



维普数据库全文收录

中国国际中文期刊卓越行动计划 建设期刊

国际中文学术期刊数据库ICAJD 收录期刊

人文与社会科学学刊

Journal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Humanities

Social Sciences



香港人文社會科學研究院
HONG KONG RESEARCH INSTITUTE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WISVORA

ISSN 3079-4552



ISSN 3079-4552

eISSN 3079-4560

1 卷 5 期

2025年6 月

人文与社会科学学刊

Journal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主办 香港人文与社会科学研究院
Hong Kong Research Institute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编辑出版 《人文与社会科学学刊》编辑部
编辑部邮箱 xk@wisvora.com
投稿地址 www.wisvora.com



中国国际中文期刊卓越行动计划 建设期刊
国际中文学术期刊数据库ICAJD 收录期刊

总编辑 陈科存
副总编辑 梅见华 孙文杰

编辑委员会

李兆祺	林鑫	苏天	穆艾伟	熊森浩
刘伟伟	吕憬岩	黄少安	刘宇	叶明裕
陈曦	景瑞宾	崔健	王正威	李泽宇
姚金芳	李明蔚	吴钰双	穆尚海	曹一君
陈立立				

青年编委

舒波 田蕾娅

版权声明

文章版权由文章作者与维思沃尔出版社(WISVORA Publishing)所有。单篇文章由 WISVORA Publishing 正式出版, 所刊载文章均依照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进行许可。根据该许可协议, 任何第三方在明确署名原作者与出处的前提下, 均可对本刊内容进行复制、传播、演绎使用, 无需作者及出版社另行个别授权。

《人文与社会科学学刊》© 已获得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4.0 International许可



香港人文社會科學研究院
HONG KONG RESEARCH INSTITUTE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香港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专注于人文与社会科学领域的学术研究与交流, 旨在为学者提供研究支持, 并促进知识的共享与应用。研究院通过出版学术期刊、举办学术会议及提供政策建议, 推动学术界与社会各界的对话与合作。

网址: www.hks.ac.cn 邮箱: info@hks.ac.cn



*Journal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国际标准连续出版物号

印刷出版 ISSN 3079-4579

电子出版 ISSN 3078-4387

出版社 WISVORA Publishing

维思沃尔出版社

地址 香港新蒲岗景福街99号启德工
业大厦8楼D07

wisvora-publishing@wisvora.com

www.wisvora.com

中国大陆引进
北京中科进出口有限责任公司

中国大陆运营
广东国图出版管理有限公司



WISVORA
Publishing



微信扫一扫

维思沃尔出版

目 录 TABLE OF CONTENTS

- 意识冰山的倾覆：从弗洛伊德潜意识理论解构《乌合之众》的群体非理性 - 陈立立，曹一君 1-3
- 鄂东南传统民居的数字化推广策略研究——以咸宁市为例 - 张鹏 4-9
- 虚实之间的人文实践：基于 3A 游戏案例分析数字空间的人文价值与实现路径 - 杨亨冉 10-15
- 从“他者化”到“对话”：弗兰克·麦吉尼斯《会有人看顾我》中的身份建构与协商 - 姜依玲 16-20
- 中国城市旅游的恢复性服务景观对游客满意度的影响研究：关注感知价值的媒介作用 - 孙晓丽，张惠媛，陈宇 21-27
- 电视专题多维表达与价值认同策略——以《放歌新时代》为例 - 王俊翰，冯磊 28-31
- 广东沿海经济带县域经济发展路径分析——以湛江市为例 - 刘婷 32-36
- 中华民族共同体视域下民族音乐文化传承传播研究——以成都青少年民族乐团为例 - 幸子依 37-41
- 接受美学视阈下的跨文化翻译策略研究——以季羡林自述作品的文化负载表达与隐喻翻译为例 - 金成臻 42-46
- 以诗为境理念指导下的大学公共数学教学 - 苏莉，于晟伟 47-49
- 旅游对大学生心理健康影响的研究进展与启示 - 袁宏瑞，李贝贝，殷程强 50-56
- 大模型标注基础上中国文化类视频的多模态话语意义构建研究 - 秦子敏 57-63
- 论金爱烂《角质层》中的消费意识形态幻象 - 苏超慧 64-67
- 与中国接壤的南亚东南亚国家主流媒体中的中国形象呈现研究——以中国斡旋沙特伊朗建交的相关报道为例 - 李博晔，黄芊 68-74
- 大卫一世与苏格兰自治市镇的兴起探究 - 张丽 75-79
- 林业上市公司社交媒体企业环境信息披露研究 - 田轶凡 80-86
- 看不见的空间选择——试论欧洲美声唱法与中国民族唱法的审美差异 - 秦杰 87-90
- 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的逻辑理路 - 李晶，王丽华 91-94
- 基于 CDIO 理念的多音阶简易电子琴电路实验的教学设计 - 于沛，于晟伟，王慧颖，李晶，孙墨，孟瑜，李姚 95-101
- 严肃游戏视域下的汽车文化传播研究 - 史舒扬 102-105
- 《阿诺拉》：一场关于身份与权力的电影隐喻 - 辛月 106-109
- 从柳州市紫荆花文化创意廊看文创产业与教育融合的创新路径 - 谭凯琪，徐彬芸，张靖彬，黄柳清 110-114
- IP 到 DP 的价值跃迁机制：虚拟形象全产业链开发的协同演化路径 - 杨雅轩，李佳纯，马思雨-马存军，苏涛，胡珂 115-118
- 论陶渊明思想对地理困境的超越 - 方立娟 119-125
- 基于听辨实验的延边朝鲜语使用者对首尔方言单元音/ɔ/与/o/的感知样态考察 - 许秦 126-131
- 时空视域下城市流动摊贩治理探索与启示 - 沈洋冬，黄高琴，林选妙 132-136
- 高中语文古诗文教学的困境与策略探究——以学习任务群为视角 - 刘涵 137-141
- 新会计准则对房地产企业财务报告合规性的影响分析——基于收入确认与资产减值视角 - 高存毅 142-145
- 混合式教学“三步三思”高阶能力转化教学研究——以新工科背景下《线性代数》课程为例 - 王慧颖，于晟伟，于沛，宋云涛 146-150
- 东西方“互联网+大健康”行业发展模式探讨 - 赵雨馨 151-156
- 壮族三月三节文化与高校英语教学的融合探析 - 许远鹏，李祝杏，韦庆源 157-161

在主体与客体之间：《静安庄》的通感隐喻及其建筑 - 钱亮帆, 魏美如 162-167

两创"背景下客家童谣融入幼儿园课程的路径研究--基于文化生态学视角 - 方梦麟 168-170

非遗文化融入美育的创新机制研究 - 陈洛羽 171-174

中国国家男篮和国青男篮成绩差异致因及路径 - 谷佳威, 谢莹莹 175-178

基于慕课平台的运动教育模式本土化改造研究--以高校篮球课程为例 - 谷佳威, 谢莹莹 179-181

数字年龄歧视--人工智能给老年人带来的挑战和机遇 - 沙琳·楚恩, 吴静, 刘晓燕 182-188

虚拟货币洗钱犯罪的法律风险与防控机制研究 - 陈文博 189-192

电子伙夫：女性玩家烹饪类游戏的角色实践与隐性规训 - 刘葶葶 193-196

狄德罗的"怪物"与后人类--基于人的偶然性的解读 - 夏铮铮 197-203

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教育的历史逻辑与当代治理启示 - 傅丽君 204-209

英汉认知隐喻对比：通过"（口）渴"和"饥（饿）"表达的"愿望" - 郑翮 210-213

语篇分析视角下语言景观治理研究 - 吴仲启, 陈维妙 214-217

从海洋到城市：广州海洋文化与城市文化的共生逻辑与战略选择 - 郭彦汝 218-224

核心素养视域下 BOPPPS 模式在中学英语教学中的应用 - 邢新荣 225-228

颜色词在国际中文教学中的文化价值研究 - 洪杨 229-231

翻译美学视角下《伤寒论》中模糊语的英译研究 - 蒋靖, 柯蓬 232-241

副文本理论下《道德经》英译本脚注的文化阐释研究 - 杨白雪 242-246

《白鹿原》的性别文化意识分析 - 李昊军, 赵晓倩 247-250

基于"互联网+"的电工电子课程数字化教学模式探究 - 付亚坤, 于晟伟, 何永明 251-254

智能时代下设计的系统化转型研究 - 寇犇, 曹棵棵, 袁臣辉 255-258

短视频切片对电影叙事与传播路径的重构 - 曹棵棵, 寇犇 259-262

亲子联结强度及学业自我效能感对普通高中生抑郁程度的影响：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 2022 数据的实证分析 - 于文丽, 陆泳仪, 葛蒲, 杨赛儿, 张瑞峰 263-268

食品安全犯罪的侦查取证研究 - 钟云东 269-273

数智文化赋能抚州康养产业发展的对策研究 - 许迅, 李亚军 274-278

"小鸭舍·大振兴"：生态养殖模式对乡村可持续发展的路径探究 - 陈铭杨, 樊震怡, 章浩, 冀文慧 279-282

红色旅游线路中的乡村公共艺术介入研究--以大别山红安县为例 - 张智乐, 吴楚君 283-286

金融集聚对产业创新成果转化的影响研究 - 郭杨, 洪果琳, 马晓婷, 马晓磊 287-293

内容、形式与身份：处在阈限中的中国作者纪录片 - 李忠业 294-297

基于 Citespace 可视化分析脑卒中患者运动功能康复的研究热点与演化趋势 - 黄佳雪, 陈园, 周宏宇 298-304

文旅融合视域下宁德市陆游文化旅游资源开发 - 林黎茜 305-310

基于大语言模型和 RAG 的舆情知识交互及推荐研究 - 马钰 311-314

"人工智能+"驱动的计算机专业创新型人才培养模式研究 - 王天顺, 马钰, 付丽方 315-318

红色文化融入大学生理想信念教育的路径探析 - 张雅平 319-322

乡村振兴背景下工业与遗产旅游"政产学研用"多维联动教学机制研究 - 宋承霖 323-326

本土音乐文化在幼儿园音乐教育中的融合现状和反思 --以广东省江门市幼儿园为例 - 李丽婷, 杨晓岚 327-331

云南省乡村教师身份认同现状调查研究--基于 1908 份数据的分析 - 张善富, 代江丽 332-337

意识冰山的倾覆：

从弗洛伊德潜意识理论解构《乌合之众》的群体非理性

陈立立¹ 曹一君¹

(1.广东文理职业学院, 广东 廉江 524400)

摘要：本文以古斯塔夫·勒庞的《乌合之众》为研究对象，结合心理学中意识与潜意识的二元结构理论，探讨群体心理的形成机制及其对社会的影响。文章通过分析个体在群体中“自我意识消解”的现象，揭示了群体非理性、易受暗示、暴力倾向等特征，同时从弗洛伊德潜意识理论出发，阐释了人类行为受无意识支配的本质。进一步地，文章将群体心理的运作逻辑与社会权力更迭相结合，指出群体既是历史变革的推动者，也是意识形态的被动服从者。这一分析不仅深化了对《乌合之众》的哲学解读，也为理解当代社会现象提供了心理学视角。

关键词：群体心理；潜意识理论；非理性行为；社会权力更迭；意识形态服从

Doi: doi.org/10.70693/rwsk.v1i5.940

一、群体心理的形成与特征

《乌合之众》是一本及其精彩的理论式小说，严格意义上它是一本心理学作品，一本研究群体心理的心理学作品，却又饱含着许多哲学家的深刻思维，闪耀着心理学和哲学的色彩，说理，辩证和解释上都十分耐人寻味。

在介绍这本书之前，要先介绍一个哲学问题。哲学家、文学家和心理学家在各自不同的研究领域中，面临着一个共同的人生终极问题，这个问题就是“我是谁”。古往今来，这是一个亘古不变的问题，无数的人发出这个疑问，有的人终身致力于认识自我，有的人终身都没有认识到这个问题。

讲述这个问题，要先来分析人类的意识结构。我们通常认为人的意识分为意识和潜意识两部分，潜意识也称为无意识。如果把人全部的意识看成海面上的一座冰山，那么意识仅仅是漂浮在海面之上，那可见的百分之五，海面之下蕴藏着神秘且力量庞大的能量，那即是人的潜意识。每个人的潜意识都是自由的，是非理性、甚至非道德的一部分，日常参与我们生活的是意识部分，意识通常在抑制我们的潜意识，让我们能做出符合社会生活的行为。表面上看起来，我们的意识控制着我们，抑制着我们的潜意识，但实际上又并非如此。意识永远不可能战胜潜意识，举个例子，我们不想去上课，这是潜意识里渴望自由的那部分开始发挥了作用，然后意识会告诉你，必须要去上课，旷课会影响平时分，可能会导致挂科，进而影响毕业。于是你不得不去上课了，此时意识看似战胜了潜意识，但你在被迫去上课的时候，产生了不满、愤懑的情绪，甚至选择了上课的时候走神、发呆、玩手机、消极抵抗，这就是潜意识依旧在发挥它巨大的作用。人之所以不能认识自我，因为大部分人都无法意识到自己的潜意识部分，潜意识是一个绝对忠诚于自己的东西，它就像是你心里最深处的那个小孩，它反映着你最强烈的渴望，你受到的伤害，你的隐藏着的思维模式，我们一生都在靠着潜意识的指挥去生活，却只有极少部分人意识到了潜意识的存在。

二、潜意识与群体行为的关系

那么什么东西是我们的潜意识部分呢，你上课时发呆脑子里天马行空无拘无束的那段时间里，想的东西就是潜意识的部分，还有你的梦境，这就是解梦的原理，透过你的梦境，触摸到你的潜意识，可以分析出你目前的渴望，你的状态甚至更多。还有你的思维模式，如果总结和剖析你在面对事情和挑战时，采取的惯用做法、产生情绪的核心原因，或者是人生的经历特别是童年的经历，就会发现哪些事情对你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导致你形成了

作者简介：陈立立(2002—)，女，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教育管理学

曹一君(2001—)，男，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教育管理学

通讯作者：陈立立

什么样的思维模式，这算是真正认识自我的一部分，这一点非常难，依靠个人是难以完成的，这是心理学家的领域。举个例子，今天有个人，非常爱表现自己，以求得到别人的认可，经常不能接受别人的批评。这个特点进而决定了她非常关注别人对她的看法，以及经常抑制自己以迎合别人。通过分析发现，因为她幼年时期被父母抛弃，是被家里的长辈抚养长大的。而长辈最经常说的话就是，如果你不乖，我就不要你了。这句话对她的人生影响巨大，不乖、不优秀——被抛弃，这个公式成为了指导她人生的真理。她没有自我的边界，不知道别人的侵犯到哪一步是侵犯，总是无底线的退让和迎合，因为害怕自己不被喜欢，然后被抛弃，同时也让她总是承担着巨大的压力和焦虑去努力，因为很明显，潜意识的思维模式告诉她，不优秀，也会被抛弃。

三、群体心理对社会的影响与权力更迭

理解了意识和潜意识的部分，我们再来讲《乌合之众》，笔者讲从几个问题入手去分析。

第一，如何领导群体。首先什么是所谓的群体，勒庞所说的群体，并不是普通意义上的大众或者是群众，许多人偶然集合在一起，哪怕人数再多也不会构成群体。群体是一个特殊的心理集体，指的是受到某一事件，演说、激情、恐惧、爱恨的刺激而聚集在一起的人，为了某个目标或某些精神需求而有所行动的人。想要控制一个群体，就要先把握群体的心理。人一旦加入一个群体，原本的个性就会消失，同时丧失的还有独立思考的能力，无意识开始支配他，智力程度减弱。结群后，由于人多势众，个人会产生一种幻觉，感觉到自己力大无穷，无可战胜，好像没有什么事情是办不到的，又因为法不责众，知道自己无论做什么坏事都不会受到惩罚，所以也不需要负责任。束缚个人的责任感一旦消失，人就会随心所欲，肆意妄为，这个束缚个人的责任感，就是理性的部分，也十分接近我们说的意识的作用。所以一旦加入一个群体，人就变成了一个野蛮人，凶残，易怒且暴力。一个人是不会去杀人的，但是一个人在群体里，在群体的鼓动之下，他会轻而易举的做到这件事，甚至成为一种荣耀，无论他是一个普通的市民，还是一个教育学家。

群体游走在潜意识的边缘，极其容易受到暗示，暗示会通过传迅速进入他们的大脑，让他们做出独自一人时不会做出的事情。而受到暗示的群体，可以随时为了暗示给他们的理想而赴汤蹈火，如果被利用的好，他们也会表现的大公无私、勇敢无畏、无比忠诚，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堪称为高尚的道德典范，比如军队就是如此。

那么什么样的暗示，可以最快的支配一个群体呢？答案是涉及传统的、简单的、不具体的。影响群体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种族，历史上的种族一旦形成，它就会通过遗传规律产生巨大的力量，以至于它的信念，制度和艺术，它的所有文明成分都成了灵魂外在的表现方式。这就是传统，传统代表着过去的观念，需求和情感，它是种族精神的综合，对我们影响巨大，民族是过去形成的一个有机体，它像所有的有机体一样，只能通过一代代缓慢的遗传积累才发生变化。给群体的暗示如果是和父辈的信念背道而驰的，那这个暗示就一定是短暂的。但支配和控制一个群体最快速的方法就是掌握群体的民族意识。这实际上很好理解，群体是一个游走在潜意识的集合，那么民族意识，就是群体所有个人潜意识里共质的部分，催动共质的部分，就足以控制群体。这就是军队这个群体集合的如此迅速、且发挥巨大力量的原因，因为它涉及了爱国，维护民族存亡利益等因素。群体里的个人是不需要自我和独立思考的，一旦如此，这个群体就马上分崩离析。最可怕的偶像并不在庙堂里，也不是宫殿中那些最专制的暴君。这些人可以一下子就消灭，但统治群众的思想，是看不见的主人，任何反抗对它们来说都不起作用，只能用时间来消磨。

简单的、抽象的暗示，给群体的刺激不管是什么观念，其形式只有变得绝对和简单的时候，才能显示其重要性，只有不那么具体的时候，才更容易得到认可和传播。在建立一个暗示的时候，简化暗示的内容，取一个好听名字，对群体来说十分重要。正如1873年西班牙的血腥革命，就因为一个神奇的词语，意思很含糊，每个人都可以根据自己的方式来解释它。“激进派已经发现，集权制的共和国就是改头换面的君主国。为了让他们高兴，会议一致通过成立联邦共和国，虽然没有一个投票者能说清楚刚刚投了什么票，但这个名称让大家都很高兴。美德和幸福降临到人间了。一个共和党人，如果政敌拒绝给予他联邦主义者头衔，他会大发雷霆，就像受到了天大的侮辱。人们来到街上互相祝贺，联邦共和国万岁。联邦共和国是什么东西呢？有的人认为是各省解放，建立与美国相仿的制度，或者是行政分支；有的人则认为这是要消灭所有的权力，进行社会大清算。”

社会的更迭是如何进行的。勒庞认为，时代和社会的更迭更多的都是大众的选择，群体的天性不在于斗争，而在于服从。不是政权统治群众，是群众造就了政权。不是制度统治群众，是因为群众才诞生了制度。即群众不停的选择新的思想和政权来服从，一旦这个政权和思想失去了生命力，群体就会奋起推翻这个腐朽无力的机构，然后找到下一个合适的选择。而在这个期间，就必然处于无政府状态。

制度和统治是种族的产物，远非时代的创造者，而是时代所创造的。对民族的统治不能乱来，而是要根据他们的性格来决定。一种政治制度的形成需要几百年，更改它也需要几百年。制度没有任何固有的品质，本身没有好坏之分。

第三,新的暗示要通过宗教形式建立。群体的信念用一个词语来概括就是“宗教情感”,不需要推理,不能忍受讨论和矛盾,只拥有强烈和极端的情感。群体崇拜心目中的崇高者,害怕他身上所谓的神奇力量,缺乏分析教条的能力,只想着传播他们,所有不接受这些教条的人都被当做是敌人。他们倾其所有的精神资源,服从意愿和热情想象,为某种事业或者个人效劳,并将其作为自己思想和行动的目标指南。勒庞认为,信仰某种东西,是我们人类一直不曾改变的特质,只不过时至今日,我们把信仰的对象改变了,从以前的崇拜自然,崇拜天神到崇拜科学。在被理智之光照亮的那天,人们打破了装饰教堂祭坛的神像和圣人画像,灭了蜡烛,然后又不失时机的运用某些无神论者的著作代替被毁灭的神像,虔诚的重新点燃蜡烛。人们的宗教信仰改变了,可是宗教情感从不改变。建立支配群体的暗示,必须具备宗教的形式,因为宗教形式让这些暗示免于讨论。无神论之所以被群体接受,也是因为它具有宗教感情的那种偏狭狂,拥有了这种外在的形式,它很快就变成了被崇拜的对象。

四、心理学视角对现代社会的启示

今天我们大部分人都是无神论信念的虔诚信仰者。随着更多的阅读和思考,我们应该更多的明白,正如书中所说的那样,我们的宗教情感不曾改变,不妨把科学和理性也当成信仰的一种。书中有一段话深刻打动着笔者“科学许诺给我们真相,至少能让我们明白我们的智力所能理解的各种关系。但它从来没有许诺给我们和平与幸福,它对我们的感情无动于衷,听不见我们的哀号。但我们又必须努力与它共处,因为没有任何东西能夺回被它赶走的幻想。”文艺复兴之后,人们得到了越来越多的自由,失去了宗教这个有力的戒尺,法律和道德代之,却不具备上帝那样的无处不在的监察和公信力,也无法解答人的意义和归宿问题。从某种意义上说,信仰科学与理性的人失去了永恒的本质,却又为没有永恒和确定焦虑着。

人类的每一次进步都需要付出巨大的代价,在文明的前进中,我们大多数人都是愚昧群体的一员,只有屈指可数的人足以短暂的成为群体的领袖,但卑微如我们,多阅读和思考,尽量保持独立,希望也能参破其中,留存一点智慧的火花,也就少一点时代的被动。

参考文献:

- [1]古斯塔夫·勒庞.乌合之众[M].北京大学出版社:201901:180.
- [2]张兆端.群体行为和群体性事件的社会心理机制——勒庞《乌合之众》和莫斯科维奇《群氓的时代》读介[J].山东警察学院学报,2012,24(01):100-113.
- [3]姜启壮.对弗洛伊德理论体系中自我概念的整理[D].四川大学,2007.
- [4]李侠.意识与潜意识的认知机制——以梦的颜色为探析视角[J].江西社会科学,2017,37(03):14-25.
- [5]张浩.论潜意识或无意识认识[J].东岳论丛,2007,(04):126-130.
- [6]复生.意识与潜意识[J].中国人才,2000,(05):52.

The Overturning of the Iceberg of Consciousness: Deconstructing the Group

Irrationality of "The Crowd" from Freud's Subconsciousness Theory

Lili Chen¹, Yijun Cao¹

¹ Guangdong Vocational College of Arts and Sciences, Lianjiang, Guangdong

Abstract: This article takes Gustave Le Pen's "The Crowd" as the research object, and combines the binary structure theory of consciousness and subconsciousness in psychology to explore the formation mechanism of group psychology and its impact on society. The article reveal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irrationality, susceptibility to suggestion, and violent tendencies of a group by analyzing the phenomenon of "self-awareness dissolution" of individuals in the group. At the same time, starting from Freud's theory of the subconscious, it explains the essence of human behavior being governed by the unconscious. Furthermore, the article combines the operational logic of group psychology with the change of social power, pointing out that groups are both drivers of historical change and passive followers of ideology. This analysis not only deepens the philosophical interpretation of 'The Crowd', but also provides a psychological perspective for understanding contemporary social phenomena.

Keywords: Group psychology; Subconscious theory; Irrational behavior; Social power turnover; Ideological obedience

鄂东南传统民居的数字化推广策略研究——以咸宁市为例

张鹏¹

(1.湖北科技学院艺术与设计学院, 湖北 咸宁 437100)

摘要: 鄂东南传统民居作为荆楚文化与徽派技艺交融的物质载体, 以咸宁市为核心区域留存了丰富的历史建筑遗产。将分析其传统民居的历史文化、建筑技艺价值及经济薄弱、传播滞后、认同不足等困境。提出通过激光扫描、BIM 建模构建数据库, 借助 VR、AR 打造沉浸式场景, 结合互动游戏、短视频强化传播等适配策略。研究表明, 数字化能提升乡村旅游体验, 推动“观光”向“沉浸参与”转化, 促进“单一产品”向“多元业态”创新, 通过文化 IP 传播重塑地域认同。研究为传统民居数字化推广及乡村旅游升级提供技术路径, 为其他经济欠发达地区起到借鉴意义。

关键词: 鄂东南传统民居; 数字化推广; 文化遗产保护; 活态传承

基金项目: 2024 年度湖北省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鄂南文化研究中心开放项目《旅游数字化背景下鄂南民居建筑的推广对策研究》(2024ENWH19)

Doi: doi.org/10.70693/rwsk.v1i5.932

一、引言

传统建筑与建筑遗产是全球人居环境不可再生的宝贵资源。特别是具有历史属性的传统建筑, 更是地域性历史文化、生活方式、艺术造诣的综合表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实施〈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操作指南》强调数字化技术在遗产建档与传播中的核心作用^[1]。意大利“数字庞贝”项目通过 1:1 激光扫描 (精度达 0.5mm) 与 VR 重建, 实现了遗址的沉浸式展示与损伤模拟, 为濒危遗产提供了非接触式保护范式^[2]。Iñigo Leon 等 (2020) 在西班牙遗产保护实践中, 结合无人机摄影与地面激光扫描, 提出“快速高精度数字化”技术路径^[3]。国内研究则围绕技术应用、传播创新与理论建构展开: 技术应用层面, 曾宪川等在《岭南经典传统民居 BIM 数字化图录》中, 通过建筑信息模型 (BIM) 实现了传统装饰纹样的参数化记录, 解决了复杂构件的精准建模问题^[4]。为咸宁传统建筑的数字化保护、留存与推广起到了技术方式探索。

在数字化传播方面, 智慧公园已经形成了完整的综合性数字化应用。秦琅等以徽州屏山有庆堂为例, 通过扩展现实 (XR) 技术构建沉浸式交互系统, 证明技术赋能可提升文化遗产的体验深度^[5]。马利广提出了“传统民居数字化采集三层架构”^[6], 为咸宁建立分级数据存储体系提供了理论支撑。

理论建构层面, 杨群基于元宇宙视域, 提出“数字孪生+文化叙事”的传承模式^[7], 刘沛林等则强调“参与式保护”理论, 主张将社区纳入数字化进程^[8], 这些传播途径的探索, 为经济欠发达的咸宁地区传统民居传播提供了多元协同传播机制的框架指引。

基于咸宁市的经济体量、城市影响力、传统民居资源等客观情况, 本文提出了三点研究问题:

1. 鄂东南传统建筑数字化留存的意义是什么。
2. 数字信息化时代, 适合经济较弱地区的数字化应用方式。
3. 传统民居数字化留存对乡村旅游具有那些影响。

二、鄂东南传统民居现状分析及研究意义

2.1 多维价值体系的地域特质

传统民居是地域文化的重要载体, 蕴含着丰富的历史、艺术和学术价值, 然而, 受人口外流、建设性破坏及自然侵蚀等经济、人为、自然的影响, 传统民居存在一定程度的损毁及破坏^[9]。

鄂东南地处长江中游南岸, 以咸宁为中心的区域孕育了兼具楚风徽韵的传统民居体系。咸宁市作为鄂东南的重要城市, 拥有大量的古村、古民居, 如垌口村、羊楼洞村、内冲瑶族村等, 这些传统民居是咸宁历史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截至 2024 年, 咸宁境内有 27 个中国传统村落 (表 1)、382 处登记在册古民居, 其中明清时期建筑占比达 45%, 形成以徽派建筑风格为基础的鄂南传统民居风格。这些民居以“多开间、多进深”的族居空间格局、精湛的木雕砖雕技艺及宗族文化符号, 成为荆楚文化的重要物质载体 (图 1)。

作者简介: 张鹏, 湖北科技学院艺术与设计学院, 助教, 博士生, 研究方向为传统村落、景观设计、工业遗产保护。

这些传统民居是咸宁历史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现代城镇化快速发展的冲击下，咸宁传统民居的保护与推广面临着知名度不高、传播渠道有限、与现代生活融合不足等发展性问题。

表1 咸宁市传统村落及建筑特点（作者自绘）

批次	村名	建筑特点
第一批	羊楼洞村	中俄万里茶道、明清石板街、茶产业链
第二批	无	无
第三批	垌口冯村、刘家桥村、回头岭村、 宝石村、西泉村、畈上王村	明清建群，徽派与鄂南建筑风格融合、 楚天民俗第一村
第四批	大塆村、内冲瑶族村、高湖村朱家湾 彭碑村、郭家岭村、纸棚村、郑家坪村、石门村、西庄	明清建筑群、红色遗址、瑶族发源地 梯田农耕文化、造纸文化、
第五批	村、上坳村、厦铺村、白泥村、 张司边村	人神共居文化建筑、 明清建筑群、石建筑群、
第六批	白岩泉村、安丰村、润田村、 金星村、江源村、车田村	万里茶道古驿道遗迹、红色遗址、古码头商 贸景观、清代民居及古桥景观



图1 族居民居（作者自摄）

2.2 工艺技艺的文化融合性

咸宁传统民居是融合了民居建造技艺、民俗文化、生态选址技艺为一体，展示了良好的“三生空间”的物质遗产。

民居建造技艺体现在主体结构上，采用“穿斗式构架为主、抬梁式为辅”传统制式，节点采用“走马销”、“穿枋榫”等楚地特色榫卯，增强抗震性能，同时融合徽派“马头墙”、“封火山墙”等元素。墙体采用本土化原材料，“竹编夹泥墙”，以楠竹为骨架、混合红土与稻壳夯筑，兼具保温与防火性，体现“因材施教”的营建智慧，共同构筑了石基青墙黛瓦的建筑范式。在细部雕刻方面，“通山木雕”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普遍应用于咸宁地区的传统建筑木构装饰中，题材不局限于植物、神兽、传说故事等，均象征着美好寓意。

民居空间作为宗族社会的物质载体，承载着复杂的民俗宗族社会功能。在通山王明璠府第的“三进两院”格局中，正堂用于宗族祭祀，两侧厢房按“长幼有序”分配居住空间，形成了以祖先祭祀为中轴主体，居住为辅的家族式群居院落。

在空间功能性方面，天井与前厅作为核心公共空间，承载“新春开井”“冬至祭祖”等民俗，也是主家进行一系列宴请活动的主要场所。

民居选址与村落选址充满了生态智慧与经济智慧。以茶产业为主的羊楼洞古街的“前店后宅”式民居^[10]，车田村滨水民居，均借助长江支流与水运交通，促进了村落经济发展，既满足了山水生态村落的传统风水理念，也反映明清时期商贸交易的生存需求。

2.3 鄂东南传统建筑数字化推广的意义

鄂东南传统建筑承载着地域文化的核心基因，但其推广面临多重现实阻滞，在咸宁这一经济欠发达地区，深层反映出经济基础、传播理念与社会认同的结构性矛盾。

2.3.1 推广存在的制约性

(1) 经济基础较弱

2024 年咸宁经济体量不足 2000 亿元，排湖北省第十，直接导致地方财政对乡村投入资金不足，同时乡村缺乏产业链，青年群体外流，空心化严重。基层政府无力承担空置传统建筑的修缮保护项目，长期面临维护资本大于修缮资本的赤字投资，导致多数建筑处于“有限维护”状态。

(2) 传播意识的制约

安居意识的禁锢是传播意识不足的主要制约。咸宁坊间定位一直是武汉市后花园，生态资源型城市，立足建设生态康养、生态旅游等城市第三服务产业，基于传统村落多存在与远离主要发展地段的山区，受地理因素影响，制约了针对传统村落传播意识的拓展，自媒体传播偏向营利性热点传播，对传统建筑的传播兴趣度偏低。

数字化传播的技术短缺是传播手段不足的核心困境。作为缺乏高新技术及数字化科技欠缺的城市，过度依赖外部数字产业支持，将形成投资大、成效低、覆盖面小的传播困境。缺乏数字化模型资源库营造的沉浸式体验场景，如敦煌研究院的“数字藏经洞”；缺乏乡村民俗居民俗文化叙事体系构建，如武汉“知音号”；缺乏传统建筑构建体系框架模型，如抖音账号“见筑师”、“天工开物”等。

地域认同不足是缺乏以文化为基础的建筑载体推广制约。咸宁市为湖北省四线城市，第七次人口普查总人口 304.14 万，人口流动频繁。咸宁城市大 IP 及传统建筑 IP 的认可度不足，数字化传播并不能产生爆炸性吸睛效应，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数字推广的广泛认可度。地方官媒“咸宁文旅”抖音粉丝仅 1 万人，发布视频作品 324 个，多为旅游推介、城市宣传等官方范式推广，无法引起共鸣，一定程度上造成了低感知的地域认同。

2.3.2 数字化推广的意义

传统建筑的数字化推广，在助推文化的永续传承方面，能有效进行濒危遗产的永久性数字存档与活化，多元文化要素的系统性整合与叙事重构。在刺激经济新生态方面，推动低成本、高附加值的文化产品转化，跨地域、跨产业的价值延伸与品牌塑造。在重塑地域文化认同方面，激发年轻群体的文化启蒙与参与式传承培育社区主体的文化赋能与身份重构。

三、基于数字留存方式的推广策略

3.1 数字化记录与存储

通过激光扫描技术、无人机航拍测绘技术、BIM 模型构建技术等，进行传统民居数字化数据库建设。

激光扫描技术：激光扫描技术以其高精度、高效率的特点，能够快速获取传统民居的三维几何信息。通过激光扫描技术精确地反应建筑的表面形态和空间结构。结合数据处理软件，对扫描数据进行去噪、滤波、配准等处理，以获得高质量的三维点云数据。

无人机航拍技术：无人机航拍技术为传统民居的外部形态记录提供了全新的视角和手段。配备高分辨率相机的无人机能够灵活地在建筑周围飞行，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影像数据。这些影像数据通过软件生成二维正射影像图（DOM）和数字表面模型（DSM），亦可通过三维软件构建出传统民居的三维模型，进行数字化留存。

建筑信息建模（BIM）技术：BIM 技术是一种集成了建筑几何信息、物理信息、功能信息等多维度信息的数字化建模技术。通过将激光扫描数据和无人机航拍影像数据导入 BIM 软件，构建传统民居的详细三维模型，并为其赋予丰富的属性信息，如建筑材料、构件尺寸、结构性能等。BIM 模型还可以为后续的保护、修复和管理工作提供有力的支持，如进行结构分析、碰撞检测、施工模拟等。

3.2 虚拟展示与沉浸式体验

（1）线上展示平台

搭建集三维模型、历史档案、全景漫游、多媒体资源于一体的数字化展示平台，是推广鄂东南传统民居文化的重要窗口。该平台应具备以下功能和特点：

用户友好型界面设计：平台的界面应简洁直观，易于操作，使用户能够轻松地浏览和检索各种信息。同时，应提供多种导航方式，如按地区、按建筑类型、按历史时期等，方便用户快速定位感兴趣的建筑。

资源丰富型信息展示：除了展示传统民居的三维模型和全景漫游外，还应集成与其相关的历史文献、图片、音频、视频等多种多媒体资源，为用户提供一个全面、深入的了解渠道。如，通过展示向阳湖知青的历史沿革资料，让用户了解其时代发展历程和文化背景。通山木雕通过数字化模型解构，展示传统建筑工艺的精湛技艺。

（2）VR、AR 体验场馆建设

AR、VR、MR 等技术已经熟练应用于城市公园沉浸式景观体验中^[1]。构建沉浸式数字体验馆已然成为重要的推广方式之一

VR 技术应用：VR 技术能够为用户创造出一个完全沉浸式的虚拟环境，使其仿佛身临其境地置身于传统民居之中。通过佩戴 VR 头盔等设备，用户可以在虚拟环境中自由地行走、观察和互动，深入了解建筑的内部结构、装饰细节以及文化内涵，还可以通过设置虚拟场景，展示传统民居在不同历史时期的风貌变化，增强用户对文化遗产的认知和理解。

AR 技术应用：AR 技术则将虚拟信息与现实场景相结合，为用户带来更加直观和便捷的体验。在传统民居的保护与推广中，可以开发基于 AR 技术的移动应用，用户通过手机或平板电脑的摄像头扫描现实建筑，即可在屏幕上看到与之相关的虚拟信息，如建筑的历史背景、构件名称、工艺介绍等。此外，还可以利用 AR 技术实现虚拟修复功能，让用户直观地看到受损建筑修复后的样子，提高公众对文化遗产保护的关注度和参与度。

(3) 互动式文化体验

开发与鄂东南传统民居相关的互动式游戏、影视与教育应用，是吸引年轻群体关注、增强文化传承趣味性的的重要手段。

影视开发：咸宁地区的自然风貌与传统建筑曾作为许多影视作品的取景地，受到较高评价。武汉地区是当前短视频影视的重要发展地，文化部门需对接网络文化传播公司，吸引针对乡村类型、仙侣类型、文化回忆类型的网剧项目，前往传统村落进行常驻拍摄，鼓励创作关于咸宁市的优秀影视文本，促进微电影影视传播推广。

建筑设计游戏：设计以传统民居为主题的建筑设计游戏，以小程序形式进行推广。使用户在游戏中扮演建筑师的角色，按照传统建筑的营造法则进行房屋设计和建造。在游戏过程中，用户可以深入了解传统民居的建筑结构、材料特性以及工艺技巧，培养对传统建筑文化的兴趣和热爱，促进结构性探索类游戏推广。

沉浸式游戏研发：以传统村落场景为基底，开发探索类、文化类、营造类体验式游戏，开发一款融合传统民居文化元素的解谜游戏，将建筑历史、民俗故事、传统技艺等内容巧妙地融入谜题设计中。玩家在解谜的过程中，不仅是游戏的参与者，更是文化的探索者，通过对谜题的解答，逐步揭开传统民居文化的神秘面纱，增强对文化遗产的认知和认同感。

(4) 社交媒体推广

短视频平台营销：充分利用抖音、快手等短视频平台的庞大用户基础和强大的传播优势，制作并发布一系列具有吸引力和感染力的短视频，展示鄂东南传统民居的独特魅力和文化内涵。内容可以涵盖传统民居的建筑特色、历史故事、民俗活动、传统技艺等多个方面，结合建模赛道头部主播进行推广，如“见筑师”的传统建筑拆解视频登上官媒账号（图二）



图二 “见筑师”数字建模（网络资源）

社交媒体话题互动：在微信、微博等社交媒体平台上发起与鄂东南传统民居相关的热门话题讨论，引导用户参与互动和分享。例如，发布一些传统民居的老照片、建筑细节图片等内容，鼓励用户在评论区分享自己对传统民居的认知、感受和相关经历。举办线上摄影比赛、文化知识问答等活动，吸引用户积极参与，提高话题的热度和影响力。通过互联网数字化话题传播，可以扩大鄂东南传统民居的传播范围，还能够增强公众与文化遗产之间的情感联系，促进文化传承与推广。

四、传统民居数字化留存对乡村旅游的影响

4.1 游客体验升级：从“观光浏览”到“沉浸参与”的深度转化

(1) 虚实融合的立体化体验

沉浸式场景还原：通过 VR 技术对咸宁刘家桥村、羊楼洞古街、古瑶族村落等古民居群进行数字建模，

游客可通过头戴设备“穿越”至明清时期,体验古茶商交易、古瑶族人祭祀等历史场景。例如,赤壁羊楼洞村开发的“万里茶道 VR 漫游”项目^[12],游客能直观感受古民居内的砖茶制作流程,甚至“亲手”参与压模工序,通过数字化沉浸式体验,吸引游客停留。

AR 导览的知识可视化:在通城内冲瑶族村,游客扫描古民居墙体即可触发 AR 弹窗,显示该建筑的历史背景、建筑工艺及民俗活动。这种“所见即所得”的知识叠加,使游客对乡村文化的理解从表层认知深入到文化逻辑。

(2) 互动参与的游戏化体验

数字寻宝与任务解锁:推出“古建密码”AR 游戏,游客在现实场景中寻找隐藏的文化符号,解锁对应的数字藏品,完成任务可兑换非遗体验课。

虚拟角色的文化叙事:将古民居拟人化为“文化向导”,通过 AI 语音导览讲述建筑背后的故事。例如,设置数字导览系统,虚拟角色根据游客年龄调整叙事风格,对儿童讲解“古桥为什么有七个孔”(对应北斗七星寓意);对建筑爱好者分析传统建筑木结构的力学原理,实现“因人而异”的个性化体验。

4.2 旅游产品创新:从“单一观光”到“多元业态”的生态构建

未形成区域联动的多元业态共同发展,是咸宁传统建筑推广体系的思维局限。在全域旅游大力推动,传统村落集中连片发展的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咸宁各地区仍然在独立推动如“万里茶道”“古瑶民俗”“北伐战争”等各自的品牌定位。

(1) 小程序资源整合

相关单位需集中定位,开发数字化小程序,综合统筹、资源集中,提供 720 度全景漫游、虚拟民宿试住(如体验古民居改造的非遗主题民宿)、在线预约非遗体验课等功能,吸引远程游客“云端种草”。如临近省份,江西省开通了“云上古村”数字博物馆,取得较好反响,助推江西乡村旅游发展。

(2) 文化 IP 的商业化转化

数字文创衍生品开发是城市品牌推广的重要实践方式。将古民居的建筑符号(如马头墙轮廓、木雕纹样)转化为数字插画、动态壁纸、3D 打印模型等^[13]。校企联动,孵化培育青年文化创新团队,通过模块化、标准化流程构建传统建筑拼装式建筑产业,推动地域性建筑品牌产业创新。

非遗技艺的场景化嵌入:在数字化留存的古民居空间内设计非遗体验动线,例如在通山古民居群开设“木雕工坊”,游客可参照数字模型学习雕刻古民居窗棂纹样,作品经 3D 扫描后生成专属数字证书;在崇阳古民居内设置“提琴戏小剧场”,通过全息投影重现传统戏曲在古祠堂中的演出场景,使非遗体验与建筑空间形成文化共振。

五、总结与展望

5.1 总结

本文以鄂东南传统民居为研究对象,聚焦咸宁地区传统民居数字化留存的意义、适配路径及对乡村旅游的影响展开研究。首先剖析咸宁传统民居的多维价值与存续困境,指出其在历史文化、建筑技艺及生态智慧上的独特性,以及面临的经济基础薄弱、传播意识滞后、地域认同不足等现实阻滞。继而从技术应用层面提出数字化记录(激光扫描、无人机测绘、BIM 建模)、虚拟展示(线上平台、VR/AR 体验)、互动传播(游戏、影视、社交媒体)等策略,构建“记录 - 展示 - 体验 - 传播”的数字化推广体系。研究发现,数字化留存能显著提升乡村旅游的游客体验深度(如 VR 场景还原、AR 知识导览),推动旅游产品创新(数字文创、非遗体验嵌入),并通过文化 IP 塑造增强地域认同。

5.2 展望

未来研究可进一步探索:(1)数字技术与传统民居保护的深度融合,如利用 AI 进行民居状态“监测-评估”体系、区块链实现修缮过程存证。(2)构建“政府-社区-企业-高校”多元协同机制,强化社区主体在数字化进程中的参与感与受益度。(3)结合元宇宙、数字孪生等前沿技术,打造虚实融合的文化体验新场景,推动传统民居从“数字化留存”向“活态化传承”升级。此外,针对经济欠发达地区,需优化技术应用成本效益比,探索轻量化、可持续的数字化推广模式,为同类地区提供可复制的实践范式。

参考文献:

- [1] 孙燕,解立.浅议 2021 年版《实施〈世界遗产公约〉操作指南》修订[J].自然与文化遗产研究,2022,7(02):6-18.
- [2] Poehler E E. Digital Technologies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Archaeological Labor[J]. Heritage, 2023, 6(5): 3985-3997.
- [3] Leon I, Pérez J J, Senderos M. Advanced techniques for fast and accurate heritage digitisation in multiple case studies[J]. Sustainability, 2020, 12(15): 6068.
- [4] 曾宪川, 陆琦, 廖江陵. 岭南经典传统民居 BIM 数字化图录: 传统建筑装饰纹样数字化传承探讨[J]. 建筑学报, 2019(5): 4550.
- [5] 秦琅, 曹莹. 扩展现实技术在徽州传统民居建筑数字化传承中的应用——以屏山有庆堂为例[J]. 工业设计, 2023(7): 128131.
- [6] 马利广. 传统民居数字化采集及应用[J]. 信息记录材料, 2021, 22(10): 182184.
- [7] 杨群. 元宇宙视域下徽派传统民居营造技艺的数字化发展路径研究[J]. 安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3(6): 9297.
- [8] 刘沛林, 李伯华. 传统村落数字化保护的缘起、误区及应对[J]. 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8(5): 140146.
- [9] 张鹏,唐雪琼.大理白族民居建筑文化保护与传承研究[J].西南林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2021,5(04):86-92.
- [10] 张鹏. 万里茶道视域下羊楼洞茶文化传统建筑保护与发展路径研究[J]. 城市建设, 2025, 22(05): 146-149+209.
- [11] 张鹏.共生视域下数字科技赋能的新型景观场所精神[J].现代园艺,2024,47(03):147-150.
- [12] 赵雪.虚拟现实技术赋能“万里茶路”与晋商文化传播[J].文化产业,2024,(23):22-24.
- [13] 汪艳荣,罗彬.鄂东南传统建筑彩绘在荆楚建筑风貌中的应用策略研究[J].湖北科技学院学报,2023,43(06):8-18.

Research on Digital Promotion Strategies for Traditional Vernacular Dwellings in Southeastern Hubei: A Case Study of Xianning City

Zhang Peng¹

¹*School of Art and Design, Hubei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Xianning, Hubei 437100*

Abstract: As a physical embodiment of the convergence between Jingchu culture and Huizhou architectural techniques, traditional vernacular dwellings in southeastern Hubei, with Xianning City as the core area, preserve a rich legacy of historical architectural heritage. This study analyzes their historical-cultural significance, architectural craftsmanship value, and current challenges including underdeveloped local economies, inadequate dissemination, and insufficient cultural identity. It proposes tailored strategies: establishing digital databases through laser scanning and BIM modeling, creating immersive scenarios via VR/AR technologies, and enhancing dissemination through interactive games and short videos. Findings demonstrate that digitalization can elevate rural tourism experiences by transforming "sightseeing" into "immersive participation" innovating "single-product offerings" into "diversified formats" and reshaping regional identity through cultural IP dissemination. The research provides technical pathways for digital promotion of traditional dwellings and rural tourism upgrading, offering referential value for other economically underdeveloped regions.

Keywords: Southeastern Hubei traditional vernacular dwellings; Digital promotion; Cultural heritage conservation; Living heritage transmission

虚实之间的人文实践：

基于 3A 游戏案例分析数字空间的人文价值与实现路径

杨亨冉¹

(1 韩国京畿大学, 韩国 京畿道 水原市 16227)

摘 要：随着数字技术的飞速发展，高预算、高知名度的 AAA 级电子游戏不仅在娱乐领域占据重要地位，其构建的虚拟空间也日益成为承载文化、历史与情感体验的重要媒介。这些数字空间不再仅仅是游戏叙事的背景板，而是通过对现实世界的精细重建或富有想象力的创造，展现出深刻的人文价值。本文借鉴人文科学领域关于“场所”（Place）与“空间”（Space）的理论探讨，聚焦于 3A 游戏中的“人文空间实践”，这一概念指在虚拟空间设计中有意识地融入人文关怀、伦理考量与意义深度的过程。通过对《黑神话：悟空》、《刺客信条》系列和《对马岛之魂》等 3A 游戏的系统分析，说明了如何运用虚拟空间内的空间美学、环境叙事和场所感营造手段来传递人文价值。3A 游戏因其独特的互动性和沉浸感，展现出强大的文化传播、历史意识塑造和情感共鸣激发能力，尽管它们在商业逻辑及人文关怀，以及历史准确性与主观真实感之间面临紧张关系。本文主要探索实现数字空间人文价值的途径，强调跨学科合作、体验式理解、伦理反思与数字人文方法应用的重要性，作为未来的游戏设计和研究的指标参考。

关键词：数字空间；人文实践；3A 游戏；空间美学；虚拟重建；场所感；环境叙事；文化传播

Doi: doi.org/10.70693/rwsk.v1i5.936

一、引言

众多 3A 级电子游戏投入巨量资源，以惊人的视觉保真度在虚拟世界中重建现实或历史场景。从文艺复兴时期的佛罗伦萨到古埃及的广袤土地，这些数字空间以其前所未有的复杂性和细节，吸引着全球数以亿计的玩家沉浸其中。虚拟环境已远超传统意义上“背景”的概念，它们已然成为玩家体验的核心，设计理念、互动机制及其承载的文化意义，正吸引着来自游戏研究、建筑学、数字人文、文化遗产等多个领域的学者进行深入探讨^[1]。

本文的核心议题，是关注在这些 3A 游戏的虚拟空间建构中，所体现的“人文空间实践”（Humanistic Practice in Digital Space），即在数字空间的设计、开发与呈现过程中，有意识地融入人文关怀、文化意涵与意义深度的系列行为与考量。这些巨大的虚拟空间，除了提供娱乐之外，如何在“虚实”之间，创造出具有人文价值的体验？它们如何通过空间设计来讲述故事、传递情感、引发思考？

借鉴人文科学领域，特别是数字人文研究中对“场所”与“空间”重要性的日益关注^[2]，本文认为，分析 3A 游戏中的人文空间实践具有多重意义。一方面，它关乎数字时代的文化传播。互动式的虚拟体验为公众接触、理解乃至参与历史与文化遗产保护提供了全新的途径^[3]。另一方面，它深刻影响着玩家的认知与情感体验，包括沉浸感和通过身体经验塑造的场所感^[4]。游戏对历史的再现，也影响着玩家的历史意识与价值观的形成^[5]。这一议题本身构成了技术、艺术与人文交叉的前沿地带，为我们理解数字媒介，如何塑造人类的空间感知和文化认同开辟了新的理论视域。

本文旨在借鉴 Urszula Pawlicka-Deger, 在其关于人文科学实践场所研究中展现的思路——即强调“场所”对于知识生产、社群构建和学科发展的重要性^[2]——将对“空间”的批判性反思应用于 3A 游戏的虚拟世界。

作者简介：杨亨冉(1982—)，男，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游戏的设计美学及艺术理论、应用研发；ORCID:0009-0006-9533-2105

通过对具体游戏案例的系统性分析,本文试图梳理数字空间中人文价值的体现方式,并总结其可能的实现路径,为未来游戏设计与相关学术研究提供一份基于空间理论视角的基础性探讨。

二、理论框架:数字空间的人文维度

正如物理空间对于人文实践具有塑造作用^[2],数字空间同样并非价值中立的技术容器,而是充满了社会、文化和情感意义的建构物。理解 3A 游戏中的人文空间实践,需要引入一套能够解读其人文维度的理论框架。

(一) 空间美学 (Spatial Aesthetics) 与人文空间 (Humanistic Space)

源于建筑理论和环境心理学的“空间美学”,关注由空间和场所引发的情感与审美体验^[6]。它超越了空间的物理形态和功能,强调其蕴含的意义、氛围以及附着其上的叙事。将此概念应用于虚拟世界,意味着游戏环境的设计本身,就可以被视为一种创造意义、唤起情感的艺术实践^[6]。精心设计的虚拟空间,如同具有“诗意力量”的物理场所,能够承载深刻的人文内涵。游戏的建筑空间设计趋势,也日益受到关注,思考如何构建人所需的生活方式和世界感知体验^[7]。

在此语境下“人文空间”可被理解为,那些在虚拟重建或创造中,被赋予了特定文化、历史、社会或情感意义的数字场所。它强调空间作为人类经验、记忆和价值载体的属性。当 3A 游戏对现实地点的重建,超越了单纯的视觉模仿,致力于传达场所精神 (Genius Loci)、历史氛围,或特定社群的文化肌理时,便可视作为一种人文空间实践。这种实践日益与城市公共艺术空间的生产产生关联,数字媒介介入下的公共艺术空间,呈现出流动的美学场景^[8]。

(二) 解读游戏空间的关键理论视角

学界已发展出多种理论工具来分析游戏空间及其意义传达机制:

环境叙事 (Environmental Storytelling): 指通过环境细节,如物品摆放、场景设计、文字线索等,来讲述故事、传递背景信息或暗示世界状态的方式。一个好的叙事结构,不仅与玩法相互促进,也能带动玩家情感,增强游戏的沉浸感^[7]。玩家通过探索和解读空间中的线索来拼凑叙事,空间本身成为一种“诱发事件”,建筑与叙事由作为纽带的人(玩家)产生关联^[7]。环境叙事是构建游戏世界深度和可信度的重要手段,观众的注意活动,也参与到画面空间感的生成中,决定了空间意义的最终实现^[9]。

场所感 (Sense of Place) 与临场感 (Presence): 场所感与临场感是理解玩家体验的关键概念。场所感 (Sense of Place) 指玩家在虚拟环境中产生的“身临其境”的主观感受,一种与虚拟世界建立起的心理和情感联系^[1]。临场感 (Presence) 则更侧重于描述这种心理状态或主观感知,即个人感觉“就在那里”,并且忽略了技术的中介作用^[10]。空间的视觉设计、声音景观 (Soundscape)、互动反馈以及叙事融入等因素,共同作用于场所感和临场感的营造^[10]。其中,听觉氛围 (Auditory Atmospherics) 的营造对于打破视觉中心范式,创造更全面的空间体验至关重要^[11]。

表 1 理论框架关键概念对比表

概念名称	核心定义	在游戏空间分析中的应用侧重
空间美学 (Spatial Aesthetics)	关注由空间和场所引发的情感与审美体验,强调其意义、氛围与叙事	分析游戏环境设计本身作为艺术实践,如何创造意义、唤起情感
人文空间 (Humanistic Space)	被赋予特定文化、历史、社会或情感意义的数字场所,强调其作为人类经验、记忆和价值载体的属性	识别和评估虚拟空间中所承载和传递的人文内涵
环境叙事 (Environmental Storytelling)	通过环境细节(物品、场景、文字等)讲述故事、传递信息	解读空间如何作为叙事媒介,构建世界深度和可信度
场所感 (Sense of Place)	玩家在虚拟环境中产生的“身临其境”的主观感受和情感联系	评估虚拟世界引发玩家心理归属感和情感连接的程度
临场感 (Presence)	玩家感觉“身处”虚拟环境之中,忽略技术中介的心理状态	衡量技术与设计因素在创造“就在那里”体验方面的效果
沉浸感 (Immersion)	系统技术特性(系统沉浸)或玩家心理状态(心理沉浸),指专注于游戏世界	分析游戏吸引和维持玩家注意力的能力,及其不同类型(系统、叙事、挑战)
氛围 (Atmosphere)	空间唤起的整体情绪基调	把握游戏空间所营造的特定情感色彩

场所精神 (Genius Loci)	一个地方独特的、难以言传的灵魂或特质	探究虚拟场所是否塑造出独特且可感知的“地方感”
身体经验 (Bodily Experience)	玩家通过感官替代在虚拟空间中的实践、认同、情感与记忆体验	理解互动和化身机制如何塑造玩家对虚拟空间的感知和反应

沉浸感 (Immersion)：沉浸感常与临场感关联，但有所区别。通常可以指系统本身的技术特性，例如高保真画面、环绕音效带来的“系统沉浸”^[12]，也可以指玩家的主观心理状态，比如玩家全神贯注于游戏世界而忽略现实环境^[13]。更有学者将其细分为系统沉浸、叙事沉浸和基于挑战的沉浸^[14]。通常认为，更高的系统沉浸度有助于，提升玩家的临场感和心理沉浸感^[10]。

氛围 (Atmosphere) 与场所精神 (Genius Loci)：氛围与场所精神常与场所感关联。氛围指空间唤起的整体情绪基调，而场所精神则指一个地方独特的、难以言传的灵魂或特质。它们共同构成了玩家对虚拟场所“真实性” (Authenticity) 体验的基础。

身体经验 (Bodily Experience)：在沉浸式传播特别是虚拟现实游戏中，身体经验成为理解玩家体验的关键维度。虚拟现实通过替代感官输入，重塑了玩家的空间实践、身份认同 (通过化身 Avatar)、情感反应乃至记忆^[4]。

这些理论视角不是竞争关系，它们互相作为补充存在。空间美学的基础依赖于环境叙事的细节和特定氛围的创建，并通过玩家的身体体验传达人文内容。通过掌握这些理论工具我们能够系统地研究 3A 游戏如何通过空间设计实现其人文潜力。

三、案例分析：3A 游戏的人文空间实践

凭借深厚技术实力和庞大的资源投入，大型游戏开发团队在虚拟空间中，或多或少的进行了多种多样的人文探索实践。以下通过几个代表性案例进行分析：

(一) 文化意涵与东方美学：《黑神话：悟空》

于 2024 年 8 月正式发售的单机游戏《黑神话：悟空》，凭借其独特的东方美学风格、对中国古典名著《西游记》的创新性改编，发售后在全球范围内引发轰动。

游戏设定在西游故事之后，讲述玩家扮演的“天命人”，为复活孙悟空而踏上旅程，寻找散落世间的六件“根器”。开发团队通过对中国各地，特别是山西省众多古建筑和文化遗址 (如大足石刻、小西天、南禅寺等)，进行实地数字扫描，把这些真实的历史文化元素，组合到游戏场景设计中。游戏中到处都是古刹、庙宇等建筑风格，险峻山峦、幽深森林等自然景观，妖怪设定融合了佛教、道教及民间传说元素，展现出对中国传统视觉符号，和审美意境的深刻理解和传承运用。

空间则通过环境叙事，如残破的佛像、神秘的壁画、散落的文本、甚至场景中的非玩家角色，传递背景信息、推进剧情。玩家在探索广阔地图、解开谜题同时，与黑熊精、黄风大圣、百眼魔君等经典妖怪及其变体战斗，不仅体验到角色的成长，也在互动中逐步拼凑故事真相，理解不同角色的立场，产生个体化的意义和情感共鸣。

《黑神话：悟空》的实践路径观察探索，核心在于其开发团队对文化深度、艺术品质，与开发技术实力的高度整合。通过文化再创造，对真实文化遗址的数字化，致力于复现具有东方美学特征的人文场所。其巨大成功证明了此路径，在文化传播上的有效性，从而引发全球兴趣与现实关注的潜力。此实践亦需面对文化再现的准确性、艺术真实感，以及商业化背景下人文空间实践的固有复杂性。

(二) 文化再现与传播：《刺客信条》系列

《刺客信条》系列是探讨游戏中文物再现与传播的典型示例^[5]。从《刺客信条 II》对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城市的复刻^[7]，到《刺客信条：起源》和《奥德赛》对古埃及、古希腊文明的宏大重现，该系列以其对历史场景、建筑和社会风貌的细致描绘而闻名。

人文价值体现：游戏为玩家提供了直观了解特定历史时期城市布局、社会生活、文化习俗的互动平台。其推出的“探索之旅” (Discovery Tour) 模式，专注于教育性探索，更体现了其作为文化遗产传播工具的潜力^[3]。这种大型项目的开发也体现了跨学科合作的必要性^[15]，例如育碧甚至利用其游戏模型与博物馆等机构合作^[3]。对巴黎圣母院、罗马斗兽场等标志性建筑的精准建模，和对光照、人群、音乐等时代氛围的渲染，游戏成功创造了强烈的历史场所感，玩家仿佛置身于那个年代。

该系列展示了将严谨的历史研究，与商业游戏开发相结合的路径，尽管这种结合有时会引发争议^[5]。通过与历史学家、考古学家合作，利用摄影测量法等技术，在追求视觉奇观的同时，也承载了一定的文化传

播功能。

（三）空间美学与情感营造：《对马岛之魂》

《对马岛之魂》以其对 13 世纪日本对马岛自然风光，和传统建筑美学的诗意描绘，获得了广泛赞誉。游戏并未追求绝对的历史准确性，而是侧重于营造一种符合时代背景的美学意境。

游戏通过对色彩、光影、构图，例如风吹动草地、落叶飘零的动态景观的极致运用，以及对日式建筑风格的选择性再现，例如参考弥生时代的建筑元素，成功传达了一种宁静、肃杀而又充满生命力的空间美学。游戏的空间设计服务于核心主题：荣誉、牺牲与战争的残酷。开阔壮丽的自然景观与战火蹂躏的村庄对比，宁静的神社与激烈的战斗场景呼应，共同烘托出一种复杂而引人入胜的氛围。

《对马岛之魂》的成功在于其精准地把握了“真实感”（Authenticity），而非死守“准确性”（Accuracy）。通过提炼文化符号和美学特征，并将其融入引人入胜的视觉和玩法设计中，游戏创造了一种强烈的情感体验和文化认同感，证明了空间美学在人文价值传递中的核心作用。

（四）保真度的协商：准确性、真实感与游戏性的平衡

所有 3A 游戏的虚拟重建，都面临着如何在历史/现实准确性、玩家主观的真实感，以及游戏性需求之间取得平衡的挑战^[5]。

追求完全符合史实的准确性往往不现实，也未必符合商业游戏的目标，存在准确性的局限。《刺客信条》系列常因其对历史的“游戏化”改编而受到批评^[5]。开发者往往会为了强化叙事、提升游戏性，例如《刺客信条》中，为了便于攀爬而调整的建筑结构，或适应技术限制而做出妥协。

相比客观的准确性，开发者似乎更倾向于营造主观的“真实感”，也就是让玩家真实感的追求或“符合那个时代/地方的感觉”^[5]。这种感受与氛围营造、场所感的建立密切相关，更能激发玩家的情感投入和沉浸体验^[4]。

表 2 案例分析比较表

游戏名称	黑神话：悟空	刺客信条系列	对马岛之魂
文化/历史背景来源	中国古典名著《西游记》、中国古建文化	特定历史时期（如文艺复兴、古埃及等）	13 世纪日本对马岛（蒙古入侵背景）
空间美学侧重点	东方魔幻、高保真文化复现	历史场景复刻、建筑细节	诗意写实、自然风光、日式建筑美学
人文价值体现方式	文化再创造、东方美学呈现、叙事体验	历史与文化普及、营造历史场所感	东方美学传达、情感氛围烘托
“真实性”处理策略	融入真实遗址、强调文化真实感	侧重历史研究（存争议）、视觉真实感	强调美学意境（真实感）而非历史准确性
主要实现手段	数字扫描融入、文化再创造、技术整合	跨学科合作、历史研究、摄影测量法	艺术提炼、文化符号运用、视觉设计

四、数字空间人文价值的实现路径

基于以上理论探讨和案例分析，我们可以尝试总结在 3A 游戏等数字空间中实现人文价值的几条可能路径：

深化跨学科合作与知识整合 是重要途径。人文空间的成功构建，离不开多领域知识的融合。游戏开发者需要更积极地与历史学家、文化学者、人类学家、建筑师等专家进行对话与合作^[3]。借鉴数字人文领域建立研究中心和实验室以促进合作的模式^[2]，游戏行业也可以探索更机制化的跨界合作模式。

数字空间的独特优势，在于其互动性和沉浸感，强调体验式理解与情感共鸣同样关键。实现人文价值的核心，在于充分利用这些特性，创造能够引发玩家深度思考，和情感共鸣的“体验”。同时，对历史真实感的营造也深刻影响着玩家的体验与价值判断^[5]。目标应是从“观看”历史/文化转向“体验”和“反思”。利用接受美学理论，关注玩家的“期待视野”与交互审美体验，可以更好地设计出引发共鸣的作品^[16]。

3A 游戏作为商业产品，其开发不可避免地受到市场逻辑的影响，平衡商业诉求与人文关怀需要伦理自觉。当游戏内容触及真实的人类经验、历史创伤或文化多样性时，开发者需要承担起相应的伦理责任。这要求在追求商业成功的同时，保持对所再现内容的人文关怀和批判性反思，避免刻板印象、过度简化或不恰当的商业化利用^[17]。建立更完善的内容审查和伦理咨询机制，是行业可持续发展的必要考量。

数字人文领域发展出的分析工具和方法，如空间分析^[8]、虚拟民族志、近距离游戏（Close Playing）等^[18]，

不仅可以用于对现有游戏进行批判性研究，也可以反哺游戏设计过程。例如，在开发阶段运用空间句法，分析地图布局对玩家行为的潜在影响^[8]，或通过玩家研究深入了解不同设计，对场所感和意义解读的效果^[4]。

鼓励多元化的人文空间探索能够丰富人文景观。虽然 AAA 游戏因其影响力而备受关注，但独立游戏 (Indie Games) 和严肃游戏 (Serious Games) 在人文空间实践方面也展现出巨大的创造力^[3]。

五、结论

3A 级电子游戏的虚拟空间，已成为当代文化景观中，不可忽视的部分，并且它们不仅展示技术成就，同时也提供了人文实践的潜力空间。本文通过结合人文科学对“场所”和“空间”的深刻理解，以及具体游戏案例的分析，分析数字空间中，实现人文价值的可能性和路径。研究发现 AAA 游戏通过整合空间美学、环境叙事、场所感营造，以及交互体验设计等元素，能够在文化传播、历史认知和情感体验上，产生正面效果。这个过程展现了商业逻辑，和人文关怀之间的复杂张力，同时还表现了客观准确性，和主观真实感之间的冲突。在开发引人入胜的虚拟世界的过程中，开发者实质上进行着文化解释和价值取舍，实现数字空间中，更人文化的价值观，需要游戏产业、学术界和社会公众共同努力。

跨学科合作的深化，加上体验理解和情感共鸣的重视，以及伦理意识的保持，数字人文方法的采纳和探索多样性的鼓励，将成为推动数字空间发展，甚至具有更强人文深度和责任感的關鍵方向。同物理空间影响我们的思维和活动一样^[2]，我们所开发并沉浸的数字空间，将产生深远的影响于人类文明未来的展望，在未来继续关注并分析反思“虚实之间”的人文实践，在当今时代具有极大的重要意义。

参考文献：

- [1] VON BORRIES F, WALZ S P, BÖTTGER M. Space Time Play: Computer Games, Architecture and Urbanism: The Next Level[M]. Basel: Birkhäuser, 2007.
- [2] PAWLICKA-DEGER U. Place matters: Thinking about spaces for humanities practices[J]. Arts and Humanities in Higher Education, 2021, 20(3): 320-338.
- [3] ANG K H, NG Y J, LIEW T W. Digital Game-Based Heritage Education: Analyzing the Potential of Heritage-Based Video Games[J]. Education Sciences, 2024, 14(4): 396.
- [4] 周逵. 沉浸式传播中的身体经验:以虚拟现实游戏的玩家研究为例[J]. 国际新闻界, 2018, 40(5): 6-26.
- [5] STIRLING E, WOOD L. "Actual history doesn't take place": Digital Gaming, Accuracy, and Authenticity in Assassin's Creed: Odyssey[J]. Game Studies, 2021, 21(1).
- [6] BACHTOLD D. The History and Manifestations of the Metaverse in Contemporary Spatial Aesthetics[J]. Journal of Social and Political Sciences, 2022, 5(4): 18-30.
- [7] 叶阳. 游戏与建筑艺术空间的设计趋势[J]. 文学艺术周刊, 2022(5): 89-92.
- [8] 刘子菲. 基于数字媒介的城市公共艺术空间生产研究[D]. 中国传媒大学, 2023.
- [9] 谢迪思. 观众的注意活动与电影画面的空间感生成[J]. 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23, 62(4): 113-121.
- [10] 殷子亮, 邵斌. 虚拟现实和电子游戏研究中临场感、沉浸感与心流的关系探讨[J]. 新媒体研究, 2024, 10(16): 20-23+28.
- [11] Yang H, Hong T. Auditory Atmospherics in Games: Beyond the Visuocentric Paradigm[J]. 人文与社会科学学报, 2025, 1(2): 366-374.
- [12] MURRAY J H. Hamlet on the Holodeck: The Future of Narrative in Cyberspace [M]. Cambridge: MIT press, 2017.
- [13] WITMER B G, SINGER M J. Measuring presence in virtual environments: A presence questionnaire[J]. Presence, 1998, 7(3): 225-240.
- [14] 罗蜜. 解构沉浸感:论元游戏中的交互性[J]. 美与时代(上), 2025(1): 45-49.
- [15] FOKA A, MISHARINA A, ARVIDSSON V, et al. Beyond humanities qua digital: Spatial and material development for digital research infrastructures in HumlabX[J]. Digital Scholarship in the Humanities, 2018, 33(2): 264-278.
- [16] 刘洁. 接受美学视角的 AR 虚拟影像艺术交互审美研究[D]. 宁波大学, 2019.
- [17] CHAPMAN A. Critical Gaming: Interactive History and Virtual Heritage[J]. Arise, 2018, 1(1): 1-19.

- [18] DUNN S, HUGHES L. Close Playing: Literary Methods for Videogame Criticism[J]. Journal of Gaming & Virtual Worlds, 2019, 11(2): 153-170.

Humanistic Practice Between Virtual and Real: Analyzing Humanistic Value and Implementation Paths in AAA Game Digital Spaces

Hengran Yang¹

1 Graduate School, Kyonggi University, Suwon-si, Gyeonggi-do 16227, Korea

Abstract: The swift advancement of digital technology has led high-profile AAA video games to dominate entertainment while their detailed virtual worlds serve as crucial media for delivering cultural and historical experiences along with emotional narratives. The digital environments in video games now serve as spaces with deep humanistic significance through their accurate representations of reality and creative design. This paper examines "Humanistic Spatial Practice" in AAA games which involves deliberately incorporating humanistic care alongside ethical considerations and meaningful depth into virtual space design based on theoretical perspectives of "Place" and "Space" from the humanities. By analyzing representative AAA game cases such as Black Myth: The research examines spatial aesthetics and environmental storytelling in Black Myth: Wukong along with the Assassin's Creed series and Ghost of Tsushima to understand how humanistic values are expressed within virtual spaces through the creation of meaningful places. AAA games demonstrate substantial capability for cultural transmission alongside historical consciousness formation and emotional resonance stimulation because of their distinctive interactive and immersive characteristics. AAA games encounter conflicting interests between business objectives and humanistic values while needing to balance historical precision with personal authenticity. Through this paper we summarize different approaches to achieving humanistic value within digital spaces while stressing the need for interdisciplinary work together with experiential learning and ethical analysis supported by digital humanities practices to serve as guides for future game development research that seeks deeper humanistic insights.

Keywords: Digital Space; Humanistic Practice; AAA Games; Spatial Aesthetics; Virtual Reconstruction; Sense of Place; Environmental Storytelling; Cultural Transmission

从“他者化”到“对话”：

弗兰克·麦吉尼斯《会有人看顾我》中的身份建构与协商

姜依玲¹

(1.北京外国语大学, 北京 100089)

摘要：以黎巴嫩人质为题材的戏剧《会有人看顾我》是弗兰克·麦吉尼斯的代表作之一。剧中三位西方人质通过对东方的“他者化”，特别是通过对阿拉伯女性的性别化想象和对阿拉伯世界的暴力化描述，强化自身作为西方集体身份的优越性。同时，麦吉尼斯还挑战了西方传统的二元对立思维模式，探讨了在权力关系与身份认同不断变化和发展的过程中，东西方文化之间的复杂性和交织互动，并提出了它们之间进行对话与交流的可能性。他通过作品展现了文化间的冲突与碰撞，同时也揭示了这些冲突背后蕴藏的相互理解与共存的空间。

关键词： 弗兰克·麦吉尼斯；《会有人看顾我》；他者

Doi doi.org/10.70693/rwsk.v1i5.931

一、引言

弗兰克·麦吉尼斯 (Frank McGuinness) 是当代爱尔兰著名剧作家、小说家和诗人。他的作品广泛涉及爱尔兰的历史、文化和社会问题，以其戏剧作品尤为闻名。他的写作风格融合了深刻的社会洞察和细腻的情感描绘，常常通过人物间的对话和冲突展现主题。他擅长通过展现个人与社会之间的紧张关系，反映爱尔兰的历史和政治。麦吉尼斯曾获得爱尔兰艺术委员会奖、苏格兰皇家话剧奖等多个奖项，是当代爱尔兰文学的重要人物。

《会有人看顾我》(Someone Who'll Watch Over Me) 是麦吉尼斯最著名的戏剧之一，基于真实事件创作，讲述了三名西方人，分别是美国人亚当 (Adam)、爱尔兰人爱德华 (Edward) 和英国人迈克尔 (Michael)，被恐怖分子绑架并关押在黎巴嫩的故事。三位囚徒不仅要面对身体上的痛苦，还要应对心理上的压迫和精神上的崩溃。麦吉尼斯通过三位囚徒的多重身份和复杂关系，揭示了文化、宗教与民族间的张力，同时反映出极端环境中对归属感的渴望。剧中对话不仅展现情感宣泄，还折射出西方与东方间的深刻对立与误解。然而，通过人物的反思与情感联系，麦吉尼斯展现了跨文化和解的可能性与共通人性。

约瑟夫·伦农 (Joseph Lennon) 曾梳理了18世纪至20世纪上半叶爱尔兰文学作品中对东方的想象性再现，尤其是“凯尔特人与东方之间叙事联系的发展”^[1]，地理位置上处于西方但曾是英国殖民地的爱尔兰在某种程度上和东方处于相同的处境。三上弘子 (Hiroko Mikami) 拓展了这一观点，并将其延伸到《会有人看顾我》这部剧中进行讨论，他分析了此剧的刻板印象设定，即爱尔兰人与英国人之间典型的敌对关系，以及美国人可能提供的调解。他认为这种模式使麦吉尼斯能够深入刻板印象形成的底层文化逻辑，以“发现他们民族特性的真相与神话”^[2]。他们对这部剧的讨论多聚焦于三位西方人质内部的身份矛盾，尤其是英国、爱尔兰和美国之间的复杂关系如何反映殖民历史和文化矛盾，较少涉及东方在这一叙事中的主动性及其与西方的互动，以及对剧中失语的角色，即阿拉伯绑匪的探讨较少。海伦·洛杰克 (Helen Lojek) 触及了对失语的阿拉伯绑架者的身份讨论，分析了西方人质将阿拉伯绑匪“他者”化的过程^[3]，为后续研究提供了灵感。三位西方人质试图在东方环境中保持自我认同和文化优越感，他们的困境与被作为东方的“他者”所束缚的情况象征了西方对殖民地的控制与依赖。此剧不但涉及西方殖民者对东方刻板印象的建构，还包含了以阿拉

作者简介：姜依玲 (1997-)，女，北京外国语大学，研究方向为20世纪爱尔兰文学。

伯为代表的东方对西方的反抗,以及麦吉尼斯尝试在文本中解构东西方二元对立意识形态的努力。

由此,本文拟通过后殖民理论的视角,探讨《会有人看顾我》中的“东方他者”形象,探讨西方如何通过性别化和暴力化的手段刻画阿拉伯女性以及阿拉伯文化,从而强化对东方的刻板印象。这种通过“他者化”来重塑身份的过程,展现了西方文化如何通过与东方的对立建立自我认同。随后,麦吉尼斯在此基础上对西方传统的二元对立进行了挑战,探讨了在权力关系和身份认同的动态构建中,东西方文化的复杂性和对话的可能性。

二、性别化与暴力化的“东方他者”

在《会有人看顾我》中,三位被绑架的西方人质迈克尔、爱德华和亚当,通过对东方女性及阿拉伯文化的描绘,构建了一个基于西方中心主义视角的“东方”形象。这种形象不仅强化了西方与东方之间的二元对立,还折射出爱德华·赛义德(Edward Said)在《东方主义》(*Orientalism*)中所揭示的关于东方女性与伊斯兰教的一系列负面刻板印象。在文本中,这些“东方”形象既以性别化的方式体现为对阿拉伯女性的异化与性幻想,也通过虚构的叙述揭示了对阿拉伯世界的敌意与文化偏见。

爱德华对阿拉伯女性的性幻想生动体现了赛义德所批判的西方对东方女性的性别化想象。在剧中,爱德华以调侃的语气说道:“我对一个阿拉伯女人有过幻想。她只穿了一件面纱,而我穿了条草裙”^{[4]100}。这一看似轻描淡写的陈述,实则蕴含了深刻的文化意涵。面纱作为东方女性的典型象征,在爱德华的幻想中被抽离了其原本的宗教与文化意义,转而成为一种激发男性欲望的性化道具。草裙这一充满殖民主义色彩的意象,则进一步将幻想置于西方对异域他者的文化想象之中,呈现了一个被物化为感官享受对象的东方女性形象。正如赛义德所言,东方女性往往被描绘为“男性权力幻想的产物”^{[5]207},其形象从属于男性的欲望与视角,而她们的主体声音却始终被压制。

这种性别化的东方女性形象不仅凸显了西方男性凝视下的文化霸权,也暗示了西方文化在建构自身身份时对“他者”的依赖。霍米·巴巴(Homi Bhabha)在《文化的定位》(*The Location of Culture*)中指出,殖民语境中的他者化并非单纯的二元对立,而是一种“模糊性”的生成。他者被刻画为“异己的熟悉”(the familiar other),即既是陌生的、威胁的,也是必要的和依附的^{[6]122}。这种模糊性使得东方形象在西方幻想中既被性化,又被工具化。在这场幻想中,爱德华通过“她很放纵。我喜欢这样”^{[4]100}的评价,将东方女性描述为放荡和野性,并与西方女性进行了隐性对比。当亚当随即回应“我喜欢美国女孩”^{[4]100}时,文本中无形中构建了一种文化对照:东方女性是感官的、异域的,甚至是危险的,而西方女性则被隐喻为纯洁、自控和熟悉的。这种二元对立不仅加深了西方对东方的性别化理解,也为三位人质在极端处境下建构自我身份提供了心理支撑。他们通过物化东方女性,获得了短暂的优越感和身份确认。此外,这种幻想也反映了三位人质在极端环境中应对孤独与无助的一种心理机制。爱德华选择幻想阿拉伯女性,并非仅仅是为了调侃或娱乐,其背后隐藏着一种对现实环境的不满与自我逃避。作为囚徒,他们的身体被禁锢,行动被限制,而幻想成为他们重新确立自我存在感的一种方式。在这种情况下,东方女性形象被用作他们情感与心理的投射对象,她们的“异域性”和“神秘感”满足了他们对自由和掌控感的渴望。

除了将东方女性的形象性别化,三位人质通过想象的电影情节对阿拉伯世界进行描绘,进一步强化了西方对东方的敌意与文化偏见。这一情节由一位修女在贝鲁特的遭遇展开,她象征着基督教的仁慈与纯洁,孤身前往战乱中的黎巴嫩,肩负传播信仰与援助孤儿的使命。在这一过程中,她用歌声安抚孩子们的心灵,展现出一种理想化的西方救世主形象。然而,这位修女最终遭到阿拉伯“敌人”的枪杀,她的吉他也被打碎。这一虚构的情节将修女的无辜与阿拉伯人的暴力对立起来,通过二者的鲜明反差强化了西方的道德优越感。在赛义德的理论中,西方对东方的想象始终伴随着暴力与不文明的刻板印象,东方被塑造成一个需要拯救的“问题区域”^{[5]40}。剧中三位人质所构想的修女形象,正是这一传统的延伸:她不仅象征着西方的善良与文明,更通过她的悲剧遭遇突出了东方的野蛮与残酷。

后殖民主义学者盖亚特里·斯皮瓦克(Gayatri Spivak)曾在《属下能说话吗》(“Can the Subaltern Speak?”)一文中指出,殖民语境中被支配的“属下”往往被剥夺了自我表达的权利,他们的形象是由殖民者建构的,缺乏主体性^{[7]292}。在这部剧中,修女的死亡及其意义完全由三位人质叙述构建,而阿拉伯人的形象则被定格为暴力与野蛮的符号,这种“替代性的叙述权”正是殖民权力关系的体现。修女被杀害的场景在剧中被详细描述:“秃鹫盘旋在修女的尸体周围”^{[4]110},这一细节通过对死亡与血腥的强调,将阿拉伯人非人化,并进一步固化了西方对东方的暴力认知。

这种刻板印象的构建,与剧中三位人质的身份处境密切相关。作为囚徒,他们的生命与自由掌握在绑架者手中,这种极端的权力失衡迫使他们试图通过贬低绑架者来重建心理上的力量感和自尊心。修女的故

事情正是在这一心理动机下生成的：通过想象阿拉伯世界的野蛮与基督教的高尚对比，他们得以暂时忘却自己的困境，重新确认作为西方人的身份优越性。然而，这一虚构的情节也暴露了西方叙事的单一性与偏见。在修女的形象中，东方被描绘为绝对的“他者”，不仅缺乏与西方平等对话的可能性，甚至成为一种纯粹的威胁。这种叙事忽略了东方的多样性与复杂性，将其简化为暴力与敌意的代名词。正如赛义德所批评的，“东西方之间存在一种权力关系、支配关系、霸权关系”，在这种力量关系下“产生了关于东方的话语”^{[5]5-6}。剧中的修女故事情节无疑延续了这一传统，同时也成为三位人质身份建构与心理调适的重要媒介。

三、殖民者身份的重建

迈克尔、爱德华和亚当对阿拉伯文化的贬低与敌视，也直接服务于他们在囚禁处境下的身份重建。在被剥夺自由和尊严的极端环境中，三位人质无法通过正常的社会角色确认自己的存在。他们转而通过对绑架者的“他者化”来重新定义自身，强化集体身份。这种身份的构建和确立，正如斯图亚特·霍尔 (Stuart Hall) 所言，是“在特定权力模式的作用下，通过差异标记和排斥产生的”^{[8]4}。

迈克尔、爱德华和亚当通过语言和想象，将阿拉伯绑匪定义为与自己完全对立的“他者”。当迈克尔询问爱德华“他们是谁？”时，爱德华简单而笃定地回答：“敌人”^{[4]105}。这一语句不仅表明了三位人质对绑架者身份的统一看法，也突显了二元对立思维的植入——绑架者被等同于“敌人”，进而成为三位人质建构集体身份的参照点。在西方的文化框架中，“东方”常常作为“野蛮”“危险”的化身，与“文明”“理性”的西方形成鲜明对比。迈克尔作为英国人，常常以一种居高临下的口吻谈论绑架者，宣称“他们的无礼让我目瞪口呆”^{[4]139}；而爱德华作为爱尔兰人，虽然拥有被英国殖民的历史记忆，但在面对东方时，他仍然选择认同西方的文化优越性。亚当则以美国人的身份，将“阿拉伯人”视为与自己截然不同的存在，甚至在玩笑中说“我是美国人，我是阿拉伯人，我完蛋了”^{[4]119}，以强调两者间无法调和的对立。三位人质在极端环境中的身份建构，凸显了“西方人”作为一个文化共同体如何通过“他者化”来重塑自我认同。

由于身处困境，三位人质无法通过正常途径证明自己的存在和价值。因此，他们转而依赖对绑架者的贬低和污名化，试图在心理上重新确立自身的优越性。这一过程中，阿拉伯绑匪被描绘成没有个性、缺乏理性的群体，完全被三位西方人质的话语所定义。他们几乎没有独立的声音，而是通过西方人的叙述被简化为“粗俗”“残忍”“无礼”的象征。这种“他者化”不仅是权力的体现，更是一种心理防御机制。在极端环境下，三位人质被剥夺了行动自由，感受到无力与羞辱。通过将阿拉伯绑匪视为“野蛮人”，他们在内心深处重新构建了一种虚幻的权力平衡，获得了对自我身份的安慰与肯定。当迈克尔说“如果我们堕落到粗俗的程度，那就是向他们屈服”^{[4]113}时，他实际上是在为自己的行为设立界限，通过对绑匪的持续贬低，三位人质在压抑的环境中获得了片刻的心理慰藉，同时也让西方中心主义的价值观在无形中得以延续。

值得一提的是，尽管三位人质来自不同的国家，但在面对共同的“敌人”时，他们的身份界限变得模糊，取而代之的是“西方人”的集体身份。这一身份建构既体现了权力关系中的差异，也反映了极端环境下对归属感的渴望。本尼迪克特·安德森 (Benedict Anderson) 认为，集体身份的形成通常基于“想象的共同体”，即一种超越个人实际联系的共同认知结构^{[9]6}。在本剧中，这种“西方人”身份的想象性尤为突出，它不仅建立在共同的文化符号和历史记忆之上，更通过对“他者”的排斥来强化内部的凝聚力。在身处异国他乡的困境中，三人之间的对话和互动充满矛盾和张力，但正是这种内在的冲突，使他们意识到彼此间更深层次的共同点。与绑架者的对立，成为他们暂时消除彼此差异、凝聚集体身份的重要契机。尽管爱德华常因爱尔兰的身份而被英国人迈克尔讥讽，但在面对绑架者时，他依然选择站在“西方人”的立场上进行反击。这种身份的模糊性和多重性，既表明了文化和民族认同的复杂性，也体现了麦吉尼斯对身份问题的深刻洞察。剧中人物的语言和行为，不断在自我与“他者”之间徘徊，反映了现代社会中身份认同的动态本质。

赛义德曾言，“欧洲通过将自己与东方对立，作为一种替代甚至潜意识的自我，获得了力量与身份认同”^{[5]3}。三位西方人质通过重塑绑架者的形象，间接强化了自身的文化话语权。爱德华对绑匪的评价，以及迈克尔对文明与粗俗的界定，实际上是西方叙事对东方世界的再现与重塑。然而，正是在这一话语权的争夺中，三位人质也暴露了自己的脆弱性。他们的语言虽然试图表现出优越感，但在极端环境下的恐惧与无助感却始终难以掩饰。这种矛盾使得人物的形象更加复杂，也为后文讨论麦吉尼斯对传统东西方二元对立的解构埋下伏笔。

四、跨越对立：西方中心主义的解构与文化对话

在《会有人看顾我》中，麦吉尼斯巧妙地通过剧中人物的对话与互动，揭示了西方对东方的误读与扭曲，同时也通过将三位西方人质置于被剥夺自由与尊严的弱势地位，即通过描绘阿拉伯绑匪对三位西方人

质的反向“他者化”过程，展现了麦吉尼斯对这种传统二元对立结构的颠覆和解构。同时，这部戏剧并未止步于这一层面的反抗，通过三位人质与阿拉伯绑匪之间的对话与互动，这部作品还展示了东西方之间理解与和解的可能性。

在本剧中，阿拉伯绑匪与三位西方人质之间的关系体现了双方对彼此的“他者化”，即双方将对方看作一个不可理解、异质且威胁性的存在。阿拉伯绑架者在劫持爱尔兰人爱德华时，完全无视其所代表的爱尔兰中立身份。美国人亚当曾言：“你是爱尔兰人，来自一个中立国家。他们会放你走的”^{[4]93}。就现实情况而言，爱尔兰是一个未卷入中东冲突的中立国，按理来说爱尔兰人不应成为绑架的目标。然而，阿拉伯绑架者的行为却深刻体现了他们对所有西方人的一致看法——无论是英国人、美国人还是爱尔兰人，他们都是具有白皮肤和蓝眼睛的“西方人”，在阿拉伯人的眼中，这种身份意味着“他者”，是一个统一的、具有威胁性的群体。正是这种对“西方”的单一化与抽象化，导致了爱德华的被捕。爱尔兰人虽未直接参与中东的冲突，但他依然被视作“西方”的代表，因此成为了目标。阿拉伯绑架者的做法表明，西方世界在东方眼中是一个统一且具有威胁性的“他者”，这种文化上的单一化视角与西方对东方的二元对立是相互呼应的。

另一方面，三位西方人质在剧中也被阿拉伯绑匪抛入身为“他者”的处境中。三位人质被剥夺了行动自由，身陷险境，无论是身体上的禁锢，还是精神上的折磨，都让他们体验到“他者”的被动身份。亚当的恐惧更为具体，他痛苦地描述了绑匪可能对他施加的性暴力：“他们要用油涂我的屁股，然后让我死掉。他们会用油弄死我”^{[4]168}。在这种极度无力和脆弱的境遇下，西方人质与他们所视为“敌人”的阿拉伯绑架者之间的对立被进一步激化。通过这些描写，剧中展现了被置于“他者”位置的西方人质的痛苦，他们不仅被剥夺了行动自由，还在极度的非人道环境中面临身份与尊严的完全丧失。无论是在阿拉伯绑匪的眼中，还是在三位西方人质的眼中，对方都是一个需要被控制、对抗甚至摧毁的“他者”。

通过反向“他者化”三位西方人质，至高无上的西方特权得到挑战，但麦吉尼斯并未止步于此，他通过三位人质与阿拉伯绑匪之间的互动，尤其是三位人质对阿拉伯文化与伊斯兰教的尝试理解，展示了东西方对话与和解的潜在可能性。最典型的是三位人质通过阅读《古兰经》等伊斯兰教经典，对伊斯兰教的核心教义产生了新的理解，这使他们逐渐打破了对阿拉伯文化的刻板印象。赛义德提出，西方知识体系长期以来通过塑造对东方的“他者”概念，强化了东方文化的异质性与敌对性。这种文化二元性往往以“西方—理性与进步”与“东方—神秘与倒退”的对立表现出来^{[5]41}。然而，亚当在阅读《古兰经》后，逐步理解了伊斯兰教与基督教的共通之处，尤其是宽恕与仁爱的理念。他在剧中感慨道：“宽恕我吧，我的兄弟姐妹们，宽恕我把你们当成敌人。在你们的圣书里，隐藏着力量与和平的道路”^{[4]120}。这一转变表明，尽管三位西方人质身处困境，他们通过学习与反思，逐渐对阿拉伯文化产生了理解与宽容。因此，“文化认同并非固定不变，而是在不同文化间的接触中不断被重构”^{[6]123}。这种接触与对话的过程打破了文化间的对立与偏见，推动了跨文化理解的深化。在这种互动中，西方个体的认知不仅可以被重新塑造，甚至可能转变为一种更加包容与多元的视角，这一视角能够挑战原本对伊斯兰文化的排斥态度。

此外，剧本中的一个重要场景是三位西方人质想象着与阿拉伯人一起庆祝婚礼的场景。在这个场景中，他们不仅设想了与绑架者之间的对话，还想象了一个跨越文化差异、充满欢声笑语的世界：“我们该怎么办？我们会邀请他们参加派对吗？……想象一下这是一场婚礼……大家唱歌，讲故事。这是全世界共有的场景。喝一杯吧，如果你愿意，我们不会告诉别人。加入我们吧”^{[4]137-138}。在这一婚礼场景中，东西方不再是对立的、不可逾越的文化体系，而因共同的人性与价值观走向团结与和解。正如让-吕克·南希（Jean-Luc Nancy）在《无用的共同体》（*The Inoperative Community*）中所提出的：“共同体并非通过身份的同一性或传统的连续性来定义，而是通过共享存在和人与人之间的联系得以构建”^{[10]25}。这一场景通过婚礼这一象征性仪式展示了共同体的形成过程，它并不是依赖于文化的完全融合，而是在差异性中建立的理解与联系。此外，在朱迪斯·巴特勒（Judith Butler）看来，人类的脆弱性使我们暴露于他人的行动和影响之下，这种暴露性不仅是我们的弱点，也是我们“建立社会联系和共同体的可能性条件”^{[11]22}。剧中的婚礼设想展现了人类基于脆弱性和情感的共同性，揭示了冲突中的和平可能性。这一设想表现了剧中人物的转变，他们逐渐理解到，虽然有着深刻的文化差异，但人类对和平、爱与尊重的追求是共同的。这一场景象征着一种希望，即东西方之间的文化差异并非无法跨越，反而可以通过对话与理解化解矛盾。

五、结语

通过对《会有人看顾我》中东西方文化对立与对话的分析，本文揭示了弗兰克·麦吉尼斯如何在剧作中既批判西方“东方主义”对东方的误读与刻板化，同时又通过对话与互动展现了东西方和解的可能性。剧中人物在面对“他者化”的身份与压迫时，并未止步于反抗与对立，反而通过不断的自我反思与文化理解，逐渐破

除了自身的偏见，开始寻求一种跨越文化隔阂的对话模式。在这种对话中，尽管文化的差异依然存在，但通过共同的价值观与人性关怀，东西方的敌意与误解有可能被化解，向和解与团结的方向发展。剧中阿拉伯绑架者与西方人质之间的互动，尤其是三位人质对伊斯兰教的理解转变与想象婚礼的场景，象征着一种理想化的和解愿景。然而，尽管剧中展现了和解的潜力，我们依然不能忽视当前全球范围内存在的深刻文化与政治冲突。今日世界，尤其在 globalization 进程加速的背景下，东西方的文化差异依然是冲突的根源之一。恐怖主义、移民危机、宗教极端主义等问题，依然在全球范围内产生着深远影响。正如《会有人看顾我》所展现的那样，东西方之间的敌意并非无法跨越，通过增进对对方文化的理解、打破固有偏见，或许能够为缓解当前的文化对立和冲突提供新的思路。

参考文献：

- [1] LENNON, J. *The Celt and the Oriental: The Narratives of Irish Orientalism* [M]. Diss. University of Connecticut, 2000.
- [2] MIKAMI, H. *Frank McGuinness and His Theatre of Paradox* [M]. Buckinghamshire: Colin Smythe Limited, 2002.
- [3] HELEN L. The Diverse Dramatic Contributions of Frank McGuinness [C]// *Irish Theatre in Transition: From the Late Nineteenth to the Early Twenty-First Century*, edited by Donald E. Morse.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2015: 191-204.
- [4] MCGUINNESS F. *Someone Who'll Watch Over Me* [M]. London: Faber, 1992.
- [5] SAID E. *Orientalism* [M]. London: Penguin Books, 2003.
- [6] BHABHA H. *The Location of Culture* [M]. London: Routledge, 1994.
- [7] SPIVAK C. Can the Subaltern Speak? [C]// *Colonial Discourse and Post-Colonial Theory: A Reader*, edited by Patrick Williams and Laura Chrisman.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4: 66-111.
- [8] HALL S. Introduction: Who Needs 'Identity'? [C]// *Questions of Cultural Identity*, edited by Stuart Hall and Paul du Gay.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Limited, 1996: 1-17.
- [9] ANDERSON B. *Imagined Communities: Reflections on the Origin and Spread of Nationalism* [M]. London: Verso, 1983.
- [10] NANCY J. *The Inoperative Community* [M].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91.
- [11] BUTLER J. *Precarious Life: The Powers of Mourning and Violence* [M]. London: Verso, 2004.

From “Othering” to “Dialogue”: Identity Construction and Negotiation in Frank McGuinness’s *Someone Who’ll Watch Over Me*

Jiang Yiling¹

1Beijing Foreign Studies University, Beijing

Abstract: Set against the backdrop of the Lebanese hostage crisis, *Someone Who’ll Watch Over Me* stands as one of Frank McGuinness’s most acclaimed works. In the play, three Western hostages reinforce the superiority of their collective Western identity through the “othering” of the East, particularly by projecting gendered fantasies onto Arab women and depicting the Arab world through images of violence. At the same time, McGuinness challenges traditional Western binary modes of thinking by exploring the evolving dynamics of power and identity. He reveals the complexities and intertwined interactions between Eastern and Western cultures, while envisioning the possibility of dialogue and exchange between them. Through his portrayal of cultural conflict and collision, McGuinness ultimately uncovers the potential for mutual understanding and coexistence beneath these tensions.

Keywords: Frank McGuinness; *Someone Who’ll Watch Over Me*; Other

中国城市旅游的恢复性服务景观对游客满意度的影响研究： 关注感知价值的媒介作用

孙晓丽¹ 张惠媛² 陈宇³

(1.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 浙江 绍兴 312000, 2.苏州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江苏 苏州 215200,

3.淮北理工学院, 安徽 淮北 235000)

摘要: 本文旨在分析中国游客如何感知中国城市恢复性服务景观的因素, 以及恢复性服务场景如何影响游客满意度。研究结果如下: 第一, 恢复性服务景观对感知价值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其次, 服务环境对满意度有显著的正向影响。第三, 感知价值观对满意度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另一方面, “连贯性”对“满意度”有负面影响。因此, 在验证感知价值在恢复性服务景观对游客满意度、“远离”、“魅惑性”、“一致性”和“适合性”的影响中的中介作用的结果中, 部分采用了假设1, 作为恢复性服务景观的子因素, 通过感知价值的子因素货币价值、情感价值和社会价值的中介作用, 对游客满意度产生影响。通过确定中国城市旅游游客感知的恢复性服务景观对满意度的影响, 以下研究有助于提供解决方案, 使游客对城市旅游的服务环境有积极的看法。此外, 在服务环境开发和管理方面, 研究结果提出了有效和高效的发展战略, 使中国城市旅游能够建立竞争优势。

关键词: 城市旅游; 恢复性服务景观; 感知价值; 游客满意度

Doi: doi.org/10.70693/rwsk.v1i5.933

一、绪论

随着城市间竞争时代的到来, 各城市都在通过城市旅游来努力提高城市竞争力。这种城市旅游包含了该城市的特定形象, 将其固有的特性和旅游相结合, 提供了经济价值以外的情感、社会价值等多种价值, 在活跃城市地区方面发挥着巨大的作用^[1]。

另外, 城市旅游 (city tourism) 具有最有效地宣传城市的优势, 通过城市旅游也可以向游客延伸到城市和国家形象^[2], 城市旅游对于提高城市竞争力的重要性越来越大^[3]。

因为城市旅游在中国也很活跃, 随着经济的增长, 中国国内很多城市的人不仅在外形上的增长, 生活方式和价值观也在改变, 通过旅游寻找生活的悠闲。尽管如此, 大部分中国城市旅游由于开发不尽如人意、缺乏象征性、公共设施和流通系统不足, 以及政府的支持和政策不完善等原因, 未能很好地发挥宣传城市魅力的作用, 在没有根据游客喜好变化进行新的旅游开发的情况下, 沿袭过去, 在设定城市旅游开发的战略方向的同时, 变化迫在眉睫。

关于恢复性服务景观的研究是以酒店领域、赌场领域、餐厅领域、度假村领域、航空公司领域^[4]等为对象进行的, 但对城市旅游恢复性服务景观的实证研究非常少, 对此的研究将具有相当大的意义。同时, 在很多先行研究中, 感知到的价值会对满足产生影响。

从影响的主要因素来看, 验证城市旅游中感知到的恢复性服务景观对旅游满意的影响中感知价值的媒介效应, 也将在理论和实务上提出多种启示。对此, 本研究试图通过验证中国城市旅游恢复性服务景观对

作者简介: 孙晓丽(1990—), 女, 博士, 讲师, 研究方向为城市旅游、生态观光;

张惠媛(1997—), 女, 博士, 讲师, 研究方向为社交网络服务、银发旅游、旅游危险感知;

陈宇(1998—), 女, 硕士, 讲师, 研究方向为消费者行为、市场调查、服务营销。

通讯作者: 张惠媛

旅游满意的影响及其关系中感知到的媒介效应, 对此前没有形成理论方法的城市旅游恢复性服务景观进行实验性研究, 并为中国城市旅游发展提出一些有用的实践方案。

二、理论背景

1. 恢复性服务景观

服务景观被用作物理环境和刺激、气氛、类型材料、证据、类型线索等多种术语^[5]。现在这些词在提到服务空间内的环境因素时都可以用同一个概念。Rosenbaum 为了扩展 Bitner 对以物理环境为中心的服务景观的描述, 引入了注意力恢复理论, 建议将恢复性领域包括在服务景观中, 并开始使用恢复性服务景观这一术语^[6]。注意力恢复理论是将现代人从疲惫的生活中解脱出来, 停留在流动的溪水和芳香的花香等感官要素丰富的舒适环境中, 感受到身体和精神疲劳得到治愈的感觉, 即有助于人的身心恢复理论化的^[7]。这是根据将人的注意分为指向性自发主义和非自发无意识主义而开发的理论。指向性自发主义是指在现代人的日常生活中, 为了集中于特定的信息或活动而抑制散漫, 进行意识的努力。这种指向性自发性注意反复出现, 抑制分散刺激, 导致人类身体、心理和疲劳, 从而产生指向性注意疲劳^[8]。根据注意力恢复理论, 人类在没有集中注意力的情况下, 通过五感可以恢复指向性注意力疲劳的环境就是恢复环境。而且, 通过 Rosenbaum 等学者的研究, 确认了在自然环境中研究的恢复性特性可以扩展到商业服务景观, Rosenbaum and Massiah 将恢复性服务景观的概念定义为具有恢复人类疲劳功能的环境, 并在多个领域进行了关于恢复性服务景观的研究^[9]。

文昌浩将恢复性服务景观的概念定义为包含可恢复环境条件的物理环境, 称其为顾客通过快乐、刺激、越轨体验恢复的第三消费环境。而权赫宗曾将其定义为物理环境, 包括可恢复环境的条件, 即可以感觉到治愈的恢复环境^[10]。

本研究则将恢复性服务景观用于城市旅游进行研究, 定义为可以体验到理性恢复的物理环境。Kaplan and Kaplan 等学者曾将逃离、广度感 (Extent)、魅惑感、和谐性视为恢复性服务景观的构成因素, 但在恢复性服务景观的构成因素方面, 多数先行研究人员以注意力恢复理论为基础, 适用逃离、魅惑感、一致性、适合性因素。对此, 本研究也提出了恢复性服务计划的构成因素是以注意力恢复理论为基础, 以逃离、魅惑感、一致性、适合性四个子因素组成的多维概念进行研究。通过脱离疲惫的工作或远离日常生活的环境, 可以感知到心理上脱离的环境, 魅惑感是指通过魅力刺激人们的物理环境。一致性是指在一定规模的环境中, 人们认知的整体协调性环境, 适合性是指能够感知到符合个人价值观或偏好的环境。金镇玉和金道英以自然基础治愈游客为对象, 分析了注意力恢复对生活满意度的影响关系, 结果显示, 注意力恢复通过情感对生活满意度产生很大影响。文昌浩的研究分析了综合度假村的恢复性服务划界对顾客满意的影响关系, 结果显示, 恢复性服务景观通过情感反应中的愉悦因素对顾客满意有很高的影响^[11]。

2. 旅游满意

Fridgen 将与旅游营销直接相关的旅游满意的概念定义为产生游客想再次访问旅游目的地或向他人推荐的潜力。旅游满意可以说是在访问前的期待和访问成果之间的关系过程中产生的游客态度。以先行研究为依据, 本研究也将旅游满意定义为城市旅游的游客来之前的期待, 实际旅游体验后的真实感受, 并进行了研究。Szivas et al.表示, 满意的游客希望再次访问旅游目的地, 可以创造更多的潜在游客, Bigne et al.对再次访问和推荐意图的忠诚度也有直接影响。金镇玉、金道英的研究以治愈游客为对象, 分析了注意力恢复对生活满意度的影响关系, 结果显示, 注意力恢复通过情感影响生活满意度^[12]。朴敏雅的研究对度假村的恢复性服务景观、休闲满足的结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 结果显示, 在恢复性服务景观, 逃离、魅惑感和适合性对休闲满足产生正 (+) 的显著影响。

3. 感知价值

感知价值的概念根据研究人员或研究对象进行了多种定义, Zeithaml 的概念在营销领域最常用, 即在考虑价值这一评价的情况下, 对主观价值对象进行全面分析。金南洙把迟到的价值称为对自己支付的费用可以享受的便利。本研究将游客感知价值的概念定义为游客在城市旅游活动中对旅游商品或服务的主观评价, 并接受 Sweeney and Soutar 的观点, 以社会价值、情感价值、货币价值进行测量。社会价值是指社会概念提高的产品能力产生的功效, 情感价值是指产品产生的情感或情绪状态产生的功效。货币价值是指因金额感知带来的短期和长期费用的变化而从产品中衍生出来的功效^[13]。在金贤哲和郑基汉的研究中, 将其引入生态旅游, 将其视为感知价值的三个要素, 即情感价值、功能价值、认识价值, 并对顾客满意和行动意图的关系进行验证, 结果发现感知价值中的功能价值对顾客满意和行动意图产生了积极的唯一正 (+) 的影响。然后, 在全亨奎等人的研究中, 了解了旅游景点的特性、游客感知价值、满意度及行动意图之间的结构关系, 结果发现旅游景点的特性对游客感知的快乐价值和效用价值产生了显著的正 (+) 影响。

三、研究设计

1. 研究过程

本研究旨在验证中国城市旅游恢复性服务景观对旅游满意的影响，以及在这些关系中感知价值的媒介效应。

本研究旨在了解参加中国城市旅游的中国游客对感知旅游中恢复性服务景观环境及游客满意度的影响，主要目的是以感知价值的中国城市旅游恢复性服务景观对旅游满意的影响：以感知价值的媒介效应为中心，验证媒介作用。在问卷调查中，通过问卷星网站（中国在线问卷专门网站）填写电子问卷，在 SNS（WeChat）上发布链接，对近一年（2023 年 01 月 01 日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内有城市旅游经验的中国人进行了在线问卷调查。2024 年 1 月 17 日至 2 月 17 日，约 30 天共有 416 人回答，除其中回答明显不诚实或不适合统计分析的 66 人外，以 350 人为有效样本，利用统计程序 SPSS22.0 程序进行统计分析。

2. 研究假设的设定

- 1) 恢复性服务景观测量及其与感知价值的关系
假设 1 恢复性服务景观指标将对感知价值产生积极（+）影响。
- 2) 恢复性服务景观与游客满意度的关系
假设 2 恢复性服务景观将对游客满意度产生积极（+）影响。
- 3) 感知价值与旅游满意度的关系
假设 3 感知价值将对游客满意度产生积极的（+）影响。
- 4) 感知价值在恢复性服务景观与游客满意度关系中的媒介作用
假设 4 在恢复性服务景观与游客满意度之间的关系中，感知价值将表现出媒介效应。

四、成果分析

1. 人口统计学特征

为了了解受访者的一般特性，进行了频率分析，由此掌握的样本的人口统计学特性如下表 1 所示。

表 1 人口统计学特征

区分	项目	频度(n=350)	(%)
性别	男	179	51.1
	女	171	48.9
婚姻状况	未婚	125	35.7
	已婚	225	64.3
年龄	20 以下	16	4.6
	20-29	67	19.1
	30-39	78	22.3
	40-49	93	26.6
	50-59	56	16.0
	60 以上	40	11.4
	高中及以下	41	11.7
受教育程度	专科	76	21.7
	本科	166	47.4
	研究生及以上	67	19.1
	学生	64	18.3
职业	专业技术人员	52	14.9
	公务员	44	12.6
	企业职工	94	26.9
	个体私营业者	28	8.0
	其他	68	19.4
1 年内城市旅游次数	1 次	102	29.1
	2-3 次	166	47.4
	4-5 次	54	15.4
	6 次以上	28	8.0
城市旅游同行者	自己	48	13.7

城市旅游信息获取途径	家人	133	38.0
	朋友	116	33.1
	伴侣	29	8.3
	团体	22	6.3
	其他	2	0.6
	外部广告	36	10.3
	网络	68	19.4
	新闻	71	20.3
	他人(家人、朋友等)介绍	114	32.6
	促销宣传	21	6.0
平均月收入	其他	40	11.4
	3000 元以下	67	19.1
	3000~6000	133	38.0
	6000~9000	111	31.7
	9000~12000	18	5.1
	12000 元以上	21	6.0

2. 信度与效度分析

1) 城市旅游恢复性服务景观的信度及效度分析

对城市旅游恢复性服务景观的 16 个问题（逃离 4 个问题、魅惑感 4 个问题、一贯性 4 个问题、适合性 4 个问题）进行探索性因素分析的结果所示。城市旅游恢复性服务景观的 KMO 值为.862，显示因素分析的变量选取良好。而且，因素承载值也很高，为.715~.872，提取的 4 个因素非常合适。而且，每个固有值分别为因素 1（逃离）2.237、因素 2（魅惑感）2.941、因素 3（一致性）2.556、因素 4（适合性）2.509，对总变量解释因素 1（逃离）14.916%、因素 2（魅惑感）19.607%、因素 3（一致性）17.041%、因素 4（适合性）16.725%，总累计分散说明力为 68.290%。在因素提取过程中，问项 1 “我在游览城市的过程中，有一种摆脱重复现实的感觉。”该问题的因素机智不到 0.4，或者共性不到 0.4，因此从因素组中删除了问题。进行了第二次探索性因素分析，生成了 14 个因素。Bartlett 的球形性检验近似 $\chi^2=2456.805$ ($df=105$, $p<.001$)。基于以上分析结果，本研究提出的恢复性服务景观构成因素在概念上是妥当的，构成它的变量也可以说是整体合适的。

2) 旅游满意的信度及效度分析

旅游满意的探索性因素分析由 3 个测量变量生成 1 个因素，结果所示。Bartlett 的球形性检验的近似 $\chi^2=736.918$ ($df=3$, $p<.001$)，表明 KMO 的抽样合成检验在 0.5 以上时，认为因素分析是合适的，本研究提出了.721。KMO 的样本拟合检验测度值为.721 据调查是好的。因素装载值为.873~.940，非常合适。另外，固有值为 2.499，对总变量的分散解释力为 83.301%。基于以上分析结果，本研究提出的旅游满意构成因素在概念上是妥当的，构成它的变量也可以说是整体上合适的。

3) 感知价值的信度及效度分析

对感知价值的 9 个问题（社会价值 3 个问题、情感价值 3 个问题、金钱价值 3 个问题）进行探索性因素分析的结果所示。感知价值的 KMO 值为.894，用于因素分析的变量选取良好。而且因素的承载值也很高，为.779~.888，显示为提取的 3 个因素非常合适。而且，每个固有值分别为因素 1（社会价值）2.654、因素 2（情感价值）2.583、因素 3（金钱价值）2.466，对总变量说明因素 1（社会价值）29.491%、因素 2（情感价值）28.705%、因素 3（金钱价值）27.40%，总累计分散力为 85.596%。Bartlett 的球形性检验的近似 $\chi^2=2812.771$ ($df=36$, $p<.001$)，表明 KMO 的抽样合成检验在 0.5 以上时，认为因素分析是合适的，本研究提出了.894。以上分析结果为基础，认为本研究提出的知觉价值的构成因素在概念上是妥当的，构成它的变量也整体上是合适的。

3. 假设验证

1) 城市旅游的恢复性服务景观、感知价值与旅游满意的关系

根据调查，首先恢复性服务景观的逃离、魅惑性、一致性和适合性分别对社会价值、情感价值和货币价值具有统计上的注意力限制 (+) 效应。得出了恢复性服务景观对感知价值的影响。结果如下表 2 假设 1 被采纳。

表 2 恢复性服务景观对感知价值的影响验证

变量	模型					共线性统计	
		B	标准误差	β	t	P	VIF
情感性价值		1.569	.203		7.710	.000***	
	逃离	.178	.046	.206	3.857	.000***	.600
	魅惑性	.349	.063	.322	5.529	.000***	.503
	一致性	.080	.032	.103	2.466	.000***	.984
	适合性	.198	.059	.200	3.327	.014**	.470
R ² = .411, 修正 R ² = .405, F= 60.269 p= .000***, Durbin-Watson 2.042							
社会性价值		.802	.203		3.949	.000***	
	逃离	.053	.046	.061	1.150	.025**	.600
	魅惑性	.282	.063	.260	4.480	.000***	.503
	一致性	.057	.032	.073	1.765	.038**	.984
	适合性	.394	.059	.398	6.639	.000***	.470
R ² = .416, 修正 R ² = .409, F= 61.436 p= .000***, Durbin-Watson 2.074							
货币性价值		1.549	.254		6.096	.000***	
	逃离	.237	.058	.251	4.104	.000***	.600
	魅惑性	.114	.079	.097	1.448	.049*	.503
	一致性	.047	.041	.056	1.168	.024*	.984
	适合性	.208	.074	.194	2.809	.005**	.470
R ² = .225, 修正 R ² = .216, F= 24.984 p= .000***, Durbin-Watson 1.864							
*: p<.05, **: p<.01, ***: p<.001							

其次, 分析了恢复性服务景观对游客满意度的影响。结果表明, 逃离、魅惑性、一致性和适合性是有限的 (+) 影响, 但一致性对旅游满意度的影响在统计上没有得到关注。因此, 如下表 3 所示, 假设 2 被部分采纳。

表 3 恢复性服务景观对游客满意度的影响验证

变量	模型					共线性统计	
		B	标准误差	β	t	P	tolerance
旅游满意		.857	.178		4.809	.000***	
	逃离	.149	.041	.175	3.631	.000***	.576
	魅惑性	.260	.054	.244	4.824	.000***	.520
	一致性	.073	.030	.097	2.453	.989	.989
	适合性	.408	.048	.429	8.555	.000***	.530
R ² = .546, revised R ² = .541, F= 102.522, p= .000***, Durbin-Watson 1.764							
: p<.01, *: p<.00							

第三, 分析了感知价值对旅游满意度的影响。结果表明, 社会价值、情感价值和货币价值都对旅游满意度的关注度 (+) 有影响。因此, 如下表 4 所示, 采纳假设 3。

表 4 感知价值对旅游满意度的影响验证

变量	模型					共线性统计	
		B	标准误差	β	t	P	tolerance
旅游满意		.586	.176		3.319	.001**	
	社会性价值	.238	.047	.240	5.073	.000***	.641
	情感性价值	.356	.048	.359	7.428	.000***	.616
	货币性价值	.256	.039	.281	6.615	.000***	.797
R ² = .502, revised R ² = .497, F= 116.105. p= .000***, Durbin-Watson 1.687							
*: p<.05, **: p<.01, ***: p<.001							

2) 感知价值的媒介效应

根据调查, 恢复性服务景观的下位因素逃离、魅惑性、社会价值的媒体效应以及适应性感知价值的下

位因素对旅游满意度有影响。因此，如下表 5 所示，假设 4 被部分采纳。

表 5 感知价值的媒介效应验证

	模型			β	t	P
		B				
1		.802	.203		3.949	.000***
	逃离	.053	.046	.061	1.150	.025**
	魅惑性	.282	.063	.260	4.480	.000***
	一致性	.057	.032	.073	1.765	.038**
	适合性	.394	.059	.398	6.639	.000***
R ² = .416, revised R ² = .409, F= 61.436 p= .000***						
2		.747	.177		4.219	.000***
	逃离	.205	.040	.239	5.104	.000***
	魅惑性	.296	.055	.276	5.400	.000***
	一致性	.073	.030	.097	1.453	.989
	适合性	.332	.052	.339	6.416	.000***
R ² = .547, revised R ² = .542, F= 104.063, p= .000***						
3		.624	.178		3.498	.001**
	逃离	.197	.040	.229	4.962	.000***
	魅惑性	.253	.056	.236	4.549	.000***
	一致性	.032	.028	.042	1.147	.252
	适合性	.271	.054	.277	5.015	.000***
R ² = .561, revised R ² = .554, F= 87.840, p= .000***						
*: p<.05, **: p<.01, ***: p<.001						

五、结论

本研究以中国城市游客为对象，旨在验证城市旅游的服务划界对旅游满意的影响，以及这些关系中感知价值的媒介效应。并以本研究得出的研究结果为基础，提出今后通过对我国城市旅游的有效管理，提高旅游活性化的管理方向。分析结果总结如下：从假设检验结果来看，第一，考察了恢复性服务景观对旅游满意的影响，结果显示，在恢复性服务景观因素中，逃离、魅惑感、适合性对旅游满意有正（+）的方向影响，而一致性对旅游满意没有影响。第二，为了检验恢复性服务景观与旅游满意之间感知价值的媒介效应，进行了三阶段回归分析，结果显示，感知价值的社会价值、情感价值、金钱价值都部分地中介了恢复性服务景观与旅游满意的关系。

同时，作为通过扩大中国地区城市旅游业的中国游客来提高地区活性化方案的基础资料，将提出以下实务启示。

据调查，恢复性服务景观的逃离、魅惑、适合性会对感知的价值和满意度产生正（+）的方向影响，因此在中国城市地区，应该努力营造心理上可以摆脱的空间和视觉上有吸引力的环境，如日常逃离。除了恢复性服务景观的一致性方面，从自然基础的角度来看，游客旅游活动的项目构成和安全、城市旅游自然环境保护的组织体系化和组织化是必要的。为此，建议先了解游客的旅游活动形式，了解哪些便利设施是首选和必要的。无论城市环境的大小，通过场所设施的建筑，都会给人一种丰富的感觉，能够吸引游客的心，促进游客的探索，给游客带来快乐。此外，游客访问城市时所期待的事情，以及所要做行为和所能提供的东西，都应该保持一致。因此，在营造景区环境时，应尽量减少破坏和与自然环境不协调的道路或标志牌等，保持自然的原汁原味。结果，无论城市规模如何，在所有的旅游环境内，除了物理方面以外，在服务范围方面，都要利用好以上 3 个恢复性因素，引导游客的满意。

而且，在恢复性服务景观和旅游满意之间的关系中，感知价值的媒介效应得到了验证，这些结果将首先努力在城市内通过各种庆典或活动等构成，在引发疲劳的日常或工作中，营造一个心理上远离的、可以投入休息和个人事务的旅游环境，从而激发中国游客的情感价值。并通过制定优惠价格、扩大预约服务、提供积分等与其他企业相关的附加优惠，努力提供广泛适用优惠的旅游环境，增加中国游客的经济价值。而且，为了让游客之间的交流持续顺畅，应该通过民俗游戏体验等可以一起直接参与的有趣游戏，努力增加社会价值。

尽管取得了以上研究成果，但本研究仍存在以下局限性：首先，对比现有的关于恢复性服务景观的服务景观相关研究，在子因素和尺度上可能存在争议。与面向多个领域长期积累的服务景观研究不同，有关

恢复性服务景观的研究在概念上是因为恢复性服务景观以恢复性服务景观本来在自然环境中的治愈功能在商业环境中是可行的为依据，利用了以注意力恢复理论为基础的测量问题。对此，今后有必要进行积极的后续研究。同时，与对城市旅游的关注或重要性相比，对城市旅游的理论研究具有概念上的复杂性，以及难以用特定理论或模型等来解释的多种多样、异质性的多种旅游行为的复合式城市旅游，希望能够进行有助于解决这些问题的有意义的研究。

参考文献:

- [1]孔贞淑 (2020)。“通过旅游形态分析，研究吸引中国游客仁川的方案”。硕士学位论文。青云大学研究生院。
- [2]权赫钟 (2019)。“使用酒店或度假村的客户的恢复性服务架构对客户感知价值的影响-以恢复体验的媒介效应为中心”。博士学位论文。京畿大学研究生院。
- [3]朴柱兰 (2018)。“游客恢复环境知觉带来的恢复经验对旅游满意的影响”硕士学位论文。大邱大学研究生院。
- [4]涟川 (2021)。“提升城市品牌价值的文化旅游产品设计开发战略研究——以中国五大城市文化旅游产品为例”。博士学位论文。大邱大学研究生院。
- [5]BAKER J(1987). The Role of the Environment in Marketing Service:The ConsumerPerspective.In Czepiel,J.A., Congram,C& Shanahan,J.(Eds.), The Services Challenge:Integrating for Competitive Advantage. Chicago: American Marketing Association.pp.79-84.
- [6]ROSENBAUM M. S., SWEENEY J. C. and WIMDHORST C(2009), The restorative qualities of an activity-based, third place cafe for seniors; restoration, social support and place attachment at Mather's-More-Than-a-Cafe. Seniors Housing and Care Journal. 17(1). pp.75-90.
- [7]BAKER and CROMPTON(2000). Urban tourism research: Recent progress and current paradoxes, Tourism Management. 32(1). pp.1-15.
- [8]ROSENBAUM M. S. and MASSIAH. C(2011). An expanded servicescape perspective. Journal of Service Management. 22(4). pp.471-490.
- [9]KEBBEDE G(2017). Living with urban environmental health risks: The case of Ethiopia.Routledge.
- [10]KORPELA K. M., BORODULIN K.,NEUVONEN M., Paronen, O. and Tyrväinen, L(2014).
- [11]李熙贞·李汉宁 (2020)。“新型冠状病毒肺炎 (COVID-19) 事态长期化带来的压力水平是否所有消费者都相同? -关于新冠压力下消费者细分市场的研究”。《韩国留学会杂志》。30(4), pp.75-87.
- [12]宋善英 (2021)。“赌场综合度假村的恢复性服务草绘对场所依恋、场所忠诚度的影响: 以干预的媒介调节效果为中心”。博士学位论文。京畿大学观光专门研究生院。
- [13]Lucas A. F(2000). The Determinants and Effects of Slot Servicecape Satisfaction in a LasVegas Hotel Casino. UNLV Gaming Research & Review Journal. 7(1). pp.2.

Research on the Impact of Restorative Servicescape in Chinese Urban Tourism on Tourist Satisfaction: Highlighting the Mediating Role of Perceived Values

Xiaoli Sun¹, Huiyuan Zhang², Yu Chen³

¹Zhejiang Yuexiu University, Shaoxing, China ;²Suzhou College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Suzhou, China;

³Huaibei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Huaibei, China

Abstract: This article investigates the impact of restorative servicescape on tourist satisfaction in Chinese urban tourism and explores the mediating role of perceived values. The research results indicate that the restorative servicescape has a significant positive impact on perceived values, the restorative servicescape has a significant positive impact on satisfaction, and perceived values also has a significant positive impact on satisfaction. By determining the impact of Chinese urban tourists' perception of restorative servicescape on satisfaction, this article provides a solution to enhance tourists' positive perception of tourism service environments and proposes effective strategies for the development and management of service environments to build a competitive advantage for Chinese urban tourism.

Keywords: Restorative Servicescape; Urban Tourism; Tourist Satisfaction; Perceived Values

电视专题多维表达与价值认同策略

——以《放歌新时代》为例

王俊翰¹ 冯磊²

(1.成都艺术职业大学, 四川 成都 611433, 2.成都大学, 四川 成都 610106)

摘要: 2024年是我国文艺工作座谈会召开的十周年。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出品的电视专题片《放歌新时代》全景式呈现了我国十年文艺事业的蓬勃发展,兼具思想性和艺术性。文章认为,该作品紧密结合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采用宏微结合的叙事视角和多重影像手段有效提升作品视听质效,借助文艺事件唤醒并构建集体记忆,通过电视仪式传播增强受众价值认同,彰显出电视专题作品应有的创新表达与责任担当。

关键词: 电视专题片; 文艺创作; 文艺工作座谈会; 《放歌新时代》

基金项目: 2024年度四川省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美学与美育研究中心资助科研项目“元宇宙戏剧的‘超现实主义’美学研究”(项目编号: 24Y022)阶段性成果; 德阳市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文化旅游发展研究中心2024年度项目“互联网+背景下四川红色基因影视赋能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内在机制及策略研究”(项目编号: WHLY2024036)阶段性成果。

DOI: doi.org/10.70693/rwsk.v1i5.1222

引言

《放歌新时代》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中国作家协会联合出品,于2024年10月30日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首播,一经播出便迅速引起广泛热议,作品被国家广播电视总局评为“2024优秀国产纪录片选集”。本文梳理该作品在主题内容构建、影像叙事技巧以及价值认同方面的亮眼表现,尝试为电视专题片的创新表达与研究提供有益参考。

一、主题聚焦,描绘文艺图景

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文艺工作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为新时代中国文艺事业的蓬勃发展指明了前进方向。历经十年砥砺前行,我国文艺事业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开创了全新的发展格局。如何借助专题作品讲好文艺发展故事,该片总导演作出精准思考:阐释好新时代文艺理论背后磅礴的思想伟力,揭示新时代文艺成就背后强大深邃的真理逻辑,是这部专题片的出发点和落脚点^[1]。

作品以文艺工作座谈会作为关键起点,精心策划编排三集内容,全面深刻地阐释了新时代文艺发展的实践历程、面临的任务与挑战以及坚定不移的前进方向等重要主题,保证了内容完整性和主题集中性。在此基础上,通过系统梳理新时代文艺理论的发展轨迹,从多个维度深入挖掘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艺工作重要论述所蕴含的丰富理论内涵,使得作品的思想性得以充分彰显,展现出强大的思想穿透力。同时巧妙地运用典型人物与典型事例,以大众评论的独特视角,回顾文艺实践所取得的丰硕成果,生动呈现了作品蕴涵的人民性,让人民在文艺中的主体地位得以鲜活体现。此外,作品还采用理论与实践紧密结合的方式,对十年来文艺事业的发展规律进行精准总结,清晰阐明了文艺与时代同频共振、文艺与中华民族血脉相连的紧密联系,使作品的时代性得以鲜明凸显。

作者简介: 王俊翰(1997—),男,硕士,助教,研究方向为视听艺术;

冯磊(1999—),男,硕士,研究方向为广播电视。

二、篇章布局，深化内涵表达

电视专题片若要强化主旨表达，必须依靠精巧的谋篇布局。《放歌新时代》以《时代召唤》《人民期待》《新的使命》三大篇章为架构，搭建起层次分明、循序渐进的叙述框架，将新时代文艺发展全景图勾勒得更加生动、立体。

第一集《时代召唤》从“没有中华文化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一深刻论断开篇，聚焦文艺创作与时代的紧密联系，深入探讨新时代赋予文艺工作的新使命，即要融入潮流，成为驱动社会进步与文化昌盛的核心动力。还围绕文艺如何引领时代风尚、把握时代脉搏等核心问题进行了深入阐述；第二集《人民期待》对文艺创作的“人民性”展开系统探讨。例如剖析《山海情》《十八洞村的十八个故事》等典型作品，具象化呈现“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深入诠释习近平总书记“文艺要反映好人民心声，就要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这个根本方向”^[2]重要思想；终篇《新的使命》着眼文艺事业的长远发展，深入思考“两个结合”、加强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增强文化自信与自信、坚守中华文化立场等重要思想，以及如何为文艺事业未来发展指明方向。该篇章还探讨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推动文化创新与融合、在全球化语境中彰显中华文化魅力等议题，激励文艺工作者肩负新使命，为铸就中华文化新辉煌贡献力量。单集内容叙述大致又依循“思想引入-理论解读-文艺故事-现实关照”的逻辑层次，各篇章既相互独立又紧密联系，共同回答了文艺发展的关键问题。

分层叙述的方式使作品逻辑脉络更为清晰。从宏观政论到微观内容，再回归宏观总结，层层递进，全面展示新时代文艺发展的成就与经验，剖析我国文艺的历史使命与发展方向，深化了作品主旨表达。

三、视角融合，提升叙述温度

近几年，《正风反腐就在身边》《领航》等诸多优质电视专题作品，纷纷采用宏观表达与微观叙事相融合的创作手法，取得了良好的播出效果。其中，宏观表达为作品奠定了庄重、客观的基调，确保了内容的严肃性与权威性。在此基础上，微观叙事充分考虑观众的心理接受机制，采用温和而贴近人心的叙事语调，讲述细腻感人的故事，增添情感温度，从而让观众更容易接受与理解。

《放歌新时代》延用了宏观与微观视角融合的叙事策略，既确保了内容的理性严谨，又增强了作品的人文色彩表达。例如，《时代召唤》开篇以宏观视角精准定位新时代文艺事业的发展坐标，以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为理论指引，深入阐释新时代文艺创作的重大命题，展现出宏大的视野与深刻表达。后续在探讨文艺与时代、人民的具体关系时，巧妙切换至微观叙事视角，通过引入多个具体故事予以阐述其内涵，如引入电视剧《觉醒年代》编剧龙平平的创作经历：他在深入研究史料过程中，与陈独秀的“觉醒时刻”产生深刻共鸣，并亲述如何被革命先驱们的思想觉醒和精神追求所触动；演员于和伟饰演陈独秀，谈到在角色塑造，认为感觉像是与革命者进行了一场穿越时空的对话，让人深刻感受到信仰的力量。作品通过将个体情感与历史场景的结合呈现，让观众更易理解文艺作品的诞生背景及其引领时代思潮、推动社会变革的重要作用。

宏微融合的叙事手法贯穿全片。作品从宏观视角梳理文艺创作从“高原”迈向“高峰”的跨越历程，同时又在呈现过程中捕捉微小故事，从具体人物、作品背后故事切入，如《雪山大地》创作时深入藏地的人文体验、《沂蒙山》的唱段灵感、《十八洞村的十八个故事》的创作采风记忆等真挚故事，带领观众感受文艺创作现场，体会文艺家的创作情感，并与之产生共鸣。这种表达方式既拓展了作品的叙事空间，又能让观众多角度理解作品所表达的内容和思想。

四、多元影像，赋能视听质效

电视专题片的纪实属性和政论风格决定了其创作需采用客观冷静的影像风格。然而，单一的影像风格又易使观众产生距离感。《放歌新时代》融合传统专题片的客观基调、纪录片的纪实美感、风光片的视觉追求以及故事片的情景搭建，运用多元化、故事化的影像组合策略，打造出新颖影像表达，提升叙事张力，增强观众感知。

整体来看，《放歌新时代》的主体影像由历史活动纪实资料、人物采访、自然风光空镜及文艺作品片段构成，整体基调显示出沉稳大气，给人庄重肃穆之感。在细节处多次穿插唯美且富有修辞意味的镜头，积极营造诗意影像风格，提升作品观感。例如，在展现文学作品《雪山大地》的创作故事时，先呈现作家杨志军在神山阿尼玛卿雪山下阅读小说的场景，借助同期声（请阿尼玛卿冈日撩开云雾，我要寻找我的阿妈……）将人物、景色与文学相连，营造浓厚的浪漫氛围；随后航拍镜头以超广视角掠过人物，对准作为背景的壮丽雪山与悠然羊群；再通过不同景别的组合镜头，刻画杨志军深入果洛州腹地，在雪山与草原间坚定前行、沉浸采风的画面，形成别样意境。此外，多次精准运用升格镜头生动还原他与藏族人民一同欢歌曼舞、纵情驰骋的欢乐场景，利用唯美、活力影像诠释出文艺创作与社会、人民的紧密联系。

不仅如此，为避免传统专题片直白叙述的枯燥感，作品积极构建“场景语境”，使内容更生动易懂。如在开篇

未直接叙述文艺工作座谈会召开,而是先采访参会的文艺工作者代表尚长荣、王蒙、李准等人,利用他们的回忆与会议纪实影像,带观众进入相应情境;在展示文艺志愿者徐秋菊服务基层时,通过组合村广播声、筹备工作画面、热闹演出现场等影像,营造“百姓村晚”的热烈氛围,便于观众更易轻松感知和理解具体内容。

再者,为灵活集中展示 119 件不同形式的艺术精品时,主创团队会根据不同题材和专题片节奏选择纪实风格或预告片修辞话语^[3],构建起多维度的艺术展示空间。例如在第三集《新的使命》中,对动画电影《长安三万里》、舞剧《只此青绿》、舞剧改编电影《永不消逝的电波》等多种艺术媒介与不同文化语境的影像素材形成复调与互文性叙事结构,加入了水下摄影与动画合成、逐格、移轴等表现技巧,充分运用预告片视觉修辞的表现蒙太奇技法,以放大夸张的景别、角度等展现形式,为精品文艺的各类标识性镜头建立起快节奏新颖的视觉呈现,提升视听质效。

五、文艺事件,唤醒集体记忆

全球化浪潮使各国民众在身份认同识别过程中处于游离混乱状态,前所未有的“认同危机”与“认同焦虑”在后现代语境下出现^[4]。电视专题片在宣传主流意识形态、强化观众集体认同方面责任重大。构建“集体记忆”是实现国家认同转化的重要途径,媒介可通过对过往的记录、重现、转换以及重新构建,唤起观众对记忆的回溯与感知,进而实现集体认同观念的塑造^[5]。

《放歌新时代》作为一部专题作品,其核心宗旨在于实现价值引领。该作品通过还原中国文艺事业的发展脉络与正确方向,生动呈现了近十年来文艺的繁荣景象,使观众深刻领悟到党的领导对文艺事业的重要作用。首先在内容上选取了像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周年庆典、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 90 周年纪念以及改革开放 40 周年等党和国家发展历程中的关键节点。这些事件不仅是民族集体记忆的核心要素,更是中国历史进程中的重要里程碑。通过文艺化的叙述和影像化的呈现,这些重大事件重新激活了观众的相关历史记忆。观众仿佛跨越时空,再度领略那些激动人心的历史现场,从而重建并强化了集体记忆。

此外,作品还甄选了如《觉醒年代》《我和我的祖国》《山海情》等现象级影视作品进行串讲,引领观众重温那些曾引发广泛情感共鸣的观剧时刻;还原舞蹈诗剧《只此青绿》、舞剧《五星出东方》等幕后创作故事,使观众回溯被舞蹈艺术所折服的心动瞬间。同时,作品还将微短剧《我的阿勒泰》所引发的旅游热潮,以及改编自中国传统经典故事的游戏《黑神话 悟空》在海内外市场的广泛传播与轰动效应等文艺现象纳入其中,有效唤醒和强化观众的集体记忆。这些文艺领域的“媒介事件”构建起了一幅连贯的文艺记忆图谱,不仅丰富了作品的主要内容,更促使观众从艺术接受的角度重新审视这些文艺现象,从而提升文化认知,强化了相关记忆,观众的归属感和自豪感得以增强。

六、电视仪式,强化价值认同

詹姆斯·凯瑞提出的“传播的仪式观”,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独特的视角来审视传播现象。他将传播视为一种仪式,而电视内容与传播则被赋予了“电视仪式”的属性。在这种仪式中,观众能够突破时空的限制,以一种“被邀请”的姿态与经过“仪式化”处理的媒介内容建立联系,并通过互动达成社会共识。

《放歌新时代》正是巧妙地借助了这种“电视仪式”来实现价值引领,强化观众的国家认同。从整体架构来看,该片将文艺工作座谈会至新时代我国文艺创作的繁荣历程进行了“仪式化”处理,通过回顾经典作品与串讲创作故事,构建了一个完整的仪式过程。在雄浑的背景音乐与深沉的解说声中,节目高潮迭起,最终在结尾处将“仪式感”推向巅峰,为观众带来了一场文艺的洗礼,同时也让他们在心理上对国家文化发展的盛况产生了强烈的认同感。

在细节处理上,《放歌新时代》更是巧妙地运用了本民族独特且融合了内部文化共享元素的象征符号来强化仪式效果。例如,节目采用了重大庆典中的国旗、国徽、党旗等国家象征,传统节日里的地方习俗与民族服饰等文化元素,以及天安门、长城、人民英雄纪念碑等地理文化标识,还有重要文艺事件和现象中的特殊标识等。这些符号引导观众进行再联想和体验,从而放大了国家和民族意识,促成了文化共识与情感共鸣。观众在这一互动过程中,不断修正与确认自身的情感和身份,进而维系和巩固了国家认同。

从符号实践的角度来看,仪式过程要求内容组织者通过框架设定来赋予符号意义,并确保受众能够准确解读,进而实现有效的认同。例如,在介绍曾参演《海魂》《红色娘子军》等红色革命电影的艺术家庄牛犇时,节目将他塑造成一个具有代表性的人物符号。牛犇向年轻演员们倾情讲述:“当时被邀参加《龙须沟》,拍戏时才知道,自己是干了革命了,拍电影是为人民……”他坚定地追随中国共产党,入党宣誓时庄重而严肃的神情,以及谈到习近平总书记给他写信并勉励他要有志向时的真情流露,这些细节都被内容组织者设定为解读框架。这一框架引导观众感悟牛犇及其所代表的革命家们对党和国家事业的坚定信念与无私奉献,从而激发观众的情感共鸣和价值

认同。

更进一步地，作品中被采访的文艺工作者和叙述的文艺作品创作实践，也被转换为仪式中的象征符号，象征着广大群众和其自身的实践活动。观众不仅能在电视仪式参与中理解符号的原本意义，还通过移情联想，解读到自身被“象征”的深层涵义，进而获得与文艺工作者共通的情感体验。这种体验不仅唤醒了观众的主体意识，还让他们领悟到自身与党和国家以及社会的紧密关联，最终实现了国家认同的强化。

结 语

优秀的影视作品应为人民抒写、为时代立传。《放歌新时代》聚焦文艺回应时代所需。作品通过系统梳理新时代文艺理论脉络，深入解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艺工作的重要论述，以多元的叙事手段和影像组合策略，结合生动的文艺故事与现实关照，构建起独特的文艺集体记忆，为观众带来强烈的审美体验和价值认同。同时，同步打造“文艺创作者说”二创短视频进行立体传播，台网联动，产生广泛影响力，发挥了电视专题在传递时代主题、引领主流价值的重要作用。未来，电视专题作品应继续探索创新，更好地满足观众需求，为文化传播和社会发展贡献文艺力量。

参考文献：

- [1] 朱翌冉.《放歌新时代》：全景呈现新时代文艺十年高质量发展“百花园”[J].电视研究,2024,(12):26-28.
- [2] 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5-10-15(002).
- [3] 陶涛,何美.文艺唱响时代之歌：电视专题片《放歌新时代》创作谈[J].电视研究,2024,(12):29-32.
- [4] 刘燕.媒介认同论：传播科技与社会影响互动研究[M].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0.6.
- [5] 邢彦辉.电视仪式传播与国家认同研究[D].武汉大学,2013.72.

Multidimensional Expression and Value Identification Strategy of Television

Feature Programs— Taking "Singing in the New Era" as an Example

Wang Junhan¹, Feng Lei²

¹ Chengdu Vocational University of the Arts, Chengdu

² Chengdu University, Chengdu

Abstract: 2024 marks the 10th anniversary of the Symposium on Literature and Art Work. The television documentary *Singing in the New Era* co-produced by China Media Group presents a panoramic view of the booming development of China's literary and art undertakings in the past decade, being both ideological and artistic. The article holds that this work closely combines the spirit of General Secretary Xi Jinping's important speech at the Symposium on Literature and Art Work, adopts a narrative perspective that combines macro and micro views and multiple imaging means to effectively improve the audio-visual quality of the work, awakens and constructs collective memory by means of literary and art events, enhances the audience's value recognition through television ceremony communication, and demonstrates the innovative expression and responsibility that a television documentary should have.

Keywords: Television feature film; Literary and artistic creation; Symposium on Literary and Artistic Work; *Singing in the New Era*

广东沿海经济带县域经济发展路径分析——以湛江市为例

刘婷¹

(1.惠州经济职业技术学院 经济管理学院, 广东 惠州 516057)

摘要: 区域协调发展是推动广东省高质量发展的根本出路。选取 2020-2023 年广东省部分沿海经济带城市与湛江市的面板数据, 运用调查统计法分析湛江市经济增长与产业转型升级关系, 并梳理湛江市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现状。结果表明, 湛江市县域经济在产业结构单一、基础设施滞后、生态环境保护压力加大等方面仍存在短板, 应加快产业转型升级、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打好生态环境保护与治理“组合拳”, 以推动湛江市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关键词: 广东沿海经济带; 湛江市; 县域经济; 高质量发展

基金项目: 广东省教育厅 2023 年普通高校特色创新类项目《“双核驱动”发展战略背景下广东沿海经济带高质量发展路径研究》(项目编号: 2023WTSCX315); 中国商业经济学会 2023 年度规划课题成果(项目编号: 20242020)

DOI: doi.org/10.70693/rwsk.v1i5.939

湛江市作为海洋大市, 不仅是广东省三大省域副中心之一, 更被赋予带动粤西地区高质量发展的历史使命。然而, 在新一轮都市圈的发展规划中, 仍面临不少问题和挑战, 需要深入研究发展现状和探索相应的对策。首先, 湛江市的经济总量水平相对较低, 与省域副中心定位存在一定差距(2023 年湛江市经济总量低于茂名市); 其次, 湛江市作为沿海经济带核心城市之一, 2023 年第二产业增加值低于第三产业增加值, 在“制造业当家”的背景下, 依靠第三产业很难大幅度提升经济发展总量和扩大自身经济辐射力; 最后, 湛江市在科技创新水平需要进一步提升。近年来, 湛江市在科技创新和人才引进方面虽取得一定的成绩, 但与珠三角地区相比, 仍面临人口流失(2021 年人口净流出 153.48 万人, 居广东省第二位)、R&D 经费投入低(2021 年 R&D 经费投入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为 0.86%)等问题。本文旨在通过对湛江市县域经济发展现状的深入研究, 旨在推动湛江市县域经济产业转型升级和经济高质量发展。

1. 县域经济发展重要性

县域经济作为我国经济体系的基层单元, 其发展状况对于国家经济安全和社会稳定具有深远的影响^[1]。在当前我国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的背景下, 县域经济更是成为推动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 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推进, 县域经济的发展显得尤为重要。我国地域辽阔, 各地经济发展水平和资源禀赋差异显著。在这样的背景下, 县域经济的繁荣对于提升中西部地区发展水平, 缩小东部与中西部发展差距, 实现区域经济均衡和全面发展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首先, 县域经济是支撑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通过深入挖掘各地资源优势、产业特色, 形成优势互补、协同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 县域经济成为连接城乡、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纽带。通过充分挖掘县域经济市场潜力, 激活基层消费市场, 可以有效促进产业链供应链的完善和升级, 为国内大循环提供坚实基础。

其次, 县域经济可以带动相关产业和行业的协调发展。通过发展县域经济, 可以有效地带动周边相关产业和行业的共同繁荣, 形成一种互惠互利、协同发展的良性循环。第一, 有利于吸引各类投资, 这些产业和行业将得到扩充和升级, 进而增强市场竞争力。第二, 有利于带动产业链上下游企业的成长, 这样的产业链不仅能够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 推动整个产业的技术创新和效率提升。第三, 有利于逐渐形成特色产业和优势行业,

如：湛江市因拥有丰富的资源和良好的产业基础，德国化工巨头巴斯夫最终决定投资 100 亿欧元，在湛江市建设全球最大的一体化基地项目，此举不仅填补了在广东省产业供应上的短缺，更有利打造万亿绿色石化产业，对周边地区产生积极的辐射效应，从而实现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第四，有利于保障和改善民生，一方面，县域经济的繁荣可以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提高当地居民的收入水平和生活质量。另一方面，随着县域经济的发展，地方政府将有更多的财政收入用于公共服务和社会福利事业的建设，如教育、医疗、文化等，从而进一步提升居民的生活品质和幸福感。

2. 广东省沿海经济带县域经济发展特点

广东沿海经济带县域经济作为我国经济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鲜明的特色和独特的地位。这一经济现象的形成与发展，不仅反映了我国沿海地区独特的地理优势和资源优势，也展示了县域经济在全球化背景下所展现出的强大活力与潜力。首先，广东沿海县域经济在发展方向上呈现出明显的外向型特征。这些县域依托港口和海运优势，积极融入全球产业链和价值链，大力发展以出口为导向的加工制造业。通过引进外资、技术和管理经验，这些县域成功实现了产业升级和转型，形成了以外贸为驱动的经济增长模式。以珠三角地区的东莞、中山等市为例，这些城市通过发展加工贸易和引进外资，实现了快速的工业化和现代化，成为全国乃至全球知名的制造业基地。其次，在产业结构方面，广东沿海县域经济展现出多元化发展的态势^[2]。除了传统的制造业，新兴产业如电子信息、生物医药、新能源等也在这些县域得到迅速发展。这些新兴产业不仅提高了县域经济的科技含量和附加值，也增强了其抗风险能力和竞争力。同时，这些县域还注重发展现代服务业，如金融、物流、旅游等，进一步丰富了产业结构，提升了县域经济的综合实力。此外，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广东沿海县域经济也得到了优先发展。这些县域通常位于交通要道或港口附近，具有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优势。因此，在交通、通信、供电等基础设施方面，这些县域得到了大量的投资和支持，形成了较为完善的基础设施网络。这些基础设施不仅为广东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也为居民生活质量的提升创造了有利条件。综上所述，广东沿海经济带县域经济是我国经济发展中一个非常独特且重要的现象，其外向型特征、多元化产业结构以及完善的基础设施建设等发展特点，使得这些县域在全球化背景下展现出了强大的生命力和发展潜力。

3. 湛江市县域经济发展成效与现状分析

3.1 湛江市县域经济发展回顾

湛江市地处雷州半岛的南端，坐落于广东省的西南部，其独特的地理位置使其成为连接内陆与海洋的重要门户。湛江市因其优越的地理位置和丰富的自然资源，县域经济取得了显著的发展成效，成为广东沿海经济带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我国南方的重要交通枢纽之一，湛江市拥有完善的海陆空交通网络，为经济发展提供了便捷的物流条件。这里既有繁忙的港口，又有四通八达的公路和铁路网，还有繁忙的机场，为货物运输和人员往来提供了极大的便利。这种优越的地理位置和便捷的交通条件，使得湛江市在经济发展中占据了得天独厚的优势。近年来，湛江市政府高度重视县域经济的发展，制定了一系列扶持政策和措施，为当地经济的腾飞注入了强大的动力。政府加大了对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改善了交通、水利等基础设施条件，为经济发展提供了有力的支撑。同时，政府还积极优化产业结构，推动创新驱动发展，引导企业加大科技创新力度，提高产品的附加值和市场竞争力。这些政策的实施为湛江市县域经济发展提供了有力保障，也带动了教育、医疗、文化等社会事业的快速发展。如今，湛江市的公共服务水平和人民群众的生活质量得到了显著提升。

3.2 湛江市县域经济发展面临的问题

3.2.1 产业结构单一

湛江市县域经济发展面临首要问题是产业结构单一。在当前经济全球化和区域一体化背景下，产业结构的多样性和均衡性对于县域经济可持续发展至关重要。湛江市县域经济呈现出产业结构过于单一的特点，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从产业分布来看，湛江市县域经济主要集中在传统农业、渔业和旅游业等低附加值产业。据湛江市统计局的数据显示，湛江市 2023 年市地区生产总值为 3793.59 亿元，同比增长 3.0%，其中，第一产业增加值 706.91 亿元，同比增长 3.8%；第二产业值为 1454.62 亿元，同比增长 0.5%；第三产业增加值为 1632.06 亿元，同比增加 4.5%。不难看出，虽然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占比有所提高，但第一产业较上年仍有不小的增长，这种产业结构使得湛江市县域经济易受到自然灾害和市场波动影响，降低了经济抗风险能力。从产业链条看，湛江市县域经济的产业链条较短，缺乏高附加值的环节。以农业为例，湛江市农业主要以种植业和养殖业为主，农产品加工和深加工环节相对薄弱，这使得湛江市农业产值较低，农民收入增长缓慢。湛江市县域经济中的工业和服务业存在一定产业链条短板，如缺乏核心技术和高端人才等。以旅游业为例，湛江市县域旅游资源丰

富,但由于旅游产品开发水平不高,缺乏特色和吸引力,导致旅游业发展潜力未能充分发挥其作用。同时,在湛江市一些传统产业,如陶瓷、家具等,也面临技术创新不足、产品同质化严重等问题^[3]。

3.2.2 基础设施滞后

湛江市县域经济发展面临的另一关键问题是基础设施滞后,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从交通基础设施来看,湛江市道路、桥梁等设施建设不足,导致交通不便、物流成本高,交通基础设施滞后严重制约湛江市县域经济对外联系和内部流通。从能源供应来看,湛江市电力、燃气等能源供应不稳定,影响了企业正常生产和居民生活。据2023年广东能源局和湛江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数据,2023年广东省人均用电量约达6718千瓦时,湛江市人均用电量仅为广东省平均水平的64.6%,部分地区甚至存在用电难的问题,这种能源供应的滞后,限制了湛江市县域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从R&D经费投入来看,据2022年广东省科技经费投入公报获悉,2022年湛江市R&D经费31.97亿元,从投入总量来说位居粤西第一位,但从R&D经费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仅有0.86%(这两项数据均低于省域副中心汕头市36.28亿元和1.20%),说明湛江市基础研究实力偏弱,制约了湛江市研发创新的全面发展。

3.2.3 生态环境压力加大

在湛江市县域经济发展进程中,生态环境压力加大成为不容忽视的问题。随着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加快,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之间的矛盾日益凸显,特别是在快速追求GDP增长的环境资源过度开发和污染问题愈发严重,给当地的生态系统带来巨大压力,湛江市县域的水体污染状况令人担忧,随着工业废水、生活污水不断排放,以及农业污染的加剧,湛江市县域河流、湖泊和近海海域水质急剧恶化。据2023年湛江市环保局公布的数据,部分监测点的水质已经低于国家五类水标准,严重威胁到居民饮用水安全和水生生态系统健康。空气质量问题也日益突出,湛江市部分工业企业废气排放不达标,汽车尾气排放量增加,建筑扬尘等问题频发,导致空气中PM_{2.5}、PM₁₀等污染物浓度升高,不仅影响市民呼吸健康,还有可能引起酸雨等二次环境污染,对农作物和森林生态造成伤害。同时,红树林遭到大面积破坏,废水直排大海和海边倾倒生活、建筑垃圾等生态破坏,也在不同程度地使生物多样性面临严峻挑战,以致生态系统稳定性和服务功能遭到削弱。

4. 湛江市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可行性建议

4.1 产业升级与转型

湛江市作为广东沿海经济带重要节点,其经济发展路径的探索对于整个区域发展具有重要的示范作用。当前,湛江市县域经济发展正处于转型升级关键时期,产业升级与转型成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动力。产业结构调整是产业升级与转型的首要任务。湛江市县域经济大多以农业、渔业为主,但随着经济发展和市场变化,单一的产业结构已经很难满足经济发展需求。湛江市县域经济需向多元化、高附加值的产业结构转型,具体而言,可以发展海洋经济、高新技术产业、现代服务业等新兴产业,同时对传统产业进行技术改造和升级,提高其附加值和竞争力。

技术创新是产业升级与转型重要支撑,湛江市县域经济在技术创新方面存在一定短板,需加大科技投入,引进先进技术和人才,推动技术创新和应用。可以通过建立科技创新平台、加强产学研合作等方式,促进技术创新成果转化和应用,推动产业升级与转型。人才培养和引进是产业升级与转型关键因素。湛江市县域经济在人才方面存在一定短缺,需加大人才培养和引进力度,可通过建立人才培养基地、加强人才引进政策等方式,吸引更多高素质人才来湛江市经济发展,为产业升级与转型提供有力的人才支持。

表1 2023年湛江市产业升级与转型关键指标数据

指标	数值
第一产业增加值	706.91 亿元
第二产业增加值	1454.62 亿元
第三产业增加值	1632.06 亿元
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	13.26 亿元
高技术制造业投资增长	40.2%
海洋生产总值	1274.9 亿元
海洋生产总值增长	7%

资料来源:2023年湛江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政策支持是产业升级与转型的重要保障。政府在产业升级与转型过程中应发挥积极作用,制定相关政策和措施,为产业升级与转型提供良好的环境和条件。增加对新兴产业的财政支持、税收奖励和政策措施等,鼓励

企业进行技术革新, 升级产业^[4]。湛江市县域经济的产业升级与转型是一个系统工程, 需从产业结构调整、技术创新、人才培养和政策支持等多个方面入手。只有通过综合施策, 才能推动湛江市县域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 为广东沿海经济带的发展作出更大的贡献, 如表 1 所示。

据表 1 可知, 湛江市县域经济正在逐步优化产业结构, 增加高新技术产业和海洋经济的占比, 注重技术创新和人才培养, 并得到了政府政策的大力支持, 为湛江市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有力保障。

4.2 加强基础设施建设

在推动湛江市县域经济发展过程中, 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是至关重要的环节。基础设施是经济发展重要支撑, 对于促进产业升级、吸引投资和提升区域竞争力有重要意义, 如表 2 所示。

表 2 2020-2023 年湛江市基础设施投资情况

年份	基础设施投资总额 (亿元)	公路里程 (公里)	港口吞吐量 (亿吨)
2020	242.71	22346	2.33
2021	492.48	22539	2.20
2022	516.36	22561	2.54
2023	391.28	22960	2.83

资料来源: 2020-2023 年湛江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据表 2 可知, 湛江市在基础设施方面的投资持续增长, 公路等交通设施不断改善, 港口吞吐量也呈现出稳步增长的态势。表明湛江市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取得了一定成效, 为县域经济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为了进一步加强基础设施建设, 湛江市需从以下方面入手: 一是加大基础设施投资力度, 特别是在交通、水利、能源等关键领域, 确保资金投入与经济发展需求相匹配; 二是优化基础设施布局, 加强城乡之间的互联互通, 提升区域整体发展水平^[5]; 三是注重基础设施的质量和效益, 避免重复建设和资源浪费, 确保投资的有效性和可持续性; 四是加强政策引导和监管, 鼓励社会资本参与基础设施建设, 形成多元化的投资主体。五是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是湛江市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重要保障, 通过持续投入和优化布局, 湛江市将进一步提升基础设施水平, 有利于加强智慧城市建设, 实现城市智能管理, 促进数字经济与传统产业的融合发展, 为经济发展提供坚实基础和强大动力^[6]。

4.3 生态环境保护与治理

生态环境保护与治理是湛江市县域经济不可或缺的重要议题, 随着经济快速增长, 环境问题凸显, 成为制约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瓶颈。加强生态环境保护与治理, 对于保障区域经济的绿色和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湛江市需加强环境监测和数据收集工作。通过对环境质量实时监测可及时发现环境问题, 为制定针对性治理措施提供科学依据, 如表 3 所示。

表 3 2020-2023 年湛江市环境监测的主要指标数据

年份	PM2.5 年均浓度 (微克/立方米)	空气质量优良率 (%)	水体达标率 (%)	工业固体废物产生量 (万吨)
2020	21	96.7	100	845.16
2021	26	98.4	100	893.49
2022	21	96.4	100	1158.03
2023	20	97.3	100	1113.19

资料来源: 2020-2023 年湛江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据表 3 可知, 湛江市在空气质量、水体达标率等方面取得一定成效, 但仍需进一步加强工业固体废物处置工作, 应加大环保投入, 推动绿色产业发展, 通过财政补贴、税收优惠等政策措施, 鼓励企业采用清洁生产技术, 减少污染物排放。加强对环保产业的扶持, 培育具有竞争力的环保企业, 推动环保产业发展。湛江市应加强生态修复和保护工作, 对于受损的生态系统要及时修复, 恢复其生态功能。加强自然保护区建设和管理, 保护珍稀物种和生态环境。湛江市应加强环境教育和宣传工作, 通过举办环保宣传活动、开展绿色生活等方式, 增强公众环保意识, 形成全民参与环境保护良好氛围, 生态环境保护与治理是湛江市县域经济发展重要基础。实现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协调统一, 为湛江市县域经济可持续发展奠定基础。

广东沿海经济带县域经济的高质量发展, 不仅是新时代背景下的必然要求, 更是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的生动体现^[7]。这一发展态势, 不仅为广东乃至全国的经济社会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 也为粤西地

区的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湛江市作为粤西地区发展的重要引擎，应聚焦海洋经济发展的全要素和全过程，推动海洋经济在更高水平上的供需平衡。通过聚焦海洋经济发展的全要素和全过程，不仅能够提升当地人民的生活水平，还能够为粤西地区的全面振兴注入新动力。总之，广东沿海经济带县域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从多个层面进行系统设计。

参考文献：

- [1]郭永.河南县域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研究[J].中共郑州市委党校学报, 2024 (3) : 79-84.
- [2]袁萌.广东省县域经济差异及其影响因素研究[D].广州: 暨南大学, 2019.
- [3]刘茗沁.湛江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评价分析[J].南方论刊, 2024 (4) : 31-33.
- [4]汤晓龙.高质量发展视角下地方推进民营经济发展的思考和建议——以广东省湛江市为例[J].辽宁经济, 2022 (3) : 34-43.
- [5]杨少文, 许抄军.湛江市区带动周边县域经济发展研究[J].岭南师范学院学报, 2020 (6) : 31-37.
- [6]刘国军.广东湛江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实现高质量发展的优势和挑战[J].中国国情国力, 2021 (9) : 39-40.
- [7]陈宏寿.广东沿海经济带高质量协调发展: 背景、困境和路径[J].汕头大学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 2023 (3) : 84-93.

Path Analysis of County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Guangdong Coastal Economic Zone--Taking Zhanjiang City as an Example

Liu Ting¹

¹*Huizhou Economics and Polytechnic College, Guangdong Huizhou 516057, China*

Abstract: Coordinated regional development is the fundamental way to promot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in Guangdong Province. Select the panel data of some coastal economic belt cities in Guangdong Province and Zhanjiang City from 2020 to 2023, analyz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conomic growth and industrial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of Zhanjiang City by using the survey and statistics method, and sort out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status of county economy of Zhanjiang City.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county economy of Zhanjiang still has shortcomings in the aspects of single industrial structure, lagging infrastructure and increasing pressure of ecological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It is necessary to speed up industrial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strengthen infrastructure construction, and play a good combination of ecological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nd governance to promote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the county economy of Zhanjiang.

Keywords: Guangdong coastal Economic Zone; Zhanjiang City; County economy;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中华民族共同体视域下民族音乐文化传承传播研究

——以成都青少年民族乐团为例

幸子依

(¹西南民族大学, 四川 成都 610000)

摘要: 民族音乐作为中华文化基因载体, 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发挥重要作用。本研究以成都青少年民族乐团为案例, 通过参与观察发现: 多民族青少年通过乐器接触唤醒文化记忆、协作演奏培育交往能力、创新传播重构文化符号, 形成“认知-情感-行为”三维认同转化机制。音乐实践促使青少年从文化消费者转变为传播主体, 借助音乐符号的共享与转译, 促进跨民族情感共鸣与文化互嵌, 为新时代共同体意识建构提供了艺术实践路径。

关键词: 中华民族共同体;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民族音乐; 文化认同

基金项目: 西南民族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项目, 编号: 2025SYJSCX125

DOI: doi.org/10.70693/rwsk.v1i5.945

引言

在全球化进程与文化多样性交织的当代语境下,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实现民族复兴的精神基石。本研究以成都青少年民族乐团为样本, 揭示民族音乐传承如何通过符号整合、实践参与与仪式互动, 推动各民族青少年从文化认知到情感归属的深层转化。民族音乐作为活态文化编码系统, 其器乐符号的跨文化整合突破了单一民族的文化边界。例如乐团作品《丝绸之路》中, 古筝与箜篌的音律调和不仅呈现五声音阶与波斯调式的交融, 更隐喻陆上丝绸之路的文化互通。琵琶形制从曲项到直项的演变、技法从轮指到扫弦的融合, 印证了霍米·巴巴的“文化杂糅”理论, 展现外来文化在中原涵化中既保留异域特质又生成新审美范式的动态过程。这种器乐符号的互鉴共生, 使音乐成为连接历史与现实的文化桥梁。在音乐创作的当代性转化中, 民族音乐通过“文化基因提取—情感意象重组”的内在逻辑, 构建超越民族界限的音乐话语。作曲家赵季平的《庆典序曲》以西南少数民族芦笙舞曲的复合节奏为基底, 融入秦腔苦音调式的悲怆苍劲, 通过多声部对位形成既具地域特色又超越民族界限的音乐表达。芦笙特有的“三拍短促”节奏型与汉族锣鼓“紧打慢唱”技法的呼应, 在节奏张力中隐喻多民族文化的碰撞与交融。青少年在演绎此类作品时, 既需掌握不同民族乐器的演奏技法, 又需理解音乐语言背后的文化叙事, 这种双重学习过程使其自然浸润于多元一体的文化语境。

从社会实践层面观察, 民族音乐的集体演绎本质上是文化认同的生成仪式。对55位乐团成员的深度访谈发现, 青少年在合奏实践中经历三重认同转化: 初始阶段的乐器认知差异使其意识到文化多样性, 中期的声部协作磨合理解差异共存的艺术规律, 至后期的情感共鸣升华形成集体归属意识。这印证了塔菲尔社会认同理论中“群体比较—积极区分—群体偏好”的心理机制。一位回族团员谈及古筝与热瓦普合奏时感悟的“和而不同”, 正是共同体意识在微观实践中的具象化呈现。演出仪式通过传统服饰穿戴、乐谱符号解码等程式化行为构建情感聚合场域, 例如《茉莉花》经马头琴诠释时, 多民族演奏者的生物节律同步现象, 揭示了文化认同向身体记忆的渗透。观众掌声构成的群体符号反馈, 则将抽象认同转化为可感知的“我们”共同体想象。乐团的创新价值还体现在构建

作者简介: 幸子依 (2000-), 女, 西南民族大学艺术学硕士 (在读), 研究方向: 民族音乐学。

“专业排练厅+非遗展演空间+线上云合奏”的三维传承生态。非遗大师工作坊使青少年亲炙维吾尔族木卡姆、彝族月琴等濒危乐种的活态传承，数字化平台探索民族音乐在虚拟空间的表达可能，代际协同机制则平衡了技艺传承与文化创新。这种立体化模式使民族文化从静态标本转为可触摸、可创造的“生命体”，推动青少年从文化消费者向传播主体转变。研究表明，当多民族青少年在共同艺术实践中解码文化符号、参与集体仪式时，差异化的文化身份得以在更高层次的共同体叙事中整合。这种文化实践路径不仅为全球化时代的认同培育提供范本，更从学理层面揭示了符号互动、身体实践与情感能量在共同体意识建构中的协同作用。后续研究可拓展至不同地域与代际群体的比较，以深化对文化认同机制情境特异性的理解。

一、民族音乐文化传承的多元实践路径

（一）器乐符号的跨文化融合：重构文化记忆共同体

民族音乐传承，从本质上讲，是文化符号的活态传递进程。德国学者扬·阿斯曼所提出的“文化记忆”理论表明，器物与仪式作为记忆的载体，能够借助象征性实践突破时空限制，构建起群体的身份认同。以成都青少年民族乐团对《丝绸之路》等作品的演绎为例，在该作品中，汉族古筝与西域箜篌、琵琶展开跨文化对话。二者在音律层面存在差异，形成一种独特的张力，然而在《丝绸之路》的旋律叙事里却达到和谐统一。这两种乐器的音色碰撞，并非简单的物理叠加，而是运用“音色蒙太奇”手法（勋伯格音色旋律理论的在地化运用），重新构建了汉唐时期陆上丝绸之路的文化图景。

在针对乐团成员的访谈中进一步证实了这一观点，83.6%的受访者表示，通过合奏训练，他们理解了乐器背后的文化交融历史。一位哈萨克族团员谈道：“在演奏冬不拉时，老师会对比它和汉族三弦的共鸣箱结构差异，而进行合奏时，两种乐器能够像对话一样相互交织。在这一刻深刻意识到，差异本身也是共同体的组成部分。”这种认知转变，恰好印证了爱德华·萨义德（Edward Said）“文化杂糅性”的理论洞见——文化身份并非静态的本质存在，而是在动态实践中形成的一种关系性存在。

（二）音乐语言的创造性转化：构建超民族话语体系

民族音乐的文化整合，不应仅停留于表层元素的简单拼贴，而需深入至深层的意义生产系统。作曲家赵季平在《庆典序曲》中以西南彝族芦笙舞曲特有的复合节奏型（3+2+2）作为核心动机，运用模进、倒影等复调技术，将其解构为十六分音符群，并与秦腔苦音调式中微降 si 与微升 fa 构成的特性音程进行多声部对位。这一创作手法，暗合列维-斯特劳斯提出的“修补术”（bricolage）概念，即把不同文化系统的“碎片”重新编码，从而生成全新的意义结构，从听觉层面隐喻了多民族文化“和而不同”的共生关系。

这种创造性转化在青少年文化认同的形塑方面，发挥着尤为显著的作用。研究表明，当团员演绎《庆典序曲》时，需要同时掌握芦笙的律动感与秦腔的悲怆性表达。这一双重技术习得过程，本质上是一种文化认知的具身化（embodiment）训练。多民族音乐语言逐渐内化为青少年的文化感知图式，使他们在无意识中认同“多元一体”的文化格局。一位汉族团员在访谈中表示：“以往觉得彝族音乐十分遥远，然而在练习《庆典序曲》的过程中发现，那些节奏与汉族的锣鼓经在表达对生命的热情这一情绪上，存在某种共通之处。”

二、民族音乐文化在成都青少年民族乐团中的传播路径

（一）人内传播的认知基础作用

人内传播（intrapersonal communication）作为传播活动的元初形态，构建起个体认知建构的基础性机制。在乐团实践过程中，乐手要历经三重认知转化。首先是对音乐文本的符号解析，也就是将乐谱呈现的视觉符号转换为听觉意象；其次是对技法系统的具身认知，例如二胡演奏时，指法序列与弓法力度所形成的肌肉记忆；最终实现情感体验的移情内化。

以演绎《二泉映月》为例，演奏者需要通过对历史文化情境的想象性重构，把阿炳的个体生命体验转化为弓弦震颤所传递的情感表达。此过程与皮亚杰认知发展理论中的同化——顺应机制相契合，即外部音乐信息借助个体认知图式的调整，达成文化的内化。

认知神经科学研究显示,音乐信息的处理需要大脑听觉皮层、前额叶与边缘系统的协同运作。当青少年乐手进行乐曲诠释时,其镜像神经元系统会激发对音乐情感的具身模拟,这种神经层面的传播机制为人内传播提供了生物学依据。与此同时,梅洛-庞蒂的知觉现象学理论揭示了身体在音乐认知中的媒介作用——演奏者的肢体动作不单单是技法的承载,更是文化记忆的具身化呈现。

(二) 人际传播的交互性建构机制

人际传播(interpersonal communication)在文化传播中占据枢纽地位,于民族音乐传承进程中呈现出双重交互特性。一方面,它充当着个体认知向群体认知转化的中介系统;另一方面,它成为传统文化符号进行现代转译的实践场域。传播学者埃弗里特·罗杰斯认为人际渠道在文化传播中具备信息传递与关系强化的双重功能。成都青少年民族乐团的传播实践,恰好印证了这一理论框架。其人际传播网络借由实体空间与虚拟空间这两个维度,搭建起一个动态的意义协商系统。

在物理场域的传播实践中,乐团构建起基于具身互动的“表演-反馈”闭环系统。音乐演奏可看作是一场精心筹备的“前台表演”。演奏者借助声学符号,如旋律、节奏,以及视觉符号,像表情、肢体语言,来开展文化展演。而观众则通过“非语言反馈集群”,包括掌声强度、身体律动频率、面部表情等,形成即时的传播效果评估指标。当演奏者则会依据观众呼吸节奏的同步程度来调整乐句处理,从而实现临场性的意义共建。即传播双方通过符号交换持续重构传播情境。

随着这数字媒介的融入催生了“技术中介化人际传播”这一新范式。乐团在网络平台构建的传播矩阵,本质上是传统人际传播要素在赛博空间的拓扑变形。从平台数据来看,6460次点赞不仅是审美认同的量化指标,更是社交资本积累的符号货币。评论区的3055次推荐则形成“弱连接”(weak ties)传播网络,这种数字人际传播所产生的涟漪效应,使得民族音乐文化突破地理边界,实现跨圈层传播。

在传播效果方面,双重场域的人际互动形成了文化认同的强化机制。线下音乐会带来的“共在体验”(co-presence)能够催生情感共同体,线上传播留下的“数字痕迹”(digital traces)则构建起持久的意义网络。这种虚实交融的传播生态,不仅实现了民族音乐文化的代际传承,更借助青年群体的创造性参与,推动传统文化符号向现代性转化。正如传播学者卡斯特所指出的,在网络社会中,文化传播已演变成“多重传播流”(multimodal communication flows)的复杂互动过程,成都青少年民族乐团的实践正是这一理论范式的生动例证。

(三) 群体传播的场域中介功能

群体传播(group communication)作为文化传承的场域转换机制,在传播层级中发挥着结构性中介作用。根据库尔特·勒温群体动力学理论,群体传播通过“社会力场”(social forcefield)的形塑,实现个体认知向集体意识的范式转换。

在乐团内部传播系统中,指挥家担任着文化转译的中介者角色。指挥通过专业权威将音乐文本转化为多模态符号指令:其手势语汇构成视觉符号系统,语言阐释形成概念符号体系,示范演奏则生成听觉-动觉复合符号。例如在处理《庆典序曲》时,指挥对弦乐声部做出的“抛物线手势”,既传递力度渐变的物理要求,更隐喻时空流动性。这种群体传播过程实质是音乐文本的立体化解码,使个体乐手的认知图示整合为群体性的音乐叙事。

在公共文化展演场域,乐团与观众群体构建起“符号交换共同体”。参考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理论,音乐会现场形成临时性的文化对话空间。当《康定情歌》旋律响起时,观众群体通过身体共鸣(同步律动)、声音反馈(集体哼唱)构建起具身化的传播仪式。这种群体互动产生的情感能量(emotional energy),通过柯林斯(Randall Collins)的互动仪式链理论得以解释——集体兴奋度的提升促使音乐符号突破审美范畴,演变为文化认同的强化剂。

数字媒介时代,群体传播呈现线上线下融合的“混合场域”特征。乐团在短视频平台构建的虚拟粉丝社群,通过算法推荐的“信息茧房”效应形成文化认同强化机制。数据分析显示,关于民乐合奏视频的群体讨论中,73%的弹幕内容涉及地域文化认同,形成数字时代的“新口头传统”。这种虚拟群体传播既延续了传统口传文化的集体记忆功能,又通过数字痕迹的永久存续,构建起文化传承的新型档案库。

成都青少年民族乐团的实践表明,当代民族音乐文化的传承已演变为多层级、跨媒介的场域互动系统,其中

群体传播承担着文化基因重组与价值范式转换的关键功能。

（四）大众传播的范式重构效应

大众传播（masscommunication）作为文化传播的顶层架构，在现代社会已演变为具有认知框架重构能力的生态系统。成都青少年民族乐团的大众传播在民族音乐文化传承中发挥着三重范式重构功能：认知引导、时空突破与符号嬗变。

在认知引导维度，大众传播构建起“媒介化认知框架”。乐团通过四川卫视《文化天府》栏目的专题报道，将专业音乐语汇转化为大众文化符号。传播效果监测数据显示，节目播出后“民族乐器学习”的百度搜索指数环比提升127%。

时空突破层面，数字化传播矩阵实现了文化传播的“时空脱域”（disembedding）。乐团在微信平台建立的官方账号，运用“短视频+直播”的混合形态，将剧场艺术转化为可存储、可复制的数字产品。平台数据显示，总计收到6460次点赞、2314次转发、3055次推荐、130条评价。

在符号嬗变过程中，大众传播引发音乐文本的“超真实”（hyperreality）转化。当电视媒介对音乐会进行技术重构时，多机位剪辑、特写镜头和环绕声效共同构建起波德里亚所谓的“拟像世界”。例如对古筝演奏手部的显微拍摄，将技法细节放大为视觉奇观，使音乐接受从听觉主导转向视听综合感知。这种媒介化改造催生了新的审美范式，传统音乐的“韵味”（aura）在本雅明意义上被技术复制品取代，形成机械时代特有的文化消费形态。

该传播模式的文化意义在于，它通过媒介技术的赋权效应，使传统音乐文化获得现代性表达。当彝族月琴演奏通过4K超高清技术呈现时，不仅实现了文化保存的数字存档，更在视觉政治层面重构了民族文化的当代形象。这种传播范式的转型，实质是传统文化在媒介社会中的适应性进化，其终极价值在于构建起连接文化记忆与未来想象的传播桥梁。

三、民族音乐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作用及意义

民族音乐作为文化记忆的活态载体，通过符号化实践构建起青少年民族文化认同的认知基础。美国民族音乐学家梅里亚姆提出的“音乐即文化”理论框架揭示，音乐行为本质上是特定文化系统的仪式化展演。成都青少年民族乐团中青少年参与的民族音乐活动，实际上在进行多维度的文化认知建构：器物层面对民族乐器的具身认知、制度层面对音乐组织的规则内化、精神层面对文化价值的符号解码。

当青少年接触羌笛、月琴等民族乐器时，其既有认知图式（schemata）面临新文化元素的冲击，通过乐器形制的触觉感知与演奏技法的身体记忆，逐步实现认知结构的重组。这一过程印证了具身认知（embodied cognition）理论的核心主张——认知发展依赖身体与环境的互动体验。

在集体音乐实践中，青少年通过“文化间性”（interculturality）体验完成共同体意识建构。乐团排演的《阿诗玛叙事诗》等融合多民族音乐元素的作品，形成巴赫金所谓的“复调文化空间”。彝族月琴的悠扬、藏族弦子的律动、蒙古族呼麦的浑厚，在复调结构中既保持民族特性又形成和声共鸣。这种音乐形态的互文性（intertextuality）隐喻着费孝通“多元一体”的民族关系理论，使参与者在音乐协作中直观感知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文化基底。

这种认同建构的深层意义在于，它通过审美体验完成了政治认同的感性转化。当蒙古族马头琴的苍凉音色与汉族古筝的清越之声在合奏中达成和声平衡时，音乐本身就成为中华民族“和而不同”理念的声学隐喻。这种非说教的文化濡化（enculturation）方式，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了具身化的实践路径，印证了霍耐特承认理论中“文化承认”对共同体建构的基础性作用。

结语

民族音乐文化的现代传播机制及其在认同建构方面的功能，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开辟了独具特色的实践路径。研究表明，民族音乐借助器物接触、仪式参与以及符号解码这三条路径，在青少年群体中构建起“多元一体”的文化坐标体系。量化数据清晰显示，持续参与音乐实践活动的青少年，其共同体认同指数得到显著提升，有力印证了音乐濡化对身份认同所具有的形塑效能。民族音乐的独特之处在于，它能够将抽象的价值观念转化为可切实感知的审美体验，通过声学隐喻实现政治认同从理性到感性的转化，有效突破了传统教育单向灌输的固有

模式。

在全球化与数智变革时代背景下, 传统文化传播的创新机制。民族音乐持续发挥凝聚中华民族精神共同体的文化纽带作用, 在守正创新中赓续文明基因。

参考文献:

- [1]陈育宁.中华民族历史观与中华民族共同体[J].宁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1,43(06) :1-5.
- [2]高向东,高鹏飞.新时代民族工作的创新举措: 民族互嵌格局研究进展与未来进路[J].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48(05):116-124.
- [3]郝天宇,李如彪,韩国祥.第十一届全国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教学研讨会暨第十五届全国民族理论研究生学术研讨会综述[J].民族研究.2021(05):134-135.
- [4]谷春香.突破心理习得性无助效应培养学生自主学习能力[J].教书育人 (教师新概念) .2020(07):29.
- [5]郭庆光.传播学教程[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73-113.
- [6]卫亦芸.传播仪式观视角下的背包客亚文化传播研究[D].山西大学.2016-01-01.
- [7]张超.基于 5w 模式的农村地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研究[D].东北林业大学.2015-01-01.
- [8]王融.高校学生网络舆情的形成及影响因素分析[J].才智.2017(24).116.
- [9]张天然.农村群体性事件的治理对策研究: 基于传播学视角的考察[D].浙江海洋大学
- [10]张庆芳.中职语文课堂练习研究[D].苏州大学 2010-03-01.
- [11]于斯瑞.低音提琴独奏《草原之歌》的表演诠释[D].内蒙古大学 2019-12-01.
- [12]李巍.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新时代传播与传承的有效路径——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新时代的传播与传承》[J].科技与出版.2024(10):49.

Research on the Inheritance and Dissemination of Ethnic Music Cultur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Chinese National Community: A Case Study of the Chengdu Youth Ethnic Orchestra

Xingzi Yi

¹Southwest Minzu University, Chengdu, Sichuan 610000

Abstract:As a carrier of the genetic essence of Chinese culture, folk music plays a crucial role in solidifying the consciousness of the Chinese national community. This study, using the Chengdu Youth Ethnic Orchestra as a case, found that multi-ethnic youth awaken cultural memories through engagement with musical instruments, develop communication skills through collaborative performance, and reconstruct cultural symbols through innovative dissemination, thereby forming a three-dimensional mechanism for identity transformation of "cognition-emotion-behavior". Musical practice encourages youth to transition from cultural consumers to communicators, and through the sharing and translation of musical symbols, promotes emotional resonance across ethnicities and cultural embedding, providing an artistic pathway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community consciousness in the new era.

Keywords: Chinese national community; outstanding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folk music; cultural identity

接受美学视阈下的跨文化翻译策略研究——以季羡林自述作品的文化负载表达与隐喻翻译为例

金成臻¹

(¹上海对外经贸大学, 松江 上海 201620)

摘要: 接受美学理论揭示了译者如何通过理解和预测目标读者的期待视野, 以及选择适当的翻译策略, 实现文化信息的有效传递并提高译文的可接受性。本文选取季羡林自述作品中的部分隐喻翻译实践, 查阅历史文献与资料、对照两份翻译硕士学生的译文产出定稿, 并通过具体案例深入探讨跨文化翻译中文化负载表达与隐喻的翻译方法, 分析译本中归化与异化、增译与减译、音译与意译加注释等手法的复合运用, 揭示其在提升译文质量、促进跨文化交际中的实践意义, 期望为今后的跨文化翻译提供参考。

关键词: 接受美学; 文化负载; 隐喻; 归化与异化

DOI: doi.org/10.70693/rwsk.v1i5.943

一、引言

翻译作为跨语言与跨文化的信息传递活动, 不仅要充分传达原文的语言特点和文化内涵, 还需兼顾目标读者的接受能力。“接受美学”由德国学者汉斯·罗伯特·姚斯 (Hans Robert Jauss, 1921-1997) 在其演说《文学史作为向文学理论的挑战》提出, 强调读者在文本解读中的主体地位, 要求译者关注目标读者的期待与审美经验。由于汉语与英语两种语言在文化背景、历史传承与审美习惯上存在显著差异, 为译者带来了以文化负载表达和隐喻为代表的翻译挑战。季羡林在自述中以幽默甚至调侃的笔调讲述自己的人生历程。此类对历史画卷的评价性描绘作品, 具有独特的文学价值。本研究选取了选取作品中高频出现的文化负载表达与隐喻翻译, 如“历史进程中的青年角色”“请君入瓮”等表达作为分析案例, 并非随机挑选, 而是基于以下考量: 首先, 这些词语均具备文化负载或历史典故, 涉及“审美距离”与“期待视野”等翻译理论问题; 其次, 翻译此类词语带来的挑战具有普遍性, 与类似术语共享翻译难点, 研究其翻译策略具有方法论借鉴意义; 最后, 所选案例均基于真实译文, 而非臆造, 增强研究的实践价值。鉴于此, 本文将通过平行译本对照分析, 探讨各译本翻译策略的原因、差异与接受效果。

二、接受美学视阈下的季羡林自述作品

(一) 接受美学翻译观

接受美学 (Receptional Aesthetics) 这一概念由德国康斯坦茨学派的学者汉斯·罗伯特·姚斯在 20 世纪 60 年代后期提出。其核心观点强调读者在文学作品的理解与阐释过程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 文学作品的意义并非作者单方面赋予的固定存在, 而是在读者的阅读过程中不断生成与建构的。接受美学理论认为, 读者绝不是可有可无、无关紧要的因素。相反, 从根本意义上说, 文学作品是注定为读者而创作的, 读者是文学活动的能动主体 (马萧, 2000)。邹晓伟 (2021) 指出, 接受美学重视读者的地位, 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必须考虑读者的动态参与, 努力帮助读者实现读者与文本的期望融合。

作者简介: 金成臻(2002—), 男, 硕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为文学翻译、翻译理论。

通信作者: 金成臻

接受理论最值得关注的两个核心概念是“期待视野”和“审美距离”。所谓“期待视野”，是指文学接受活动中，读者原先各种经验、趣味、素养、理想等综合形成的对文学作品的一种欣赏要求和欣赏水平，在具体阅读中，表现为一种潜在的审美期待（Jauss, 1970）。读者在欣赏一部文学作品时，以往阅读的记忆会被唤醒，进入一种特定的情感态度中，并期待“中间与终结”，这就是“审美经验的期待视野”。而既定期待视野与新作品出现之间的不一致则为审美距离（何璐娇，刘明录，2019）。因此，接受美学翻译观启示译者，应尽量减少文化差异和语言障碍带来的理解困难，满足读者的“期待视野”，并准确把控“审美距离”，以确保原文与译文在读者接受层面上的一致性。

（二）接受美学视阈下英译本的文化挑战与理论价值

季羡林的自述中含有大量“文化负载词（culturally-loaded words）”与“隐喻（metaphor）”，若不能准确翻译将造成西方读者的严重阅读障碍。“文化负载词”是某种文化中特有事物的词、词组和习语，反映特定民族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逐渐积累的、有别于其他民族的、独特的活动方式（孔令翠，蒙兴灿，2002），这些词汇通常包含丰富的文化内涵，具有深厚的民族文化烙印和鲜明的地域特征，在另一种文化中往往缺乏直接对应或易于误解的表达形式，形成语义空缺（廖七一，2000）。而隐喻作为人类认知现象，也是语言使用过程中所产生的一种语义转化现象。余高峰（2011）指出，隐喻在语言学中，通常被定义为基于两个事物或概念之间某种相似性，使用一方的形式来表现另一方的手段。

作为一部特定历史时期的经典文学作品，其英译对当今社会具有多方面的价值。首先，促进跨文化理解，提供真实的历史视角，西方学界和公众对这一阶段的认知往往受限于二手资料或非当事国学者的解读。翻译该时期的文学作品，国外读者能够直接接触到当事作家的亲身经历与情感表达，有助于更全面、客观地理解这一历史阶段。其次，当时的文学作品在创作风格、主题表达、叙述方式等方面都受到特殊历史环境的影响。例如，样板戏、红色小说、知青文学等具有鲜明的时代烙印。将这些作品翻译成其他语言，有助于比较不同历史背景下的文学表达方式，同时也为研究同时期文学作品的翻译策略提供实践案例。再次，此类文学大多带有宣传色彩，但并不乏真实的个人经历和社会观察，故能为比较文学和翻译研究提供素材。通过翻译，不同语言的译本能促进更多国家的人和国际社会对历史记忆、反思等议题的讨论，为人类历史上的类似现象提供借鉴。

按真实性分类，文学体裁可分为虚构文学和非虚构文学，而非虚构文学又包括纪实文学、历史文学、散文及自传文学（Genette, 1997）。目前，接受美学翻译理论处理非虚构文学中的前三者已获得可观数量的成功实践，但在以往实践中较少涉及“自传文学”，存在理论空白。从长期实践经验来看，通过归化与异化、增译与减译、音译或意译加注译等翻译策略的综合运用与优势互补，译者处理文化差异难题开辟了多种路径。要实现对该书的高质量翻译，译者还需要充分理解特殊时期内涵、掌握丰富的跨文化知识，必须客观地把握尺度。

三、接受美学视阈下关键术语的翻译分析

（一）“期待视野”在翻译过程中的作用

读者首次接受一部文学作品时，必然包含着与他以前所读作品相比而进行的审美价值体验。作品外译的受众为西方读者，他们在阅读时会调用对中国近代史的认识或对相关著作的理解，期待在此书中找到与先前审美经验共通之处。然而，该书的文化负载及隐喻表达对西方受众来说是陌生的，译者不但要注意源语言与目标语言间的文化差异，还要引起读者“视野的变化”，呈现出本书特定的时代背景、社会事实和文学魅力。事实上，该书呈现的文化负载与隐喻表达的翻译问题并非“特定时期的矫正性劳动措施”所独有，而是所有涉及社会与群体的术语（例如那些指涉公众性指责与象征性裁决的表达）都面临的翻译难点。因此，研究此类词语的翻译策略，不仅能帮助准确传达该词的历史背景，也能为同类型术语的翻译提供参考。下文将对比从归化与异化、增译与减译到音译与意译加注译等翻译技巧的复合运用，探讨如何在避免误导目标读者的同时，顺应与打破兼用地对待读者的审美期待，使其能够较为轻松地接受译作内容，尽可能地保持历史真实感。

文中高频出现的表达有“矫正劳动措施”，这一措施在该时期受曲解执行，导致背离正常改造，具有负面意义，与如今并非同一概念，试看：

译文 A: “forced labor”

译文 B: “labor reform”

比对译文可见,前者仅突出“强制性”特点,未体现操作的随意性及法律监督的缺乏;后者虽为直译,但易使读者联想到正常司法或改造体系。由于历史背景,该表达隐喻含义超出西方读者理解范围,而对西方读者无法理解的事物、现象和概念等,应适当添加背景介绍、解释说明等内容,也要考虑英语的语言特点,在语言层面进行适当调整,保证译文表达清晰、表意准确(李灵,2015)。因此,为更准确呈现其时代特征与社会功能,最终采用“abused labor correction during a sociopolitical movement in mid-20th century China”的译法。

在实践中,译者参考了相关研究著作、回忆录等资料,这些资料对处理此类具有历史文化负载表达的翻译具有借鉴意义。在翻译时,无论采用归化还是异化策略,都需要兼顾其文学特色,并充分考虑目标读者的需求,使译文符合西方受众的审美水平和欣赏习惯。因此,在该书外译过程中,应促使西方读者的期待视野与译文的审美取向相结合,实现视野的融合,从而减少文化障碍,使其更容易理解和感受文本的内涵。

(二) “审美距离”在翻译过程中的作用

西方读者在接受译文时,需要逐步领会其中深刻的思想内容,同时,他们的期待视野也会随之调整,以适应译作的审美表达。译者在英译过程中,面临着在保持还是缩小审美距离之间的选择。如果保持较大的审美距离,虽然能够较完整地传达原文的神韵,却可能增加理解难度;而若过度缩小审美距离,使其更符合西方受众的阅读习惯,则可能削弱原文的本土文化价值。因此,只有当读者的期待视野与文本之间保持适当的审美距离,这些作品才能更好地被西方读者理解和接受。以“家庭财产的被动转移”为例,该表达在中文语境中常用于指称一些具有鲜明色彩的非常规管制行为。然而,目标语受众若不具备相应的历史知识,可能将其理解为一般性入室盗窃或社会行为,从而造成误读,形成较大的“审美距离”。

译文 A: illegal house raids

译文 B: house raids

这两种译法均存在潜在误导风险,如 Greene、Urbanik 和 Yankey (2021) 研究了警方对多伦多市中心女性住所的突袭行动, Hallaq 和 Fallah (2020) 也分析了以色列士兵在巴勒斯坦的搜捕行动。这些例子表明, house raids 在西方语境中并不天然带有强烈负面含义,甚至可能让读者误解为正当的执法行为。前者可能使读者误解为无组织的非法暴力活动,而忽视其在当时特定历史语境下的制度性特征;后者则因“house raids”在英语语境中通常指警察执法行动,容易引起正当性的联想,不足以传达该行为背后的整肃属性。

根据姚斯的“审美距离”理论,不同文化背景的读者对历史事件的认知不同,仅使用“house raids”无法准确传达其历史背景及整肃性质,需补充信息,以缩小审美距离。可参考“Kristallnacht”的翻译方式:在英语世界,该术语通常保留德语原名,而不是直译为“Crystal Night”,这是为了避免削弱其历史背景中的强烈负面性质。同样,译“抄家”时,直接使用“house raids”可能会稀释其政治含义,因此应补充解释性翻译,例如:“state-sanctioned home confiscations carried out during a sociopolitical movement”这种译法既揭示了行为的制度背景,也传达了其对个体权利的影响,适当缩小审美距离,增强目标语读者的历史理解。

类似的翻译挑战也出现在典故类词汇中。再看“请君入瓮”一词。该词源自唐代历史故事,原意为某人设计陷害他人却反被利用,具有讽刺与悲剧双重色彩。在书中,该词隐喻了涉事人被动参与运动机制后自身亦遭牵连的复杂境遇。若简单翻译为“We were trapped in the urn”,虽然直译了形象意象,却未能传达其中历史典故、隐喻及讽刺意味。英语读者容易将其理解为一般性的陷阱隐喻,而非特定文化背景下的自我反噬情境。“请君入瓮”属于汉语文化典故,在原文中承载了历史和讽刺意味。然而,英语中缺乏直接对等的表达方式,若仅直译为“We were trapped in the urn”,目标读者难以理解其文化深意。这一问题不仅存在于本案例,还涉及大量文化典故(如“狐假虎威”“画蛇添足”)。本案例的分析,将为其他典故翻译时如何收放目标读者的审美距离,让他们在陌生文化背景下仍能准确解读提供方法论支持。

译文 A: We were “trapped in the urn.”

译文 B: “like being lured into a self-made trap”

比对两份译文可见,译文 A 缺失对应的文化内涵,不了解“请君入瓮”这一典故就很可能无法理解其中的讽刺与无奈,作者的情感也无法传达。直译后“trapped in the urn”只是字面意思的“被困在瓮中”,而非历史典故所指的自陷圈套的荒诞。目标读者可能会认为“被困在瓮里”是物理上的惩罚,而不是自我设陷的讽刺意象。而译文 B 虽然强调了自作自受的逻辑,但其情感不够强烈,但未能体现其中的政治讽刺与无奈,可能误导目标读者会将其解读为普通的因果报应,而忽略其特定历史时期的象征意义。“请君入瓮”是一个典型的文化负载词汇,具有讽刺和警示意义。如果直接翻译为“We were trapped in the urn.”,西方读者可能会理解为字面含义,而忽略其隐含的政治属性和反讽色彩。从接受美学的“审美距离”角度来看,目标读者的文化背景与原文作者存在差异,过于直白的翻译可能使读者无法充分感受到原文的讽刺意味。因此,意译为“like being lured into a self-made trap”,并在后面补充解释“(a Chinese idiom ‘Qing Jun Ru Weng’ which vividly depicts the irony of being caught in one’s own scheme)”,既能保留原文的文化特色,又能缩短读者的审美距离,提高理解效果,“irony”一词的使用,也为目标读者营造了讽刺意味和政治荒诞。

书中以“一部十七史,不知从何处说起”以“十七史”隐喻复杂繁多之事,“历史进程中的青年角色”“群众造势团体”等词汇在特定历史语境下也具有相当的隐喻含义,因为二者暗示着特定群体在特定时期所扮演的角色与行为。因此,对这些隐喻词语的翻译需要达成隐喻在目标语中的有效重构,使读者获得与源语读者相近的审美体验。

中国史学发展到宋朝,一共编著了 17 部正史,称为十七史。因此,文天祥曾道“一部 17 史,从何说起!我今日非应博学宏词科,何暇泛论!”。本句可意译为“History is too complex for us to know where to begin”。直译为“With seventeen histories, not knowing where to start”固然复现了典故的意义,亦打破了西方受众的期待视野,但读者很难理解其中的隐喻关系与文化内涵,会造成理解障碍;而如果把“十七史”这一隐喻元素转化为“history is too complex”(历史太过复杂)则摒弃了“十七史”的典故意义,转而传达句中的隐喻意义,缩短了源文本与受众的审美距离,更易于西方受众理解。

又如“历史进程中的青年角色”一词,是指在该特定时期生长壮大的广大青年,是最积极最有生气的力量;而“群众造势团体”则指特定时期以“造势”自称的一种群众组织,及其与实践相关联的一整套思想方法和价值取向,通过比对译文,译者在此选择将其译为“radical young followers”、将“群众造势团体”译为“revolutionary insurgents”。二词在原文中承载着特定的历史隐喻和情感色彩,若采用西方受众常见的如“young people”或“rebel”等词汇,可能使读者迅速归纳为他们熟悉的普通社会群体或叛乱者,从而忽略了特定语境下所独有的文化内涵。此外,当译文呈现出不那么直接的表达时,读者往往会停下来思考:这些“radical young followers”和“revolutionary insurgents”究竟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中承载何种意味?审美感受时间的延长不仅激发了读者的好奇心,还能促使他们去了解该时期独特的历史情境,从而产生更深层次的文化和审美共鸣。因此,译者实际上是在审美距离的延长程度上作了精心地把控,通过保留原文文本中的隐喻性特征,同时用目标语言中恰当的词汇来提示读者这种“异域感”,形成了一个既保留原文独特文化特质,又能为西方受众所接受的中间地带,读者被迫需要在阅读过程中慢慢解码这些具有“参与意识”“造势”意味的词汇,从而在心理上形成一种停顿和反思,而这种“停顿”恰恰是延长审美距离的体现,使得读者能够在消化信息的同时,更深刻地体验到那段特殊历史的冲击力与复杂性。

四、结语

本研究围绕“青年角色”“请君入瓮”等多个典型案例,探讨了文化负载表达、隐喻及典故的翻译策略。从接受美学的“期待视野”理论出发,我们发现:目标读者对源语言文化的认知水平,决定了翻译策略的选择。此外,直译、意译及解释性翻译各有优劣,但文化负载词与隐喻翻译需要在忠实原意与避免误解之间寻求平衡。这些案例不仅是个别现象,还代表了整个该类型术语和文化典故的翻译困境,研究它们的翻译方法,能为类似文本(如历史文献、回忆录等)的翻译提供借鉴。未来研究可以扩展到其他特定时期历史文化背景下的相关术语,或进一步探讨接受美学在跨文化翻译中的适用性。

参考文献:

- [1] Greene, C., Urbanik, M.-M., & Yankey, M.-K. (2021). “I’m Wise to the Game”: How Inner-City Women Experience

and Navigate Police Raids. *Feminist Criminology*, 16(4), 403-423.

[2] Genette, G. (1997). *Palimpsests: literature in the second degree*.

[3] Hallaq, S., & Fallah, B. (2022). Effect of Witnessing House Raids and Arrests on Child Behavior: Evidence from Israeli-Palestinian Conflict. *Defence and Peace Economics*, 34(8), 1018–1038.

[4] Jauss, H. R. (1982). *Toward an Aesthetic of Reception*. [M].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5] Jauss, H. R. & Benzinger, E. Literary history as challenge to literary theory [J]. *New Literary History*, 1970(1): 7-37.

[6] 何璐娇, 刘明录. 接受美学视角下的广西桂剧外译[J]. *四川戏剧*, 2019(2): 155-159.

[7] 孔令翠, 蒙兴灿. 实用汉英翻译 [M]. 成都: 四川大学出版社, 2002:64.

[8] 李灵. 外宣翻译中的增译与减译技巧[J]. *中译外研究*, 2013(00): 215-224.

[9] 廖七一. 当代西方翻译理论探索 [M].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00.

[10] 马萧. 文学翻译的接受美学观[J]. *中国翻译*, 2000(2): 47-51.

[11] 余高峰. 隐喻的认知与隐喻翻译[J]. *学术界*, 2011(1): 159-164+287.

[12] 邹晓伟. 《额尔古纳河右岸》及其英译本的接受美学阐释与传播探析[J]. *黑龙江民族丛刊*, 2021(2): 130-135.

A Study of Cross-Cultural Translation Strategi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Reception Aesthetics: A Case Study of Culture-Loaded Terms and Metaphors in Ji Xianlin's Memoir Literature

Chengzhen Jin¹

¹ *Shanghai University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and Economics, Shanghai, China*

Abstract: The Reception Aesthetics reveals how translators can effectively transmit cultural information and enhance the acceptability of translations by understanding and anticipating the horizon of expectations of target readers and choosing appropriate translation strategies. This paper starts from the metaphor translation practice in Ji Xianlin's Memoir Literature. Through referring to historical documents and materials, comparing the final translation drafts of two Master of Translation students, and deeply exploring specific cases, it probes into the translation methods for culture-loaded words and metaphorical expressions in cross-cultural translation. It analyzes the combined application of techniques like domestication and foreignization, addition and omission, transliteration, and liberal translation with annotation in the translated versions, revealing their practical significance in improving translation quality and promoting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 It is expected to offer references for future cross-cultural translations.

Keywords: Reception Aesthetics; Culturally-loaded Word; Metaphor; Domestication and Foreignization

以诗为境理念指导下的大学公共数学教学

苏莉¹ 于晟伟^{1*}

(¹ 中国消防救援学院, 北京 102202)

摘要: 本论文基于课程思政视角, 深入探讨以诗为境理念在大学公共数学教学中的应用。通过剖析王国维诗词三境界与数学三种层次美学的内在联系, 挖掘诗词与数学在创作源泉、思维方式等方面的共性, 分析该理念在大学公共数学教学中的理论和实践价值, 并提出具体教学策略与实践案例, 旨在为大学公共数学教学改革、学生综合素质培养提供新的思路与方法。

关键词: 诗为境理念; 大学公共数学; 课程思政; 诗词境界; 数学美学

DOI: doi.org/10.70693/rwsk.v1i5.944

一、引言

在高等教育蓬勃发展的当下, 大学公共数学作为一门基础性、工具性课程, 对于培养学生的逻辑思维、科学素养起着关键作用。当前的大学公共数学教学仍存在诸多问题^[1]: 教学内容侧重于理论知识的灌输, 忽视了数学文化内涵的挖掘; 教学方式以传统讲授为主, 难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and 主动性; 在育人目标上, 对学生人文素养和价值观念的培养关注不足。课程思政已成为高校教育教学改革的重要方向, 要求将思想政治教育元素有机融入各类课程教学中。实现知识传授与价值引领的有机统一。在大学公共数学教学中融入课程思政, 不仅有助于培养学生的科学精神和创新能力, 还能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 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2]。在此背景下, 探索新的教学理念与方法, 实现公共数学教学中知识传授、能力培养与价值引领的有机统一, 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

诗词作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瑰宝, 蕴含着丰富的情感、深刻的哲理和独特的美学价值。数学则以其严谨的逻辑、简洁的形式和广泛的应用, 展现出独特的科学魅力^[3]。看似截然不同的诗词与数学, 实则存在着诸多内在联系^[4]。将以诗为境的理念引入大学公共数学教学, 不仅能够为数学教学注入新的活力, 还能通过诗词与数学的融合, 实现课程思政育人目标, 为公共数学教学改革提供新的路径。

二、诗词境界与数学美学层次的理论剖析

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提出了诗词的三重境界, 这三重境界不仅是对诗词创作过程的高度概括, 也深刻揭示了治学和人生追求的不同阶段。第一重境界为“昨夜西风凋碧树, 独上高楼, 望尽天涯路”。此境界描绘了一种孤独、迷茫但又心怀壮志的情境, 象征着在学习和探索的初始阶段, 人们面对未知的广阔领域, 充满了好奇与渴望, 同时也面临着困惑和挑战, 需要有勇气和决心去登高远望, 寻找前进的方向。对应到数学教学中, 即为数学认知阶段。也就是概念初构时期对知识结构的认知震荡。在微积分极限概念的教学过程中, 学生们对于用 $\varepsilon - \delta$ 语言描述的极限概念接受起来感到非常困难^[5]。我们可以借用柳宗元《江雪》一诗: “孤舟蓑笠翁, 独钓寒江雪”构建认知图式: 孤舟隐喻孤立点, 寒江映射实数的连续性, 而独钓则对应极限存在的唯一性。借用这一具象化的诗词描述, 可以将数列极限描绘为“千山鸟飞绝”后的收敛轨迹。

第二重境界是“衣带渐宽终不悔, 为伊消得人憔悴”。它体现了在追求目标的过程中, 人们全身心投入, 不畏艰难困苦, 坚持不懈地努力奋斗的精神。就如同在诗词创作或学术研究中, 创作者或学者为了达到理想的境界, 不惜付出大量的时间和精力, 即使身心疲惫也无怨无悔。在大学数学教学过程中, 对应方法探索期的思维淬炼阶段。此时在学生的认知世界中, 具有将知识点形成强连通分支的特征。具体案例如: 在微分方程这一章节的教学中, 常常会通过介绍具有现实背景的问题来锻炼学生的建模能力。特别是那些无法求出解析解的问题中, 会引入数值计算思想。在捕食者-被捕食者模型参数的调优过程中, 学生须经历反复试错的困局。可以引入陆游《冬夜

作者简介: 苏莉 (1984—), 女, 硕士, 讲师, 研究方向为最优化方法、高等数学教育;

于晟伟 (1995—), 男, 博士, 讲师, 研究方向为偏微分方程、次黎曼流形、动力系统、复杂网络、高等数学教育。

通讯作者: 于晟伟

读书示子聿》：“纸上得来终觉浅”来批判机械记忆——求解纯解析解的局限，接着就可以用“绝知此事要躬行”来引导学生进行数值实践，并要求学生在每次算法改进时标注对应诗句，如“山重水复疑无路”来记录局部收敛失败的情况。

第三重境界为“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这一境界表达了在经过长期的努力和探索后，突然获得顿悟和成功的喜悦。人们对事物的认识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曾经苦苦追寻的真理或灵感在不经意间豁然开朗。对应到数学教学和学生的数学认知阶段，即为对认知的本质理解期的范式跃迁，具备认知空间出现同伦等价变换的特征。具体实例如：在线性代数中关于矩阵对角化这一知识点的教学中，出现了一个认知拐点，即从机械计算到几何本质的理解的一个跃迁。可以引入诗境将学生对这一认知的跃迁进行优化。通过对辛弃疾原词的意境进行解码：“众里寻他”对应特征向量的搜索，“灯火阑珊”对应特征空间的基底表达。此时可以将杜甫“会当凌绝顶”与苏轼“横看成岭侧成峰”类比成“标准基下观察”和“特征基下观察”，通过这种设计的认知冲突，完成知识的跃迁。

三、课程思政视域下的教学重构路径

（一）挖掘诗词中的数学元素与数学知识的诗意表达

在教学过程中，可以选取一些蕴含数学元素的诗词，将其融入数学教学内容中。“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这句诗描绘了一幅帆船在长江上渐行渐远，最终消失在天际的画面，从数学角度来看，它体现了极限的思想。可以引导学生思考帆船与观察者之间的距离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增大，当帆船消失在天际时，距离趋近于无穷大，从而引入极限的概念，通过函数极限的定义 $\lim_{x \rightarrow \infty} f(x) = A$ ，进一步解释帆船距离变化的数学模型^[6]。

除了从诗词中挖掘数学元素，还可以尝试用数学语言诠释诗词的意境。例如，对于“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这句诗，可以从立体几何的角度进行分析。庐山的山峰在不同的观察角度下呈现出不同的形状和形态，这与立体几何中物体的视图概念相契合。可以通过建立三维坐标系，绘制山峰的立体模型，利用计算机软件生成从不同角度观察山峰所得到的视图，让学生更加直观地理解诗词所描绘的景象，同时加深对立体几何知识的理解。通过改变观察点的坐标 (x, y, z) ，观察三维模型视图的变化，帮助学生掌握视图的形成原理。在讲解函数的变化趋势时，可以引用“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这句诗。将愁绪的变化类比为函数的变化，一江春水向东流的那种连绵不绝、不断变化的态势，就如同函数在定义域内的连续变化。以指数函数 $y = a^x (a > 1)$ 为例，其函数值随着自变量 x 的增大而不断增长，就像愁绪不断蔓延，通过这种形象的比喻，帮助学生更好地理解函数的性质和变化规律。

（二）借助诗词营造数学学习情境

情境教学法是一种有效的教学方法，它通过创设与教学内容相关的情境，将抽象的数学知识与具体的情境相结合，使学生更容易理解和掌握数学知识^[7]。在大学公共数学教学中，教师可以巧妙地利用诗词来创设生动有趣的数学问题情境，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and 探究欲望。在讲解数列极限的概念时，教师可以引入“一尺之棰，日取其半，万世不竭”这句经典诗词。这句诗词形象地描述了一个数列的变化过程：将一根一尺长的木棒，每天截取一半，那么随着天数的增加，剩余木棒的长度会越来越短，趋近于零，但永远不会为零。教师可以引导学生根据这句诗词，构建一个数列模型：设木棒的初始长度为 $a_1 = 1$ ，每天截取一半后，第 n 天剩余木棒的长度为 $a_n = 1/2^{n-1}$ 。教师可以提出问题：当 n 无限增大时， a_n 的变化趋势是什么？通过对这个问题的探讨，引导学生理解数列极限的概念，即当 n 趋近于无穷大时，数列 $\{a_n\}$ 趋近于一个确定的常数。这种通过诗词创设情境的教学方法，能够将抽象的极限概念转化为具体的、直观的生活场景，让学生在感受诗词韵味的同时，轻松地理解和掌握数列极限的概念。

（三）融入诗词文化素养与思政元素考核

在大学公共数学教学的知识与技能考核环节，巧妙融入诗词元素，能够有效考查学生对数学知识的掌握程度和应用能力。教师可以设计这样的题目：“‘一去二三里，烟村四五家。亭台六七座，八九十枝花。’在这首诗中，若将数字看作一个数列，分析该数列的特点，并求出当 $n \rightarrow \infty$ 时的级数。”这道题要求学生首先识别出诗中的数字数列，然后运用级数的相关知识对其进行分析和计算。通过解答这道题，学生不仅需要掌握级数的基本概念和求和方法，还需要能够从诗词的情境中提取数学信息，将诗词与数学知识进行有机结合，从而考查了学生的数学知识应用能力和问题解决能力。

在学生在学习诗词中的数学问题时，教师应注重观察学生的思维过程和合作表现^[8]，以此来评价学生的学习方法和能力。在小组合作讨论诗词中的数学问题时，教师可以观察学生在小组中的参与度，是否积极发表自己的观点，是否认真倾听他人的意见。有些学生能够主动提出自己对诗词中数学问题的理解和解题思路，并且能够引导小组讨论的方向，推动讨论的深入进行，这些学生在思维的主动性和创新性方面表现出色。而有些学生能够认真倾听他人的发言，对不同的观点进行分析和思考，提出自己的疑问和建议，这些学生具备良好的批判性思维能力。在讲解数学知识与诗词所反映的历史文化背景时，教师可以引导学生了解我国古代数学家的成就和贡献。

[9], 如祖冲之对圆周率的精确计算、刘徽的割圆术等。通过这些内容的介绍, 激发学生的民族自豪感和爱国主义情感。教师可以让学生分享自己对我国古代数学成就的认识和感受, 以及这些成就对自己学习数学的启示。有些学生能够认识到我国古代数学的辉煌成就, 为中华民族的智慧和创造力感到骄傲, 并表示要努力学习数学, 传承和发扬我国的数学文化。这些学生在价值观上体现了对民族文化的认同和热爱, 以及对科学事业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通过对学生在情感态度和价值观方面的考量, 教师可以了解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的思想动态和精神追求, 及时给予鼓励和引导, 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 培养学生的科学精神和人文素养。

四、结论与展望

本研究基于课程思政视角, 深入探讨了以诗为境理念指导下的大学公共数学教学, 取得了一系列具有理论与实践价值的成果。在理论层面, 通过对诗词境界与数学美学层次的深入剖析, 揭示了诗词与数学之间深刻的内在联系。诗词的三重境界与数学的三种层次美学相互呼应, 展现了二者在人类智慧发展历程中的紧密关联。这种关联为数学教育与人文教育的融合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丰富了数学教育理论体系, 拓展了数学教育研究的新视角, 为数学教育美学理论的发展提供了有力的支撑。在实践层面, 本研究提出了以诗为境理念在大学公共数学教学中的一系列实践策略。在教学内容融合方面, 通过精心选取典型诗词融入数学教学, 巧妙地挖掘诗词中的数学元素, 并引导学生运用数学语言诠释诗词意境, 使数学知识与诗词文化相互交融, 让学生在感受诗词之美的同时, 更好地理解和掌握数学知识。在教学方法创新上, 借助诗词营造数学学习情境, 运用情境教学法激发了学生的学习兴趣 and 探究欲望。在教学评价多元化方面, 融入诗词文化素养与思政元素考核, 不仅考查了学生的数学知识与技能, 还注重对学生学习过程、方法以及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的评价, 实现了知识传授与价值引领的有机统一。

大学公共数学教学在以诗为境理念的指导下, 有着广阔的发展前景。在教学实践方面, 教师应不断挖掘诗词与数学知识的结合点, 创新教学方法和手段, 丰富教学内容, 为学生打造更加生动有趣、富有内涵的数学课堂。加强跨学科教学, 将数学与文学、历史、艺术等学科有机融合, 拓宽学生的知识面和视野, 培养学生的综合素养。在研究方向上, 进一步深入探讨诗词与数学之间的内在联系和作用机制, 为教学实践提供更坚实的理论支持。运用现代教育技术, 如人工智能、虚拟现实等, 开发与诗词和数学相结合的教学资源和学习平台, 为学生提供更加个性化、多样化的学习体验。通过不断的实践探索和理论研究, 以诗为境理念将在大学公共数学教学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为培养具有创新精神、实践能力和人文素养的高素质人才做出更大的贡献。

参考文献:

- [1] 李振平. 把思政元素洒满高等数学课程的实践与认识[J]. 佳木斯职业学院学报 2020 (6): 82-83.
- [2] 张奠宙. 中国古典文学中的数学意境[J]. 科学文化评论 2008 (5): 74-77.
- [3] 郝晶杰. 数学与诗词的融合研究[J]. 课程教育研究 2017 (36): 221-222.
- [4] 刘亚嘉. 利用古诗词的美培养学生的数学意境初探[J]. 科技视界 2019 (17): 154-155.
- [5] 陈辉. “高等数学”课程提升学生审美能力和人文素养实践探索[J]. 教育科学论坛 2023 (2): 157-160.
- [6] 弋彦虎. 苏轼诗词中的数学智慧[J]. 吕梁教育学院学报 2021 (38): 163-164.
- [7] 徐明. 景教学法在微分方程教学中的应用[J]. 考试周刊 2014 (59): 48.
- [8] 杨丽娅. 高等数学课程中融入思政元素的途径分析[J]. 现代商贸工业 2021 (14): 129-130.
- [9] 崔艳. 高等数学教学中融合课程思政的策略探索[J]. 安徽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2021 (5): 54-57.

University Public Mathematics Teaching Guided by the Concept of Taking Poetry as the Realm

Su Li¹, Yu Chengwei^{1*}

¹ China Fire and Rescue Institute, Beijing 102202, China

Abstract: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curriculum ideology and politics, this paper deeply explores the application of the concept of taking poetry as the realm in university public mathematics teaching. By analyzing the internal connection between the three realms of Wang Guowei's poems and the three levels of mathematical aesthetics, excavating the commonalities between poetry and mathematics in terms of creative sources, ways of thinking, etc.,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values of this concept in university public mathematics teaching, and puts forward specific teaching strategies and practical cases. The aim is to provide new ideas and methods for the teaching reform of university public mathematics and the cultivation of students' comprehensive qualities.

Keywords: The concept of taking poetry as the realm; University public mathematics; Curriculum ideology and politics; Poetic realm; Mathematical aesthetics

旅游对大学生心理健康影响的研究进展与启示

袁宏瑞¹ 李贝贝² 殷程强³

(1 滁州职业技术学院 食品与环境工程学院, 安徽 滁州 239012, 2 滁州职业技术学院 管理学院, 安徽 滁州 239012, 3 安徽师范大学 地理与旅游学院, 安徽 芜湖 241000)

摘要: 旅游活动有助于促进心理健康。大学生群体为寻求心理健康而进行的旅游活动已成为社会热点现象和强大经济动力。本文基于国内外文献研究后发现: (1) 旅游对大学生心理健康的影响是供给方旅游地、媒介方旅游体验和需求方大学生群体共同作用下的结果, 整体上旅游具有积极的心理健康效应; (2) 不同类型的旅游地大都能够给大学生带来积极的心理健康影响; (3) 大学生自身的需求和现状差异导致了心理健康促进效果的不同, 但不会从根本上阻碍旅游活动的积极心理健康效应; (4) 各种类型的旅游体验方式对大学生心理健康具有多方面的促进作用。旨在为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和旅游市场调控提供新的借鉴和参考。

关键词: 旅游; 大学生; 心理健康; 进展; 启示

Doi doi.org/10.70693/rwsk.v1i5.927

一、引言

近年来, 大学生因心理问题常产生休学、退学甚至是恶性事件, 由此引发了社会各界对大学生心理健康的高度关注^[1]。《“健康中国 2030”规划纲要》中强调, 要“加强心理健康服务体系建设和规范化管理”, 尤其要“加强对抑郁症、焦虑症等常见精神障碍和心理行为问题的干预”^[2]。其中, 大学生群体作为年轻一代, 其出生与成长的时间正处于网络和信息快速发展的阶段, 面临激烈的学业、就业、社会竞争, 其心理健康状态正成为不容忽视的社会问题^[3]。根据《2022 年中国大学生心理健康状况调查报告》, 大学生群体的抑郁风险为 21.48%, 而焦虑风险高达 45.28%^[4]。国外的统计数据也反映, 1997 年至 2012 年出生的 Z 世代年轻人中, 有 35% 的人表示接受过心理健康专业人士的治疗或治疗^[5]。这些心理健康问题很多来自学生本身的家庭环境、社交环境和地方社会环境, 很难在短时间内对这些外部压力进行调整^[6]。

旅游是一种有助于促进心理健康的活动^[7]。对于承受考试压力、社交压力、生活压力、同辈压力等心理负担的大学生群体而言, 到异地旅游, 重新感受生活, 成为他们舒缓身心、促进心理健康的热门选择^[8-10]。目前, 已有旅游地针对大学生群体推出了众多新兴旅游活动模式, 如“特种兵式旅游”“网红景点打卡”, 成为旅游地树立网络形象、拓展旅游市场、提高旅游经济效益的重要手段^[11], 也成为近年来新闻媒体的报道热点。社会舆论对这些大学生的“特别”行为常有褒贬不一的评价, 但其表象背后的实质, 即大学生群体的心理健康诉求常被忽视, 这一现象与理论的脱节在旅游学研究中逐渐被重视^[12,13]。

旅游活动如何改善旅游者心理健康的研究已经初具规模^[14]。尤其是新冠疫情的爆发, 给世界人民带来了严重的生理和心理创伤, 不少人选择旅游释放压力, 旅游的心理疗愈研究数量激增^[15]。但目前研究主要集中于旅游与游客福祉^[16]、旅游疗愈效应^[7]、旅游对老年人群体的治愈效果^[17], 主要面向大众化的游客群体或特定的弱势群体, 较少关注旅游对年轻人群体的心理效应。当前, 以大学生群体为主的年轻人正成为旅游活动的强大参与者和推动者, 他们以追求心理健康为目标的旅游活动为旅游地带来可观的经济效益,

作者简介: 袁宏瑞(1998—), 女, 硕士, 研究方向为旅游心理;

李贝贝(1985—), 女, 硕士, 副教授, 研究方向为旅游市场、旅游经济;

殷程强(1995—), 男, 博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为旅游情感。

通讯作者: 袁宏瑞

并对旅游产业的发展提出了新的诉求^[18]。面对我国旅游高质量发展的转型需求,年轻游客群体正是旅游产业进行深入提升转型的“新质生产力”动力来源^[19]。基于此,本文以“旅游”“大学生”“心理健康”为关键词,梳理国内外旅游学相关研究,归纳总结其发展趋势,以期为中国相关旅游研究提供参考。

二、研究数量与趋势

截至2025年1月20日,通过中国知网平台(CNKI),以关键词“旅游”“心理健康”“大学生”为组合进行检索,共获得86份文献。在Web of Science分别以“Tourism + Mental health + College student”“Tourism + Mental health + University student”“Tourism + Mental health + Undergraduate”进行组合搜索,分别得到18篇、33篇和13篇文献。

其中,不同年份文献的发表数量统计结果如图所示(图1)。中文检索得到的文献主要分布于2007年至2018年,参考文献主要分布于2002年至2020年,引证文献集中于2009年至2024年,呈现逐渐增加的特征。英文文献较多集中于2017年期间和2020年以后,处于稳步增长的状态。

对比国内外研究发现,虽然中国对于旅游与大学生心理健康的研究起步较早,但延续性不足,呈现出一部分集中讨论后逐渐回落的特征。国外研究虽起步较晚,但研究数量逐步增加。随着社会对大学生群体旅游需求和心理健康的日益关注,旅游如何影响大学生心理健康将成为不可忽视的研究趋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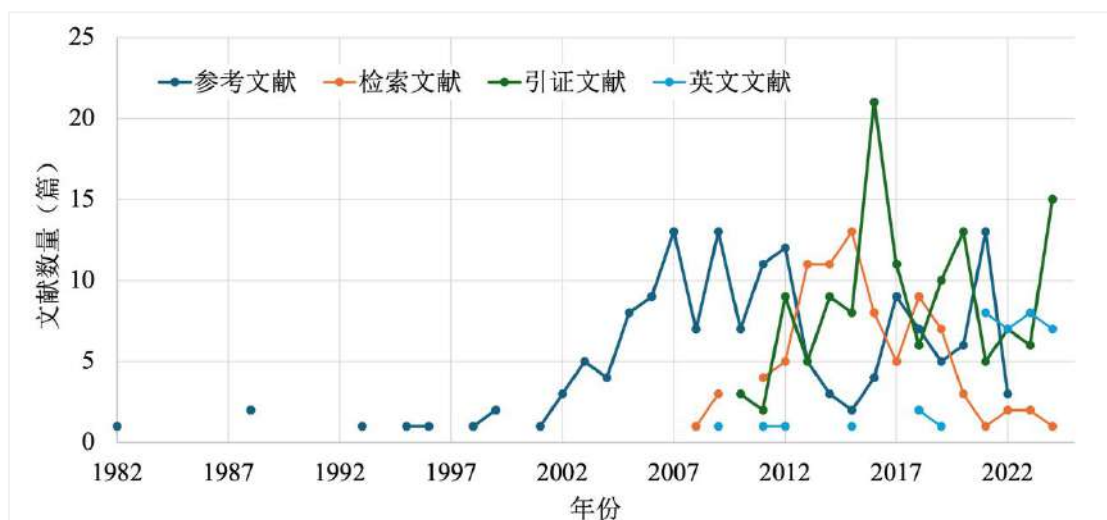


图1 文献数量统计图

三、研究热点与进展

结合已有研究发现,旅游对心理健康的影响取决于众多因素,总结来看主要包含供给、需求和媒介三个方面。第一方面为旅游地的类型,即供给部分,包含独特的环境或活动等。第二方面为游客本身的因素,即需求部分,包含性格、心理状态和家庭背景等。第三方面为参与的方式,即媒介部分,如参与的活动、体验的产品、同游者的差异等方面。

(一) 供给方面——旅游地类型差异

1、医疗保健旅游

医疗保健旅游是典型的以追求生理和心理健康为目的的旅游方式。这类旅游常涉及医院、疗养院等医疗机构,具有高消费、高投资和高收益的特征。医疗保健旅游产业的快速发展深度迎合了当前社会对于健康生活的需求,尤其是具备较多健康知识、追求生活品质的年轻人群体^[20]。例如,以健康生活为追求的海南温泉旅游研究结果表明,这种具有保健效果的旅游方式能够让参与其中的年轻人舒缓压力,获得心理状态的提升^[21]。广东省罗浮山的中医文化旅游,对年轻的大学生群体同样具有积极的心理状态改善效果,并增加了重游意愿^[22]。同时,旅游带来的积极感受使游客在日后的生活中仍能保持乐观的生活态度和高效的行为规范^[23]。当前,年轻人越来越追求养生的生活方式和健康的心理状态,而医疗保健旅游能够为年轻人游客带来积极的身心调节作用,因此成为旅游市场中越来越开阔的旅游业态^[24]。但医疗保健旅游也会因为开展过程中的阻碍和困难对游客心理产生消极的情感影响,对心理健康产生消极作用^[25]。

2、自然旅游

自然旅游地具有良好的心理健康疗愈效果^[26]。大尺度的国家公园、自然保护地、森林公园等区域,具有重要的心理健康效益^[11]。这些大尺度的旅游地常能带来直观的感官冲击,进而影响心理状态和精神感知,让游客感到舒适,产生促进心理健康的效果^[27]。如青藏高原旅游的研究发现,广阔高原的独特风光给游客带来了显著的精神逃离和情绪调节效果,具有积极的心理疗愈效应^[28]。同时,小尺度的公园和绿地也具有显著的心理健康促进效果。人们常用“净化心灵”来描述游客在公园游玩时的放松体验对心理健康产生的积极效应^[29]。居住空间内的小区绿化带、公园绿地等,也都是休闲活动开展的重要空间,对于日常生活中的负面情绪也都有积极的减缓效果^[30]。对于大学生群体而言,校园中日常体验的绿色空间可以视为其短暂的旅游空间,这部分绿色景观对于提高大学生地方依恋情感、改善心理健康具有显著的积极效益^[31]。

3、人文旅游

在旅游活动中,人与人之间的直接和间接交互会带来文化的交流与碰撞,这些深层次的交互体验往往更符合年轻人的心理诉求,也带来更复杂的心理恢复机制。例如游客在乡村旅游地通过自然接触、人文体验进行自我审视与反思,获得内心的宁静,产生心理恢复感^[32]。乡村旅游体验伴随着开发水平的提高而增强,乡村旅游过程中多样的消费体验、丰富的文化内容都能带来积极的身心感受^[33]。旅游地居民的日常生活氛围弥补了游客在平时工作中的心理感受缺失,带来积极的心理疗愈效益^[34]。在年轻人消费的网红餐厅中,大学生群体通过匿名留言倾诉想法、交流情感,这些充满文字记录的留言簿也成为年轻人情感发泄的自由空间,为他们的压力舒缓和自我提升提供了难得机会,带来独特的心理恢复效果^[9]。红色旅游地是最为典型的人文旅游目的地,以井冈山为代表的红色旅游景区不仅具有深厚的文化内涵,同时具有良好的教育功能,参与红色旅游的大学生群体能在红色文化氛围中增强心理韧性,提高主观幸福,具有明显的心理健康提升效果^[35]。

(二) 需求方面——大学生群体差异

1、社会人口学差异

大学生由于自身性别、经济状况等方面的差异,在旅游活动的开展和心理状态的感知上具有显著差异,对心理健康效应产生不同影响。例如性别方面,女性大学生更加注重旅游的社交功能与情感体验,如通过分享旅游图片、参与群体活动等方式增强人际联结,从而缓解孤独感、提升幸福感^[36]。而男性大学生更倾向于探险类旅游,通过挑战自我和体力消耗来释放压力,其心理健康效益更多来自成就感和环境适应力的提升^[37]。在经济状况方面,经济条件较好的大学生可以选择高品质的旅游休闲活动,通过深度的文化体验提升自我认同感和生活满意度^[38]。而经济压力较大的大学生更倾向于“特种兵”式的打卡旅游模式,在短暂的旅游过程中获得心理放松^[39]。

2、心理与人格特质差异

旅游者个人的品质也影响了旅游地的选择、体验方式和心理恢复效果^[40]。例如对旅游活动具有求知需求,希望在旅游中拓展知识、增长见识的大学生群体,渴望通过旅游活动带来的认知增长提高自身人际宽恕与自我宽恕水平,从而获得心理压力的释放^[41]。对于具有冒险倾向的大学生群体而言,在旅游中探索异国他乡,在陌生的环境中进行社交和成长,能够使其建立自我认知,塑造完整人格,提升心理健康水平^[36]。同时,对于自尊感的追求也会促使部分大学生通过高频次的旅游活动体现自我优越感。但这一追求会随着他们进入工作岗位后逐渐降低,取而代之的是通过旅游来获取释放工作压力的机会^[42]。

3、文化与价值认知差异

社会文化背景和价值观认知的差异,使得旅游对大学生心理健康影响不同。旅游流动塑造的非惯常环境会带来新鲜感,但也会因外地身份和地域文化差异带来不安感和危险感^[43]。中国中产阶级学生在意大利游学研究表明,国外“游学”虽然满足了这部分学生及家长对于国际化生活方式的追求,但国外旅游过程中交流的不便、文化的碰撞、生活的流动也给学生带来了显著的消极心理影响,产生希望与挫折、自我欣赏与自我责备共存的矛盾心理^[44]。新奇的饮食文化常会吸引大学生群体前往旅游,进行美食体验与打卡。对于勇于尝试新餐饮文化的大学生群体而言,旅游地的饮食文化差异能提高他们的消费欲望,满足其求异的心理体验需求,带来情感上的满足。而不愿尝试新饮食文化的大学生则表现出心理上的消极和行为上的保守^[45]。

(三) 媒介方面——体验方式差异

1、旅游中科技交互对大学生心理健康的影响

如今的大学生群体是在科技快速发展中成长的一代,新媒体、手机、网络等技术成为他们认知和感受

世界的重要媒介,是他们日常生活中的必要组成^[46]。同样,这些媒介也成为大学生群体心理感知和旅游行为之间的重要桥梁,通过这一媒介,他们不仅凭借心理感受进行旅游行为决策,也强化了旅游行为结果对心理状态的反馈。新媒体背景下的短视频也成为了大学生群体了解旅游目的地的重要渠道,通过网络媒体的宣传,旅游目的地可以调动大学生的心理状态,带来感官上的享受,从而增加旅游意愿^[47]。在特定的情景中,依托科学技术的交互式旅游体验常带来比真实体验更好的心理恢复效果。例如疫情期间的虚拟旅游活动可以有效降低民众焦虑,改善心情^[48]。对于弱势群体而言,虚拟现实技术创造的元宇宙旅游给残疾人旅游带来了更多契机,这些新兴技术帮助游客摆脱了诸多束缚,带来明显的心理健康效益^[49]。但是,大学生群体对新兴媒体的过度沉迷也会导致他们脱离现实世界、增加焦虑。尤其当部分大学生对手机完全上瘾,沉迷于虚拟世界,失去对真实世界的情感联系时,这种媒介反而阻碍了旅游行为的产生,甚至加大心理压力,陷入恶性循环^[50]。

2、旅游中自然交互对大学生心理健康的影响

在旅游活动中,与大自然的亲密接触能带来积极的心理体验。例如野外的露营、烹饪、步行等活动,让游客与大自然深度交互,带来日常生活中没有的体验,形成积极的心理健康效益^[51]。这类自然旅游活动不仅通过温度湿度、负氧离子、气候环境等因素给游客的身体带来积极感受,也通过优美风光、生物景观等因素为游客带来审美的情趣和心理的调节,身心状态的共同改善营造了“天人合一”般的平衡感受,促进了游客的心理健康,提升了生活幸福感^[52]。并且,与自然接触的美好体验还具有长久的心理健康效益。大学生的人格成长研究表明,体验自然的旅游经历往往记忆最为深刻,这些旅游经历让他们感受到了“美妙的快乐”,并在之后的日常生活中继续通过旅游回忆进行积极的心理干预^[53]。因此,在教育领域中,与大自然接触也成为推动青年积极发展的重要途径^[54]。

3、旅游中同伴交互对大学生心理健康的影响

旅游中的同伴常伴随游前、游中和游后的完整过程,与旅游主体产生密切的交往行为和情感交互,是旅游心理体验中的重要影响因素。对于大学生群体而言,旅游中的同伴可以分摊费用、保障安全、帮助决策、交流知识、增进情感,明显改善旅游感受,带来心理状态的提升^[55]。并且,在旅游活动中群体性的合作行为也有助于情感交流,提高个人素质,带来积极的心理效应^[56]。对于相伴游玩的对象,志同道合的朋友常能带来积极的心理体验,而与同事、家人的结伴旅游,其效果则是因人而异。当旅游活动较为顺利时,家人的陪伴能带来更多的和谐时光,降低游客的心理压力^[57]。但当对旅游目的地的兴趣差异较大时,家人相伴可能带来更多的分歧,导致旅游体验下降,形成额外的心理负担^[55]。

四、结论与启示

(一) 研究结论

综合当前国内外旅游对大学生心理健康影响的研究可以发现,大学生群体正值青春美好年华,更加追求心理诉求的满足。为促进心理健康而产生的旅游活动,不仅成为推动旅游产业转型变革的重要动力,也映射出丰富多彩的旅游经济现象背后当代大学生群体所面临的心理困境,对于高校教育、家庭培养和旅游产业管理都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总结而言,主要得出以下结论:

1、旅游对大学生心理健康的影响是供给方——旅游地、媒介方——旅游体验和需求方——大学生旅游需求共同作用下的结果,其中任何一个环节的差异都会导致心理健康效应的差异。但整体上,旅游活动是促进大学生群体心理健康的重要手段,并在游后的一段时间内依然发挥积极的心理效益。

2、不同类型的旅游地大都能够给大学生带来积极的心理健康影响。自全球疫情爆发以来,医疗保健旅游逐渐成为热门选择,通过生理和心理的双重治愈,提高大学生心理健康水平。自然旅游地为大学生提供了与自然环境亲密接触的机会,使游客释放压力、获得放松,从而促进心理健康。人文旅游地则通过文化交流增长见识,塑造人格,通过满足大学生心理诉求发挥心理疗愈作用。

3、大学生自身的需求和现状差异导致旅游的心理效益不同。性别、经济状况、人格特质、文化背景,价值观念等都是重要的影响因素。

4、各种类型的旅游体验方式对大学生心理健康常具有多方面的促进作用。其中新兴科技的合理使用能够强化情感抒发,促进心理健康;人与自然的直接接触可以带来身心调节和心理状态提升;志同道合的旅游伴侣也能提供更多情绪价值,促进心理疗愈。

(二) 研究启示

目前,国内外研究从旅游现象着眼,对大学生群体旅游行为背后的心理健康诉求进行了初步探索,但

未能从具体的案例中提炼普适性的理论框架以及有效的调控路径。因此,面对大学生群体新兴的旅游消费需求 and 旅游业可持续发展的目标,未来研究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更加深入的探索:

1、构建旅游对大学生心理健康影响的理论框架

旅游行为研究和旅游心理研究对大学生群体的心理健康诉求都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探索,但两类研究缺乏深度耦合。其中,旅游行为视角下的研究可以对旅游现象进行剖析,刻画其背后大学生群体不同的心理健康状态及旅游行为。通过总结其阶段性特征,掌握大学生群体行为模式和心理健康状态的变化规律。而旅游心理学研究中,成熟的理论体系可以提供解释框架,从理论层面对大学生旅游行为进行解构,不仅有助于发掘其产生背景和主导因素,还可以对其未来旅游行为倾向进行预测。通过将旅游行为研究和旅游心理研究进行深度融合,可以构建完整的“旅游现象—旅游行为—心理机制—驱动因素”理论体系,塑造旅游对大学生心理健康影响的普适性框架。

2、探索旅游促进大学生心理健康的实践路径

旅游虽然对大学生心理健康具有积极效益,但目前的研究仍未能深入探讨在实践中如何有效提升大学生心理健康水平。一方面,在旅游产业调控中,结合理论框架剖析影响大学生旅游行为和心理健康的主要因素,进行针对性的旅游产业调控,推动旅游企业为大学生群体提供更加完善的旅游产品和服务。以促进心理健康为导向,为旅游企业提供新的发展思路 and 方向,推动旅游产业提质升级,助力旅游产业从“国民经济产业”转型升级为“国民幸福产业”。另一方面,在心理健康教育实践中,改变以心理咨询为主导的传统教育手段,鼓励政府、社会、企业、家庭以旅游为抓手,探索寓教于“游”的教育模式,让大学生在旅游活动中改善心理状态。未来研究可将受益群体从大学生拓展至青少年、老年、儿童、弱势群体等,提升全民心理健康水平。

参考文献:

- [1] 黄晓旭,马博涵,张丽芳,等.园艺疗法在园林与旅游学院在校大学生心理健康状况改善中的应用探索——以河北农业大学为例[J].河北林业科技,2018,39(4):14-17.
- [2] 徐虹,于海波.大健康时代旅游康养福祉与旅游康养产业创新[J].旅游学刊,2022,37(03):10-12.
- [3] 陈又华.新时代背景下高校心理健康教育的现状及解决策略[J].湖北开放职业学院学报,2024,37(24):38-39,42.
- [4] 蓝皮书报告 | 中国大学生心理健康状况调查报告[EB/OL].http://psy.china.com.cn/2023-08/11/content_42460957.htm.
- [5] Gen Z more likely to report mental health concerns[EB/OL].<https://www.apa.org/monitor/2019/01/gen-z>.
- [6] 胡锦涛,张睿佳,谭健峰,等.大学生焦虑情绪问题的现况调查及其影响因素研究[J].卫生软科学,2025,39(1):78-81.
- [7] 杨振之,沙沙.旅游疗愈理论:构成系统与作用机制[J].旅游学刊,2024,39(3):35-47.
- [8] 刘蒙之.青年旅游新趋向背后的心理特征[J].人民论坛,2023:6.
- [9] 于佳,孙九霞,谢彦君.青年的非互动性情感倾诉与意义表达——以拉萨玛吉阿米餐厅留言簿为例[J].青年探索,2024(2):49-60.
- [10] BAROI B. Impact of travel and recreational activities on stress, happiness, and life satisfaction among university students[J]. Science, Engineering and Health Studies, 2024: 24050027-24050027.
- [11] BUCKLEY R. Nature tourism and mental health: parks, happiness, and causation[J]. Journal of Sustainable Tourism, 2020, 28(9): 1409-1424.
- [12] 张三保,李珂歆.特种兵式旅游:特征、成因与效应[J].旅游导刊,2024,8(5):27-46.
- [13] 鄢方卫,舒伯阳,赵昕,等.世俗体验还是精神追求?——消费主义背景下网红打卡旅游的归因研究[J].旅游学刊,2022,37(6):94-105.
- [14] 刘鲁,王英,吴巧红.旅游疗愈:新领域·新理论·新方法——《旅游学刊》旅游疗愈专题研讨会暨第二十一届全国区域旅游开发专委会学术年会综述[J].旅游学刊,2024,39(6):161-164,166-167.
- [15] BUCKLEY R C, COOPER M A. Tourism as a Tool in Nature-Based Mental Health: Progress and Prospects Post-Pandemic[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Research and Public Health, 2022, 19(20): 13112.
- [16] 赵宗茜,周雯佳,李光子,等.地方意义与游客福祉关系研究——以河北碣石山乡村旅游为例[J].北京林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20(1):61-68.
- [17] 吕兴洋,刘涛,谢小凤,等.回忆疗愈:过往旅游经历对老年人不幸福感的治愈作用研究[J].旅游学刊,2023,38(6):74-89.
- [18] 田小静,黄浩.基于UGC的“网红”城市游客消费行为与体验特征——以山东省淄博市为例[J].商业经济研究,2023(15):53-56.
- [19] 徐政,江小鹏.新质生产力赋能旅游高质量发展的应用场景、逻辑机理与推进路向[J].经济地理,2024,

- 44(11): 232-240.
- [20] FENGMIN Z, BAIJUN W, JIANGTAO B, et al. Investigating revisit intention of medical tourists in China through nutritional knowledge, perceived medical quality, and trust in the physiologist: A recommendation on health tourism policy measures[J]. *Frontiers in Public Health*, 2022, 10: 893497.
- [21] 邓军, 吴娜, 傅安国, 等. 海南温泉旅游者健康生活型态对其心理幸福感的影响[J]. *重庆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4, 14(5): 59-62.
- [22] PENG J, YANG X, FU S, et al. Exploring the influence of tourists' happiness on revisit intention in the context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cultural tourism[J]. *Tourism Management*, 2023, 94: 104647.
- [23] CHAULAGAIN S, PIZAM A, WANG Y. An Integrated Behavioral Model for Medical Tourism: An American Perspective[J]. *Journal of Travel Research*, 2021, 60(4): 761-778.
- [24] WRIGHT D W M, ZASCERINSKA S. Becoming immortal: future wellness and medical tourism markets[J]. *Journal of Tourism Futures*, 2022, 9(2): 168-195.
- [25] MATHIJSSEN A, DZIEDZIC E. Diasporic Medical Tourism: examining tourists' profiles, antecedents and behavioural intention[J]. *European Journal of Tourism Research*, 2024, 37: 3702-3702.
- [26] COOPER M A, BUCKLEY R. Tourist Mental Health Drives Destination Choice, Marketing, and Matching[J]. *Journal of Travel Research*, 2022, 61(4): 786-799.
- [27] 林开森, 沈姝筱, 元晓春. 国家公园游憩舒适性的探索性研究——基于生理-心理-精神-社会动态模型(BP2S)新视角[J]. *旅游科学*, 2024, 38(2): 102-117.
- [28] 余正军, 张露. 旅藏游客的旅游复愈性机制研究——基于注意力恢复视角[J]. *旅游论坛*, 2024, 17(9): 58-72.
- [29] BUCKLEY R, ZHONG L, MARTIN S. Mental health key to tourism infrastructure in China's new megapark[J]. *Tourism Management*, 2021, 82: 104169.
- [30] 赵丽宁, 李君轶. 疫情期间居住环境对城市居民焦虑情绪的影响[J]. *浙江大学学报(理学版)*, 2021, 48(5): 642-650.
- [31] 应君, 金荷仙, 张一奇, 等. 接触校园绿色空间内在动机对大学生心理健康的影响——一个被调节的链式中介模型[J]. *中国园林*, 2023, 39(5): 37-42.
- [32] 刘卫梅, 林德荣. 乡村旅游体验场景对心理恢复的作用机制研究——兼论地方依恋的中介作用[J]. *旅游学刊*, 2024, 39(3): 106-118.
- [33] LIN H H, TING K C, HUANG J M, et al. Influence of Rural Development of River Tourism Resources on Physical and Mental Health and Consumption Willingness in the Context of COVID-19[J]. *Water*, 2022, 14(12): 1835.
- [34] 黄清燕, 白凯, 杜涛. 旅游地日常生活的康复性意义研究——以丽江古城为例[J]. *旅游学刊*, 2022, 37(2): 14-30.
- [35] 闫昕, 晏雄, 解长雯, 等. 红色旅游者主观幸福感的链式生成机理研究[J]. *干旱区资源与环境*, 2023, 37(3): 178-185.
- [36] 余志远, 谷平平. 女性自行车旅游者的自我意识觉醒与主体建构[J]. *旅游学刊*, 2022, 37(6): 106-120.
- [37] 姜园园, 兰晓娟. 性别差异下的旅游者消费行为研究[J]. *现代营销(信息版)*, 2020(2): 220.
- [38] 穆红梅, 郑开焰. 大学生旅游消费行为实证研究[J]. *经济问题*, 2018(4): 123-128.
- [39] 刘晓英. 基于 MEC 模型的世代“特种兵式旅游”消费价值诉求探讨[J]. *商业经济研究*, 2024(1): 91-94.
- [40] BUCKLEY R C, COOPER M A, CHAUVENET A, et al. Theories of experience value & mental health at tourism destinations: Senses, personalities, emotions and memories[J]. *Journal of Destination Marketing & Management*, 2022, 26: 100744.
- [41] 李瑛, 贺文华. 认知性旅游体验对青年旅游者压力后成长的影响——自我宽恕和人际宽恕的多重链式中介效应研究[J]. *旅游学刊*, 2023, 38(2): 92-105.
- [42] 罗丽, 曹兴华, 覃建雄. 补偿性消费理论视角下年轻群体旅游消费行为探讨[J]. *商业经济研究*, 2021(18): 179-182.
- [43] 李琳, 唐亚男, 李春晓, 等. 非惯常环境及行为: 基于旅游情境的再思考[J]. *旅游学刊*, 2022, 37(11): 40-51.
- [44] LAN S. Youth, Mobility, and the Emotional Burdens of youxue (Travel and Study): A Case Study of Chinese Students in Italy[J].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2020, 58(3): 163-176.
- [45] 杜昀倩, 李玺. 饮食消费价值感知与美食形象对访澳游客行为意向的影响——结合饮食消费者人格特征的分析[J]. *美食研究*, 2022, 39(3): 35-44.
- [46] OLSON E D, RO H. Generation Z and Their Perceptions of Well-Being in Tourism[M]//STYLOS N, RAHIMI R, OKUMUS B, et al. *Generation Z Marketing and Management in Tourism and Hospitality: The Future of the Industry*. Cham: Springer International Publishing, 2021: 101-118.
- [47] LIU J, WANG Y, CHANG L. How do short videos influence users' tourism intention? A study of k

- ey factors[J]. *Frontiers in Psychology*, 2023, 13: 3389.
- [48] 成茜, 李君轶. 疫情居家约束下虚拟旅游体验对压力和情绪的影响[J]. *旅游学刊*, 2020, 35(7): 13-23.
- [49] UD DIN I, ALMOGREN A. Exploring the psychological effects of Metaverse on mental health and well-being[J]. *Information Technology & Tourism*, 2023, 25(3): 367-389.
- [50] 崔凤军, 王财玉. 手机成瘾对生态旅游意愿影响的心理机制[J]. *中国生态旅游*, 2024, 14(4): 785-799.
- [51] MOZOLEV O, SHOROBURA I, ZDANEVYCH L, et al. Influence of Physical Fitness of Students on the Quality of Leisure Organization in a Sports and Health Tourism[J]. *Revista Romaneasca pentru Educatie Multidimensionala*, 2020, 12(2): 117-131.
- [52] 杨振之, 沙沙, 董良泉. 生命质量视域下旅游活动对游客健康影响的研究述评[J]. *旅游科学*, 2022, 36(02): 151-175.
- [53] HOFFMAN E, JIANG S, WANG Y, et al. Travel as a Catalyst of Peak Experiences Among Young Chinese Adults[J]. *Journal of Humanistic Psychology*, 2021, 61(4): 608-628.
- [54] BOWERS E P, LARSON L R, PARRY B J. Nature as an Ecological Asset for Positive Youth Development: Empirical Evidence From Rural Communities[J]. *Frontiers in Psychology*, 2021, 12: 688574.
- [55] 王娟, 李婷, 魏荣杰. 共睦态视角下旅行同伴对旅游体验质量的相互影响研究[J]. *西北大学学报 (自然科学版)*, 2024, 54(4): 639-649.
- [56] MOZOLEV O, HUTSAL L, SHOROBURA I, et al. Basic Preparation of a Tourist for Sports and Fitness Hike[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pplied Exercise Physiology*, 2020, 9(12): 99-106.
- [57] SUN L, WANG G, GAO L. Modelling the Impact of Tourism on Mental Health of Chinese Residents: An Empirical Study[J]. *Discrete Dynamics in Nature and Society*, 2022, 2022(1): 7108267.

Advancements and Implications in the Study of Tourism's Impact on the Mental Health of College Students

Yuan Hongrui¹, Li Beibei², Yin Chengqiang³

¹ Food and Environmental Engineering Department, Chuzhou Polytechnic, Chuzhou, China

² Management Department, Chuzhou Polytechnic, Chuzhou, China

³ School of Geography and Tourism, Anhui Normal University, Wuhu, China

Abstract: Tourism activities have been identified as a significant factor in promoting mental health. The increasing prevalence of tourism among college students in pursuit of mental well-being has emerged as a notable social trend and a substantial economic impetus. This study, grounded in a comprehensive review of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literature, has uncovered several key findings: (1) The impact of tourism on the mental health of college students is a complex interplay among the supply side (tourist destinations), the mediating factor (tourism experience), and the demand side (college students themselves). Collectively, these elements contribute to an overall positive psychological effect of tourism; (2) Distinct categories of tourist destinations exert varying yet predominantly positive influences on the mental health of college students; (3) Individual differences among college students in terms of needs and current mental health status result in diverse outcomes regarding mental health promotion. However, these differences do not fundamentally impede the positive mental health effects of tourism activities; (4) Diverse tourism experience modalities offer multifaceted benefits for the mental health of college students. An in-depth exploration of how tourism influences the mental health of college students can offer valuable insights for both mental health education initiatives targeting this demographic and the strategic regulation of the tourism industry.

Keywords: Tourism; College students; Mental health; Research progress; Implications

大模型标注基础上中国文化类视频的多模态话语意义构建研究

秦子敏¹

(1 北方工业大学, 北京 100144)

摘要:本研究基于 Kress & van Leeuwen 的视觉语法理论和 Halliday 的系统功能语法理论, 以 Chat GPT 4o 为标注工具, 深入探讨了中国文化类视频《筷子: 这个餐具绝没那么简单!》中的视觉模态与语言模态如何进行意义构建。通过对该视频中多模态话语的细致解读, 研究挖掘了其中所蕴含的文化意义, 以及 Chat GPT 4o 在标注准确性、多模态语言处理能力及指令理解精度方面的局限性。希望本文能为内容创作者在讲述中国故事时提供参考价值, 同时为大模型开发与训练提供有益的启示。

关键词: 多模态话语分析; 国际传播; 中国文化; 大模型

Doi doi.org/10.70693/rwsk.v1i5.930

一、引言

在 2021 年 5 月 31 日举行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政治局第三十次集体学习中, 习近平总书记着重指出, 讲好中国故事, 传播好中国声音, 展示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 是加强我国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的重要任务^[1]。随后, 各类讲述中国文化的视频及其多模态话语研究引起了人们的重视。

然而, 早期的多模态话语分析多是提出某个分析框架并选取少量数据进行示例, 结合 Elan 等软件进行手动标注。近年来, 多模态话语研究正逐步进入全新的大数据阶段。李梦洁等指出, 未来研究可结合如 ChatGPT, Gemini 等人工智能工具, 以提升自动处理多模态语料的效率, 提供实时数据分析反馈, 并优化数据的可视化效果^[2]。

二、理论基础

(一) 视觉语法理论

视觉语法是社会符号学领域的重要理论。该理论借鉴了 Halliday 关于语言三大功能的假说, 并结合电影研究的相关理论, 提出了与这三大功能相对应的视觉图像分析的三个层面: 再现意义、互动意义和构图意义^[3]。图像的再现意义分为叙事性再现和概念性再现。图像的互动意义是指图像符号如何构建并维持观看者与图像中人物的关系。包括接触、社会距离以及视角和情态^[4]。图像的构图意义涵盖了三个方面: 信息值、显著性和取景。

(二) 系统功能语法

根据 Halliday 的系统功能语法, 语言具有三大元功能, 即表示概念意义的概念功能, 表示说话人和听话人关系以及说话人对所说内容的态度的交际功能, 以及表示语篇意义的语篇功能。其中, 概念功能主要通过及物系统来体现。交际功能的实现主要是通过语气、情态、时态和人称代词来完成的。语篇功能主要通过主位结构、信息结构和衔接的方式得以体现^[5]。

三、研究设计

(一) 研究对象

《中国范儿》(Feel of China)是由中国网精心制作的一档双语微视频系列, 节目采用英语解说和中英文双语字幕。该视频是典型的多模态话语, 以语言模态和视觉模态为主, 听觉模态为辅, 深入浅出地介绍了节气、服饰、传统工艺、节日等文中国特色文化符号, 展现了中华文化的深厚底蕴和广泛影响。在具体分

析时选取了其中的《筷子》篇为例，对其中的图像、文字符号进行分析，探究其意义构建。

（二）语料标注与统计

大语言模型（Large Language Model, LLM）是基于深度学习的自然语言处理模型，能够理解和生成自然语言文本。通过分析大量文本数据进行训练，这些大模型可对文本、语音、图像等进行分析和理解，在文献阅读与总结、情感分析、编写代码、机器翻译、访谈分析、语言和话语分析、以及多模态语言处理等方面表现出极大的应用前景^[6]。常见的大语言模型有 Chat GPT、文心一言、智谱清言、kimi 等。

本研究采用视觉语法和系统功能语法对《筷子》篇进行分析，结合前沿的大模型 Chat GPT 4o 版本进行标注(数据取自 2024 年 9 月 20 日至 28 日)。相较于之前的版本，Chat GPT 4o 能够更准确地理解上下文，从而提供更相关的回答。同时，在多模态处理、多语言处理、个性化定制等方面均有显著提升，能够很好地实现本研究的目的。

具体而言，在图像抓取阶段，Chat GPT 4o 可以从视频当中随机截取关键帧，避免人为挑选有意义帧产生的主观性；在标注阶段，基于视觉语法和系统功能语法的理论框架，可以提升标注效率；在数据统计阶段，可以生成图表，帮助标注者处理一些耗时低效的重复性工作。由于其无法像人类一样灵活应变，在截取图像时可能会抓取很多重复的画面以及转场画面，并且生成的内容可能产生误导性，所以需要人工校对，以保证标注结果的准确性。笔者用 Chat GPT 4o 从视频中抓取了 50 个关键帧，人工剔除掉重复帧后剩余 39 帧及其对应的字幕用于分析。

（三）研究问题

本研究通过分析大模型标注基础上中国文化类视频《筷子》中的多模态话语意义构建，旨在回答以下几个问题：

该视频中的视觉模态和语言模态如何进行意义构建？

大模型在标注视频的过程中存在哪些局限性与不足？

四、《中国范儿》的多模态话语分析

（一）再现意义分析

表 1 再现意义分布

分类	过程类型	标注次数	占比
叙事性再现	行为过程	23	59.0%
	心理过程	1	2.6%
概念性再现	分类过程	4	10.3%
	象征过程	11	28.2%

根据 Kress & van Leeuwen，再现意义分为叙事性再现和概念性再现两种，有无矢量是区分两者的标志。叙事性再现存在矢量，再现行为或事件，强调事件的展开和变化的过程，此类图像通常叙述一个故事或解释一个过程，体现的是“做什么”。概念性再现没有矢量，再现的则是某事物具有普遍意义的、稳定的本质，体现的是“是什么”。叙事性再现可以分为行为过程、反应过程、言语过程和心理过程，而概念性再现可以分为分类过程、分析过程和象征过程^[3]。视频的主题是筷子，因此大部分场景都是人使用筷子的画面，而人和筷子之间本身就是一种矢量关系，所以视频中大部分都是叙事性再现中的行为过程，比如图 1 的团圆饭上，小孩用筷子给老人夹取食物，大人、小孩和筷子之间分别存在矢量，因此属于行为过程。而且老人（反应者）满是欣慰地看向正在夹菜的小孩（现象），他们的目光也形成了矢量，构成反应过程。这一幕生动地展示了家庭的代际关系和文化遗产，与此同时，老人小孩坐在中间，大人位于两边，体现了长幼有序的中华传统美德。



图 1

（二）互动意义分析

1. 接触

表 2 接触类型分布

分类	标注次数	占比
索取	2	5.1%
提供	37	94.9%

Kress & van Leeuwen 指出，接触包含两个要素，索取和提供^[3]。如果图像中的参与者直视观看者，与其进行了眼神交流，则表达了索取的意义；反之，如果图像中的参与者并未直视观看者，没有眼神交流，则为提供。这两者的区别主要在于图像中的参与者与观看者是否具有眼神交流。由于视频的目的在于展示筷子所蕴含的文化内涵，即提供信息，所以大部分图像表达的都是“提供”。



图 2

图 2 中有四位参与者，参与者之间的目光形成了矢量，具有眼神交流，但参与者与观看者之间并没有眼神接触，因此，这个画面表达的是“提供”的意义。结合视频内容可知，此时正值春节时期，中间那位邻居独自在家过年，于是主人招呼他一同过来用餐，周围的主人都在用筷子给客人夹菜，彼此之间存在眼神交流，客人眼含泪花，满是兴奋与激动。筷子不仅提供了餐食，也提供了邻里之间的温情，这也是邻里和睦和团圆的中国文化内涵。

2. 社会距离

表 3 社会距离分布

分类	标注次数	占比
特写镜头	29	74.4%
中景镜头	9	23.1%
长景镜头	1	2.5%

社会距离与镜头的框架有关，可以分为特写镜头，中景镜头和长景镜头。特写镜头表示亲密或个人关系。中景镜头表示社会关系，长景镜头表示公共关系^[3]。《筷子》篇中特写镜头居多，主要为了展示筷子的细节和使用、还有美食与烹饪等与筷子紧密联系的元素。此外，图 3 展示了中国人与外国友人共享美食的场景，特写镜头表明两人之间的空间关系较为亲近，这可能暗示了他们之间的亲密关系或友好的社交互动。两人的表情都很轻松，给人一种轻松愉悦的氛围，拉近了参与者与观看者之间的关系，召唤了观众的情感，有利于增强传播效果。画面与配文“文明多姿，世界才能多彩”协同作用，通过展示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人们和谐共处，强化了文化多样性对于世界的重要性。



图 3

3. 视角

视角可以分为水平视角和垂直视角。其中水平视角由正面视角和倾斜视角构成。正面视角给观看者带来一种卷入之感，倾斜视角则给观看者一种超然之感。垂直视角包括仰视、俯视和平视。不同视角反应了参与者与观看者之间的权势关系，俯视表明权势在观看者一方，仰视表明权势在参与者一方，平视则说明观看者和参与者之间是平等的关系^[3]。



图 4



图 5

这两张图均为倾斜视角，观看者可以从侧面感受到筷子的精致，即筷子可以用精密的雕刻刀进行题诗，作画，刻字，并非只是作为餐具那么简单。这种视角使得观看者能够清晰地看到筷子上的细微纹理，体现了手工制作的工艺美。这些细节展示了工匠对品质的追求和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尊重。

4. 情态

在 Kress & van Leeuwen 的视觉语法中，情态指的是世界的真实性和可信性。而图像细节的最小和最大表示(如颜色饱和度和丰富度)影响信息的可靠性，可细分为高情态、中情态和低情态。在色彩饱和度方面，较高的情态意味着更大的可信度和真实性，而较低的情态则更加抽象，超出了世界的真实性^[3]。

视频中的筷子均取材于温暖的黄棕色竹子，而这也是筷子最初的色泽。《中国范儿》视频的目的是让世界了解更真实的中国，选用这样的颜色作为筷子的呈现，不仅最贴合人们的传统认知，还再现了筷子的自然本质，这种高情态给人以真实自然之感。而图 6 主要描绘了西周时期的“匕匙”这一具体文物，这两把“匕匙”带有铜绿的氧化痕迹，展示了金属的质感和岁月的痕迹，这种高情态十分具有历史真实性。勺子的造型和纹饰展示了当时的工艺水平和社会审美观念，与配文“可切可捞”协同作用，表明其作为饮食器具的功能和历史价值，反映了古代中国文明的发达程度和人类智慧。



图 6

（三）构图意义分析

1. 信息值

信息值靠图像中元素的构图位置来实现。主要分为上下、左右、中心和边缘^[3]。根据人的阅读习惯，左边的信息是已知的，而右边的则是新信息。上方的信息往往是理想的，而下方的信息往往是现实的。位于中心的信息是核心的，而位于边缘的信息是从属的。



图 7

图 7 则是中心-边缘信息结构，这种分布符合人的一般认知顺序，有利于观看者对重要信息的提取，并给视频留下深刻的印象。参与者包括两位老人、两个成年人和两个孩子，他们构成了一个典型的三代同堂的家庭结构。老人坐在中间的位置即“主座”是一种尊重和礼貌的表现，强调了他们在家庭中的重要地位。而这也是中国敬老爱老的宴席礼仪。每位家庭成员都满是兴奋与激动，体现了阖家团圆的中国文化内涵。

2. 显著性

显著性指的是用图像中的元素来吸引观看者，可以通过大小、聚焦程度、色调对比、色彩对比、前景化及某些文化因素实现^[3]。在这个视频中，图像主要通过大小，前景化和色彩对比来吸引观看者。比如图中的红衣服、红福字和大红灯笼都突出了人们对来年美好生活的向往和春节的喜庆。而图 5 则用前景化及模糊背景的方式突出了筷子上图画的精妙绝伦以及作画的精细，引导观众将注意力聚焦于正在被雕刻的筷子，增强了视觉效果。此外，视频中还善用特写镜头使得美食前景化，刺激观看者的味蕾，使其对中式美食印象深刻。

3. 取景

取景是指图像中是否存在空间分割线条，这些线条表示图像中各成分之间在空间上被分离或被连接的关系。可以通过矢量、颜色和视觉形状等连接或分离不同的形状^[3]。图 8 是一个庭院，石栏杆和石柱作为分割线，将院子框起来分为院内和院外。它们使得这幅图有了聚焦，吸引观看者将目光聚焦在院内手拿烟花追逐嬉戏的孩子们，突出了春节热闹的气氛。这种空间布局具有一定的对称性，体现了中国人对和谐与平衡的追求，符合“中庸之道”的设计理念。



图 8

（四）概念意义分析

概念意义主要通过及物系统来体现。Halliday 将其细分为六个具体的过程，即物质过程、心理过程、言语过程、行为过程、存在过程和关系过程^[5]。笔者用 Chat GPT 4o 将关键帧对应的字幕进行转录和标注，示例如下：

1. Chopsticks can take on themselves a variety of art forms such as inscriptions, paintings, pyrography, inlays

and carvings.

2. Eating with chopsticks is a real trick for first-time learners.

3. The world becomes colorful thanks to diversified civilizations, and the cultural tensions created by differences possess a unique form of charm.

4. They are the crystallization of Chinese wisdom as well as a symbol of the oriental civilization.

5. First of all, it's because many Chinese food are served hot, making it necessary for the diner to use a tool to avoid direct contact with hot food.

以上为 Chat GPT 4o 随机抓取的五个句子, 其中小句 1 和 5 是物质过程, 5 中动词是 are served, 目标是 many Chinese food, 这句描述了使用筷子的缘由和必要性。物质过程常与使用筷子就餐的画面一同出现, 在视频中出现的频率仅次于关系过程。小句 2、3、4 都是关系过程, 且为包孕型过程归属式。关系过程主要用于强调参与者之间的关系, 在此类宣传中国文化视频的中很常见。视频制作者使用关系过程不仅将筷子与其背后的饮食文化、团圆文化建立联系, 还能进一步与世界文明产生联结。比如小句 4 表明筷子是中国智慧及东方文明的象征, 强调其背后的文化内涵。小句 3 的配图是外国友人和国人一同使用筷子用餐的画面, 画面结与字幕协同作用, 共同强调了文化差异所带来的文化张力别有韵味。

(五) 人际意义分析

Halliday 认为语言的人际功能是指除了具有表达讲话者的亲身经历和内心活动的功能外, 还具有表达讲话者的身份、地位、态度、动机和其对事物的推断、判断和评价的功能。人际功能的实现主要是通过语气、情态、时态和人称代词来完成的。其中, 语气有四种基本类型, 分别是陈述语气、疑问语气、祈使语气和感叹语气^[5]。因为陈述语气的主要目的是提供信息, 而《中国范儿》系列视频的初衷是选取独具中国特色的文化符号进行展示和介绍, 让世界了解更真实的中国, 感受中国文化底蕴。所以《筷子》篇中的人际意义主要靠陈述语气来实现。比如, 小句 1 用陈述语气展示了筷子的多姿多彩, 可以融合题词、刻诗、绘画、烙画、镶嵌、雕镂等艺术形式。而小句 6 中疑问语气的使用则能够吸引观众的注意力, 鼓励观众参与到这种文化体验当中, 使其对使用筷子的缘由印象深刻。

6. Why do Chinese people eat with chopsticks?

(六) 语篇意义分析

语篇意义主要通过主位结构、信息结构和衔接的方式得以体现, 小句 1、2、3、4 的主位均是非标记性主位, 而小句 5 中的“First of all”则是标记性主位。这些主位无论是“Chopsticks”“Eating with chopsticks”还有“they”都将筷子分解成了具体的几个方面进行阐述, 通过述位展示了筷子背后的文化属性。同时, 用“they”代替“Chopsticks”作为主位, 这种切换促进了语篇的连贯性。而标记性主位的使用则强调了使用筷子的缘由, 反映了中国饮食文化中热菜的传统, 强调了烹饪和食用方式的独特性, 更是中国文化的象征, 体现了民族的智慧和生活方式。

五、大模型在标注过程中的局限性与不足

Chat GPT 4o 在标注过程中除了带来了一些积极的影响, 比如提升效率、避免主观性等, 也存在某些局限性与不足。

第一, 标注结果无法做到完全准确。Chat GPT 4o 主要是基于自身的数据库, 结合预训练的模型对语料进行标注。但该模型无法像人一样进行复杂的思考, 缺乏灵活应对的能力, 导致在标注时存在差异。比如 Chat GPT 4o 在随机截取关键帧时会许多重复帧或者无意义的转场画面收录进去, 从而产生误导, 影响结果的准确性。

第二, 对多模态语言的处理尚未完善。Chat GPT 4o 尚不具备直接标注语音、视频等多模态语言的能力, 输入指令后得到的大都是搭载某个软件提取图像、音频, 再输入指令进行标注的回复。与此同时, Chat GPT 4o 未能大规模处理多模态语料, 大批次输入语料后的标注结果误导性很大, 不如分批标注准确。

第三, 对指令的理解精度有限。在实际操作过程中, 有一些内容在 Chat GPT 4o 预训练的数据库以外, 但其在理解指令时并不具备处理这些区域以外的能力。比如, 在生成可视化图表的过程中, 笔者想要进行一下修改, 让其按照手绘图表的样式进行调整, 而生成的结果却大相径庭。

六、结语

本研究以中国文化类视频《筷子: 这个餐具绝没那么简单!》为研究对象, 采用 Chat GPT 4o 进行标注,

并基于 Kress & van Leeuwen 的视觉语法和 Halliday 的系统功能语法理论, 对视频中的视觉模态与语言模态进行深入分析。研究发现, 视频通过叙事性再现和概念性再现, 构建了筷子的使用过程和文化内涵; 在互动意义上, 揭示了视频与观众之间的互动关系和文化价值观的传递; 在构图意义上, 探讨了视频如何通过信息值、显著性和取景等视觉修辞手法, 实现意义构建。在语言模态上, 《筷子》善用关系过程来展示筷子与其他中国文化之间的关系, 以及陈述语气来介绍中国文化, 而主位述位进行切换也保证了语篇的连贯性, 此外, 本研究还评估了 Chat GPT 4o 在标注过程中的局限, 例如标注准确性、多模态语言处理能力及指令理解精度等方面。研究结果表明, 大模型标注技术为多模态话语分析提供了新的工具和思路, 但仍需进一步探索和改进, 以提升其在学术研究中的应用价值。

参考文献:

- [1] 袁小陆, 乃瑞华.“文化中国”国际传播多模态话语意义建构研究[J].外语教学, 2022, 43(05): 23-29.
- [2] 李梦洁, 冯德正, 邓谊.国际多模态话语分析的进展与前沿[J].现代外语, 2024, 47(03): 419-430.
- [3] KRESS, G.& T. van Leeuwen. *Reading Images: The Grammar of Visual Design* (second edition)[M]. London: Routledge. 2006: 179-224.
- [4] 李战子.多模态话语的社会符号学分析[J]. 外语研究, 2003(5): 1-8+80.
- [5] Halliday, M.A.K..L. *An Introduction to Functional Grammar* (second edition)[M].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2000: 21-76.
- [6] 许家金, 赵冲, 孙铭辰.大语言模型的外语教学与研究应用[M]. 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24: 1-127.
- [7] QIN Zimin. Multimodal Discourse Analysis of Bilingual Micro-video “Feel of China”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J]. 言語と文化の研究, 2024:88-103.

Study on the Meaning Construction of Multimodal Discourse in Chinese Cultural Videos Based on LLMs

Qin Zimin¹

¹School of Humanities and Law, North China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Beijing 100144, China

Abstract: This study is based on Kress & van Leeuwen’s visual grammar and Halliday’s systemic functional grammar. Using Chat GPT 4o as an annotation tool, it explores how the visual modality and verbal modality of the Chinese cultural video construct meaning. Through the detailed interpretation of the multimodal discourse in the video, this study shows the cultural meaning embedded in it. It further analyzes the shortcomings of Chat GPT 4o, pointing out its limitations in terms of annotation accuracy, multimodal language processing capability, and comprehension precision of instruction. It is hoped to provide reference value for content creators in telling Chinese stories, as well as useful insights for large language model’s development and training.

Keywords: multimodal discourse analysis;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Chinese culture; large language models

论金爱烂《角质层》中的消费意识形态幻象

苏超慧¹

(1.广州大学, 广东 广州 510006)

摘要: 韩国作家金爱烂在其短篇小说《角质层》中, 述写了资本主义社会中都市女性自我规训的过程。从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理论出发, 能够批判性地揭示出文本所再现的消费主义意识形态的虚幻性, 及其对个体的“询唤”机制的内在逻辑。透过韩国消费社会中青年人酸楚的现实境遇, 《角质层》所折射的, 正是被消费主义意识形态所掩盖的结构性的社会矛盾。

关键词: 金爱烂; 《角质层》; 阿尔都塞; 意识形态; 消费主义

DOI: doi.org/10.70693/rwsk.v1i5.1119

前言

在资本主义消费文化泛滥的当代语境下, 消费社会中个体的生存困境与精神症候日益呈现为物质欲望与阶级身份之间的矛盾纠缠。鲍曼就指出, “消费文化”已成为当前时代的重要特征, 是当代社会运转的核心。¹如今, 使人凝结的社会力量, 是他们作为消费者的活动, 是由他们的消费而构成的生活。²韩国女性作家金爱烂的短篇小说《角质层》(收录于短篇小说集《你的夏天还好吗?》)通过“美甲”“高跟鞋”“旅行箱”等物质符号, 刻画了都市青年女性在消费社会中的自我规训。目前, 国内学界对金爱烂文学的研究多聚焦于其“底层叙事”和“女性书写”, 但从意识形态层面切入的批评较为少见。而弥漫于文本中的“消费文化”, 正是一种意识形态。鲍德里亚就强调, 消费意识形态已经成为当代消费社会最重要的意识形态。³基于此, 本文将透过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和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理论, 穿越文本表象, 揭示《角质层》中所呈现的消费主义意识形态将个体询唤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驯服主体的内在过程, 增强对文本症状解读的批判性, 以期为更好理解包括韩国在内的消费主义社会, 在全球化进程中出现的社会矛盾以及现代性精神困境提供参考。

一、商品符号与阶级身份的意识形态幻象

在资本阿尔都塞在《意识形态和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中指出, 意识形态是个体与其实际生存状况的想象性关系的“再现”⁴, 这种“想象性关系”通过物质实践被不断再生产。在《角质层》中, 出身农村、来到首尔打拼的女主人公对“中产生活”的追求正是这种想象性关系的具象化: 她通过购买“无荧光剂纸巾”“负离子吹风机”⁵等商品, 提高自身的“生活质量”, 意图建构“上流”“得体”⁶的社会身份。在消费意识形态下, 这些所谓高品质的商品被赋予了符号意义, 它们能够表征更得体的社会身份、更高阶层的生活。换言之, 女主人公实际上并不是在消费商品本身, 而是在消费这些商品背后的符码意义。但这些消费行为本质上是向资本主义消费意识形态的屈从。在这种意识形态的宰制下, 寻求自我认同、获得一种社会身份、过一种被认为是有意义的生活, 都需要通过市场中的消费实现。⁷她享受使用有机材质的卫生巾、品味高价豆腐的过程, 并因此感到兴奋和满足。这种心理的满足感正源于资本为消费者建构的关于“平等”的幻象——正如马尔库塞所形容的那样, “如果工人和他的老板享受同样的电视节目并漫游同样的游乐胜地”⁸, 那么他们之间的阶级差异仿佛就“消失”了, 而这种幻象正借由重复不断的消费行为存续。

¹ 齐格蒙特·鲍曼. 工作、消费、新穷人[M]. 仇子明, 李兰, 译. 长春: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010: 2.

² 齐格蒙特·鲍曼. 立法与阐释者[M]. 洪涛, 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0: 223-224.

³ 张一兵. 消费意识形态: 符码操控中的真实之死——鲍德里亚的《消费社会》解读[J]. 江汉论坛, 2008, (09): 23-29.

⁴ 路易·阿尔都塞. 李迅. 意识形态和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续)[J]. 当代电影, 1987, (04): 33-45.

⁵ 金爱烂. 你的夏天还好吗? [M]. 薛舟, 译.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7: 143.

⁶ 金爱烂. 你的夏天还好吗? [M]. 薛舟, 译.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7: 141.

⁷ 齐格蒙特·鲍曼. 工作、消费、新穷人[M]. 仇子明, 李兰, 译. 长春: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010: 68.

⁸ 赫伯特·马尔库塞. 单向度的人: 发达工业社会意识形态研究[M]. 刘继, 译.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4: 9.

作者简介: 苏超慧(2003—), 女, 广州大学人文学院本科生, 主要研究方向为东亚文学与文化。

消费意识形态不仅建构幻象,更以其光鲜的外表遮蔽了背后真实的阶级处境。女主人公为出席友人的婚礼特地穿上了9厘米的高跟鞋,试图构建高贵优雅的“都市丽人”的社会形象,却因仍需要乘坐地铁,不得不踏上“像海螺一样朝地下无限延伸的台阶”⁹,忍受脚部的疼痛,而她那自驾出行的富人朋友只需把高跟鞋脱下放在副驾驶座上,脚上穿着舒适的拖鞋。¹⁰这一细节的对照,从更深层次上折射出消费主义意识形态以华丽的幻象所掩盖的阶级固化的现实本质。小说中,“9厘米的高跟鞋”也与“地铁的台阶”构成了一组核心的对照隐喻。高跟鞋象征主人公对生活质量“提高一拃”¹¹的渴望,而往地下无限延伸的地铁台阶则暗示其实际所处的社会底层位置。外在形象的“向上”与社会地位的“向下”截然割裂,这种空间的对立暴露了意识形态的“颠倒性”——在想象中,个体对其所处的生产关系的认知被消费符号扭曲为虚假的阶级平等乃至的跃升可能。类似地,作品中还提到美甲未普及时,生性克制的女主人公认为在美甲店里消费的女性是懈怠的,而多年后,在美甲店内,疏于护理手部的她则被美甲师调侃为“懒人”。¹²这又是消费主义意识形态对现实生存境况的一种“想象性畸变”¹³的生动展演。

阿尔都塞认为,意识形态通过“询唤”(interpellation)机制将个体塑造为主体。¹⁴在《角质层》中,主人公在日常生活中所面对的,是同事们“别的不管,这个必须”¹⁵的消费建议,是前辈“不管多忙多累,都要把自己打扮得生机勃勃”“这也是竞争力”“这些都是自我管理”¹⁶的亲切责备,也有美甲师“你太懒了,疏于手部护理”¹⁷的玩笑……这些日常话语无不使得主人公在“接受意见”的幻觉中逐渐完成主体认同,将主人公“询唤”为资本逻辑场域的消费主体中的一员。

不仅如此,大都市的消费主义意识形态还将个体建构为“自由消费者”的主体,使“我”对自己“有资格”作出“超过一拃”这种消费选择深信不疑,¹⁸并且误认自己看似自由的消费选择为完全自主的行为。因为主体“一定会在他的物质的实践活动中作为一个自由的主体来标铭自己的观念”¹⁹。《角质层》中的主人公眼光毒辣,善于识别高档货、在特价百货商场中“淘宝”,看似精明。但从鲍曼对消费主义的批判的视角看来,她的购物技巧越是醇熟,她就越是愚蠢的公民。²⁰因为市场的意识形态早已把她训练成消费者,剥夺了她拒绝市场诱惑的自由,她的对商品的掌控感亦无从谈起。²¹而主人公所谓的自由消费需求也都是被资本社会中的文化、媒体等制造出来的“虚假的需要”²²。这种自由仅仅是在资本操纵下的生产力发展而引起的消费范围的扩大,以及商品的迭代,是一种“给定自由”²³。都市丽人们享受着美甲过程的“从容和权利”²⁴,女主人公甚至将穿着高跟鞋时的不适感视作一种“特权”²⁵。事实上,无论她们如何与这些需求相一致,这些需求始终都是“要求压制的占统治地位的社会的产物”²⁶。消费社会中,人们的欲望本身已被格式化为某种社会控制逻辑的一部分,他们无不深陷资本逻辑“召唤”的陷阱,在“成为自己”的幻象中践行着资本权力的指令。

二、消费仪式与主体内化的意识形态规训

幻象借由物质实践产生,因而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具有一种物质存在,通过各种“仪式”落实到实践中,并无时无刻存在于人们的日常生活中。²⁷《角质层》中主人公的购物行为就无异于一场消费主义的实践仪式。她大量购买标榜进口而溢价的日本生啤等在资本逻辑统摄下被“赋魅”的商品,并从中获得愉悦,还坦言如果这种幸福感可以购买的话,她愿意“继续”²⁸“本来以自我为衡量尺度的幸福被投射在消费幻象的商品消费中”²⁹,又构

⁹ 金爱烂.你的夏天还好吗?[M].薛舟,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7:140.

¹⁰ 金爱烂.你的夏天还好吗?[M].薛舟,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7:158.

¹¹ 金爱烂.你的夏天还好吗?[M].薛舟,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7:144.

¹² 金爱烂.你的夏天还好吗?[M].薛舟,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7:153.

¹³ 路易·阿尔都塞,李迅.意识形态和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续)[J].当代电影,1987,(04):33-45.

¹⁴ 路易·阿尔都塞,李迅.意识形态和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续)[J].当代电影,1987,(04):33-45.

¹⁵ 金爱烂.你的夏天还好吗?[M].薛舟,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7:143.

¹⁶ 金爱烂.你的夏天还好吗?[M].薛舟,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7:143.

¹⁷ 金爱烂.你的夏天还好吗?[M].薛舟,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7:153.

¹⁸ 金爱烂.你的夏天还好吗?[M].薛舟,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7:144.

¹⁹ 路易·阿尔都塞,李迅.意识形态和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续)[J].当代电影,1987,(04):33-45.

²⁰ 齐格蒙·鲍曼,克里斯·泰斯特.与鲍曼对话[M].杨淑娟,译.台北:远流图书公司,2004:126-127.

²¹ 齐格蒙·鲍曼.工作、消费、新穷人[M].仇子明,李兰,译.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10:68.

²² 赫伯特·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发达工业社会意识形态研究[M].刘继,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4:6.

²³ 舒练.穿越幻象:基于资本逻辑的消费主义解构——消费主义泛滥全球的逻辑脉络分析[J].学术探索,2020,(11):33-40.

²⁴ 金爱烂.你的夏天还好吗?[M].薛舟,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7:148.

²⁵ 金爱烂.你的夏天还好吗?[M].薛舟,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7:141.

²⁶ 赫伯特·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发达工业社会意识形态研究[M].刘继,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4:6.

²⁷ 张一兵.阿尔都塞:社会再生产中的国家意识形态规训装置——以阿尔都塞《论再生产》为中心[J].江苏社会科学,2020,(01):154-163+9-10.

²⁸ 金爱烂.你的夏天还好吗?[M].薛舟,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7:143.

成了一种完全自愿又自我满足的自我奴役。

尤为突出的是,主人公在美甲店中做的手部护理,同样是一次盛大的意识形态“狂欢”,一次消费主义意识形态的物质化实践。文本中的美甲店可以视为消费主义意识形态机器的一个现代变体,是资本逻辑场域的缩影。从去除指甲周围的毛刺、抹搽营养液,再到涂上指甲油,整个过程细致又复杂。主人公对美甲过程“被照顾”的幻想的沉溺,正体现出作为消费主义意识形态实践主体的她是如何“自由地”接受自身的臣服地位的。³⁰基础护理步骤中被去除角质层——人体表皮正常的生理屏障,在都市场域内却异化为“不整洁”的象征。而美甲这一消费行为将身体的一部分转化为“最昂贵的饰物”³¹,则隐喻着消费主义对个体的劳动属性的剥离,将其异化为符号化的“商品”。因为原生的、粗糙的双手,正是传统印象中劳动者的象征。这种“身体改造”被社会规训为“自我管理”的正当需求,甚至成为了职场人的“竞争力”,与绩效挂钩。勤于护理手部的人成为被推崇为“整洁”的模范,而不做这种过程繁复的手部护理的人,则被视为“懒惰”,这恰是消费主义意识形态下的美业利用特定主体对个别主体的支配与排除。³²店员背台词般的程式化的推销话术、美甲师将顾客的角质用纸巾包起展示时兴奋的神情、“我”看着灯光下自己漂亮的美甲时露出的孩子般的笑容,是意识形态镜像结构下主体之间的相认,³³也都无疑构成了这场表演性质的仪式的一部分。《角质层》将这种完整的、已经形成逻辑闭环的、将个体询唤为服从资本秩序的主体的仪式性消费展现得淋漓尽致。

意识形态通过“招唤”使个体内化权力关系,成为主动服从规范的主体。³⁴《角质层》中,“我”对同事们追求高档品牌的购物建议深感认同,眼光变得越来越高;又遵循职场前辈那套从皮肤状态到个人形象、再到社会评价与职业竞争力的意识形态链条,并将它们内化为自己的行为准则。由此观之,皮肤、指甲护理在文本中已超越单纯的生理需求层面,而被编码为“职业素养”的能指符号,其背后隐含着消费意识形态对个人身体进行规训的权力逻辑。当“我”将前辈的评价标准转化为自我审视的尺度时,意识形态已成功在主体内部建立起“自我监督”的机制,这正是阿尔都塞所言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区别于“镇压性国家机器”的重要特征——它是“淡化的、隐蔽的,甚至是象征性的”³⁵。意识形态通过文化、伦理、价值等意识形态符号系统,使个体在“自愿服从”中完成对权力结构的主动维护。文本中主人公消费品位的改变与提升,本质上是她将资本编织的消费幻象内化为“自我需求”的体现,反映出消费主义意识形态认知框架对主体感知系统的重塑,使其消费行为与职业发展、社会身份乃至个人价值被建构为具有必然因果关系的认知图式。

三、生产关系再生产与阶级困境的循环

阿尔都塞指出,保障生产关系的再生产是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重要功能。³⁶这种再生产通过文化符号系统,将个体无意识地整合进资本主导的剥削秩序,认同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关系的合法性。《角质层》中主人公对消费需要产生了依赖,声称消费让她感觉到自己“正在参与大城市旺盛的生产活动”³⁷。而她虽然工作已有三年,但几乎无积蓄的生存境况,也并不能简单归因于个人理财能力的问题——因为她不过是“追随同龄女性潮流和规则的人”³⁸。当“月光族”“债奴”成为韩国社会青年的群体性症候,说明这一现象很大程度由宏观层面的资本主义消费意识形态的成功渗透造成,实际上也根源于经济社会结构性矛盾等公共议题。正如鲍曼所言:“消费社会是一个信用卡社会;而不是存折社会。”³⁹而这恰恰是资本精心设计的“债务陷阱”——通过消费信贷体系以及“高品质生活”的宣传将劳动者未来的劳动力价值提前透支,从而确保其自觉地、在更长周期内依附于资本生产体系。

意识形态温和而隐秘地让个体将“想象的生存条件”误认作“实在的生存条件”。⁴⁰主人公将自身超前消费行为合理化的表述——“我还年轻,赚钱的日子还很多”⁴¹,正是这种误认机制的典型体现。她以盲目乐观的自我安慰,掩盖了自身被资本逻辑支配的真实处境。她甚至将资本逻辑下带有剥削性质的生产和消费浪漫化地视作都市的新陈代谢,她从支付账单中,得到自己可以更好地进行生产活动的暗示。⁴²随之形成的经济困境亦迫使其通过劳动继续维持其高消费,从而巩固了资本主义劳动力再生产的链条。这种意识形态遮蔽机制维系了生产关系

²⁹ 舒练.穿越幻象:基于资本逻辑的消费主义解构——消费主义泛滥全球的逻辑脉络分析[J].学术探索,2020,(11):33-40.

³⁰ 路易·阿尔都塞,李迅.意识形态和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续)[J].当代电影,1987,(04):33-45.

³¹ 金爱烂.你的夏天还好吗?[M].薛舟,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7:154.

³² 路易·阿尔都塞,李迅.意识形态和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续)[J].当代电影,1987,(04):33-45.

³³ 路易·阿尔都塞,李迅.意识形态和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续)[J].当代电影,1987,(04):33-45.

³⁴ 路易·阿尔都塞,李迅.意识形态和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续)[J].当代电影,1987,(04):33-45.

³⁵ 路易·阿尔都塞,李迅.意识形态和意识形态国家机器[J].当代电影,1987,(03):100-112.

³⁶ 路易·阿尔都塞,李迅.意识形态和意识形态国家机器[J].当代电影,1987,(03):100-112.

³⁷ 金爱烂.你的夏天还好吗?[M].薛舟,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7:143.

³⁸ 金爱烂.你的夏天还好吗?[M].薛舟,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7:144.

³⁹ 齐格蒙特·鲍曼.工作、消费、新穷人[M].仇子明,李兰,译.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10:75.

⁴⁰ 路易·阿尔都塞,李迅.意识形态和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续)[J].当代电影,1987,(04):33-45.

⁴¹ 金爱烂.你的夏天还好吗?[M].薛舟,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7:144.

⁴² 金爱烂.你的夏天还好吗?[M].薛舟,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7:143.

再生产的恶性循环,即普通劳动者越是通过消费寻求身份认同、获得心理满足,就越需要出卖更多劳动力以维持消费水平,从而进一步巩固资本主义生产系统。而大量表面的、符号化、泡沫化的消费,彻底阻断了阶级跃升的可能。因而持续的消费行为、长期的“无积蓄”状态,又更进一步地加剧了工薪阶层的阶级固化。

文本中的“旅行箱”意象深刻隐喻了这一困境。主人公千辛万苦携带旅行箱登上N首尔塔与友人见面,却得知朋友已不打算去旅行了。“我们不像是出门或者即将出门,倒像是被驱逐到远方的人。好像从很久很久以前,我们就拖着如此庞大的行李箱走来走去。”⁴³这是文末主人公的独白,也构成了对消费主义意识形态下个体异化的生动诠释。行李箱作为流动性的象征,在此成为对于资本宰制的意识形态的反讽——消费主义许诺自由与流动,却将个体禁锢于物质累赘与阶级固化的双重牢笼,被囚禁其中的人们也因此成了消费社会的“弃儿”。

结语

金爱烂在接受中国科学报的采访时曾指出,文学是将痛苦之人的声音故事化、语言化的过程,而比起“温暖的”语言,“准确的”语言更能还原人的痛苦。⁴⁴在《角质层》中,她恰以真实又细腻的笔触,述写了都市青年工作生活的酸楚,更揭露出浸润于资本宰制的意识形态中的他们欲壑难填、精神贫乏、个体异化的现实困境。金宝英通过对各种生活细节的真实的再现,不仅从日常生活微观权力的角度,揭示出被消费社会的“幻象”所掩盖的阶级固化的矛盾,更构成了对当代意识形态微观机制的敏锐剖析。而当这一“症候文本”被置于阿尔都塞意识形态理论视域下,消费主义意识形态通过物质实践,将个体询唤为顺从的主体的内在逻辑,及其所遮蔽的结构性的社会矛盾便暴露无遗,也为更好理解消费意识形态在当代文学作品中的呈现提供了更具批判力量的阐释。

参考文献:

- [1] 齐格蒙特·鲍曼.立法与阐释者[M].洪涛,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
- [2] 齐格蒙特·鲍曼;契斯·泰斯特.与鲍曼对话[M].杨淑娇,译.台北:远流图书公司,2004.
- [3] 齐格蒙特·鲍曼.工作、消费、新穷人[M].仇子明,李兰,译.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10.
- [4] 赫伯特·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发达工业社会意识形态研究[M].刘继,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4.
- [5] 金爱烂.你的夏天还好吗? [M].薛舟,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17.
- [6] 路易·阿尔都塞,李迅.意识形态和意识形态国家机器[J].当代电影,1987,(03):100-112.
- [7] 路易·阿尔都塞,李迅.意识形态和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续)[J].当代电影,1987,(04):33-45.
- [8] 张一兵.消费意识形态:符码操控中的真实之死——鲍德里亚的《消费社会》解读[J].江汉论坛,2008,(09):23-29.
- [9] 张一兵.阿尔都塞:社会再生产中的国家意识形态规训装置——以阿尔都塞《论再生产》为中心[J].江苏社会科学,2020,(01):154-163+9-10.
- [10] 舒练.穿越幻象:基于资本逻辑的消费主义解构——消费主义泛滥全球的逻辑脉络分析[J].学术探索,2020,(11):33-40.
- [11] 午荷.书写普通人忍耐困境的英雄一面[N].中国社会科学报,2021-02-25(002).

On the Ideological Fantasy of Consumerism in Kim Ae-ran's "Cuticle"

Su Chaohui¹

¹ Guangzhou University, Guangzhou, China

Abstract: In the short story "Cuticle", the Korean writer Kim Ae-ran offers a compelling perspective on the process of discipline among urban women in a capitalist society. According to Louis Althusser's theory of the ideological state apparatus, it is possible to critically reveal the illusory nature of the ideology of consumerism reproduced in the text and the inner logic of its mechanism of "interpellation" of the individual. Cuticle reflects the structural social contradictions that exist within the Korean consumer society and the ideology of consumerism that is used to mask these contradictions.

Keywords: Kim Ae-ran; Cuticle; Louis Althusser; Ideology; Consumerism

⁴³ 金爱烂.你的夏天还好吗? [M].薛舟,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7:167.

⁴⁴ 午荷.书写普通人忍耐困境的英雄一面[N].中国社会科学报,2021-02-25(002).

与中国接壤的南亚东南亚国家主流媒体中的中国形象呈现研究 ——以中国斡旋沙特伊朗建交的相关报道为例

李博晔¹ 黄芊^{2*}

(¹ 云南师范大学, 云南 650500, ² 云南大学, 云南 650500)

摘要: 在全球权力转移与数字地缘政治交织的背景下, 非西方世界如何解码中国的新型全球治理实践, 成为突破“中心—边缘”认知范式的重要切口。本研究以2023年沙伊和解事件为棱镜, 考察南亚—东南亚7个陆地接壤国家(印度、尼泊尔、越南、缅甸、老挝、不丹、巴基斯坦)主流媒体对中国中东调解角色的认知建构机制。探讨该区域在涉华报道中如何建构中国的国家形象。本文从报道规模、情感倾向、叙事框架、语言策略等维度展开分析, 总结出该区域媒体主要构建了“和平调解者”“战略扩张者”与“现实主义行动者”三类中国形象。但由于部分国家相关报道的缺失, 无法全面代表与中国陆地接壤的南亚东南亚国家主流媒体, 希望在未来的研究中得以继续深入研究。

关键词: 国家形象; 沙伊复交; 南亚东南亚主流媒体

基金项目: 云南师范大学国家级大学生创新创业培训项目专项资助经费 (202310681039)

DOI: doi.org/10.70693/rwsk.v1i5.961

一、研究概述

随着在国际事务中影响力的持续提升, 中国在全球舆论场中的国家形象构建日益成为国际传播与新闻传播学的重要研究议题。近年来, 中国在中东、非洲、拉美等地的外交行为频繁引发国际社会关注。2023年3月, 在中东局势持续动荡的背景下, 中国成功促成沙特与伊朗在北京举行秘密会谈。3月10日, 三方共同发表联合声明, 宣布沙伊关系将全面恢复。在中国斡旋下, 沙特阿拉伯与伊朗达成协议, 同意恢复自2016年断绝的外交关系。^[1]沙伊矛盾曾是中东地区影响最广泛的矛盾之一, 两国在北京宣布复交, 有望带来积极、正面的连锁效应, 为也门、叙利亚、伊拉克和黎巴嫩等多个地区热点问题降温。^[2]该事件被广泛视为中国在中东事务中实现外交突破的标志性成果, 也是中国积极推进全球安全倡议、展现“大国调解者”形象的重要体现。

中国成功斡旋沙特与伊朗实现复交是中国外交的一项重大成果, 展现中国在中东事务中的影响力不断增强的同时进一步提升了其在国际社会中的形象与地位。与中国地缘接壤的南亚与东南亚国家与中国在地理、安全和经济等方面有着密切联系。其主流媒体对中国斡旋中东事务的报道反映出各自对中国国际影响力的判断的同时也反映出它们在区域格局中的中间与态度。这些国家并未直接参与中国斡旋沙特与伊朗建交的事件进程, 但其主流媒体的报道仍然具有重要意义。其主流媒体报道内容与方式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该国对中国国际行为的关注程度、价值判断以及战略态度。通过分析这些媒体是否报道、报道的数量和倾向, 可以观察这些国家如何认知中国在中东地区发挥的作用、是否认可其国际调解者的身份, 进而折射出中国国家形象在周边区域的外部感知状况。

二、研究论述

国外学者对国家形象的研究较早, 美国学者马丁等认为, 国家形象是个体对某一国家的综合感知和评价。^[3]是关于某一具体国家的描述性、推断性、信息性的信念的总和。其中描述性信念反映了个体对国家客观特征的认识。信息性信念主要来源于如广告、媒体、口碑等渠道的外部信息传播, 这些信息构成了个体对国家的具体知识。

作者简介: 李博晔(2003—), 男, 云南师范大学传媒学院在读学士, 研究方向: 舆情研究, 智能传播;

黄芊(2002—), 男, 云南大学新闻学院在读硕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 计算传播, 智能传播。

通信作者: 黄芊

^[4]巴洛古认为国家形象是通过感知、情感及整体评价共同作用形成的对某一国家的总体认知结构,其由个体对国家各类特征的认知和由这些认知所引发的情感反应共同构成。^[5]个体通过对这些特征的评估形成对国家的整体印象。国家形象的认知结构依赖于外部信息输入的有效性 with 情绪唤起的强度。在现代媒体高度可视化、情绪化、框架化的信息生产体系中,国家形象不仅是媒体呈现的客体,更是被反复重构的传播产物。国家形象的建构不仅取决于国家自身在国际体系中的行为与表现,更取决于国际媒体系统如何设置议题、选择框架并分配叙事权力。尤其是在重大外交事件中,媒体话语策略对国家形象的引导效应不容忽视。

徐小鸽是我国最早开始研究国家形象的学者,他认为国家形象是“一个国家在国际新闻流动中所形成的形象,或者说是一国在他国新闻媒介的新闻言论报道中所呈现的形象。”新闻媒介通过报道某个国家的事件、人物和社会状况,塑造了该国在国际社会中的形象。^[6]综合国内外学者对国家形象的研究,结合本文的研究对象与中国陆地接壤的南亚东南亚主流媒体与研究内容,本文将国家形象界定为与中国陆地接壤的南亚东南亚主流媒体新闻言论报道中所呈现的对中国的整体认知与感知印象。本文以中国相邻国家主流媒体的相关报道为样本,从框架类型、情感倾向和立场标注等视角探究其话语特征及中国形象的建构模式。

三、样本选择及类目构建

在本研究计划分析与中国接壤的南亚东南亚国家主流媒体对中国斡旋沙特伊朗建交事件的报道。具体来说,本研究期望涵盖印度、巴基斯坦、缅甸、尼泊尔、老挝、不丹、越南等邻国主流媒体,并于每个国家中选择三个主流媒体对该事件的报道作为研究对象。沙伊复交并非持续性事件,但在之后如伊朗重新开放了其在利雅得的大使馆以及伊斯兰合作组织在吉达的总领事馆和代表处,2023年8月17日,在沙伊断交七年后,伊朗外长首次对阿拉伯进行访问这类事件再次对沙伊复交进行报道。由此在检索报道时以“Saudi Iran”为关键词,时间设定在2023年3月1日至2023年9月1日。

在印度以上述关键词和时间进行检索,报道来源复杂多样,在对报道来源进行筛选之后选择《印度时报》、《印度斯坦时报》、《印度教徒报》三家媒体作为研究样本来源。在尼泊尔用同样方式检索筛选后选择《喜马拉雅时报》、《加德满都邮报》、《坎蒂普尔报》作为尼泊尔报道来源。在巴基斯坦用同样方式检索筛选选择《巴基斯坦通讯社》、《国民报》、《黎明报》。在越南用同样方式检索筛选后有且仅有《人民报》对相关事件进行报道,由此选择《人民报》作为越南报道来源。在对于样本的选择方面,笔者排除了不丹、缅甸、老挝,其最主要原因在于资料获取可行性极低通过在 Factiva 新闻数据库及在官方网站中对相关媒体的检索与筛选,发现以下三个国家的媒体并未对该事件进行报道:不丹、缅甸、老挝。同时不丹、老挝与缅甸在中东地区的外交、能源或地缘合作联系较为有限,中国调解沙伊复交对其国家战略、安全局势或区域角色影响较小,因而相关报道中更少体现出国家立场或情感表达,不具备充分观察“国家形象情感倾向”的研究价值。

以沙特伊朗和解、恢复外交作为相关标准,对十家媒体所有“Saudi Iran”报道进行阅读并筛选删减后,共获得相关报道 71 篇。为了从整体上把握四方对事件报道的基本概况,本文参考已有相关研究,共设定报道数量、报道主题、新闻体裁、报道倾向、四个类目,对报道样本进行编码,具体如下:报道数量:按照报道时间,对 2023 年 3 月 1 日至 2023 年 9 月 1 日共计六个月内,中国、美国与中东地区的报道数量进行统计并分析其变化趋势。报道主题:本文根据数据库与原网站对新闻稿件的主题划分,共将沙伊复交的报道题分为军事行动、政治、国家公共安全、外交关系与事务、国际关系新闻体裁:根据样本实际情况,将新闻报道体裁分为消息、通讯、深度报道、评论文章四种。报道倾向:基于报道中的情感词将报道的整体情感倾向分为正面、中性、负面。

本文主要采用文本分析、内容分析两种研究路径。通过内容分析法从报道数量、主题、体裁、倾向性四个维度对报道样本进行概括性呈现。内容分析方法能够有效提取特定时期内的信息传播重点,揭示信息在特定阶段的表达趋向、态度立场与语义变化,归纳出其整体的叙事结构与倾向性特征。

四、报道样本分析

报道的数量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不同国家对相关事件的重视程度,老挝、缅甸、不丹三国并未对事件做出相关报道。从报道数量上看,巴基斯坦三家主流媒体对沙伊复交事件的报道数量最多,印度比巴基斯坦略少一点。相比之下,尼泊尔和越南的报道数量则显得较为不足。巴基斯坦媒体对中国斡旋沙特与伊朗复交事件的报道数量居于前列,超过印度等区域大国,这一现象与中巴之间长期稳定且紧密的双边关系密切相关。中国与巴基斯坦自建交以来即建立了高度互信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特别是在“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巴经济走廊的推进深化了两国在经济、安全、外交等多方面的合作。由此巴基斯坦主流媒体对于中国外交行为的关注度极高。中印两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两个国家,地理上接壤,且在经济、政治、军事等多个方面均互有交集。两国的外交关系复杂且具有多维性,既有经济合作,也有边界争端。尤其是在过去几十年中,中印边界争议和战略竞争一直是两国关系中

的重要议题。两国虽在一些领域合作但在地缘政治和战略布局上一直存在竞争。对于印度而言,沙特和伊朗恢复外交关系是一个值得高度关注的重要事件。尼泊尔、越南稍显不足。在事件的初期阶段即2023年3月10日中国、沙特和伊朗三国在北京发布三方联合声明,宣布沙特和伊朗达成双边协议时,巴基斯坦、印度与尼泊尔媒体迅速响应,相关报道数量达到顶峰,占据整体报道的75%以上。在事件发生日媒体对于事件的关注度最高。而后事件热度随时间推移而降低。4月的报道数量显著下降,在5月份出现了报道空缺又于6月份略微回升的现象。2023年4月6日,沙特伊朗外长七年来首次正式会晤。2023年6月7日,伊朗驻沙特阿拉伯大使馆在两国外交官员的见证下,于当地时间6日正式重开。由于两个后续事件的发生,4月相关报道虽急剧下降但并未出现空缺,在5月份出现了报道空缺,6月份略微回升。

从报道趋势来看,报道整体趋势受事件影响阶段性变化。巴基斯坦、印度、尼泊尔变化趋势相似,在事件初期沙伊双方签署《北京协议》时报道数量在本国所有报道数量中占比最高,4月下降,5月出现报道空缺,6月、7月由于伊朗驻沙特阿拉伯大使馆重开报道数量略微回升。越南在3月、4月对相关事件分别有一篇报道,5月及以后没有任何报道。尼泊尔和越南的总报道数量较少,媒体对事件的报道趋势变化相对平缓,印度的报道数量则呈现出急剧下降的趋势,表明印度媒体对这一事件的关注度较高,但随着事件的进展,报道热度迅速消退。

四国主流媒体报道整体以通讯、消息、深度报道与评论文章四种体裁为主。各国对不同新闻体裁使用占比各不相同,越南、尼泊尔媒体对该事件的关注较为有限仅有通讯、消息,报道风格以传递事件进程为主相对简洁。报道内容多为基本事实的介绍而缺乏深入分析。印度和巴基斯坦媒体对该事件进行更多的分析与评论。评论类报道反映两国媒体对中国斡旋角色的高度关注的同时展现了对中东外交局势的深刻理解和对中国斡旋新闻的担忧。

报道倾向性分析如图1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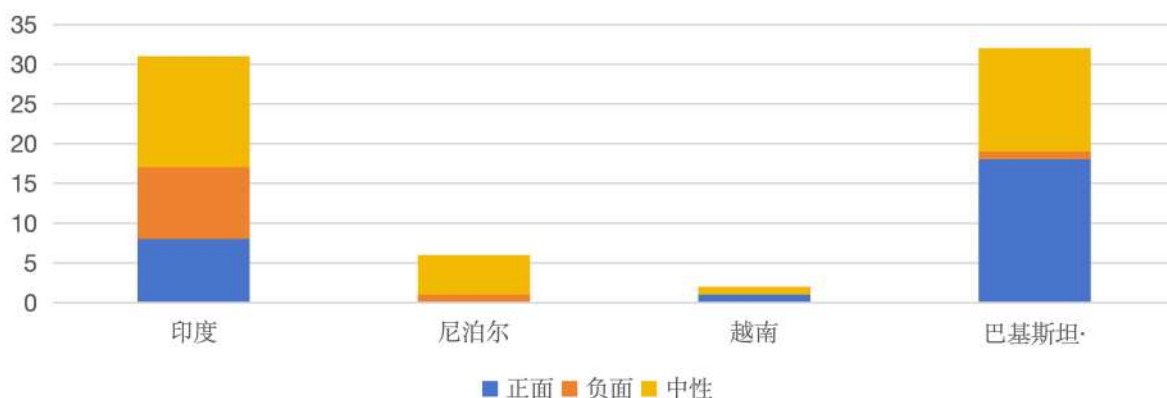


图1 报道倾向性情况

越南的媒体以陈述、分析事件为主,且在报道方面主要阐述沙伊复交,虽然在报道中用到了“斡旋”此类情感倾向偏正面的词汇,但占比极少且仅于交代事件过程中,提及感情色彩的流露不明显。由此越南整体上的情感倾向处于中立。尼泊尔对沙伊复交的相关报道中中立报道占比83.4%,负面占比16.6%,总体呈现中性偏负面的情感倾向,其中中立报道同越南一样以陈述、分析事件为主。而其负面倾向的报道通过列举中国外交中一些如“对西方的愤怒爆发”和“中国在台湾地区事务上的立场引发一定舆论反应。”表达出对中国外交政策的不满,带有一定消极或批判意味。在印度媒体的报道中,中立报道占比最大约为45%这一趋势表明,在涉及沙伊复交的报道中,印度更多报道无明显情感倾向的、更加客观的新闻。这部分报道的主要形式是通讯和消息,内容围绕沙伊复交过程来报道,而不在语言上过度渲染或添加主观感情色彩;负面报道次之,占比约29%,该类报道主要是评论文章,对事件或话题进行观点陈述和分析的报道以表明印度对中国的担忧或警惕;正面报道占比最少约为26%,此类报道主要是通讯,在其中肯定中国斡旋沙特伊朗建交的积极作用。在对巴基斯坦主流媒体关于中国斡旋沙特与伊朗复交事件的32篇报道进行情感倾向分析后,结果显示:正面报道占据主导,共计18篇,占总样本的56.25%;中性报道13篇,占40.63%;而带有负面情绪的报道仅有1篇,占比3.13%。巴基斯坦媒体在此议题上整体呈现出明显的正面态度。在媒体叙述中,中国被频繁塑造为“和平缔造者”与“负责任大国”,其外交努力不仅有助于缓解中东紧张局势,也被视为地区国家(包括巴基斯坦)带来潜在发展机遇的积极力量。即便是那一篇带有负面倾向的报道,其负面倾向更多集中于大国博弈的现实复杂性和对美国以色列“破坏者”形象的塑造描述,而非直接否定中国的外交斡旋角色。这种高度一致的积极态度反映出中巴之间长期稳定的战略合作关系,也体现了巴基斯坦媒体在涉华议题上的认知倾向。

尼泊尔、越南的相关报道更关注沙特伊朗和解过程本身报道相对客观中立,印度自身角度出发对事件进行报道更关注中国对印度利益的影响,正面负面均有涉及。巴基斯坦主流媒体在相关报道中整体立场明显偏向积极正

面。

五、媒体报道的叙事文本分析

(一) 角色

中国为中东局势稳定作出了重大贡献。2022年12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问沙特并出席中国同海湾合作委员会六国首次峰会。2023年2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见伊朗总统易卜拉欣·莱西,这是伊朗领导人20年来首次对北京进行国事访问。在对于中国角色的塑造上,越南媒体整体呈现出中国作为和平的推动者形象。2023年3月中国斡旋沙特伊朗建交。越南在对相关事件的报道中明确提到在中国的斡旋下两国达成协议同意恢复外交关系,同时直接引用中国外交官王毅的评价“沙伊复交是对话与和平的胜利”,进一步加强了中国在该事件中的积极作用。

在巴基斯坦主流媒体对中国斡旋沙特与伊朗建交事件的报道中,中国并非被简单设定为一个中立协调者,而是在多重话语逻辑中被赋予了积极、主导与结构性等复合型角色。作为“和平调解者”,中国被频繁嵌入以“积极贡献”“外交胜利”“建设性力量”等措辞构建的叙述中,通过积极正面词汇反复强调其在事件推进中的核心作用。这种语义赋权体现出媒体在态度评价维度上对中国行为的高度正面认同。同时,中国被进一步建构为“全球秩序重塑者”。其主流媒体将此次斡旋置于美国全球影响力衰退与多极秩序崛起的宏观图景之中,强化中国在地缘政治重构中的能动性合法性。将中国建构为一个具有道义正当性、制度吸引力与现实利益协调力的多维角色形象,充分反映出中国在区域外交中的话语权上升与影响力拓展。

尼泊尔方面展现出一种复杂、矛盾的中国角色。一方面肯定中国的积极斡旋作用,在尼泊尔媒体关于沙特与伊朗恢复外交关系的系列报道中,中国普遍被设定为本次事件的和平调解者。尽管相关报道整体语气保持中立,缺乏明显情绪化修饰,但在具体的事件叙述与背景交代中,用积极正面词汇呈现出对其角色的肯定并未削弱中国的实际推动作用。另一方面质疑中国推动沙伊复交的动机。如在尼泊尔媒体报道标题中“unfamiliar”(陌生)一词在语义上中立,但结合其隐含着对中国此前缺席全球外交的批评,该词暗示其当前角色的“非传统性”与“过渡性”。同时在报道中将中国与美俄等“老牌全球强权”对比,强化了“新崛起国家”与“既有秩序维持者”之间的隐性权力区隔给中国赋予了逐渐试图插足旧秩序的参与者身份。在分析中美角色替换时,尼泊尔方面有报道将中国调解行为置于美中竞争框架中分析,将中国描绘为“战略挑衅者”;将中国斡旋行为解读为对美国在中东影响力的有意削弱与挑战,而非出于和平理念的积极外交参与。其报道中通过一系列关联性叙述,将中国调解行为与其全球能源利益绑定。指出中国是中东能源出口的最大客户,且与伊朗之间存在四千亿美元的投资承诺。通过这种叙述方式以表面提供客观事实支持的方式将中国在中东地区的介入动因与经济利益深度挂钩从而质疑其外交中立性。尼泊尔方面在情绪色彩的具体用词方面使用使用负面修辞解读中国在地区事务中的角色,将中国建构为一个“利益引导的调解者”而非“中立调解人”的角色。

尼泊尔所呈现的中国国家形象稍显复杂。其媒体在相关报道中确认了中国外交在区域冲突调解中的积极作用,同时其报道也通过精细的修辞和结构安排,强化中国“非中立、非道义”的外交印象,构建出一个介于“和平推动者”与“利益引导的调解者”之间的角色。

印度媒体主要从中印战略竞争的视角报道此事件,强调中国的中东行动对印度地区利益和安全的影响。这类报道认为,这种关注源自两国长期以来的地缘政治竞争和历史性摩擦。中国在中东和印度洋的外交行动引发了印度对其传统地位和安全利益的深刻担忧。印度与中国之间的边界争议自1962年的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以来便未能得到彻底解决。虽然两国在经济和文化交流上有所发展,但边界问题和两国之间的不信任感依然存在。

印度报道在描述中国外交行为时通过一系列高度价值化的表达手法,对中国进行了负面政治定性。其部分媒体使用负面修辞解读中国在地区事务中的角色强化中国在东亚、南亚和大洋洲的压迫性形象。在叙述其与周边国家的关系时将中国设定为一个拒绝妥协、不尊重邻国主权、动辄诉诸武力的“新殖民主义者”。而当中国在中东扮演和平调解者时,媒体使用情绪化词语评价中国外交动向,语义上形成了对中国全球行为“合法性”的系统性削弱。一些评论中使用‘主宰’等词汇来强调中国在该地区扩大影响力的行为特征。

印度媒体报道将中国调解行为置于美中竞争框架中分析,强调中国是潜在的全球秩序构建者与旧有霸权的替代者而非单纯调解者。将中国斡旋行为置于全球权力更替的框架下,表现出中国在国际秩序中提升话语权、参与制定新规则的意图。“Supplant”(取代)内在语义具有极强的替代性与权力位移感,暗示着中国并非在现有框架下协同合作,而是在寻求取而代之。同时印度媒体在报道中通过突出“野心”“挑战”“替代”等词汇,将中国扮演的中立的“和平调解人”角色转变为一个在国际秩序中跃跃欲试的“挑战者”,希望提升其在国际事务中的话语地位。

中国的调解行为被视为高度策略化、功利的行为。媒体倾向于将其解释为“战略布局”“形象管理”或“现实利益”,其新闻报道中将中国的调解行为视为其扩展在中东乃至全球地缘影响力的重要手段,特别是借此挑战美国

在中东的传统主导地位。同时将能源安全看作中国斡旋沙特与伊朗恢复外交关系的核心驱动力之一。作为全球最大石油进口国,中国依赖中东地区提供大约40%的石油供应,中东地区的稳定对于中国来说至关重要。中国在推动两国和解实质上是在通过外交手段确保自身的能源供应安全。通过斡旋两国恢复外交关系,中国不仅能够促进地区的和平,还能进一步巩固其在中东的经济与能源利益。

总体而言,印度媒体相关报道中呈现出的中国国家形象呈现出复杂多样的特点,其媒体报道在肯定中国和平的推动者的同时质疑中国调解行为的动机

(二) 布景

越南相关报道数量仅有2篇且篇幅简短,其媒体在事件整体背景的描述上在将沙伊复交事件置于长期教派冲突与地缘竞争的背景中,通过铺陈伊沙关系缓和的时间链条与多轮谈判背景构建出“长期对立、渐进缓和”的历史背景。其报道中提及自2021年起双方即在伊拉克与阿曼斡旋下展开多轮接触但未能取得实质进展,直到2023年3月中国主持谈判才实现关系正常化。强调当前的外交成果具有“缓和冲突”的转折性意义。报道语境构建出中国作为和平推动者的角色。

巴基斯坦主流媒体在报道中国斡旋沙特与伊朗建交事件时,构建了一个多层次、嵌套式的布景与语境体系,赋予该事件以深刻的历史连续性和现实战略意义。从历史脉络上看,其媒体回溯了沙伊关系的演变路径,包括1979年伊朗伊斯兰革命、沙特对伊拉克的支持、2016年沙特处决什叶派教士后引发的断交风波等节点事件。这些历史材料不仅作为事实性叙述呈现,更在话语层面上构成一种“不可避免的冲突历史”的宏大背景框架,为当前复交的“意外性”提供了叙事张力。在地缘政治语境方面,媒体将中国斡旋嵌入“美中竞争”“单极秩序终结”与“多极化趋势兴起”的全球权力转型图景之中,明确指出沙伊缓和不仅是区域事件,更是全球战略再配置的一部分。

尼泊尔媒体在背景的描述上更关注沙特与伊朗自身出于地区安全战略考量所作出的调整。通过报道伊朗与胡塞武装的关系、沙特对导弹袭击的指控、核计划与能源安全之间的纠葛,构成了尼泊尔媒体所设定的事件深层冲突脉络。沙伊双方在持续动荡与安全困局的挤压下必须主动寻求缓和路径,以摆脱长期代理战的困局与国际对抗的牵制。两国外交转向被放置于沙伊国家利益重新配置、区域稳定性需求上升的大背景而不再被简单归因于外部斡旋的突破。

印度地区的布景更加宏大但负面,其关注点放眼世界范围内权力的变化而不局限某一个国家或地区,最终落脚印度。印度对语境的关注则重点在自身,因此在印度媒体的报道中,事件背景主要在于中国在中东地区行为对印度影响力与地位的影响。印度媒体普遍将此次中沙伊协议放置于世界秩序权力西退东进的背景之中。同时不断强调美国在该地区的影响力正逐步削弱,其盟友之间的裂痕加剧。如沙特对以色列的迟疑、对也门战争的疲惫、以及对美国安全承诺的不满。中国正是在这种动荡与战略真空之中得以以“和平调解者”的身份破局进入,为中东局势稳定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印度媒体广泛运用背景交代与细节补充,借此为中国的外交行为构建出一个“深层动因”的战略布景。中国的和平斡旋并非单一目标,而是服务于其更广泛地缘利益与权力布局的工具性手段。有评论指出,随着华盛顿将资源投入乌克兰战争以及与中国战略竞争美国在中东的影响力正在减弱。而中国对中东地区能源需求的稳定依赖和“一带一路”倡议建立的新型贸易关系使得中国需要一个稳定的中东局势,以满足其石油进口的需求和加深经济联系的动机。^[7]报道更倾向于从“战略审慎”与“防范式观察”的角度来看待中国介入中东事务的行为。

(三) 情节与冲突

越南媒体对于中国斡旋沙伊复交事件的报道中情节比较单一。越南媒体主要以旁观者的视角转述沙伊复交这一事件,客观中立梳理了中东地区长期以来的冲突动荡及中国外交不断探索在调解全球冲突问题中的作用。

在巴基斯坦媒体的报道中,情节没有那么复杂。巴基斯坦媒体梳理中东地区长期以来的矛盾以及美国霸权对中东地区产生的负面作用,引述专家、官员的评论看法,肯定中国在沙伊复交中所起到的我选调节作用和中国外交不断探索在调解全球冲突问题中的作用,同时也分析了中国斡旋行为成功对巴基斯坦经济方面的积极影响。在冲突的构建中主要聚焦两方面中美和中巴,美国在中东影响力减弱,而中国则通过调解沙伊关系增强了自身在该地区的政治影响力。这种处理方式在冲突结构上形成一种“中美竞争”的设置。

尼泊尔媒体在对“沙伊复交”事件进行报道时,情节相对越南稍显复杂。但依然是以旁观者视角来转述沙伊复交事件,与越南不同的是,尼泊尔媒体在对事件本身的报道上肯定了中国“推动”的积极作用,但其报道中部分报道源于美联社,其针对中国的报道倾向显得不是那么正面积极。其媒体也表达了对中国涉外立场的不一致看法。在冲突的构建上,尼泊尔媒体通过引用美联社文章体现出,中美在中东媒体中还是呈现出“敌对竞争”的状态。

印度媒体在对“沙伊复交”事件进行报道时,情节复杂得多。首先在对事件本身的报道上肯定了中国“推动”的

积极作用,但其报道就中国参与“沙伊复交”事件出发有意针对中国参与这一事件的动机进行了分析与猜测。同时就中国的外交、军事行为大做文章。在冲突的构建上,中美在印度媒体中还是呈现出“敌对、竞争”的状态。中国与中东则是由于中国对中东严重的资源依赖和推进“一带一路”的需求,需要从稳定的中东局势中受益。中国与印度则是印度忧虑、警惕中国的军事、外交行为。

六、媒体呈现的中国国家形象

通过对越南、尼泊尔、印度、巴基斯坦四国主流媒体(2023-2024年)关于沙伊复交事件的71篇报道分析发现,南亚东南亚陆接国家媒体对中国形象的建构呈现显著分化:

和平调解者:媒体对中国和平推动者形象的承认表明中国促成沙特与伊朗恢复外交关系是全球安全理念在中东地区的重要实践成果,对中国国家形象的塑造与传播具有重大意义。此次外交行动体现了中国在全球治理体系中的责任感与贡献意愿,展现出中国愿为世界和平与稳定付出努力、承担使命的姿态。沙伊和解的实现为中东地区带来缓和的同时也为国际社会提供了和平解决争端的替代路径。中国以实际行动为推动区域安全提供支持,不仅提升了其在中东的政策信誉,也强化了“负责任大国”的国际认知。

战略扩张者:中国在促成沙特与伊朗恢复外交关系中的活跃作为,在部分国家媒体报道中也被赋予了战略竞争维度的解读。在印度媒体的报道中,中国并非单纯作为和平推动方出现,更多被视为一个通过参与中东事务来提升地区参与度和话语影响力的行动者。沙伊复交事件在该语境中不再被看作是单一的外交协调成果,而在印度媒体的语境中,沙伊复交事件并非单纯的外交协调成果,而被视为中国推进地区政治影响力、强化能源战略联系、并逐步削弱美西方传统地位的一项战略性介入行动。其外交活动已不仅仅停留在劝和促谈层面,而是服务于长期谋划中的战略利益拓展。

现实主义行动者:中国的发展离不开能源支撑,确保国内经济稳定与社会秩序,是其实现全球强国目标的重要基础。中国对波斯湾地区的依赖随着经济持续扩展、能源消耗显著上升日益加深。数据显示,中国约50.7%的石油进口来自波斯湾国家,这使得中东地区对中国的国家安全与战略布局具有高度现实意义。中国之所以积极参与中东事务的外交斡旋,一方面源于其对能源持续供应的迫切需求;另一方面,则与“一带一路”倡议的顺利推进密切相关。作为重大战略平台,“一带一路”亟须和平稳定的区域环境作支撑,而中东的安全形势直接影响中国对外经贸布局与基础设施合作的可持续性。

七、媒体呈现的中国国家形象

中国国家形象在媒体报道中的情感表现,是国家身份、战略关系与信息话语结构共同作用的结果,而非对外交事件的直接反映。研究发现媒体的情感倾向受到国家与中国之间地缘政治关系与现实利益诉求的影响。与中国战略关系密切、舆论环境稳定的国家通常在报道中呈现出对中国外交行为的积极评价。与中国存在战略竞争的国家在报道中表现出较强的警惕与批评态度,印度媒体将中国的外交举措解读为扩大地区影响力或加强在地区事务中的参与。部分国家信息来源依赖性较强,其主流媒体报道多基于西方通讯社内容编译,话语框架存在一定程度的西方视角偏移。

中国与巴基斯坦自1951年建交以来始终保持高度稳定的政治关系。20世纪60年代双方通过和平谈判解决边界争议,奠定了深厚的政治互信基础。在此后的多边外交与地区事务中,两国在多数议题上立场一致,政治关系不断深化。2005年中巴建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2015年进一步升级为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在“一带一路”倡议框架下,中巴经济走廊的建设进一步加固了双方在能源、基础设施与安全等领域的战略互依同时增强了巴基斯坦对中国国家角色的正面认知与政策期待。巴基斯坦主流媒体在报道中国斡旋沙特与伊朗复交事件时展现出高度积极的立场,在其主流媒体的相关报道中将中国建构为和平缔造者与全球秩序建设者,这种情感倾向不仅体现出对中国外交行为的认同,也反映了中巴特殊政治关系对巴基斯坦涉华报道的深层影响。在国家利益方面巴基斯坦的报道强调中国在地区调解中积极作用的同时将中东局势稳定与巴基斯坦地缘环境改善联系,其媒体认为稳定的地区格局有助于推进中巴经济合作,降低安全风险,增强与伊朗的双边沟通与能源协同。

印度与中国长期存在边界争议和地区影响力竞争,近年来在“印太战略”框架下更明确地将中国视为地区战略竞争者甚至潜在威胁。中国在中东地区外交影响力的增强,被印度部分主流媒体解读为中国“战略扩张”的表现,其调解行为被描述为“抢夺地缘主导权”的手段,媒体中关于中国形象的情感倾向表现出明显的防范、警惕甚至批评色彩。尤其是在报道中出现“中国利用外交突破扩大对印度洋的影响”等论述,反映出印度媒体并未聚焦事件本身,而是通过战略博弈视角重构中国的“真实意图”,这一叙述逻辑背后正是基于印度对中国持有的竞争性地缘战略判断。同时印度将自身视为南亚及印度洋地区的重要力量,长期与沙特、阿联酋等中东国家维持稳定的能源与战略关系。中国在中东影响力的增强,可能削弱印度在地区事务中的影响力,影响其在伊朗、印度洋地区的利益。

其主流媒体相关报道多将中国调解行为解读为地缘政治博弈的一部分，媒体对中国形象的警惕情绪由此生成。

越南和尼泊尔媒体在对沙特与伊朗关系恢复的报道中整体语气保持中性未表现出显著情感立场。其主流媒体报道以事件基本信息和外交进程为主、报道内容侧重于事件呈现，未突出中国在调解过程中的具体角色，缺乏主观评论与立场表达。媒体对该事件的介入意愿有限未对中国角色进行明显正面评价或负面表态。两国媒体的报道风格反映出越南媒体对中东事务的观察态度和在无直接国家利益牵动的背景下对国际事务报道的克制立场。

四国媒体在报道沙特与伊朗复交过程中对中国的情感态度差异，深层根源在于国家对中国的战略定位。战略友好型国家更倾向于在媒体话语中给予中国正面评价，处于竞争或对抗关系的国家则在报道中显现出更多疑虑甚至批评倾向。国家层面的地缘政治判断影响着媒体在情感层面对中国形象的建构。国家能否从中国调解沙伊关系中获得利益是影响媒体相关报道情感倾向的重要因素之一。当相关事件与国家利益构成正向联动时，媒体更倾向于积极评价中国行为；当相关事件被视为区域竞争格局中的变量，媒体则可能表达忧虑或防范立场。国家是否“从中受益”是媒体建构国家形象时情感立场的重要依据。

参考文献:

- [1] 邓纬琳.沙特国族主义的兴起:内涵 表现与动因[J].阿拉伯世界研究,2024,(04):30-54+157-158.
- [2] 牛新春,李绍先.乘势而上:中国斡旋沙特伊朗复交及其影响[J].国际问题研究,2023,(03):38-54+139-140.
- [3] 李德帅.《中苏文化》关于苏联国家形象的建构研究(1936-1945)[D].河北师范大学,2023.DOI:10.27110/d.cnki.g hsfu.2023.000140.
- [4] Martin I M, Eroglu S. Measuring a multi-dimensional construct: Country image[J]. Journal of business research, 1993, 28(3): 191-210.
- [5] Baloglu S, McCleary K W. A model of destination image formation[J]. 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 1999, 26(4): 868-897.
- [6] 徐小鸽.国际新闻传播中的国家形象问题[J].新闻与传播研究, 1996, 3(2):11.DOI:CNKI:SUN:YANJ.0.1996-02-005.
- [7] 周玉.“沙伊复交”报道中的策略性叙事分析[D].西安外国语大学,2024.

A Study on the Representation of China's National Image in the Mainstream Media of South and Southeast Asian Countries Bordering China: A Case Study of Media Coverage on China's Mediation in the Saudi–Iran Reconciliation

Li Boye¹ , Huang Qian²

¹ Yunnan Normal University, Yunnan Normal University, kunming, china

² Yunnan University, Yunnan University, kunming, china

Abstract: Against the backdrop of global power shifts and the intertwining of digital geopolitics, how the non-Western world decodes China's new practices in global governance has become a key entry point for breaking the "center-periphery" cognitive paradigm. This study takes the 2023 Saudi–Iran reconciliation as a prism to examine how mainstream media in seven South and Southeast Asian countries bordering China (India, Nepal, Vietnam, Myanmar, Laos, Bhutan, and Pakistan) construct their perceptions of China's mediating role in the Middle East. It explores how the region builds China's national image in its China-related reporting. The analysis is conducted across dimensions including reporting scale, emotional tone, narrative framing, and linguistic strategies, and identifies three main media portrayals of China in the region: "peaceful mediator," "strategic expander," and "realist actor." However, due to the absence of relevant reporting in certain countries, the study cannot fully represent the perceptions of all mainstream media in South and Southeast Asian countries that share land borders with China. This issue warrants further exploration in future research.

Keywords: National image; Saudi–Iran reconciliation; Mainstream media in South and Southeast Asia

大卫一世与苏格兰自治市镇的兴起探究

张丽¹

(¹暨南大学, 广东 广州 510000)

摘要: 大卫一世时期, 苏格兰建立了包括贝里克、罗克斯堡等在内的一系列早期自治市镇。这些自治市镇大多在苏格兰王室的直接支持下建立, 以市场为核心构成要素, 在地理上多毗邻城堡。苏格兰自治市镇的兴起与十一世纪以来欧洲西部贸易的活跃、苏格兰本土城镇发展密切相关。大卫一世个人也在其中起到了关键作用。通过自治市镇的贸易获取经济利益, 是大卫一世推动设立自治市镇的主要原因。大卫一世时期苏格兰王国自治市镇的兴起为其后续的繁荣奠定了基础, 并推动了中世纪苏格兰的经济发展。

关键词: 自治市镇; 大卫一世; 苏格兰王国; 中世纪苏格兰

DOI: doi.org/10.70693/rwsk.v1i5.964

自治市镇的建立和兴起是十二世纪苏格兰经济史上的重大创新, 是十二世纪苏格兰统治者有意为之的产物。相较于普通城镇, 自治市镇的发展重心更加集中于手工业和贸易。自治市镇的市民拥有旧城镇的居民们未曾享有的权利和自由^{[1](P265)}。学界主流观点认为, 大卫一世 (David I) 的统治对苏格兰自治市镇的建立和兴起起到了关键的推动作用。苏格兰的早期自治市镇 (burgh), 如特威德河畔贝里克 (Berwick-upon-Tweed)、罗克斯堡 (Roxburgh) 等, 是在大卫一世时期才逐渐发展起来的^{[2](P33)}。

一、大卫一世时期的苏格兰自治市镇

大卫一世时期, 苏格兰的新兴自治市镇类型较为单一, 以王室自治市镇为绝对多数, 具有强烈的王室主导的色彩。这些早期的自治市镇往往位于交通便利的贸易中心, 多毗邻城堡, 以市场为核心构成要素。

(一) 自治市镇的类型

大卫一世统治时期, 苏格兰建立了十数个王室自治市镇, 大致包括: 特威德河畔贝里克、罗克斯堡、邓弗姆林 (Dunfermline)、爱丁堡 (Edinburgh)、珀斯 (Perth)、斯特灵 (Stirling)、阿伯丁 (Aberdeen)、福里斯 (Forres)、哈丁顿 (Haddington)、皮布尔斯 (Peebles)、伦弗鲁 (Renfrew)、卢瑟格伦 (Rutherglen)、埃尔金 (Elgin)、林利斯高 (Linlithgow)、蒙特罗斯 (Montrose) 等。其中, 贝里克和罗克斯堡的自治市镇建立时间最早。哈丁顿和伦弗鲁的自治市镇后来分别被授予艾达·德·瓦伦 (Ada de Warenne) 和沃尔特·菲茨·艾伦 (Walter fitz Alan)。

这些早期的王室自治市镇, 如贝里克、爱丁堡、哈丁顿、珀斯、阿伯丁等, 是在早先已有的城镇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贝里克城镇建立于诺森比亚王国时期, 最初是盎格鲁-撒克逊人的定居点, 原属诺森比亚伯爵领地。大卫一世统治时期, 贝里克处于苏格兰王国的控制下, 是苏格兰的最初的“四大王室自治市镇” (Curia Quattuor Burgorum) 之一^{[3](P3-10)}。爱丁堡的历史可以追溯到盎格鲁-撒克逊时期^{[4](P334)}, 它在九世纪时被纳入苏格兰的统治范围, 同样属于最初的四个王室自治市镇。哈丁顿原属于伯尼西亚 (Bernicia) 王国的统治下, 后被纳入苏格兰王国领地。^{[5](P1)}。邓弗姆林、斯特灵等其他王室自治市镇, 则以建立时间相对较晚的定居点为基础。邓弗姆林也是最初的四个王室自治市镇之一, 它依托于十一世纪中后期建立的邓弗姆林修道院 (Dunfermline Abbey) 而存在。斯特灵城镇据称在苏格兰国王亚历山大一世 (Alexander I) 统治末

作者简介: 张丽(2001—), 女, 硕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为世界上古中古史 (苏格兰中世纪史)。

期建立^{[4](P334)}。

除王室自治市镇外，大卫一世时期，苏格兰还出现了非王室的自治市镇，如坎农格特（Canongate）。在大卫一世的允许和授权下，荷里路德修道院（Holyrood Abbey）建立了坎农格特自治市镇^{[6](P467)}。但此类非王室自治市镇在这一时期极为少见，绝大多数的自治市镇仍是在王室直接主导下建立的王室自治市镇。

（二）自治市镇的特征

大卫一世统治时期的苏格兰早期自治市镇在地理位置、核心构成要素等方面均有一定的突出特征。就地理位置而言，这些早期自治市镇通常位于苏格兰东部的陆路、河流和海路交汇处，便于贸易，且较为靠近王室统治的中心地带，如爱丁堡、蒙特罗斯、珀斯、阿伯丁、罗克斯堡、贝里克等。爱丁堡临近一条主要的陆路通道，利斯（Leith）的天然海港能够为它提供服务。蒙特罗斯临近南埃斯克河（South Esk）的河流入海口，是天然的港口。珀斯位于泰河（Tay）的一个渡口，河运便利。阿伯丁位于迪河（Dee）入海口附近的港口^{[7](P136-137)}。罗克斯堡位于蒂维厄特河（River Teviot）与特威德河交汇处。贝里克位于特威德河入海口。这些定居点地理位置优越，是极好的贸易中心。

市场和城堡在早期自治市镇的发展中相辅相成。就市场和城堡在自治城镇中的性质和地位问题，学者们提出了不同的观点。“驻防理论”（garrison theory）的支持者们认为，苏格兰的自治市镇本质上是依赖于一定规模的驻防武装的防御据点，它以军事价值为重，贸易只是它的附带功能。大卫一世时期的苏格兰早期自治市镇，一般毗邻城堡。其中一些城堡在苏格兰的自治市镇成立前就已建立。如爱丁堡城堡，约建成于十一世纪。另一些城堡始建于大卫一世统治时期，如贝里克城堡、罗克斯堡城堡和蒙特罗斯城堡。也有学者认为，城堡并非自治市镇的必要组成部分，自治市镇建立的首要目的在于商业，在于扩大和规范贸易，从而增加王室和贵族的收入^{[8](P85-87)}。

这两种对立的观点，均有一定的合理性，反映出市场和城堡对于自治市镇的重要影响。但相较于城堡，市场在自治市镇的发展中更有可能居于核心地位，更有可能成为构成自治市镇的核心要素。一些自治市镇的规划布局 and 它们所处地区的遗存遗迹，可以佐证上述观点。在福里斯、埃尔金、罗克斯堡等自治市镇的规划布局中，市场一般位于自治市镇主街的中心位置。与之形成对比的是，爱丁堡城堡、贝里克城堡、罗克斯堡城堡、珀斯城堡的具体位置在对应的自治市镇之外^{[8](P86, 90)}。此外，苏格兰自治市镇的早期市民中有许多是英格兰人、佛兰芒人等外来定居者^{[7](P136-140)}，这侧面印证了对外贸易交流在自治市镇中的突出地位。

二、苏格兰自治市镇兴起的历史原因

苏格兰自治市镇的兴起，既受到欧洲西部贸易发展的整体趋势的影响，也与苏格兰特殊的城镇发展过程密切相关。作为苏格兰自治市镇的最初建立者，大卫一世对这些市镇的早期发展同样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

（一）贸易与城镇发展

欧洲西部范围内的贸易发展是苏格兰自治市镇兴起的一大推动因素。十世纪开始，欧洲进入持续约三百年的“中世纪暖期”（Medieval Warm Period）。在这一最佳气候期，欧洲农业蓬勃发展，人口迅速增长^{[9](P26)}。从事贸易和手工业的人数增加，银币广泛使用，商业活跃，整个欧洲的贸易量都有所增加^{[2](P33)}。苏格兰对外贸易在此时也不断发展，主要的对外贸易对象是英格兰与佛兰德斯。苏格兰自治市镇的早期市民多来自埃塞克斯的奥尔福德（Orford）、约克郡的惠特比（Whitby）、拉文瑟（Ravenser）和约克等英格兰东部城镇^{[10](P122)}。英格兰与苏格兰之间的往来贸易之密切，从这些自治市镇的早期市民构成便可以看出。

佛兰德斯的手工纺织业对苏格兰的对外贸易也产生了重要影响。中世纪的佛兰德斯以纺织业闻名。十一世纪，佛兰德斯的纺织技术实现突破，能够生产出宽度和质地均匀的布料^{[6](P464)}。这不仅促进了佛兰德斯的纺织品出口贸易和纺织业的繁荣发展，也使得佛兰德斯对纺织原料的进口需求增长。英格兰与苏格兰生产羊毛，能够为佛兰德斯的手工纺织业提供重要原料。在与佛兰德斯的羊毛贸易中，英格兰占据了主要份额，但苏格兰也能够从中获利^{[1](P271)}。由于地理等自然条件的限制，苏格兰比英格兰更加依赖畜牧业，畜牧业是苏格兰农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佛兰德斯织造技术改进的同一时期，苏格兰的畜牧业产量也有所提高^{[6](P310-311)}，进一步刺激了苏格兰羊毛出口，推动了以商业贸易为重的苏格兰自治市镇的建立。

本土城镇的发展也是苏格兰自治市镇兴起的重要背景。不同于毗邻的英格兰,苏格兰在历史上未曾被纳入罗马帝国的版图,苏格兰境内也缺乏罗马统治下形成的城市中心。因此,苏格兰城镇所受到的来自罗马的影响相对较小。苏格兰城镇的发展更多表现为一种自然的渐进过程,而非罗马城市衰退后的再度“复兴”。中世纪早期,盎格鲁—撒克逊人在英格兰建立的城镇常常位于原先的罗马城市之上,以有限的方式进行着贸易。但在同一时期,苏格兰似乎并不存在能与这些城镇的发展相媲美的城镇^{[7](P136)}。

由于实物证据和文献的欠缺,苏格兰城镇在十一世纪的发展状况不甚明晰。城镇教堂数量的稀少与发展的相对滞后,也使得苏格兰的城镇发展进程显得缓慢。但惠特霍恩(Whithorn)一地的考古发掘工作表明,在十一世纪前,苏格兰存在着小规模贸易定居点^{[11](P23)}。针对爱丁堡、珀斯和克雷尔的研究,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上述三地在被设立为王室自治城镇前的城镇发展状况。它们极有可能在十二世纪初便已发展为较为繁荣的城镇定居点^{[6](P465-470)}。

(二) 大卫一世的影响

大卫一世本人也在苏格兰自治市镇兴起的过程扮演了重要角色。大卫一世是十二世纪苏格兰历史变革中的关键人物,以推进封建化、推行政府革新、完善教会组织等政治、军事、宗教方面的成就而闻名。巴罗(G. W. S. Barrow)等学者将大卫一世时期苏格兰王国发生的历史变革称为“大卫革命”(Davidian revolution)^{[12](P54)}。在大卫一世主政时期,苏格兰的封建制度得到较快发展,国家军事组织、统治阶层构成等发生重大变化。许多来自英格兰、诺曼底等地区的外来家族在苏格兰获得领主身份和新的领地,为苏格兰国王提供城堡驻军和骑士武装,履行封建义务^{[12](P52-53)}。苏格兰境内建立起一定规模的封建关系,封建化进程大幅推进。一批英格兰贵族担任了苏格兰王室政府的官员,苏格兰的政法官制度(Justiciarship)初现雏形^{[13](P69)}。在教会组织方面,大卫一世发展了苏格兰的教区体系^{[14](P155)}。

除上述成就外,大卫一世在经济方面也颇有建树,其中最为重要的是本土硬币的铸造和自治市镇地位的授予。在大卫一世之前,苏格兰没有全国性或者地区性的本土硬币。大卫一世成为国王后,于1136年从英格兰国王斯蒂芬的手中夺取了卡莱尔及其铸币厂,以及附近的银矿。他模仿斯蒂芬铸造的英格兰硬币,在爱丁堡、圣安德鲁斯、罗克斯堡、贝里克和卡莱尔等地制造了苏格兰的最早的本土硬币。这些硬币的设计与英格兰硬币相仿,在重量和品质方面也遵循了英格兰的标准。直至十四世纪,这一情况才有改变^{[15](P17-18)}。本土硬币的制造,促进了苏格兰本土商业。与英格兰硬币相仿的设计与相同的质量、品质,使得苏格兰和英格兰两国的硬币可以自由流通,推动了苏格兰对外贸易的发展。

大卫一世推动设立自治市镇,同样基于经济目的。王室自治市镇是苏格兰国王的主要收入来源之一^{[16](P2)}。将自治市镇的法律地位授予贸易中心所在地,是大卫一世增加王室收入的重要举措。此外,还有一些历史学家认为,大卫一世设立自治城镇、提升自治市镇地位的部分动机是希望苏格兰向更广泛的国际贸易网络开放^{[1](P271)}。在自治市镇建立后,大卫一世也颁布了一系列法规,维护和强化新兴自治市镇的特殊权利。例如,威廉一世(William I)在颁布给因弗内斯的特许状中提及了他的祖父大卫一世时的三项法律。这三项法律的目的均在于保留自治市镇市民在自治市镇范围内进行特定商业活动的权利,并维护自治市镇商品买卖的垄断权^{[1](P272-273)}。

三、苏格兰自治市镇兴起的历史影响

苏格兰自治市镇兴起所产生的历史影响是多方面的。从最直接的层面来看,大卫一世统治时期自治市镇的设立,为此后苏格兰自治市镇的进一步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推动了自治市镇数量的增长、法律的完善、管理的变化。从更深刻的层面来看,苏格兰自治市镇的设立极大地促进了王室收入的增长,以及苏格兰国内贸易、对外贸易的发展,对中世纪苏格兰的经济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

(一) 自治市镇的发展

大卫一世离世后,马尔科姆四世继位。马尔科姆四世统治时期,苏格兰新增自治市镇数量较少,似仅有因弗基辛(Inverkeithing)、因弗内斯(Inverness)两地。马尔科姆四世的统治结束后,他的兄弟威廉成为新一任苏格兰国王,即威廉一世。威廉一世继承了大卫一世的自治市镇政策,继续以王室权力大力推动苏格兰自治市镇的发

展。

在威廉一世的推动下, 苏格兰自治市镇的数量大幅增加, 苏格兰新增了邓弗里斯 (Dumfries)、金霍恩 (Kinghorn)、福法 (Forfar)、奈恩 (Nairn)、金托尔 (Kintore)、班夫 (Banff)、艾尔 (Ayr) 等十数个王室自治市镇^{[3](P12-16)}。非王室控制的自治市镇, 如亨廷顿伯爵大卫 (David, earl of Huntingdon) 所建立的邓迪 (Dundee) 等, 数量也有一定增长。至威廉一世统治晚期的 1210 年, 苏格兰存在约 40 个自治市镇, 其中多数都位于王室领地内, 享受王室的保护^{[8](P87)}。英格兰人、佛兰芒人等外来定居者依旧是苏格兰自治市镇市民的重要来源。

这一时期, 王室授予自治市镇各项权利的程序也得到进一步的规范, 通过特许状等书面文件记录授予自治市镇的特权逐渐成为一种惯例。源于大卫一世时期的有关自治市镇的各项立法, 也在这一时期逐渐统一起来。对自治市镇法律的相关研究表明, 自治市镇法律的书面编撰始于威廉一世统治时期。这一过程在现存的名为《威廉国王法》(Constitutiones Regis Willelmi) 的手稿汇编中有所反映。《威廉国王法》以威廉一世 1209 年授予珀斯自治市的特许状为首, 大量借鉴了这一特许状当中的规定。威廉一世统治早期授予卢瑟格伦和艾尔的特许状中, 也有着类似的规定。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 自治市镇的相关法律极有可能在威廉一世统治时期便已逐渐成熟, 开始了系统化、统一化的成文编撰过程, 并在之后成为更为普适的自治市镇法的重要借鉴^{[1](P273-274)}。

十二世纪中后期, 苏格兰自治市镇的管理也出现了新的变化。十三世纪关于自治市镇法院的史料反映出, 此时的自治市镇法院已能熟练处理自治市镇范围内的纠纷和案件。这表明, 苏格兰自治市镇的管理机构在十二世纪就已经有了很大的发展。在大卫一世和马尔科姆四世统治时期, 自治市镇的税款主要是由国王指定的王室官员征收的, 自治市镇的运作也受到王室官员的监督。威廉一世时期, 自治市镇的领导者由郡长等王室官员转变为自治市镇市民代表的趋势加强, 苏格兰自治市镇的自治倾向和自治传统初现^{[1](P279-280)}。

(二) 苏格兰经济的发展

苏格兰自治市镇的兴起, 不仅促进了苏格兰王室收入的增长, 也对苏格兰整体的经济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中世纪苏格兰的贸易以自治市镇为中心。在各种自治市镇中, 王室自治市镇长期占据重要地位。直到十七世纪, 苏格兰的对外贸易仍然由王室自治市镇主导^{[17](P118)}。大量的王室自治市镇的设立, 使得王室能够直接向自治市镇的市民收取租金, 同时也推动了苏格兰境内贸易地点的固定化、集中化, 使得有关税款的征收更加便捷, 有利于王室财政收入的增长^{[18](P457)}。在大卫一世统治时期, 珀斯等苏格兰东部沿海自治市镇为王室带来的税收就已十分可观, 其重要性可能高于同时期向自治市镇市民征收的租金收入^{[6](P467)}。此外, 在自治市镇发展初期, 维持自治市镇贸易垄断地位的责任主要由王室负担, 王室还可以通过出售或授予自治市镇范围内的贸易垄断权获利^{[1](P274)}。

苏格兰自治市镇的兴起也推动了苏格兰的商业和贸易活动的发展, 为中世纪苏格兰的经济作出了贡献。苏格兰的自治市镇大多毗邻城堡, 受王室保护, 能够在王室指定的地域范围内享有商品的独家贸易权和制造权, 形成地域性的贸易垄断^{[17](P118)}。自治市镇的市民们能够享受贸易税收的减免, 拥有比农民更为广泛的个人自由和法律自由。这些由王室授予的优越条件和商业特权, 使得自治市镇范围的贸易更加安全、更有保障, 吸引了众多的手工业者和商人在自治市镇定居或从事贸易。

在这些定居自治市镇的早期市民中, 英格兰人、佛兰芒人等外来定居者尤为特殊。佛兰芒人广泛定居于圣安德鲁斯 (St Andrews)、阿伯丁、因弗内斯和埃尔金等自治市镇。来自英格兰南海岸、东盎格利亚 (East Anglia)、诺森比亚等地的英格兰移民, 则与珀斯、罗克斯堡等自治市镇建立了紧密的联系。这些外来定居者拥有苏格兰本土市民所缺乏的丰富经验、熟练技能和大量人脉。他们从苏格兰的原材料贸易和商品贸易中获益, 同时也为苏格兰的商业发展提供了资金和技术, 对苏格兰的商业贸易和自治市镇的早期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1](P282-283)}。

结语

自兴起以来, 苏格兰自治市镇便在苏格兰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大卫一世统治时期, 新兴的苏格兰自治市镇主要是促进贸易和商业的经济中心, 受到王室的高度控制。苏格兰自治市镇的兴起在很大程度上是“自上而下”的产物, 大卫一世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为此后苏格兰自治市镇的繁荣奠定了关键基础。大卫一世后, 自治市镇的政治机构、市民构成、法律框架逐渐完善, 深刻地影响了苏格兰的历史发展。

参考文献:

- [1] Oram Richard. Domination and Lordship: Scotland 1070-1230[M].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2011.
- [2] Barrell A. D. M. Medieval Scotland[M].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0.
- [3] Smith Pryde George. The Burghs of Scotland: A Critical List[M].London, Glasgow an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1965.
- [4] Irving Joseph. On the Origin and Influence of Burghs in Scotland[J].Transactions of the Glasgow Archaeological Society,1866,1(4): 333-353.
- [5] Forbes Gray W. A Short History of Haddington[M].Edinburgh: Neill and Company Limited,1944.
- [6] A. M. Duncan Archibald. Scotland: the Making of the Kingdom[M].Edinburgh: Oliver and Boyd,1975.
- [7] MacQuarrie A. Medieval Scotland: Kingship and Nation[M].Stroud: Sutton Publishing, 2004.
- [8] Barrow G. W. S. Kingship and Unity: Scotland,1000-1306[M].Toronto and Buffalo: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1981.
- [9] Easterbrook, Don J. Evidence-Based Climate Science[M].New York: Elsevier,2011.
- [10] Webster Bruce. Medieval Scotland: the Making of an Identity[M].New York: St. Martin's.Press,Inc.,1997.
- [11] Hill Peter, Cambell Ewan, et.al. Whithorn & St. Ninian: the Excavation of a Monastic Town, 1984-91[M]. Stroud: Whithorn Trust, 1997.
- [12] Barrow G. W. S. Scotland and Its Neighbours in the Middle Ages[M].London:The Hambledon Press,1992.
- [13] Barrow G. W. S. The Kingdom of the Scots: 2nd Edition[M].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2003.
- [14] Moffat James C. The Church in Scotland[M].Philadelphia: Presbyterian Board of Publication, 1882.
- [15] Cribb Joe, Cook Barrie, Carradice Ian. The Coin Atlas[M].New York,Oxford and Sydney: Facts on File,1990.
- [16] Mackay John. The Convention of Royal Burghs of Scotland[M].Edinburgh: Co-operative Printing Company limited,1884.
- [17] Houston J. M. The Scottish Burgh[J].The Town Planning Review,1954,25(2):114-127.
- [18] Keith Theodora. The Trading Privileges of the Royal Burghs of Scotland[J].The English Historical Review, 1913,28(111): 454-471.

An Exploration of David I and the Emergence of Burghs of Scotland

Zhang Li¹,

¹*College of Liberal Arts, Jinan University, Guangzhou, China*

Abstract:During the reign of David I, a series of early burghs, including Berwick and Roxburgh, were established in Scotland. Most of these burghs were founded under the direct support of the Scottish Crown, with the market as the core constituent element, and geographically adjacent to castles. The emergence of burghs in Scotland was closely linked to the vibrant trade in western Europe from the eleventh century onward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the native towns of Scotland. David I himself also played a key role in this process. The economic benefits gained through trade in burghs were the main reason why David I promoted for the establishment of burghs. The emergence of the burghs in Scotland under David I laid the foundation for the burghs' further prosperity and contributed to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medieval Scotland.

Keywords:burghs; David I; kingdom of Scotland; medieval Scotland

林业上市公司社交媒体企业环境信息披露研究

田轶凡¹

(1.南通理工学院, 江苏 南通 226001)

摘要:随着我国对环境问题的日趋重视以及环境保护措施的执行,近年来国内学者们逐渐开始重点关注上市公司环境信息披露的现状及其影响因素。本文选择了我国30家林业上市公司作为案例对象,针对这些企业2021年微信公众号上的环境信息披露情况进行研究。本文对这些企业公众号中所涉及的环境信息进行统计并分类,比较林业企业在两种不同渠道信息披露的差异,分析得出社交媒体环境信息披露的影响因素。通过本文分析结果可得:

(1) 进行环境信息披露对于企业有正面的影响,但大部分林业企业更加偏向于将环境信息披露在社会责任报告中。(2) 产权属性和政治关联度对企业环境信息披露水平具有较为显著的正向影响。根据以上结论本文提出相关政策建议,为改善我国林业企业的治理状况和环境信息披露提供依据。

关键词: 社交媒体; 环境信息披露; 企业治理

DOI: doi.org/10.70693/rwsk.v1i5.969

一、引言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大自然是人类赖以生存发展的基本条件,必须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站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度谋划发展。环境信息披露是企业环境管理制度,是生态文明制度体系的基础性内容。随着我国对于环境保护的重视不断增强,许多企业开始通过不同的渠道对于环境方面做出披露,例如企业的年度报告和官方网站等就公布了企业的环境治理情况以及为实现良好环境而采取的措施,从而也揭示了这些举措给企业本身所带来的影响。

随着我国社交媒体的不断发展,人们获取信息的方式也逐渐变得多元化。越来越多的人偏向于在一些社交媒体平台上共享资源和信息,例如微博、小红书、微信公众号等,都是个人和企业发布相关信息的重要途径。通过调查发现,目前我国的许多上市公司都拥有官方社交媒体账号,并且部分企业会将相关的环境信息以推文的形式发布在微信公众号上,以起到树立企业形象以及影响投资者决策的作用。

根据知网、WOS等期刊数据库的相关文献显示,国内外学者主要聚焦于企业在传统渠道上的环境信息披露并对企业环境信息披露行为展开研究。随着疫情政策的放开,我国的经济也开始逐渐复苏,市场需求也在不断地扩大,为实现资源的合理配置以及效率最大化的目标,市场竞争也逐渐变得激烈。正因如此,环境信息披露对企业发展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企业为了增加自身的竞争力并能够在行业中占据有力的一席之地,便会通过在社交媒体平台上披露环境信息,使得投资者更多地了解到企业为落实环保政策所施行的措施以及成效,从而达到增强企业价值的目的;其次,从长远的角度来看,企业的环境信息披露情况也能够一定程度上反映出该企业的风险承担水平。如果一个企业本身关于环境信息披露的内容较少甚至不进行披露,那么该企业就很有可能存在环境治理方面的问题,如若在今后遇到相关风险便不能做到及时妥善地处理问题,从而引发一系列负面的后果。所以企业有责任对其环境信息以及治理措施进行披露,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环境治理情况,为以后措施的改进积累经验。

二、文献综述

(一) 传统渠道环境信息披露研究

企业信息披露的传统渠道主要包括企业的年度报告、业绩说明会以及官方网站等,而企业环境信息的相关内容一般会在企业报告中的社会责任这一项中进行披露。

表 1 环境信息披露研究综述

作者	观点	问题
高晓燕等	环境信息披露可基于国际经验,从强化外部约束和基础支撑、改进激励机制等方面进行推动 ^[1] 。	环境信息披露存在内生动力不足、外部约束弱、技术和数据获取存在障碍等问题。
常馨等	碳信息披露是实现“双碳”目标的重要举措,是落实企业碳减排责任的有效手段,是解决利益相关方碳信息不对称问题的重要方式 ^[2] 。	我国碳信息披露制度存在政策法规不健全、标准不统一、披露机制不完善等问题。
谢天和徐潇潇	绿色税制改革能显著遏制重污染企业 ESG 信息披露漂绿程度,表现出积极的信息治理效应 ^[3] 。	环境信息披露情况与该公司的实际情况存在不符,存在“漂绿”现象。
秦天宝	环境信息依法披露的功能定位是生态环境治理体系中连接政府监管和企业自治的“桥梁”,是多元共治主体的连接点 ^[4] 。	环境信息披露呈现出本土化改造不彻底、法律系统不兼容以及制度衔接不顺畅等问题,其核心在于环境信息依法披露的功能定位不清晰。

目前国内外学者对于企业社会责任报告所披露的内容及现状的研究成果颇丰,但专门对环境信息披露进行的研究量较少且开始时间较晚,并且对于环境信息披露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国内。学者们根据环境信息所涵盖的各个方面(如污水和废气的排放、产品和服务等)进行分类研究,从不同的角度探究了上市公司环境信息披露的现状以及影响因素。

(二) 社交媒体环境信息披露综述

随着互联网的不断发展,社交媒体在信息披露方面发挥着不可忽视的作用。与传统渠道相比,社交媒体不仅拓展了企业信息披露的方式,还使得人们能够更加便捷快速地获取企业相关信息。

表 2 社交媒体环境信息披露研究综述

作者	观点	社交媒体
彭语嫣	微信披露环境信息能在一定程度上引起资本市场的正向反应 ^[5] 。	微信
Liu 等	具有环境信息披露意识的用户的讨论话题主要包括 ESG 的投资、披露、评级以及实践 ^[6] 。	新浪微博
李常青和狄然	企业社交媒体关注度有助于进一步放大企业 ESG 表现对投融资期限错配的缓解作用 ^[7] 。	公司股吧
He 和 Li	公司环境信息披露水平与社交媒体所报道的公司 ESG 事件呈负相关 ^[8] 。	Twitter、Face book

相关文献研究表明,国内的大部分企业偏向于选取微博和微信公众号来披露企业环境信息,而国外则主要在 twitter 和 face book 等社交媒体平台上进行披露。目前大部分学者认为社交媒体的出现与使用对企业进行环境信息的披露具有积极的作用,如降低信息不对称性以、提高企业竞争力等。但在社交媒体信息披露过程中也存在着一些问题,如公布的信息量较少、内容不够详尽等。这也就是说,企业如果想要以社交媒体环境信息披露的方式为自身带来效益,就必须重视并采取相关措施调整改善这些现存的问题。

综上,国内外学者们对企业环境信息披露的研究,主要是对传统渠道的披露内容以及存在的问题等进行分析 and 探讨,而缺少对社交媒体企业环境信息披露方面的研究。除此之外,在社交媒体环境信息披露研究中,研究样本主要来自微博和博客,缺少关于微信公众号这一社交媒体平台的研究。而对于社交媒体环境信息披露和传统渠道环境信息披露二者间的联系与区别的研究则更少,所以社交媒体环境信息披露的研究需要进一步补充和完善。

三、研究设计

(一) 数据来源

根据腾讯控股有限公司 2024 年度的财报显示,微信的月活跃账户数达到了 13.82 亿,同比和环比均有所增长。由此可见,中国用户对于微信的使用范围和依赖程度远远超过其他社交媒体平台,而这就意味着企业在微信公众号上所发布的信息更容易被用户所接收到,因此本文将微信公众号作为将要研究的社交媒体平台。本文使

用 Python 获取微信公众号文章共计 3631 篇, 企业社会责任报告来源于巨潮资讯网。

(二) 变量定义

本文使用定量分析法对收集到的微信推文进行分析, 进一步探究林业企业通过社交媒体进行环境信息披露为企业自身所带来的影响。根据文献综述以及理论研究, 本文选取了环境信息披露指数作为因变量, 将企业规模、现金持有量、产权属性、财务杠杆、政治关联这五项指标作为自变量, 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 探究林业上市公司社交媒体环境信息披露的影响因素。表 3 中使用的变量内容如下:

因变量: 环境信息披露指数 (EDI), 本文采用如下公式进行计算:

$$EDI_i = \sum EDI_i / \sum MEDI_i \quad (1)$$

其中, EDI_i 表示第 i 家公司的环境信息披露指数, $\sum EDI_i$ 表示第 i 家样本公司的各项目披露得分之和, $\sum MEDI_i$ 表示第 i 家企业的各项目目标得分之和。本文共有 19 个二级环境信息子维度, 若均有定性与定量披露, 则得分为 2 分, 因此目标得分之和为 38。

自变量: 通过查阅大量文献, 本文发现学者们在进行环境信息披露影响因素的分析时, 所选取的企业规模 (SIZE)、现金持有量 (CASH)、产权属性 (SOE)、财务杠杆 (LEV)、政治关联 (CMPC) 这五个指标与环境信息披露水平的相关性较为显著, 因此本文选取以上五个变量作为自变量进行研究。

表 3 变量定义

变量名称	变量解释
SIZE	企业规模, 即企业总资产的自然对数
CASH	现金持有量, 即企业现金持有量的自然对数
SOE	产权属性, 即企业的实际控制人类型是国有还是非国有, 国有为 1 分, 非国有为 0 分
LEV	财务杠杆, 即资产负债率 (总负债 / 总资产)
CMPC	政治关联, 即高管是否在县级以上政府、人大、政协任职, 是为 1 分, 否为 0 分
EDI	环境信息披露指数

(三) 林业企业环境信息披露框架

本文根据全球报告倡议组织 (GRI) 发布的《G4 可持续发展报告指南》中的指标进行梳理和分类, 由于部分指标在选取的微信公众号文章中并没有涉及到, 所以将这些指标进行选择性别除并将所有指标的序号重新编排, 最终构建的林业企业环境信息披露框架如表 4 所示:

表 4 林业企业环境信息披露框架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物料	EN1 所用物料的重量或体积
	EN2 采用经循环再造物料的百分比
	EN3 机构内部的能源消耗量
能源	EN4 减少的能源消耗量
	EN5 产品和服务所需能源的降低
水	EN6 按源头说明的总耗水量
	EN7 循环及再利用水的百分比及总量
	EN8 机构在环境保护区或其他具有重要生物多样性价值的地区或其毗邻地区, 拥有、租赁或管理的运营点
生物多样性	EN9 机构的活动、产品及服务在生物多样性方面, 对保护区或其他具有重要生物多样性价值的地区的重大影响
	EN10 直接温室气体排放量
废气排放	EN11 减少的温室气体排放量
	EN12 臭氧消耗物质(ODS)的排放
	EN13 氮氧化物、硫氧化物和其他主要气体的排放量
污水和废弃物	EN14 按水质及排放目的地分类的污水排放总量
	EN15 按类别及处理方法分类的废弃物总重量

	EN16 严重泄露的总次数及总量
	EN17 受机构污水及其他（地表）径流排放严重影响的水体及相关栖息地的位置、面积、保护状态及生物多样性价值
产品和服务	EN18 降低产品和服务环境影响的程度
交通运输	EN19 为机构运营而运输产品、其他货物及物料以及员工交通所产生的重大环境影响

四、实证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分析

本文对公司的环境信息披露水平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了变量指标体现的数据特点及反映的具体情况。

首先，本文对30家样本公司在传统渠道（即社会责任报告）进行的环境信息披露情况进行统计和分析，结果如表5所示。这些企业的环境信息披露水平在一级维度下的平均值为11.13，标准差为8.07，中位数为13.50，最大值和最小值分别为24和0，表明林业企业整体的披露水平不高且不同企业在社会责任报告中的披露量差距较大。根据打分标准，这30家林业企业中最高只有24分（总分38分），证明社会责任报告中的环境信息披露还有待完善。19个二级维度的均值都处于1-2之间，其中最高的是en3_w，分数为2，表明林业企业在能耗方面的披露情况较好，而均值最低的是分数为1分的en2_w、en15_w、en17_w以及en19_w，说明林业企业在对可循环物料、生物多样性以及交通方面的关注度较少，缺少定量或定性的披露。

表5 社会责任报告环境信息分析

变量	样本量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中位数	最大值
en	30	11.13	8.07	0	13.50	24
en1	30	1.40	0.49	1	1	2
en2	30	1.00	0.00	1	1	1
en3	30	2.00	0.00	2	2	2
en4	30	1.50	0.50	1	1.5	2
en5	30	1.20	0.40	1	1	2
en6	30	1.83	0.37	1	2	2
en7	30	1.33	0.47	1	1	2
en8	30	1.21	0.41	1	1	2
en9	30	1.38	0.49	1	1	2
en10	30	1.80	0.40	1	2	2
en11	30	1.70	0.46	1	2	2
en12	30	1.84	0.36	1	2	2
en13	30	1.83	0.37	1	2	2
en14	30	1.14	0.35	1	1	2
en15	30	1.00	0.00	1	1	1
en16	30	1.08	0.27	1	1	2
en17	30	1.00	0.00	1	1	1
en18	30	1.07	0.26	1	1	2
en19	30	1.00	0.00	1	1	1

接着，表6报告了林业企业社交媒体环境信息二级维度的披露情况。通过统计和评分得出，不同环境信息子维度的披露水平有较大差距。首先，环境一级维度披露变量（en_w）的平均值为6.57，其中披露水平最高的是总分为41分的岳阳林纸，而永安林业等8家企业并列倒数第一，披露水平均为1分。其次，根据环境二级维度披露变量来看，en18_w的均值为3.17，而en1_w、en2_w、en11_w、en12_w、en16_w等指标的平均值只有0.03，反映出大部分企业在微信公众号上披露的环境信息缺少对于污染物排放量的披露。

表6 社交媒体环境信息披露描述性统计

变量	样本量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中位数	最大值
en_w	30	6.57	8.11	1	4	41

en1_w	30	0.03	0.18	0	0	1
en2_w	30	0.03	0.18	0	0	1
en3_w	30	0.30	0.94	0	0	4
en4_w	30	0.10	0.4	0	0	2
en5_w	30	0.47	0.81	0	0	3
en6_w	30	0.37	0.98	0	0	4
en7_w	30	0.07	0.36	0	0	2
en8_w	30	1.03	4.85	0	0	27
en9_w	30	0.17	0.64	0	0	3
en10_w	30	0.40	0.95	0	0	4
en11_w	30	0.03	0.18	0	0	1
en12_w	30	0.03	0.18	0	0	1
en13_w	30	0.07	0.36	0	0	2
en14_w	30	0.07	0.36	0	0	2
en15_w	30	0.07	0.36	0	0	2
en16_w	30	0.03	0.18	0	0	1
en17_w	30	0.07	0.36	0	0	2
en18_w	30	3.17	3.52	0	2	14
en19_w	30	0.07	0.36	0	0	2

最后, 本文对涉及的变量进行了描述性统计分析。从表7可以看出, 环境信息披露指数作为因变量, 其均值为0.17, 标准差为0.21, 中位数为0.11, 最小值和最大值分别为0.03和1.08, 由此可见不同公司的环境披露水平之间差距较大。其次, 本研究一共涉及5个自变量。第一, 企业规模。对30家样本企业的总资产取自然对数后, 均值为21.99, 标准差为6.09, 中位数为22.04, 最大值和最小值分别为36.52和20.15; 第二, 样本公司现金持有量的自然对数的均值为20.16, 标准差为1.22, 中位数为20.18, 最大值和最小值分别为23.37和17.34; 第三, 产权属性的均值是0.53, 表明在所有样本企业中约有一半的企业是国有企业; 第四, 财务杠杆的均值是0.47, 最小值和最大值分别为0.19和0.90, 这表明不同公司之间的杠杆利益和财务风险的差距较大; 第五, 样本公司政治关联度的均值为0.5, 即30家样本企业中有15家企业的高管在县级以上政府、人大、政协任职。

表7 变量描述性统计分析表

变量类型	变量	样本量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中位数	最大值
因变量	EDI	30	0.17	0.21	0.03	0.11	1.08
	SIZE	30	21.99	6.09	20.15	22.04	36.52
	CASH	30	20.16	1.22	17.34	20.18	23.37
自变量	SOE	30	0.53	0.50	0.00	1.00	1.00
	LEV	30	0.47	0.17	0.19	0.47	0.90
	CMPC	30	0.5	0.50	0.00	0.50	1.00

(二) 相关性分析

本文为探究社交媒体环境信息披露的影响因素, 对选取的变量进行了相关性分析。表8报告了林业上市公司社交媒体环境信息披露和公司特征变量之间的相关性分析结果。

根据结果显示, 林业上市公司社交媒体环境信息披露水平与企业规模在10%的水平上呈正相关, 相关系数为0.581, 证明企业规模越大, 披露水平越高; 林业企业社交媒体环境信息披露水平与现金持有量的相关系数为0.104, 呈正相关, 说明企业现金持有量越高, 社交媒体环境信息披露水平就越高; 林业企业环境信息披露与产权属性的相关系数为0.426, 且在10%的水平上显著, 表明若企业产权属性为国有, 则环境信息披露的程度则会更高; 林业上市公司社交媒体环境信息披露水平与政治关联的相关系数为0.486, 呈正相关且在10%的水平上显著, 表示若高管在县级以上政府、人大、政协任职, 则该企业社交媒体上披露环境信息的可能性更大一些; 而唯一与林业企业社交媒体环境信息披露水平呈负相关的就是财务杠杆, 相关系数为-0.162, 证明林业企业财务杠杆系数越大,

则财务系统的风险就越大,不利于企业进行社交媒体环境信息披露,所以披露水平就越低。

公司规模与现金持有量间的相关系数为0.911,在5%的水平上呈正相关,代表林业企业现金持有量越多,该公司的规模越大;产权属性与政治关联呈正相关且相关系数为0.401,在10%的水平上显著,说明企业政治关联度越高,产权属性为国有的可能性就越高。

综上,现金持有量和财务杠杆对于社交媒体环境信息披露的影响不显著,故认为这两项指标与林业企业社交媒体环境信息披露水平没有必然联系。而林业上市公司的企业规模产权属性以及政治关联对于社交媒体环境信息披露具有较为显著的正向影响,所以这三项指标为影响林业上市公司环境信息披露水平的主要影响因素。

表8 社交媒体环境信息披露影响因素的相关性分析

	EDI	SIZE	CASH	SOE	LEV	CMPC
EDI	1					
SIZE	0.581**	1				
CASH	0.104	0.911**	1			
SOE	0.426*	-0.060	0.013	1		
LEV	-0.162	0.271	0.204	-0.156	1	
CMPC	0.486*	0.217	0.221	0.401*	-0.064	1

注: **、*分别表示在5%、10%的水平上显著

(三) 回归分析

本文使用SPSS27.0进行回归分析,进一步探究企业规模、现金持有量、产权属性、财务杠杆、政治关联这五个指标与林业社交媒体企业环境信息披露水平间的相关性。根据上文的相关性分析中对林业上市公司环境信息披露影响因素的研究,建立研究模型如下:

$$EDI = \beta_0 + \beta_1 SIZE_{it} + \beta_2 CASH_{it} + \beta_3 SOE_{it} + \beta_4 LEV_{it} + \beta_5 CMPC_{it} + \varepsilon \quad (2)$$

表9对SIZE、CASH、SOE、LEV和CMPC进行回归分析,各变量的容差均大于0.2且方差膨胀因子(VIF)均小于5,可以认为自变量之间不存在多重共线性,所选取的样本数据符合多元线性回归的基本假设和要求。根据上述回归结果得出以下结论:(1)企业规模与环境信息披露指数之间具有极显著的正向关系($p < 0.001$),表明企业规模对企业环境信息披露具有十分积极的影响;(2)产权属性和政治关联度这两项指标与环境信息披露指数也呈较为显著的正相关关系($p < 0.05$),说明国有企业或者高管在县级以上政府、人大、政协任职的企业更注重落实国家的环保政策,会更加积极主动地进行环境信息披露,从而使企业具有更高的环境信息披露水平。

表9 社交媒体环境信息披露影响因素的回归性分析

模型	未标准化系数		标准化系数	t	显著性	共线性统计	
	B	标准错误	Beta			容差	VIF
(Constant)	-0.241	0.445		-0.542	0.593		
SIZE	0.018	0.005	0.527	4.093	0.000	0.893	1.120
CASH	-0.007	0.023	-0.038	-0.298	0.768	0.892	1.121
SOE	0.135	0.058	0.316	2.310	0.030	0.792	1.262
LEV	-0.005	0.163	-0.004	-0.029	0.977	0.899	1.112
CMPC	0.150	0.060	0.353	2.506	0.019	0.745	1.342

五、结论与建议

(一) 研究结论

本文研究旨在分析林业上市公司在新兴社交媒体与社会责任报告中的环境信息披露的区别以及探讨其环境信息披露的影响因素。通过收集企业在微信公众号上发布的有关环境信息的文章并进行分类研究,得出以下结论:

(1)大部分林业上市公司在社会责任报告中披露的环境信息都比在社交媒体上披露的要更加详尽,尤其是重点关注的污染企业,几乎对于本文设定的每一项环境子维度都进行了定性或定量分析。这表明国家以及政府对于环境治理的重视程度在不断提升,同时企业也逐渐开始意识到自觉进行环境信息披露对于企业本身也有着正面的影响,利于树立企业形象。而大部分企业更加习惯于将环境信息披露在社会责任报告中,主要是为了更好地整合信息以及便于让相关检察人员和投资人直截了当地获取企业环境信息。

(2) 本文主要选取企业规模、现金持有量、产权属性、财务杠杆、政治关联这几项指标,与社交媒体环境信息披露水平进行相关性研究。通过分析得出,产权属性、政治关联度与社交媒体环境信息披露呈正相关,企业财务杠杆与披露水平呈负相关,企业规模、现金持有量与环境信息披露的正相关性不显著,因此不具有必然联系。

(二) 政策建议

根据实证研究的结果,本文针对林业上市公司社交媒体环境信息披露的影响因素提出三点政策性建议:

(1) 虽然我国生态环境部规定不在重点排污单位的企业可以自愿进行环境信息披露,但随着国家对于环境保护的日益重视,非重点污染单位也有一定的责任和义务对企业环境信息进行公开,这样做也有利于对企业自身的环境状况进行监督并做到及时调整和改善,也可以起到树立企业形象和吸引投资的重要作用。

(2) 大部分林业上市公司都能够在社会责任报告中披露企业环境信息,但有些企业在社交媒体上披露的环境信息较少,且这些信息中大部分都是有关于产品和服务对环境的影响,并没有过多提及企业在排放废水、废气或节能等方面的内容,所以本文建议这些企业以后在社交媒体平台进行信息披露时可以多关注这几个方面。

(3) 根据上文研究,企业规模、产权属性和政治关联度与林业上市公司社交媒体环境信息披露水平均呈显著正相关,所以林业企业要重视这三项因素对环境信息披露的影响并进行相关的调整和完善。

参考文献:

- [1] 高晓燕,向念,赵琪. 中国商业银行环境信息披露的现状、问题及展望[J].环境保护,2022,50(5):53-57.
- [2] 常馨,李书林,董战峰. 企业碳信息披露制度建设框架研究[J].中国环境管理, 2024,16(6):32-40.
- [3] 谢天,徐潇. 绿色税制改革对重污染企业 ESG 信息披露“漂绿”的影响研究[J].财会通讯, 2024(24):21-25,48.
- [4] 秦天宝. 环境信息依法披露的功能定位与优化路径[J].政治与法律,2025(2):115-129.
- [5] 彭语嫣. 微信披露环境信息及其经济后果研究——以中国石油为例[D].湖北:中南财经政法大学,2020.
- [6] Liu M, Luo, Lu W. Public Perceptions of Environmental, Social, and Governance (ESG) Based on Social Media Data: Evidence from China[J]. Journal of Cleaner Production,2023,387:135840.
- [7] 李常青,狄然. ESG 表现能缓解企业投融资期限错配吗[J].厦门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73(5):30-42.
- [8] He G, Li A. Does media coverage of firms' environment, social, and governance (ESG) incidents affect analyst coverage and forecasts? A risk perspective[J].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financial Analysis,2024,94.

A Research on Environmental Information Disclosure of Listed Forestry Companies on Social Media

Yifan Tian¹

¹School of Business, Nantong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Nantong, China

Abstract: With the increasing emphasis on environmental issues and the implementation of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measures in China, domestic scholars have gradually begun to focus on the current status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of environmental information disclosure among listed companies in recent years. This paper selects 30 forestry listed companies in China as case studies, examining their environmental information disclosure on WeChat public accounts in 2021. The environmental information disclosed on these corporate accounts is statistically analyzed and categorized, comparing the differences in disclosure across two distinct channels and identifying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environmental information disclosure on social media. The findings of this research reveal: (1) Environmental information disclosure has a positive impact on enterprises, but most forestry companies tend to disclose such information primarily in their social responsibility reports. (2) Ownership attributes and political connections have a significantly positive influence on the level of corporate environmental information disclosure. Based on these conclusions, this research proposes relevant policy recommendations to improve governance and environmental information disclosure practices in Chinese forestry companies.

Keywords: Social Media; Environmental Information Disclosure; Enterprise Governance

“看不见的空间选择”——试论欧洲美声唱法与中国民族唱法的审美差异

秦杰¹

(¹ 韩国国立全北大学, 韩国 全罗北道 全州 54896)

摘要: 音乐具有时间性, 同样也具有空间性。在声乐演唱中, 声音“空间感”的存在是良好声音审美的基础, 生理空间和心理空间的构建是优秀的歌唱者具有良好的声音审美的根本要求, 因而声乐生理空间和心理空间的构建对声乐实践或者是声乐教学具有重要意义。立足于音乐具有“空间性”这一点进行探讨, 欧洲美声唱法与中国民族唱法声音审美不同的根本原因是人的机体对不同生理空间以及不同心理空间的构建有所不同。

关键词: 空间; 美声唱法; 民族唱法; 审美

DOI: doi.org/10.70693/rwsk.v1i5.960

一段音乐的呈现, 人们往往使用“时间”进行衡量, 如“这段音乐有两分钟”、“这段音乐比那段音乐长”等等。在当今“何为音乐”这一问题的探讨中, 无论是音乐理论学科的研究还是音乐实践的探索, 在经过许多人反复论证后, 均将结论不约而同地指向一个古老的命题——“音乐是一门时间艺术”。

在对音乐时间属性的认同上面, 一方面, 尽管后来有许多音乐美学的研究者将这个古老的命题加上“内在的”、“自我意识的”等补充修饰词从而形成自己的观点, 但是不得不承认, 音乐的时间属性还是成为了一个常态认知; 另一方面, 虽然音乐发展经过多个时期, 无论是“古典”、“浪漫”时期贝多芬的《命运交响曲》、肖邦的《华丽的大波兰舞曲》, 还是发展到“现代音乐”、“后现代音乐”时期, 诸如约翰凯奇《4分33秒》等这类怪诞、离奇的音乐均不能跳脱音乐与时间属性的捆绑。

在讨论“何为音乐”时, “空间”作为“时间”的对应名词也常常被提及。在交响乐的欣赏中, 我们常常会听到两个不同音乐主题通过两种不同乐器同时演奏从而将两个所塑造的不同音乐形象进行对比, 从而产生了一种音乐内部的空间对比。从音乐的本体特征来看, 这种现象体现在不同音所构成的和声意义和节奏意义上, 因此音乐同样具有空间属性。在谈到空间属性时, 不得不提到声乐教学实践中所提到的空间感。这里所指的“空间”是指声音由声带发出, 依靠选择不同的共鸣腔体所产生的“空间”感, 而并非上文所谈到的不同音所构成的和声意义与节奏意义的“空间”属性。

在一般的音色审美认知中, 欧洲传统美声唱法与中国的民族唱法的审美区别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是美声唱法的技巧性较强, 通常认为演唱时需要“底气很足”, 喉咙要充分打开, 通俗点讲就是嗓子的管道口需要开很大; 民族唱法则被认为声音需要甜美, 声音也需要比美声细。其次美声的咬字主要着眼于元音的连贯, 讲究“腔正字圆”; 民族唱法因为汉语言的原因, 则要求“字正腔圆”。另外也认为美声唱法声音靠后, 民族唱法声音位置靠前等几个方面。

笔者认为, 我们讨论这两种唱法的音色审美差异时, 无论是谈到喉咙打开究竟够不够充分还是咬字需要“字正”还是“腔正”, 亦或者是声音位置的靠前靠后, 我们都必须将音色审美归结到腔体的选择上来。腔体的运用便是我们对声音审美上所认知的空间感。美声唱法和中国民族唱法因为有了腔体运用差异, 所以才会有空间的选择差异, 因而我们才会有对两种不同唱法有审美上的差异

一、生理空间

所谓“空间”，《现代汉语词典》²的解释是指某个物体的形状、长短、大小、宽窄、位置等特质，是物质存在的一种客观形式。在歌唱家进行演唱时，人体的相关发声器官构成了歌唱时所必需的物质条件，各个器官的相互协作于是就构成了歌唱时所产生的生理空间。这里所指的空间是以三维空间特性为标准的具有“长、宽、高”表征的空间概念。

在演唱者的整个演唱过程中，空气由口鼻吸入肺部，肺部充气体积增大，向下压迫横膈膜肌肉。发声时，横膈膜肌肉收缩部的将肺气体挤压出来，气体冲击闭合的声带，使声带振动发声；声音从声带发出，声波经过口腔、头腔、胸腔、鼻腔、喉腔所构成的共鸣腔系统向外传导。在这一过程中，整个共鸣腔系统就构成了所谓的“生理空间”。

不得不说，无论是欧洲美声唱法还是中国的民族唱法，上述过程都是在演唱中的一个基本生理过程。但是，两种不同唱法的歌唱家在演唱时，我们可以明显感觉两者具有审美差异。究其原因，不同唱法的歌唱家在演唱时对生理空间的运用有所差异。

人体的每一个器官都是以个体空间的形式存在，每一个器官的空间形态特征不一样，因而每一个器官都有自身的不同的机能特点。例如，声带作为人的发声器官，具有振动发声的机能，是歌声的产生的源头；口腔是人体的一个发声共鸣腔，口腔共鸣即是声音通过声带的发出后到达口腔是引起的口腔共振，共振点在口腔的上面的靠前硬腭的集中反射而引起的共振，这样的共振可以使我们的声音更加明亮、集中、靠前；头腔共鸣通常在声乐教学中被称为“头声”，是声音通过口腔到达鼻腔上面的蝶窦区域引起的共振，头腔共鸣可以使得声音在低音区更加有力量、明亮，具有穿透力；胸腔共鸣在中高音区均会使用到，尤其是在低音区更加明显。声波向人体声带下部传送，在气管、喉头引起振动并继续往下传送到胸中引起共振，良好的胸腔共鸣可以使声音更加饱满、色彩性强。

每个器官都是由个体空间的存在相互连接构成了一个大的机体的整体空间，演唱时，声音从声带发出的时候是非常微弱的，在经过人体的大的空间场进行加工后，才能有具有良好审美特征的声音。因此，不管是西方的美声唱法还是中国的民族唱法，均讲究声音的共鸣以及声音的空间感。在声乐实践中，如果声音缺少共鸣，均会苍白无力从而失去声音的色彩没有空间感。美声唱法在声音共鸣空间的选择上，讲究人体共鸣腔的整体运用。其中低音区更注重胸腔共鸣，所以在演唱低声区时，声音在胸腔的空间感更足；高音区以头腔、鼻腔共鸣为主，所以在演唱高声区时，头腔、鼻腔的空间感更足。美声唱法从第低声区到高声区元音的演唱使口腔一直是处于打开状态。所以，美声唱法的咬字讲究“腔正”而非“字正”。民族唱法的演唱者虽然也是同时会运用到多种共鸣同时工作，但是仍然以头腔、鼻腔、口腔的共鸣为主进行审美追求。同样因为汉语言的语言习惯，民族唱法的咬字更加注重“字正”而非“腔正”。因此，在这种咬字习惯下，民族唱法的音色让我们听起来更加高亢、明亮，同样因为良好的共鸣腔共振的运用，所以使声音听起来更加靠前、尖锐。

在两种不同的审美体系引导下，美声唱法与中国民族唱法在声音运用上体现出显著的差异。这种差异首先体现在对人体不同发声器官的选择与运用上。美声唱法是一种高度系统化、技术化的演唱体系，对演唱者的生理结构提出了全面而细致的要求。它强调充分调动和协调胸腔、咽腔、口腔、鼻腔乃至颅腔等多个共鸣腔体，以获得声音的圆润性、穿透力和丰富的音色层次。通过对各个共鸣腔体的精细控制，美声唱法能够在声音中形成低频与高频泛音的有机融合，使声音具有厚度、深度和立体感，从而满足其审美上对“圆润”“宏大”“浑厚”等特质的追求。

相较之下，中国民族唱法在技术体系上更注重本民族语言特点与文化审美的契合，其声音发声机制更侧重于口腔与鼻腔的空间利用。在实践中，民族唱法往往弱化甚至有意规避对胸腔空间的强烈依赖，除非是为了塑造特定的艺术形象或表达特定情感时才会有意识地增加胸腔共鸣的参与。这种声腔运用上的差异直接导致了两者在音色审美上的不同倾向。

从听觉感知的角度来看，美声唱法的声音通常被认为更圆润、饱满、位置靠后，并具有一定的包围感和共鸣深度；而民族唱法的声音则更为明亮、清晰、位置靠前，具有穿透力强和情感表达直接的特点。声学原理也为这种差异提供了理论支持。人声的物理本质是一种声波，不同的腔体因其空间大小差异而对声波产生不同频率的共振。口腔和鼻腔因空间较小，主要增强高频部分，从而赋予声音以清亮、明快的特征；而胸腔由于其空间较大，更倾向于产生低频共振，增强声音的厚重感和共鸣感。

因此，从声音共鸣的物理属性出发可以进一步理解两种唱法所体现的审美差异：美声唱法追求音色的整体丰满与和谐，强调高频与低频泛音的平衡；而民族唱法则更加注重高频部分的清晰与集中，使声音更贴合汉语语言的声调特征及民族文化所偏好的音色取向。这种对不同共鸣空间的选择性运用，不仅体现了两种唱法在技术层面的差异，更反映了深层次的文化审美取向和历史传统的差异性。

²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编委.现代汉语词典（第六版）[Z].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

二、心理空间

歌唱者在演唱时,为了使其演唱的音值、音强、音色、音高达到既定要求,所以必须精确控制其身体某些器官的机能状态。在这一过程中,人脑首先要在大脑里想象出一个确定的空间状态,再通过控制身体器官的机能运动,从而做到对生理空间的调节。通过人脑想象、判断以调节演唱者生理空间的这一个确定的、虚拟的空间状态在歌唱者的意识中是存在着“大小”、“长短”、“宽窄”的,这个“想象”的空间状态也具有“真实”空间状态的表征。但是这个确定、虚拟的空间的产生是经过一系列心理活动产生的,并非实体空间,是意识对物质的反映,因而我们可以将这个空间状态称为“心理空间”。

“心理空间”是人机体的一种感知状态,是通过人机体对身体各器官的协调从而形成的一种整体的运动状态再通过大脑的联想从而形成的。例如,我们在演唱中谈到说声音要“竖起来”。所谓“竖起来”,其对应的形容声音的词是“塌下去”。我们在对声音的“竖起来”、“塌下去”的认识中,必须将声音的感知建立到具有“长”、“宽”、“高”的三维空间中来。声音由“塌下去”到“竖起来”的过程就好像是一瓶从倒下到被扶起来的矿泉水、一块被捏得软烂到成型泥土。我们的意识必须是将声音想象得从“塌下去”到“竖起来”,从而在我们的脑海里形成了一个虚拟的空间,类比这个空间,我们的大脑发出信号控制我们的肌肉调动起我们集体器官的运动,如口腔的充分张开,呼吸支点的降低,肩膀的放松等,从而形成前面所提到的“生理空间”。

歌唱需要“竖起来”是美声唱法和中国民族唱法对声音概念的统一认知,但是这两者在心理空间的建构在很多方面还是有所不同,因而也造成了不同的美感差异。上文在对生理空间的认知中,我们提到了民族唱法的咬字更加注重“字正”而非“腔正”。这一现象的产生通过心理空间的建构来解释我们就可以认为:因为汉语言与欧洲语言的习惯差异,以及民族唱法很大程度上受到中国戏曲的影响,所以我们在演唱中国民族唱法的心理空间的构建时,我们脑海会构建一个“方块字”的想象空间,也就是说,我们会将字咬成“方块字”并将声音的感觉放在我们的上下唇以及牙齿的部位。而我们在演唱美声唱法时,除了汉语言与欧洲语言习惯的问题,另外为了追求声音的集中,我们的声音通过声带的发出后到达口腔引起口腔共振,共振点在口腔的上面的靠前硬腭进行集中反射。所以,美声唱法的咬字不能将注意力集中在上下唇以及牙齿上,而是应该注意力放在硬腭的共振点上。加之欧洲人将元音在歌唱中极其重视的语言习惯,所以,我们在美声唱法里的咬字时,咬辅音发出以及元音的变化不能随便改变口腔的大小并且咬字的力度不能过大;咽腔也需要有竖立空间的纵向感,也就是咬字要圆、立。

在探讨声乐演唱中的生理空间时,我们已指出,美声唱法要求演唱者充分调动身体各个共鸣腔体的空间潜力,而中国民族唱法则更侧重于口腔与鼻腔的空间运用。这种在生理空间使用上的差异,不仅体现在技术操作层面,也直接影响到演唱者对“心理空间”的构建方式。也就是说,心理空间的建立并非孤立存在,而是与生理空间密切交织、相辅相成的。不同唱法对生理空间的依赖程度与重点不同,必然引导演唱者在心理层面对发声意象和身体控制的认知结构进行相应的调整。

具体而言,在美声唱法的声乐实践中,由于其强调对整个声道系统——包括胸腔、咽腔、口腔、鼻腔、头腔等多个腔体的协同共鸣,演唱者的大脑必须构建一个复杂而全面的心理空间模型。在这个模型中,各个腔体的空间感不仅需要被清晰地“想象”出来,还必须通过训练内化为肌肉记忆,使其在发声过程中自如地参与共鸣。心理空间的构建在这里不仅是一种抽象的意识活动,更是一种精确的身体调控与感觉反馈机制。只有当演唱者在心理层面对声音的方向、体积、共鸣位置等形成完整而具体的意象,身体的各个器官才能按照这一心理图式协调运作,从而实现美声唱法所追求的那种融合高低频泛音、富有立体感、饱满且均衡的理想音色。

而在中国民族唱法的声乐实践中,心理空间的构建相对集中于口腔与鼻腔两个核心区域。这种空间构建更加注重声音的清晰度、穿透力和语言的表达性。演唱者在训练中常常通过强化对前置共鸣、鼻腔上扬、口腔前部张力等方面的感知,来精细化控制声音的走向与音质。这种较为“前置”的心理空间意象,有助于形成明亮、集中、富有民族特色的声音效果,符合中国民族唱法中对语言清晰、情感直白与音色清亮的审美追求。

从认知心理学的角度来看,心理空间的构建是一种与声音记忆、动作计划以及听觉反馈紧密相关的综合性活动。它不仅影响声音的形成方式,还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声音的情感表达与艺术风格。因此,我们可以认为,生理空间的差异不仅塑造了唱法的技术面貌,更在深层次上决定了不同唱法对声音意象的认知路径,从而形成了独特的审美取向与文化表达方式。演唱者在不断训练中逐步建立起与所选唱法相适应的心理空间,这是从声音技能到声音美感跨越的核心环节。

结 语

音乐具有时间性,同样也具有空间性。立足于音乐具有时间性这一点,学者们以往对欧洲美声唱法与中国民族唱法的声音审美的区别主要是通过咬字吐字的异同、共鸣方式的异同、声音色调明亮与否等几个方面加以分析。同样是针对两者这几点声音审美区别的分析,立足于音乐具有“空间性”这一点进行探讨,笔者认为人机体

对不同生理空间以及不同心理空间的构建是才是欧洲美声唱法与中国民族唱法声音审美不同的根本原因之所在。

另外,笔者认为,声乐工作者必须具有对声乐生理空间和心理空间构建的正确认知,才能对不同唱法的声音审美有正确的认识,才能在声乐实践中对自己的演唱提出要求,或者是有助于在声乐教学中教师对学生进行声音抽象的概念、意象的理解,以及帮助学生对无法进行视觉监视的机体行动进行把握。总之,声乐生理空间和心理空间的构建对声乐实践或者是声乐教学都具有重要意义。

参考文献:

- [1]邹长海.声乐艺术心理学[M].人民音乐出版社,2000.
- [2]邹本初.歌唱学[M].人民音乐出版社,2000.
- [3]田鸣恩.科学的唱法[M].人民音乐出版社,1987.
- [4]罗中一.从我国30多年美声唱法研究文献看声乐教学理论之构建[D].上海音乐学院,2014.
- [5]赵春萌.浅析声乐演唱中的审美心理过程及艺术实践[J].黄河之声,2017(18).
- [6]郝威威.浅析声乐演唱中联想和想象的实践应用[J].黄河之声,2017(16).
- [7]杨芳.谈声乐演唱听知觉的主要特征[J].戏剧之家(上半月),2014(05).
- [8]印海洋.如何调整心态达到最佳歌唱状态[J].黄河之声,2016(21).
- [9]陈冬燕.如何建立正确的歌唱状态[J].大众文艺,2010(08).
- [10]胡世红,崔学宝.歌唱状态探讨——论歌唱的运动性以及“声乐耳朵”的辩证性[J].艺术探索,2002(S2).
- [11]梁婧宇.探究民族唱法与美声唱法在声乐教学中的发展[J].北方音乐,2020(19).
- [13]包玉姣.声乐演唱中的点、线、平面、空间[J].广东教育(教研版),2007(12).
- [14]吴燕.浅谈当代中国民族唱法与美声唱法的融合[J].艺术评鉴,2016(04).
- [15]肖黎声.以腔行字——美声唱法歌唱训练之我见[J].中央音乐学院学报,1997(02).

“The Invisible Space Choice”——on the aesthetic difference between the European bel canto and the Chinese folk style singing

Qin Jie¹

¹Jeonbuk National University, Jeonju, Jeollabuk-do, Republic of Korea

Abstract: Music possesses not only temporality but also spatiality. In vocal performance, the perception of “spatiality” in sound forms the foundation of refined vocal aesthetics. The construction of both physiological and psychological vocal space is a fundamental requirement for accomplished singers to achieve a high level of vocal aesthetic appreciation. Therefore, establishing physiological and psychological space in vocal practice holds significant importance for both performance and pedagogy.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spatial dimension of music and argues that the fundamental difference in vocal aesthetics between European bel canto and Chinese national singing styles lies in the distinct ways the human body constructs and perceives these physiological and psychological spaces.

Keywords: space; bel canto; the Chinese folk style singing; aesthetics

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的逻辑理路

李晶¹ 王丽华¹

(¹ 潍坊食品科技职业学院, 山东 潍坊 261000)

摘要: 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 在新时代指引着中国的发展方向。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是凭空提出的, 它并非无水之源、无本之木, 它的形成蕴含着深刻的唯物史观基础, 是对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经验的科学总结。同时, 新时代我国社会发展的现实需要要求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 以加快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

关键词: 以人民为中心; 理论逻辑; 历史逻辑; 实践逻辑

DOI: doi.org/10.70693/rwsk.v1i5.972

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充分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具有的价值立场和方法依据, 是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立场和观点的继承, 是唯物史观关于群众观点的继承发展和创新。厘清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的理论逻辑、历史逻辑和实践逻辑, 有助于汇聚民智民力, 切实推动以人的现代化为目标导向的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进程^[1]。

一、理论逻辑: 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理论奠基

唯物史观是一种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其根本出发点和着眼点在于“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2], 而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正是蕴含着深刻的唯物史观基础。

(一) “现实的人”是历史发展的起点

马克思立足于现实世界, 从物质实践的视角对观念的东西进行阐释, 将“现实的人”视为实践本体论的先决条件和起点。他在对人类发展全过程的历史研究中发现, 人类社会的伟大变革是几代人实践活动的产物, 会随着实践活动的深入而发展。马克思和恩格斯将其中从事实践活动的人称为“现实的人”。

所谓“现实的人”是有生命的感性存在。首先, “现实的人”是处于一定社会历史中的人, 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先决条件。每个人的生存和发展都不能脱离一定的社会环境。其次, “现实的人”的生存和发展依赖于一定的物质生活条件, 包括他们已有的和他们创造出来的物质生活条件^[3]。再次, “现实的人”最根本的活动方式是生产实践活动, 即获取物质生活资料的劳动, 并在物质生产实践过程中实现自我塑造、自我改变和自我发展^[4]。最后, “现实的人”受到一定历史条件的影响和制约。在马克思看来, 人的存在及其活动的现实性, 作为唯物史观的本体论的出发点, 与物质第一性的观点是一致的。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就是生产劳动发展的历史。从本质上讲, 社会历史是在历史主体的现实活动中, 通过人类劳动实践将自然界转化为人化自然的过程。因此, 马克思和恩格斯将传统本体论哲学的对象重新定位为人类生活的现实世界。

马克思将历史主体——社会历史的某一特定发展阶段中, 实践和认识活动的主体——定义为参与物质生产实践活动的不被随意支配的“现实的人”, 认为历史主体中最庞大的群体就是物质资料生产的人民群众。由此, 马克思确立了“现实的人”作为社会历史发展主体的地位, 并为人民主体思想确立了逻辑上的起点, 这为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奠定了理论基石。

(二) 人民的实践活动是历史前进的根本动力

唯物史观认为人类的社会历史是人类活动产生变化和发展的过程。马克思指出, 人们在劳动中创造出世界的历史, 在实践中促进了历史的发展。

作为“现实的人”, 他们受到自然界的约束, 因此必须以某种方式生产物质生活。而人类为满足其生存需要而进行的物质生产活动就是最基本的实践活动之一。这种最基本的实践活动不仅满足和改变了人的需要, 而且还

作者简介: 李晶(1997—), 女, 潍坊食品科技职业学院思政教师, 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与当代社会发展问题研究;

王丽华(1981—), 女, 潍坊食品科技职业学院思政教师, 研究方向为思想政治教育、大学生职业指导。

改变了人所处的特定社会环境,把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联系在一起,形成一种不可分割的关系,使得主体和客体在相互作用中产生一定的历史发展规律。马克思一方面肯定人的历史主体性,另一方面强调了实践的重要性,即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对人和自然的物质世界进行对象化的活动^[5]。

自然界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必然要进行实践,作为人类社会生存的条件,马克思认为它是一种特殊的人类活动,包含了人之所以为人的三个基本特征:自由性、创造性和社会性。此外,物质实践产生了物质生活本身,同时也塑造了某些社会关系,决定了人的政治、精神和社会生活。马克思明确指出,唯物主义的出发点是实践,而后再把实践作为人的社会历史发展的起点,认为实践是人类认识的现实活动,通过把人的本质力量外化于客观世界,也把客观世界的丰富规定性体现在人的全部能力之中,从而使人与外部世界产生相互作用。总之,实践中的人是实践的主体,是社会关系的承载者,他不仅根据自己的能力和需要构建社会关系又调节社会关系。马克思十分重视实践,并最终把实践作为理解自然和社会的起点,以便具体地、历史地理解人,真正掌握人自身的运动规律。

(三) 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是人类历史发展的价值旨归

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学说在唯物史观中具有重要地位。人的创造性劳动是社会发展的主要动力,随着社会的发展,人越来越自由地得到解放和发展。马克思提出,无产阶级的共产主义革命必须克服和消除资本主义分工、私有制等造成的劳动者的异化,使所有人在社会中得到充分发展。马克思恩格斯于1848年在《共产党宣言》一书中提出一个经典命题,恩格斯称其为“标示未来社会主义新纪元的基本特征”：“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6]

马克思深化了对唯物史观的研究,明确规定社会生产的主体是人,人同时也生产社会,从这个角度出发,他把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视为共产主义奋斗的最理想目标。人的自由发展是马克思关于人民主体概念的核心,它包含三层意思:人是社会的主人,人是自然的主人,人是自己的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这三种社会形式经过这一历史发展阶段后,个体之间的社会异化关系将在共产主义社会中通过废除劳动分工和私有财产而完全消解,使个人能够充当自己的主人,所有个人都能作为社会主体参与所有实践活动,人的主体地位将得到充分提升,个人利益与共同利益的完全统一将得以实现。在构建共产主义新蓝图时,马克思认为个人发展是历史发展的基本条件,并致力于实现人类潜能的最大化。这只能通过推翻旧的资产阶级国家机器,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将“社会权力”移交给人民来实现,最终才能实现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

二、历史逻辑: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经验的科学总结

在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中以及在新时代,在不同的发展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将人民主体思想付诸于实践,共同构成了习近平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形成的历史逻辑。

(一)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人民立场的确立和巩固

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前,中国各大阶级争取的救国救民运动都以失败告终,究其根本原因,是没有正确认识人民在这一活动中的重要作用。中国共产党诞生以后,毛泽东等中国共产党人在领导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反对官僚资本主义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运动中,高度重视人民在革命中的重要作用,坚持人民立场,在密切联系人民群众、全面发动人民群众参与革命斗争中提出了群众路线,并将其作为革命的重要指导。

在此基础上,1933年8月,毛泽东同志在中央革命根据地南部十七县召开的政治会议上明确指出:“革命战争的激烈发展,要求我们动员群众”^[7]。毛泽东领导建立井冈山农村根据地时,就提出了三个任务,即打仗消灭敌人、打土豪筹物资、做好群众工作。土地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始终站在农民一边,领导广大工农群众“打土豪、分田地”,使农民分得土地,基本的生产生活资料有了保障,加强了对党的信心并积极参加革命,实现了农民在政治上和经济上的全面解放,这极大地激发了工农群众积极投身革命,争取伟大胜利,切实做到了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践行了党的群众路线,是对人民立场的巩固。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等中国共产党人从人民群众的实际需求出发,把握了党与人民群众之间血肉联系这一本质要求,自觉运用马克思主义群众观武装人民头脑、指导人民群众进行革命实践,为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开辟了的光明前景和崭新局面。

(二)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人民主体力量的充分展现

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的历史新时期,毛泽东等中国共产党人立足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新变化以及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坚持人民立场,深入分析和把握我国发展思路、前进方向和工作重点,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结合起来,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取得了一系列突出成绩,充分调动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投身社会主义事业。

新中国的成立,为中国的进步和发展提供了重要条件。当时国家落后,人民生活困苦,迫切需要建立和完善各种制度来发展经济。以人民主体思想为指导,政治上建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经济上实现恢复和发展,维护人民群众的各种利益就理所当然地成了中国共产党义不容辞的任务与职责。1949年下半年起,党领导人民没收了

官僚资本,稳定了全国的物价,党又领导人民进行了新解放区的土地改革工作,肃清了国民党统治期间的反动势力。在党的领导下,国民经济得到了恢复和发展,人民的生活水平得到了初步的改善。1953至1956年,实行社会主义三大改造,在此基础上,实现了社会主义公有制的转变,为我国社会发展奠定了经济基础。1954年9月,第一届全国人大的召开以及我国第一部宪法的实施,为人民当家作主提供了法律保障。由此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正式建立,是我国实现经济快速发展、社会安定有序以及人民生活质量的改善的重要保证,为中国实现进步与发展奠定了政治和经济基础。

(三) 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人民立场的丰富和发展

1978年12月18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揭开了我国全面实施改革开放的序幕,邓小平等中国共产党人,坚持人民立场,以保障人民利益为初心,以推进改革开放为己任,将党和国家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20世纪80年代初,在全国各地推广实施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1992年,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明确提出“三个有利于”标准,并就社会发展的一系列重大问题作出了深刻阐述,切实提高了人民的生活水平,这为我们进一步推进改革开放、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起到了很大的指导作用。我们国家的经济之所以能够快速发展,人民的生活之所以能够得到明显改善,就是因为我们始终坚持人民的立场,人民群众对国家建设的责任感与使命感才得以极大提高,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伟力由此也得到了充分彰显。

在新世纪之际,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提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把群众利益放在第一位,赢得了人民的拥护和支持,巩固了党的执政基础,推动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为新时期新思想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进入新世纪新的阶段,我国进入发展的重要时期,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提出“科学发展观”,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只有走进人民身边,关心人民安危冷暖,我们才能更好地战胜前进道路上的种种困难,使科学发展的目标能够如期实现。

(四) 新时代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的价值升华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发展进入新时代,我国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明显提高,人民主体意识越来越强,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了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

进入新时代以来,党一直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在各方面取得了伟大成就,是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立场的生动实践。例如,经过8年的时间,经过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努力,我们取得了脱贫攻坚的胜利,并顺利地完成了消灭绝对贫困的艰巨任务,创造出了人类历史上的反贫奇迹。又如,2020年,面对新冠肺炎疫情的爆发,习近平总书记亲自指挥部署,明确提出要把人民生命安全放在首位,在党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下,全国上下众志成城,仅用三个多月的时间在武汉、湖北两场保卫战中,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全国疫情得到了有效防控并进入常态化阶段,同时也取得了经济社会发展的胜利,当年我国成为全球唯一一个实现经济正增长的主要经济体。

以上种种表明,我们党坚持人民主体地位,重视人民群众在党和国家事业中所处的历史性作用,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把群众利益放在首位。

三、实践逻辑:新时代我国社会发展的现实需要

新的伟大时代,将不可避免的催生新的思想。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的必然要求以及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变的现实要求,为习近平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的形成提供了重要的实践逻辑。

(一) 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的必然要求

社会基本矛盾学说在马克思唯物史观中有重要地位,成为我们党治国理政的重要依据。马克思对客观世界,特别是对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进行了深刻的揭示,只有对社会基本矛盾及其运动规律有一个明确的把握,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才有可能得到明确的、真实的表述。

新时代以来,我国生产力水平迅速提升,经济持续中高速增长并取得明显发展成效。经济发展之余,中国民主法制建设,思想文化建设和生态文明等制度建设亦成绩斐然。我国社会生产力发展与生产关系变革的成果,不论就其广度、深度或强度而言,都具有历史性和变革根本性。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社会生产关系也发生了显著的变革。同时,作为社会主体和社会发展的产物,我们是过去社会矛盾运动的必然目标,是促进社会矛盾发展并不断解决新矛盾的原因和动力。如果绕过社会的基本矛盾,就不可能创造“美好生活”。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创造性地提出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是对社会基本矛盾理论在实践层面的发展和创新^[8]。社会基本矛盾的运动不是两对概念的冲突,而是其物质承担者,也就是人民,创造和改变历史的过程。在人类社会,除人类,人类活动及其产物之外,就不可能找到其他的东西。社会历史是在社会基本矛盾运动中进行并发展的,其中生产力具有决定性作用,同时劳动者对生产力具有决定性作用,所以社会基本矛盾的决定性作用必须由人在创造历史中的活动来补充。生产方式在社会发展中的决定性作用同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主体作用无论从理论上还是从实践上看都是完全一致的。一切英雄豪杰的历史作用,无不因符合人民的需求和力量而展现。这实质上证实了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坚持了生产方式矛盾运动的方向,是对历史前进基本规律的把握,是顺应时代发展趋势的表现。

因此,习近平把分析社会基本矛盾学说的立足点定位于人的全面发展。在这个意义上,从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的要求出发,需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

(二) 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变的现实要求

进入新时代以来,我国在各个领域都取得了巨大进步。经济的快速发展极大地改善了人民的生活,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也随之提高,综合国力和文化软实力稳步提升,国际影响力不断增强。与此同时,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转变,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依然存在。

时代的发展和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可以看出,新时期中国人民的基本需求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不仅满足了吃、穿、住的基本问题,而且对更高的物质生活水平和精神文化的需求也越来越多。特别是改革开放四十年来,生产力的提高和人民财富的增加,使人们的生活水平显著提高,对美好生活的需求更加迫切。例如,在政治生活方面,人们希望公平、有序、自主地参与和行使权利;在精神生活方面,人们希望有更多丰富多彩的精神文化活动;在生态文明方面,人们希望有更美的人居环境和更好的绿色产品;在社会服务方面,人们希望有更有尊严的生活;在职业选择方面,人们希望有更稳定的收入;在子女的教育方面,他们希望得到更公平的教育。其次,社会基本矛盾的变化表明,今天我国的发展还存在着许多不平衡的现象。发展不平衡、不充分仍然是新时代的特征之一,正在成为人们追求美好生活的现实障碍。

在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的相关论述,是坚持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的表现,这是一种实事求是的思维方式,通过联系历史和现实、理论和实践得出结论。面对社会基本矛盾的转化,中国共产党孜孜不倦地追求更高境界,将人民对美好生活视为自己的奋斗目标,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不断地满足人民的各方面需要,以加快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

四、结语

习近平的“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是以时代发展为依据,提出的新的时代表达,与我国党情、国情、社情、民情等现实状况密切相关,克服了历史发展的困境和局限,在新时代背景下作出了新的原创性贡献。不仅实现了理论层面的创新,还在实践方面表现出了其可行性和创造性。它不仅是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有力指导,也是人类发展的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的来源。厘清习近平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的逻辑理路,有助于将其更好地贯彻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去,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实践提供依据,让人民有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推动早日实现中国梦,实现每个人全面发展。

参考文献:

- [1] 徐子涵,张立梅.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的逻辑理路[J].菏泽学院学报,2025,47(01):19-27.
- [2]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295.
- [3]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520.
- [4]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525.
- [5] 张文喜.马克思论“大写的人”[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187.
- [6]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53.
- [7] 毛泽东选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19.
- [8] 田鹏颖,崔菁颖.社会基本矛盾学说的创新发展与时代启示[J].学习论坛,2020,No.428(08):70-79.

The logical reasoning of the people-centered development ideology

Li Jing¹, Wang Lihua¹

¹ Weifang Vocational College of Food Science and Technology, Weifang, Shandong 261000

Abstract: The people-centered development ideology guides the development direction of China in the new era. The development philosophy of putting people at the center was not put forward out of thin air. It is not a source without water or a tree without roots. Its formation contains a profound foundation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and is a scientific summary of the practical experience of China's revolution, construction and reform. Meanwhile, the practical needs of China's social development in the new era require that we must adhere to a people-centered approach and accelerate the process of modernization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Keywords: People-centered; Theoretical logic; Historical logic; Practical logic

基于 CDIO 理念的多音阶简易电子琴电路实验的教学设计

于沛¹ 于晟伟^{1*} 王慧颖^{1*} 李晶² 孙墨¹ 孟瑜¹ 李姚¹

(1.中国消防救援学院, 北京 北京 102202, 2.北京石油化工学院, 北京 北京 102617)

摘要:随着 CDIO 工程教育理念的推广, 其在实践教学中的应用受到广泛关注。本文以多音阶简易电子琴实验教学为例, 探讨 CDIO 理念在电子线路设计实验课程中的应用。将实验分为四个阶段: 构思阶段, 学生在教师引导下明确任务需求并分组讨论形成方案设计简报; 设计阶段, 通过 Proteus 软件仿真优化电路方案; 实施阶段, 完成原理图设计、PCB 制作及电路调试, 锻炼动手能力; 运行阶段, 小组展示作品并进行组间互评。通过全流程实践, 学生系统掌握了电子线路设计技能, 提升团队合作与创新能力, 为电子类课程实践教学提供参考, 实现了知识传授与能力培养的有机统一, 有效提高学生的工程实践能力。

关键词: CDIO; 电工与电子技术; 555 定时器; 简易电子琴

基金项目:北京市教育委员会科研计划项目资助(KM202410017006); 北京石油化工学院课程思政示范课建设项目(ZDKCSZ202203004)

DOI: doi.org/10.70693/rwsk.v1i5.973

一、引言

CDIO (Conceive-Design-Implement-Operate, 即构思—设计—实现—运行) 理念以学生为中心, 提供了“由点及线到面至体”的结构层次序列, 旨在通过系统的培养模式提升学生全方位的能力^[1]。很多教师专家将 CDIO 理念应用于教学实践中。向勇^[2]结合虚实结合的实验室建设和智慧平台应用, 创新实验教学方法, 提升学生工程思维素养。刘扬^[3]构建基于 CDIO 的三级实验项目体系, 培养学生从项目构思到运作的全过程能力。陈曦^[4]融合 OBE 和 CDIO 理念, 提出闭环管理教改方案, 通过任务增量划分和分级量化考核, 提升学生复杂数字系统构建能力, 创新实验教学方法。孙天晨^[5]开发基于 CDIO 理念的电路实验教学系统, 通过一体化教学资源、及时反馈机制和项目教学环节, 有效提升学生工程实践能力, 为电路实验教学提供新方法。罗东梅^[6]结合 CDIO 和 OBE 理念, 构建多元化课程资源和混合教学模式。段荣霞^[7]构建“三阶段、三平台、四环节”的线上线下融合式教学模式, 将思政元素融入教学过程, 通过项目驱动和全过程考核, 提升学生的综合能力和创新能力。

本文基于 CDIO 理念进行多音阶简易电子琴实验教学, 使学员深入理解 555 定时器的工作原理及其在多谐振荡器中的应用; 系统掌握电子线路设计的全流程, 包括电路设计、仿真、PCB 制作、调试与优化; 提高解决实际工程问题的能力, 培养团队合作和创新思维。让学生从产品构思到运行整个周期内, 通过主动探究、实践操作、有机融合的方式来了解工程、认识工程, 从而实现基础知识、个人能力、团队协作能力及工程系统能力 4 个层面的全方位。

二、基于 CDIO 的电路实验教学流程设计

作者简介:于沛(1989—), 女, 博士, 副教授, 研究方向为电工电子教学、消防救援装备;

于晟伟(1995—), 男, 博士, 讲师, 研究方向为偏微分方程、次黎曼流形、动力系统、复杂网络、高等数学教育;

王慧颖, 女, 博士, 副教授, 研究方向数学建模、大数据分析、大学数学教育;

李晶(1987—), 男, 博士, 副教授, 研究方向为硬件电路仿真教学;

孙墨(2006—), 男, 本科在读;

孟瑜(1989—), 女, 学士, 研究方向为教学管理;

李姚(1999—), 男, 本科在读。

通信作者:于晟伟, 王慧颖

结合 CDIO 工程教学理念,以“多音阶简易电子琴”为例阐释在实验教学中的应用过程。实验要求:以 555 定时器为基础构成多谐振荡器,要求实现高、中、低音阶的切换以及十二平均律的输入,使用喇叭来发出不同的音阶^[8,9]。教师为学生提供一套项目化、系统化的电子线路设计的全流程实验学习流程^[10]。学生在学习过程中,体会从方案设计、仿真、PCB 设计、电路板制作、功能验证、成品的全流程。如表 1 所示为基于 CDIO 理念的“多音阶简易电子琴”教学流程。

表 1 基于 CDIO 理念的多音阶简易电子琴电路实验教学流程

阶段	阶段名称	内容
1	构思	指导教师布置多音阶简易电子琴的实验要求,并给出 3-4 种实现方式,学生自由 3-4 人分组选题并设置组内人员分工,形成方案设计简报;指导教师根据小组简报情况,提出改进建议;
2	设计	查阅网络资源,选定虚拟电路元件,使用 Proteus 软件电路仿真,验证设计方案的正确性和可行性;
3	实施	仿真正确后,原理图设计、PCB 布局布线、焊接电子元器件、波形和功能测试。在指导教师的协助下,锻炼学生的动手能力和理论联系实际的能力;
4	运行	以小组为单位对各小组设计的实验作品进行功能展示,介绍设计方案、设计过程、实验过程中出现为问题和解决办法。指导教师点评和组间互评的方式共同提升学习效果。

三、实验案例

(一) 实验方案设计

实验方案组成框图如图 1 所示,方案包括电源、按键、选频、功率放大、扬声器模块以保证电子琴系统的正常工作。其中电源模块为系统提供总体电能;按键模块实现十二平均律的选择;选频模块实现低中高三音阶的转换;功率放大模块实现将输出波形进行放大处理,以驱动扬声器正常工作;扬声器模块实现音频的输出。



图 1 实验方案设计图

(二) 实验电路仿真

采用 Proteus 软件进行原理仿真设计如图 2 所示,将 NE555 的 2、6、7 脚连接构成多谐振荡器,并联电阻、电容构成 RC 振荡电路,通过改变串联电阻值改变振荡频率,连接 3 脚输出产生的音频,连接示波器可以观察到产生正确的波形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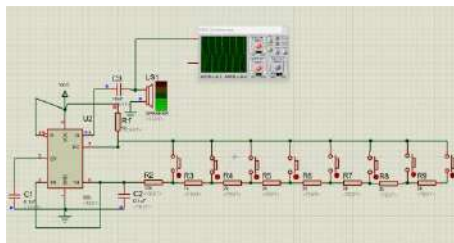


图 2 Proteus 软件仿真原理图

(三) 具体实施

3.1 原理图设计

555 定时器的多音阶简易电子琴设计与实现,包括电源、按键、选频、功率放大、扬声器模块以实现该电子琴正常运作。电源模块为系统供能提供电源,选频模块实现低中高音阶的转换,功率放大模块实现声音的放大,

接口模块设计为多按键进行交互。通过按钮开关来实现不同的 RC 调频网络，从而控制 555 多谐振荡器不同频率的波形输出；再经过音频功率放大器的放大，高、中、低音阶的切换以及十二平均律的输出。

3.1.1 电源模块设计

如图 3 所示为电源模块原理图，选用 6Pin TYPE-C 进行 5V 供电，使用 5.8mm 平头双掷有锁开关控制整体电流通断；使用 LED 灯检测电路的实际工作情况，同时串联限流电阻防止 LED 灯因电流过大导致烧毁；并将未使用的 CC1，CC2 接口串联下拉电阻进行接地处理，保证了系统供电的稳定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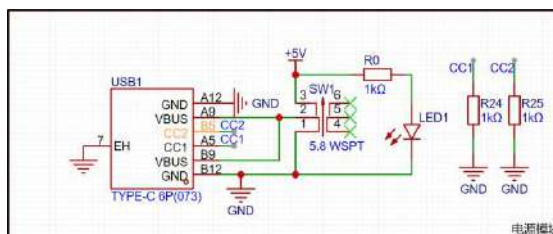


图 3 电源模块原理图

3.1.2 按键模块设计

通过 555 多谐振荡器输出不同频率的波形。由 555 定时器和外接元件 R_1 、 R_2 、 C 构成的多谐振荡器如图 4 所示，脚 2 与脚 6 直接相连。利用电源通过 R_1 、 R_2 向 C 充电，以及 C 通过 R_2 向放电端 DC 放电，使电路产生振荡。电容 C 在 $2/3 V_{CC}$ 和 $1/3 V_{CC}$ 之间充电和放电，从而在输出端得到一系列的矩形波。输出信号的时间参数为：

$$t_{w1} = 0.7(R_1 + R_2)C \quad (1)$$

$$t_{w2} = 0.7R_2C \quad (2)$$

$$T = t_{w1} + t_{w2} = 0.7(R_1 + 2R_2)C \quad (3)$$

其中， t_{w1} 为 VC 由 $1/3V_{CC}$ 上升到 $2/3V_{CC}$ 所需的时间， t_{w2} 为电容 C 放电所需的时间。

所以，555 多谐振荡器输出矩形波的频率为：

$$f = \frac{1}{T} = \frac{1}{0.7(R_1 + 2R_2)C} = \frac{1.43}{(R_1 + 2R_2)C} \quad (4)$$

为了调节输出波形的频率，我们取 $R_1=1k\Omega$ ， $C=0.4\mu F$ ，于是得到只含 R_2 变量的单变量关系式：

$$f = \frac{1.43 \times 10^7}{4(1 + 2R_2)} \quad (5)$$

通过改变 R_2 的大小就可获得不同输出频率的信号，在频率 f 已知的条件下，其相应的电阻 R_2 为：

$$R_2 = \frac{1.43 \times 10^7}{8f} - 2000 \quad (6)$$

由上述公式计算可以得到低音阶各音调所需调的电阻如下表 2 所示。

表 2 各音调对应电阻（三线表）

音调	do	do#	re	re#	mi#	fa	fa#	sol	sol#	la	la#	si	do
阻值 (Ω)	11645	10906	10159	9495	8833	8243	7662	7119	6614	6125	5671	5236	4835

结合实际元器件进行筛选与近似值处理后，设计出如图 4 所示的选频模块原理图。其中 U_6 为可调电阻，随着阻值的调整，方便使用者调音或进行滑音演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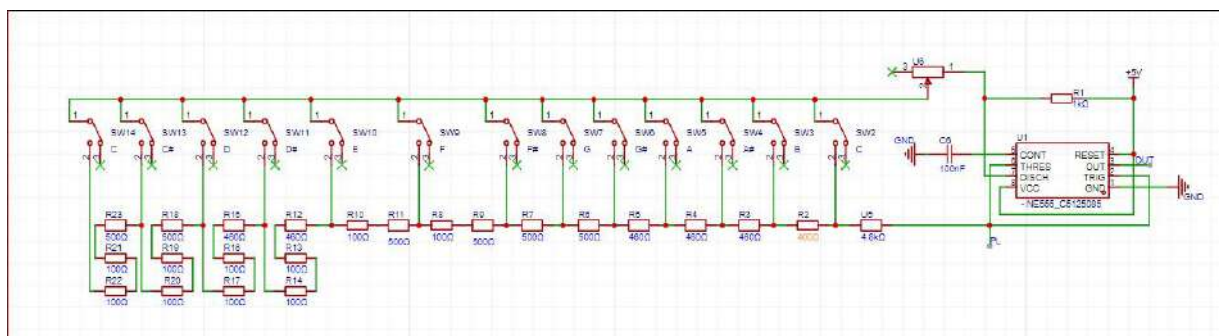


图 4 按键模块原理图

3.1.3 选频模块设计

在按键模块设计中，已经完成了低音阶电路的设计。由公式（4）可以得出，在电阻固定情况下，输出频率 f 是受电容 C 控制的。因此，改变电容 C 的大小，即可实现低音阶到中、高音阶的转换。中音的频率是低音的 2 倍，高音的频率是低音的 4 倍。使用单刀三掷开关进行切换，即可便捷的切换高、中、低频；将三个电容都分别并联一个 LED 灯，通过不同 LED 灯的亮灭以快速确定高中低频的选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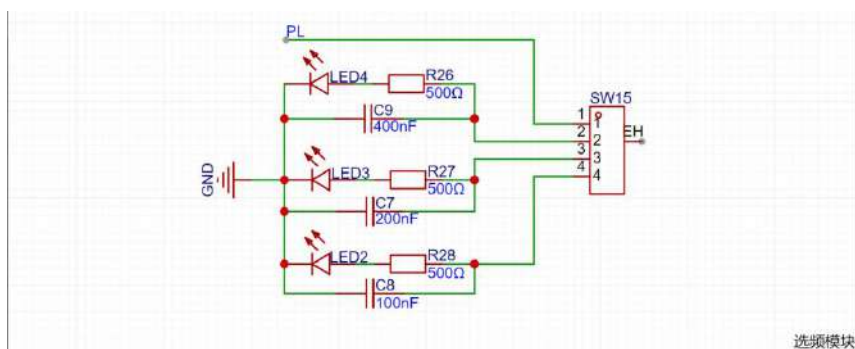


图 5 选频模块原理图

3.1.4 功率放大模块设计

如图 6 所示为功率放大模块，由 BX-PH2.0-4PZZ 和 LM386M-1 组成。使用 BX-PH2.0-4PZZ 接口实现电路板与外部扬声器之间的连接和信号传输，该模块实现了电路转化为音频的关键步骤。LM386M-1 实现功率放大，根据 LM386M-1 的数据手册确定功率放大器的放大倍率。公式（7）和（8）为放大倍数和输出公式，其中 β 为晶体管电流放大系数， R_C 为集电极电阻， r_{be} 为基极-发射极等效电阻。

$$A_v \approx -\beta \frac{R_C}{r_{be}} \quad (7)$$

$$u_o = A_v \cdot u_i \quad (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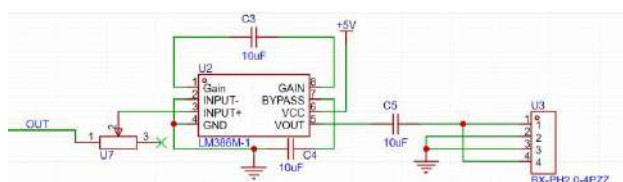


图 6 功率放大模块原理图

3.2 PCB 图设计

3.2.1 布局设计

根据电路原理图导入 PCB 板并确认主板大小后,将电路板所需的输入、输出接口优先放置在主板边缘,便于使用者使用,将各模块分类别集中放置,避免出现飞线交叉,确保各系统元件的顺利连接,将 LED 灯放置在对应功能的附近,即完成 PCB 板的布局设计如图 7 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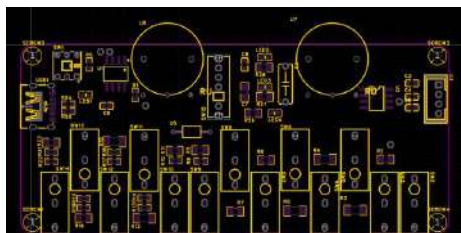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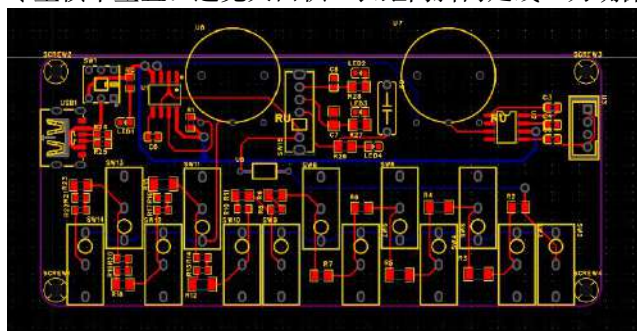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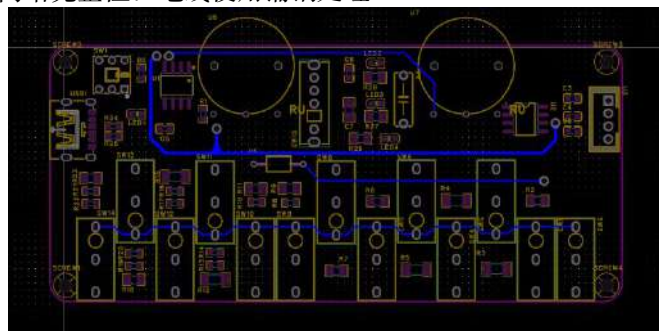
图 7 PCB 布局设计

3.2.2 布线设计

布线规则设置为电源线 (VBUS 5V 等) 0.5 毫米,信号线 (普通引脚) 0.25 毫米。使用双层板进行布线如图 8 所示,按照标准设计与美观规范,相同层之内避免出现直角、锐角布线,重要信号线尽可能远离主板边缘,在各引脚线路交叉处使用泪滴;不同层之间线路不平行走线,减少不必要的过孔数量,必要位置做净空处理;走线尽量横平竖直,避免大面积、长距离斜向走线。为确保网络完整性,地线使用铺铜处理。



(a) 顶层布线



(b) 底层布线

图 8 PCB 布线设计

3.2.3 制版、焊接与调试

上传 PCB 图进行制版如图 9 (a) 所示,焊接前要首先确定元器件数量、种类、封装规格是否与 BOM 表 (如图 9 (b) 所示) 符合。优先焊接较难焊接的贴片、多引脚元器件,为避免烙铁高温损害塑料元器件,应在其余元器件焊接结束后,再焊接易受高温损害的元器件。焊接时,应确保焊盘、烙铁温度合适,必要时使用助焊剂辅助焊接的顺利进行,避免出现虚焊。单个器件焊接结束后,使用万用表测量是否虚焊,防止后续调试时出现较为严重的系统故障。焊接结束后,在确保各元器件功能正常的情况下进行通电调试,同时使用可调电源、万用表、示波器等实验设施辅助调试。如图 10 (a) 所示为实物电路板,10 (b) 所示为功能验证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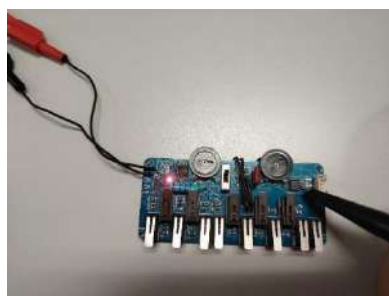


(a) 制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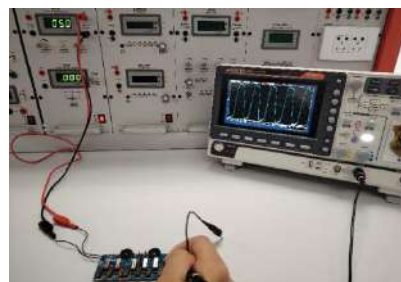
序号	数量	名称	规格	单位	备注
1	1	PCB 板	40mm x 40mm	块	
2	1	USB 接口	USB 2.0	个	
3	1	LED 灯	5mm	个	
4	1	电阻	10k	个	
5	1	电容	100nF	个	
6	1	芯片	ATmega328P	个	
7	1	芯片	MAX3221CPE	个	
8	1	芯片	MAX485	个	
9	1	芯片	MAX232	个	
10	1	芯片	MAX485	个	
11	1	芯片	MAX232	个	
12	1	芯片	MAX485	个	
13	1	芯片	MAX232	个	
14	1	芯片	MAX485	个	
15	1	芯片	MAX232	个	
16	1	芯片	MAX485	个	
17	1	芯片	MAX232	个	
18	1	芯片	MAX485	个	
19	1	芯片	MAX232	个	
20	1	芯片	MAX485	个	
21	1	芯片	MAX232	个	
22	1	芯片	MAX485	个	
23	1	芯片	MAX232	个	
24	1	芯片	MAX485	个	
25	1	芯片	MAX232	个	

(b) BOM 表

图 9 制版和 BOM 表



(a) 实物电路板



(b) 功能验证

图 10 实物图

(四) 考核评价

采用“五维度”评价体系,从实践能力、学习态度、创新能力、沟通协作能力、团队贡献度等方面全过程全方位考核学生的学习效果。其中实践能力和学习态度的评定方法以客观评价为主,利用软件中自带的 DRC 检查客观评价;创新能力、沟通协作能力和团队贡献度的评定方法结合了学员组内互评和教师综合主观评价。如表 3 所示为具体的考核评价点。

表 3 考核评价点

维度	权重	考核内容	评定方法
实践能力	30%	原理图绘制、PCB 绘制、符号绘制、封装绘制	DRC 检查通过、提交作业客观评价
学习态度	20%	实验报告查阅资料与撰写	官网统计、报告内容客观评价
创新能力	15%	综合答辩项目创新性	综合评价 (教师)
沟通协作能力	20%	团队协作项目沟通协作能力、综合答辩项目沟通协作能力	组内互评 (学生)
团队贡献度	15%	团队协作项目完成度、综合答辩项目完成度	综合评价 (教师)

四、结论

CDIO 工程教育理念对培养高素质工程技术人才具有重要意义。指导教师应找准 CDIO 理念与电子线路设计课程的契合点,从学生的兴趣点出发,发挥工程文化的育人功能,切实提高学生的实践能力,实现知识传授与能力培养的有机统一。

参考文献:

- [1] 李辰,舒睿,刘贵杰.基于 CDIO 理念的“三层次”电工电子实训教学模式探究与实践[J].黑龙江教育(理论与实践),2023,(10):63-65.
- [2] 向勇.基于 CDIO 理念探索电子控制技术实验教学新模式[J].中国教育技术装备,2024,(21):150-153.
- [3] 刘扬.新工科背景下 CDIO 理念在《电工电子学实验》中的应用[J].电脑知识与技术,2020,16(02):142-144+146.
- [4] 陈曦,于金鹏.基于 OBE-CDIO 理念的“数字电子技术”实验教学设计[J].电气电子教学学报,2023,45(01):200-203.
- [5] 孙天晨.基于 CDIO 的电路实验教学系统设计开发与应用研究[D].华东师范大学,2023.
- [6] 罗东梅,何姗姗,孙文玲,等.CDIO-OBE 理念下的嵌入式系统课程改革探索与实践[J].电脑知识与技术,2025,21(08):161-164.
- [7] 段荣霞,郎宾,李楠.基于 CDIO 工程教育模式的“电工电子实训”课程教学设计研究[J].工业和信息化教育,2024,(05):76-80.

- [8] 黄杰庆,戴权晶,刘月红.一种基于 555 定时器的多音阶简易电子琴设计与实现[J].电子制作,2022,30(14):74-76.
- [9] 杨艺敏,刘涛,陈锡华,等.基于 BOPPPS 教学模式的数字电路与逻辑设计课程教学探究——以 NE555 定时器及其应用为例[J].西部素质教育,2025,11(04):173-177.
- [10] 于沛,李晶,丁杨,等.电子电路设计实验全流程教学改革探索[J].电气电子教学学报,2024,46(04):204-207.

Teaching Design of Multi scale Simple Electronic Piano Circuit Experiment Based on CDIO Concept

Yu Pei¹, Yu Chengwei^{1*}, Wang Huiying^{1*}, Li Jing², Sun Mo¹, Meng Yu¹, Li Yao¹

¹ China Fire and Rescue Institute, Beijing 102202, China

² Beijing Institute of Petrochemical Technology, Beijing 102617, China

Abstract: With the promotion of the CDIO (Conceive, Design, Implement, Operate) engineering education philosophy, its application in practical teaching has attracted widespread attention. This paper takes the Multi-scale Simple Electronic Piano experimental teaching as an example to explore the application of the CDIO philosophy in the electronic circuit design experimental course. The experiment is divided into four stages: In the Conceive stage, students, under the guidance of teachers, clarify the task requirements and form design briefs through group discussions. In the Design stage, students optimize the circuit design through simulation using Proteus software. In the Implement stage, students complete the schematic design, PCB fabrication, and circuit debugging, thereby enhancing their hands-on skills. In the Operate stage, groups showcase their works and conduct peer evaluations. Through the entire process of practice, students systematically master the skills of electronic circuit design, improve their teamwork and innovation abilities, and provide a reference for the practical teaching of electronic courses. It effectively integrates knowledge transmission with capability cultivation and significantly enhances students' engineering practice abilities.

Keywords: CDIO; Electrical and Electronic Technology; 555 Timer; Simple Electronic Piano

严肃游戏视域下的汽车文化传播研究

史舒扬¹

(¹北京汽车博物馆, 北京 100071)

摘要:当前, 文化遗产传播正经历着从单向输出到多维交互的深刻转变。本文聚焦于北京汽车博物馆的严肃游戏实践, 探究怎样借助叙事重构、技术赋能以及场景创新等方法, 促进汽车文化从静态展示向动态交互传播改变。研究认为, 北京汽车博物馆的严肃游戏以具身认知理论为内核, 经由“侦探的诞生”“车辙的千年印记”等项目建构的多种形态的体验空间, 将汽车历史、机械原理以及文化价值融入角色扮演、解谜探索等游戏机制, 形成历史、科学、文化元素相融合的新型传播体系。研究同时指出, 汽车博物馆要深化跨学科叙事框架, 提高AI、AR、VR等技术对沉浸式体验的支持, 并进一步建构全球化传播生态。北京汽车博物馆的创新实践证实了严肃游戏在汽车专题类博物馆科学传播中的价值, 为文化遗产的数字化传承提供了可供参考的路径。

关键词: 严肃游戏; 汽车文化; 科学传播; 博物馆传播

DOI: doi.org/10.70693/rwsk.v1i5.953

在全球化浪潮以及数字化技术的双重推动之下, 文化遗产的传播范式正经历着一场从单向输出到多维交互的深刻转变。作为工业文明的标志性符号, 汽车记录了科学技术的发展历程, 也承载着社会记忆、审美变迁以及文化价值等多方面的内涵。当前, 汽车文化在博物馆之中主要依靠静态展示、线性叙事等方式来进行传播, 而以上传播方式导致了公众参与度较低、体验层次较为单一等一系列问题的出现。在这样的背景之下, 以严肃游戏作为代表的新型互动传播方式借助场景重构以及参与者主导的叙事逻辑, 为汽车文化传播效能的提升提供了创新实践范式。

作为汽车专题类博物馆, 北京汽车博物馆近年来积极探寻游戏化叙事与文化传播相结合的科学传播实践模式, 借助设置一系列汽车主题的游戏展项, 建构起展区内部具有示范作用的体验空间。北京汽车博物馆的严肃游戏体验项目打破了传统博物馆以展品为中心的传播模式的限制, 亦证实了具身认知理论的有效性, 即当参观者经由游戏化交互获取具身体验时, 他们对于汽车历史、科学原理以及文化内涵的认知将获得较大程度的提升。本文以北京汽车博物馆作为实例, 梳理严肃游戏视域下的汽车文化传播特点, 分析严肃游戏对汽车文化传播的实质性影响, 并且为汽车专题类博物馆的可持续发展提供建议。

一、严肃游戏视域下的汽车文化溯源与发展

“严肃游戏”(Serious Games)这一概念最初由学者克拉克·C·阿布特(Clark C. Abt)提出, 它指的是一种有明确的教育目标, 并且主要目的并非单纯为了娱乐的游戏形式。随着游戏传播体系不断发展, 严肃游戏已经从最开始的卡牌、桌游领域延伸至电子游戏, 其应用内容也逐渐涉及到教育、医疗、军事、文化传播等多个方面。

汽车文化与严肃游戏有着较高的适配性, 一方面, 汽车的机械结构以及工作原理可以借助游戏实现可视化呈现, 另一方面, 汽车的历史发展脉络在叙事性游戏设计中也能够得到生动的展现。汽车文化和严肃游戏的结合源自驾驶培训类模拟器的开发, 自20世纪90年代起, 随着计算机等科学技术的发展, 汽车制造商与科研机构开始将驾驶模拟系统逐渐引入驾驶员的培训流程当中, 一系列相关严肃游戏的制定提高了驾驶者模拟复杂路况的应急能力。这种类型的严肃游戏不但拥有科学传播功能, 还凭借虚拟场景的设置传递了交通安全等文化理念。

21世纪初期, 游戏引擎技术取得了突破, 这为汽车文化和严肃游戏的结合增添了更多科学方面的元素。微软推出的《极限竞速》系列(Forza Motorsport)拥有高度拟真的车辆物理引擎以及赛道设计, 这款游戏不仅能够契合赛车爱好者的需求, 还被汽车工程院校运用于车辆动力学教学, 成为了科学以及文化传播的双重载体。在同一时期, 汽车品牌开始积极主动地参与到游戏开发之中。宝马便与《极品飞车》进行了游戏传播方面的合作, 他们将品牌历史以及设计理念融入到游戏叙事内部, 形成了“虚拟展厅”效应, 提高了用户对于品牌文化的认知。2003年, 国际游戏开发者协会(IGDA)提出严肃游戏应该具备互动性和教育性等特征, 这一理念促使汽车文化与严

作者简介: 史舒扬(1992-), 女, 博士, 研究方向为科学传播研究、比较文学与跨文化研究等。

肃游戏的结合进一步向着多维度拓展。

2010年后,汽车文化和严肃游戏的结合逐渐突破了工具性的局限,而是向着文化价值的传递转变。在国内,吉利汽车将赛车文化、改装艺术和游戏进行结合,依靠“超吉联赛”等电子竞技活动,吸引年轻群体广泛关注中国汽车工业的发展情况;在国外,《极限竞速:地平线5》则选择墨西哥汽车文化作为背景,借助虚拟场景来还原当地的民俗以及工业历史,达成了地域文化在全球范围内的传播。近年来,汽车博物馆开始借助严肃游戏来重新建构参观者的观展体验,在德国梅赛德斯-奔驰博物馆推出的AR项目里,参观者可以依靠互动体验去了解经典车型以及其背后的故事,北京汽车博物馆也可以借鉴这一模式,利用游戏化叙事呈现中国汽车工业的里程碑事件,例如红旗轿车的研发历程或新能源技术的突破等。

当前,汽车文化传播和严肃游戏的融合呈现出技术、文化、玩家三者共创的发展特征,一方面,虚拟现实技术(VR)以及增强现实技术(AR)持续进步,使得严肃游戏的沉浸体验感得以加深;另一方面,参与者共创模式兴起,玩家开始参与车辆改装设计,不断达成多方协同创新。从驾驶模拟工具转变成文化传播媒介,汽车文化与严肃游戏的结合一直和技术进步、产业需求以及文化发展紧密关联,其发展过程体现了游戏作为媒介的功能拓展,也指出了数字化时代汽车文化传播的多样化路径。北京汽车博物馆将严肃游戏纳入科学传播体系,不仅能够提升观众的互动体验,还能够建构汽车文化的动态传承模式,为行业提供创新传播的范例。

二、严肃游戏视域下的汽车文化传播特点

作为一种融合教育性与娱乐性的传播形式,严肃游戏在科学文化传播进程中借助游戏机制激发了参与者的主动性以及沉浸感。北京汽车博物馆在开展汽车文化传播活动时,凭借自身丰富的馆藏资源以及科技手段开发了多种类型的严肃游戏,建构起以叙事为核心、以问题为导向、以场景为载体的传播模式。本节将以北京汽车博物馆为实例,详细分析严肃游戏视域下的汽车文化传播特点。

北京汽车博物馆的严肃游戏文本以叙事为核心,借助完整的故事架构,将汽车文化知识融入到角色扮演以及情节发展的进程之中。《侦探的诞生:幻影列车》阅读活动以“侦探解谜”剧本游作为基础,参与者需要采用阅读书籍、观察展品、破解谜题等诸多方式,还原“消失的后视镜”这一事件的真相。《穿越时空的未来驾驶员》科普剧则以飞行汽车的研发作为背景,参与者需要在博物馆内收集“龙芯”零件,完成科学挑战。以上游戏在悬疑叙事之中将汽车文化知识串联起来,激发了青少年对于汽车结构的兴趣,将原本单向的知识传递转变为多线程的科学探索,达成了对汽车文化的深刻认知以及情感共鸣。

北京汽车博物馆的严肃游戏设计以问题为导向,引导参与者依靠观察、推理以及实践等一系列方式形成知识的内化。在《丢失的后视镜》科普探索游戏中,参与者需要对一级藏品“吉斯110”缺失后视镜这一现象进行详细观察,据此提出自己的猜想,并依照线索去查阅档案,与“老师傅”“奇妙博士”等NPC展开互动,最终了解汽车设计的演变历史。而在“时空穿梭:寻找龙芯之旅”剧本游中,参与者则要对汽车部件的功能进行分析,还需破解机械原理方面的谜题,最终合成“龙芯”。以上游戏将汽车工程知识分解成为可以实际操作的关卡,强化了“实践-理论-再实践”的学习程序,充分展现出具身认知理论的关键作用,即借助身体参与以及环境互动来推动科学知识的建构。

北京汽车博物馆的严肃游戏展示以场景为载体,着重将汽车文化符号转变为可以被感知、可进行传播的主体。在文创产品的符号延伸层面,博物馆依据汽车的演变历程的特征,增添了印章、百车图卷轴等线索,将中华文化和汽车历史融合成创新游戏形式,创造了独特的博物馆藏品、文化、教育三位一体的传播模式。在国际交流的场景设置方面,博物馆在一系列特展、临展之中展示了北京-巴黎拉力赛等汽车赛事的经典场景,以“车轮”作为连接文化价值的符号,突出汽车身为跨文化对话媒介的重要作用。以上游戏借助文化符号及国际交流等演绎形式,将藏品展示升华为文化对话,建构起更为立体的科学传播体系。

由此可见,在汽车文化与严肃游戏相结合的过程中,北京汽车博物馆借助多维度以及多层次的游戏叙事方式,建构起独特的汽车文化传播体系。这一特殊传播体系的特征是以参观者为核心,将知识传递转变为主动探索,促进汽车文化由静态展示向动态体验转变,进而从专业领域延伸到日常生活之中。这一模式也为其他汽车专题类博物馆的科学文化传播提供了可供参考的范式。

三、严肃游戏视域下的汽车文化传播创新:“车辙的千年印记”案例分析

目前,在严肃游戏创新领域,北京汽车博物馆推出了针对青少年的融媒体科普教育项目“车辙的千年印记”,它的主要设计目标是借助严肃游戏的互动形式,达成汽车文化的沉浸式传播以及科学思维的培养。该项目选择将车轮的演变历史作为叙事主线,融合PBL(Problem-Based Learning)教学法,打造了兼具知识性、实践性和趣味性的跨媒介学习场景。

在项目创新理念方面,“车辙的千年印记”创造性地提出了三种科学传播的融合理念。其一为历史与科技的融合叙事,以车轮的技术迭代作为游戏线索串联起“老爷车时代”“汽车百家争鸣时代”“现代汽车时代”三场时空穿越,将汽车工业史转变为可体验的探索任务;其二是多模态交互的传播模式,以科普图书、研学手册、模型制作、视频微课四种媒介形态作为主要传播形式,并借此达成“认知”“实践”“创造”三者不断循环的闭环学习路径;其三是设定游戏化学习机制,例如引入卡通 IP“嘟嘟”作为引导者,借助寻宝、解谜、挑战赛等游戏化任务激发青少年主动剖析科学知识的兴趣。

在游戏叙事设计方面,“车辙的千年印记”项目以车辆发展的三种不同时代作为核心叙事框架,将汽车技术发展史转变为沉浸式探索任务。最初的老爷车时代以辐条车轮为典型代表,游戏借助对杜瑞亚 L 型汽车、福特 T 型汽车等藏品展开的探索,引入“怎样解决木辐条车轮稳定性问题”的终极任务,以此引导参与者区分传统工艺与现代材料之间的差异。其次是汽车百家争鸣时代,这一时代以辐板车轮为代表,游戏以红旗 CA72、解放 CA10 等藏品作为载体,设计“重型车辆车轮承重实验”来对比辐条与辐板结构的力学性能,进而理解技术革新的必然性。最后是现代汽车时代,这一时代科技感与智能化特征并存,游戏依靠解剖式展车(沃尔沃 740 Turbo 等)以及发动机的动态演示,结合“记里遥控车”模型制作等活动,将古代记里鼓车的机械原理与现代里程表技术联系起来,达成古今科技的跨时空对话。

在具体模块设置方面,“车辙的千年印记”项目安排了展厅研学营、模型实践课、趣味挑战赛三类严肃游戏互动模块,借助沉浸式互动提高参与者对汽车文化的认识。其中,展厅研学营以“找·展品”“听·故事”“学·知识”“玩·手册”作为任务链,例如在“记里鼓车”展项中,参与者要观察车轮转动和鼓槌击打的机械联动情况,推导出里程记录的原理。模型实践课是围绕汽车主题且基于 PBL 教学法的实践课程,参与者需要分组完成“记里遥控车”的拼装与调试工作,并且在小组合作期间解决齿轮传动比、信号反馈等实际问题,以此来理解动力传递以及数据记录的工程逻辑。趣味挑战赛更注重实地操作环节,北京汽车博物馆在西广场设置了竞速赛道,参赛者及其家庭要依据手册中的科学原理来优化遥控车性能,将知识应用转化为有竞争性的游戏目标,同时在这一过程中强化学习成果。

在科学传播策略方面,“车辙的千年印记”项目运用科普图书、研学手册、视频微课以及 UGC 创作等多种媒介协同的传播形式,建构起多维度的汽车文化传播矩阵。科普图书《汽车博物馆寻宝之旅》以问答式文本和拟人化 IP 形象“嘟嘟”相结合的方式,将发动机原理、制动系统等专业知识转变为寻宝解密任务,产生了独特的科学传播效应。研学手册《车辙的千年印记》依据北京汽车博物馆内部展品信息以及游戏项目内的动手实验来开展科学传播,在“转向系统”章节中,参与者可借助折纸模拟转向连杆运动,使抽象原理变得更加具体形象。视频微课与 UGC 创作激励参与者制作体验视频或绘画作品(内容涵盖展品解读、模型制作过程等),通过在社交媒体分享视频实现二次传播,进一步提升了游戏的影响力。

在传播价值成效方面,“车辙的千年印记”项目改变了传统博物馆的静态展陈方式,借助观察、实践、反思等一系列学习途径,引领青少年提高自身的科学思维能力、动手操作能力以及问题解决能力。由此可见,该项目的创新实践印证了严肃游戏在汽车文化传播领域所拥有的独特优势,其内部驱动型叙事建构了博物馆新型沉浸式传播空间,参与式设计强化了参与者的游戏主体性以及相关学习体验,情感化传播增进了青少年对汽车文化的情感认同,这些特点无疑提升了汽车博物馆在科学文化传播过程中的传播价值与传播成效。

四、启示与建议

当前,严肃游戏在汽车文化传播领域已经展开了一系列创新实践,这些实践为博物馆教育功能的拓展赋予了全新的思考角度。本文围绕北京汽车博物馆在严肃游戏视域下有关汽车文化传播的创新情况展开研究,证实了严肃游戏在知识传递、情感共鸣以及文化认同方面的独特意义,其经验对汽车专题类博物馆的科学传播模式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依照前文梳理的内容,本节将从叙事体系、技术融合、传播生态三个方面提出相应的启示与建议,以此为博物馆文化传播的游戏化转型提供参考。

在叙事体系方面,要深化叙事驱动,建构学科知识融合体系。严肃游戏的关键竞争力在于叙事逻辑和知识体系之间的深度融合,在博物馆开展科学传播工作时,历史脉络与科学技术相结合可以有效激发参与者的探索精神。借助这一视角,汽车博物馆可以从两个方面来优化叙事策略,一方面是强化跨学科叙事框架,将汽车文化与社会史、科技史、艺术史等学科联系起来,例如在展示新能源汽车技术时,可以融入气候变化、能源革命等全球化议题,借助游戏任务引导参与者思考技术演进与社会发展之间的关系。另一方面是开发分层叙事结构,针对不同年龄以及知识背景的受众群体设计差异化的叙事路径,对低龄儿童采用卡通 IP 引导的拟人化叙事,对青少年增加工程原理推导等理论型任务,对成年观众则侧重于历史文化的深度挖掘,借此达成分众化传播的效果。

在技术融合方面,要赋能技术体验,推动虚实结合场景创新。当前,严肃游戏的沉浸感主要源自实体展品和剧本任务的融合,而人工智能、VR、AR 等技术的不断普及无疑为场景的升级创造了崭新的可能性。汽车博物馆

可以从两个方面对技术体验进行赋能,一方面,建构虚实结合的新型展示场景,例如运用 AR 技术重现北京-巴黎拉力赛的历史场景,让参与者能够与相关虚拟人物展开互动。另一方面,引入生成式 AI 来优化游戏交互逻辑,借助人工智能生成个性化的科学知识探索路线,依照参与者的体验反馈动态调整游戏难度,并且自动生成定制化的学习报告。

在传播生态方面,要优化传播途径,加强科学话语体系建设。汽车文化具有天然的跨文化属性,参与者在体验严肃游戏时可以将其视为文化对话的媒介载体。基于这一视角,汽车博物馆可以从两方面提升科学话语体系建设的能力,一方面是开发多语言文化适配的游戏版本,例如在“车辙的千年印记”项目中融入不同国家的科学文化传播介质(如语言或形象化注释),借助本地化叙事扩大文化传播范围。另一方面是打造云端协作游戏平台,联合全球汽车博物馆建立线上联盟,设计跨国团队任务(如“汽车赛事中的文化溯源”项目),让各国青少年通过科学协作破解技术谜题,在互动中理解文化的多样性。

可以认为,严肃游戏与汽车文化传播的融合打破了传统博物馆的单向文化传播模式。借助叙事重构、技术介入以及生态化运营等方式,汽车博物馆中的科学文化传播形式逐渐由观看转为体验,从传播升级为共创。实践表明,只有以参观者为中心,将专业知识转化成可感知、可交互、可传播的游戏化体验,才能真正达成博物馆科学传播体系的转型。在未来,随着元宇宙等数字生态概念的成熟,严肃游戏将会激发出更多种类的认知交互形态。博物馆行业的从业者应当持续保持创新自觉,推动科学知识与文化传播之间的深度融合。

参考文献:

- [1] ABT CLARK C. Serious games[M]. Lanham: University press of America, 1987.
- [2] 李德庚.流动的博物馆[M].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 2020.
- [3] 刘红鹰.盛大游戏对严肃游戏的判断和布局 [EB/OL]. (2011-10-30)[2025-04-17]. <https://www.techweb.com.cn/news/2011-10-30/1112121.shtml>
- [4] 龙迪勇.空间叙事学[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5.
- [5] 朱绍中等.汽车简史[M].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 2008.

Research on the Communication of Automobile Culture in the Perspective of Serious Games

Shi Shuyang¹

¹ Beijing Auto Museum, Beijing, China

Abstract: Currently, cultural heritage communication is experiencing a profound transformation from one-way output to multi-dimensional interaction.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practice of serious games in Beijing Auto Museum, and explores how narrative reconstruction, technological empowerment and scene innovation can facilitate the change from static display to dynamic interactive communication of automobile culture. The study shows that the serious game of Beijing Auto Museum takes embodied cognition as the theoretical background, and builds a multimodal experience field through projects such as ‘The Birth of the Detective’ and ‘The Thousand-Year Prints of the Ruts’, embedding the history of automobiles, mechanical principles and cultural values into role-playing, puzzle-solving and exploration game mechanisms, forming a new communication system that integrates history, science and cultural elements. The study further points out that auto museums need to deepen the interdisciplinary narrative framework, strengthen the support of AI, AR, VR and other technologies for the immersive experience, and build a globalized communication ecology. The innovative practice of Beijing Auto Museum verifies the value of serious games in the science communication of automobile thematic museums, and provides a referable path for the digital inheritance of cultural heritage.

Keywords: Serious games; Automobile culture; Science communication; Museum communication

《阿诺拉》：一场关于身份与权力的电影隐喻

辛月¹

(广州工商学院, 广东 广州 510000)

摘要：本文旨在深入剖析奥斯卡获奖影片《阿诺拉》中所蕴含的丰富政治隐喻，通过对影片中人物设定、情节发展以及相关历史背景的细致解读，揭示出电影如何巧妙地映射出现代国际关系中俄罗斯、乌克兰、亚美尼亚和美国之间的复杂互动与权力博弈。通过对影片表层爱情故事的解构，挖掘出其深层的政治寓意，探讨导演如何运用电影语言将地缘政治冲突、国家身份认同以及阶级差异等严肃议题融入到一个看似通俗的叙事框架之中，从而引发观众对于当代国际格局的深刻思考。

关键词：《阿诺拉》；政治隐喻；身份认同；国际关系；阶级差异

Doi: doi.org/10.70693/rwsk.v1i5.926

一、引言

在电影艺术的长河中，真正能够触动人心并引发深刻思考的作品，往往不仅仅是视觉与听觉的盛宴，更是思想与情感的深度交融。肖恩·贝克的《阿诺拉》宛如一颗璀璨的星辰，在第97届奥斯卡颁奖典礼上大放异彩，一举斩获最佳影片、最佳导演、最佳女主角等五项大奖，成为电影艺术与思想性完美结合的典范。这部影片以其独特的叙事手法和深刻的主题内涵，为观众呈现了一个充满隐喻与反讽的光影世界，使得我们在欣赏其艺术魅力的同时，也不禁陷入对现实世界的深刻反思。

影片的表层故事看似简单：一位脱衣舞女阿诺拉与年轻富二代伊万因一场短暂的婚姻而产生交集，最终在现实的冲击下分道扬镳。然而，当我们深入挖掘其内核，便会发现导演巧妙地将诸多政治隐喻融入其中，使其成为一部关于身份、权力以及国家间复杂关系的隐喻性文本。从人物的外形选择到剧情的巧妙安排，从历史背景的隐晦指涉到文化符号的精准运用，每一个细节都仿佛是导演精心埋设的伏笔，等待着观众去解读其中的深意。

在当今这个全球化与地缘政治冲突并存的年代，电影作为一种强大的文化表达形式，其承载的意义早已超越了娱乐的范畴。它成为了社会现实的镜像、文化观念的载体以及政治思想的传播媒介。《阿诺拉》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以其独特的视角和深刻的洞察力，将国际政治的复杂图景浓缩于一个看似平凡的爱情故事之中，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解读当代世界格局的全新视角。

正如法国著名电影理论家安德烈·巴赞所言：“电影是现实的渐近线”，它不断地趋近于现实，却又在某种程度上超越现实。《阿诺拉》通过对具体人物命运的描绘，将抽象的国际关系具象化，使得观众能够在情感共鸣中理解那些宏大的政治命题。这种艺术与思想的融合，不仅赋予了影片极高的艺术价值，更使其成为一部具有深刻社会意义的文化产品。

二、人物设定：身份与权力的视觉符号

在《阿诺拉》这部影片中，导演对于男女主人公的外形选择绝非随意为之，而是蕴含着深邃的政治隐喻与文化内涵。这种精心构建的人物形象，成为了解读影片深层次主题的关键线索，引领观众透过表象去洞察隐藏于其后的权力结构与身份认同问题。

（一）阿诺拉：美国身份与俄罗斯血统的交织

影片中的女主角阿诺拉，由拥有黑色发色和眼珠的犹太裔演员米奇·麦迪森饰演，她被设定为一个具有

作者简介：辛月，广州工商学院国际教育学院专任教师，助教，研究方向：历史学，社会人文。

俄罗斯血统的 25 岁美国公民。这一人物设定本身就构成了一个复杂而富有张力的身份符号。阿诺拉的美国身份使其天然地与这片土地的价值观、文化传统以及社会结构相联结，而她的俄罗斯血统又为她蒙上了一层来自东欧大陆的神秘色彩，她的血液中流淌着另一种历史记忆与文化基因。

从地缘政治的角度来看，美国与俄罗斯作为当今世界的两个重要大国，其关系始终充满了竞争与博弈。阿诺拉的身份设定无疑是在隐喻这种复杂而微妙的美俄关系。她既是一个独立的个体，承载着个人的梦想与追求，同时又在某种程度上象征着两个大国之间的文化交融与冲突。她的存在，仿佛是一道桥梁，连接着东西方两个世界；又如同一面镜子，映照出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价值观差异与碰撞。

在影片中，阿诺拉作为一名脱衣舞女，身处社会的底层，面临着阶级的压迫与生存的困境。然而，她却怀揣着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渴望通过与伊万的婚姻实现阶级的跃迁。这种对美国梦的追逐，实际上是对美国社会价值观的一种映射，同时也揭示了在全球化背景下，个体在追求身份认同与社会地位时所面临的困境与挣扎。

（二）伊万：俄罗斯富家子弟的典型形象

与阿诺拉相对应的男主角伊万，则是由拥有典型欧洲人外表的俄罗斯演员马克·埃德尔斯斯坦饰演。21 岁的伊万被设定为一个俄罗斯富家子弟，他的形象在影片中被刻画得颇为鲜明：享受着优越的物质生活，却在精神上显得空虚与迷茫；渴望摆脱父母的控制，追求个人的自由，却又在关键时刻表现出软弱与妥协。

伊万的形象可以被看作是俄罗斯新一代青年的代表，他们在苏联解体后的新俄罗斯社会中成长，面临着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价值观的冲突与融合。他的父亲作为俄罗斯的军火商，象征着俄罗斯在国际舞台上强大的军事工业力量以及在地缘政治中的重要地位。而伊万本人则代表着那些在新自由主义经济浪潮中成长起来的俄罗斯青年，他们享受着全球化带来的物质红利，却在精神层面迷失了方向。

伊万为了获得美国身份而选择与阿诺拉结婚，这一行为实际上隐喻了俄罗斯青年对于西方文化的向往与追求。然而，当他得知父母要来解除婚姻关系时，他的仓皇而逃以及随后的酗酒放纵，则揭示了他在面对强权父母时的无奈与软弱。这种性格上的矛盾，正是俄罗斯在国际关系中所面临的困境的一种体现：一方面，俄罗斯试图通过与西方的接触与合作来提升自身的国际地位；另一方面，又难以摆脱传统的大国思维与地缘政治束缚，导致在与西方的互动中始终处于一种矛盾与挣扎的状态。

（三）亚美尼亚打手团：地缘政治的隐喻符号

在影片中，一直陪伴在阿诺拉身边的打手伊戈尔，其扮演者尤拉·鲍里索夫是名俄罗斯男演员，但在剧中被设定为亚美尼亚人。这一人物设定同样具有深刻的政治隐喻意义。亚美尼亚作为一个在历史上饱受磨难的国家，其与俄罗斯、土耳其等周边国家的关系错综复杂。在影片中，亚美尼亚打手团的出现，实际上是在隐喻地缘政治中那些处于大国夹缝中的小国角色。

伊戈尔这个角色在影片中展现出一种矛盾的特质：一方面，他对阿诺拉表现出关心与同情，在面对伊万父母的强权时，他试图为阿诺拉发声，维护她的尊严。另一方面，他又不得不屈从于伊万父母的安排，执行他们的命令。这种矛盾的性格，正是亚美尼亚在国际关系中的真实写照。在大国的博弈中，既希望能够维护自身的独立与尊严，又不得不在一定程度上依附于大国以寻求生存与发展的空间。

值得注意的是，伊戈尔的外表酷似普京，这一细节设计无疑是在向观众传递一种关于权力与政治的暗示。普京作为俄罗斯的象征性人物，其形象在影片中的出现，使得观众能够更加直观地联想到俄罗斯在国际舞台上的权力地位以及其在地缘政治中的影响力。而伊戈尔在剧中亚美尼亚人的身份，又进一步加深了这种权力关系的复杂性，暗示着小国在大国面前的无奈与妥协。

三、剧情分析：爱情故事背后的政治博弈

《阿诺拉》的剧情表面上是一段因身份与婚姻而起的爱情故事，但深入探究其内核，便会发现导演巧妙地将国际政治的复杂图景融入其中，使得每一个情节转折都蕴含着深刻的政治隐喻。通过对剧情的细致解读，我们可以窥见导演如何运用电影语言将宏大的政治命题具象化，呈现在观众面前。

（一）婚姻与身份：美国梦的追逐与幻灭

影片的开端，伊万为了获得美国身份，选择与阿诺拉在拉斯维加斯结婚。美国身份在影片中被赋予了极高的价值，它不仅代表着合法的居留权，更象征着进入美国社会主流、享受美国梦的机会。伊万对美国身份的渴望，实际上反映了俄罗斯青年对于西方自由民主价值观的向往，以及在全球化背景下对自身发展机会的渴望。

然而，当伊万得知父母要来解除婚姻关系时，他的反应却是毫不犹豫地放弃新婚妻子仓皇而逃。这一行为不仅揭示了伊万性格中的软弱与逃避，更在隐喻层面上反映了俄罗斯在面对西方压力时的矛盾态度。一方面，俄罗斯渴望与西方接轨，获取经济与技术上的利益；另一方面，又难以摆脱传统的大国思维与地缘政治的束缚，导致在与西方的互动中始终处于一种被动与妥协的状态。

阿诺拉在这一过程中，则代表了那些身处底层、渴望通过个人努力实现阶级跃迁的个体。她的美国梦在伊万的逃离中破碎，在全球化进程中，个体在追求身份认同与社会地位时所面临的困境与挫折。阿诺拉的挣扎与失败，不仅是个人的悲剧，更是对整个社会结构与权力关系的一种反思。

一直关心阿诺拉的伊戈尔在这一场景中，尽管知道不可能，但还是卑微而又强硬地替阿诺拉发声，要求伊万道歉。这一情节设计颇具“受钺三让，敢请还璧”之意。即便在强权面前，弱者依然会试图维护自己的尊严与正义，尽管这种努力往往难以改变现实的结局，但伊戈尔的行为，仿佛是在向观众传递一种关于道义与尊严的思考。

（二）飞机上的互动：强国与弱国的权力展示

在飞往拉斯维加斯的飞机上，亚美尼亚打手团向俄罗斯寡头讨好的种种搭讪，都被对方傲然无视。这一情节不仅展现了人物之间的权力关系，更在隐喻层面上反映了强国与弱国之间的互动模式。

俄罗斯寡头的傲慢与冷漠，象征着强国在国际关系中的强势地位与对弱国的轻视。而亚美尼亚打手团的讨好与逢迎，则揭示了弱国在面对强权时的无奈与妥协。这种权力的不对等关系，在国际政治中屡见不鲜，影片通过这一细节，巧妙地将这种现实困境呈现在观众面前，引发我们对于国际秩序与权力平衡的深刻思考。

（三）解除婚约：强权与弱者的对抗

当阿诺拉与伊万被带回到拉斯维加斯，面对伊万父母的强权时，影片进入了高潮部分。这一情节集中展现了权力的不对等关系以及弱者在强权面前的无奈与挣扎。伊万的父母作为俄罗斯的寡头，拥有巨大的财富与影响力，他们在处理儿子的婚姻问题时，表现出一种冷酷无情的态度，仿佛一切都可以用金钱与权力来解决。

阿诺拉在这一过程中，尽管内心充满了愤怒与不甘，但她依然决然地签了解除婚约书。这一行为既是对伊万父母强权的控诉，也是对自己命运的无奈接受。她的签字，象征着弱者在强权面前的妥协，然而这种妥协并非完全的屈服，更是一种对现实的清醒认识与对自身尊严的最后坚守。

四、历史背景与文化符号：隐喻的深度挖掘

影片中诸多细节与背景设定，都与特定的历史事件和文化符号紧密相连。通过对这些元素的解读，我们可以进一步挖掘出影片中隐藏的深刻政治隐喻，理解导演如何巧妙地将历史记忆与传统文化融入到现代国际关系的叙事之中。

在影片中，导演巧妙地运用了多种文化符号来强化政治隐喻。例如，伊戈尔提到自己今年30岁，没有什么财产，被阿诺拉夸奖很适合他的那辆车，也是他外婆留给他的。30岁这一年龄与乌克兰和亚美尼亚独立的时间相呼应，象征这些国家在独立后所经历的岁月。其次，伊戈尔所提到的财产问题，反映了这些国家在经济发展上的困境与挑战。外婆留下的车作为一种传承的物品，象征着历史与文化的延续，同时也暗示着在现代化进程中，这些国家如何在保持自身传统与文化特色的同时，应对全球化带来的冲击与变革。

乌克兰与亚美尼亚在独立后，都拥有较为丰富的自然资源，但却面临着经济发展不甚理想、政治局势动荡不安等问题。影片中阿诺拉的祖母是苏联人，她会一点俄语，这一细节为人物背景增添了深度，苏联解体后，这些国家与俄罗斯之间依然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种联系既包括文化上的亲缘关系，也涵盖了政治、经济等多方面的复杂互动。

五、结论

《阿诺拉》这部影片以其独特的叙事手法和深刻的主题内涵，在电影艺术的领域中独树一帜。通过对人物设定、剧情发展以及历史背景的巧妙构建，导演肖恩·贝克成功地将国际政治的复杂图景融入到一个看似通俗的爱情故事之中，为观众呈现了一个充满隐喻与反讽的光影世界。

影片中的每一个细节、每一个人物都仿佛是一个政治符号，承载着丰富的文化与历史内涵。从阿诺拉的美国身份与俄罗斯血统的交织，到伊万作为俄罗斯富家子弟的典型形象；从亚美尼亚打手团的地缘政治隐喻，到婚姻与身份的政治博弈；从飞机上的权力展示，到历史背景与文化符号的深度挖掘，每一个元素都在诉说着关于身份、权力以及国家间复杂关系的故事。

在当今这个全球化与地缘政治冲突并存的时代，《阿诺拉》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解读当代世界格局的全新视角。它提醒着我们，在欣赏电影艺术之美的同时，也不应忽视其背后所蕴含的深刻思想与社会意义。通过对这部影片的深入解读，我们不仅能够更好地理解电影作为一种文化表达形式的力量，更能够引发对于国际关系、身份认同以及阶级差异等重要议题的深刻思考，从而更加清晰地认识我们所处的这个复杂而多变的世界。

参考文献

- [1] 闫琨骐. 映照与挑战：美国电影中身体恐惧的政治隐喻流变 [J]. 河北民族师范学院学报, 2024, 44 (04): 95-102.
- [2] 潘源. 2023 年美国电影批评研究 [J]. 世界电影, 2024, (05): 82-108.

《Anora》: a cinematic metaphor for identity and power

XinYue¹

1 Guangzhou College of Technology and Business, city, Guangzhou

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is paper is to analyze the rich political metaphors contained in the Oscar-winning film *Anora*, and to reveal how the film skillfully maps out the complex interactions and power games among Russia, Ukraine, Armenia, and the United States in the moder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rough a detailed interpretation of the characters' settings, the plot development, and the relevant historical backgrounds of the film. Through the deconstruction of the film's superficial love story, the film uncovers its deeper political allegory, and explores how the director uses the language of cinema to integrate serious issues such as geopolitical conflicts, national identity and class differences into a seemingly commonplace narrative framework, thus triggering the audience's profound reflection on the contemporary international landscape.

Keywords: *Anora*; political metaphors; identity;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class differences

从柳州市紫荆花文化创意廊看文创产业与教育融合的创新路径

谭凯琪¹徐彬芸¹张靖彬¹黄柳清¹

(1.广西民族大学, 广西 南宁 530000)

摘要:本研究聚焦柳州市紫荆花文化创意廊的实践探索,系统剖析文化创意产业与教育协同发展的创新模式。该案例以紫荆花主题为轴线,通过特色文创产品开发与沉浸式文化体验设计,不仅重构了文化教育的内容供给方式,其独特的创意表达形式和交互体验设计更显著提升了教育过程的参与度与获得感。并基于实践观察,提出文创产业与教育融合的创新路径。

关键词:文化创意产业;教育融合;紫荆花文化创意廊;文化传播;教育创新

基金项目:广西民族大学自治区级大学生创新训练项目《基于中华国粹的文创销售平台构建研究》(S202310608112)

DOI: doi.org/10.70693/rwsk.v1i5.942

一、引言

当今世界正经历着全球化与信息化的深刻变革,文化创意产业作为新经济形态的代表,正在重塑传统产业的发展格局。通过创意设计、数字技术和市场运营的有机融合,将无形的文化资源转化为可感知的文化商品,既激活了文化遗产的现代生命力,也为区域经济增长开辟了创新路径。与之形成呼应的是,教育体系作为文化传递的主阵地,正面临着从知识传授向价值塑造的转型需求。这种时代背景下,文创产业与教育实践的协同创新,正在催生兼具文化传播效能与教育功能的新型生态。

柳州紫荆花文化创意廊的探索实践为观察这种融合趋势提供了鲜活样本。作为城市文化地标,该项目以本土特色花卉为叙事主线,通过沉浸式展览和互动体验项目,搭建起连接文化展示与公众参与的平台。设计团队深度挖掘紫荆花背后的城市记忆,开发系列文创产品实现文化符号的具象转化,使传统文化元素自然地融入现代生活场景。这种创新尝试不仅验证了文创与教育结合的可行性,更揭示了文化价值传播的新可能。

本研究聚焦柳州紫荆花文化创意廊的实践案例,系统解析其运作模式中的创新要素。通过考察具体项目的实施策略,重点探讨文化资源向教育载体的转化机制,以及跨界融合产生的协同效应。研究结论既能为同类项目的规划设计提供参考框架,也有助于深化对文化教育融合规律的理论认知,兼具实践指导价值和理论探索意义。

二、文化创意产业与教育融合的理论基础

(一) 文化创意产业概述

文化创意产业是以文化资源为核心生产要素,通过创造性转化手段将文化元素进行产业化开发的特殊经济形态。依托创意设计、数字技术等现代生产工具,对传统文化资源进行价值重构,形成具有市场吸引力的文化产品与服务集群,其核心在于借助创意力量与创新思维,将文化遗产资源转化为符合现代消费需求的文化商品及服务形态,呈现出高附加值属性、创新驱动特征、强融合性特质及文化内涵深度化等显著特点。

作者简介:谭凯琪(2002—),女,本科生,档案学专业;

徐彬芸(2002—),女,本科生,会计学专业;

张靖彬(2001—),女,本科生,物流管理专业;

黄柳清(2001—),女,本科生,国际贸易专业。

通信作者:徐彬芸

在文化传承维度，文化创意产业通过创造性转化策略构建起传统与现代的联结机制，将静态文化资源转化为动态文化资本。这种转化不仅实现文化记忆的当代激活，更通过市场化路径拓宽文化传播渠道，形成可持续的文化传承生态系统。

（二）文创产业与教育融合的理论依据

1. 品牌形象论

品牌形象论强调品牌作为文化价值载体的传播功能，主张通过符号化建构形成文化认同。在教育融合实践中，需着重开发具有教育意涵的文创符号体系，构建兼具文化深度与教育功能的品牌矩阵，从而强化受众的文化认知图式，建立持久的情感共鸣机制。

2. 定位理论

基于市场竞争的差异化原则，定位理论要求教育融合项目必须确立独特的价值坐标。实施过程中需构建双重定位体系：在文化维度建立价值识别系统，在教育层面形成目标导向机制，通过精准的受众分析与内容设计，形成具有排他性的教育文化产品供给模式。

3. 产教融合理念

产教融合强调构建教育与产业的价值共生体系，其本质是建立知识生产与市场需求的动态适配机制。在实践层面表现为产学研协同创新机制的建立，具体通过校企共建实训基地、开发实践课程项目等方式，实现教育链与产业链的深度嵌合。而现代产教融合制度已演进为系统化的制度架构，包含政策引导、资源配置、评价标准等要素，形成保障教育供给与产业需求精准对接的规则网络。

三、柳州市紫荆花文化创意廊案例分析

在文化创意产业与教育融合的创新实践中，柳州市紫荆花文化创意廊展现出独特的范例价值。该案例以文化主题的深度开发为核心，通过设计语言创新与教育功能重构，构建起文化消费与教育实践的双向通道，为行业提供了可资借鉴的融合样本。

（一）紫荆花文化创意廊的实践成果

1. 文化传播与教育功能的耦合机制

紫荆花文化创意廊以地方文化符号系统为基底，通过产品叙事与空间展演的双重路径实现文化传播。其开发的紫荆花元素茶器、丝织品、箱包系列，运用符号转译策略将柳州历史文脉转化为现代设计语言，形成兼具实用价值与教育功能的物质载体。这种文化再生产模式突破单向传播局限，通过产品使用场景中的文化解码过程，触发公众对地域文化认同的主动建构。

2. 教育方式的创新与拓展

紫荆花文化创意廊在教育方式的创新与拓展方面展现了显著的实践成效。其教育创新体现在技术赋能与文化实践的深度融合。数字沉浸装置构建的互动场域，采用具身认知理论指导下的体验设计，使文化认知从被动接受转向情境化感知。传统木刻版画、油印工艺等非遗工坊项目，则通过参与式创作激活文化记忆的当代传承。这种教育模式创新实现了三重转变：知识传递方式从抽象到具象、学习主体从客体到主体、教育目标从认知到实践，形成文化教育的立体化架构。

3. 文化与教育的共生效应

紫荆花文化创意廊构建的文化生态圈层具有显著的溢出效应。不定期举办的紫荆花文化论坛、非遗大师工作坊等活动，形成文化生产与教育传播的交互平台。此类活动通过文化资本的符号交换，既强化了公众的文化主体意识，又催生出传统工艺创新、文创IP孵化等衍生价值，验证了文化传承与教育创新的正反馈机制。

（二）文创产业与教育融合的结构特征

1. 文化符号的价值转化路径

紫荆花文化创意廊通过符号学的能指重构策略，将紫荆花从自然意象升华为文化表征系统。作为城市精神载体的紫荆花符号，其隐喻意义（家族伦理、历史记忆）被解码为可感知的文化叙事，并通过文创产品的物质形态实现符号资本向教育资源的转化，形成文化认同的具象化表达。

2. 教育场域的重构逻辑

紫荆花文化创意廊的教育实践遵循建构主义学习观,通过情境创设促进意义生成。其空间设计采用“文化剧场”理念,将展览区转化为文化认知的开放文本,互动区构建为知识生产的实践平台。这种场域重构打破了传统教育空间的物理边界,使文化学习融入日常生活实践,形成持续性的教育影响力。

四、文创产业与教育融合的创新路径

以柳州市紫荆花文化创意廊积累的实践经历为参考,本研究提出了一套助力文化创意产业与教育相互融合的全面策略。依托构建“文化解码-教育转译-价值共生”的理论体系,塑造出具有实际推行可行性的实践样式,以期能给相关行业提供兼具理论厚度与实践价值的应对方案。

(一) 文化解码与教育转译的双向机制

1. 文化基因的谱系化挖掘

为深化文化资源的系统性研究,需建立文化资源的考古学式研究模式。以紫荆花文化符号研究为例,借助符号学分析与文化人类学视角,能够实现对表层文化符号的深度解构,挖掘蕴含的历史记忆沉淀与集体情感认同,并将表层文化符号转化为包含历史记忆、集体情感的文化基因图谱。因此,这种深度解码要求组建涵盖历史学、人类学、考古学等多学科背景的跨学科研究团队,以口述史整理、物质文化考证等多种方法,搭建起可教育转化的文化数据库,为文化传承与创新发展提供坚实的理论与数据支撑。

2. 教育内容的转译策略

文化内涵向教育价值的创造性转化是一个知识再生产的动态过程。一方面,可以采用叙事重构技术,将文化元素转化为包含冲突结构、角色原型的教育剧本,经过系统设计并融合文化价值与教育目标,能够激发学习者情感共鸣与认知参与的教育载体。另一方面,运用情境建模方法,以空间叙事与互动装置构建认知脚手架,将原本抽象的文化概念转化为可感知、可体验的教育模块,实现文化认知的梯度式深化。

(二) 教育技术的界面创新与体验升级

1. 构建技术中介的教育界面

扩展现实技术谱系(XR)的应用需突破视觉呈现层面,向多模态交互系统的深度探索。在实践中应结合触觉反馈装置模拟传统工艺肌理,利用眼动追踪技术优化文化认知路径,能够对学习者在文化认知过程中的注意力分布、信息接收路径进行动态分析,进而优化内容呈现方式,创造符合具身认知理论的技术增强型学习环境。此外,该技术界面应具备自适应特征,能根据学习者认知水平动态调整信息密度。

2. 具身认知工坊的体系化建设

手作体验项目的优化与发展,需突破传统零散化、碎片化的教学模式,构建具有逻辑性与层次性的系统化文化技能传递体系。因此,必须建立“基础认知-技能掌握-创新应用”三级实训模块,各模块分别对应不同层次的教学目标,并在每个模块配备量化评估指标。例如木刻版画教学可分解为纹样解读(文化认知)、刀具控制(技能习得)、现代设计应用(创新转化)三个阶段,构成完整的教育价值链。此类循序渐进的教学安排,形成包含文化传承、技能培养与创新发展的完整教育价值链,有效提升手作体验项目的教育价值与社会影响力。

(三) 教育品牌的价值网络构建

1. 教育品牌符号体系的建构

品牌建设需实现从形象识别到价值传递的跃升。基于符号资本理论框架,符号资本理论构建品牌意义生产系统,将核心文化符号(如紫荆花)转化为包含教育隐喻的超级符号。以紫荆花为例,通过深度文化解构与教育内涵重构,将具象文化符号升华为承载教育理念的超级符号,使其具备强大的意义生产与传播效能。在实践维度,品牌价值传递体系的构建需依托结构化的操作框架,包括开发品牌叙事原型库,建立视觉符号与教育价值的锚定关系,使品牌接触点转化为文化认知节点。

2. 跨媒介教育传播网络的织造

构建“线上-线下-在场”三维传播矩阵:线上开发微课程链式传播系统,强化知识传递的连续性与延展性;线下打造移动教育装置艺术,突破传统课堂的物理边界;在场体验强化仪式化学习设计,以沉浸式、交互性的学习活动,增强文化传播的情感共鸣与价值认同。其中,着重突破短视频平台的教育转化瓶颈,借助算法逻辑重构文化内容分发机制,形成“文化热点-深度解读-实践引导”的传播闭环。

（四）产教融合生态系统的迭代发展

1. 教育生态共同体的培育

产教融合需从项目合作升级为价值共同体建设。构建“院校-企业-社区-政府”四维联动机制，通过制度设计与资源整合，实现教育链、人才链与产业链、创新链的有效衔接。此外，设立文化教育创新实验室作为枢纽节点，搭建知识共享平台，打通课程开发、技术转化、市场验证的完整链条，形成产学研用深度融合、可持续发展的创新生态系统，提升职业教育的适应性和产业发展的竞争力，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有力的人才和智力支持。

2. 文化教育人才的孵化模式

人才培养需建立“文化素养+教育技术+产业思维”的三维能力模型。一方面，推行项目制教学改革，将真实文创项目拆解为教学模块，转化为适配教学需求的模块，形成“文化诊断-创意提案-产品孵化”的完整训练流程。另一方面，构建动态能力评估体系，重点培养文化转译能力、技术整合能力与教育设计能力的复合型人才谱系，满足文化创意产业及教育领域不断变化的人才需求。

五、结论与建议

（一）研究总结

本研究以柳州市紫荆花文化创意长廊为例，深入分析了创意教育领域创意产业与文化产业融合的创新逻辑和实践机制，明确指出，文化创意产业与教育创意产业的深度融合，在本质上不仅是一个促使文化资本向教育资本转化从而达成价值实现的进程，更是搭建起文化解码与教育转译的双向通路。通过分析表明，实现文化符号的现代化，精心改造和设计教育空间，推广产业和教育共同发展的生态发展模式，可以扩大文化的传播，深化教育创新的效益。柳州紫荆花项目的成功，理论上和实践上都对创新文教的融合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是文化资源活化、教育创新和产业增值融合的创新应用，也是文化与教育协同发展、可借鉴的实践模式，为保护、传承和传播特色文化开辟新途径，履行新使命。

（二）对策建议

1. 制度性保障体系的构建

建议建立多层次政策支持体系：在宏观层面制定文化教育融合专项规划，中观层面设计财政杠杆工具组合，如文化教育消费券、创新券，微观层面完善文创园区配套政策。重点强化文创产业集群的空间规划，通过用地指标倾斜、基础设施联建等举措，形成产业集聚效应。

2. 知识产权价值转化机制的完善

建立全周期的知识产权管理系统，提供涵盖权利登记、评估和交易流转等各个方面的综合服务体系。为了建立一个开放的、共同的知识产权管理系统，建议试行“版权银行”模式，将版权认定的文化资产纳入公共教育资源数据库。同时，应加强技术保护措施，充分利用数字水印、区块链存档等技术，切实打造强有力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此外，还应建立快速反应系统，及时处理侵权行为，保护知识产权人的合法权益。

3. 产教融合生态圈的优化升级

推动建立“跨部门教育合作创新中心”，建立以需求为导向的协同育人机制，可通过建立“双导师制”引入项目孵化模式，由企业技术骨干和院校教师共同指导实践项目。建议开发产教融合效能评估指标体系，将文化转化率、教育渗透率等核心指标纳入考核范畴，构建动态优化机制。

4. 文化资源开发模式的革新

柳州市紫荆花文化创意廊通过系统性革新文化资源开发模式，构建了“三维一体”的保护与转化体系。在文化转化层面，研发团队基于“文化基因解码工程”，将紫荆花纹样、壮族铜鼓几何图腾等核心元素分解为多类文化符号，联合学校开发多门教育课程。为防范文化异化，明确禁止商业性篡改市花标准形态负面清单，建立工业遗产改造专家评审机制。

（三）发展前瞻

文化创意产业与教育融合将呈现三大趋势：技术驱动层面，扩展现实(XR)与生成式人工智能(AIGC)的深度应用将重构教育场景；价值创造层面，文化IP的跨媒介叙事将形成教育传播新模式；制度创新层面，文化教育共同体模式将突破传统产业边界。

在国际化维度,通过国际文化教育认证标准对接、跨境文创教育联盟建设等举措,提升文化软实力输出效能。并特别关注数字丝绸之路框架下的文化教育合作,运用元宇宙技术搭建跨国文化学习社区,实现文化互鉴与价值共生的战略目标。

研究证明,文化创意产业与教育体系的深度融合,是文化创意产业逐步实现现代化的前提,建立多维度协同机制,推动制度创新、数字升级和生态重构,可以有效激发文化传承与教育创新相辅相成效应,为建设文化强国提供持续动力。

参考文献:

- [1]尚童童.新时期关于博物馆文创产品现状的思考——基于青年群体视角[J].赤峰学院学报(汉文哲学社会科学版),2025,46(02):55-58.
- [2]陈晓洁,王海霖.壮族文化元素在博物馆文创产品开发中的应用研究[J].文物鉴定与鉴赏,2025,(04):68-71.
- [3]奉涛,王梦遥.基于地域文创产品包装设计的高等教育模式探讨[J].绿色包装,2025,(02):61-64+73.
- [4]邹梦萍,欧东林.基于广西地域文化的文创产品创新设计与应用的研究——以壮锦纹样为例[J].鞋类工艺与设计,2025,5(01):3-5.
- [5]徐哲坤.“博物馆+”模式下河套文化博物院文创产品设计教学创新对策研究[J].参花,2025,(09):174-176.
- [6]上官小雨.数字时代博物馆文创产品数字化呈现与设计策略[J].中国包装,2025,45(03):106-110.
- [7]赵思琪,苏琳玉.地域文化背景下安阳城市品牌 IP 形象设计研究[J].鞋类工艺与设计,2025,5(04):179-181.

Innovative Path of Integration between Cultural and Creative Industries and Education from the Bauhinia Cultural and Creative Gallery in Liuzhou City

TAN Kaiqi¹, XU Binyun¹, ZHANG Jingbin¹, HUANG Liuqing¹

¹ Guangxi Minzu University, Guangxi, Nanning

Abstract: This study focuses on the practical exploration of the Bauhinia Cultural and Creative Gallery in Liuzhou City, and systematically analyses the innovative paradigm of synergistic development between cultural and creative industries and education. Taking the theme of Bauhinia as the axis, the case not only reconstructs the content supply mode of cultural education through the development of special cultural and creative products and the design of immersive cultural experience, but also significantly improves the degree of participation and sense of acquisition in the education process through the unique form of creative expression and the design of interactive experience. Based on the practical observation, the innovative path for the integration of cultural and creative industries and education is proposed.

Keywords: Cultural and Creative Industries; Educational Integration; Bauhinia Cultural and Creative Gallery; Cultural Communication; Educational Innovation

IP 到 DP 的价值跃迁机制：

虚拟形象全产业链开发的协同演化路径

杨雅轩¹ 李佳纯² 马思雨·马存军² 苏涛² 胡珂²

(1.武汉传媒学院 湖北武汉 430205; 2.哈尔滨金融学院 黑龙江哈尔滨 150030)

摘要:在当前数字经济快速发展的形势下,虚拟形象 IP 在文化产业里占据着关键地位,它从 IP 转变为 DP 的价值提升过程较为复杂,本文运用复杂系统理论来分析这一转变机制,明确其核心特性、阶段特征以及协同演化机制,并且凭借案例研究其发展路径。迪士尼在创意、产业以及技术方面所取得的成功经验为全球树立了典范,中国的杰外动漫和 A-SOUL 同样也有一定成果,然而本土产业发展遭遇了版权、技术以及市场等挑战。文章给出了相应对策,像政策方面建立国家标准、推动版权集中管理,产业方面构建管理平台,技术方面开发生产工具,以此为虚拟形象产业发展提供参考,帮助其突破困境,推动文化产业走向繁荣。

关键词:虚拟形象 IP; 价值跃迁; 协同演化; 复杂系统理论; 发展策略

基金项目:哈尔滨金融学院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虚拟形象赋能数字生活——基于虚拟形象的全产业链打造”(G202410245034)

DOI: doi.org/10.70693/rwsk.v1i5.963

一、引言

在数字经济时代,虚拟形象 IP 已成为文化产业的关键战略资源,深度嵌入影视、游戏、消费等多个领域,创造出巨大的商业价值。例如虚拟偶像初音未来,不仅发行音乐、举办演唱会,还跨界与多品牌合作推出各类周边产品,其商业版图不断拓展,彰显出虚拟形象 IP 的强大影响力。

复杂系统理论指出,IP 向 DP 的价值转化是创意、产业、技术等多要素协同演化的过程,并非单一环节的线性发展。就像热门动漫 IP 的衍生开发,既要有精彩的创意内容,也要依赖产业的合理运营和技术的有力支持。从理论层面看,传统产业链研究多为静态分析,本研究构建的协同演化框架引入复杂系统理论,能弥补传统研究的不足,完善产业链理论体系。在实践方面,迪士尼的创意激发机制和杰外动漫的跨界协同模式,为中国虚拟形象产业提供了可借鉴的经验。本研究综合运用文献分析法梳理相关领域文献,通过案例研究法剖析典型案例,采用对比研究法对比中美虚拟偶像产业链,如初音未来与 A-SOUL,旨在为中国虚拟形象产业发展提供有益参考。

二、复杂系统视角下的 IP-DP 演化

在剖析 IP 到 DP (衍生产品) 的价值跃迁机制时,复杂系统理论提供了关键的分析视角,其核心特性深刻影响着这一过程,IP-DP 价值跃迁呈现出阶段性特征,且各阶段存在着多种协同演化机制。

复杂系统理论包含自组织、适应性、非线性与涌现等核心特性。自组织特性使 IP 生态能借助用户互动自发形成社群。以游戏《原神》为例,其丰富的角色设定和宏大世界观激发玩家热情,大量用户在网络平台进行二次创作,形成了充满活力的二创圈。玩家们通过创作绘画、小说、视频等内容,不仅丰富了《原神》的文化内涵,还吸引了更多潜在用户,促进了 IP 的传播与价值拓展^[1]。适应性则体现在产业链能依据技术变革动态调整策略。随着 AI 技术的兴起,部分虚拟偶像制作公司迅速做出反应,利用 AI 优化虚拟偶像的形象设计,使其更加逼真、

作者简介:杨雅轩(2004—),女,本科,新媒体交互体验构建、跨文化传播;

李佳纯(2004—),女,本科,研究方向为数字经济与贸易;

马思雨·马存军(2005—),女,本科,研究方向为数字经济与贸易;

苏涛(2004—),男,本科,研究方向为产业组织协同行为、产业生态管理;

胡珂(2005—),女,本科,研究方向为跨境商务营销、跨文化商务谈判。

独特,同时借助 AI 进行内容创作,提升虚拟偶像的表现力和与粉丝的互动性,增强了市场竞争力。非线性与涌现特性表明,小 IP 有可能通过衍生品开发实现价值的指数级增长。上海迪士尼的“玲娜贝儿”便是典型案例,这一 IP 凭借可爱的形象,通过开发大量周边产品,如玩偶、文具、服装等,以及举办相关主题活动,迅速在全球走红,创造了巨大的商业价值,实现了从小众 IP 到高价值 IP 的跨越^[2]。

IP-DP 价值跃迁可划分为四个阶段。创意孵化阶段,构建独特且富有吸引力的 IP 世界观是关键。如刘慈欣构建的“三体”宙,以其对宇宙的独特想象、深刻的科学思考和宏大的叙事架构,吸引了全球大量粉丝,为后续影视、游戏、动漫等多领域的产业开发奠定了坚实基础。产业延伸阶段,围绕核心 IP 开发多元衍生品矩阵,实现 IP 价值的多元变现。热门网络文学 IP 常常被改编成影视剧、动漫,开发成游戏,还会举办线下主题体验活动。像《盗墓笔记》,不仅有影视改编作品,还开发了相关游戏,以及线下沉浸式体验活动,满足了不同粉丝群体的需求,充分挖掘了 IP 的商业价值。生态扩张阶段,IP 与文旅、教育等不同行业形成跨行业联盟。一些地方文旅部门借助热门 IP 打造特色文旅项目,提升旅游吸引力;教育机构与 IP 合作开发教育产品,丰富教育内容。例如,故宫博物院与多个 IP 合作推出文创产品,将传统文化与现代创意相结合,既传播了文化,又实现了 IP 价值的拓展。当 IP 进入价值衰减阶段,需要采取重启策略。“奥特曼”IP 在发展过程中曾面临热度下降的问题,通过推出新的剧集,对角色形象进行优化,开发新的周边产品,重新吸引了观众和消费者,实现了 IP 的重启与价值重塑^[3]。

在 IP-DP 价值跃迁进程里,有着多种协同演化机制,就创意与产业协同而言,优质内容乃是衍生品开发的关键驱动力,动漫《鬼灭之刃》依靠精彩的剧情以及鲜明的角色设定,吸引了众多粉丝,其周边产品销售额突破百亿,有力地显示出优质内容对衍生品开发有着强大的带动作用^[3]。在技术与市场协同方面,AR/VR 等技术的运用提升了 IP 的沉浸感以及用户体验,拓展了市场,迪士尼在“星球大战”系列中运用全息投影技术,打造出沉浸式体验项目,使观众如同置身于电影场景之中,提高了项目的吸引力,提升了 IP 的市场影响力,政策与资本协同对产业发展同样有着意义。政府扶持与风险投资相结合,可加快产业整合,像河南设立文旅 IP 基金,吸引资本投入,为当地文旅 IP 的开发给予了资金支持,推动了文旅产业的升级与发展^[4]。

三、国际经验:迪士尼的协同演化路径

迪士尼作为全球娱乐产业的巨头,在 IP 到 DP(衍生品)的价值跃迁及虚拟形象全产业链开发的协同演化方面有着卓越表现,其成功经验值得深入剖析与借鉴。

在创意层面,迪士尼致力于构建庞大的 IP 宇宙。通过收购漫威、皮克斯等知名品牌,极大地扩展了自身的 IP 矩阵。这些丰富多样的 IP 在“统一品牌、不同体验”的理念下,形成了一个相互关联且充满活力的生态系统。例如漫威系列超级英雄电影,每一部都有独特的故事与风格,但都统一在迪士尼的品牌之下,为观众带来多元化的娱乐体验。在创意激发机制上,迪士尼内部的“铜锣秀”发挥了重要作用,这种紧张的头脑风暴会议能在短时间内激发员工的奇思妙想,为 IP 创作提供源源不断的灵感。同时,迪士尼积极开展外部合作,与故宫文创联名就是典型案例,将东西方文化元素巧妙融合,创造出兼具文化内涵与商业价值的新产品,进一步丰富了 IP 的文化内涵与市场吸引力^[2]。

产业层面,迪士尼实现了全产业链的高效联动。以影视、衍生品和主题公园为核心,形成了一个紧密的闭环。在电影上映时,同步推出与电影相关的玩具、服装等衍生品,借助电影的热度带动衍生品的销售。如《冰雪奇缘》热映时,艾莎公主和安娜公主的玩偶、裙子等周边产品销量惊人。而主题公园则成为强化 IP 体验的重要场所,游客可以在公园中沉浸式体验 IP 故事,这种线下体验又进一步反哺电影和衍生品的市场。此外,迪士尼利用数据驱动产业发展,通过对用户画像的深入分析,精准把握消费者需求,指导衍生品的设计。“冰雪奇缘”公主裙的迭代升级就是基于对消费者喜好和市场反馈的研究,不断优化产品设计,提高市场竞争力^[2]。

在技术层面,科技给予迪士尼的 IP 发展强有力的支持,随着 AI 技术不断进步,迪士尼着手尝试运用 AI 生成虚拟形象,如此一来,开发成本得以降低,创作效率也有所提高,比如说借助 Midjourney 这类工具设计新角色,为 IP 内容增添新的生机与活力。区块链技术在迪士尼的 IP 运营里也有应用,借由区块链达成数字藏品的确权,保证了数字资产的安全与唯一。“漫威”NFT 拍卖突破千万美元,这便是区块链技术在 IP 价值挖掘方面的成功实例,拓宽了 IP 的商业变现渠道^[5]。

迪士尼于创意、产业以及技术这三个层面展开协同发展,有力支撑了其 IP 达成从源头至衍生产品的价值最大化,还为全球虚拟形象全产业链开发提供了宝贵的经验范式,相关产业可学习此范式,推动自身在 IP 价值跃迁以及全产业链开发方面实现发展。

四、本土实践:中国虚拟形象产业的挑战与突破

在虚拟形象产业逐步发展的进程当中,中国本土企业始终保持积极探索的态势,已然取得了一些成果,然而也面临着许多挑战,借助对典型案例展开分析、将技术进行创新应用以及依靠政策给予扶持等多方面的共同努力,中国虚拟形象产业正在持续不断地寻求突破。

杰外动漫于虚拟形象产业的跨界协同领域有着颇为较大的表现,其凭借对游戏公司实施并购,成功取得了渠道优势,为虚拟形象的多元发展构筑起了稳固根基,就“洛天依”这一广为人知的热门虚拟偶像而言,杰外动漫凭

借自身所拥有的渠道资源,推出了“洛天依”联名耳机,达成了虚拟形象与实体产品的紧密结合,拓宽了盈利途径,提高了“洛天依”这一IP的商业价值。用户的UGC即用户生成内容,对IP的迭代发挥了关键的反哺作用,在B站平台上,与“洛天依”相关的二创视频数量已超过50万条^[1]。这些二创内容丰富了“洛天依”的文化内涵,契合了不同用户的个性化需求,吸引了更多潜在粉丝,提高了IP的影响力与生命力,促使“洛天依”IP持续进化与发展。

技术创新给中国虚拟形象产业给予了新的发展契机,A-SOUL的直播电商模式就是典型的例子,A-SOUL借助实时动作捕捉以及AI交互技术,达成了虚拟偶像24小时不间断直播,这一新模式给用户给予了全新观看感受,增进了用户和虚拟偶像之间的互动,还拓宽了虚拟偶像的商业变现渠道。在电商变现方面,A-SOUL的直播带货成果较大,GMV(商品交易总额)成功突破亿元,其衍生品牌“A-SOUL Store”年销售额增长了200%,这种由技术驱动的直播电商模式,为虚拟形象产业在电商领域的发展树立了范例,呈现了虚拟形象在商业领域的巨大潜力。

政策扶持在中国虚拟形象产业发展进程中扮演着关键推动角色,河南专门设立了规模高达20亿的文旅IP基金,将重点放在支持像“唐宫夜宴”这类优质IP的开发上,此项举措给文旅IP的创作、推广以及产业转化给予了充足资金支撑,促使文化与旅游产业深度融合,推动了相关虚拟形象的发展。另外产融平台的搭建把银行、PE机构和文创企业连接起来,切实缩短了文创企业的融资周期,为虚拟形象产业发展提供了有力金融支持,利于企业开展IP开发、技术创新以及市场拓展。

然而中国虚拟形象产业在不断发展进程中依旧遭遇一些挑战,像是虚拟偶像形象存在同质化现象、产业上下游协同方面有所欠缺、技术创新成本偏高等问题,要达成的突破,企业应当提高创新能力,着重进行IP的差异化塑造,提升虚拟形象的独特特性以及文化内涵,强化产业上下游之间的合作,构建起完整的产业链生态,加大技术研发投入力度,提高技术创新的效率,降低技术应用的成本。政府和行业协会需要持续完善相关政策法规,加强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工作,规范市场秩序,推动虚拟形象产业朝着健康、可持续的方向发展。

五、协同演化中的关键机制

在虚拟形象全产业链开发所经历的协同演化进程当中,正反馈循环、风险缓冲机制以及生态位分化起着非常关键的作用,促使着IP朝着DP实现价值的跃迁。

正反馈循环堪称推动价值增长的关键动力,就拿游戏《原神》来说,它凭借持续推出优质内容,像持续更新角色池,给玩家带来全新角色体验^[1]。那些设计精巧的角色有着独特技能、性格以及故事背景,吸引了众多玩家,致使粉丝数量持续攀升,随着粉丝群体的壮大,《原神》的影响力不断提高,其衍生品销售也变得日益火爆。从角色手办到周边饰品再到主题文具等,种类繁多的衍生品契合了粉丝的情感消费需求,为IP给予了丰厚利润,而这些利润又投入到内容制作当中,用于开发更多新角色、新剧情以及优化游戏体验,提升内容质量,吸引更多粉丝,形成了“优质内容→粉丝增长→衍生品销售→反哺内容制作”良性正反馈循环。这一循环持续强化IP的影响力与商业价值,使其在市场竞争里占据优势位置。

风险缓冲机制是保障产业稳定发展的重要支撑。采用多IP布局是分散风险的有效策略,“漫威宇宙”构建了庞大的超级英雄体系,众多不同性格、能力的英雄角色形成了多IP格局^[2]。即使某个英雄系列的作品表现不佳,其他英雄的故事线和相关作品仍能维持整个“漫威宇宙”的热度与商业价值,避免了因单一IP失败而导致的整体产业危机。同时,衍生品预售和版权质押融资等保险机制也能降低投资风险。在项目启动初期,通过预售衍生品,提前获得资金回笼,减少了后期资金压力;将版权进行质押融资,可以在创作过程中获取必要的资金支持,保障项目的顺利进行,有效降低了投资风险,为IP全产业链开发提供了稳定的资金流保障。

生态位分化可帮助IP在市场里精准找到自身定位,达成差异化的发展态势,头部IP依靠其强大的影响力以及广泛的受众基础,将发展重点放在全球化方面,像科幻小说《三体》,凭借其宏大的世界观以及深刻的思想内涵,在海外市场发行之后获得了广泛的关注,吸引了全球读者的目光,达成了文化的跨地域传播,扩展了IP的国际影响力。腰部IP则深入耕耘垂直领域,凭借精准的定位来契合特定受众的需求,“罗小黑”以其独特的二次元风格,主要面向二次元受众群体,凭借推出动漫作品以及周边产品等方式,在二次元市场中占据了一定的位置,与头部IP形成差异化竞争,一同推动了虚拟形象产业的多元化发展。

这些关键机制彼此相互配合,正反馈循环可促进价值增长,风险缓冲机制可以保障产业稳定,生态位分化帮助实现差异化发展,它们共同构成了虚拟形象全产业链开发协同演化的坚实基础,推动IP产业持续不断向前发展,达成从IP到DP的高效价值跃迁。

六、挑战与对策建议

于虚拟形象全产业链开发的协同演化进程里,存在着许多挑战,需提出相应解决对策,促使产业持续健康发展。

在现存的诸多挑战里,版权碎片化问题显得颇为突出,就拿“奥特曼”版权纠纷这个例子来说,IP授权处于分散状态,这致使在全产业链开发进程中,各个环节很难形成有效的协同效应^[2]。不同的主体持有不同部分的版权,在衍生品开发以及影视改编等方面,容易出现利益分配不均衡、开发计划相冲突等状况,对IP价值的最大化挖掘造成了妨碍。技术瓶颈同样是一个大难题,实时渲染和情感计算技术的成熟程度不够,对虚拟形象的表现力以

及与用户的情感交互深度形成了限制^[6]。这使得虚拟形象在呈现效果方面难以达到理想的情形，没办法充分契合用户不断增长的需求，市场认知存在偏差，虽说 Z 世代对虚拟偶像的接受程度较高，给产业发展提供了关键的支持，然而银发群体的接受程度较低^[1]。这表明虚拟形象的市场拓展受到了一定的限制，无法充分覆盖更为广泛的消费群体。

面对这些挑战，可以从几个不同层面提出发展建议，在政策方面，建立 IP 价值评估国家标准很关键，借助统一的评估标准，能更科学地衡量 IP 价值，为版权交易以及产业开发提供可靠依据，推进版权集中管理，可有效整合分散的版权资源，减少版权纠纷，提升产业协同效率，促使 IP 全产业链有序发展。在产业层面，构建 IP 全周期管理平台是关键举措，从创意构思阶段起，对 IP 展开全方位规划与管理，涉及开发过程中的资源调配、市场推广，以及后期的 IP 退役处理等^[7]。这样的平台能实现产业链各环节的信息共享与协同作业，保证 IP 在整个生命周期可得到合理开发与利用，提升 IP 的综合价值。在技术层面，开发模块化虚拟形象生产工具，比如 Unreal Engine Metahuman，能降低虚拟形象的制作难度，提高生产效率和质量^[6]。这些工具可让开发者更便利地创建虚拟形象，快速达成不同风格和功能的虚拟形象开发，契合多样化市场需求，推动虚拟形象产业创新发展。

通过应对版权碎片化、技术瓶颈和市场认知偏差等挑战，以及实施政策、产业和技术层面的建议，能够有效推动虚拟形象全产业链开发的协同演化，促进 IP 到 DP 的高效价值跃迁，实现虚拟形象产业的可持续发展，为文化产业的繁荣注入新的活力。

参考文献:

- [1] 解迎春,晏青.数字时代虚拟偶像的生成逻辑与人机互动[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5,46(03):159-168.
- [2] 石群峰,晏萌.从 IP 到 DP:全产业链开发的难点与出路[J].传媒,2016,(07):80-82.
- [3] 林进桃,谭幸欢.虚拟偶像: 数字时代网络 IP 的升级与重构[J].电影新作,2022,(01):79-86.
- [4] 黄俊又,努尔古丽·阿不都苏力.网络媒介重塑文旅 IP 路径研究——评《文化和旅游 IP: 理论溯源与实践探索》[J].人民长江,2024,55(01):254.
- [5] 张丽锦,吕欣.虚拟数字人: 模因论的新“锚点”——模因论视域下的虚拟数字人: 概念、特征和应用[J].学术探索,2024,(03):57-66.
- [6] 刘建泽.从赋能到“赋魂”: 虚拟数字人在传媒领域的应用现状、挑战及展望[J].传媒,2024,(07):52-54.
- [7] 方红峰.网络文学 IP 跨媒介开发研究[J].传媒,2024,(23):73-75+77.

The Value Transition Mechanism from IP to DP: The Co-evolutionary Path of the Whole Industry Chain Development of Virtual Images

Yang Yaxuan¹, Li Jiachun², Ma Siyue¹, Ma Cunjun², Su Tao², Hu Ke²

¹ Wuhan University of Communication, Wuhan, China 430205

² Harbin Finance University, Harbin, China 150030

Abstract: In the current context of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the digital economy, virtual image IPs play a crucial role in the cultural industry. The process of value enhancement from IP to DP for virtual image IPs is complex. This paper applies the complex systems theory to analyze this transformation mechanism, clarifying its core characteristics, stage features, and co-evolution mechanisms, and also explores its development path through case studies. Disney's successful experiences in creativity, industry, and technology have set a global example. China's JieWai Animation and A - SOUL have also achieved certain results. However, the development of the local industry faces challenges in terms of copyright, technology, and the market. This article proposes corresponding countermeasures, such as establishing national standards and promoting centralized copyright management in the policy aspect, constructing management platforms in the industry aspect, and developing production tools in the technology aspect. These measures aim to provide reference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s virtual image industry, help it overcome difficulties, and promote the prosperity of the cultural industry.

Keywords: Virtual Image IP; Value Transformation; Co-evolution; Complex System Theory; Development Strategies

论陶渊明思想对地理困境的超越

方立娟¹

(1.暨南大学中文系, 广东 广州 510632)

摘要:陶渊明有着一定的地理情结,对于田园、山林等表现出了一定的情感,他也遭遇过地理困境,出任期间需面对路途的遥远、艰辛以及途中的归思,在归田之后,他又要面对新的地理困境,但他的文学乃至人生并未为地理所限,他实现了对地理困境的超越。陶渊明的思想不为地理所限的深层原因,包括天性的影响、独特思想的形成及“心不滞物”之境界。陶渊明在对天性进行思考时,不是为了成为更好的自己,而是成为自己,其思想受儒道释影响,却又有其独特之处。陶渊明不为某一种信仰或思想所限制,思想可以跨越地理的疆界,从而实现对地理的超越。

关键词:陶渊明; 地理困境; 思想; 超越

DOI: doi.org/10.70693/rwsk.v1i5.977

文学家受地理环境影响,但在某些情况下又可以不为地理所限。刘师培《论研究文学不可为地理及时代之见所囿》言:“试以晋人而论,潘岳为北人,陆机为南人,何以陆质实,而潘清绮?”²其实陆机虽为南方人,然文风与其入洛的经历有一定联系。《文选》李善在注《藉田赋》时曾引臧荣绪《晋书》曰:“潘岳,字安仁,荥阳中牟人。总角辩惠,摘藻清艳,乡邑称为奇童。”³即他这种文风在小时候就已展现,这似乎跟南北地理关系不大,毕竟一个人的文风除了受地域影响,也跟个人秉性特质等相关,刘师培又说:“一代杰出之文人,非特不为地理所限,且亦不为时代所限。”⁴有时地理因素可以在文学创作中起作用,却未必起关键性作用,杰出者可以跳脱地理限制,而陶渊明即是这样的杰出者。本人曾在《陶渊明文学创作对地理的超越》⁵一文中谈及其文学创作对地理的超越,然而文学技法上的地理超越与思想上的超越还是有区别的,有必要就陶渊明思想对地理困境的超越展开论述。

一、陶渊明遭遇的地理困境

陶渊明在作品中表现出了对田园、山林、居住场所的情感,他在出仕途中很想念田园生活,曾言:“园田日梦想(一作想梦),安得久离析(一作拆)?”⁶对于山,他也曾直言“性本爱丘山”,对于居住场所,他也有“吾亦爱吾庐”之言。渊明有着一定的田园情结,山林情结等,却也遭遇过地理困境。

陶渊明对田园怀有情感,出仕时却不得不离开田园,他对“吾庐”有情感上的寄托,有时却不得不面临迁居。渊明遭遇的很多人生困境,与地理也有很大关系,有的也可称之为地理困境,这包括出行困境,归隐之后的田园困境及居所困境。

在行役期间,渊明需要面对路途的遥远、艰辛以及途中的归思。“投策命晨装,暂与园田(一作田园)疏。眇眇孤舟逝,绵绵归思纡”,渊明告别熟悉的园田去往异地他乡,归思却萦绕于心。他需要面对路途中的困境,这种困境从表层上看是远离家乡造成的,从深层次看则与其仕隐选择有关,这是一种仕隐矛盾引发的路途困境。这种困境不仅发生在去往异地的路上,也发生在从异地回来时,如《庚子岁五月中从都还阻风于规林》二首其一,

作者简介:方立娟(1988-),女,汉族,江西赣州人,于2022年从厦门大学毕业,现为暨南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博士后流动站研究人员,研究方向为文学地理学、中国古代文学、华文文学。

²刘师培撰,程千帆等导读:《中国中古文学史讲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年,第162页。

³(南朝·梁)萧统编,(唐)李善注:《文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337页。

⁴刘师培撰,程千帆等导读:《中国中古文学史讲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年,第163页。

⁵《论陶渊明思想对地理困境的超越》以及《陶渊明文学创作对地理的超越》之主要内容皆出自本人博论,为中国国家图书馆所收藏,详情见:方立娟:《书写与超越:陶渊明文学中的地理空间研究》,博士学位论文,厦门大学,2022年。

⁶陶潜撰:《陶渊明集》,宋刻递修本,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本文所引陶诗文皆出自宋刻递修本。有些不涉及异文或已在前文标注过的,则不一标注。

诗中虽未明言当日还得寄宿在外等事，但当天未返程的诗人，实际上却得面对在外住宿等问题，更何况思乡之情迫切，家乡似乎就在眼前，“延目识（一作城）南岭，空叹将焉如”又包含了多少无奈。

渊明《杂诗》其九言：“慷慨思南归，路遐无由缘。”他出门在外思归，却因路远而难以实现。《杂诗》其十一言：“我行未云远，回顾惨风凉。春燕应节起，高飞拂尘梁。边（一作鳧）雁悲（一作照）无所，代谢归北乡。离鹄鸣清池，涉暑（一作暮）经秋霜。愁人难为辞，遥遥春（一作喜）夜长。”¹雁与春燕都可跨越地理的界限，回归故土，离鹄也可经夏秋两季而返回清池，诗人言：“我行未云远。”却又久不得归。也许造成这样的原因是出仕，而“投耒去学仕”的诗人却必须面对这些地理上的困境。

在渊明生活的时代，似乎走仕途才能施展抱负，但仕宦中很多事由不得自身，更何况身处乱世，“山川一何旷，巽坎难与期”，行役之困境来自自然与人文环境的双重影响。为职责所限，渊明数次都需离开故土为官，这与他本性里对家乡的依恋又相违背，哪怕是他后来在“去家百里”的彭泽为官，也是“眷然有归欤之情”。于他而言，出外地为官不仅要面对行役路上的地理困境，亦不免受地理空间所限，无法经常见到热爱的家乡，而在外又难以获得家的归属感。归隐后，行役路困境才得到真正解决，然而他又得面对新的地理困境。

外出需经济支出，而归隐后的渊明很难有额外的钱进行远地旅行，因而有时他不得不面临出行困境。即便是在家乡，渊明去耕作时可能需要经过较远的路途，其出行困境有时会影响田园体验和居住体验。

渊明在归田之后又遭遇了新的地理困境。自然界的气候等会直接影响农作物的生长，影响收成，从而影响他的生活。如他在《归园田居》中直言“常恐霜霰至”，桑麻类农作物遇霜易凋零，“常恐”二字说明这种担忧并非偶然。当田园遭遇旱灾时，加之“螟蛾恣中田”，导致收成不好，影响了诗人的物质生活。诗人归隐后遭遇的一些生活困境其实与地理也有一定程度的关联。

再者，渊明的田园有远有近，有些去往田园之路偏远不易行，如《癸卯岁始春怀古田舍》二首的“地为罕（一作幽）人远”等。不过这点需辩证看待，从诗人喜爱自然的视角而言，路远其实也是欣赏风景接触自然的机会，“荒野比田园更加自然，也是更少人涉足之处，给他更多的诗意和安宁”²，然而从另一方面来说，他需要获得粮食和蔬菜，路远的话会给他照顾作物带来一些不便，这也可称为地理困境之一。

陶渊明曾自言“爱吾庐”，有时又不得不迁居，虽抱着“草庐寄穷巷，甘以辞华轩”之心念，可戊申年房子遇火，却让渊明暂时面临“一宅无遗宇，舫舟荫门前”的困境。

总之，人很难脱离其所处的地理环境而生存，而在农耕时代，也很难跨越几处地理环境而生活，在外地的渊明很难到达他记忆中的家园，而在家乡的渊明也很少有机会回到曾经的仕宦地。待他归隐时，其所安身的地理环境也存在着一些不稳定性，渊明有因火灾而迁居事，尽管迁居南村的他是欢喜的，却也意味着他在南村的活动变多，而在故地的行迹相对更少。他也有因荒年而不得不面临物资不足的情况，然而陶渊明的思维与心境并未为地理环境所囿，而是突破与超越了地理困境。

二、陶渊明对于地理困境的超越

渊明在归隐前几乎没有特别好的方法来解决所遭遇的地理困境，这种困境关乎其人生选择。渊明在行役路上就有辞官归隐之念，如“静念园林好，人间良可辞”，又如“投冠旋旧墟（一作庐），不为好爵萦”，至晋安帝元兴二年，其想法又推进一步，这从《癸卯岁始春怀古田舍》即可看出。他对于躬耕“南亩”之尝试，也是提前对归隐生活的实践，但这并未帮助他真正摆脱行役路之困境，乙巳岁三月他还得踏上使都的路途。

“园田日梦想，安得久离析（一作拆）”，可他却还在奔波的路上，“终怀在归（一作壑）舟，谅哉宜（一作负）霜柏”，这时他已有了摆脱地理困境乃至人生困境的妙法。渊明使都后基本放弃了远役之事。据《归去来兮辞并序》，彭泽离家不过百里左右，担任彭泽令还有“公田之利”，然而这似乎并不能圆了他的田园梦，他自言“眷然有归欤之情”，其中的原因是“质性自然，非矫厉所得”，这是值得深味的。一方面做官的本质没有变，即使在离家近的地方为官，也会感到束缚，违背自然天性，据《晋书》载：“郡遣督邮至县，吏白应束带见之。潜叹曰：‘吾不能为五斗米折腰，拳拳事乡里小人邪！’”³另一方面，渊明乃“性本爱丘山”之人，尤其爱家乡的丘山。按当时的交通条件，“去家百里”，公务在身，要回家也不易，“眷然”和“归欤之情”可见其归思。在离家近的彭泽为官，看上去是折衷之法，却依然回归不了他念想中的田园，又违背其天性。在尝试过一些选择后，渊明决定辞官归隐，这帮助他摆脱了行役路的地理困境以及一些心灵困境。

渊明在归隐后，也面临着一定的出行困境。他会通过精神式的远行来达到对出行困境的超越，其归隐后的精神远行跨越了地理的疆界。关于渊明的精神远行，本人另有文章详述。

¹根据语境，涉暑（一作暮）经秋霜之“涉”字后取“暑”字为宜，遥遥春（一作喜）夜长之“遥遥”后取“春”字为宜。

²方立娟：《希望之延续与自然之呈现：陶渊明的田园与田园里的陶渊明》，《海峡人文学刊》，2021年第4期。

³（唐）房玄龄等：《晋书》，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第1642页。

陶渊明在正式归隐之后, 还得面临不一样的田园困境。不过渊明有他的解决方式。“夏日长抱饥, 寒夜无被眠。造夕思鸡鸣, 及晨愿鸟(一作景, 又作乌)迁”, 这是苦熬的方式。在遇上灾害以致农作物收成不好的情况下, 光靠苦熬很难维持, 也可能会出去借贷或乞讨, 虽说渊明《乞食》一诗的创作时间有争议, 但他归隐后在遇到粮食不足的情况下也有乞食的可能。辞官归田后, 陶渊明的心理与身份的转换有一定契合, 即他有时把自己看成一个普通百姓, 而未必是一个抱着大志又不得用的士人, 以这般心态乞食, 与农人交流, 不仅可解决暂时的温饱问题, 亦可得其中乐趣。

渊明还可通过调整心态及精神远行的方式超越田园困境。从《有会而作》的小序中可看出田园未必能供应足够的物资, “岁月将欲暮, 如何辛苦(一作足新)悲”, 当田园无法供应他生活的必需品时, 他说: “常善粥者心, 深恨(一作念)蒙袂非。嗟来何足吝, 徒没空自遗。”其思维超越了他所处的地理环境, “斯滥岂彼(一作攸)志, 固穷夙所归。馁也已矣夫, 在昔余多师”, 除了在田园生活中感受悠然, 他也可以从其他方面汲取生存和生活乃至生命的力量。在《丙辰岁八月中于下潏田舍获》中, 他言: “遥谢荷蓑翁, 聊得从君栖。”他不仅是一个农人, 其精神也可穿越时空, 以古贤者为伴。

精神的远行也有助于渊明超越居所困境。“诗人的天职是还乡, 还乡使故土成为亲近本源之处”¹, 渊明在乙巳年正式辞官返乡, 回到了他曾经依恋之地。不过归家后他难免遇到一些难题。本人曾在《陶渊明诗文中的远行书写》中论证: “渊明虽然在乙巳岁辞官了, 但他真正意义上的家还是需要从精神上寻找, 这种寻找在某种意义上而言也是寻找身心之安顿, 也是寻求一种精神回归。”²

归隐初期, 渊明居所方面的问题并未得到彻底解决, 居所未必给他精神上的归属感。至《戊申岁六月中遇火》, 他还有“仰想东户时, 余粮宿中田”之想法, 至《移居》, “闻多素心人, 乐与数晨夕”或许是对“仰想东户时, 余粮宿中田”的回应。“吾庐”固然可爱, 但迁居后也得到了另一种快乐。归隐后的精神远行及心态上的逐步转变, 让他跳脱了地理的限制。

三、陶渊明思想不为地理所限的深层原因

如前所述, 人容易受其所处地理环境的影响, 但陶渊明的思想和文学创作虽受了一定的地域文化影响, 却不为地理所限, 自有其超越之处。陶渊明思想不为地理所限之原因, 亦值得探究。

1、“质性自然”: 天性的影响

陶渊明在《归去来兮辞》中评价自己“质性自然, 非矫厉所得”, 在《与子俨等疏》中, 他自言“性刚才拙, 与物多忤”, “性刚”与“质性自然”并不矛盾, “性刚”更不易为外界力量所屈, 有自己的原则, 才能更好地遵从本性。渊明在《归园田居》自称“性本爱丘山”, 又在《归鸟》中言: “遐路诚悠, 性爱无遗。”可见他对于自我天性有一个思考的过程。

渊明言“质性自然”, 可能受到了道家影响, 其“性”与今天所说的先天遗传因素有不一样之处, 但天性其实又与先天遗传因素有一定的关联。大卫·科恩认为: “遗传不只影响到我们的怪癖、性情、爱好或先天不足、神经症, 它还影响到我们的弹性、抵抗能力, 从早年的逆境中恢复的能力、自我决定能力、创造力以及对环境的应对, 其中包括家庭环境。”³又: “然而一个人的基因蓝图是不能被全部遗传给下一代的。我们只能传输一部分。也就是说, 父母只能随机地将其一半的蓝图传递给每一个子女。这就导致了个体间的独特差异。”⁴颜延之《陶征士诔》称渊明: “弱不好弄, 长实素心。”⁵又: “在众不失其寡, 处言愈见其默。”⁶渊明在《晋故征西大将军长史孟府君传》中曾评价其外祖父孟嘉: “始自总发, 至于知命, 行不苟合, 言无夸矜, 未尝有喜愠之容。”在《命子》中评价父亲: “于穆(一作皇)仁考, 淡焉虚止。寄迹风云, 置(一作冥)兹愠喜。”也许渊明的一些性格曾受家族环境或道教等影响, 却不能排除也有先天遗传因素。

老子曰: “专气致柔, 能如婴儿乎?”⁷婴儿有一种本真状态, 不像成人一样受到世俗干扰。回归婴儿状态, 不仅在于身, 也在于心。人的一些天性有时会被后天环境所遮蔽, 有时在世俗中逐渐迷失自我。“实迷途其未远, 觉今是而昨非”, 渊明辞官的心路历程也与回归自我天性有关。

渊明在《饮酒》序言中说: “纸墨遂多, 辞无论次, 聊命故人书之, 以为欢笑尔。”这说明他有意整理自己的

¹ (德) 海德格尔著, 郅元宝译, 张汝伦校: 《人·诗意地安居: 海德格尔语要》,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0年, 第69页。

² 方立娟: 《陶渊明诗文中的远行书写》, 《南昌师范学院学报》, 2024年第2期。

³ (美) 大卫·科恩著, 王大华、周晖译: 《遗传如何影响孩子的性格、能力及未来》, 北京: 新华出版社, 2003年, 第9页。

⁴ (美) 大卫·科恩著, 王大华、周晖译: 《遗传如何影响孩子的性格、能力及未来》, 北京: 新华出版社, 2003年, 第184页。

⁵ (清) 严可均辑: 《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四),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9年, 第514页。

⁶ (清) 严可均辑: 《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四),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9年, 第514页。

⁷ 李存山注译: 《老子》, 郑州: 中州古籍出版社, 2008年, 第58页。

文集,但他没有追随潮流。刘勰《文心雕龙·明诗篇》言:“江左篇制,溺乎(孙云:《御览》作‘于’)玄风……”¹不管是东晋的玄风,还是宋初诗坛争奇求新之风,渊明都没有主动去迎合,即使是在仕途上也没有为了迎合世俗而取巧,他不求名。这说明渊明其实并未丢失“质性自然”之天性,只是一部分天性暂时为仕宦所困,为世俗遮蔽而已。

渊明在对天性进行思考时,不是为了成为更好的自己,而是成为自己。在回归自我天性的过程中,渊明也会受到周围环境的影响,多因素综合作用下,渊明渐渐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思想。

2、独特思想的形成

陶渊明的思想受儒道释影响,但又有自己的独特之处。他善于在前人思想的基础上,形成自己独特的思想。

渊明受儒家文化影响很深,这点已有很多相关研究,不赘述。渊明确实从儒家思想中汲取了不少精神力量,在《始作镇军参军经曲阿作》中诗人以颜回自比,《论语·先进》言:“子曰:‘回也其庶乎,屡空。赐不受命,而货殖焉,亿则屡中。’”²颜回常处于贫困状态,在学问道德方面却接近完善,而他也能在“一簞食,一瓢饮”³的处境中不改其乐。在《与子俨等疏》中他引用了子夏“死生有命,富贵在天”⁴之言,他认为子夏之所以如此言,是因为穷达不可过分追求,长寿和短命是不能在命定之外去选择的。他对子夏此言的解读,似跟道家因素更契合,然而意义却又是从儒家子弟处所生发,可见他骨子里对儒家的尊奉。道家跟儒家思想之间又是有链接通道的,如《论语·泰伯》“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⁵等,这也为很多古代文人儒道兼收的思想提供了一定基础。

尽管儒家也支持“无道则隐”,但很多儒家人物在战乱年代并未归隐,即便孔子说:“道不行,乘桴浮于海。”⁶可他在经历了陈蔡之困之后,依然不忘宣称自己的政治主张,这一点,跟道家还是不同,而让渊明真正走向隐居的其实是道家 and 道教文化。这里说的道家文化主要是指以黄老、庄子等人的思想形成的文化。《史记》中《太史公自序》言:“道家使人精神专一,动合无形,赡足万物……”⁷道教则是有组织有团体有神明崇拜的宗教,在理论上吸收了一些老庄思想,但又对老庄思想有所改造。渊明所处的时代,天师道盛行,虽然目前未见典籍记载渊明是否信教,但他还是有受天师道影响的可能。

乙巳岁是渊明归隐的那一年,在乙巳岁三月经钱溪时,他说:“一形似有制,素襟不可易。”在同年所作的《归去来兮辞》中,他正式回应了这点:“既自以心(一作身)为形役,奚惆怅而独悲。”道家教人脱离形体束缚走向自由,《庄子》言:“与物相刃相靡,其行尽如驰而莫之能止,不亦悲乎!终身役役而不见其成功,茶然疲役而不知其所归。可不哀邪!”⁸又:“物物而不物于物。”⁹而其“质性自然,非矫厉所得”的一面,也与《老子》中的“道法自然”¹⁰有所契合。虽然渊明自幼习儒家典籍,但他性格里也有跟道家契合的一面,这点对他归隐选择的影响非常重要。

渊明还受道教文化的影响,渊明所处时代,不乏天师道信仰者,渊明家族中又有人信仰天师道,陈寅恪先生在《魏书司马睿传江东民族条释证及推论》中言:“而陶侃后裔亦多天师道之名,如綽之、袭之、谦之等。”¹¹据陈寅恪《崔浩与寇谦之》:“此传载谦之名少一‘之’字,实非脱漏,盖六朝天师道信徒之以‘之’字为名者颇多,之字在其名中,乃代表其宗教信仰之意,如佛教徒之以‘昙’或‘法’为名者相类。”¹²而詹石窗和程敏华认为:“关于六朝人以‘之’为名事,今查检道教内外文献,知其时名中带‘之’的人,信佛、信道或与之无关涉者皆有之。”¹³但不管如何,《晋书》记载了其叔父陶淡“好导养之术,谓仙道可祈。”¹⁴他的从弟敬远也信仰道教,渊明一些作品也涉及对道教的认同,他受道教影响很深,但目前并没有典籍记载渊明自身是否有天师道信仰,李小荣认为:“刘宋新天师道经典《三天内解经》卷上所讲‘三天正法’即要求:‘治病疗疾,不得饮酒食肉。’从严格的道教戒律意义上

¹ (南朝·梁)刘勰著,范文澜注:《文心雕龙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第67页。

² 杨伯峻译注:《论语译注》,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2版,第115页。

³ 杨伯峻译注:《论语译注》,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2版,第59页。

⁴ 杨伯峻译注:《论语译注》,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2版,第125页。

⁵ 杨伯峻译注:《论语译注》,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2版,第82页。

⁶ 杨伯峻译注:《论语译注》,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2版,第43页。

⁷ (汉)司马迁撰,韩兆琦评注:《史记》,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第7636页。

⁸ 曹础基译注:《庄子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2010重印),第18页。

⁹ 曹础基译注:《庄子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2010重印),第229页。

¹⁰ 李存山注译:《老子》,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79页。

¹¹ 陈寅恪:《金明馆丛稿初编》,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第121页。

¹² 陈寅恪:《金明馆丛稿初编》,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第93页。

¹³ 詹石窗、程敏华:《陶渊明道教信仰及其相关诗文思想内涵考论》,《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1期。

¹⁴ (唐)房玄龄等:《晋书》,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第1641页。

讲,即便生病之际,也不能饮酒。”¹又:“当时古灵宝经对酒戒的特殊态度,完全契合于陶渊明的精神需求。”²从渊明的生活习惯看,他很难接受全套的道教戒律,未必是纯正的天师道教徒,只能说明他受过天师道的影响。

其实以渊明自我意识强烈的特点以及后来思想上的独特性,他的思想很难为某一门宗教所限制,且《晋书》把他和陶淡一起放进“隐逸”一类,介绍了陶淡崇尚仙道之事,却没提及渊明是否有这方面信仰。另,还可从天师道经典著作《老子想尔注》来分析,观《老子想尔注》的“情性不动,喜怒不发,五藏皆和同相生,与道同光尘也”³,这跟陶公性格倒有契合处。渊明及其家族中一些人的性格符合道教经典的一些要求,然而从渊明文学看,其个人言行未必完全符合道教经典,对于《道德经》的“智慧出,有大伪”,《老子想尔注》的批注有言:“真道藏,耶文出,世间常伪伎称道教,皆为大伪不可用。何谓耶文?其五经半入耶,其五经以外,众书传记,尸人所作,悉耶耳。”⁴此处的“耶”通“邪”,《老子想尔注》认为五经有一半入了邪文,然而渊明“游好在六经”,更何况他好奇书,还读《山海经》,《老子想尔注》还言:“道用时,帝王躬奉行之,练明其意,以臣庶于此,吏民莫有不法效者。知道意贱死贵仙,竟行忠孝质朴,□端以臣为名,皆忠相类不别。”⁵渊明并没有“贱死贵仙”,其生死观也是自然的,如“聊乘化以归尽”、“应尽便须(一作复)尽,无复独多虑(无使独忧虑)”等,这些认识更接近于庄子,与当时的天师道信仰有所不同。除《老子想尔注》外,渊明的思想跟《太平经》所记载的也未必完全符合,这点在后文会有提及。渊明受当时的天师道影响,但对某些教义其实并没完全吸收,甚至也有不一样的看法。本人在《连接与阻隔:陶渊明诗文中的山》一文中已提及陶渊明对于昆华仙境的追求到归隐后期之“邈然兹道绝”及“应尽便须(一作复)尽,无复独多虑(无使独忧虑)”等想法⁶,这其实也从侧面映证了渊明对于道教态度的一些变化,其实陶渊明在人生的后期慢慢形成了自己的思想。

渊明也不免受释家的影响。他在当时可以接触到释家中人,他居住在江州一带,很方便跟慧远集团打交道,且他跟慧远、刘遗民、周续之、张野等人也是朋友,从《莲社高贤传》来看,渊明有加入他们的机会,《莲社高贤传》:“常往来庐山,使一门生二儿舁篮舆以行。时远法师与诸贤结莲社,以书招渊明,渊明曰:‘若许饮则往。’许之,遂造焉,忽攒眉而去。”⁷也许渊明很难遵守当时的佛教戒律,更深层次的原因可能是他未必能够从思想上全面信仰一门宗教。

渊明于《归园田居》中言:“人生似幻化,终当归空(一作虚)无。”“空无”这个术语,跟佛家有关。只是这里出现了异文,空,又作“虚”,曾本、咸丰本、焦本都有“一作虚”之记载,“虚无”也可跟道家有关,且“幻化”也有一定的道家成分。渊明作《形影神》诗,但道教也有关于形神的讨论,如《太平经》,而佛教的慧远也曾作《万佛影铭》。即使观点不一致,也很可能说明渊明对于佛教的一些义理其实也是思考过的。诚如朱光潜所言:“我并不敢因此就断定渊明有意地援引佛说,我只是说明他的意识或下意识中可能有一点佛家学说的种子,而这一点种子,可能像是熔铸成就他的心灵的许多金属物中的寸金片铁;在他的心灵焕发中,这一点小因素也可能偶尔流露出来。”⁸

对于有着独立思考能力,有一定质疑精神的渊明而言,他很难真正服从某一种思想。如他曾经对传统的善恶观提出过疑问,渊明言:“积善云有报,夷叔在(一作饥)西山。善恶苟不应,何事空立言!”⁹关于善恶有报的理念,儒道两家皆有涉及,《周易·坤·文言》中的“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¹⁰便跟儒家的善恶观相关。而《太平经》卷三十五言:“但当赏善罚恶,令使其分明□□,即善者日兴,恶者日衰矣。”¹¹《太平经》卷八十六言:“是故天者常佑善人,道者思归有德;故天者不肯佑恶人,道者不肯附于愚蔽人也。故常敕真人,以付归有德之君也。”¹²

然而渊明对于善恶有报曾有过疑问,他在诗歌中也没有避讳这种疑惑。值得注意的是,这或许可以从佛教中找答案。《莲社高贤传》有对道生法师之记载,言其“研思因果,乃立‘善不受报’,及‘顿悟成佛’义。”¹³陈坚说:

¹李小荣:《陶渊明与道教灵宝派关系之检讨——以涉酒诗文为中心》,《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5期。

²李小荣:《陶渊明与道教灵宝派关系之检讨——以涉酒诗文为中心》,《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5期。

³饶宗颐:《老子想尔注校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7页。

⁴饶宗颐:《老子想尔注校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22页。

⁵饶宗颐:《老子想尔注校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23页。

⁶详细内容见:方立娟:《连接与阻隔:陶渊明诗文中的山》,《中华研究月刊》,2025年第2期。

⁷作者不详:《莲社高贤传》,北京:中华书局,1991年版,第17页。

⁸朱光潜:《诗论》,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202页。

⁹本诗末句“传”字后,宋本注:“空立言,一作立空言。”

¹⁰(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19页。

¹¹上海古籍出版社校:《太平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第148—149页。

¹²上海古籍出版社校:《太平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第321页。

¹³作者不详:《莲社高贤传》,北京:中华书局,1991年版,第7页。

“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乃是中国化的佛教观念，因为考诸印度佛经，其实并没有“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这样的说法，至少没有这样的原话。印度佛经上有的只是“诸恶莫作，诸善奉行”，说全了叫“诸恶莫作，诸善奉行，自净其意，是诸佛教”，这是个佛教偈语，被称为“七佛共偈”。¹陈坚认为：“竺道生自己的相关论述以及当时佛教界围绕‘善不受报’的往来辩难基本上都已失之无存。”²渊明要解决关于善恶的疑惑，可能需要佛教的阐释。或许道生法师能够对渊明的疑惑作出回答，只是道生法师在庐山传法时，渊明未必听闻。更何况一来他儒道兼综，二来他也未必能守佛家戒律。

“结发念善事”的渊明，曾在《荣木》中言：“匪道曷依？匪善奚敦？”可见他在人生路上愿意向善。渊明曾说：“不赖固穷节，百世当谁传。”坚守气节的品质，也确实可流传百世。《左传·襄公二十四年》：“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³立德也可以称“不朽”。不可否认，渊明自身有“立德”之想法，他在《形影神》中说“立善常所欣”⁴。“立善常所欣，谁当为汝誉？甚念伤吾生，正宜（一作目）委运去”，立德未必就能有美名，以渊明当时的身份和名声来看，他预料自己百世后可能名已不存，毕竟他没有主动迎合这个世界，故不免有“伤吾生”之慨叹，却也有“委运去”之释然。“应尽便须（一作复）尽，无复独多虑（无使独忧虑）”，浪于大化中的不仅仅是他的生命，也可能是他的声名，他把这些都看成是合乎自然的。是生还是死，是沉还是浮，是默默无闻还是流传百世，顺其自然而已。“应尽便须（一作复）尽，无复独多虑（无使独忧虑）”，出于本心，出于自然。

渊明曾受儒释道思想影响，但他晚年的一些思想有独特之处，是他自己内心的总结。渊明在人生的后期，其实能够做到《庄子》中的“独与天地精神往来，而不敖倪于万物。不谴是非，以与世俗处”⁵，不过其思想又不仅限于道家庄子，这样的人，他不为某一种信仰或思想所限制，他的思想自然也可以跨越地理的疆界，不为地理与时代所限。

3、“心不滞物”之境界

山林对于渊明而言有着特殊意义，“性本爱丘山”，“托体同山阿”，山林是他情感的寄托之一，也是安放他去世后的身体之地。但诗人言：“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一作为）尔？心远地自偏。”他喜欢山林，却不执着于此，田园对于渊明而言也具有不一样的意义，他曾眷恋田园，也能在田园中看淡。正因如此，他所描绘的景致更加显得自然动人。《古学千金谱》有言：“心不滞物，在人境不虞其寂，逢车马不觉其喧。篱有菊则采之，采过则已，吾心无菊。”⁶这种“心不滞物”之境界与明代许学夷提及的“超然物表”之境界是类似的，皆认识到了陶渊明精神上的自由。

陶渊明“心不滞物”境界之形成，与其天性及其独特思想有一定的关系。“质性自然”也让他更不会执着于外物，更知顺时而为，而“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应尽便须（一作复）尽，无复独多虑（无使独忧虑）”的思想也让他超脱于现实的有形，而达到了心的自由。这种“心不滞物”之境界，大概形成于渊明归隐之后⁷。

“心不滞物”与地理情结并不矛盾，因人的情感在不同的时间，情境下可呈现不同的状态。在出仕途中，陶渊明很难做到“心不滞物”，此时心易为外在事物影响，即使他当时在文学作品中偶尔有超脱之词，可是却不代表其当时心境的超然。而他正式归隐之后，真正开始自然生活，虽然偶尔有烦忧，但也可以有“心不滞物”之际，这类思想有时也会反映在其文学作品中，明朝诗论家许学夷在《诗源辩体》中说：“晋宋间谢灵运辈，纵情丘壑，动逾旬朔，人相尚以为高，乃其心则未尝无累者。惟陶靖节超然物表，遇境成趣，不必泉石是娱，烟霞是托耳。”⁸

陶渊明曾有过的行役路困境在归隐后得到了解决。而田园困境、居所困境以及出行困境也没有困住其思维。陶渊明的思想受地理影响，其实又超越了地理的限制。他曾设想出远郊的情景，表明了“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的豁达，而他又在《自祭文》中说明了“不封不树”，这是一种在意，也是一种豁达。若真不在意，就不会有所交待。若真的过于在意，就可能会留下标志。生前有着地理情结的他，身后所归之地也是他关注过的。而生前思想超越了地理所限的陶渊明，希望自身的墓地“不封不树”，随岁月流逝，最后归于自然。对于今人而言，他的墓地也是一个谜⁹，可对于他本人来说，或许是归于自然。

¹陈坚：《“善有善报”与“善不受报”——佛教善恶“因果”观辨析》，《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5期。

²陈坚：《“善有善报”与“善不受报”——佛教善恶“因果”观辨析》，《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5期。

³杨伯峻译注：《春秋左传注》，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第3版，2011年第11次印刷，第1088页。

⁴“立善常所欣”之“立”字后有注，看不太清，似“一作主”。

⁵曹础基译注：《庄子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2010重印），第397页。

⁶作者不详：《古学千金谱》，转引自北京大学中文系编：《古典文学研究资料汇编·陶渊明卷（下编）》，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70页。

⁷方立娟：《陶渊明文学创作对地理的超越》，《人文社科研究学刊》，2025年4月，第3卷2号。

⁸（明）许学夷著，杜维沫校点：《诗源辩体》，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第106页。

⁹本人曾经在博士论文第一章第一节中探讨过相关问题。

归于自然，是身体的回归，也是精神的回归，身体和思想联系着大地，又超越了所处的时空。

参考文献：

- [1]刘师培撰，程千帆等导读.中国中古文学史讲义[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
- [2]（南朝·梁）萧统编，李善注.文选[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 [3]方立娟.书写与超越：陶渊明文学中的地理空间研究[D].博士学位论文，厦门大学，2022.
- [4]方立娟.陶渊明文学创作对地理的超越[J].人文社科研究学刊，2025，3(2):10—17.
- [5]（晋）陶潜.陶渊明集[M].宋刻递修本,中国国家图书馆藏.
- [6]方立娟.希望之延续与自然之呈现：陶渊明的田园与田园里的陶渊明[J].海峡人文学刊 2021（04）:145-150+156.
- [7]（唐）房玄龄等.晋书[M].北京：中华书局,2000.
- [8]（德）海德格尔著，郇元宝译，张汝伦校.人,诗意地安居：海德格尔语要[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
- [9]方立娟.陶渊明诗文中的远行书写[J].南昌师范学院学报，2024（02）：69—73.
- [10]（美）大卫·科恩著，王大华、周晖译.遗传如何影响孩子的性格、能力及未来[M].北京：新华出版社,2003.
- [11]（清）严可均辑.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四)[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
- [12]李存山译注.老子[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8.
- [13]（南朝·梁）刘勰撰，范文澜注.文心雕龙注[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
- [14]杨伯峻译注.论语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0(第2版).
- [15]（汉）司马迁撰，韩兆琦评注.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2010.
- [16]曹础基译注.庄子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2007（2010重印）.
- [17]陈寅恪.金明馆丛稿初编[M].上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
- [18]詹石窗、程敏华.陶渊明道教信仰及其相关诗文思想内涵考论[J].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01): 67-71+160.
- [19]李小荣.陶渊明与道教灵宝派关系之检讨——以涉酒诗文为中心[J].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05): 111—119.
- [20]饶宗颐.老子想尔注校证[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
- [21]方立娟.连接与阻隔：陶渊明诗文中的山[J].中华研究月刊，2025（02）：20—25.
- [22]作者不详.莲社高贤传[M].北京：中华书局，1991年版.
- [23]朱光潜.诗论[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8.
- [24]（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M].北京：中华书局,1980.
- [25]上海古籍出版社校.太平经[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
- [26]陈坚.“善有善报”与“善不受报”——佛教善恶“因果”观辨析[J].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5):39—46.
- [27]杨伯峻译注.春秋左传注[M].北京：中华书局,2009(第3版):.
- [28]作者不详.古学千金谱[M].转引自北京大学中文系编：古典文学研究资料汇编·陶渊明卷（下编）[C].北京：中华书局，1962.
- [29]（明）许学夷著，杜维沫校点.诗源辩体[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

The Transcendence of Tao Yuanming's Thought on Geographical Dilemma

FANG Lijuan

Depart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Jinan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632, China

Abstract: Tao Yuanming has a certain geographical complex, showing certain emotions for the countryside, mountains, etc. He also encountered geographical difficulties, which required him to face the distance, hardships and reflections on the way during his career. After returning to the field, he had to face new geographical difficulties, but his literature and even his life were not limited by geography. He transcended the geographical dilemma. The deep reasons why Tao Yuanming's thought is not limited by geography include the influence of nature, the formation of his unique thought and the realm of "heart not stagnant". When Tao Yuanming pondered on nature, he did not aim to become a better version of himself, but to become himself. His thoughts were influenced by Confucianism, Taoism, and Buddhism, but also had their own unique characteristics. Tao Yuanming was not limited by any particular belief or ideology, and his thoughts could transcend geographical boundaries, thus achieving a transcendence of geography.

Keywords: Tao Yuanming; Geographical predicament; Transcendence; Thought

基于听辨实验的延边朝鲜语使用者对 首尔方言单元音/ɔ/与/o/的感知样态考察

许 秦¹

(1. 东京大学, 日本 东京 1130033)

摘要: 本研究通过听辨实验, 探讨了目前居住在中国延边朝鲜族自治州的朝鲜族朝鲜语使用者如何感知首尔方言使用者发音的单元音/ɔ/与/o/。先行研究指出, 延边朝鲜语与首尔方言中, 单元音/ɔ/与/o/的开口度呈现相反关系, 即从声学角度来看, 两者在音值上存在差异。此种差异有可能导致延边朝鲜语使用者与首尔方言使用者在听辨彼此的/ɔ/与/o/时出现错误。为了验证这一点, 本研究以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出身的年轻一代延边朝鲜语使用者为对象, 进行了听辨实验, 观察他们对首尔方言单元音/ɔ/与/o/的感知状况。实验结果显示, 无论男女, 延边朝鲜语使用者均以相当高的比例将首尔方言的/ɔ/感知为/o/, 将/o/感知为/u/。换言之, 延边朝鲜语使用者在准确听辨首尔方言使用者的/ɔ/与/o/方面存在一定困难。这一现象可以归因于延边朝鲜语与首尔方言的元音系统差异。

关键词: 延边朝鲜语, 首尔方言, 元音/ɔ/, 元音/o/, 听辨实验

DOI: doi.org/10.70693/rwsk.v1i5.956

1. 前言

1.1. 研究背景

本研究旨在通过听辨实验, 考察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居住的朝鲜族²朝鲜语³使用者, 如何感知首尔方言使用者的单元音/ɔ/(ㅓ)与/o/(ㅕ)。延边朝鲜语作为中国境内朝鲜族最为普遍使用的朝鲜语方言, 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关于延边朝鲜语的研究, 多集中于音系学领域, 这是因为延边朝鲜语保留了首尔方言已消失的重音体系⁴, 该体系继承自其底层方言咸镜道方言, 因此对于了解已难以直接观察的咸镜道方言的音系特征具有重要意义。此外, 由于延边朝鲜语中存在独特的方言词汇与词尾, 因此形态论及句法语义学的研究也有一定积累。然而, 相较于其他韩国语言变体, 延边朝鲜语在语音学研究上尚属薄弱, 因此有必要进一步补充其语音系统的详细描写。

朝鲜语中的单元音/ɔ/在各地方言中音值差异显著, 且同一方言内部不同世代之间亦存在差异。根据许秦(2021, 2022)的研究, 延边朝鲜语中单元音/ɔ/的开口度小于首尔方言的/ɔ/, 更接近首尔方言的/o/。不过, 许秦(2023)指出, 延边朝鲜语年轻一代中/ɔ/与/o/的开口度差异已几乎消失, 且从F1⁵(与发出元音时的张口大小相

作者简介: 许 秦(1995—), 男, 博士, 东京大学人文社会系研究科研究员, 研究方向为朝鲜语的音系学, 语音学。

² 朝鲜族是中国官方认可的少数民族, 其祖先为自清朝末期起从朝鲜半岛迁移至中国东北地区的朝鲜人。延边朝鲜族自治州是中国朝鲜族人口最多的地区, 自早期以来便积极推进朝鲜语教育。关于中国境内朝鲜族的形成过程, 可参考金光洙(2009)。

³ 亦可称之为“韩国语”或者“韩语”。本论中统一称之为“朝鲜语”。

⁴ 延边朝鲜语的重音系统保留了咸镜道方言的重音特征, 其特点是在一个词组中仅出现一次高音调。关于延边朝鲜语声调系统的研究, 可参考河须崎(2010)。

⁵ 由声道的共鸣所获得的能量峰值被称为“共振峰”(formant), 其按低频率依次称为第一共振峰(F1)、第二共振峰(F2)、第三共振峰(F3)等。若将共振峰频率与元音的构音特征相联系, 可总结如下规律: 首先, F1 随口腔前部的狭窄程度降低而降低, 随喉部的狭窄程度增加而升高, 即与元音的开口度相关。其次, F2 随着舌后部的收缩而降低, 随着舌前部的收缩而升高, 即与元音的前后性相关。然而, F2 的数值并不总是能准确反映元音构音时舌位的前后位置, 这是因为 F2 受到唇圆化的影响。唇圆化程度越强, 各共振峰的频率越低, 尤其是当发生唇圆化时, F1 和 F2 中的 F2 下降更为显著。因此, 虽然 F2 是解释元音前后性的线索之一, 但在同时考虑唇圆化元音与非唇圆化元音(即

关)平均值来看, /ɔ/的 F1 值反而大于/o/, 呈现向首尔方言靠拢的趋势。然而, 即便如此, 延边朝鲜语的/ɔ/开口度仍未达到首尔方言的水平。因此, 有必要进一步探讨延边朝鲜语使用者能否准确感知首尔方言发音者的/ɔ/与/o/。因此, 本研究通过听辨实验, 探讨延边朝鲜语使用者对首尔方言/ɔ/与/o/的感知样态。

1.2. 先行研究

关于元音/ɔ/的音值, 已有多项研究。以首尔方言为对象的声学研究中, 김현 (2008) 指出, 长短元音/ɔ:/与/ɔ/的共振峰频率差异, 在 5 位受试者中仅 1 位出现明显差异。신우봉 (2018) 指出, 年轻一代的/ɔ/更趋向后舌化, 且音值受前导音、音节位置(词首/非词首)等条件影响。

关于元音/o/, 多项研究报告了/o/与/u/的音值接近现象(如 J. Han & H. Kang, 2013; H. Kang & J. Han, 2013; T. Igeta 等, 2014; 강지은 공은정, 2016)。尤其指出女性中/o/与/u/的接近现象尤为显著, 且不是简单的合流, 而是整个非前舌元音系统发生链式变动。

此外, 关于/o/与/u/区分的听辨实验, 변희경 (2018) 发现, 尽管女性受试者的共振峰差异很小, 但并未导致感知混淆, 提示其他声学变量(如 H1-H2⁶、基频 F0⁷)在区分中起作用。

关于延边朝鲜语的/ɔ/与/o/, 김현기 (2009) 指出, 延边大学生群体中/ɔ/与/o/的音值融合为/o/。许秦 (2021) 发现, 男性的/ɔ/呈现中舌音值, 女性则与/o/同为后舌音, 但通过圆唇与否加以区分。许秦 (2023) 进一步指出, 年轻一代中/ɔ/与/o/开口度差异已不明显, 但统计上仍有显著差异, 尚不能断言与首尔方言完全同化。

关于/o/与/u/的听辨, 岩井亮雄 (2017) 研究指出, 延边朝鲜语使用者更易将首尔方言年轻人发音的/u/感知为/o/, 而/o/的混淆情况较少。

1.3. 实验方法

本实验以首尔方言 30 岁男性发音者为素材, 录制了包括/ɔ/与/o/在内的 8 个单元音⁸, 每个元音前加上辅音/h/ (ㅎ) (如: ㅎ/ho/, ㅎ/ho/等)⁹。同时, 为观察非词首音节中/ɔ/的感知情况, 还制作了以“아”/a/为前缀的无意义双音节词(如: 아ㅎ/ aho /, 아호/aho/等)。

听辨实验对象均为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出身, 接受过小学至高中完整朝鲜语教育的 6 名 20 岁左右男女(各三名)¹⁰。实验分单音节与双音节两组, 采用随机排列的录音素材, 每个目标元音重复三次¹¹, 并要求受试者听后在纸上记录所听元音, 最后回收数据, 统计正确率。

2. 考察

2.1. 延边朝鲜语单元音/ɔ/与/o/的音值

在叙述实验结果之前, 首先有必要详细说明延边朝鲜语单元音/ɔ/与/o/的音值。因此, 以下整理并提出先行研究许秦 (2021) 与许秦 (2022) 中呈现的延边朝鲜语单元音音值。

首先, 许秦 (2021) 进行了关于延边朝鲜语使用者后舌元音/ɔ、o、u、ʉ/的声学语音学研究, 揭示了其音值。同时, 与首尔方言后舌元音的音值进行了对比, 并论述了其差异。在该研究中, 通过测量元音/ɔ/与/o/的共振峰频率, 得出男性使用者的元音/ɔ/具有中舌平唇元音的音值, 元音/o/具有后舌圆唇元音的音值。而女性使用者的元音/ɔ/与/o/皆为后舌音, 但/ɔ/为平唇元音, /o/为圆唇元音。接着, 许秦 (2022) 基于上述研究成果, 构建了如下延边朝鲜语单元音体系。

表 1 男性延边朝鲜语使用者单元音体系 (出自: 许秦 2022)

	前元音	央元音	后元音
闭元音	i		ʉ (非圆唇) /u (圆唇)
半闭元音	e	ɔ	
半开元	ɛ		o
开元音		a	

平唇元音)的情况下, 仅凭 F2 的数值无法判断舌头的前后位置。此外, 先行研究还指出 F3 的数值亦与唇圆化有关。因此, 在判断某一元音是否具有唇圆化特征时, 有必要综合观察 F2 和 F3 的数值。

⁶ 可作为表示气息性强度的声学信息, 气息性越强, 该值越高。

⁷ 基本频率 (fundamental frequency) 亦称为基频, 在本研究中指的是元音所具有的音高。

⁸ 即/a/、/ɔ/、/o/、/u/、/w/、/i/、/ɛ/、/e/。

⁹ 辅音/h/ (ㅎ) 为声门摩擦音, 可视作最接近元音的辅音。为最大程度地减少辅音对元音的影响, 指示被试在元音前加上辅音/h/进行发音。

¹⁰ 由于在中国收看韩国电视节目变得更加便利, 且朝鲜族赴韩变得更加容易, 因此在本研究中所选定的被试中, 没有一人是完全未曾观看过韩国节目或从未去过韩国的。

¹¹ 用于听辨实验的词语共有 24 个, 包括单音节词和双音节词。

表2 女性延边朝鲜语使用者单元音体系 (出自: 许秦 2022)

	前元音	央元音	后元音
闭元音	i	u	u
半闭元音	e		ɔ (非圆唇) /o (圆唇)
半开元	ɛ		
开元音		a	

此外, 通过与首尔方言单元音体系的对比, 关于元音/ɔ/与/o/, 总结了以下结论:

第一, 从开口度的差异来看, 可以知晓在延边朝鲜语中, 元音/o/的开口度大于元音/ɔ/, 而在首尔方言中, 元音/ɔ/的开口度更大。

第二, 从前舌性差异来看, 首尔方言的元音/ɔ/作为后舌元音的特性, 比延边朝鲜语的元音/ɔ/更加显著。

第三, 在圆唇元音/o/与/u/中, 首尔方言的前舌性¹²顺序是/o/ < /u/, 而延边朝鲜语则相反, /o/的前舌性较/u/更强。

第四, 关于元音/a/的前舌性, 延边朝鲜语与首尔方言之间并无显著差异。

接着, 许秦 (2023) 仅以延边朝鲜语年轻一代使用者为对象, 对单元音、双元音、辅音的声学特征进行了实验语音学考察。关于元音/ɔ/与/o/, 出现了与许秦 (2022) 不同的现象: 无论男女, 尤其在开口度差异方面, 变得模糊。仅从平均值来看, 反而元音/ɔ/的开口度比元音/o/更大, 呈现出与首尔方言类似的开口度关系。但许秦 (2023) 同时指出年轻一代延边朝鲜语使用者的/o/的开口度尚未达到首尔方言的/o/的开口度水平。

从以上先行研究可以知晓, 延边朝鲜语与首尔方言在元音/ɔ/与/o/的音值上存在差异, 这种音值上的差异可能导致感知上的困难。也就是说, 延边朝鲜语使用者与首尔方言使用者之间, 互相在听辨元音/ɔ/与/o/时, 极有可能发生误认。

基于以上内容, 以下将呈现延边朝鲜语使用者对首尔方言使用者元音/ɔ/与/o/感知的听辨实验结果。

2.2. 延边朝鲜语使用者对首尔方言/ɔ/与/o/的感知样态

本节将具体叙述延边朝鲜语使用者如何感知首尔方言元音/ɔ/与/o/的听辨实验结果。实验方法如同前述研究方法所说明, 向六名二十多岁的延边朝鲜语使用者播放经编辑后的三十岁初首尔方言男性发音者的录音文件, 要求受试者听辨所听到的元音, 并记录下来。实验素材中包含了元音/ɔ/与/o/各三次。下列表3就单音节情况和双音节 (即目标元音位于非词首音节时) 情况, 整理了延边朝鲜语使用者正确回答的次数及整体正确率。同时, 将各受试者的错误情况也分别标注在表3中的括号内。

表3 听辨实验结果

	/ɔ/的正确次数 单音节	/o/的正确次数 单音节	/ɔ/的正确次数 双音节	/o/的正确次数 双音节
女性 A	3	0(ɔ→o)	3	0(ɔ→o)
女性 B	0(ɔ→a)	0(ɔ→o)	0(ɔ→o)	0(ɔ→o)
男性 C	1(ɔ→o)	0(ɔ→o)	0(ɔ→o)	0(ɔ→o)
男性 D	0(o→u)	2(o→u)	0(o→u)	2(o→u)
男性 E	0(o→u)	0(o→u)	0(o→u)	1(o→u)
男性 F	3	1(o→u)	0(o→u)	0(o→u)
正确率	38.9%	16.7%	16.7%	16.7%

从表3可知, 无论是单音节情况下, 还是目标元音位于非词首音节情况下, 延边朝鲜语使用者对于两元音的听辨正确率均极低。

首先, 在单音节条件下, 就元音/ɔ/的听辨结果来看, 完全未能正确回答的受试者, 在男性中有两名, 在女性中有一名。详细来看, 这两名男性受试者三次全部将首尔方言的元音/ɔ/误听为/o/, 而该名女性受试者则三次全部误听为/a/。此外, 有一名女性受试者在三次中仅正确辨识一次首尔方言的元音/ɔ/, 其余两次均回答为/o/。不过, 在男女受试者中, 分别有一人三次全部正确辨识出首尔方言的元音/ɔ/。

相较之下, 在双音节条件下, 即元音/ɔ/位于非词首音节时, 整体正确率进一步下降。在男性受试者中, 单音节条件下未能正确辨识的受试者, 在双音节条件下也全部将首尔方言的元音/ɔ/误听为/o/。而单音节条件下三次全部正确辨识的男性受试者, 在双音节条件下却三次全部误听为/o/。女性受试者中, 也显示出类似现象。单音节条件下从未正确辨识的女性, 在双音节条件下也未能正确辨识, 且三次均误听为/o/。另外, 在单音节条件下曾有一

¹² “前舌性”是作者为表示基于听觉印象的元音空间中前后位置所提出的术语, 该术语与实际口腔中舌头的前后位置并不一定对应。

次正确辨识的女性,在双音节条件下三次均未能正确辨识。然而,单音节条件下三次全部正确辨识的女性受试者,在双音节条件下也三次全部准确回答。

接下来,关于单音节条件下元音/o/的听辨结果,整体来看,比/ɔ/的正确率更低。男性受试者中,有一人两次正确辨识首尔方言的元音/o/,另有一人仅一次正确辨识。而女性受试者三人,在单音节条件下均未能正确辨识首尔方言的元音/o/。仔细观察各受试者的回答情况后发现,所有误答均为/u/。

在双音节条件下,即元音/o/位于非词首音节时,情况亦相似,正确率仍然较低。女性受试者无一人正确辨识首尔方言的元音/o/。男性受试者中,在单音节条件下正确回答两次的受试者,在双音节条件下亦正确回答两次。而原本单音节条件下仅一次正确辨识的受试者,在双音节条件下完全未能正确回答。相反,单音节条件下完全未能正确辨识的男性受试者,在双音节条件下有一次正确回答。即便如此,所有误答均为/u/。

根据以上结果,可以认为,延边朝鲜语使用者在听辨首尔方言元音/ɔ/与/o/时,以相当高的概率发生误认:将/ɔ/误听为/o/,将/o/误听为/u/。延边朝鲜语使用者将首尔方言/o/误认作/u/的结果,与先行研究岩井(2017)所报告的不同。岩井(2017)指出,几乎不会将/o/误认为其他元音,但根据本研究结果,延边朝鲜语使用者却以高概率将首尔方言的/o/误认作/u/。

2.3. 感知错误发生原因的探究

为了进一步考察这种现象发生的原因,笔者测量了由首尔方言发音者录制的元音/ɔ/、/o/及/u/的共振峰频率。此外,考虑到大部分延边朝鲜语使用者将/o/误听为/u/,因此也测量了首尔方言发音者的/u/的共振峰频率¹³。下表4与表5分别整理了延边朝鲜语男性使用者的/ɔ/、/o/、/u/的共振峰频率,以及首尔方言男性使用者的对应数据。此处,延边朝鲜语男性数据引自许秦(2023)对延边朝鲜语年轻一代男性使用者元音的平均值测定。由于实验使用的是首尔方言男性发音数据,因此未采纳延边朝鲜语女性数据,避免因性别差异带来的影响。因为女性口腔结构与男性不同,通常女性元音的共振峰频率普遍高于男性,故直接比较不适宜。

表4 男性延边朝鲜语使用者元音共振峰频率 (单位: Hz)

元音	F1	F2	F3
ɔ	542.283	875.910	2250.171
o	376.742	629.202	1900.556
u	415.473	950.071	1997.092

表5 首尔方言使用者元音共振峰频率 (单位: Hz)

元音	F1	F2	F3
ɔ	524.379	820.191	2227.905
O	405.903	591.419	2116.984
U	420.835	874.108	2510.940

从表5的数值来看,可以知晓首尔方言使用者的元音/o/与/u/在F1值上的差异极小。但元音/u/的F2值远高于元音/o/。根据普遍共识,应当是/o/的F1值高于/u/,然而在本发音者中,反而是/u/的F1值更高。这一现象可能与T. Igeta等(2014)等人报告的首尔方言中/o/与/u/接近现象有关。即,元音/o/上升,最终靠近了/u/。而且,本发音者中,不仅是/o/上升,同时/u/也发生了明显的前移。推测这可能是为了维持/o/与/u/的辨别性而产生的变化,但需要进一步验证。

为了更直观地把握延边朝鲜语元音与首尔方言元音之间的关系,利用上述数据绘制了如下的元音空间图。

¹³ 元音的共振峰频率在元音稳定段进行测量,测量时的最大共振峰频率设定为5000Hz。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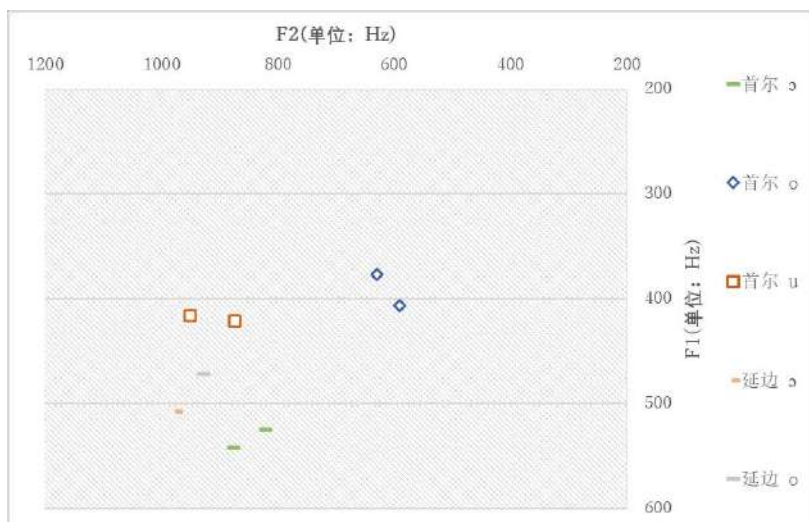


图1 元音空间图

从图1可以看出,首先,延边朝鲜语年轻一代使用者的/u/在元音空间中与首尔方言的/o/非常接近。因此,解释了延边朝鲜语受试者几乎全部将首尔方言的/o/听辨为/u/的现象。其次,就F1值来看,延边朝鲜语的/o/在元音空间上介于首尔方言的/o/与/u/之间,但更接近于首尔方言的/o/。因此,在听辨首尔方言/o/时,正确率略高似乎可以解释,但实际上受试者大多误答为/u/,这一点难以用单纯的声学距离来说明。可能的原因是,延边朝鲜语年轻一代在听辨元音时表现出较为保守的倾向。也就是说,虽然发音上元音/o/的开口度有所变化,但在听觉感知上,仍倾向于将开口度较大的元音辨认为/o/,开口度较小的辨认为/o/。关于这一点,还需进一步研究。

综上所述,可以认为,延边朝鲜语的元音体系确实对首尔方言元音的感知造成了影响。然而,延边朝鲜语与首尔方言在元音体系上的差异不仅限于上述所讨论的内容。为了更具体详尽地描述元音体系差异对感知的影响,今后需要将听辨实验扩展至所有单元音。

3. 结论

本研究利用声学语音学的方法,通过听辨实验,考察了延边朝鲜语使用者对首尔方言元音/o/与/u/的感知样态,得出了如下结论:

无论性别,延边朝鲜语使用者均以相当高的比例将首尔方言的元音/o/误认作/u/,将元音/u/误认作/o/。换言之,延边朝鲜语使用者在准确听辨首尔方言使用者发音的元音/o/与/u/方面存在困难。这一现象可视为源于延边朝鲜语与首尔方言在元音体系上的差异。

然而,本研究作为对先行研究所遗留课题的试探性探索,仍然存在一些未解问题:

首先,本研究所采集的受试者虽然确实能代表延边朝鲜语使用者群体,但人数有限,考虑到个体差异,尚难以全面反映延边朝鲜语整体的感知样态。因此,今后有必要扩大受试者规模,收集更多数据,并进行精密的统计分析,以更加明确延边朝鲜语使用者对首尔方言元音感知的实际情况。

其次,本研究的受试对象仅限于年轻一代,尚缺乏对老年群体的考察。因此,未来还需补充对老年受试者的听辨实验,揭示世代间的差异。

此外,本研究仅以元音/o/与/u/为对象进行听辨实验,但实际上,延边朝鲜语与首尔方言在其他元音上亦存在差异。因此,有必要将听辨实验范围扩大至所有单元音。

最后,延边朝鲜语使用者对首尔方言元音的误认现象,也提示了首尔方言使用者在感知延边朝鲜语元音时可能存在的问题。因此,未来也应针对首尔方言使用者进行延边朝鲜语元音的听辨实验,这亦是今后的研究课题之一。

期待未来能够逐一解决上述课题,在此结束本次讨论。

参考文献:

- [1] 변희경.서울말 /ㅛ/와 /ㅜ/를 구별하는 음향변수[J].말소리와 음성과학,2018,10(2):15-24.
- [2] Han, Jeong-Im & Kang, Hyun-Sook. Cross-generational Change of /o/ and /u/ in Seoul Korean I: Proximity in Vowel Space[J].말소리와 음성과학,2013,5(2):25-31.

- [3] Igeta, Takako, Sonu, Mee & Arai, Takayuki. Sound change of /o/ in modern Seoul Korean: Focused on relations with acoustic characteristics and perception[J]. 말소리와 음성과학, 2014, 6(3): 109-119.
- [4] 岩井亮雄. 韓国語ソウル方言単母音の変化の方向性と聴取判断の様相—/ㅜ/と/ㅗ/の合流と/ㅗ/と/ㅓ/の接近を中心に—[J]. 朝鮮学報, 2017, 242: 47-77.
- [5] 강지은, 공은정. 서울 방언 단모음의 소리 변화와 음향 단서 연구: 단일지점 포먼트와 궤적 양상[J]. 말소리와 음성과학, 2016, 8(4): 39-47.
- [6] Kang, Hyun-Sook & Han, Jeong-Im. Cross-generational Change of /o/ and /u/ in Seoul Korean II: Spectral Interactions in Normalized Vowel Space[J]. 말소리와 음성과학, 2013, 5(2): 33-41.
- [7] 김광수. 해방 전 중국에서 조선어의 변화 발전 연구[M]. 서울: 도서출판 역락, 2009.
- [8] 김현기. /ㅏ/의 음성 실현과 그 조건[J]. 국어학, 2008, 52: 3-25.
- [9] 김현기. 연변 조선족 방언 음성의 실험적 연구[J]. 말소리와 음성과학, 2009, 1(1): 47-52.
- [10] 河須崎英之. 中国で話されている朝鮮語のアクセント比較[J]. 東京大学言語学論集, 2010, 29: 103-138.
- [11] 許秦. 中国延辺朝鮮語の非前舌母音 /ㅏ, ㅓ, ㅓ, ㅓ/ に対する実験音声学的研究試論[J]. 朝鮮学報, 2021, 258: 1-54.
- [12] 許秦. 実験音声学による中国延辺朝鮮語の母音体系の研究[J]. 東京大学言語学論集, 2022, 44: 313-329.
- [13] 許秦. 現代中国延辺朝鮮語の音響特徴に対する実験音声学的研究—若い世代の話者を中心に— [D]. 東京大学人文社会系研究科博士論文, 2023.
- [14] 신우봉. 한국어 /ㅏ/의 음성 실현 양상 연구 - 서울 코퍼스를 중심으로 - [J]. 겨레어문학, 2018, 60: 233-258.

A study on the perception aspects of Yanbian Korean speakers regarding the vowels /ɔ/ and /o/ in the Seoul dialect based on the listening experiment

Qin, Xu¹

¹Researcher, The University of Tokyo, Tokyo, Japan

Abstract: This study investigates the perceptual patterns of Korean speakers currently residing in the Yanbian Korean Autonomous Prefecture, China, through a listening experiment designed to examine how speakers of the Seoul dialect perceive the vowels /ɔ/ and /o/. Previous research has shown that the degree of openness of the vowels /ɔ/ and /o/ in Yanbian Korean and the Seoul dialect is inversely related. In other words, acoustic differences exist in the phonetic realizations of /ɔ/ and /o/ between Yanbian Korean and the Seoul dialect. These phonetic discrepancies may lead to perceptual errors when speakers of Yanbian Korean and the Seoul dialect listen to each other's vowels. To investigate this, a perception experiment was conducted with young speakers of Yanbian Korean residing in the Yanbian Korean Autonomous Prefecture. The study examined how these speakers perceive the vowels /ɔ/ and /o/ as produced by Seoul dialect speakers. The results indicate that, regardless of gender, Yanbian Korean speakers frequently perceived the Seoul dialect vowel /ɔ/ as /o/, and /o/ as /u/, at a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rate. This suggests that Yanbian Korean speakers experience difficulty in accurately perceiving the vowels /ɔ/ and /o/ as spoken in the Seoul dialect. This phenomenon can be attributed to systematic differences in the vowel systems of Yanbian Korean and the Seoul dialect.

Keywords: Yabian Korean, Seoul dialect, Vowel /ɔ/, Vowel /o/, Listening experiment

时空视域下城市流动摊贩治理探索与启示

沈洋冬¹ 黄高琴¹ 林选妙²

(¹ 云南师范大学, 云南 昆明 650000, ² 桂林旅游学院, 广西 桂林 541000)

摘要: 城市流动摊贩议题长期存在学术争议, 以往对流动摊贩的讨论主要聚焦于摊贩本身, 对摊贩所争夺的城市空间和时间缺乏关注, 导致治理效果有限。基于时空视域, 系统梳理了现有关于城市流动摊贩的文献, 并结合现今城市流动摊贩治理困境, 提出城市流动摊贩的时空治理建议。包括不同尺度空间下和不同性质空间中的摊贩空间治理, 分时分区治理和重视不同时段的经济效能, 促进夜间经济发展的摊贩时间治理。

关键词: 城市流动摊贩; 研究进展; 政策启示

基金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土空间视野下纵向岭谷区村落人居环境优化的空间肌理与方法”(52168012); 云南师范大学研究生科研创新基金一般项目“空间社会学视野下城市流动摊贩昼夜分异与空间机制研究”(YJSJJ23-B101)

DOI: doi.org/10.70693/rwsk.v1i5.957

在全球经济增长放缓的趋势下, 低就业率是各国政府亟待解决的问题之一。正规经济部门虽具有吸纳劳动力数量多、盈利高和纳税能力强等优势, 但其准入门槛高, 难以为失业者提供即时的收入来源^[1]。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研究表明非正规经济在保障就业、缓解社会压力等方面具有重要作用。以摆摊为代表的非正规就业是提高就业率的有效途径, 在部分发展中国家甚至是乡村人口融入城市的必经“跳板”^[2]。但因流动摊贩游离于政府监管之外, 往往会引起交通拥堵、环境污染和噪音扰民等城市运行失序问题^[3]。因此, 若想利用流动摊贩发展经济, 了解流动摊贩负效应和治理难题产生的根源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

现行治理模式和研究中普遍关注摊贩所引起的负效应本身和相应的治理手段^[4], 却忽略了流动摊贩空间属性, 造成“一管就死, 一放就乱”的摊贩治理困境^[5]。摊贩问题的本质在于多元主体对城市公共空间的抢占与博弈, 是城市空间中生存权与发展权的深层次矛盾, 体现了摊贩群体生存需求与城市管理诉求的空间权属竞争^[6]。因此, 本研究紧密围绕流动摊贩研究的时空视角, 在系统性阅读的基础上全面回顾既有的流动摊贩时空研究, 从中吸取摊贩治理的经验与启示。以期为进一步的案例研究提供切实可靠的理论指引。

空间视域下的城市流动摊贩研究

(一) 流动摊贩空间分布规律

1. 城市流动摊贩宏观分布规律。流动摊贩宏观空间分布规律对于优化城市规划和摊贩空间治理具有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城市管理体系对流动摊贩空间排斥程度的强弱, 会直接影响其宏观分布格局。具体而言, 在“强排斥性”的城市规划体系中的城市, 摊贩分布密度自城心向外随管制力度下降而上升, 环绕分布在城市边缘^[7]。而在“弱排斥性”的城市, 流动摊贩则表现为“边缘和中心集聚”^[8]、“多核集聚”等宏观分布格局^[9], 在道路较窄的老城区流动摊贩则呈现“多而疏”的格局^[10]。此外, 流动摊贩可能会沿出城通道由城心向城郊逐渐集聚, 呈扇形分布^[11]。

2. 城市流动摊贩中小尺度分布规律。居民社区、街道和大学城等区域的流动摊贩被广泛讨论。北京案例利

作者简介: 沈洋冬(1997—), 男, 硕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为城市地理与非正规经济;

黄高琴(1998—), 女, 硕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为城市流动性。

通信作者: 林选妙(1989—), 男, 助理研究员, 研究方向为智慧旅游与旅游信息化。

用多源数据和数理分析,发现流动摊贩的集聚具有规模上限,300m是摊贩集聚最大直径,提出“建立长期定点、临时弹性等多种类型的摊贩疏导区”的策略。并进一步总结出城市建成环境会让摊贩的分布与选址在局部违反“市场优先”原则,形成差异化的摊贩区位选址模式^[11]。多案例基于地域性对此做了研究外延:重庆案例从整体、聚集区、个体三个层面分析城市街巷摊贩的时空分布特征,表明山地城市流动摊贩具有特殊的时空特性,由于山地城市地势起伏较大,城市公共空间被切割,形成大量碎片化空间,进而塑造了流动摊贩在街道尺度下总体集聚而个体分散的独特行为模式^[12]。长沙案例对岳麓山大学城周边的流动摊贩的人群构成、经营活动的时间特征和空间分布特征进行分析,证实依附于大学城的流动摊贩具有相对稳定的聚集特征^[2]。

(二) 空间性质对流动摊贩的影响

1. 空间性质差异对流动摊贩经营策略的影响。不同空间类型通过物理约束与制度规训双重机制,塑造差异化的摊贩经营策略。具体而言,依附于农贸市场的摊贩,以地摊为主要形式,流动性差且空间占用面积较小^[13]。露天市场的摊贩占用面积大,产品结构更多元,其性质更像是交易市场本身,而非对正规市场的补充^[14]。相比之下,街道内的流动摊贩以轮式载具为主,部分甚至是小型货车,通过高机动性和高流动性实施动态游击经营,来规避管制和寻找消费者^[5]。或是通过在道路尽头或迂回处摆摊,减少对城市交通的影响,以取得社区居民的非正式认可^[15]。

2. 空间性质差异与流动摊贩依附空间选择的影响。部分摊贩与正规商户形成的特殊空间共栖,有研究发现部分摊贩会通过租用或借用正规商铺门前“灰空间”的方式实现半固定经营^[1]。例如南京案例的163个样本中,51%的流动摊商位于商业服务业用地周边,36%的流动摊商位于居住用地周边,而其他类型用地周边的流动摊贩数量相对较少^[6]。这种“共栖”不仅可以帮助正规商家获取额外租金收入,也能与摊贩形成局部“集聚效应”以提高商品销售速率,前提是摊贩与正规商铺不形成产品或时间上的竞争关系。但这种“共栖”并非普遍现象,更多的是正规商户对流动摊贩的排斥。例如,苏州案例发现流动摊贩与购物类商业设施密度呈负相关关系,64%的流动摊贩会选择在正规商户歇业后设摊经营,并自觉维护商户门面的整洁和卫生^[1]。除此之外,有研究表明出于安全的心理考量,流动摊贩在摆卖时通常会选择背部有遮挡且面向人群的空间,因此摊贩对背靠墙壁、花坛和公交站牌等遮挡物且面向人行流向的区位具有强烈偏好^[16]。

二、流动摊贩的时序变化研究

摊贩作为劳动者,其休息需求是不可或缺的基本要素,全天候经营者只是特例。摊贩对经营时段的选择,是基于个体条件和市场环境考量后采取的差异化生计策略^[17]。因此,流动摊贩的时序变化模式及其背后动因应是深入研究的重点之一。

(一) 摊贩时序变化研究

既有研究受限于流动摊贩时空数据的可获性约束,多聚焦于微观尺度的实证分析,尤以城市街区^[18]、大学城^[19]等典型空间单元为重点。案例比较分析表明,流动摊贩展现出显著的时空适应性策略:在消费群体特征差异驱动下,其经营活动呈现出规律性的时间弹性特征。

多案例研究表明,城市街区场景中,摊贩时空分布呈现典型双峰波动模式,峰值时段分别对应午间(11:00—13:00)服务通勤群体与晚间(18:00前后)满足休闲消费需求^[18];而在大学城空间单元内,则显现早间(6:00—9:00)餐饮供给、午间(11:00—13:00)快速服务及晚间(17:00—23:00)餐饮供给与文化消费的三峰分异特征^[19]。这种差异化的时空行为模式,深刻揭示了流动摊贩与在地社会时空结构之间的动态耦合机制,为理解非正规经济空间实践的时间维度异质性提供了重要实证依据^[20]。

(二) 不同时段摊贩研究

1. 对早间流动摊贩的研究。多案例表明,由于早间摊贩经营时间较早,他们倾向于通过非正式租赁协议取得正规商户门前的短暂使用权,从而在经营时间和空间上与正规商户形成错位经营^[6]。由于缺乏合法的自由摆卖依据,部分早市摊贩选择在城市管理者的非工作时段内占据“城市缝隙”区域^[13],以此规避政府监管。具体而言,

早市摊贩的工作时间集中在凌晨 2:00 至上午 10:00, 由于高强度劳动, 通常没有额外的精力从事兼职工作, 流动性较低, 对城市秩序扰动较小。郝辰杰等以经营时间开始较晚的南京早间街头摊贩为研究对象, 发现相较于早市摊贩, 为尽可能接近消费者, 其更偏好于在交通节点、次干道等区域集聚, 且工作时间更长, 在结束早间时段的经营后往往会转移至下一个地点摆卖, 因而流动性更强, 对城市运行秩序扰动更大^[21]。

2. 对日间流动摊贩的研究。主要聚焦于管制、市场和旅游等因素对日间流动摊贩的潜在影响。广州案例发现, 为找寻“合适的消费者”并规避城管工作时段更为严格的管制, 日间流动摊贩展现出了极高的流动性^[20]。印度案例表明, 在炎热的气候环境下, 街头摊贩在遵循市场指向的前提下, 倾向于选择靠近开放绿地的区域经营, 以创造更为舒适的微气候购物环境, 其摆卖位置会随绿荫的变动而转移^[21]。苏州案例表明, 由于历史遗存和旅游设施的分布, 日间摊贩的活动范围较大, 并具有明显的“游击”特征, 即随景区人流量的减少, 摊贩会向人流量高的景区转移^[1]。

3. 对夜间摊贩的研究。主要涉及夜间摊贩形成的“烟火气”、对城市活力的强化和夜间摊贩的治理困境等方面。场景理论认为, 显场景、前场景和潜场景共同构成了城市夜间经济的“烟火场景”^[23]。夜间摊贩的发展始终随城市更新和发展保持同步, 城市现代化程度越高, 城市居民对夜间经济的需求就越迫切, 对城市夜间流动摊贩形成的“烟火气”呼声越高, 夜市的社会性和情感性体验价值则越为突出^[24]。例如, 魏淑媛等从“生存韧性”的角度解析了夜间流动摊贩在建构生存机会空间过程中对城市活力提升的间接影响^[25]。谢金丰等认为夜市治理的核心要素在于刚性与弹性管制的有机结合。政府应负责刚性的管控底线, 如夜市经营不影响城市的正常运转, 不出现食品安全问题等。而弹性的管控部分, 也是非正规经济的特色优势, 则应在政府监管下, 由多元主体通过协调自主决策^[26]。黄耿志等借助生命周期理论, 发现夜间流动摊贩疏导区的疏导效果具有“夭折-衰落-存续-升级”的特征, 认为政府管制刚性和资本参与程度是影响疏导区类型演变的关键所在。资本参与程度过高会导致疏导区产生“绅士化”, 排斥原始进入摊贩, 政府管制刚性过强会使致疏导区失活进而衰落^[27]。

三、对城市流动摊贩治理的启示

基于以上学者的研究和城市流动摊贩实际摆卖中产生的负效应, 本文建议从空间和时间两个维度切入, 以构建更为完整和系统的分析框架, 进而完善地摊经济时空治理的差异化理论模型, 精细化治理城市流动摊贩。

(一) 空间视域研究对摊贩治理的启示

1. 对城市宏观尺度下流动摊贩空间治理的启示。应充分尊重市场需求, 根据城市不同区域人群对流动摊贩的物资供给功能的需求大小, 结合城市基础设施状况, 在城市不同区域设置相应数量的摊贩疏导区。例如通过对城市人口分布和农贸市场、超市等基础设施在不同区域的分布和供给能力的评估, 判断城市不同区域对流动摊贩需求的紧迫性, 以减轻“中心集聚”或是“局部或边缘集聚”等摊贩极核分布模式对城市运行秩序造成的压力, 促进摊贩分布的“均等化”。

2. 对城市中微观尺度下流动摊贩空间治理的启示。现有研究表明, 流动摊贩在中微观尺度空间中的集聚具有规模上限, 摊贩在该类空间中具有小规模、多群组的集聚模式。因此, 在中微观尺度空间中摊贩的治理应立足摊贩的空间利用特征, 充分利用“碎片化”空间, 疏导摊贩。既能提升街巷空间中的空间利用率, 又能增加街道活力。

3. 对城市不同性质空间中流动摊贩空间治理的启示。应全面识别和评估流动摊贩偏好的空间类型, 根据流动摊贩偏好集聚的空间类型和居民需求, 设置差异化的摊贩疏导区。例如居住区居民既需要摊贩提供的便利的消费机会, 又厌恶摊贩产生噪音和环境污染。因此居住区内的摊贩治理和疏导区设置应以保证居民的日常正常生活秩序为前提, 充分利用原有低效利用空间设置疏导区。既能提高空间效率, 又能降低摊贩对居民生活的干扰。对街道中正规商户密集的区域, 应充分尊重正规商户的需求, 禁止摊贩侵占正规商户的交通流线。同时, 正视摊贩与正规商户产生的“集聚效应”, 充分利用正规商户门前店后的“灰空间”疏导流动摊贩, 实现二者的“帕累托改进”。

(二) 时间视域研究对摊贩治理的启示

1. 分时分区治理。文献综述已经表明不同时段流动摊贩其活动模式和偏好空间有所差异。这点也被学界

所注意到,然而目前的分时治理策略往往仅关注早晚高峰时段摊贩引发的交通拥堵问题,导致大部分区域被划为禁止摆摊区,从而抑制了摊贩的活力。因此,建议在划定流动摊贩疏导区时,应在保障城市有序运行的基础上,综合考虑城市流动摊贩的昼夜分布特征和选址偏好,并兼顾不同时间段的摊贩活动,划定潮汐式疏导区,即在特定时段允许摊贩在某些区域经营。例如,在不影响城市运行的前提下,可以在路口、道路辅路等区域设置潮汐式疏导区,在高峰时段禁止摊贩进入,而在车流量较低的时段允许其经营。这种策略不仅能够有效降低流动摊贩带来的负面影响,还能保持其活力,同时提升城市的包容性和灵活性。

2. 重视不同时段的经济效能,促进夜间经济发展。传统研究认为市场经济在日间的运行效率高于夜间,因此政府部门更注重日间正规经济的运行秩序,对夜间经济的重要性存在一定的忽略和轻视。但文献综述表明,相比于日间摊贩,夜间摊贩对城市活力的提升作用更加明显,并在形成商业氛围和文旅吸引力等方面具有独特作用。因此有必要对夜间摊贩更加“包容”,针对夜间摊贩出台专门性的治理举措,在“放活”与“管好”之间找到平衡,以促进“夜间经济”发展。例如,结合地方特色开发文旅项目打造主题夜市,如保靖县“迁陵记忆”网红街、北京“夜京城”特色消费地标等。坚持柔性治理,创新夜间摊贩管理方式,如颍州区采用“721 工作法”(70%服务、20%管理、10%执法),以劝导代替处罚。

参考文献:

- [1] 胡莹,沈锦焘.苏州城市流动摊贩空间分布机制及其空间治理策略[J].规划师,2023,39(09):131-137.
- [2] 周晓穗,吴晓.流动摊贩的时空分布特征研究——兼议流动摊贩包容性治理策略[J].现代城市研究,2020,(01):89-96.
- [3] HUANG G, XUE D, LI Z. From Revanchism to Ambivalence: The Changing Politics of Street Vending in Guangzhou [J]. Antipode, 2014, 46(1): 170-189.
- [4] 温演驰,杨倩,石丽丽.北上广深以法治保障流动摊贩设摊经营的探索及启示[J].宁波经济(三江论坛),2024,(10):44-48.
- [5] 黄耿志,薛德升.非正规经济的正规化:广州城市摊贩空间治理模式与效应[J].城市发展研究,2015,22(03):51-57.
- [6] 兰文龙,郝辰杰,姜莹,等.南京市主城区早间流动摊商空间特征调查研究[J].现代城市研究,2021,(02):14-19.
- [7] ZHANG X, SHAO J. Evaluation of the Suitability of Street Vending Planning in Urban Public Space in the Post-COVID-19 Era [J]. Land, 2024, 13(4).
- [8] OMOEGUN A O, MACKIE P, BROWN A. The aftermath of eviction in the Nigerian informal economy [J].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Planning Review, 2019, 41(1): 107-128.
- [9] 刘昱辰,陈晓纯,刘轶伦,等.基于街景影像和深度学习技术的城市流动商贩空间分布制图[J].热带地理,2023,43(06):1098-1110.
- [10] 戴若颖,党雪薇,冯兆,等.基于随机森林的流动摊贩分布模型[J].中山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18,57(01):76-82.
- [11] 张延吉,张磊,吴纳维.城市建成环境对流动商贩空间分布的影响——兼议摊贩疏导区的规划选址[J].人文地理,2017,32(05):76-82.
- [12] 景晓婷.包容性视角下山地城市社区街巷摊贩时空特征与优化研究[D].重庆:重庆大学,2021.
- [13] LI J, REN L, HU T, et al. A city's "urban crack" at 4 a.m.: A case study of morning market vendors in Beijing's Longfu Temple area [J]. Habitat International, 2018, 71: 14-21.
- [14] LEMESSA S D, WATABAJI M D, YISMAW M A, et al. Evening street vending and the tragic living conditions of vendors: The case of eastern Ethiopia region [J]. Cities, 2021, 108.
- [15] LIU Y, LIU Y. Detecting the city-scale spatial pattern of the urban informal sector by using the street view images: A street vendor massive investigation case [J]. Cities, 2022, 131: 103959.
- [16] 庞宇琦,薛德升,王德.流动商贩的分布特征及营业空间界面影响分析——以广州中山大道西路段为例[J].人文地理,2012,27(02):56-61.

- [17] RECCHI S. Informal street vending: a comparative literature review [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ociology and Social Policy*, 2020, 41(7/8): 805-25.
- [18] 黄瓴,景晓婷.空间治理视角下山地城市社区街巷摊贩时空分布与空间优化研究——以重庆市七星岗街道为例[J].*城市发展研究*, 2021, 28(05): 102-110.
- [19] 黄幸,阮佳玲,吴婷婷.日常生活实践视角下高校周边公共空间生产过程与机制——以广州五山为例[J].*城市发展研究*, 2024, 31(03): 24-31+47.
- [20] 黄耿志.城市摊贩的社会经济根源与空间政治[M].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5.
- [21] 郝辰杰.非正规视野下大城市早间商摊问题及规划策略[D].南京: 东南大学, 2015.
- [22] BASU S, NAGENDRA H. The street as workspace: Assessing street vendors' rights to trees in Hyderabad, India [J]. *Landscape and Urban Planning*, 2020, 199.
- [23] 李康化,刘启航.何以最抚凡人心? ——城市“烟火气”场景的要素、价值与治理[J].*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 2023, (12): 20-37.
- [24] 刘向前,梁留科,元媛,等.大数据时代美食夜市游憩者满意度双视角研究[J].*美食研究*, 2018, 35(02): 24-31.
- [25] 魏淑媛,王春光.城市非正式就业者的生存韧性与会空间建构[J].*城市发展研究*, 2020, 27(10): 41-46.
- [26] 谢金丰,涂文颖,陈宇琳.非正规经济视角下的夜市治理机制与策略——以杭州为例[J].*现代城市研究*, 2023, (09): 59-65.
- [27] 黄耿志,袁雪松,李晴,等.大城市流动摊贩疏导区的演变类型与机制研究——以广州为例[J].*城市发展研究*, 2023, 30(02): 110-117.

The Research Progress of Urban Mobile Vendors at Home and Abroa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pace and Time

Shen Yangdong ¹, Huang Gaoqin ¹, Lin Xuanmiao ^{3*}

¹ Yunnan Normal University, Kunming, China

² Guilin Tourism University, Guilin, China

Abstract: The issue of urban mobile vendors has long been the subject of academic controversy. Through a systematic literature review, this paper finds that the academic perception has undergone a shift from negative criticism to value reconstruction: in the early stage, it focused on the inefficiency of vendors and the contradiction with urban management, and in recent years, it has gradually paid attention to their social value in dimensions such as employment absorption, cultural continuation, and food diversity. The spatial perspective study has formed an analytical framework of "macro-distribution law - spatial attribute influence", but there are three limitations: insufficient comparison of lateral spatial types, lack of cases in small and medium-sized cities, and weak research on the correlation of tourism space. The existing achievements of the temporal research mostly focus on the characteristics of vendors in a single period of time, although breakthroughs have been made in the exploration of the temporal regularity of a small-scale and single spatial type, the research on the macro-urban scale is lacking, and there is a lack of temporal dynamic comparison across spatial types. Overall, this field urgently needs to expand the correlation analysis of multiple spatial types and strengthen the research on the temporal evolution of the urban scale to deepen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spatio-temporal laws of vendors.

Keywords: City; Mobile Vendors; Research Progress; Research Review

学习任务群视域下高中语文古诗文教学的困境与策略探究

刘涵¹

(1.中央民族大学, 北京 100074)

摘要:在教育改革持续推进的背景下,高中语文古诗文教学面临新的挑战与机遇。本研究发现传统古诗文教学模式受应试影响,存在教学方法单一、学生兴趣低、资源整合不足等问题,而语文学习任务群的出现从四个方面为其提供了解决问题的新路径。第一,设计丰富的学习任务促进学生能力提升;第二,创设真实且充满“语文味”的情境营造学习氛围;第三,有效整合资源帮助学生构建全面知识体系;第四,建构多元评价体系全面科学地认识学生。这些策略能有效应对教学困境,提升学生语文核心素养,并为未来深化教学改革指明了方向。

关键词:高中语文; 学习任务群; 古诗文教学; 现实困境; 创新策略

DOI: doi.org/10.70693/rwsk.v1i5.967

一、引言

为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2023年5月,教育部办公厅公布《基础教育课程教学改革深化行动方案》,^[1]在教育改革持续深化的当下,高中语文教学正经历深刻变革,其中古诗文教学因肩负文化传承与素养培育使命,成为关键焦点。目前,高中语文古诗文教学面临着新的机遇与挑战,而学习任务群作为新事态下语文教学的关键方法,将其引入高中语文古诗文教学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与深远的教育价值。

二、高中语文学习任务群与古诗文教学的理论阐释

(一) 语文学习任务群的内涵与特征

《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2017年版2020年修订)》明确指出:“从祖国语文的特点和高中生学习语文的规律出发,以语文学科核心素养为纲,以学生的语文实践为主线,设计‘语文学习任务群’。‘语文学习任务群’以任务为导向,以学习项目为载体,整合学习情境、学习内容、学习方法和学习资源,引导学生在运用语言的过程中提升语文素养。”^[2]但文件中并未单独设置“古诗文阅读”的学习任务群,而是以附录的形式呈现了推荐背诵篇目,相关古诗文教学要求分散出现在其他任务群中。因此,从学习任务群视角下探究古诗文教学的工作亟待开展,来为实际教学提供科学的教学指导。

根据其定义,语文学习任务群有五个鲜明的特征。第一,它以任务为导向,打破传统语文教学按篇章逐段讲解的单向线性模式,将学习内容转化为具体、连贯且富有挑战性的任务群,促使学生主动探究;第二,强调整合性,它跨越语文篇目单一知识范畴,强调融合各种资源与内容,以求全方位解读篇目的内涵;第三,注重自主性,它鼓励学生依据自身兴趣与能力自主选择学习的内容与方式,充分发挥学生主观能动性,构建个性化知识体系;第四,突出实践性,它强调让学生在听说读写、观察思考等真实语文实践活动中学习运用语文,提升学生的实际运用能力;第五,具有情境性,学习任务群的情境必须是课堂内容涉及到的“大情境”,即贯彻课堂学习内容的情境,同时还要充满“语文味”,^[3]将学生带入特定氛围,使其如临其境感受课文的魅力与价值。

作者简介:刘涵(2002—),女,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学科教学、教师发展与学生培养。

（二）古诗文教学在高中语文教育中的地位与价值

古诗文作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瑰宝，可以写景状物，可以言志抒情，在高中语文教育中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具有不可估量的价值。

第一，从文化遗产的角度看，古诗文是中华五千年文明的结晶，承载着丰富的历史、哲学、宗教、艺术等信息。它们是史书的另一种表达形式，记录着朝代的更迭、社会的变迁，从《诗经》中的“国风”反映先秦时期各地的民俗风情，到杜甫诗展现唐朝由盛转衰的社会画卷。同时，古人深邃的哲学思想镌刻在诗文之中，蕴含着强大的精神力量，能为学生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奠定基础。如《论语》传递儒家的仁爱、礼义观念，《庄子》表达道家的逍遥、齐物思想，为学生打开智慧之门，使其领略古人对宇宙、人生的深度思考。

第二，从美育角度而言，古诗文独具魅力。首先，直观感受诗韵律和谐悦耳，平仄相间、押韵严谨，读来朗朗上口，吟诵间学生体悟到汉语的音乐之美，提升审美鉴赏力与创造力，滋养心灵，塑造高雅审美情趣。其次，古诗文意象丰富多彩，明月寄托相思，松柏象征坚毅，甚至一个意象表达多种情感或品质。诸多意象营造出或雄浑壮阔、或婉约凄美、或清幽空灵的意境，让学生沉浸其中感受古典美学韵味。最后，古诗文语言凝练优美，炼字炼句独具匠心，为学生提供炼字写作的极佳素材。

第三，古诗文是提升语文素养的绝佳素材。在语言建构上，学生通过学习古汉语词汇、语法、句式，夯实语言基础，精准理解词句含义，提升文言文阅读与表达能力。在思维发展上，古诗文用词精准凝练促使学生深入揣摩、思索、挖掘其深意，解读诗歌比兴手法、散文的微言大义等，锻炼逻辑思维与形象思维。在文化遗产与理解上，学生浸润在古诗文承载的多元文化中，感受地域、民俗、价值观念差异，能够拓宽文化视野，增强文化自信，成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践行者与传播者。

（三）学习任务群与古诗文教学的契合点

学习任务群与古诗文教学在多个维度紧密契合，学习任务群为高中古诗文教学设计与实践提供基础和指导，为其注入新活力，开启新篇章。

第一，从教学目标层面看，学习任务群旨在培养学生语言建构与运用、思维发展与提升、审美鉴赏与创造、文化遗产与理解的核心素养，古诗文教学则可以依托学习任务群全面提高学生的语文核心素养。实施任务群教学时，教师应依据“创设阅读情境”的要求，设计能够激发学生情感体验的问题或任务，^[4]同时注意学习任务的阶梯性来锻炼其能力。^[5]

第二，从教学内容层面看，学习任务群强调整合，能够打破知识碎片化弊端，而古诗文恰是多元知识的集合体，能通过一系列学习任务让学生深入理解诗文价值。一首古诗，既是文学佳作，又关联创作时代的历史状况、哲学思潮、社会百态。学习任务群促使教师将古诗文置于大文化背景，如研习唐诗，教师可以结合唐朝政治兴衰、科举制度、对外交流，全方位剖析诗作内涵，让学生领略文学与历史、哲学等交织的魅力，拓宽知识视野。

第三，从教学方法层面看，学习任务群倡导的任务驱动、情境创设、自主合作探究等，与古诗文教学需求契合。古诗文本身距今久远，学生理解难度较大，教师在实际教学中势必需要采取新颖的任务驱动学生兴趣，创设易于理解的情境引领学生赏析诗文内在思想，以更具创新性的探究环节帮助学生在完成任务中感受文人风雅与古诗文的魅力，改变传统被动学习，激发自身学习热情。

三、当前高中古诗文教学的困境剖析

（一）教学方法传统且单一

在当下高中古诗文教学中，传统单一的讲授法仍占据主导地位，“教”“研”不结合或者结合不好。^[6]许多教师在课堂上侧重于字词的精确释义、句式的详细剖析以及文意的逐句疏通，将古诗文拆分为零散的语言知识点进行灌输。在文言文教学方面，教师执着于逐句翻译，从字词落实到句子通顺，学生忙于记录译文，课堂成了教师的“一言堂”，学生只是被动接受知识的容器，缺乏主动思考、自主探究的空间，对古诗文的学习沦为机械记忆，难以真正触及古诗文的深层内涵与文化精髓，而无法领略其文学魅力，则更谈不上培养语文核心素养。

（二）学生缺乏学习兴趣，积极性低

受时代隔阂与教学方式的双重影响，高中学生对古诗文学习普遍兴致不高。一方面，古诗文创作年代久远，其语言表达、文化背景、生活情境与现代社会相距甚远，学生理解起来存在较大障碍。^[7]《诗经》中的诗篇，用词古朴、比兴含蓄，让习惯现代直白语言的学生常觉得晦涩难懂，心生畏惧；另一方面，枯燥的教学方法加剧了学生兴趣的流失。课堂上单调的字词讲解、生硬的背诵要求，使古诗文学习沦为枯燥的任务，学生难以从中获得乐趣。为应对考试的古诗文默写题目，学生需反复机械记忆，耗费大量精力，却未能培养起鉴赏的能力，也无力深入体会诗词的美感与韵味。^[8]学生的学习积极性被严重挫伤，在课堂上表现为被动参与、注意力不集中等问题，甚至对古诗文学习产生抵触情绪，不利于开展教学活动和达成学习目标。

（三）教材资源整合不足，关联性较差

现行高中语文教材中的古诗文编排虽有一定系统性，但仍存在可优化空间。教材在知识点分布上较为零散，各篇古诗文之间的关联性挖掘不够深入，教师多按教材顺序逐篇讲授，未能有效引导学生构建知识网络。举例而言，在古诗词单元，不同诗人的作品虽有主题分类，但对于同一流派诗人风格的传承与演变、不同流派之间的对比融合等内容，教材缺乏明确提示，教师也未充分整合拓展，学生难以形成系统认知。同时，教材对课外相关资源的拓展指引不足，缺乏对同时代散文家、诗人群体、各文体发展脉络等背景资料的联系与拓展，学生阅读视野受限，无法从更广阔的文化语境中理解古诗文，难以深入探究其文学价值与历史意义，制约了语文综合素养的提升。

四、学习任务群视域下高中古诗文教学的创新策略

（一）任务驱动：设计多样化学习任务

在学习任务群视域下，任务驱动是一种极为有效的教学策略。学习任务是课程内容落实到课堂的中心环节，“‘语文学习任务群’以促进‘自主、合作、探究’学习方式为主要目的，凸显学生学习语文的根本途径。”^[9]它以明确的学习任务为导向，将复杂的古诗文学习内容拆解为一个具体、可操作的任务，使学生在完成任务的过程中主动探索知识，而不是被动接受灌输。这种方式能够充分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锻炼他们的自主学习、合作以及解决问题的能力。

在基于文本解读的任务设计方面，教师要引导学生“在用中学”，深入推敲文本具体语句与意象，通过一个个具体的任务环节促使学生结合语境推测词义、品味语言、总结规律，进而推动古诗文学习方法的变革。以部编版教材中苏轼的《赤壁赋》为例，在预习阶段，教师可布置个人任务让学生查阅苏轼被贬黄州的经历及当时的文化背景，理解其创作心境。课堂上，教师围绕文中主客问答的形式，设计问题链环环相扣来引导学生带着问题思考，如“客之悲从何而来”“苏子之乐又体现了怎样的人生态度”等，组织学生分组讨论，探究作者复杂的情感变化与人生哲理。

（二）情境创设：营造沉浸式学习氛围

“语文学习任务群”强调培养学生“在真实情境中解决问题”的能力，^[10]其情境创设的效果是衡量学习任务设计优劣的重要指标。情境创设是一种将抽象的知识与具体情境相结合的教学方法。通过创设与古诗文相关的情境，能够使学生更直观地感受作品所描绘的场景、情感和文化背景，从而降低理解难度，增强学习的趣味性和吸引力。这种沉浸式的学习氛围有助于学生更好地融入古诗文的世界，提升对作品的感悟和理解能力。

历史情境还原是营造沉浸式学习的有效方式。例如在教授部编版教材《烛之武退秦师》时，教师可展示春秋时期的政治格局地图，讲解秦、晋、郑三国之间的利益纠葛与外交形势，并在课堂中引导学生模拟历史场景，演绎烛之武与秦伯的对话，体会烛之武的智慧与语言艺术，让学生深刻理解故事背后的历史意义。

此外，教师还要引入真实的富有“语文味”的情境，让学生调动生活经验，从自身经验出发，切身感悟古诗文的情感。教师可引导学生联系自身的情感与经历，结合教材中诗文细细体悟与共情，布置任务或作业让学生以亲身经历为素材创作简短的古诗或古文，努力挖掘出古诗文的生活价值，使学生在贴近生活的情境中，增强对古诗

文情感的共鸣。

（三）资源整合：构建全方位学习支持体系

资源整合强调对各类学习资源的优化组合和有效利用，旨在为学生提供更加丰富、多元的学习支持。教材资源是基础，是实现国家意志的媒介，教师要以教材为根本，解读教材，重构教学内容，但仅依靠教材远远不够。教师还需要通过整合教材内外的资源，如拓展阅读，帮助学生从多个角度理解古诗文，构建更加全面、深入的知识体系，提升文学鉴赏能力和文化素养。^[11]

第一，对于教材资源深度挖掘，教师要打破单篇教学的局限，从“单篇到群文到整本书”，注重知识的系统性与关联性。^[12]以部编版高中语文教材中的古诗词单元为例，在学习古代田园诗时，可以将陶渊明、孟浩然、王维等田园诗人的作品进行整合，对比分析他们诗作中田园意象的运用、对田园生活描绘的侧重点以及表达情感的异同。陶渊明的《归园田居》表达了对官场的厌弃与对田园生活的热爱，王维的《山居秋暝》则在描绘田园美景中蕴含着对宁静生活的向往，教师可以通过对比引导学生从多维度构建田园诗的知识体系，提升文学鉴赏能力。

第二，拓展阅读、多媒体资源为古诗文教学增添活力。教师通过适当增补同题材、同作者或同时代的诗文，相互联系、相互对比，引导学生从多维度构建知识体系，提升文学鉴赏能力。而多媒体资源已广泛应用到实际课堂中，丰富了学生的直观感受。例如在学习部编版教材中李白的《蜀道难》时，教师通过播放展现蜀地壮丽山川的视频，让学生身临其境般直观感受蜀道的险峻，利于理解文章创作内容。

（四）多元评价：采取科学系统的评价方式

在学习任务群视域下，高中古诗文教学的评价理念需从传统的关注结果向重视过程转变。以往高中古诗文教学评价过度依赖考试成绩，主要以“成绩论英雄”，呈现出单一化、片面化弊端。^[13]而新的评价理念则聚焦于学生在完成学习任务过程中的表现，涵盖参与度、团队协作、思维发展、审美提升等多个维度。

第一，评价主体方面，应摒弃单一的教师评价主体模式，构建学生自评互评、教师评价、专家评价相结合的多元评价主体结构。^[14]教师可制定符合古诗文学习效果的评价量表作为指导，学生依据评价量表，从内容深度、逻辑结构、语言表达等多个维度，相互点评，提出修改建议。这不仅能让从他人视角审视自身不足，学习借鉴同伴长处，还能增强学生的参与感与责任感，培养批判性思维与合作精神。教师评价与专家评价则侧重于对学生学习过程的整体把控，从任务完成的质量、目标达成度、知识技能提升情况等方面给予专业指导，引导学生持续进步，促使评价成为促进学生全面发展的有力杠杆。

第二，评价内容应涵盖知识、能力、过程与情感态度价值观多个维度。在知识维度，学生对古诗文字词、句式、文学常识等基础知识的掌握情况可通过默写古诗词、解释文言实词虚词来检测。能力维度聚焦于学生古诗文鉴赏、分析、创作等能力，教师可判断学生赏析诗词意象、意境的步骤、剖析散文论证逻辑的情况明确其能力维度的提升情况。过程维度关注学生参与学习任务的积极性、团队协作、问题解决策略等，教师观察小组合作探究时学生们分工、讨论、总结过程，以学生合作过程中的表现为依据判断学生的参与情况。情感态度价值观维度则重视学生从古诗文汲取的精神滋养，所体悟到的文人高洁品格与精神以及由此引发的对自身品德修养的反思，教师可通过学生分享所学到的品格与获得的启示了解学生的情感态度，并在日常生活中观察学生是否落实，进而全面、立体地评估学生古诗文学习成效，促进学生综合素质提升。

五、结语

古诗文凝练着历代思想精华与历史文化，是高中语文学习的重要内容，也是提升学生核心素养的关键依托。学习任务群的教学要求与设计能有效改善当前古诗文教学中出现的教学方法单一、学生积极性不高以及资源整合不足问题，在语文教学中具有指导意义。未来，高中古诗文教学可通过设计多样化学习任务、营造沉浸式的学习情境、整合资源重构教学内容来激发学生学习兴趣，同时采取多元评价方法科学系统地评估学生学习效果，打破古诗文“教师教不了、学生学不会”的尴尬困境，并可尝试紧密联系古诗文学习与生活实践、社会热点，促使古老经典在现代社会焕发生机与活力，切实提升学生运用语文知识解决现实问题的能力，推动高中古诗文教学迈向更高质量、更具创新性的发展阶段。

参考文献:

- [1] 教育部. 教育部办公厅. 基础教育课程教学改革深化行动方案 [EB/OL]. (2023-05-26)[2025-01-12]. http://www.moe.gov.cn/srcsite/A26/jcj_kcjcgh/202306/t20230601_1062380.html.
- [2]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 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2017 年版 2020 年修订)[S]. 北京: 人民教育出版社, 2020.
- [3] 吴静. 在“群”参照与任务创新中实现深度学习——学习任务群背景下高中古诗词教学的设计策略[J]. 语文教学通讯·D 刊(学术刊), 2024(12):5-7.
- [4] 刘颖异. 优化情境设计内化情感体验[J]. 中学语文教学, 2022(02):68-69.
- [5] 纪顺. “文学阅读与写作”任务群视域下的古诗文教学——以陶渊明诗文专题教学为例[J]. 语文建设, 2024(11):31-35.
- [6] 代亚菲. 如何提高学生诗词鉴赏的能力[J]. 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4, 35(S2):207-208.
- [7] 张志强, 徐林祥. 统编高中语文教材古诗文编排特色及施教策略[J]. 语文建设, 2024, (03):49-53.
- [8] 王虹伟, 王金香. 高中古诗教学的现状及策略[J]. 语文教学通讯·D 刊(学术刊), 2017(06):12-15.
- [9] 王荣生. “语文学习任务”的含义——语文课程标准文本中的关键词[J]. 课程·教材·教法, 2022, 42(11):4.
- [10] 王子鹏. 基于“学习任务群”的高中语文阅读作业设计研究[D]. 重庆: 西南大学, 2021.
- [11] 蒋银坤, 张逸. 拓宽古诗文阅读教学资源的策略——以统编高中语文必修上册第三单元为例[J]. 中学语文教学, 2024(09):17-20.
- [12] 何立新. 多样态阅读教学: “学习任务群”落地纾困的有效策略[J]. 语文建设, 2024(23):32-36.
- [13] 陈传歆. 学习任务群视域下高中语文大单元教学设计[J]. 新教育, 2024(34):20-22.
- [14] 李慧. 基于学习任务群背景下的高中语文古诗词教学研究[J]. 汉字文化, 2024(16):130-132.

Research on the Dilemmas and Strategies of Ancient Poetry and Prose Teaching in Senior High School Chines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Learning Task Clusters

Liu Han¹

¹*School of Education, Minzu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China*

Abstract: Against the backdrop of ongoing educational reforms, the teaching of ancient poetry and prose in senior high school Chinese curriculum is confronted with new 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 This study reveals that the traditional teaching model of ancient poetry and prose is influenced by the examination-oriented approach, presenting problems such as monotonous methods, low student interest, and insufficient resource integration. The emergence of Learning Task Clusters offers new solutions to these issues from four aspects. Firstly, designing diverse learning tasks to enhance students' abilities; secondly, creating authentic and “Chinese-flavored” contexts to foster a learning atmosphere; thirdly, effectively integrating resources to help students build a comprehensive knowledge system; and fourthly, establishing a multi-dimensional evaluation system to comprehensively and scientifically understand students. These strategies can effectively address teaching dilemmas, enhance students' core Chinese literacy, and point the way for future deepening of teaching reforms.

Keywords: Senior high school Chinese; Learning Task Clusters; Ancient poetry and prose teaching; Realistic dilemmas; Innovative strategies

新会计准则对房地产企业财务报告合规性的影响分析

——基于收入确认与资产减值视角

高存毅¹

(重庆艺术工程职业学院, 重庆 402560)

摘要: 随着经济环境的变化与会计规范体系的完善, 新会计法的实施对企业财务报告合规性提出了更高要求。房地产行业作为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其业务的特殊性决定了受新会计法影响更为显著。深入探究新会计法在收入确认与资产减值方面的规定对房地产企业财务报告合规性的影响, 不仅有助于房地产企业准确把握政策导向, 提升财务管理水平, 也为保障市场秩序、维护利益相关者权益提供重要依据。本文基于收入确认与资产减值视角, 系统分析新会计法对房地产企业财务报告合规性的影响。从新会计法关于收入确认与资产减值的核心规定出发, 结合房地产企业业务特点, 详细阐述其在收入确认时点、金额计量、财务报告披露, 以及资产减值测试等方面的具体影响, 并针对性提出完善会计政策、加强人员培训、优化信息系统等应对策略, 旨在为房地产企业适应新会计法要求、增强财务报告合规性提供理论与实践参考。

关键词: 新会计准则; 房地产企业; 财务报告; 合规性; 收入确认; 资产减值

DOI: doi.org/10.70693/rwsk.v1i5.971

引言

房地产行业作为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 其健康稳定发展对经济增长、社会稳定具有关键作用。财务报告作为反映企业财务状况与经营成果的重要载体, 其合规性直接影响利益相关者的决策及行业的有序发展。新会计法的颁布与实施, 对企业财务会计工作提出了更高要求, 尤其在收入确认与资产减值等关键领域进行了修订与完善。房地产企业因项目开发周期长、资金投入大、收入与成本确认复杂等业务特点, 受新会计法的影响更为显著。深入研究新会计法对房地产企业财务报告合规性在收入确认与资产减值视角下的影响, 有助于房地产企业准确把握政策变化, 规范财务管理, 提高财务报告质量, 增强市场竞争力。

一、新会计法关于收入确认与资产减值的核心规定

(一) 收入确认相关规定

新会计法在收入确认方面引入了收入准则新模型, 即“五步法”模型。该模型要求企业在确认收入时, 首先识别与客户订立的合同, 明确合同中各方的权利与义务; 其次识别合同中的单项履约义务, 将合同中的各项承诺分解为独立的履约义务; 接着确定交易价格, 考虑可变对价、重大融资成分等因素对价格的影响; 然后将交易价格分摊至各单项履约义务, 按照各单项履约义务的单独售价比例进行分摊; 最后在履行了各单项履约义务时确认收入, 以控制权转移作为收入确认的关键时点, 取代了以往风险报酬转移的判断标准。这一变化使得收入确认更加注重合同实质, 强调与客户之间的交易流程和经济实质, 对企业准确判断收入确认时点和金额提出了更高要求。

(二) 资产减值相关规定

新会计法对资产减值的规定进一步强化了资产减值测试的要求和规范。企业需要在资产负债表日, 对各项资产进行减值测试, 判断资产是否存在减值迹象。当存在减值迹象时, 应当估计资产的可收回金额, 可收回金额应

作者简介: 高存毅(2004—), 男, 专业为统计与会计核算。

当根据资产的公允价值减去处置费用后的净额与资产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的现值两者之间较高者确定。若资产的可收回金额低于其账面价值,则应当计提资产减值准备,且资产减值损失一经确认,在以后会计期间不得转回(除存货等少数资产外)。这一规定有效避免了企业利用资产减值进行利润操纵,提高了财务信息的真实性和可靠性。

二、房地产企业业务特点及财务报告合规性要求

(一) 房地产企业业务特点

房地产行业的经营活动呈现显著的产业特性,其业务链条涵盖土地储备、项目开发、市场营销及售后管理等多个环节。项目开发周期通常跨越 3 - 5 年,部分大型综合开发项目甚至超过 8 年,这种长周期特性使得企业面临市场环境 with 政策变动的双重不确定性。资金投入方面,土地出让金、建筑安装成本、营销费用等构成主要支出,单项目资金投入规模常达数十亿甚至上百亿元,而资金回笼依赖于分期销售与交付,回款周期与开发周期存在明显错配。在收入与成本确认环节,预售制度导致收入确认滞后于资金流入,成本核算需跨越多个会计期间,加剧了财务核算的复杂性。此外,房地产行业作为政策敏感性行业,土地出让政策、信贷调控政策及税收政策的调整,均会对企业经营决策与财务状况产生直接影响。

(二) 房地产企业财务报告合规性要求

基于房地产行业独特的业务特性,财务报告需遵循更为严格的合规标准,以确保财务信息的真实性、准确性与完整性。在收入确认领域,企业需依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14 号——收入》,准确判断控制权转移时点,避免因预售款收取而提前确认收入,同时需合理计量可变对价、重大融资成分等因素对收入金额的影响。资产减值方面,针对存货(开发产品、开发成本)、固定资产、无形资产等主要资产类别,需定期进行减值测试,严格遵循可收回金额孰高原则计提减值准备,防止资产账面价值虚增。信息披露层面,要求企业在财务报告附注中详细说明收入确认政策、资产减值测试方法、关键会计估计及判断依据,以满足投资者、债权人及监管机构对企业财务状况的全面了解需求。

三、新会计法对房地产企业收入确认的影响

(一) 收入确认时点的变化

新会计法以控制权转移作为收入确认的关键时点,对房地产企业预售模式下的收入确认产生重大影响。在以往以风险报酬转移为判断标准时,部分房地产企业可能在收到预售款时即确认收入,而新规定要求企业需在将开发产品的控制权转移给客户时,通常为交房时才能确认收入。这一变化使得房地产企业收入确认时点后移,导致企业在预售阶段虽然现金流充足,但利润表中的收入和利润不能及时反映,影响企业短期财务指标和业绩表现。

(二) 收入金额计量的复杂性增加

新会计法对交易价格的确定考虑了更多因素,如可变对价、重大融资成分等,这增加了房地产企业收入金额计量的复杂性。在房地产销售中,存在大量促销活动,如折扣、返利、奖励积分等,这些都属于可变对价范畴,企业需要合理估计可变对价的金额,并在满足一定条件时将其计入交易价格。此外,房地产企业预售款的收取与交房之间存在时间差,可能构成重大融资成分,企业需要对其进行调整,按照实际利率法计算利息收入或利息费用,这对企业的财务核算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若计量不准确,可能导致收入金额虚增或虚减,影响财务报告的合规性。

(三) 对财务报告披露的影响

新会计法要求企业在财务报告中充分披露与收入确认相关的信息,包括合同的关键条款、履约义务的履行情况、交易价格的确定方法及分摊原则等。房地产企业需要在财务报告中详细说明开发项目的销售合同条款,如交房时间、付款方式、质量保证条款等,以及如何根据新准则判断控制权转移时点,如何计量收入金额等。这使得财务报告的披露内容更加丰富和详细,提高了财务信息的透明度,但也增加了企业财务报告编制的工作量和难度。

四、新会计法对房地产企业资产减值的影响

(一) 存货减值测试难度加大

房地产企业的存货主要为开发产品和开发成本,其价值受市场供求关系、房价波动、政策调控等因素影响较大。新会计法要求企业更频繁、更严格地进行存货减值测试,准确判断存货是否存在减值迹象,并合理估计可收回金额。然而,房地产市场具有较强的不确定性,房价走势难以准确预测,且不同地区、不同项目的房地产价值

差异较大,这使得企业在评估存货可变现净值时面临较大困难。此外,开发项目的开发成本核算复杂,包括土地成本、建筑安装成本、配套设施成本等,如何准确分摊成本并确定其与可变现净值的关系,也是企业面临的难题。若存货减值测试不准确,可能导致资产价值高估或低估,影响财务报告的真实性。

(二) 固定资产和无形资产减值评估的专业性增强

房地产企业的固定资产如办公设备、运输工具等,以及无形资产如土地使用权等,在新会计法下也需进行严格的减值测试。对于固定资产,企业需要准确评估其预计未来现金流量和使用寿命,考虑技术进步、市场竞争等因素对资产价值的影响。对于无形资产,尤其是土地使用权,其价值与房地产市场紧密相关,企业需要结合土地的用途、周边房地产市场情况等因素,合理评估其可收回金额。这些评估工作需要专业的知识和技能,对企业财务人员的专业素质提出了更高要求。若评估不准确,可能导致资产减值计提不合理,影响财务报告的合规性。

(三) 对财务报告稳健性的影响

新会计法严格的资产减值规定促使房地产企业更加谨慎地对待资产价值,及时计提资产减值准备,提高了财务报告的稳健性。通过合理计提资产减值准备,企业能够更真实地反映资产的实际价值,避免资产泡沫,降低财务风险。同时,这也有助于投资者和债权人更准确地评估企业的财务状况和经营风险,做出合理的决策。然而,过度谨慎的资产减值计提也可能导致企业财务指标表现不佳,影响企业的市场形象和融资能力,因此企业需要在稳健性和合理性之间寻求平衡。

五、房地产企业应对新会计法影响的策略

(一) 完善收入确认与资产减值相关的会计政策和流程

房地产企业应根据新会计法的要求,结合自身业务特点,修订和完善收入确认与资产减值相关的会计政策和流程。在收入确认方面,明确各项目不同销售模式下的收入确认时点和计量方法,建立严格的合同审核机制,确保收入确认符合准则规定。在资产减值方面,制定详细的资产减值测试流程和标准,规范减值迹象的判断、可收回金额的估计等操作,提高资产减值核算的准确性和规范性。同时,加强会计政策和流程的培训与宣贯,确保财务人员准确理解和执行。

(二) 加强财务人员专业能力建设

新会计法对财务人员的专业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房地产企业应加强财务人员的培训和学习,提高其专业素质。定期组织财务人员参加新会计法及相关准则的培训课程,邀请专家进行解读和案例分析,帮助财务人员掌握新规定的核心要点和操作方法。鼓励财务人员参加专业资格考试,如注册会计师、注册税务师等,提升专业知识和技能水平。此外,企业还应建立财务人员交流学习机制,分享工作经验和遇到的问题,共同提高业务处理能力。

(三) 优化信息系统建设

为适应新会计法下收入确认和资产减值核算的复杂性,房地产企业应优化信息系统建设。引入先进的财务软件 and 项目管理系统,实现合同管理、销售管理、成本核算、资产管理等业务模块与财务系统的有效对接,提高数据的准确性和及时性。通过信息系统自动采集和分析业务数据,为收入确认和资产减值测试提供支持,减少人工操作带来的误差和风险。同时,利用信息系统加强对财务数据的监控和分析,及时发现异常情况,提高财务管理效率和决策的科学性。

(四) 强化内部控制与风险管理

房地产企业应强化内部控制,建立健全收入确认和资产减值相关的内部控制制度。加强对合同签订、销售收款、成本核算、资产清查等关键环节的控制,确保业务流程合规、财务信息真实可靠。建立风险预警机制,对收入确认和资产减值可能面临的风险进行识别、评估和监控,及时采取措施防范和化解风险。例如,针对房地产市场波动导致的存货减值风险,企业可通过市场调研和数据分析,提前制定应对策略,如调整销售策略、优化产品结构等。

(五) 加强与利益相关者的沟通与协调

房地产企业应加强与投资者、债权人、监管部门等利益相关者的沟通与协调。在财务报告编制过程中,及时向利益相关者解释新会计法对企业财务报告的影响,说明收入确认和资产减值相关的会计政策和估计方法,增强财务信息的透明度和可信度。积极回应利益相关者的关切和疑问,听取其意见和建议,不断改进财务管理工作。

同时，加强与监管部门的沟通，及时了解政策动态和监管要求，确保企业财务报告合规性符合相关规定。

结论

新会计法在收入确认与资产减值方面的规定变化，对房地产企业财务报告合规性产生了深远影响。在收入确认方面，改变了收入确认时点和计量方法，增加了财务报告披露要求；在资产减值方面，加大了存货、固定资产和无形资产减值测试的难度，提高了财务报告的稳健性。房地产企业应充分认识到这些影响，通过完善会计政策和流程、加强财务人员专业能力建设、优化信息系统、强化内部控制与风险管理以及加强与利益相关者的沟通协调等策略，积极应对新会计法的要求，提升财务报告合规性，为企业的可持续发展奠定坚实基础。未来，随着房地产市场环境和会计法规的不断变化，房地产企业还需持续关注相关政策动态，不断调整和完善财务管理工作，以适应新的挑战 and 机遇。

参考文献:

- [1]张瑛琪.新会计准则下企业财务报告分析应用[J].市场周刊,2024,37(29):151-154.
- [2]周莹莹.新会计准则下财务报告分析应用建议[J].活力,2024,42(04):7-9.
- [3]牛文静.新会计制度下政府财务报告信息有效性分析及发展建议[J].财经界,2023,(22):117-119.
- [4]李汐若.基于新会计准则视域下公允价值计量研究——以 W 集团财务报告为例[J].当代会计,2019,(22):126-127.
- [5]赵娜.基于新会计准则基础下的财务报告改进研究[J].昆明冶金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17,33(06):68-71.
- [6]王敏.浅谈新会计准则下财务报告的分析及改进[J].现代经济信息,2013,(19):191+193.
- [7]薛辉.新会计准则与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相关性分析[J].北方经贸,2013,(06):68-69.
- [8]孙颖.新会计准则与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相关性分析[J].中国经贸导刊,2012,(05):10-11.
- [9]宋永春.新会计准则对上市公司财务报告的影响研究[J].中国乡镇企业会计,2011,(12):38-39.
- [10]周淑勤.浅析我国新会计准则与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对财务报表列报的比较及改革动向[J].财经界,2010,(21):93-94.

Analysis of the impact of new accounting standards on the compliance of financial reports of real estate enterprises ——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income recognition and asset impairment

Gao Cunyi¹

1 Chongqing vocational college of art and engineering, Chongqing, China

Abstract:With the change of economic environment and the improvement of accounting standard system,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new accounting law puts forward higher requirements for the compliance of financial reports of enterprises. As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national economy, the particularity of the real estate industry determines that it is more significantly affected by the new accounting law. Deeply exploring the impact of the new accounting law on the financial reporting compliance of real estate enterprises in terms of income recognition and asset impairment will not only help real estate enterprises accurately grasp the policy orientation and improve the level of financial management, but also provide an important basis for ensuring market order and safeguarding the rights and interests of stakeholders.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income recognition and asset impairment, this paper systematically analyzes the impact of the new accounting law on the financial reporting compliance of real estate enterprises. Starting from the core provisions of the new accounting law on income recognition and asset impairment, combined with the business characteristics of real estate enterprises, this paper expounds its specific impact on the timing of income recognition, amount measurement, financial report disclosure and asset impairment test in detail, and puts forward countermeasures such as improving accounting policies, strengthening personnel training and optimizing information systems, in order to provide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reference for real estate enterprises to adapt to the requirements of the new accounting law and enhance the compliance of financial reports.

Keywords:New accounting standards; Real estate companies; Financial reporting; Compliance; Revenue recognition; Impairment of assets

混合式教学“三步三思”高阶能力转化教学研究

——以新工科背景下《线性代数》课程为例

王慧颖¹ 于晟伟^{1*} 于沛^{1*} 宋云涛¹

(¹中国消防救援学院, 北京 102202)

摘要: 新工科教育目标是培养在“新国情、新需求、新技术”时代背景下所需要的创新型和应用型人才, 以新工科创新工程人才培养模型为依据, 探索人才培养新规律。从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教学评价方面探索线性代数课程的高阶学习与“三步三思”课程思政融合的混合式教学模式。该模式借助互联网信息技术平台, 可使工科学生形成高阶思维、应用实践、能力素养相融合的认知体系。通过线性代数课程的实践教学, 验证了创新教学模式对培养创新应用人才的有效性。

关键词: 新工科; 线性代数; 高阶思维; 课程思政; 混合式教学

DOI: doi.org/10.70693/rwsk.v1i5.955

一、引言

互联网时代计算机科技技术的发展改变了高校大学生以往的学习路径和能力培养方向[1]。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到来必将迎来世界经济发展的新机遇和新挑战, 这一发展也必然会导致人才培养目标的转型, 高校在顺应发展潮流和需要时不断做出相应对策, 建设新的教育框架和教学模式, 从而满足社会人才的需求[2-4]。工业革命的发展唯有工程教育变革才能适应“新国情、新需求、新技术”时代背景下创新型和应用型人才的需要。2016年中国成为《华盛顿协议》第18个成员国, 实现了各国工程教育水准的实质等效[5]。2018年首批“新工科”研究和实践的公布, “新工科”建设发挥出了“催化剂”的作用, 加速了各高校的教育改革, 推进了学科建设、人才培养等方面的深层次改革[6]。新工科建设目标为我国高等工程教育提供了发展方向, 高等工程教育在于培养学生形成高阶思维、应用实践、能力素养相融合的认知体系。在相关系列研究后发现高阶思维能力培养的教学模式[7]可以满足新工科背景下创新型和应用型人才的需要。

线性代数课程在高等工科院校专业课程计划中作为必修基础课程之一, 该课程学习成果为其他专业课程和科研工作提供需要的数学功底和研究方法[8]。线性代数在自然科学、工程技术和军事等领域中有广泛的应用, 然而具有逻辑性和抽象性强、章节知识点联系紧密、独特的语言和授课学时少等特点, 使得这门课很难被初学者理解[9,10], 导致传统教学模式无法深层次展开线性代数课程的讲解。因此线性代数课程在新工科背景下对其教学模式创新提出了新的要求, 使得高校教师必须勇于面对新的挑战做出相应的调整。

混合式教学模式采用线上互联网平台教学和线下传统课堂教学结合的方式, 将每节课分为课前、课中、课后三步实施, 使得教学时间和空间都得到一定程度的延展[11]。混合式教学模式有利于课堂教学内容从低阶知识向高阶知识转化, 促进学生高阶思维能力提升, 做到以学生为中心[12]。混合式教学模式人才培养目标是培养高素质人才和掌握先进技术的人才, 为社会进步和发展做出贡献的高素质接班人[13]。因此课程思政也需要融入在混

作者简介: 王慧颖, 女, 博士, 副教授, 研究方向数学建模、大数据分析、高等数学教育;

于晟伟 (1995—), 男, 博士, 讲师, 研究方向为偏微分方程、次黎曼流形、动力系统、复杂网络、高等数学教育;

于沛 (1989—), 女, 博士, 副教授, 研究方向为电工电子、消防救援装备;

宋云涛 (1982—), 男, 硕士, 副教授, 研究方向为代数表示论、高等数学教育。

通信作者: 于晟伟, 于沛

合式教学模式中,实现课程思政“立德树人”的教育功能[14]。这也充分证明了混合式教学教育功能与课程思政建设诉求是高度一致的。因此混合式教学模式为新工科背景下线性代数课程高阶学习与课程思政融合寻找到有效途径。

本文研究试图探讨如何在新工科背景下构建混合式教学融合高阶学习和“三步三思”课程思政育人的新教学模式,以线性代数课程为例研究实现新教学模式的路径,并给出详实教学设计方案和实践成果,为新时代新工科创新型、应用型人才培养做好准备。

二、新工科背景下线性代数课程人才培养模型

培养新工科人才分为三个阶段,分别为知识的理解和储存,知识的运用和分析,技能的综合和创新。学习过程按照高阶思维能力的形成遵循从低阶理解认知向高阶创新认知发展的特点。基于文献[3,7]提出的人才培养模型和新工科背景下的人才需求,本文提出新工科背景下线性代数课程人才培养模型包含“关键品性”、“应用能力”、“创新能力”三个部分。“关键品性”看作人才培养内在根基,是能力持续健康发展的保证。包括道德思想方面、理想信念方面、社会责任和伦理责任四个维度[4]。前三个方面培养贯穿家庭教育、义务教育和高等教育,是传统教育的部分,而伦理责任培养嵌入到课程教育中,进一步完成从能力到素养的内化。“应用能力”看作对知识原理用于解决新问题的能力,这一能力形成是从知识理解和储存初阶思维训练到知识运用和综合分析高阶思维训练,实现理论到实践过程的转化。“创新能力”看作是提供新思想、新理论、新方法和新发明的能力,它由一些思维能力综合而来,主要包括逻辑思维、创新思维和实践能力。面对不同领域具备提出评价、质疑和鉴别的能力,实现应用到创新过程的转化。

三、新工科背景下线性代数混合式教学创新设计

在上述新工科线性代数课程人才培养模型基础上,重新设计工科专业人才的培养计划和学习目标,如下表1所示。

表 1 新工科线性代数课程教学人才培养目标

培养目标	学习要求	关键技能
知识目标	低阶知识向高阶知识转化	低阶知识包括学习内容相关概念、定理和推论以及运算规则;高阶知识学习难度大,教师在教学情境设计中引导学生思考,学生主动学习和探索新知识,将知识延申至邻近应用区域,使学生掌握求解实际问题的技能;学生在低阶知识向高阶知识转化中不仅对所学知识脉络、来源和应用是清晰的,而且可以对相似知识点进行对比和联想达到自己解决质疑点的能力。
能力目标	理论向实践转化;应用向创新转化。	达到低阶认知能力(知识点、数学模型、证明推导)向高阶认知能力(学习意义、价值、应用、创新)的转换,利用课程思政和应用案例,达到学生探索问题的能力,自主学习能力以及创新思维能力。
关键品性目标	价值塑造转化:知识是载体,价值是目的。	将价值观渗透于知识传授之中,引导学生理性思考问题,培养“使命、敬畏、严谨、行动”的行业职业精神,培养“奉献,智谋,专业,执行”的行业职业素养,树立正确人生观、价值观。

基于新工科人才培养模型设计线性代数课程教学理念,一是以培养学生能力为导向重构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模式,展现分步、分阶、分层式教学内容实现知、能、用能力提升;二是以课程价值塑造为导向构建高阶知识模块化课程思政内容,展现多元化、信息化、差异化教学资源实现明、思、辩方面提升;三是以评促学为导向建立高阶学习教学效果评价,达到育人目标并发挥教学评价的反哺效应。该教学模式融入了高阶学习与课程思政教育,做到以学生为主体,教师为主导,重点培养学生的应用创新思维。分步教学方式包括线上课前基础导学、教师课堂高阶教学和课后线上线下复习提升三步实施;分阶教学内容包括低阶知识和高阶知识,低阶知识可以适当在课前导学中进行学习;分层次作业包括基础知识达标作业、高阶知识拓展作业,考核学生知识掌握和综合分析能力转化情况。基于上述教学思路,新设计的教学模式将三步教学紧密联系构建线性代数课程教学整体。

新的教学模式极大拓宽了教学的空间和时间,为线性代数课程提供“教”与“学”的更多可能。低阶知识学习主

要集中在课前和课内,高阶知识学习主要集中在课内和课后,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培养集中在课内和课后,关键品性培养集中在课前、课内和课后三个环节融入课程思政教学。空间的多维度体现在课堂、图书馆等地方授课,时间的多维度体现在课内和课外。

四、线性代数课程新教学模式实践

线性代数课程授课对象是工科专业本科大二学生,总课时 32 学时。

1、高阶知识教学模式设计

课程性质要求满足授课和学习达到理论结合实际,掌握程序软件工具,达到后续专业课程知识的衔接,使学生感受到线性代数课程的重要性。

(1) 线性代数应用案例引入

从生活案例中了解线性代数的应用。教师收集一些实用案例,通过描述、讨论、提问等方式激发学生对知识的探索,从而引出线性代数的概念、定理、运算等。比如,从图像处理技术引出矩阵的运算理论,从物理做功引出向量内积运算等。

从后续专业案例中寻找线性代数的应用。学生通过了解到线性代数在其专业中的应用价值,对学生提升内在学校的动力是非常有帮助的。教师在理工科专业必修课程中如密码学、电路、自动控制系统、数字信号处理、应急救援技术、图像处理技术、测量学等课程收集线性代数应用案例,作为线性代数课程教学内容的一部分。

从不同学科专业背景中了解线性代数的应用。引导学生了解线性代数知识应用的广泛性,促进学生增加线性代数理论知识学习和探索解决问题的方法,达到学生创新意识的产生。比如为消防工程专业讲解图像处理技术和计算程序编码等。

(2) 编程实践融入线性代数教学

线性代数课程教学内容中存在矩阵运算和行列式运算,其阶数越大,运算过程越繁琐,因此运用计算机技术是必不可少。目前,在求解线性应用问题时,常使用 MATLAB 软件,该软件通过输入命令程序可以快速解决线性问题,是求解运算的有效工具。另外, MATLAB 软件还具备画图功能,可以将数学模型在软件窗口中画出,使较抽象的数学模型变得生动和直接。因此线性代数教学中必须融入计算机技术。

2、“三步三思”课程思政教学融入设计

混合式教学全过程中赋予课程思政路径,如图 1 所示。分别在课前导学、课堂教学以及课后复习这三个阶段赋予课程思政设计,形成“三步三思”课程思政教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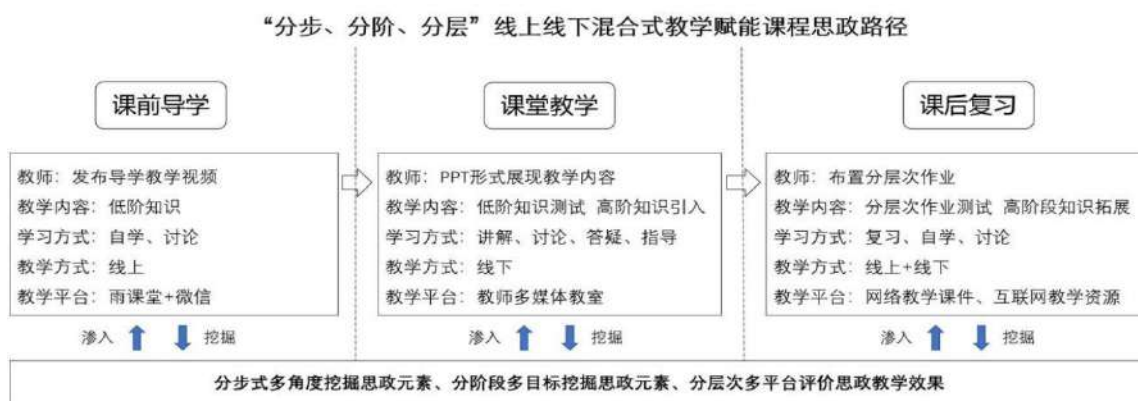


图 1 混合式教学中“三步三思”课程思政融入路径

利用线上课前导学内容挖掘课前教学思政元素。教师可以在课前导学中融入线性代数相关背景知识。例如,从“数学发展史”、“中国科学家故事”、“技术应用介绍”中挖掘知识点探索思政元素,潜移默化的讲给学生,渗入探索科学的精神和求知精神,激发学生学习动力。利用线下课堂教学内容挖掘课堂教学思政元素。教师注重学以致用,展现出科学的目的是运用,而科学知识最终服务于社会,从而挖掘思政元素,使学生深刻体会到线性代数知识与科学前沿研究的紧密联系,培养学生知识运用能力,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和建立社会责任感。利用线上线下多平台课后复习内容挖掘课后思政元素。例如,布置综合作业、创新性作业,引导学生将知识和思想教育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将课程思政从课内拓展到课外。

3、课程新教学模式实践

高阶学习与课程思政融合的混合式教学模式从理论设计到课程实践遵循以下路径。

线上课前导学内容构建: 课前导学视频录制内容包括概念、定理、推论并且同时在润物无声中融入思政,属

于基础知识范畴,视频录制时间不宜过长 5 至 7 分钟。线性代数教学大纲课程分为 5 章 25 节课,视频录制 68 个知识点,总共时长 408 分钟。

线下课堂教学内容构建:教师对课前导学内容测试,掌握学生自学情况和存在的问题,归纳和总结学习目标、重点及难点,对复杂知识及难题进行精讲,在理论学习中引入应用案例,引导学员讨论和探索解决方法,在学习过程中逐渐升华,进一步强调正确价值观和社会责任感的重要性,从而使学生形成高阶思维和高素质。

线上线下课后拓展提升:教师结合所学知识点,布置基础知识达标作业和高阶知识拓展作业,考核学生课上知识掌握情况、高阶知识转化情况以及创新思维形成效果。结合线上课程资源,逐渐培养学生独立思考、自主学习、小组协作、求解问题的能力,达到学以致用,实现课程思政的内化。

4、新教学模式下教学效果评价方法

线性代数课程教学模式使用高阶学习与课程思政融合的方式,将教学过程划分为三个教学阶段,每个教学阶段实现教学目标不同。高阶学习效果评价方式:课前导学涉及在线教学、在线讨论等环节,学生需要展现出一定的自学、沟通、凝练问题等行为;课堂教学涉及在线内容评测、精讲、提问、小组讨论、编程实验等环节,学生需要展现理解、思辨、表达、应用等行为;课后复习涉及基础作业线下提交、综合性及创新性作业线上展示等环节,学生需要体现分析、创新、协作、寻找求解方法等行为,这些行为构成了学生教学效果评测要素。课程思政效果评价方式采用线下访谈和线上问卷方式。因此教学效果评价中不仅仅体现课程终考成绩,也需要同时体现形成性评价^[15],如图 2 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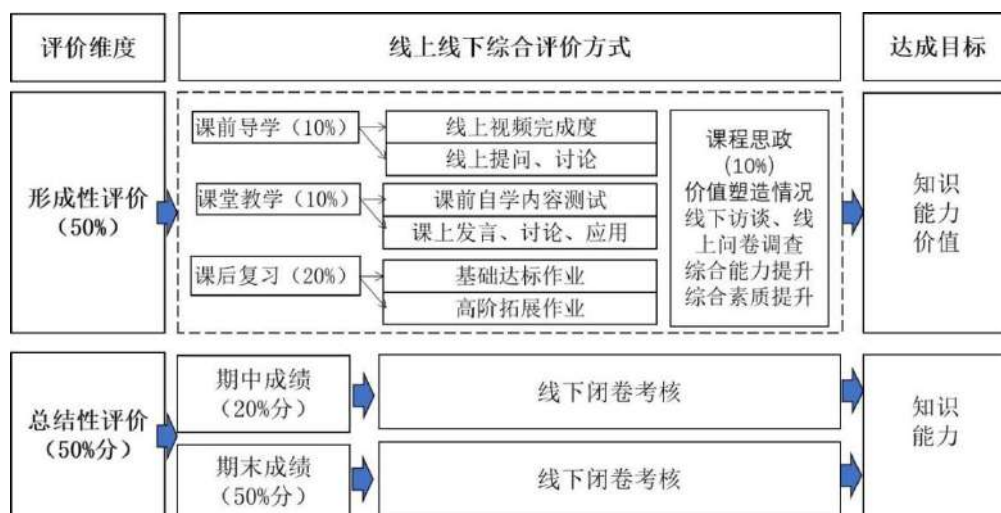


图 2 新教学模式评价方法

五、新教学模式教学反思

教学反思是课程教学持续发展和教师专业逐步提升的重要环节。教师依照教学实施课堂情况及教学报告进行教学反思。需要注意以下几点:一是反思引入应用案例与学生兴趣点是否一致;二是反思高阶拓展作业是否符合学生知识水平;三是反思课程教学评价方法是否达到以评促学和反哺促教。这需要教师不断完善,做好新工科背景下线性代数课程混合式教学改革持续发展。

六、结论与展望

新工科背景下人才培养需具备各种专业知识、实践能力、创新思维和品德修养等体现,而传统教学模式无法满足新工科人才培养需求。《线性代数》课程教学改革注重人才培养新理念的探索实践,创新教学模式更能够充分发挥教师在教学过程中的指导、启示、监察控制等主导作用,也充分体现出学生学习过程中的主体性、创造性和探索性,有效提升学生综合素质,具有很强推广应用价值。

参考文献:

- [1] 赵洪利,侯兴明.军队在线教育模式和学习支持服务研究[J].继续教育,2018,32(10):3-6.
- [2] 王树国.第四次工业革命背景下的高等教育变革与发展[J].中国高教研究,2021(01):1-4+9.

- [3] 王世斌, 顾雨竹, 郅海霞. 面向 2035 的新工科人才核心素养结构研究[J]. 高等工程教育研究, 2020(04):54-60+82.
- [4] 罗嘉庆, 叶欣, 刘鹏飞, 陈文字. 面向新工科的新生工程认知体系构建——以计算机导论课程建设为例[J]. 高等工程教育研究, 2020(05):25-2.
- [5] HANRAHAN H. The Washington Accord: history, development, status and trajectory[J]. A see global colloquium on engineering education, 2008(10):1-17.
- [6] 韩旭, 高长安. 以“工学并举”思想引领高校新工科建设[N]. 中国科学报, 2019-01-23(004).
- [7] 赵永生, 刘巍, 赵春梅. 高阶思维能力与项目式教学[J]. 高等工程教育研究, 2019(06):145-148 +179.
- [8] 郭艳凤, 郭春晓, 林燕. 新工科背景下线性代数线上线下混合式“金课”的改革与实践[J]. 高教学刊, 2021, 7(30):139-142.
- [9] 王利东, 刘婧. 从应用实例出发的线性代数教学模式探讨[J]. 数学教育学报, 2012, 21(03):83-85.
- [10] 兰瑞平, 雒晓良. 应用型本科院校“线性代数”教学改革探讨[J]. 教育理论与实践, 2017, 37(09):45-46.
- [11] 贫雅萍. 混合式教学在外贸函电课程教学中的应用[J]. 西部素质教育, 2019, 5(22):127-128.
- [12] 刘玮, 熊永华, 王广君. 新工科背景下工科课程高阶学习教学模式探讨与实践[J]. 高等工程教育研究, 2021(03):163-168.
- [13] 张男星, 孙继红, 王春春, 桂庆平. 我国在线高等教育发展的国际比较及推进策略[J]. 中国高教研究, 2021(01):48-55.
- [14] 习近平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强调把思想政治工作贯穿教育教学全过程开创我国高等教育事业发展新局面[N]. 人民日报, 2016-12-09(01).
- [15] 翟苗, 张睿, 刘恒彪. 高校混合式教学形成性评价指标研究[J]. 现代教育技术, 2020, 30(09):35-41.

Reflections on the Integration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lements into

Advanced Mathematics Class

Wang Huiying¹, Yu Chengwei^{1*}, Yu Pei^{1*}, Song Yuntao¹

¹ China Fire and Rescue Institute, Beijing 102202, China

Abstract: The goal of new engineering education is to cultivate innovative and applied talents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new national conditions, new demands and new technologies”. From the aspects of teaching content, teaching method and teaching evaluation,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hybrid teaching mode of advanced learning and curriculum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integration in linear algebra course. With the help of the Internet information technology platform, this model can make engineering students form a cognitive system integrating higher-order thinking, application practice and ability accomplishment. Through the practice teaching of linear algebra, the effectiveness of innovative teaching mode for cultivating innovative application talents is verified.

Keywords: Emerging Engineering; Linear Algebra Golden Course; High-order Thinking;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Blended Learning

东西方“互联网+大健康”行业发展模式探讨

赵雨馨¹

(1.南京中医药大学, 江苏 南京 210023)

摘要: 目的 探讨中国与美国在“互联网+医疗健康”领域的发展模式差异, 总结可借鉴的经验。方法 采用文献分析与案例对比法, 从政策导向、技术创新、资源分配等维度比较两国发展路径。结果 中国以政府主导推动全民健康覆盖, 重点解决医疗资源不均问题; 美国依赖市场资本与技术创新, 聚焦个性化医疗。两国均面临数据安全、行业标准化等挑战。结论 发展中国家需结合国情优化政策支持、技术创新及支付体系, 推动“互联网+大健康”可持续发展。

关键词: 互联网+大健康; 医疗资源分配; 数据安全; 政策支持; 个性化医疗

DOI: doi.org/10.70693/rwsk.v1i5.954

引言

现代社会的大健康产业普遍以科技赋能健康为理念, 致力于为用户提供全方位的健康服务, 旨在打造一流的医疗健康产业互联网平台。^[1]“互联网+大健康”是指以互联网为载体, 借助移动通信技术、云计算、物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 整合医疗服务、健康管理、智能健康设备及健康数据, 形成线上线下一体化的健康服务平台。这一概念强调通过技术手段提升医疗服务的可及性和效率, 从而应对全球化带来的健康挑战。在全球化背景下, “互联网+大健康”的发展受到了信息技术和健康需求变化的推动。尤其是在后疫情时代, 全球范围内的传统医疗健康系统受到了极大的冲击, 各国纷纷加速推广数字医疗服务。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数字医疗服务的推动力量并不相同。在西方发达国家, 技术创新和市场需求成为推动“互联网+大健康”发展的主要力量; 而在中国等新兴市场, 政府主导的政策推动成为发展的关键因素^[2]。本文旨在探讨东西方在“互联网+大健康”领域的不同发展模式, 重点分析中国与美国的典型代表。首先, 发展模式的比较有助于揭示不同国家在推动“互联网+大健康”过程中所面临的共性机遇与挑战, 借鉴发达国家的成功经验, 制定适合中国等发展中国家的发展策略。其次, 随着全球人口老龄化趋势的加剧以及慢性病患率率的上升, 健康产业被视为未来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之一, 这一产业也将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3]。由于新冠肺炎疫情的爆发, 大多数部门的活动——无论是商业、教育还是医疗保健——都以在线而不是内联方式进行, 因此, 互联网流量急剧增加^[4]。疫情这一突发性的公共卫生事件的发生, 使得互联网技术与医疗健康服务结合的必要性大为凸显。再之, 由于人类活动范围的扩大、公共卫生系统的漏洞、生物实验室安全问题等种种原因, 使得未来出现大规模疫情的概率不断增加, 这将对人类健康和全球经济带来极大的威胁。因此, 研究并加强互联网技术与大健康行业相结合, 提高低收入水平与改善发展中国家的行业发展模式极为重要。通过以中美发展模式为例的比较分析, 可以了解全球化背景下不同国家如何利用互联网技术应对健康挑战, 进而为中国“互联网+大健康”行业的发展提供有价值的参考。

1 东西方“互联网+大健康”发展模式比较

1.1 以中国为例的发展中国家“互联网+大健康”行业发展模式

1.1.1 政府主导与政策驱动

作者简介: 赵雨馨(2004—), 女, 本科生, 研究方向为护理学

中国的“互联网+大健康”模式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政府的政策支持。随着中国人口老龄化加剧,慢性病高发和医疗资源长期分布不均,2016年国务院发布《“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提出以促进健康为中心的“大健康观”和“大卫生观”,强调全人群和全生命周期的健康服务。2022年“十四五”国民健康规划进一步要求全方位干预健康问题和全周期保障人群健康。这体现了我国健康战略从治病转向健康、从治疗转向预防的转变,倡导个人健康责任。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在于个人健康信息的共建共享和互联互通。^[5]中国政府通过一系列的政策改革,推动互联网技术在医疗健康领域的应用。

在政策的引导下,中国的互联网医疗市场发展迅速,大量科技企业和互联网平台纷纷进入健康领域。政府与企业间的合作加强,地方政府通过引入科技企业,利用互联网技术优化当地的医疗资源分配,促进全民健康管理。2019年国家发改委更是与相关部门联合发布了《促进健康产业高质量发展行动纲要》,指出未来三年要着重贯彻落实“互联网+医疗健康”提升工程^[6]。

1.1.2 新型的医疗健康服务业态逐步形成

中国的互联网大型企业,如阿里健康、平安好医生、微医等,响应政策号召,通过技术创新快速推动了在线健康服务的发展。2023年以来,诸多创新成果相继问世:医联发布的基于Transformer架构的国内首款医疗大模型MedGPT进行了内部测试,允许用户通过与AI连续对话实现症状咨询;微医正在研发医疗AI大模型,打造紧密型医疗联合体的底层操作系统,同时还与腾讯合作共建“六病共管”专病智能产品;平安健康今年6月发布“平安医博通”多模态医疗大模型,可帮助医生生成患者健康档案、提供医学知识辅助等。

随着银发经济升温,我国互联网医疗企业也深入布局养老服务领域,以应对我国人口老龄化趋势^[7]。为个体健康监测提供了技术支撑,缓解了中国作为人口大国所面临的全民健康问题的压力,进一步推动了全民健康数据的收集和分析。通过对这些数据的整合和分析,形成个性化健康管理方案,满足了人们对自身健康日益增长的市场需求^[8]。据了解,截至2023年9月,平安健康的居家养老服务覆盖全国54个城市,同时还为用户建立个人健康档案,提供个性化解决方案以及全流程监测。

1.1.3 医疗资源不均衡与互联网远程医疗的补充发展

中国作为一个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国家,发达地区拥有较为完善的医疗资源,而偏远地区和基层医疗水平相对薄弱。互联网技术的应用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这一困境,通过远程医疗和健康管理平台,优质的医疗资源可以快速扩展至偏远和欠发达地区,提升了全民健康服务的覆盖面。特别是在疫情期间,必要的隔离政策使在线问诊的需求激增,“互联网+大健康”极大地保障了人民群众的就诊需求。2020年,在新型冠状病毒疫情期间,河南毗邻湖北,又居交通要道,人口众多,疫情防控任务艰巨。华为联合国家远程医疗中心,日夜兼程,仅用了不到4天时间,就完成了河南省18个地市、108个县的147家新冠肺炎医疗救治定点医院隔离病区远程会诊系统的建设,全省所有的重症病人都能通过该系统得到省级专家的及时会诊,有效支撑了河南省在防疫期间的统一调度、远程会诊、方案共享、救治指导等工作的顺利开展。在疫情的特殊阶段,远程医疗对患者和医护人员都有极大的帮助。远程医疗跨越时间、空间和地域限制的优势,高效率实现了优质医疗资源下沉,也有力解决了基层患者和医疗机构对于上级医疗支援的需求,缓解了定点医院的诊疗压力,减少了人员跨区域传播风险。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健康领域相关改革发展成就显著,人民健康水平提高与技术进步拓宽了远程医疗的服务范畴,如患者远程门诊咨询、实施远程监护等。远程医疗服务发展需要互联网信息技术的有力支持,同时,信息化发展与服务需求增加倒逼远程医疗服务项目向横向和纵向的深度发展^[9]。

1.2 以美国为例的发达国家“互联网+大健康”行业发展模式

1.2.1 资本推动与国家政策并举

全球互联网医疗最早起源于美国,美国的互联网医疗行业发展起始于21世纪初期,在过去的近20年时间里行业稳步发展。其国家政策支持孵化出了美国一半以上的互联网医疗。美国通过保险计划的支付,激励政策以及对医院的评估方法,促使医院使用互联网医疗,大大刺激了互联网医疗市场的高速发展。与中国不同的是,美国的“互联网+大健康”行业的发展更多依赖资本市场的支持和市场需求的驱动。美国的资本市场对于科技创新

的支持力度巨大,吸引了大量科技公司和初创企业进入了健康领域^[10]。这些公司通过利用云计算、人工智能、物联网等前沿技术,推动了个性化医疗、远程医疗和健康数据分析的发展。

美国的“互联网+大健康”行业由苹果、谷歌和亚马逊等几个典型科技巨头布局。例如,苹果推出了 Apple Health,整合用户的健康数据;谷歌则通过收购 Fitbit 等可穿戴设备公司,深入健康数据市场。亚马逊则在在线药房和远程医疗领域发力,为消费者提供便捷的健康服务。

1.2.2 精准医疗技术强化助推个性化医疗服务不断成熟

美国作为技术创新的前沿,在互联网健康领域的技术应用走在全球前列。特别是在个性化医疗方面,美国通过基因检测、精准医疗和大数据分析,为患者提供了高度个性化的治疗方案。例如,基因测序公司 23andMe 利用互联网技术向消费者提供基因检测服务,并通过大数据分析帮助用户预防和管理遗传性疾病。突破性技术的发展引领我们步入了以生物监测为核心的新纪元。比如,现今市面上出现了搭载传感器的生物识别智能戒指,能通过配套的手机 APP,为用户提供个性化睡眠质量相关的分析^[11]。此外,人工智能的广泛应用也极大提升了诊断的准确性和效率,如 IBM 的 Watson Health 系统已经被用于多家医院的肿瘤治疗和诊断中。

2015 年美国总统奥巴马在国情咨文演讲中宣布,精准医学 (precision medicine) 将会是人类史上,缔造医学突破最重大的机会之一。美国的精准医学计划将透过推动利用个体化基因信息的疾病治疗,募集 100 万志愿者之基因数据,以及环境、生活方式与其他数据,链接并整合至电子健康云端数据库,透过研究不同族群、各个年龄段的个体化基因信息,推进精准医学的研究与应用,来协助治疗、改善、管理及预防癌症与糖尿病等疾病。

1.2.3 互联网医疗技术的跨界合作弥补行业不足

美国的资本推动不仅加速了行业发展,还促进了跨界合作。大型科技公司与传统医疗机构、保险公司合作,打造全新的健康生态系统。通过跨领域合作、技术创新与健康服务更加紧密的结合,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逐渐形成了集医疗服务、健康管理、数据分析于一体的服务模式^[12]。如 Amwell、MDLIVE、Teladoc 等互联网医疗企业,为医保公司、医院/医疗集团和雇主提供线上医疗服务。这些企业拥有庞大的医保参保用户基础,服务覆盖多个医保计划和医疗集团,成为美国互联网医疗行业的重要力量。

2 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互联网+大健康”行业发展困境与实践建议

2.1 以中国为例的发展中国家在互联网+大健康行业中的发展困境

2.1.1 医疗资源分配不均

尽管中国的互联网医疗行业快速发展,但医疗资源分配不均依然是亟待解决的问题。城乡差距和地区间差异导致互联网医疗的普及受限,特别是在偏远和欠发达地区,医疗资源的匮乏阻碍了远程医疗和健康管理平台的推广^[13]。对于很多农村地区来说,很多医生并不具备较强的网络服务意识,群众对这种新型模式的知晓度和利用度并不高。虽然很多医护人员关注网络医疗,并了解到网络医疗的改善性和方便性,但在对病人进行具体治疗时,由于医疗资源分配不均,依然还以线下线下医疗为主,如何对其进行引导,使其能够通过线上展开日常的医疗工作,依然具有很大的挑战性。

2.1.2 数据安全与隐私保护

随着“互联网+大健康”的普及,健康数据的大规模采集和应用变得尤为重要。个人的健康信息不仅涉及隐私,还可能影响社会的稳定和安全。然而,当前中国在健康数据的保护方面仍面临诸多挑战。一方面,部分互联网医疗平台缺乏完善的数据保护机制,容易导致用户信息泄露和滥用;另一方面,用户在接受互联网健康服务时,往往并未充分了解数据使用条款,缺乏数据保护的意识和手段。比如在平台注册时的号码信息,或进行线上注册时身份及医保信息,以及在平台上检验单和电子病历等,也会产生一定痕迹,这些会无形中加大了隐私暴露风险,监管起来也比较困难^[14]。这些问题的存在不仅影响了用户对互联网医疗的信任度,也制约了行业的进一步发展。

2.1.3 行业标准化不足

中国的“互联网+大健康”产业虽然发展迅速,但行业标准化和监管体系相对滞后。由于该行业涉及医疗、互联网、数据安全等多个领域,存在行业标准不统一、监管空白等问题。例如,不同的互联网医疗平台之间在数据互通、诊疗流程和服务标准上缺乏统一的规范,这使得用户在不同平台间的体验差异较大,难以形成有效的市

场秩序^[15]。此外,由于互联网医疗的在线诊疗、药品配送等环节的特殊性,现有的法律法规对其覆盖有限,导致医疗事故或纠纷发生时的责任划分存在模糊地带。

2.1.4 医患关系的线上化难题

在传统的医疗服务模式中,医患之间的互动是面对面的,而互联网医疗服务则将这一关系线上化,带来了新的挑战。例如,许多患者在面对网络医生时缺乏信任感,担心无法获得与线下诊疗同等质量的服务;会对其安全性和可靠性产生一定质疑,尤其是在自我居家监测时,也会怀疑自己能否完成这些内容^[16]。此外,医生在互联网平台上处理的患者数量激增,可能导致医务人员的负担加重,服务质量难以保证。如何建立起信任机制,增强患者的体验感和满意度,是推动“互联网+大健康”健康发展的关键。

2.1.5 支付体系和医保对接不完善

目前,中国的互联网医疗支付体系仍不完善,特别是与医保的对接相对滞后。虽然部分地区的互联网医疗服务已经纳入医保报销范围,但总体覆盖面有限,且用户支付流程较为复杂,使用体验有待提升。此外,互联网医疗企业的盈利模式较为单一,主要依赖于用户付费和平台服务费用,而这些收入模式难以支持大规模的技术创新和服务提升。如何建立起更加灵活的支付体系,并推动互联网医疗与医保系统的全面对接,是当前行业亟待解决的问题。

2.2 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可以向发达国家借鉴的基于本国国情的行业发展经验

2.2.1 促进医疗资源均衡分配

美国广泛研究与应用远程医疗服务与虚拟护理,包括视频咨询、远程监控等,通过远程医疗、智能健康设备和数据共享平台等手段,推动优质医疗资源下沉,改善偏远地区的医疗服务状况。美国一项研究指出,由于头痛疾病的广泛流行和严重程度各不相同,有组织的头痛服务是必不可少的,尤其是分层头痛服务模式得到了全球认可。而大多数国家都面临着准入有限、意识、经济障碍和卫生政策不足等难题。远程医疗可以通过扩大头痛护理的机会来帮助改善健康公平,因为它可以为患者提供服务,而无需长时间等待,并且可以在因人员短缺而服务不足的地区提供医疗保健。^[17]鉴于此,中国政府可鼓励医疗机构与互联网平台合作,进一步结合5G技术,促进城乡医疗资源的互补与共享,通过建立远程医疗中心,将优质的医疗资源从大城市输送到基层和偏远地区,解决医疗服务不平衡的问题。此外,政府还可以为基层医院和诊所提供更多技术支持,帮助它们更好地应用互联网医疗技术。

2.2.2 加大政策扶持与行业监管力度

要推动“互联网+大健康”行业的持续健康发展,首先需要建立健全行业标准和监管体系。目前,发达国家对于数据隐私保护、电子病历系统标准、医疗软件认证等方面有较为完善的法律法规,如美国的HIPAA法案,用于保障患者的隐私权。中国等发展中国家政府应进一步加强对互联网医疗行业的政策支持,完善相关法律法规,特别是在数据安全和隐私保护方面。通过建立严格的监管机制,确保医疗数据的安全性和透明度,增强用户对互联网健康服务的信任感。我国政府可以制定统一的服务标准和流程规范,确保不同平台之间的互联互通,更好地推动国内医院之间以及跨机构的数据共享。同时,医疗数据的安全性和合法使用也应被纳入监管范围,出台相应的法律法规,确保用户信息的隐私和安全得到有效保护^[18]。

2.2.3 推动技术创新与服务流程改进

美国等发达国家在互联网+大健康行业中的技术创新较为成熟。AI技术如今已经被用于多个医疗领域,其IBM Watson Health和Google Health等项目展示了AI在医疗领域中的潜力。发展中国家政府应鼓励科技企业加快技术创新,特别是在远程医疗、人工智能和大数据分析方面的发展。除此之外,美国医疗机构普遍实行持续的质量改进措施,定期评估服务流程并寻找优化机会。中国相关行业协会应积极推动服务标准化建设,确保技术和服务的统一性和规范性,以提高整体服务质量。例如,中国的医保系统接入对“互联网+大健康”的普及具有重要意义。为了提高互联网医疗服务的可及性和便捷性,政府应加大力度推动医保与互联网医疗平台的深度融合。

2.2.4 增强公众数字健康意识

在线教育资源对患者的理解、意见和行为有影响。美国一项研究表明,越来越多的结直肠癌患者正在接受诊断,并使用互联网搜索信息。该研究旨在提供迄今为止对在线结肠直肠资源最深入、最全面的检查。通过互联网引擎搜索,结直肠癌在线信息可以在问责制、可读性、内容准确性和完整性方面得到改善^[19]。山西白求恩医院的一项智能化互联网医疗服务模式对门诊患者教育效果的实证研究表明,对照组患者接受常规医疗服务,干预组则在接受常规医疗服务基础上增加智能化互联网医疗支持,包含网络在线平台健康教育、随访和咨询服务。比较两组患者健康知识掌握情况、自我管理能力和患者满意度及复诊率等指标对照组患者常规医疗服务,干预组则在接受常规医疗服务基础上增加智能化互联网医疗支持,包含网络在线平台健康教育、随访和咨询服务。比较两组患者健康知识掌握情况、自我管理能力和患者满意度及复诊率等指标,发现干预组患者健康知识掌握程度、自我管理能力和满意度评分显著高于对照组,复诊率显著低于对照组。这表明,智能化互联网医疗模式在优化患者教育和提高医疗服务质量方面具有良好应用价值。^[20]目前,中国健康管理行业整体上规模还不小,能接受系统健康服务的人群还很少,究其主观原因,目前大部分人的认识还停留在疾病医学模式下,如何让健康管理成为健康新风尚是目前亟需解决的难题。此外,在新医科背景下,医学学科体系发展迅速,新的诊疗模式与预防保健理念层出不穷。因此,政府和企业应联合推动健康教育和数字化知识普及,提升公众对互联网健康服务的认知和信任度。特别是在现如今老龄化社会中,如何让老年人掌握和利用互联网技术获得医疗服务,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可以通过社区活动、宣传教育和培训课程,帮助老年群体和弱势群体更好地使用互联网健康平台。同时,发展中国家可以学习发达国家在专业人才培养方面的经验,积极引进国外教育资源,培养具备国际视野的大健康产业人才。

2.2.5 完善支付体系与商业模式

当前,中国的互联网健康服务在支付体系上仍不够完善,用户的支付意愿和支付渠道相对有限。观察发达国家中成功的商业案例,结合本国国情,可以帮助发展中国家找到适合本地市场的商业模式。我国政府应积极推进医保与互联网医疗平台的对接,简化用户支付流程,使更多的互联网医疗服务能够纳入医保报销范围。另一方面,企业应探索多样化的商业模式,提供更多符合用户需求的健康服务套餐,同时通过合理的定价策略提高用户的付费意愿。此外,医保报销流程的简化与线上化也需要得到改善,确保用户在使用互联网医疗平台时能够方便快捷地完成支付和报销^[21]。

3 结论与展望

通过对中美两国“互联网+大健康”发展模式的深入比较分析,可以得出以下几点结论:首先,中国的互联网健康产业依赖于政府的强力推动,国家政策起到了指导性作用;而美国则更倾向于利用市场力量,私人资本和企业是推动行业发展的主要动力。其次,在技术应用方面,美国凭借其强大的科技创新能力,重点发展个性化医疗和精准医疗,而中国则更多关注如何利用技术提升全民健康服务的覆盖率,尤其是解决医疗资源不均的问题^[22]此外,两国在市场机制和医疗支付体系上也存在显著差异,这些差异反映了各自不同的社会经济背景和发展需求。

尽管两国在“互联网+大健康”领域的侧重点不同,但它们都在探索如何通过技术创新和服务模式优化提升医疗服务的质量和效率,面对全球化的挑战,两国在未来的发展中将有更多的合作与交流机会。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速和信息技术的不断进步,中国及其他发展中国家应积极探索适合本国国情的发展路径,推动互联网与大健康产业的深度融合,以提高全民健康水平,并为全球卫生事业做出更大贡献。未来的研究方向可包括跨国合作案例分析、新兴技术在互联网健康领域中的应用评估以及用户行为和满意度的长期跟踪研究等。

参考文献

- [1]王汝林.基于架构创新的大健康产业互联网发展规划研究[J].互联网周刊,2024,(08):50-52.
- [2]李璐璐.浅谈我国“互联网+医疗健康”发展现状与思考[C].2018 海峡两岸暨港澳大健康论坛论文集.2018:449-452.
- [3]本刊记者.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健康中国 2030”规划纲要》大健康产业大有可为健康中国势在必行[J].中国品牌与防伪,2023,(S1):4-6.
- [4]Ja'afreh MA, Adhami H, Alchalabi AE, Hoda M, El Saddik A. Toward integrating software defined networks with the Internet of Things: a review. Cluster Comput. 2022;25(3):1619-1636.

- [5] 雷亚欣. 多源个人健康信息协同共享机制及微服务模式研究[D]. 吉林大学, 2024. DOI:10.27162/d.cnki.gjlin.2024.001778.
- [6] 本刊编辑部. 21 部委重磅发布《促进健康产业高质量发展行动纲要（2019-2022 年）》[J]. 科技新时代, 2019, (Z1): 38-39.
- [7] 国务院关于促进服务消费高质量发展的意见[J].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公报, 2024, (23): 21-24.
- [8] 龚梦迪. 数智化发展对医疗服务行业企业绩效的影响研究[D]. 安徽财经大学, 2024.
- [9] 姜艺佼, 王锐, 张喆, 等. 基于“互联网+医疗健康”的我国远程医疗发展驱动及现状分析[J]. 中国市场, 2023, (09): 15-17+34. DOI:10.13939/j.cnki.zgsc.2023.09.015.
- [10] 贺景怡, 许达仁, 陈曦, Jonathan Medalsy. 麦肯锡: 2024 年大健康行业五大趋势[J]. 企业家, 2024(7): 84-88
- [11] 吴义天, 杨燕绥. 荷兰基层互联网医疗的发展经验及启示[J]. 卫生经济研究, 2021, 38(4): 39-42.
- [12] 陈好嘉, 张新庆, 蔡笃坚. 美国精准医学政策走向与反思[J]. 医学与哲学(A), 2018(01).
- [13] 孙倩倩, 周守君. 我国远程医疗的现状、问题及发展对策[J]. 南京医科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2, 22(01): 25-30.
- [14] 郭祥倩. 加强网络安全管理促进“互联网+医疗健康”发展[N]. 中国家庭报, 2022-09-12(005). DOI:10.44197/n.cnki.nzgit.2022.000341.
- [15] 张晓旭. 《2023 互联网医疗服务洞察报告》发布: 用户新需求驱动构建新型服务体系[EB/OL]. (2024-02-02)[2025-04-29]. 动脉网. <https://mp.weixin.qq.com/s/vBAdQO1enBqSYLvG0nHwkA>
- [16] 周咏竹, 陈雅玲. “互联网+”时代农村基层医疗健康发展的机遇与挑战[J]. 农家参谋, 2022, (23): 38-40.
- [17] Raffaelli B, Rubio-Beltrán E, Cho SJ, De Icco R, Labastida-Ramirez A, Onan D, Ornello R, Ruscheweyh R, Waliszewska-Prosół M, Messina R, Puleda F. Health equity, care access and quality in headache – part 2. J Headache Pain. 2023 Dec 13;24(1):167.
- [18] 杨启凡, 王宇萍. 我国公共卫生领域面临的突出生物安全问题[J]. 中国公共卫生, 2023, 39(05): 676-680.
- [19] Wang L, Gusnowski EM, Ingledew PA. Digesting the Contents: an Analysis of Online Colorectal Cancer Education Websites. J Cancer Educ. 2022 Apr;37(2):263-273.
- [20] 赵莹. 智能化互联网医疗服务模式对门诊患者教育效果的实证研究[N]. 山西科技报, 2024-11-07(A06).
- [21] 王振博, 纪美好, 叶明, 等. 河南省远程会诊服务效率及影响因素分析[J]. 医学信息学杂志, 2024, 45(09): 50-56.
- [22] 王哲, 李琳, 唐圣晟, 等. 数字健康及其面临的机遇与挑战[J]. 数字医学与健康, 2023, 01(1): 38-43.

A Comparative Study of the Development Models of "Internet + Comprehensive Health" Industry in Eastern and Western Countries

Yuxin Zhao

College of Nursing, Nanjing University of Chinese Medicine, Nanjing, 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differences in the development models of "Internet + Healthcare" between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and summarize actionable insights. Methods Using literature analysis and case comparison, this study compares the development paths of the two countries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policy orientation,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nd resource allocation. Results China relies on government-led policies to promote universal health coverage, focusing on addressing uneven distribution of medical resources; the United States emphasizes market-driven capital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prioritizing personalized healthcare. Both countries face challenges such as data security and industry standardization. Conclusion Developing countries should optimize policy support,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nd payment systems according to their national conditions to achiev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Internet + Healthcare".

Keywords Internet + Healthcare; Medical resource allocation; Data security; Policy support; Personalized healthcare

壮族三月三节文化与高校英语教学的融合探析

许远鹏¹ 李祝杏¹ 韦庆源¹

(1.广西科技师范学院, 广西 来宾 546199)

摘要:在全球化背景下,文化多元共生与交流融合意义重大。“壮族三月三节文化”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瑰宝,以其独特性展现壮族人民智慧与文化魅力。将其融入高校英语教学,是对文化传承创新与地方高校文化育人模式的探索。从剖析壮族三月三节文化的内涵着手,探寻该文化与高校英语教学融合的意义、作用与创新点。在此基础上,提出结合壮族地域特色、强化文化渗透力度、开展多元文化活动以及拓展教学辐射范围等融合举措,力求提升壮族三月三节文化与高校英语教学的融合成效。在增强学生英语学习能力的同时,进一步深化学生的文化认知、提升学生的文化素养。

关键词:壮族三月三节文化; 高校英语; 融合

基金项目:教育部产学合作协同育人项目“教育信息化背景下的高校英语实践体系的构建”(项目编号:231101381140608)

DOI: doi.org/10.70693/rwsk.v1i5.959

在全球化浪潮汹涌澎湃的当下,文化的多元共生与交流融合已成为驱动社会进步与文明跃升的关键力量。中华民族凭借源远流长的历史和绚丽多彩的文化,孕育出博大精深的思想体系与独具魅力的人文精神,不仅铸就了中华民族别具一格的精神气质,更为世界文化的百花园增添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壮族三月三节文化”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宝库中一颗熠熠生辉的瑰宝,以其起源的悠远性、传承的连贯性以及内涵的丰富性,生动展现了壮族人民在长期的生产生活实践中所创造的智慧结晶与文化瑰宝。因此,将“壮族三月三节文化”融入高校英语教学,不仅是对文化传承与创新理念的生动践行,更是对地方高校文化育人模式的大胆探索与积极尝试。

一、壮族三月三节文化概述

壮族三月三节,又称歌圩节、歌婆节或歌仙节,是壮族祭祀祖先、倚歌择配的传统节日,其名称源于农历三月初三这一特定日期。作为壮族地区极具代表性的重要节日,它不仅是壮族人民在长期生产生活中形成的智慧结晶,更是中华民族多元文化宝库中一颗璀璨的明珠,承载着壮族深厚的历史底蕴与丰富的文化内涵。^[1]壮族三月三节文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独具特色且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宛如一条无形的纽带,紧密连接着壮族人民的历史与现实,承载着壮族人民世代代的记忆与情感。这一文化以其独特的民族风情和地域特色,形成了包括祭祀文化、歌圩文化、服饰文化、饮食文化、体育竞技文化等在内的多元文化体系。祭祀文化体现了壮族人民对祖先的崇敬与感恩之情,通过庄重的仪式祈求祖先保佑家族平安、风调雨顺;歌圩文化则是青年男女以歌传情、以歌择偶的重要平台,他们用歌声表达爱意、倾诉心声,展现了壮族人民浪漫而热情的性格;服饰文化绚丽多彩,壮族服饰上的精美图案和独特款式,蕴含着壮族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饮食文化丰富多样,五色糯米饭、艾糍粑等传统美食,不仅味道鲜美,更承载着壮族人民对生活的热爱和对传统文化的传承;体育竞技文化如抛绣球、打陀螺等,既具有娱乐性,又能增强体质,体现了壮族人民积极向上的生活态度。这些文化元素相互交融、相互映衬,共同构成了壮族三月三节文化丰富而独特的内涵。壮族三月三节文化之所以魅力无穷且影响深远,在于它不仅仅是一种外在的文化表现形式,更是一种内在精神的传承与延续。它既体现在精美的壮族

作者简介:许远鹏(1996—),男,硕士,研究方向为教育学;
李祝杏(1996—),女,硕士,研究方向为教育学;
韦庆源(1970—),男,讲师,研究方向为英语教育。

通讯作者:韦庆源

服饰、独特的传统建筑等物质文化遗产上,更深刻地融入了壮族人民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从田间地头的劳作到节日庆典的热闹场景,从口口相传的古老传说到悠扬动听的山歌民谣,壮族三月三节文化以一种潜移默化的方式滋养着壮族人民的心灵。

壮族三月三节文化中的各个文化元素并非孤立存在,而是相互依存、相互促进,共同构建了一个和谐统一的文化生态系统。它是集历史性、地域性、民族性于一体的综合性文化体系,既反映了壮族人民在不同历史时期的生活状态和精神风貌,又体现了壮族地区独特的自然环境和人文特色。在新时代背景下,深入挖掘和传承壮族三月三节文化的精髓,对于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增强民族文化自信、推动民族文化交流与融合、促进社会和谐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而将壮族三月三节文化与高校英语教学相融合,不仅能够为英语教学注入新的活力,还能让更多的人了解和认识这一独特的民族文化,实现文化传承与语言教学的双赢。

二、壮族三月三节文化与高校英语教学的融合意义与作用

首先,将壮族三月三节文化融入高校英语教学,意味着教学内容的极大丰富与拓展。通过向学生介绍壮族三月三节的历史渊源、传统习俗(如唱山歌、抛绣球、打陀螺等)、特色美食(如五色糯米饭、艾糍粑等)以及背后蕴含的动人传说等多元信息,学生能够在学习英语语言的同时,深入领略中华文化的多元性和丰富性。这种文化对比教学模式不仅极大地增加了课程的趣味性和吸引力,还能帮助学生构建起更为全面、立体的文化认知框架,使学生能够在更广阔的视野下审视和理解不同文化之间的差异与共性。壮族三月三节文化承载着壮族人民的精神寄托和价值追求,在高校英语教学中融入这一文化,有助于学生深刻感受到中华文化的独特魅力和深厚底蕴,从而增强学生的文化自信和民族自豪感。当学生用英语讲述壮族三月三节的故事、传播这一独特的民族文化时,他们不仅能熟练掌握英语的表达方式,更能传承和弘扬自己的民族文化,这种强烈的身份认同感和责任感将激励学生更加积极主动地投身于英语学习和文化交流之中。

其次,将壮族三月三节文化融入高校英语教学,还有助于学生更好地理解和尊重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的思维方式和行为习惯。通过对比和分析壮族三月三节文化与英语国家文化的异同点,学生能够培养更加开放和包容的文化心态。例如,在壮族三月三节期间,人们通过唱山歌来表达情感、交流思想,而在英语文化中,人们可能更倾向于直接的言语表达。通过这样的对比,学生能够更加敏锐地察觉到不同文化之间的差异,从而在跨文化交流中更加得心应手,避免因文化差异而产生的误解和冲突。这种跨文化交流能力的培养,将为学生的未来发展提供更广阔的空间,促进他们国际视野的拓展和综合素质的提升。

三、壮族三月三节文化与高校英语教学融合的创新点

(一) 文化沉浸式教学营造节日体验新场景

为了将壮族三月三节文化深度融入高校英语教学,高校英语教师可创新采用“文化沉浸式教学”模式,围绕壮族三月三节文化精心设计一系列独具特色的英语情境模拟活动,让学生以跨越时空对话的方式亲身感受这一节日的独特魅力,实现语言技能提升与文化传承的有机统一。

在教学中,教师要深度还原壮族三月三节期间的热闹场景,从热闹非凡的歌圩现场到温馨祥和的家庭聚会,从精彩绝伦的民俗表演到香气四溢的美食摊位,每一处细节都经过精心考量,力求让学生仿佛置身于壮族三月三节的欢乐氛围之中。通过实景搭建或多媒体展示等手段,为学生营造出身临其境的学习氛围,使学生在视觉、听觉乃至嗅觉上全方位感受壮族三月三节文化的魅力。^[2]

在情境模拟中,学生不再是被动的旁观者,而是积极的参与者。学生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选择扮演不同的角色,如热情好客的主人、能歌善舞的歌手、技艺精湛的工匠等,用英语进行交流与互动。这种角色扮演的方式能够极大地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and 创造力,使学生在模拟的情境中自然而然地运用英语,同时也加深了对壮族三月三节文化内涵、历史渊源、风俗习惯等方面的理解。例如,在模拟歌圩对歌的场景中,学生可以用英语表达山歌的歌词,体验壮族青年男女以歌择偶的浪漫情怀;在模拟美食制作的场景中,学生可以学习用英语介绍五色糯米饭、艾糍粑等特色美食的制作方法和文化寓意。

(二) 数字化赋能教学开创文化传播新范式

数字化教育转型是当前教育改革的重要趋势之一,高校与教师应积极响应国家关于推进教育数字化的战略部署,创造性地搭建“壮族三月三节文化英语数字融合平台”。这一平台不仅是高校英语教学的一次创新尝试,更是壮族三月三节文化国际传播的新载体,通过深度融合自媒体与在线教育技术,能够打造集学习、交流、传播于一体的综合性数字生态,让壮族三月三节文化的独特魅力跨越时空界限,以英语为纽带,传播到世界各地。

平台的核心竞争力在于内容的创新与融合。教师需要组建一支由语言学专家、民族文化学者和教育技术专家

组成的跨学科团队,共同策划并制作一系列高质量的壮族三月三节文化英语教学资源,从生动有趣的短视频到深入浅出的音频课程,从互动性强的在线问答到沉浸式的虚拟展览,力求全面、精准地展现壮族三月三节文化的精髓,同时以国际化的视角和英语的表达方式,让学生轻松理解和欣赏这一文化的独特魅力,提升他们的英语学习和跨文化交流能力。[3]

数字化融合平台能够实现壮族三月三节文化与高校英语教学的深度融合,为壮族三月三节文化的国际传播开辟了新的途径。通过英语这一国际通用语言,让壮族三月三节文化的独特魅力和深厚底蕴得以跨越地域和文化的界限,吸引更多国内外学生的关注和兴趣,促进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与互鉴,提升我国文化的软实力和国际影响力。例如,平台可以推出“壮族三月三节文化英语短视频大赛”,鼓励学生用英语创作短视频,展示壮族三月三节的精彩瞬间和文化特色,并通过社交媒体进行传播,扩大壮族三月三节文化的国际影响力。

四、壮族三月三节文化与高校英语教学的融合方法与措施

(一) 结合节日特色,彰显文化融合成效

在高校英语教学中融入壮族三月三节文化这一极具特色的民族文化资源,不仅能够极大地丰富教学内容、提升学生的学习兴趣,还能有效促进学生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认知与传承,培养其跨文化交际能力。教师在备课过程中,应深入挖掘现有高校英语教材中的文化空白点或可拓展之处,巧妙地将壮族三月三节文化元素融入其中,通过对比不同民族文化的异同,引导学生思考全球化背景下文化多样性的重要意义,以及如何在跨文化交际中保持文化自信与尊重他国文化。[4]

例如,在教授有关节日庆典方面的英语知识时,教师可以组织学生进行“壮族三月三节庆典体验”的模拟活动。学生需提前准备关于壮族三月三节的历史渊源、传统习俗(如唱山歌、抛绣球、打陀螺等)、特色美食(如五色糯米饭、艾糍粑等)的英文介绍材料,并在课堂上扮演不同角色进行模拟展示和互动问答。这样的教学方式不仅能锻炼学生的英语口语表达能力,还能让学生在亲身体验中感受壮族三月三节文化的独特魅力,增强文化自信。在教学导入阶段,教师需从壮族三月三节的特色出发,以一段精彩的壮族三月三节庆典视频作为开场,引发学生的兴趣和好奇心。随后简要介绍活动目的和规则,强调语言运用和文化传播的重要性。然后以小组为单位组织学生身着壮族传统服饰,用流利的英语向其他学生介绍壮族三月三节的风俗习惯。在每个小组的展示过程中,教师和其他学生作为听众可以就介绍内容提出相关问题,如“What's the significance of singing folk songs during the festival?”“How do people make the colorful glutinous rice?”等,介绍者需迅速反应并用英语进行解答。这样既能展现学生的应变能力和语言组织能力,也能在交流中增强文化认知。

将壮族三月三节的特色与英语教学进行结合,既是彰显文化融合成效的有效方法,也是丰富英语教学设计的重要途径。高校英语教师要不断挖掘教材中的文化渗透点,并设计具有互动性和趣味性的英语交流活动,这样才能更好地锻炼学生的英语理解能力与表达能力,让学生在接受文化熏陶的同时也能增强自身英语学习能力。

(二) 注重文化渗透,探寻英语结合方法

文化渗透对于培养学生的文化素养与认知能力有着不可忽视的积极作用。因此,高校英语教师在开展教学活动时,应积极探寻壮族三月三节文化与英语练习的有效结合方法,让学生在文化的熏陶中锻炼英语交流和表达能力,增强多元文化理解与应用能力。

例如,教师可以组织学生开展以“壮族三月三节”为主题的英文故事演讲或短剧表演。学生需用英语讲述或演绎壮族三月三节期间的经典故事、民间传说或传统习俗。比如,讲述壮族青年男女通过对歌相识相恋的浪漫故事,展现三月三歌圩的独特魅力;演绎壮族人民制作五色糯米饭的传说,体现节日美食背后的文化寓意。此活动不仅能锻炼学生的英语口语表达能力,还能加深学生对壮族三月三节文化的理解与记忆。在活动开始前,教师首先要明确活动主题,并引导学生通过图书馆、网络资源、地方文化资料等途径搜集关于壮族三月三节的经典故事、民间传说、传统习俗等素材。然后让学生根据个人兴趣与特长自由组合成小组,每组4-6人。小组内部要分工明确,包括编剧、导演、演员和道具制作等角色。教师鼓励学生发挥创意,将搜集到的素材改编成适合英文演讲或短剧表演的形式。在活动进行的过程中,各小组要依次上台进行英文故事演讲。内容围绕壮族三月三节文化的某个方面展开,如将壮族三月三节对歌的习俗改编成一段关于爱情与勇气的故事,讲述青年男女在歌圩上通过歌声表达情感、追求幸福的过程。在演讲过程中,学生需运用流利的英语、生动的肢体语言和丰富的情感表达将观众带入壮族三月三节的文化世界。

此外,教师还可以组织“壮族三月三节文化英语海报设计大赛”。让学生以小组为单位,用英语文案和精美的画面设计海报,展示壮族三月三节的特色。在设计过程中,学生需要深入了解节日文化,用英语准确表达海报的主题和内容。这不仅能提高学生的英语写作能力,还能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和艺术审美能力。同时,开展“壮

族三月三节文化英语线上分享会”也是一种有效的融合方式。利用网络平台,让学生分享自己在了解壮族三月三节文化过程中的收获和感悟,用英语介绍节日的美食、音乐、舞蹈等元素。其他学生可以提问、交流,形成良好的互动氛围。通过这种方式,拓宽学生的文化视野,提高学生的英语表达能力和跨文化交流能力。

(三) 开展文化活动, 增强融合实践应用

为了进一步增强壮族三月三节文化在高校英语教学中的融合渗透效果, 高校英语教师需设计开展多种文化交流与演示活动, 让壮族三月三节文化与英语知识进行充分结合。这样不仅能凸显壮族三月三节文化的教育引导作用, 也能让学生在英语实践锻炼中提升综合学习能力, 并加强对英语知识的学习印象。

例如, 英语教师可深入分析英语教材中与传统文化和跨文化交际相关的章节, 筛选出与“壮族三月三节文化”相契合的内容作为活动的基础框架。邀请壮族文化专家、民间艺人或研究学者来校进行专题讲座, 通过生动的讲述、实物展示(如五色糯米饭、绣球等)和互动问答, 让学生近距离感受壮族三月三节文化的魅力, 激发学生的学习与探索兴趣。教师可引导学生根据个人兴趣和特长自由组合成小组, 每组选定一个与“壮族三月三节文化”相关的主题进行文创制作。比如选择以壮族传统服饰的图案为原型进行现代设计, 或者专注于壮族三月三节歌舞元素的文创产品开发。在教师的指导下, 各小组要自主构思设计方案, 用英语撰写设计思路报告, 明确阐述创作灵感来源、设计目标和预期效果。同时, 学生还需用英语记录材料选择的过程, 包括材料的名称、来源、特性以及为何选择这些材料来体现壮族三月三节文化的特色。

为了确保活动的英语实践效果, 教师还需设定全英文交流环境。在展示讲解环节, 让学生用英语向众人介绍自己的文创作品, 包括设计思路、制作过程、壮族三月三节文化元素的体现以及个人感悟等。教师和其他学生作为观众认真聆听并适时提问, 形成良好的互动氛围。例如, 当学生介绍以壮族歌舞为元素的文创摆件时, 其他学生可以问“*How does this handicraft reflect the characteristics of Zhuang's singing and dancing culture?*”(这个手工艺品是如何体现壮族歌舞文化特色的?)介绍者需用英语进行清晰、准确的回答。展示讲解结束后, 教师可组织评审团对文创作品和展示讲解进行综合评价, 从创意性、制作质量、英语表达、跨文化理解等多个维度进行打分和点评。评审团可以由英语教师、文化专家和学生代表组成, 确保评价的全面性和公正性。对于表现优秀的小组和个人, 给予适当的奖励和表彰, 如颁发荣誉证书、提供展示机会等。这样既能提升活动的实践效果, 也有利于提高学生的英语学习自信, 促进学生全面学习成长。

此外, 还可以开展“壮族三月三节文化英语主题摄影展”。让学生用镜头捕捉壮族三月三节期间的精彩瞬间, 如热闹的歌圩现场、精美的传统服饰、独特的民俗活动等, 并为每张照片配上英文说明。通过摄影展, 不仅能让学生更深入地了解壮族三月三节文化, 还能锻炼他们的英语写作能力和审美能力。同时, 组织学生进行英文讲解, 向其他师生介绍照片背后的故事和文化内涵, 进一步增强英语实践应用能力。

(四) 拓展教学范围, 发挥文化融合作用

壮族三月三节文化与高校英语的融合是教学创新的重要举措。高校英语教师在教学过程中不仅要创新教学方法, 更要拓展文化教育氛围, 发挥文化融合的实际教学作用, 让壮族三月三节文化成为与国际文化交流的突破口, 让学生在了解并学习壮族三月三节文化的同时也能增强英语理解与表达能力, 从而实现英语教育培养的根本目的。^[5]例如, 教师可以设计“壮族三月三节文化国际交流”学习项目, 鼓励学生以团队形式, 运用所学英语知识和创意能力制作关于壮族三月三节文化的英文宣传片, 涵盖壮族三月三节文化的多个方面, 如节日起源、传统习俗(对歌、抛绣球、打陀螺等)、特色美食(五色糯米饭、艾糍粑等), 通过生动的画面和流利的英语解说向世界展示壮族三月三节文化的独特魅力。然后教师可利用互联网为学生搭建集学习、交流、展示于一体的线上文化交流平台, 并设置壮族三月三节文化英文资源库、在线课程、交流论坛等板块。在英文资源库中, 上传与壮族三月三节文化相关的英文文章、视频、音频等资料, 方便学生随时随地进行学习和查阅; 在线课程可以邀请文化专家和英语教师共同授课, 深入讲解壮族三月三节文化的内涵和英语表达技巧; 交流论坛则为学生提供了一个交流和分享的平台, 学生可以在这里讨论学习心得、分享创作灵感。在项目末期, 教师可组织学生举办一场盛大的国际文化交流节, 用以展示学生制作的壮族三月三节文化英文宣传片、举办壮族三月三节文化主题英语演讲比赛、艺术展览等活动。教师可邀请国际友人和学生家长参与, 共同感受壮族三月三节文化的独特韵味和英语的魅力。在国际文化交流节上, 学生用英语向国际友人介绍壮族三月三节文化, 回答他们的问题, 进行深入的文化交流。通过设置国际性文化交流实践活动, 不仅能增强壮族三月三节文化在高校英语中的融合效果, 也能合理拓展英语教学的范围, 让英语学习更加互动化与国际化。

五、结语

壮族三月三节文化具有显著的地域文化特点, 将壮族三月三节文化巧妙地融入高校英语能有效地激发学生的

英语学习与探索兴趣,也让英语课堂更加具有文化内涵和趣味体验。能够让学生在文化熏陶下增强自身文化内涵,同时也能锻炼自身英语表达能力与理解能力。壮族三月三节文化与高校英语的融合既是文化间的相互碰撞,也是拓展学生文化视野与国际思维的有效教育方式。因此,教师要深入挖掘壮族三月三节文化与高校英语的融合创新点,并根据学生能力兴趣开展多样性教学实践活动,从而进一步提升高校英语教学质量,发挥壮族三月三节文化的教育渗透作用。

参考文献:

- [1]陈晓钰.重构传统是壮族“三月三”品牌打造的最佳选择[N].南宁日报,2016-04-14(009).
- [2]彭佩兰.高校英语教学中跨文化意识的培养——评《跨文化视域下高校英语教学转型与创新》[J].中国教育学刊, 2024(7):150.
- [3]郭欣.多元文化视域下的大学英语教学改革研究[J].中国多媒体与网络教学学报(上旬刊), 2023(2):90.
- [4]李梦锐.文化育人视域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高校英语课程教学路径探究[J].海外英语, 2024(10):96-98.
- [5]汤继.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高校英语教学的路径研究[J].学周刊, 2024(19):41-44.

Exploring the Integration of the Culture of the March 3 Festival of the Zhuang People and English Teaching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Xu Yuanpeng¹, Li Zhuxing¹ Wei Qingyuan¹

¹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Guangxi

Abstract: In the context of globalization, the symbiosis of cultural diversity and exchange and integration are of great significance. As a treasure of Chinese outstanding traditional culture, “March 3 Festival of the Zhuang People” shows the wisdom and cultural charm of the Zhuang people with its uniqueness. Integrating it into English teaching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is an exploration of cultural inheritance innovation and cultural education mode in local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Starting from analyzing the connotation of the culture of the March 3 Festival of the Zhuang people, we explore the significance, role and innovation of the integration of this culture with English teaching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On this basis, the integration measures of combining Zhuang regional characteristics, strengthening cultural penetration, carrying out diversified cultural activities, and expanding the scope of teaching radiation are proposed in order to enhance the effectiveness of the integration of the culture of the Third of March Festival of the Zhuang Nationality and English teaching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While enhancing students' English learning ability, it further deepens students' cultural cognition and improves their cultural literacy.

Keywords: Zhuang March 3 Festival Culture; College English; Integration

在主体与客体之间：《静安庄》的通感隐喻及其建筑

钱亮帆^{1*} 魏美如^{1*}

(¹ 云南大学, 云南 昆明 650000)

摘要: 翟永明的长诗《静安庄》以通感与通感隐喻为核心手法, 展现了诗人独特的感知方式与认知图式。诗中通过“复合通感”将多种感官体验交织, 形成“粗暴”的感官混淆, 既扩展了诗歌张力, 也隐喻了现实世界的复杂状态。感官描写涵盖听觉、视觉、触觉等, 主体隐去的同时, 知觉却蔓延至客体, 形成“他者的知觉”, 构建出主客体互通的诗意空间。通感手法不仅作为修辞技巧, 更成为认知机制与氛围营造方式, 通过“特征转移”“情动生成”“知觉跳跃”等规则, 赋予语言以建筑性。诗中的“静安庄”既是地理空间, 也是福柯笔下的“异托邦”, 通过通感颠覆现实, 在语言的混乱中重构充满矛盾与张力的世界。最终, 通感隐喻成为连接现实与诗性世界的桥梁, 呈现女性主体在隐退中感知并重塑现实的独特力量。

关键词: 《静安庄》; 主体; 客体; 通感隐喻; “异托邦”建筑

DOI: doi.org/10.70693/rwsk.v1i5.974

《静安庄》是翟永明于1985年所作长诗, 在这首诗中展现出了作为“女性诗人”的慎思与在《黑房间》和《死亡的图案》中渗透出的“黑夜意识”。在《静安庄》的技术手段中, 很突出的一项是她的通感与通感隐喻。钱钟书认为通感是“感觉移借^[1]”, 汪少华则认为是“是指我们在思考或交流时用属于乙感官范畴的事物印象去表达属于甲感官范畴的事物印象^[2]”也就是将各种感官的边界打通。《静安庄》中则存在“复合通感”的特性, 很多语句不止存在甲感官向乙感官的位移, 甚至符合了甲乙丙丁多个感官, 并将感受复合地揉在一起, 从表面上看起来甚至是“粗暴”的感官混淆。

翟永明的诗歌技术性是很强的, 且这种技术性是和她的诗歌内容结合在一起。而在《静安庄》中, 广泛的感官知觉构成了诗歌的基础, 而在广泛的知觉之下, “通感”的手法扩张着诗歌画面的张力, 成为她的诗歌技术手段的方式。另外, 通感指向的是一种隐喻方式, 莱考夫指出是“概念隐喻理论”^[3], 也就是隐喻不仅作为一种词义的引申方式, 更多的是认知机制。换句话说, 构成的是“通感隐喻”的意义能指方式, 通过通感的手法试图进入到作为“女性诗人”的认知图式, 也通过通感呈现出现实世界的状态, 尤其是试图从现实的单薄推向语言的复杂。当然, 《静安庄》的题目是由于诗人在70年代于成都静安大队插队时的经历绘成, “静安庄”似乎与“静安大队”是地名的巧合, 但“静”与“安”的氛围深入到了诗歌的书写中。而通向那种“静”与“安”的世界的路径, 则是通过“通感”这一手法展开, 波默在《气氛美学》中提到: “(通感)并不是要创作作品, 而是要营造场景, 就是说, 要营造一种某出戏剧在其中上演的气氛情调之空间。”^[4]同时又认为通感是对“情态间(Intermodal)特质或感官特质的情感效果。”^[4]也就是说, “静安庄”在这个层面上来说正是依靠通感构筑起来的。故而, 《静安庄》的通感修辞是有三个层面, 一是一种技术的提升; 二是一种隐喻的路径; 三是一种氛围的建筑方式。

一、主体的感官混淆

《静安庄》有大量的直接感官描写, 包括“听、视、嗅、味、触”五种感官, 其中最核心的是听觉与视觉。听觉方面, 有“我来到这里, 听见双鱼星的嗥叫/又听见敏感的夜抖动不已”^[5]“已婚夫妇梦中听见/卯时雨水的声音”^[5]“分娩的声音突然提高”^[5]“像一个老人失去深度/喊声来自天空/使浑身发凉”等, 指向的是一种“空间性在场”^[4]; 视觉方面, 有“它的眼在夜里升上头顶/令人目眩”^[5]“猛然看见天空呈现错乱色彩/周身布满被撕裂的痛楚”^[5]“我看见婚礼的形象/在生命的中心, 孤独微笑”^[5]等。触觉有“水是活的, 我触摸, 感觉欲望上升”

作者简介: 钱亮帆 (2004-), 男, 云南大学文学院学生, 研究方向为比较诗学;

魏美如 (2005-), 女, 云南大学文学院学生, 研究方向为明清文学及文论;

*本文两位作者为共同第一作者。

[5], 嗅觉有“向日葵发出氤氲的臭味”[5], 味觉有“我的脸无动于衷, 使天空倾斜, 使静安庄/具备一种寒冷的味道。不动”[5]。其实感官认知是认识世界的重要方式, 而诗歌中大规模地出现感官表达, 也正是诗人在试图认识现实世界, 然后通过语言来表达自我世界的一种方式。但这样的写法引申出一个问题, 也就是主客体何以成立的问题, 如果认知客体的感官成为一种书写的方式, 那客体何以客观地表现出来, 且主体何以表现内心的认知而非沦落为客体的“行车记录仪”。

阿多诺在《主体与客体》中早已警示, 主客体关系绝非静态的二元对立, 而是通过实践不断重构的辩证过程, (主客体)“彼此不存在支配关系的但又存在各自介入的区别状态。”[6]在翟永明的叙述中, 试图通过某个“建筑”达成主体的隐去, 《静安庄》中表现为永远“十九岁”的身份凝固, “我十九, 一无所知, 本质上仅仅是女人”[5], 这种“年少”“无知”与她的“女人”的生理身份与社会身份是联结在一起的, 正如她在早期写作的《你是一个迷途的女人》一般, “一个迷途的女人/生来就是如此, 生来就/合体、相称、无依无靠/厌倦了生活你是”[7], 迷途意味着不知道方向, 也就毋宁提人的行动, 年幼、无知的女人, 正是“迷途”的状态, 而“迷途”的状态展现出的是隐去个体, 或着说个体被迫隐去的无奈。翟永明同样在《个人女性观》提到: “从女性视角望出去, 我想关注的却是人类普遍面临的问题”[5], 所以说, 当个体的声音消失, 在一个集体的环境内也“静安”了起来。换句话说, 《静安庄》展现客体的方式就是隐去主体。

而《静安庄》表现主体的方式, 使得诗歌不沦为简单的意象堆叠体, 就在于“通感”的使用。在我看来, 翟永明的通感在技术上达成了两个层面的效果, 一个是语言的内在层, 实现了能指意义的聚合, 成为了某种“诗性”的语言; 另一层则是连接好了语言与现实世界, 也就是将“感觉”的概念蔓延出去, 实现主体与客体在一定程度上的互通, 这实际上也是她自己提到的“诗歌的建筑”。

具体而言, 《静安庄》的通感手法呈现出单纯通感与复合通感两种情况, 单纯通感就是只有两种感官参与, 而符合通感有复杂的感官意象, 也就是不止一种感官的复杂作用。首先可以列举翟永明的单纯的通感, 在这此诗中占据的是少数, 如“从早到午, 走遍整个村庄/我的脚 听从地下的声音/让我到达沉默的深度”[5], 这里是将我的脚与大地的触觉通为听觉, 将大地震动的触感幻化为地下的声音; 又如“猛然看见天空呈现错乱色彩/周身布满被撕裂的痛楚”[5], 痛楚是一种身体感受, 也就是触觉, 而承接地却是“猛然看见”, 将触觉转化为了听觉。

同时, 有趣的现象就在于, 翟永明将这种痛楚或大地的声音赋予到的是“周身”, 准确来说是“天空的周身”或“整个村庄”, 并不实在地发生在主体的身上, 而是处于被主体“观看”的状态。在整个“静安庄”的世界里, 尽管十九岁的我被隐去了, 但最主要的基调是“我”在观看, 有观看人的, “男孩子们在夜里练习杀人”[5]; 也有观察物的, “痛苦的树在一夜间改变模样”[5], 更有观察作为整体的世界的, 尤其是随着年月的增长而不断流转的世界, “傍晚清凉热烈的消息, 强奸于正午发生, /如同一次地震, 太阳在最后时刻松弛, /祈祷布满村庄, 抬起的头因苦难而肿胀”[5], 这里有重要的时间尺度, 也就是“傍晚”到“正午”的逆向行进。从宏观的布局来说, 每一节的标题是每个月份; 而从细节上来说, 每一节内部又有这个季节应有的物候, 还有落实到每一天的感受之中。也就是说, 哪怕此刻的主体是被遮蔽的, 是被隐去的, 但是主体仍然有知觉去进行感受, 并且通过感官的书写将这种感受给书写出来。不仅如此, 主体的感受还蔓延到主体之外的境界, 也就是“周身”, 将主体的想象放置在客体的生存状况中, 尽管这种客体是依据着主体的认知而构筑的。但是, 试图隐去主体的痕迹, 以及已经隐去主体在“静安庄”的一切行动, 这无疑使得诗歌呈现出更丰富的张力。

故而, 纯粹的通感, 似乎也不止是局限在主体的感知内部中, 更多程度上也指向的是客体世界, 换句话说, 这里的通感呈现出大通感的状态, 也就是前述的第二层, 将主体的感知与客体的感知结合起来, 也就是一种“他者的知觉”状态的蔓延。在《第十月》里有一段:

陌生人走向夜间出现的亡灵
死亡的种子在第十月长出生命
无声无息, 骨头般枯竭的脸
我是怎样散发天真气息? 但朝向我的
是怎样无动于衷的眼睛?
在我诞生之前就注视这个村庄[5]

这里也提到了“看”与“被看”的关系。“陌生人”与“亡灵”的相遇形成第一重凝视, 活人的脚步主动走向死亡的领域; 而“死亡的种子”在十月孕育生命, 则暗示死亡本身也在窥视着生机。“散发天真气息”的“我”本是观看主体, 却猝然发现被“无动于衷的眼睛”所注视。末句“在我诞生之前就注视”将这种凝视永恒化, “静

安庄”如同被死亡预装的监控镜头，生者始终是被死亡凝视的客体。段从学认为：“现代人的问题，就在于忽略了让个人成为个人的‘看’与‘被看’的世界结构，认定个人乃‘世界之外’的天启式存在，反过来牢牢抓住虚幻的‘个人’，这个事实并不存在的幻象来对抗事实性的‘现实世界’，从而陷入了‘被看’，被充满了敌意的外部世界所包围的恐惧之中。”^[8]在这里的叙述显然是从看的状态反而掉入了被看的恐惧与挣扎之中；换句话说，是从由个体延申到世界的叙述，让渡到了个体的幻灭在世界的状态下“非存在”的状态。

对于主体来说，客体世界是他者，而“静安庄”展现出的是一个缄默的主体在对客体进行一些叙述，这些叙述是具备着“不能之能”的属性，韩炳哲将这解释为：“即使主体所有的需求都得到了满足，它仍然追寻他者。需求是针对自己的。渴望的轨道却在自身之外。自身的重力将‘我’深深拉进自身，‘渴望’被从这种重力中解放出来。”^[9]何况在“静安庄”的世界里，作为一个迷途的女人，是没有必要也没有能力实现将“我”与“周身”的统一性，相反，那是时时刻刻都无法实现自我意志与自我行动的独立的状态，也就是一种被外部世界所包围的实质的恐惧。但是，在这种状况之下存在着一种对外在的“渴求”，也就是通过情感力量试图实现的，从自我让渡到他者的，实现真正走进一个外在的，把主体意志放开的世界里去。而这种“渴求”，正是以这种“大通感”的手法来实现的，换句话说，正是主体感知的延申，使得客观的物充斥着被解释的意义，这也为建构那个虚拟的外在世界提供了一个通过路径。

复合通感则是更加含混，也更加倾向于阿多诺所述的“各自介入的区别状态^[6]”，在这个状态下，显然还是主体的“看”占据了最主要的部分，或者说主体的“感知”占据了最主要部分，但是其中糅杂的复杂的感官现象，则是翟永明试图从不同的状态突破到同一个现实世界的他者领域，也是尝试对复杂的世界的反身。在《第一月》中有这样一节：

第一次来我就赶上漆黑的日子
到处都有脸型相像的小径
凉风吹得我苍白寂寞
玉米地在这种时刻精神抖擞
我来到这里，听见双鱼星的噪叫
又听见敏感的夜抖动不已^[5]

“脸型相像的小径”将客体的路通感在视觉体验上，“凉风吹得我苍白寂寞”则让触觉浸染了色彩的寒意，玉米地的“精神抖擞”赋予植物以人的生命感，而“双鱼星的噪叫”将星象幻听为兽鸣，都是将客体转化为听觉或视觉感官，最末“敏感的夜抖动不已”将整个场景收束为一种神经质般的听觉震颤，将客体的世界转变为一个可触、可听、甚至具有情绪的生命体。可以发现，通感手法不仅是修辞技术的突破，更是一种认知方式，通过通感，诗人让被压抑的女性主体在隐退中仍能感知世界，并在语言的复杂织体中重构现实，乃至在许多诗行，实现了主体的人与客体的世界的一种二元连接，以至于不分你我，尤其体现在复合通感的段落。换句话说，通感不仅是诗人主观的感受的位移，更是对客体世界的隐喻，是将客体视作他者后，将知觉蔓延至客体的身上，以生产出更具“诗性”和张力的文本内容。

二、建筑规则与词语的秩序

而翟永明在“通感”的建筑过程中有着一定的建筑规则，这些规则也就是词语的秩序，换句话说，翟永明的通感不是将感官的话题与述题简单地位移即可，而是由于客体的感官性的融入而变得更为复杂，我认为她在感官书写的建筑规则中有“特征转移”“情动生成”“知觉跳跃”三种方式。其中前两种是有迹可循，我们日常生活中可以成为语汇，前者是基础的状态，后者则是主客体知觉蔓延的常见状态；最后一种则是无逻辑式的感性表达，是具备着语言的跃迁性，且意境突破了常规的通感的性质。

“特征转移”是通感的基础，也就是将甲感官的特征转移到乙感官的特征上，但是在使用过程种，则往往会忽略甲感官的本身的语境。但翟永明则试图将许多感官原本的状态放置到同一个场景内，例如在《第四月》里有：

四月是最残忍的一个月
他们擅长微笑
他们有如此透明的凶器
燕子带着年复一年的怪味

落满正方形的院子，丁香就在门前喧嚷^[5]

其中，“燕子的怪味”让归燕的视觉形象裹挟着陈年腐朽的嗅觉记忆；“丁香喧嚷”则赋予花香以听觉的嘈杂感。关键点在于“怪味”似乎可以形容丁香，“喧嚷”似乎也可以形容燕子，将两种感官直接地进行错位，则有种否定四月的自然属性的倾向，当然，也就与艾略特的“四月是一个残忍的月份^[10]”联结在了一起，呈现出一种冷漠地暴力性，尤其是将错乱的感官放置在“正方形院子”这个规整而压抑的空间里，完成对“残忍”的立体建构。

“情动生成”则是在《静安庄》中最常见的一类。“情动”是发轫于德勒兹的理论，“情动”是指：“我们会在身体和身体之间(人类的、非人的、身体部分的,以及其他)传递的强度中,在循环于身体和世界周围、循环于身体与世界之间,或者粘附在身体和世界之上的回响中找到情动。”^[11]也就是将情感视为在人类与非人类、有机与无机存在之间流动的能量。它强调情动是具身的(embodied)、关系性的,并通过身体与环境的持续互动而不断生成。通感修辞可以被视为情动在语言艺术中的表现方式,而情动理论则为通感现象提供了更深层的哲学和心理学术解释。而在《静安庄》中核心呈现的便是由主体到主体之外的情感动向,并且通过知觉引导的情感式方式生成。同样是在《第四月》有一段:

我的脸无动于衷,使天空倾斜,使静安庄
具备一种寒冷的味道。不动
但一生被废墟的平静破坏头
向刻满印褶的石页生长并裂开^[5]

“使天空倾斜,使静安庄具备一种寒冷的味道”,这里通过主体的“无动于衷”以及一个“使”,引发了一系列外在景象的变化,天空的倾斜、静安庄的寒冷味道,这种从主体到主体之外的情感动向,正是情动理论所强调的情感在身体与世界之间的传递与回响。诗人将自身的情感体验具象化为身体的“不动”与“生长裂开”,并通过与“废墟”“石页”等元素的互动,展现出情感在身体内部的涌动以及与周围环境的相互影响。

“知觉跳跃”则是翟永明诗歌中最难把握的一项。实际上,“跳跃”早在陈望道的《修辞学发凡》中已有提及,他认为“跳脱”是一种修辞手法,是“语言因为特殊的情境,例如心思的急转,事象的突出等等,有时半路断了语路的,名叫跳脱。”^[12]当然,几乎所有的诗歌都具备跳脱的特性,包括陈望道所说的“急收、突转、岔开”三种形式。但是跳脱只是形式上的表现,而我们如果关注具体的跳脱的内容,那就会呈现出千奇百怪的样貌。《静安庄》的跳脱很大程度上实在知觉层面,换句话说,在感官的转换上呈现出无逻辑的倾向,同样对于感官的转移也具备着这一特征。例如在《第十二月》这么写到:

始终在这个鸦雀无声的村庄,耳听此时出生的
古老喉音,肋骨隐隐作痛
一度可接近的时间 为我
打开黑夜的大门,女孩子站在暮色里^[5]

这节里关涉到“听觉”“痛感(触觉)”“视觉”三个感官形式,并且三者之间看起来是没有联系的,是忽然地跳跃。但在跳跃中又有着整体的凝固,尤其是“女孩子”的身影在暮色中显得朦胧而模糊,她的存在既可能是情感的触发点,也可能是情感的寄托对象,她的静默与村庄的寂静相互呼应,进一步强化了诗歌中那种静谧而深沉的情感氛围。

正如上述提到的,在通感的内容方面呈现出“大通感”,在通感的技巧层面呈现出“复合通感”的特征。无疑,这与前述的差等性的通感有着根本性质的不同。这种通感手法实际上是独特的诗歌语言秩序,不仅如此,她的秩序的生成正是来源于“静安庄”的意义本身。如果说主体的身体隐去与感官膨胀为“静安庄”的书写提供了可能性,那么“静安庄”本身的属性则反哺到主体身上,成为其词语构筑必然性的一环。

对于通感隐喻而言,原本是具备着等级性的,一般认为始源域为触觉,目标域为听觉的频率最高,也就是从低级感官触觉向高级感官听觉位移的频次是最高的^[13]。但是,对于翟永明的诗歌而言,感官的触觉不止是在主体身上,更多地偏移到了客体之上,这也就意味着差等性的隐喻分析并不存在很大的价值,这也是本文并未分析各个感官的具体通感路径的原因。在我看来,通感是属于修辞的一部分,而修辞则是语言的一部分,奥斯汀的言语

行为理论强调,语言不仅是描述世界的工具,更是改变世界的实践^[14]。也就是诗人通过诗歌语言,不仅去描述世界,更多地去建筑她的生活世界。叔本华在《作为意志与表象的世界中》强调:“每一真正的、无伪的、直接的意志活动都立即而直接的也就是身体的外现活动^[15]”翟永明的通感实际上指向的正是一种意志活动的身体外现,尽管其中的身体性被隐去,但整个过程正好符合她所说的“建筑”。她说道:“对诗人来说,他的写作一直面对两种现实,一个是现实中的现实,一个是诗歌中的现实。现实中的现实让他观察生活,诗歌中的生活让他与生活保有一定的距离。^[16]”而如何实现从现实中的现实与诗歌中的现实的连接,也就是将沉淀在意识深处的“比较稳定的知觉图示体系^[17]”与现实世界联系起来,也就是段从学所说的:“写诗,因此而不是简单的复制,甚至逃避现实,而是一个以人类共同的‘现实世界’为基础筑造诗性的‘生活世界’,创造个人丰富多彩且不可替代之生命形态的生存论事件。”^[8]在《静安庄》中呈现出一种悬置状态,不仅是身体虽被隐去,但感官却异常活跃的主体悬置,甚至蔓延至村庄、星象、亡灵等非身体领域,乃至建筑起吊诡的现实世界。但这种书写并非对现实的逃避,而是通过知觉的错位与延展,在语言中重构一个更具弹性的“生活世界”。换句话说,就是在词语的秩序里延申出诗人的建筑性。

三、静安庄:诗人的异托邦

福柯曾指出,异托邦是一个与现实世界并存却又截然不同的空间,它是对现实的扭曲、放大或颠倒,是一个既真实又虚幻的场所。他在《词与物》里写道:“异位移植(诸如我们通常在博尔赫斯那里发现的那些异位移植)使言语枯竭,使词停滞于自身,并怀疑语法起源的所有可能性;异位移植揭开了我们的神话,并使我们的语句的抒情性枯燥无味。”^[18]他在论述中反复地提及词法与句法,并认为作为文本的异托邦是扰乱人心的对语言的摧毁,尤其是由对神话的摧毁而质疑语法起源的合理性。实际上,在翟永明的诗歌中呈现出了语言的混乱性,尤其是在表面语法和词汇的被破坏之下,但是,在语言的背后却又引申出感官,且这种感官的书写又是有着一定的建筑规则与建筑性的。

当然,“静安庄”并非一个简单的地理空间,而是一个充满矛盾与张力的异托邦世界,这里指向的是作为社会空间的异托邦。它既是一个被时间遗忘的村庄,又是一个不断流动与变化的时空。但是又如福柯所说:“这实际上并不等于否定时间,而是把握那种称之为时间和历史的方法。”^[19]在这里,时间不再是线性的,而是呈现出一种错乱与循环的状态。同时,在空间方面又是一个充满象征与隐喻的抽象空间。在这里,空间不再是简单的物理存在,而是充满了情感与意义的投射。最为关键的是,“静”与“安”依旧是人的感知,尤其是人对于环境的感知。

翟永明的《静安庄》中,“异托邦”的构建不仅是对现实空间的颠覆,更是主体感知与客体世界在语言中的复杂交融。诗人通过通感隐喻,将“静安庄”这一地理名称升华为一个既真实又虚幻的言语世界,其中主体的感官体验与客体的物理属性被彻底混淆,形成一种独特的诗意空间。这里的“静安”并非单纯的寂静与安宁,而是通过感官的错位与膨胀,将村庄转化为一个充满矛盾与张力的场域。例如,“双鱼星的嗥叫”将星象听觉化,“敏感的夜抖动不已”又将夜晚触觉化,这些通感手法不仅打破了感官的边界,更模糊了主体与客体的分野,使得“静安庄”成为一个知觉蔓延的异质空间。福柯笔下的“异托邦”是对现实的扭曲与重构,而《静安庄》则通过语言的混乱性实现了这一目标。诗人以“他者的知觉”为桥梁,将主体的隐退与客体的显影交织在一起,让村庄成为承载情感与意义的容器。在这个世界里,时间与空间被重新编码,感官的混淆不再是修辞的装饰,而是认知现实的根本方式。最终,“静安庄”作为诗人的异托邦,既是对现实的逃离,也是对语言可能性的探索,它通过通感隐喻在混乱中建立起一种新的秩序,成为连接主体心灵与客体世界的诗意中介。

同样是波默在《气氛美学》里认为:“不言自明的是,第一性的、根本的知觉现象,即气氛,基本上不具有个别感官性的特征。”^[4]换句话说,“静安”作为一种气氛,本质上就是最直接的知觉感受,并在具体的诗作过程中,又通过各种通感与感知书写的方式去刻画这种感受。而产生诗人异托邦的核心在于两方面,一方面是“静安”本身就带有缄默,带有不存在任何感知的基础的概念,意味着不发出声音的没有任何听觉的形式,所以自然也不带有波默的“空间性在场”^[4]的必然性;另一点则是翟永明自身的建筑属性,试图通过某种建筑的手段去构筑“静安庄”,原本来说是无法生成的,但正如“异托邦”的生成一般,在现实的“静安大队”与语言中的“静安庄”里构筑起来充斥着感官与感官膨胀的“异托邦”空间,这种来源于他者的“异托邦”,正通过通感隐喻实现人的颠覆。

参考文献:

- [1] 钱锺书.通感[J].文学评论,1962,(01):13-17.
- [2] 汪少华,徐健.通感与概念隐喻[J].外语学刊,2002,(03):91-94+112.
- [3] Lakoff G, Johnson M. *Metaphors we live by*[M].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8.
- [4] [德]格诺特·波默,贾红雨译.气氛美学[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76,147,84.
- [5] 翟永明.潜水艇的悲伤:翟永明集 1983-2014[M].北京:作家出版社,2015年:31,32,33,41,36,40,35,34,42,36,43,265,38,45,48.
- [6] 上海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外国哲学研究室编.法兰克福学派论著选辑[M].商务印书馆:中国图书书目数据库,1998:210.
- [7] 翟永明.女人[M].桂林:漓江出版社,1984年:55,56.
- [8] 段从学.《乡村茶馆》与翟永明的生存建筑学[J].文艺争鸣,2016,(12):84-98.
- [9] [德]韩炳哲,吴琼译.消失的他者[M].北京:中信集团出版社,2019年:59.
- [10] [英]T·S·艾略特,张焜恒译.《荒原》[M].上海文艺出版社,2020:1.
- [11] 格里高利·塞格沃斯,梅利莎·格雷格,李婷文.情动理论导引[J].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18(04):20-29.
- [12] 陈望道著.修辞学发凡[M].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262.
- [13] Day S. Synaesthesia and synaesthetic metaphors[J]. *Psyche*, 1996(2):32.
- [14] 杨玉成著.奥斯汀:语言现象学与哲学[M].商务印书馆,2002:104.
- [15] [德]叔本华著,石冲白译,杨一之校.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年:151.
- [16] 翟永明.《女儿墙:翟永明散文》[M].厦门:鹭江出版社,2010年:46.
- [17] [挪]诺伯格·舒尔兹著,尹培桐译.存在·空间·建筑[M].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90年:19.
- [18] [法]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著,莫伟民译.词与物[M].上海三联书店,2001:5.
- [19] [美]福柯等著,周宪译.激进的美学锋芒[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19.

Between Subject and Object: Synaesthetic Metaphor and Its Textual Architecture in *Jing'an Zhuang*

Qian Liangfan¹, Wei Meiru¹

¹ Yunnan University, Kunming

Abstract: Zhai Yongming's long poem *Jing'an Zhuang* employs synaesthesia and synaesthetic metaphor as its core devices, revealing the poet's unique perceptual mode and cognitive schema. Through compound synaesthesia, the poem interweaves multisensory experiences (auditory, visual, tactile) to create a "violent" sensory disorientation, which not only amplifies poetic tension but also metaphorizes the complexity of reality. As the poetic subject recedes, perception extends to objects, generating an "other's consciousness" that constructs a lyrical space bridging subject and object. Synaesthesia here transcends mere rhetorical technique; it functions as a cognitive mechanism and atmospheric scaffolding, governed by rules such as trait transference, affective emergence, and perceptual leaps, thereby endowing language with an architectonic quality. The "*Jing'an Zhuang*" in the poem operates both as a geographical locus and a Foucauldian heterotopia, subverting reality through sensory hybridity and reconstructing a contradictory yet dynamic world within linguistic chaos. Ultimately, synaesthetic metaphor serves as a bridge between reality and the poetic realm, manifesting the distinctive power of the female subject to perceive and reshape reality through strategic withdrawal.

Keywords: *Jing'an Zhuang*; Subject; Object; Synaesthetic Metaphor; Heterotopian Architectonics

“两创”背景下客家童谣融入幼儿园课程的路径研究

——基于文化生态学视角

方梦麟¹

(¹广东梅州职业技术学院, 广东 梅州 514000)

摘要: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战略背景下,本研究以文化生态学为理论框架,综合运用文献计量、问卷调查(N=511)、深度访谈(N=18)及参与式观察等混合研究方法,系统剖析梅州客家童谣融入幼儿园课程的现状与路径。研究发现,童谣融入的文化生态位综合得分3.02分(5分制),核心瓶颈表现为教师文化资本不足($\beta=0.48$)、家庭文化惯习缺失($\beta=0.35$)与制度支持薄弱($\beta=0.29$),质性研究进一步揭示语言生态断裂、课程权力博弈等深层矛盾。基于“文化生态系统修复”理论,研究提出物质文化层资源体系建构、制度文化层规则完善、精神文化层认同培育的三维协同路径,为地方传统文化的学前教育转化提供实证参考与方法论启示。

关键词:客家童谣; 幼儿园课程; 文化生态学; 文化生态位; 文化传承与传播

基金项目:2024年梅州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MZSKLX2024006);广东省普通高校青年创新人才项目(2024WQNCX264);2022年福建省中青年课题(JAS22366)

DOI: doi.org/10.70693/rwsk.v1i5.951

引言

近年来,“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成为文化强国建设的核心命题。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深化传统文化与教育融合的战略方向,强调从青少年阶段筑牢文化自信根基。梅州客家童谣作为以方言传唱的“文化记忆体”(房学嘉,2005),蕴含农耕文明、民俗伦理等多元基因。将非遗文化融入幼儿园课程不仅是地域文化传承的实践,更是本土化课程建构的突破。文化生态学将童谣融入视为“文化因子—教育环境—传承主体”的动态系统,涵盖物质文化层(资源)、制度文化层(规则)、精神文化层(认同)的交互作用。本研究引入朱利安·斯图尔德的文化生态系统理论,通过量化数据描摹童谣融入的“生态位”现状,结合质性研究解析主体与环境的交互逻辑,旨在构建科学的传承路径。

1 研究设计:文化生态学视角的混合研究框架

1.1 理论框架与核心概念

梅州客家童谣被界定为以梅州方言为载体的儿童口头传统,兼具农耕记录、民俗表达与族群认同功能。其“代际文化记忆体”属性为课程融入提供理论基石(房学嘉,2005)。以《排排坐》(“排排坐,唱山歌,爷打鼓子涯打锣”)为例,童谣通过生活场景再现强化幼儿对客家饮食文化与集体协作的认知。《月光光》(“月光光,秀才郎,骑白马,过莲塘”)通过月夜意象传递客家崇文重教传统,《菱角子》(“菱角子,角弯弯,大姊嫁在菱角山”)则以植物隐喻家族伦理关系。幼儿园课程的文化传承需实现资源适配(文本转化)、功能适配(领域渗透)与主体适配(家园协同)的三维平衡。幼儿园课程则是童谣实现教育价值的关键场域。在“两创”目标导向下,其文化传承维度不仅要求对童谣文本进行适切性改编,更需在课程目标、内容、实施与评价环节形成完整链条。课程目标需契合幼儿认知发展规律,在语言启蒙、社会认知、艺术审美等领域渗透童谣文化内涵;课程

作者简介:方梦麟(1990—),女,赫哲族,专业主任,讲师,博士,研究方向为职业教育。

内容要完成从原生态童谣到教育素材的筛选与重构；实施过程强调游戏化、情境化教学；评价机制则注重对幼儿文化感知与传承能力的动态评估。

从文化生态学的系统性思维来看，童谣融入幼儿园课程的过程，实质是文化因子（童谣）、教育环境（制度、资源、空间）与传承主体（教师、幼儿、家庭）构成的生态系统持续调适的过程。物质文化层聚焦教材教具开发、数字化资源建设等硬件要素；制度文化层涉及课程标准制定、师资培训体系构建等规则层面；精神文化层则关注教师与幼儿对客家文化的价值认同、情感共鸣与创新传承意愿。三大层面相互作用、彼此影响，任一环节的失衡都可能导致文化生态位的错位，阻碍童谣融入的深度与效度。

1.2 研究方法与数据采集

研究采用混合研究范式：通过 Citespace 分析 2013-2023 年“传统文化+学前教育”领域 1286 篇文献，发现“客家童谣”研究空白；对梅州市 23 所幼儿园的 186 名教师、325 名家长开展问卷调查（教师卷 $\alpha=0.87$ ，家长卷 $\alpha=0.82$ ），揭示教师文化资本（ $\beta=0.48$ ）、家庭文化惯习（ $\beta=0.35$ ）、制度支持（ $\beta=0.29$ ）为核心影响因子；对 5 所样本园开展 12 周田野观察与 18 人次深度访谈。质性数据显示，73%的教学停留在“歌词朗诵”层面，例如《伯公伯婆》（祭神童谣）仅被用于语言活动，其背后的祈福文化与自然崇拜未被挖掘；而家园协同效率与方言习得率呈正相关（ $r=0.59$ ），如梅县实验幼儿园通过“祖孙童谣会”将《转屋家》（“转屋家，食擂茶”）融入亲子活动，使幼儿方言使用率提升 31%。

2 研究过程：文化生态系统的失衡表征与机制解构

2.1 量化分析：文化生态位模型验证

基于结构方程模型的路径分析显示（CFI=0.93，RMSEA=0.04），客家童谣在幼儿园课程中的生态位呈现“文化基质-教育载体-主体互动”的断裂特征。教师客家方言掌握度（因子载荷 0.78）与童谣创新改编能力（因子载荷 0.65）构成文化资本的关键缺口，这与吴康宁（2017）提出的教师文化再生产能力理论形成互证。家庭场域中，祖辈传唱频次（ $\beta=0.41$ ）与亲子方言互动时长（ $\beta=0.37$ ）显著影响童谣传承效能，印证了布迪厄“文化惯习代际传递”理论的核心命题（Bourdieu, 1986）。

2.2 质性解码：系统失衡的深层机理

参与式观察发现，样本园童谣活动存在“仪式化展演”倾向。例如，《掌牛阿哥》（“掌牛阿哥吹竹笛，阿妹上山割芦荻”）本可结合角色扮演重现客家牧牛场景，但 73%的教学仅要求幼儿背诵歌词。访谈文本经 NVivo12 编码显示，教师普遍面临“文化转译困境”：“既要保持客家话的韵律美感，又要让幼儿理解其中的民俗隐喻”（T-7 访谈记录）。这种困境实质反映了 Tudge（2008）提出的“文化生态系统适应不良”问题，即教育主体尚未建立传统文化与现代课程的转码机制。以《萤火虫》（“萤火虫，唧唧虫，翻转屎窟吊灯笼”）为例，其“萤火虫引导先人归家”的生死观隐喻因缺乏情境支撑，导致文化意义流失。

3 理论建构：三维协同的文化生态系统修复路径

3.1 物质文化层：构建“四维资源矩阵”

基于文化生态学物质适应理论（Steward, 1955），研究提出“文本-媒介-空间-人力”资源体系。建议开发《客家童谣可视化图谱》（含 AR 方言标注），例如将《月光光》转化为 AR 互动游戏，幼儿可通过扫描月亮图标聆听方言吟唱并参与“秀才郎骑马”虚拟场景演绎。同时，将“茶山号子”等劳动歌谣转化为体能游戏课程，如结合《踏板歌》（“踏板踏板，踏到板子溜溜圆”）设计客家板食制作动作操。研究团队在梅江区实验幼儿园的对照实验表明，采用情境游戏法的实验组方言习得率提升 42%（ $p<0.01$ ），且对《鸭麻呱呱》（养鸭童谣）中“早出晚归”劳动文化的理解度达 82%。

3.2 制度文化层：创新“双轨支持系统”

借鉴 UNESCO（2019）非物质文化遗产教育保护经验，提出“政策供给-园本转化”协同机制。教育部门可建立方言教师资格认证制度，例如大埔县试点“客家文化传承师”培训项目，要求教师掌握《月光光》《菱角子》等 30 首核心童谣的方言吟唱与教学设计；幼儿园则需完善课程审议机制，如丰顺县实验幼儿园将《阿鹊鹊》（“阿鹊鹊，打盘车”）融入社会领域，通过“童谣中的合作游戏”培养幼儿团队意识。研究验证了张华（2019）提出的“制度文化弹性”理论，发现制度支持每提升 1 个标准差，教师课程转化效能提高 0.38 个标准差（ $p=0.003$ ）。

3.3 精神文化层：培育“文化认同共同体”

通过设计“童谣文化节”“祖孙共唱工作坊”等活动，构建家庭-社区-幼儿园的认同培育网络。例如，五华县示

范园联合当地文化馆开展“童谣寻根之旅”，幼儿在《转外家》（回娘家童谣）采风活动中记录祖辈口述史，并创作绘本《阿婆的月光光》。纵向追踪数据显示，参与项目的幼儿客家文化认同感（Cronbach's $\alpha=0.89$ ）年均增长23%，验证了Bronfenbrenner（2005）生态系统理论中微观系统联动的有效性。研究特别强调恢复童谣作为“文化记忆体”的元功能，如将《排排坐》的饮食童谣转化为食育课程，通过“客家擂茶制作”活动实现文化基因的活态传承。

4 结论与讨论

本研究通过混合研究方法，揭示了传统文化融入学前教育存在的生态断裂问题。相较于王连生（2016）的单一维度文化移植论，提出的三维协同路径更契合文化生态系统的动态平衡需求。通过文化生态学视角，证实梅州客家童谣融入幼儿园课程的核心障碍在于物质、制度、精神层面的生态位失衡。提出的三维修复路径既响应了“两创”战略需求，也为同类文化传承提供了“系统优化”的方法论参考。研究局限在于追踪周期较短，未来可扩展至赣南、闽西等客属地区进行跨文化比较，进一步开发课程效果评估工具，构建多方协同机制。

参考文献:

- [1]房学嘉. 客家源流探奥[M]. 广州: 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5:67-73.
- [2] Steward J H. Theory of Culture Change: The Methodology of Multilinear Evolution[M]. Urbana: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1955: 72-98.
- [3] 刘焱, 潘月娟. 传统文化在学前教育中的传承: 价值与路径 [J]. 学前教育研究, 2018 (5): 3-11.
- [4] Bourdieu P. The forms of capital[A]. In: Richardson J. Handbook of theory and research for the sociology of education[C]. New York: Greenwood, 1986:241-258.
- [5] 李晓红. 民间艺术园本课程开发研究[J]. 学前教育研究, 2020(6):45-57.
- [6] 冯晓霞. 文化生态学视野下的幼儿园课程建设 [J]. 中国教育学刊, 2020 (9): 78-83.
- [7] UNESCO. Text of the Convention for the Safeguarding of the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Z]. Paris: UNESCO, 2019.
- [8] 吴康宁. 教师的文化自觉与课程改革[J]. 教育研究, 2017(3):12-21.

Research on the Path of Integrating Hakka Nursery Rhymes into Kindergarten Curriculum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Two Innovations" ——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ultural Ecology

Fang Menglin

Guangdong Meizhou Vocational and Technical College, Meizhou, China

Abstract: Under the strategic background of the "creative transformation and innovative development" of China's excellent traditional culture, this study takes cultural ecology as the theoretical framework and comprehensively applies mixed research methods such as bibliometric analysis, questionnaire survey ($N = 511$), in-depth interview ($N = 18$) and participatory observation to systematically analyze the current situation and path of integrating Meizhou Hakka nursery rhymes into kindergarten curriculum. The study finds that the comprehensive score of the cultural niche of the integration of nursery rhymes is 3.02 points (on a 5-point scale). The core bottlenecks are manifested as the insufficient cultural capital of teachers ($\beta = 0.48$), the lack of family cultural habits ($\beta = 0.35$) and the weak institutional support ($\beta = 0.29$). The qualitative research further reveals the deep-seated contradictions such as the break of the language ecology and the game of curriculum power. Based on the theory of "cultural ecosystem restoration", the study proposes a three-dimensional collaborative path of constructing the resource system at the material culture level, improving the rules at the institutional culture level, and cultivating the identification at the spiritual culture level, providing an empirical reference and methodological inspiration for the transformation of local traditional culture in preschool education.

Keywords: Hakka Nursery Rhymes; Kindergarten Curriculum; Cultural Ecology; Cultural Niche; Cultural Inheritance and Dissemination

非遗文化融入美育的创新机制研究

陈洛羽¹

(¹中国台湾艺术大学, 中国台湾 新北 220307)

摘要: 非物质文化遗产蕴含丰富的审美价值与文化意涵,是推动学校美育体系发展的重要资源。在“以美育人、以文化人”教育政策深化背景下,非遗与美育的融合日益受到关注。然而,当前实践仍面临课程零散、师资不足、协同弱化及数字化支撑滞后的结构性问题。本文在系统梳理相关问题基础上,提出涵盖课程建设、教师协同、资源整合与技术赋能的“四维机制”路径模型,旨在构建非遗融入美育的可持续发展体系。研究指出,机制创新有助于非遗由形式嵌入迈向结构整合,进而拓展学生的审美体验与文化认同空间。未来尚需聚焦不同学段适配性与跨区域协同实践的深化,以提升非遗美育的系统效能与文化教育价值。

关键词: 非物质文化遗产; 美育; 文化认同; 创新机制

DOI: doi.org/10.70693/rwsk.v1i5.965

非物质文化遗产(非遗),作为中华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蕴含着丰富的历史价值和审美意蕴。近年来,随着“以美育人、以文化人”理念的深入推进,非遗在美育教育中的作用日益凸显。将非遗融入美育课程,不仅有助于提升学生的审美素养,还能增强其文化认同感和民族自豪感。然而,当前非遗与美育的融合仍面临诸多挑战。课程体系不完善、师资力量不足、资源整合不力等问题,制约了非遗美育的深入发展。非遗在高校美育中的应用路径尚需进一步探索,以实现其教育价值的最大化。而数字技术在非遗教育中的应用尚处于初级阶段,缺乏系统的数字化教学资源 and 平台,影响了非遗教育的广泛传播和有效实施^[1]。构建完善的非遗保护机制对于推动非遗教育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2]。为解决上述问题,本研究提出构建“课程机制—师资机制—协同机制—技术机制”的四维创新路径,旨在通过系统化的机制建设,推动非遗文化与美育教育的深度融合,实现非遗教育的可持续发展。

一、非遗文化的美育价值与教育意涵

非物质文化遗产不仅是中华民族集体记忆的结晶,更是涵养学生审美素养与人文精神的重要教育资源。美育与非遗的融合,不仅彰显文化自信,更是推动非遗现代化传承的关键路径。它不仅丰富了美育的内容体系,也为非遗注入了新的发展动能。非遗艺术承载着实践美、生态美与乡土美的审美特质,体现出道器合一、美善共生的文化精神,已成为构建新时代中华美育体系的重要资源支撑,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3]。在新时代文化自信与教育融合发展的背景下,美育被赋予了以文化人、以美润心的战略功能,而非遗的多维文化内涵与艺术表现形式,正为美育课程提供了独特的内容支撑与价值引导^[4]。

从审美价值层面看,非遗项目如剪纸、漆艺、刺绣、戏曲等,承载着高度凝练的形式美、技艺美与意境美,能够激发学生的审美直觉与感性认知。例如,非遗剪纸所呈现的细腻线条、象征图案与地域风格,不仅有助于学生形成对传统视觉语言的理解,也强化了他们对“美”的具体化建构^[5]。

从文化价值层面来看,非遗不仅体现出民族独有的精神图谱与生活智慧,更是连接历史与现实的文化桥梁。传统节庆、礼仪规范、民俗技艺等所展现的文化意义,使学生在审美体验中完成文化认同的构建^[6]。非遗课程若结合地域性文化资源,不仅可激发学生的在地文化归属感,也有助于文化自觉的培育与人文修养的深化^[7]。此外,非遗还具备高度的创新潜能。在新时代美育要求中,强调学生综合素质与创新能力的提

作者简介: 陈洛羽(1998—),女,福建福州人,台湾艺术大学(中国台湾),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创意产业设计、非遗文化创新策略。

升,而非遗教育通过“技艺传授+文化阐释+创意设计”的方式,为学生提供了融合传统与现代的创作空间^[8]。这也表明,非遗美育不仅是知识传授,更是文化创新与素质教育交汇的育人场域。

二、非遗美育融合中的挑战

尽管“非遗进校园”作为国家文化育人战略的重要组成,已在各级教育实践中陆续展开,然而非遗文化真正融入学校美育体系的进程仍处于初级阶段。大量相关项目仍停留在展示层面或课外活动形式,缺乏系统的课程化推进与机制化支持。在实际教学中,非遗与美育融合面临诸多制约因素,表现为制度设计、教学资源、人员配置、运行机制等层面的一系列结构性问题,难以支撑其作为美育主渠道的功能实现。本章节将从课程体系、师资结构、协同平台与技术支撑四方面,梳理非遗美育实践中最核心的挑战,并为后续机制构建提供问题依据与理论起点。

(1) 课程体系缺乏系统性设计

当前多数学校的非遗课程仍停留在活动层面,缺乏从小学至大学的螺旋式课程体系,且存在重技艺传授、轻文化阐释的倾向^[9]。例如,纸艺课程多停留在剪纸技法训练,未能引导学生理解其背后所蕴含的民俗文化与美学精神,导致课程内容碎片化、实践深度不足。部分课程过度强调技艺操作,而对非遗背后的文化语义、历史背景、地域特色等方面着墨不足,易使学习流于表面,削弱其人文价值的传达。

(2) 专业师资与教学支持不足

非遗教育的有效推进离不开具备复合能力的教学队伍。然而在当前实践中,普遍存在美育教师对非遗认知不深、传承人缺乏教学经验的双重问题。非遗教育涉及深厚的工艺技法与文化背景,当前艺术教师在非遗知识与表达能力上往往不足,导致非遗教育多流于形式,难以达成深层文化传承与审美建构目标^[10]。专业教师虽然熟悉教学方法,但往往对非遗项目所涉及的技艺、历史与文化缺乏系统理解;而非遗传人虽技艺精湛,却难以胜任教学组织与教育表达。这种“教学能力”与“文化知识”的结构性错位,不仅影响课堂教学效果,也阻碍了非遗课程的深入推进。此外,城乡及区域间美育资源差异亦制约非遗教育的均衡推进。尤其是非重点学校与农村地区,面临美术、音乐设施不足、课程时间被压缩的问题,非遗美育的实施更难以保障^[11]。相关培训机制尚不健全,支持系统不足,使得师资能力的提升缺乏可持续动力。

(3) 协同机制尚未形成合力

非遗文化作为跨学科、跨领域的教育资源,其有效融入学校教学,需依赖多方协同与机制保障。但目前实践中,不同系统之间的资源整合与协作仍显薄弱。尽管政策层面提倡“大美育”协同育人,但社会美育力量介入学校仍面临机制协同乏力、资源共享平台缺失等问题。尤其在非遗项目方面,校社合作多流于表层展示,难以形成长效机制^[12]。学校、文化机构、非遗工作站等主体之间缺乏长期稳定的合作机制,部分合作仍停留在项目层面,缺乏制度支撑与组织保障。同时,教育管理部门与文化行政体系之间的信息共享与政策协同也不够充分,制约了资源共建、课程共研、人才共育等机制的有效落地。这种“协而不同、合而不固”的局面,成为非遗教育深度发展的主要障碍之一。

(4) 数字化教学基础薄弱

在数字技术日益渗透教育各领域的今天,非遗美育的数字化程度相对滞后。虽然部分地区与学校已尝试开发非遗相关数字资源或开展线上教学活动,但整体来看,无论是在资源覆盖、技术平台、还是交互设计方面,均存在较大差距。一方面,国家级与地方级非遗项目的数字化资料尚未系统整理,资源分布不均、可用性不强;另一方面,学校在使用技术手段提升课堂沉浸感、丰富学生体验方面,尚缺乏足够的技术支持与教学设计能力。这不仅限制了非遗课程的教学广度,也影响了其在青少年群体中的传播效果与文化认同的生成。

三、非遗融入美育的四维创新机制

在“以美育人、以文化人”的国家战略推动下,非遗文化融入美育教育亟需从被动引入转向机制构建的系统性提升。基于当前教育实践的瓶颈与资源整合的趋势,本文提出四维创新机制,旨在从课程、师资、协同与技术四个维度形成非遗美育融合的系统性解决路径。

(1) 课程机制：构建分层分类、螺旋递进的教学体系

课程机制的构建应聚焦“课程化”与“体系化”的双重目标。具体而言，应依据学生年龄特征与认知发展规律，设计涵盖“认知—体验—创作”三阶段的美育课程模块，实现从感知美到创造美的学习跃迁。例如，在小学阶段融入直观体验与趣味动手内容，初中阶段强化文化理解与表现技法，高中阶段引导学生进行主题创作与审美批评，最终形成由浅入深、逐层推进的非遗美育课程图谱。与此同时，应注重区域文化资源的本土性转化，实现非遗项目与地方教材的融合适配，提升教学的在地性与现实性。

(2) 师资机制：构建“双师协同、多元参与”的复合型育人队伍

师资问题是非遗美育落地的关键环节。针对当前专业教师非遗素养不足、传承人教学能力有限的现实，应推动“双师型”师资结构建设。高校可联合文化机构、非遗传承单位开展“教师+匠人”共育机制：一方面，培养具备非遗文化理解力与教育设计能力的美育教师；另一方面，引导优秀非遗传承人参与课程共研、课堂共授与教学实践，赋能其教育表达能力。通过制度化的“工作坊制”与“项目制”合作模式，构建起学科知识、文化技艺与教学能力三者融合的复合型人才体系。

(3) 协同机制：搭建跨系统、跨领域的共育协作平台

非遗美育的可持续推进离不开多主体的联动协同。为打破教育系统与文化系统之间的壁垒，应搭建涵盖学校、文化馆、非遗保护中心、社区组织等多元主体的“非遗美育协同中心”，推动“资源共建—课程共研—活动共创”的平台化协作。该中心可统筹开展区域性课程开发、主题展演、文化节庆与师资培训，形成校地合作、社会参与、学生受益的良性循环格局。此外，应推动政策机制对接与资源整合制度化，提升项目的稳定性与推广效应。

(4) 技术机制：建构数智融合的沉浸式美育体验场域

借助数字化转型趋势，非遗美育可突破时间与空间限制，拓展为“虚实结合”的教育场景。一方面，应加快非遗数字资源采集、整理与可视化呈现，推动建立国家与地方层级的数字资源库；另一方面，融合 AIGC、VR/AR 等新兴技术开发虚拟课堂、数字工坊与互动平台，提升学生的参与感与沉浸感。

数字化不仅扩展了非遗的传播路径，也促进了其知识结构的系统建构与审美经验的深度生成，为未来非遗教育的智慧演进提供了技术支撑。

四、结语

本研究以非物质文化遗产融入学校美育为切入点，系统梳理当前教育实践中面临的核心问题，涵盖课程体系不完善、师资队伍结构性失衡、跨部门协同薄弱以及数字化基础滞后等方面。为回应上述挑战，研究尝试从课程建构、教师协作、资源整合与技术支持四个层面，提出综合性推进机制，期望为非遗教育在美育体系中的深入发展提供理论支持与实践参考。研究过程中发现，非遗文化所具备的审美价值、文化象征与在地性特质，能够有效丰富美育内容，并促进学生的文化理解与艺术表现力。从课程层面而言，需依学生发展阶段建立由浅入深的教学体系，使其在“认知—体验—表达”中逐步实现审美能力的提升；在师资层面，应推动高校专业教师与非遗传承人之间的协同机制建设，形成优势互补的教学结构；在协同层面，应重视教育行政、文化机构与学校之间的资源统筹与制度对接，形成常态化的联动机制；而在技术层面，新兴的数字媒介工具虽尚处探索阶段，但其在教学情境拓展、沉浸式体验提升等方面显示出可观潜力。

本研究虽提出了一套较为系统的推进路径，但仍须指出研究尚存在若干局限。其一，本研究以文献分析与机制归纳为主要研究方法，尚未开展实证性教学实验，相关构想的实际成效与可行性仍需在具体教育场域中进一步检验；其二，当前尚缺乏一套科学的评价体系以衡量非遗美育在学生文化认同、审美素养及创新能力方面的具体影响，后续研究有待从评估方法与数据支持角度补足；其三，不同地区、不同教育阶段在资源条件、文化背景与政策配套上的差异，亦可能影响机制的适配性与推广路径。

未来的研究可从以下方向进一步深化：聚焦不同学段的课程适配机制，推动非遗教育与学校课程标准之间的有效衔接；推动跨区域、跨部门之间的协同体系构建，提升非遗教育的覆盖广度与资源整合效能；构建量化与质性并重的评估工具体系，深入分析非遗课程对学生综合素养的影响路径；进一步探讨数智赋能条件下非遗教育的教学策略与传播模式，兼顾文化的深度传达与教学的可操作性。

综上所述，本研究在现有理论基础与教育实践观察的基础上，初步提出了非遗融入美育的关键机制与路径建

议,期望为后续相关研究提供可参考的理论框架与议题线索。诚如传统文化的传承本非一蹴而就,非遗教育的深入发展亦需在多元主体的持续推动与教育系统的动态调适中,不断生成新的实践可能与理论积累。

参考文献:

- [1] 李旭. 非遗元素在高校美育教育中的浸润渠道研究[J]. 教育与研究, 2023, 6(7): 88–92.
- [2] 陆春艳. 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机制的研究综述[J]. 社会科学前沿, 2024, 13(4): 432–438.
- [3] 张俊杰, 屈健. 非遗美术与西部美育的协同创新——以关中地区的国家级非遗美术为中心[J]. 美术研究, 2021(05): 17–18.
- [4] 韩丹, 程思佳. 非遗融入高校美育的价值、现状与路径研究——以师范类高校主题性非遗美育为例[J]. 中国大学教学, 2025(3): 44–46.
- [5] 罗兰. 非遗传承视域下聊城剪纸融入高校美育的价值与路径[J]. 聊城大学学报, 2024, 30(4): 11–13.
- [6] 阮海云. “非遗”校本课程的美育价值及其实现[J]. 北京联合大学学报, 2020(11): 95–96.
- [7] 周俊伟. 区域非遗文化与高校美育契合性提升策略研究[J]. 学术品读, 2023(12): 33–36.
- [8] 李山岗, 刘小旦. “三位一体”传统文化美育体系的构建与探索——以晋中学院为例[J]. 教育理论与实践, 2021, 41(18): 40–43.
- [9] 蓝泰华. 纸艺在中小学手工课中的融入探讨[J]. 中国教育学刊, 2023(S1): 83–84.
- [10] 邱地, & 谢朝晖 (2015). 《高校美育面临的困境与对策探讨》. 教育探索, (6), 87–90.
- [11] 周福盛, & 黄一帆 (2022). 《社会美育力量参与学校美育: 价值、困境与路径》. 中国电化教育, (1), 105–109.
- [12] 张志强 (2024). 《美育浸润行动视域下中小学美育的现实困境及其疏解路径》. 中国教育学刊(11), 68–73.

A Study on the Innovative Mechanisms of Integrating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into Aesthetic Education

LuoYu Chen¹

¹Taiwan (region) University of Arts, New Taipei 220307, Taiwan region, China

Abstract: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with its profound aesthetic and cultural dimensions, represents a valuable resource for enriching school-based aesthetic education. As national policies increasingly emphasize education through aesthetics and culture, the integration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into teaching practices has drawn growing attention. However, its implementation remains hindered by fragmented curricula, limited teacher capacity, weak institutional coordination, and lagging digital support. This study proposes a four-dimensional innovation model—comprising curriculum development, teacher collaboration, resource integration, and digital enhancement—to address these structural challenges. The model aims to establish a sustainable framework for embedding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within educational systems. Findings suggest that such mechanisms can facilitate a shift from symbolic inclusion to systemic integration, broadening students' aesthetic engagement and deepening their cultural identity. Further efforts are needed to explore adaptive approaches across educational levels and strengthen interregional collaboration, ensuring the long-term impact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in aesthetic education.

Keywords: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Aesthetic Education; Cultural Identity; Mechanism Innovation

中国国家男篮和国青男篮成绩差异致因及路径

谷佳威¹, 谢莹莹²

(1. 山东体育学院, 山东 济南 250100; 2. 山东体育学院国家篮球学院, 山东 日照 276800)

摘 要: 本研究采用文献资料法、录像分析法和专家访谈法等研究方法, 在“三大球”振兴工程和体育强国战略的宏观背景下, 聚焦于振兴“三大球”工程以来我国男篮竞赛成绩差异, 旨在通过深入分析其背后的多重因素, 为中国男篮竞技水平的提升提供理论支撑与策略建议, 推动我国篮球运动的可持续发展。研究总结了职业篮球和校园篮球的发展现状对我国五人制男篮竞赛成绩的影响。建议: 未来国家男篮应从加强顶层设计, 激发篮球市场活力; 加强作风建设, 改善中国男篮风貌; 变革职业联赛, 提升男篮竞技水平; 重视科学研究, 加强科研保障应用; 培养职能教练, 建立双轨训练体系等几个方面入手以提升国家男篮的竞技实力。

关键词: 三大球振兴; 五人制男篮; 竞赛成绩

DOI: doi.org/10.70693/rwsk.v1i5.982

0 前言

2021 年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十四五”体育发展规划》, 提出了“三大球”振兴工程, 明确提出五人男子国家队争取获得 2024 年巴黎奥运会参赛资格; 三人男子国家队获得巴黎 2024 年巴黎奥运会参赛资格并力争获得好成绩的目标。近年来, 国家体育总局在总书记的领导下, 认真落实《“十四五”体育发展规划》, 积极推动“三大球”的全面振兴工作。然而中国五人男篮却面临前所未有的困境, 不仅未能延续传统的“亚洲霸主”地位, 更是遗憾未能获得 2024 巴黎奥运会正赛资格。因此, 审视三大球振兴工程以来我国国家男篮竞赛成绩的变化、总结经验, 提出我国男子篮球项目振兴策略, 具有重要意义。

1 三大球振兴下中国男篮竞赛成绩

1.1 我国国家男篮竞赛成绩

2024 年亚洲杯预选赛, 中国男篮在本届比赛大胆起用新人, 征召部分年轻运动员出征, 面对日本男篮 88 年的不败记录被打破, 体现出中国男篮竞技水平的退步以及亚洲篮球运动的竞争日渐激烈。2023 年国际篮联篮球世界杯, 中国男篮历史上首位 NBA 归化球员出战, 但中国男篮最终成绩却仍旧不理想, 仅仅取得 4 负 1 胜的战绩, 排名第 29 位, 这也是中国男篮在男篮世界杯的历史最差成绩。同年在 2023 年杭州亚运会男子篮球项目中, 中国男子篮球代表队仅获得铜牌。而刚经历换帅和非全主力出战的菲律宾队则获得队史第一枚亚运会金牌。2023 世界杯预选赛之后, 中国男篮奔赴印度尼西亚参加 2022 年男篮亚洲杯, 但未获得较为理想的成绩, 被四强拒之门外。

1.2 我国国家青年男篮竞赛成绩

2024 年中国国家 U17 男子青年篮球队与美国、法国等世界强队同为一组。在世锦赛经过 7 场高水平竞赛, 最终获得第 13 名的成绩。2023 年 U19 男篮世界杯中国队与法国、加拿大、西班牙三支世界级强队同为一组, 获得了第十名的竞赛成绩, 这也是中国国家男子青年篮球队历史第二好的成绩。2022 年 U17 世青赛由于受新冠病毒

作者简介: 谷佳威 (2000-), 男, 在读硕士, 研究方向为篮球理论与教学;
谢莹莹 (2003-), 女, 在读本科, 研究方向为篮球理论与教学。

疫情影响,未能获得同年U17世青赛参赛资格,故选取2022年亚青赛作为研究对象。在2022年U18国青男篮亚锦赛中,中国男篮展现出了较强的竞争力和韧性,获得赛事季军。

2 国青男篮与国家男篮竞赛成绩差异成因分析

(1) 国家激励制度差异:中国篮球在激励球员挑战国际高水平赛事方面缺乏激励制度,存在俱乐部对球员冲击高水平联赛横加阻拦的现象,导致国家男篮竞技水平的落后。而在国青男篮方面,各俱乐部对于青训球队成绩的重视程度相对较低,同时由于合同条款的限制,均积极鼓励运动员挑战高水平联赛。

(2) 教练团队选用差异:国家男篮近年大胆启用“洋帅”,但是否适合中国男篮还值得商榷。在此之前的教练人选也多为国内联赛的杰出主教练。而国青男篮教练的选择未注重教练员带队成绩,其均专注于对年轻球员的培养,能够深刻了解队员的心态与需求,有效地提升团队的执行力和凝聚力。

(3) 心理抗压能力差异:国家男篮在媒体高度关注下,使球员产生较大的心理负担,导致比赛关键时刻产生逃避责任的现象。反观国青男篮在社交媒体关注度较低,产生相对宽松的竞技环境,使球员展现出更强大的心理素质,能够勇于承担关键球的责任敢于发挥。

(4) 职业发展需求差异:国家男篮队员多在国内联赛获得的辉煌成就,但年龄和体能状况已限制其冲击高水平联赛,使球员缺乏挑战高水平联赛的动力。国青男篮运动员则正值职业生涯上升期,均渴望在更高水平的联赛证明自己,实现个人价值飞跃,故而在国际比赛表现出更高投入程度,在世界赛场上屡创佳绩。

(5) 外部竞赛环境差异:国家男篮运动员的赛事参与主要集中在国内职业联赛,其余教学比赛由于地域分散的限制,数量较少。相比之下,国青男篮队员主要依托校园与职业青训,拥有更多的实战比赛机会。3 慕课+运动教育教学模式的高校篮球课程设计

4 我国五人制男篮竞赛成绩提升困境

4.1 高水平教练员培养制度匮乏

我国篮球教练员的来源主要是来自全国各地高校体育专业的毕业生和退役运动员。高校学生有着扎实的教育理论和专业知识,但在高水平竞赛经验方面相对不足;退役运动员虽然拥有着丰富的实战经验和高超的技战术水平,但是在教育理论学习和专业知识方面相对于高校学生略显欠缺,两类教练员群体的训练科学化水平均有待提升。其次,开放性多方位教练员结构不足,偏重于地缘关系的封闭性结构。近亲繁殖现象阻碍了其他优秀教练员的加入,缺乏异质性教练员的互动,教练员之间降低了竞争性,弱化了内部教练员水平的发展提高。

4.2 职业联赛运营机制不合理

我国职业篮球联赛是由举国体制下专业队的模式转型而来,缺乏足够的群众支持与成熟的市场经济环境作为保障。但随着市场经济的逐步发展,职业联赛归属国家事业或是体育产业的矛盾逐步暴露。这也导致了由于体制机制的不完善以及职业体育人才资源的匮乏造成国家公利和俱乐部私利之间的矛盾,职业俱乐部与国家队国际赛事人才争夺、职业联赛让步国家队长期集训、俱乐部“为国养士”等冲突事件频出。

4.3 职业联赛运营机制不合理

我国篮球职业联赛虽在结构上实现了协会的实体化运营,但是受到传统举国体制框架的影响,其权力来源于上级体育行政部门,不能够有效起到作为社会参与主体,弥补市场与政府双重失灵的润滑作用。在我国在职业体育发展过程中,行政权力长期制约着资本权力,政府干预过度。同时缺乏完善的职业体育联盟机制,不能发挥职业联盟、职业体育俱乐部等市场主体作用,职业体育市场的秩序与活力关系难以平衡。

我国职业篮球联赛因高水平教练员培养制度匮乏、运营机制僵化、目标定位缺乏明确性,直接制约了五人制男篮的全面发展。资源分配不均,赛事推广与品牌建设受限,难以吸引高水平外援的加盟,影响了联赛的整体竞争力。加之目标定位模糊,缺乏长远规划,导致我国男篮战术体系与人才培养体系难以与国际接轨,最终限制了五人制男篮在国际赛事中的成绩提升,亟待通过深化改革与创新机制破局。

5 我国五人制男篮竞赛成绩提升策略

5.1 加强顶层设计，激发篮球市场活力

面对中国职业篮球联赛中深圳、广州、南京等俱乐部连年亏损，依赖球员转会费维持运营的困境，亟需从顶层设计入手，激发篮球市场活力，以期提升 CBA 的竞争环境。例如德国政府通过立法保障与政策调控，由社会体育组织进行组织管理，德国篮球联赛也由此实现了管办分离与市场化运作的高度融合。我国应加快整合社会资源，激发社会活力，夯实发展基础，基本建立政府主导、部门协同、协会主办、社会广泛参与的篮球发展新机制的篮球发展新模式。政府作为主管部门应出台相关政策，引导社会企业和市场机构积极投资参与篮球事业，在税收和行政审批等方面给予优惠政策，充分激发市场主体参与活力。同时，借鉴德国职业联赛的成功经验，建立健全高度竞争性的职业联赛体系，吸引多元化投资主体参与，提升联赛商业价值，为俱乐部提供稳定的资金来源。通过这一系列顶层设计的加强，中国篮球市场有望迎来新的发展机遇，焕发勃勃生机。

5.2 变革职业联赛，提升男篮竞技水平

中国国家男篮竞赛成绩不尽如人意的重要原因之一便是中国篮球职业联赛在竞争力低，面对世界篮球竞争格局的日渐激烈，中国篮球联赛进行系统化的变革势在必行。李元伟教授指出，职业联赛是国家队的基础，职业联赛的水平提高能够推动中国男篮竞技水平提升。例如，日本 B 联赛的升降级制度，使 B1 和 B2 两个级别联赛中的球队带来较大的竞争压力，从而推动其竞技水平的提升。因此，要加强联赛自身建设，创新联赛运行模式，健全联赛管理体系，从而提升篮球行业公信力，以确保比赛的公平公正推动国内球员的合理流动，避免国字号球员扎堆现象，从而提升各支球队的竞争力。同时职业联赛要与世界接轨，加强国际赛事的规则研究。全面分析国际赛场竞赛规则与国内职业联赛的差异，针对差异进行变革，从而做到从容应对国际竞赛。通过这一系列变革举措，中国男篮的竞技水平必将实现质的飞跃，为中国篮球的崛起奠定坚实基础。

5.3 深化国际交流，建立交流合作机制

中国男篮应致力于建立完善与国际篮联及 NBA 等顶尖篮球组织的沟通协调机制，深化在政策研究、信息共享、人才流动、教育培训及赛事合作等多领域的双边或多边业务交流。通过这些合作，增强中国篮球在国际篮球界的影响力与话语权，积极承担并履行国际责任。同时，要大力支持 CBA 俱乐部与 NBA 俱乐部建立长期友好的合作关系，不仅在球员交流、教练培训、技术引进等方面展开深度合作，还在篮球文化、信息教育等层面进行广泛交流，促进资源的高效整合与优化配置。这样的合作模式将有助于提升我国篮球运动的国际化水平，加速我国篮球事业与世界顶尖水平的接轨，为中国篮球的全面发展注入新的活力与动力。

5.4 紧贴政策指向，培养高水平教练团队

前国家体育总局局长，带领中国女排豪夺五连冠的功勋主教练袁伟民指出：教练对于一个国家整体竞技水平的高低，起着无可替代的作用，优秀教练员可以充分发挥每一名运动员的长处，提升竞技水平。因此，建立高水平教练员培训体系是提升中国篮球竞技水平的应然之路。2023 年国家体育总局等部门印发《关于在学校设置教练员岗位的实施意见》，《意见》指出，学校可根据实际工作需要聘任专（兼）职教练员。有条件的地区还可以以购买服务的方式与社会力量合作，为学校提供体育教育服务。政策的发布也给教练员培训带来新的机遇，由此提出以下针对性的措施：（1）完善当前教练员培训体制与选用制度，严格执行教练员认证制度，提升教练员基础知识与技能储备的应用能力。（2）严格把控教练员培训合格认证体系，挑选真正热爱篮球，真正有志向扎根于篮球领域的教练员，以壮大篮球人口基础（3）建立并完善监督机制，坚决落实监督机制和持证上岗制度，对获得篮球教练员证书的教练员，不定期开展后续课程培训，提升执教能力。（4）大力扶持基层篮球教练员，不定期开展全方面交流、学习活动和公益性学术研讨，以提高执教水平。

5.5 依托体教融合，重视后备人才培养

全面贯彻《关于深化体教融合促进青少年健康发展的意见》，发挥校园篮球培养优秀后备人才的关键作用，

与教育部携手开启全面战略合作, 全力推动篮球运动深入校园。深化体育课程改革, 特别强化篮球竞技教育的独特优势, 构建一套内容丰富、形式多元、个性化教学的青少年篮球教育体系。制定详细的校园篮球教学训练指南, 积极鼓励并支持各类学校成立篮球俱乐部, 同时引导体育院校的篮球教练走进校园, 构建传统校与专业体育学校合作网络, 深化与业余俱乐部、职业俱乐部的合作, 以此形成优势互补, 改善篮球后备人才短缺问题。

6 结语

三大球振兴工程实施以来, 中国五人制男篮竞赛成绩惨淡但, 中国男篮能否迎难而上, 再度重回亚洲之巅, 闯入奥运八强, 是中国男篮未来应持续关注两大重点。需坚持问题导向,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积极探索符合我国国情的高质量发展之路, 带动我国国家男篮竞赛成绩的整体提升, 继而为中国篮球改革发展以及体育强国建设贡献力量。

参考文献:

- [1] 黄优强, 池建, 孟凡素, 等. 新中国 70 年中国男篮主教练选拔任用的回顾、反思与展望[J]. 天津体育学院学报, 2019, 34(05): 388-394.
- [2] 方泰, 杨国庆. 我国“三大球”职业体育发展: 历史脉络、实然困境与应然路向[J]. 北京体育大学学报, 2024, 47(02): 75-90.
- [3] 李健, 石作政, 韩征强, 等. 德日竞技篮球崛起的经验及启示[J]. 广州体育学院学报, 2024, 44(01): 120-128.
- [4] 刘永峰, 刘连红, 严浩铭, 等. 欧洲篮球强国小篮球运动发展经验和启示[J]. 成都体育学院学报, 2023, 49(01): 81-87.
- [5] 邵凯. 日本“三大球”振兴发展的时代特征与经验启示[J]. 沈阳体育学院学报, 2025, 44(02): 94-100+137.
- [6] 崔鲁祥. “三大球”振兴背景下校园篮球课程教学的现实困境与纾解策略[J]. 沈阳体育学院学报, 2025, 44(01): 38-44.

Research on localization of sports education mode based on MOOC platform -- Taking College Basketball Course as an example

Gu Jiawei¹, Xie Yingying²

¹Shandong Sport University, Jinan 250100, Shandong; ²National Basketball Academy, Shandong Sport University, Rizhao 276800, Shandong

Abstract: Using the methods of literature review, video analysis and expert interview, this study focuses on the differences in the competition results of China's men's basketball team since the revitalization of the "three big balls" project under the macro background of the "three big balls" revitalization project and the sports power strategy, aiming to provide theoretical support and strategic suggestions for the improvement of the competitive level of China's men's basketball team and promote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China's basketball sport through in-depth analysis of the multiple factors behind it. This paper studies and summarizes the influence of the development status of professional basketball and campus basketball on the performance of Chinese five-a-side men's basketball. Suggestions: in the future, the National Men's basketball team should strengthen the top-level design and stimulate the vitality of the basketball market; Strengthen the style construction and improve the style of the Chinese men's basketball team; Change the professional league and improve the competitive level of men's basketball; Attach importance to scientific research and strengthen its application; To improve the competitive strength of the National Men's basketball team, we should cultivate functional coaches and establish a dual track training system.

Keywords: three ball revitalization; Five man basketball team; Competition results

基于慕课平台的运动教育模式本土化改造研究

——以高校篮球课程为例

谷佳威¹, 谢莹莹²

(1.山东体育学院, 山东 济南 250100; 2.山东体育学院国家篮球学院, 山东 日照 276800)

摘要:本研究针对传统篮球教学中存在的重技能轻素养、主体性缺失等问题,探索了慕课与运动教育模式深度融合的新型教学体系。通过解构运动教育模式的六大核心要素,创新设计双循环三阶段课程架构,将慕课技术嵌入基础理论-技能训练-联赛实践全流程,形成线上线下联动的教学闭环。课程实施中采用分层训练机制、动态积分制度及多维评价模型,有效破解了课时分配矛盾与学生能力差异,构建了数字学习-情境竞赛-文化浸润三位一体的体教融合新范式,为高校篮球课程改革提供了可复制方案。

关键词:慕课; 运动教育教学模式; 篮球; 教学实践

DOI: doi.org/10.70693/rwsk.v1i5.981

0 前言

体育教育作为学校体育工作的中心环节,是实施素质教育和培养全面人才的重要途径。2020年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全面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学校体育工作的意见》,提出学校体育要以服务学生全面发展、增强综合素质为目标,逐步完善“健康知识+基本运动技能+专项运动技能”的学校体育教学模式。但现阶段篮球课程教学模式上仍遵循早期观念,课程教学过程以教师讲授为主导,忽视了学生学习的主体性;教学目标以提升学生专业技能为导向,忽视了学生的全面发展。鉴于此,本研究将慕课+运动教育教学模式引入高校篮球课程的教学实验中,通过对其教学内容设计展开介绍,阐述基于慕课+运动教育教学模式的高校篮球课程教学实践应用,以供高校篮球运动教育工作者参鉴。

1 慕课+运动教育教学模式的构建

1.1 慕课教育的本土化演进

M00C 源于英文 Massive Open Online Course, 简称“慕课”,自2013年引入中国以来经历了显著的适应性变革。随着慕课的深入普及,信息技术与教育教学进行了深度的融合,截至2023年,我国高等教育领域已建成涵盖1291所高校的慕课体系,累计上线课程7.68万门,注册用户达4.54亿人次,吸引2亿人次的学习者,并且结合中国实际情况构建了一系列高校慕课应用新模式,如MOOCs、SPOCs、MOOCs SPOCs、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等多种在线开放课程新形态。但是,体育类慕课呈现出特殊的双面性特征:一方面,其课程访问量普遍超过同类理论课程30%以上;另一方面,受制于运动技能习得的实践性要求,实际完课率长期徘徊在8%-12%之间,篮球等专项课程更面临高达65%的中途弃课率。

1.2 运动教育模式的理论突破

运动教育模式全称是运动教育课程与教学模式,是由美国著名体育学者西登托普创立的一个以活动为基础的教育模式,于20世纪80年代在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提出。教学目标旨在为学生提供获得真实的、富有教育意义的运动体验的机会。美国国家体育课程标准(SHAPE America)的实证研究表明,采用该模式可使学生运动技能保持率提升42%,团队协作能力提高37%。然而在我国教育实践中,受制于传统课时分配、教师角色转型滞后等因素,该模式的实施效果尚未完全释放。

2 慕课+运动教育教学模式的目标锚定

作者简介: 谷佳威(2000-),男,在读硕士,研究方向为篮球理论与教学;
谢莹莹(2003-),女,在读本科,研究方向为篮球理论与教学。

2.1 课程周期与课时分配的优化矛盾

运动教育模式在实施过程中有六个主要的板块,即运动季、团队联盟、正式比赛、总决赛、成绩记录和庆祝,这六个板块在整个的课程中相辅相成、密切联系、缺一不可。传统运动教育教学模式要求持续 20 课时以上的完整赛季周期,在常规 16-18 周学期制下面临结构性矛盾。美国原版模式中季前赛(4 周)、常规赛(8 周)、季后赛(4 周)的三段式设计,与我国高校普遍 32-36 学时/学期的课程设置存在显著冲突。慕课+运动教育教学模式,充分保证了整个教学过程以竞赛周期为主导,将竞赛真正贯穿整个学期,基础技术学习、基础战术学习、裁判规则学习均可以在课上和课下的碎片时间使用移动终端在慕课上观看学习,极大地压缩了课上课下,更多的服务于竞赛。

2.2 学生运动能力差异化的教学挑战

我国高校学生多数没有十分扎实的篮球运动技能和体能基础,使得运动教育模式的主体环节,竞赛无法正常开展。传统竞赛模式下部分学生因技术短板沦为“赛场旁观者”。在运动教育模式框架下,慕课技术的引入形成了“观察-解析-模拟-反馈”的闭环学习链。学生可随时调取标准化动作模板进行对比分析,有效解决了传统教学中因集体授课导致的个性化指导缺失问题。特别是在复杂技能学习中,慢动作回放解析的视频讲解使体前变向的蹬地角度、运球的肢体协调等微观技术要素得以可视化呈现,显著提升技术迁移效率。慕课+运动教育教学模式一方面将基础技术教学迁移至弹性化的慕课空间,保障了课堂竞赛环节的完整性与连贯性;另一方面通过动作细节的讲解与指导实现差异化辅导,消解了学生技能基础参差带来的教学阻滞。

3 慕课+运动教育教学模式的高校篮球课程设计

3.1 慕课+运动教育教学模式的高校篮球课程教学进度安排

基于慕课+运动教育教学模式的篮球课程采用“双循环”教学架构,将 8 周(16 次课/32 学时)的课程分为基础构建期、能力提升期和竞赛整合期三阶段。基础构建期为两周,教学活动为通过课外 8 学时的慕课学习完成篮球基础理论掌握,课内 8 学时重点进行传、投、运等基本技能的分组循环训练。能力提升期为三周,教学活动为集中开展技战术组合训练与裁判规则实践,12 学时用于挡拆配合、快攻反击等战术的情景模拟教学,4 学时实施裁判角色轮换演练。竞赛整合期为两周,教学活动以单循环联赛为核心,12 学时完成 6 场主客场制比赛,最后 4 学时通过赛事复盘与技能展示进行课程总结。慕课学习贯穿全程,每周课外需完成 2 学时理论模块,内容涵盖规则解析、战术图解与运动科学知识。

课堂教学设计形成四阶段闭环体系。常规建立期在第一周,重点组建 4-6 人固定团队并制定《团队章程》,同步开展基础体能测试与篮球发展史学习。技能精进期为第二周到第三周,实施技术分层训练,要求近距离原地投篮命中率 $\geq 60\%$,限定运球过障时间 ≤ 25 秒,轻微干扰下上篮成功率需达 70%,同时通过战术板推演掌握 2-3 套基础配合。联赛实施期为第四周到第七周,设置单循环常规赛与交叉淘汰季后赛,每周完成 2 场比赛,要求每场轮换 3 名学生裁判,团队需提交战术预案,个人完成 200 字比赛日志。总结提升期在第八周,举办篮球文化周活动,包含最佳阵容评选、经典赛事复盘与友谊赛组织。

3.2 慕课+运动教育教学模式的高校篮球课程教学目标

课程目标体系涵盖三个维度。运动技能方面要求男生罚球命中率 $\geq 65\%$ 、女生 $\geq 50\%$,全场运球上篮完成时间 ≤ 35 秒,团队场均助攻 ≥ 6 次且快攻成功率 $\geq 40\%$ 。文化素养目标包括完成 2000 字篮球运动有关书籍读书报告,组织篮球规则科普活动,以及 100%践行团队制定的《文明竞赛公约》。行为发展目标设定课外自主训练打卡 ≥ 12 次,参与篮球公益活动 ≥ 1 项,并带动 3 名非选课学生参与篮球活动。

3.3 慕课+运动教育教学模式的高校篮球课程教学过程管理

教学实施强调过程管理,建立慕课学习和课堂学习双控机制,每周发布 2 个 15-20 分钟微课视频,设置章节测试完成度 $\geq 80\%$ 的参赛门槛,要求学生在线上讨论区人均发帖 ≥ 3 次。竞赛组织采用积分进阶制,常规赛胜场积 3 分、负场积 1 分,季后赛晋级队伍额外积 5 分,同时设立进步最快奖等非竞技奖项。实施差异化教学策略,按技术水平划分基础组与提高组,基础组侧重脚步移动与基本技术,提高组着重战术配合与临场应变,考核标准根据基线成绩提升幅度分级评定。

3.4 慕课+运动教育教学模式的高校篮球课程教学评价制度

评价体系构建五维综合评价模型,技能发展依据技术测试达标率进行评价,占比 30%;战术素养通过比赛录像分析执行效果,占比 20%;理论认知评价综合慕课测试与读书报告成绩进行评价,占比 15%;团队贡献主要考核裁判履职与学习日志的质量,占比 15%;行为参与参考训练打卡与活动组织数据进行评价,占比 15%。过程性评价占比 60%,终结性评价占比 40%,并将而这两进行组合评价,同时设立技术、战术、理论三条单项成绩 ≥ 60

分的达标线,引入团队捆绑评价机制(个人成绩×团队系数)。

4 慕课+运动教育教学模式的价值厘定

4.1 主体学习范式的重构

本研究中慕课+运动教育教学模式的“运动季-竞赛链-数字孪生”三维协同机制,以运动季为基本教学单元,以篮球竞赛为主线,促使学生从被动接受者转型为知识建构的主体,充分调动学生独立思考(解析慕课资源)以及自主锻炼(制定比赛策略)、的能力,切实实现运动技能发展与实践应用能力提升(参与裁判实践)的统一,从而深化学生对篮球运动理论的理解,并提高学生的实践操作能力。

4.2 情境教学的具身效应

篮球运动是一项对抗激烈、团结协作的对抗性体育活动,不仅考验参与者的体能和技巧,还要求他们具备强烈的合作精神。慕课+运动教育教学模式能够将篮球运动课程教学引入篮球竞赛中复杂情境,通过主客场制联赛还原竞技压力情境,要求学生在高速对抗中完成决策;通过构建战术沙盘系统,促使学生以第一视角推演各种攻防战术,这种具身化学习环境使运动认知从机械记忆转向情境理解,从而提高学生的团队协作效能。

5 结论

本研究针对高校篮球选修课程教学中的现实困境,通过本土化改造运动教育模式与慕课技术的融合应用,构建了一套创新性的教学体系,突破了传统教学模式在课时分配、学生差异和能力培养等方面的局限,设计了基础构建-能力提升-竞赛整合三阶段教学流程,实现了理论教学线上化与技能实践情境化的有机统一。在实施过程中,通过分层训练机制满足不同水平学生的学习需求,借助动态积分制度激发团队竞赛活力,运用五维评价模型全面考察学生发展。不仅验证了数字化教学资源与运动教育模式结合的可行性,更通过联赛实践和文化浸润的双重路径,有效提升了学生的专业技能、战术素养和团队协作能力,为高校体育课程改革提供了新范式,对推动体育教育数字化转型具有示范作用。

参考文献:

- [1] 刘占鲁,冯嘉诚,余佳俊,等.慕课融入运动教育模式课堂教学的研究[J].广州体育学院学报,2019,39(04):110-112.
- [2] 张帅,唐锦兰.教育数字化转型背景下我国外语类慕课研究现状与前瞻[J].外语教育研究前沿,2024,7(04):51-57+95.
- [3] 高航,章荣江,高嵘.当代运动教育模式研究[J].体育科学,2005,(06):79-83+86.DOI:10.16469/j.css.2005.06.019.
- [4] 李小刚.美国运动教育模式本土化研究[J].体育文化导刊,2017,(05):161-165.
- [5] 高航,高嵘.论运动教育模式的时代价值与发展[J].体育文化导刊,2020,(01):105-110.
- [6] 张李强,汪晓赞.运动教育模式的国际研究热点述评[J].武汉体育学院学报,2017,51(02):93-100.

Research on localization of sports education mode based on MOOC platform -- Taking College Basketball Course as an example

Gu Jiawei¹, Xie Yingying²

¹Shandong Sport University, Jinan 250100, Shandong; ²National Basketball Academy, Shandong Sport University, Rizhao 276800, Shandong

Abstract: This study explores a new teaching system that deeply integrates MOOC and sports education models to address the problems of emphasizing skills over literacy and lacking subjectivity in traditional basketball teaching. By deconstructing the six core elements of the sports education model and innovatively designing a dual cycle three-stage curriculum structure, MOOC technology is embedded into the entire process of basic theory, skill training, and league practice, forming an online and offline linked teaching loop. In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curriculum, a hierarchical training mechanism, a dynamic integration system, and a five dimensional evaluation model were adopted, effectively resolving the contradictions in class hour allocation and differences in student abilities. A new paradigm of integrating digital learning, situational competition, and cultural immersion was constructed, providing a replicable solution for the reform of college basketball curriculum.

Keywords: MOOC; Sports education teaching mode; Basketball; practice

数字年龄歧视——人工智能给老年人带来的挑战和机遇

沙琳·楚恩

(多伦多大学, 安大略 多伦多)

吴静¹ 刘晓燕² 译

(1.青岛科技大学, 山东 青岛 266061, 2.山东中医药大学, 山东 济南 250355)

摘要: 人工智能 (AI) 和机器学习正在重塑医疗、教育、就业、金融和法律等领域。然而, AI 系统的开发数据往往包含社会显性和隐性偏见, 其预测模型可能加剧社会不平等和权力失衡等问题。当前, 关于 AI 如何延续种族、性别和阶级歧视的讨论已成主流, 但对其年龄歧视的研究相对不足。面对全球老龄化与 AI 技术的快速发展, 亟需审视 AI 系统中的年龄偏见。本文重点探讨 AI 年龄歧视现象, 提出一个概念模型, 并分析相关伦理和法律影响, 讨论数字世界的不公正循环如何助长 AI 年龄歧视。最后, 本研究指出未来数字年龄歧视的研究方向, 以完善该领域的知识体系。

关键词: 偏见; 老年学; 机器学习; 技术

基金项目: 教育部人文社科规划基金项目 (20YJAZH103); 青岛市社会科学规划研究项目(QDSKL2301164)

DOI: doi.org/10.70693/rwsk.v1i5.985

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加剧和技术的快速发展, 人工智能 (AI) 领域面临着新的挑战与考量。根据 Russell 和 Norvig (2010) 的定义, 人工智能被描述为“研究能够从环境中接收感知并采取行动的智能体” (p.viii)。

尽管当前关于 AI 偏见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种族和性别偏见及其引发的严重后果 (Zhavoronkov et al., 2019), 但对 AI 中与年龄相关的偏见, 即年龄歧视, 却鲜有关注 (Butler, 1969)。年龄歧视是一种复杂的社会偏见, 其表现形式主要包括: (a) 对老年人群和衰老过程的偏见性态度; (b) 针对老年人的歧视性行为; 以及 (c) 助长这些态度和行为的制度化政策与社会实践 (Rosales & Fernández-Ardévol, 2020; Wilkinson & Ferraro, 2002)。2019 年新冠疫情大流行期间, 老年人被普遍视为最易感、最脆弱的群体, 这一现象进一步凸显了年龄歧视的普遍性 (Vervaecke & Meisner, 2021)。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报告 (2021) 指出, 年龄歧视对健康福祉产生了显著的负面影响, 导致早逝和医疗成本增加。这些报告还强调, 在稀缺医疗资源的分配中, 年龄有时成为唯一的决定因素, 这意味着个体的年龄可能直接决定其能否获得基本的医疗干预。

鉴于 AI 偏见已被广泛视为亟待解决的关键问题, 我们迫切需要采取基于证据的策略来预防和解决 AI 系统中的与年龄相关的偏见。这些策略不仅将为未来法律和社会政策的制定提供坚实的依据, 还将助力减少偏见, 促进社会公平。在本文中, 我们首次提出了“数字年龄歧视”这一术语, 将其定义为在人工智能等技术中所表现出的年龄偏见, 并深入探讨了导致 AI 系统产生这种偏见的机制。在接下来的部分, 我们将详细讨论 AI 系统中的年龄歧视现象、其更广泛的伦理和法律影响, 以及未来研究的方向。

作者简介: 沙琳·楚恩【加拿大】(1974—), 女, 博士, 教授, 研究方向为老年学与人类学。

译者简介: 吴静(1978—), 女, 硕士, 副教授, 研究方向为人工智能与老龄传播;

刘晓燕(1986—), 女, 硕士, 讲师, 研究方向为英语翻译与跨文化传播。

本译文是基于 CC BY 许可协议的原文翻译。

一、AI 系统中的偏见

AI 技术因其在学习和推理能力上的显著进步，被誉为发展最快的技术 (Brown,2020)。作为一种工具，AI 的潜在应用范围在理论上几乎是无限的。从根本上来讲，AI 工具通过快速处理海量数据集（数据量越大越好）的机器学习算法，实现模式识别、统计关联、预测、推理和问题解决 (Presser et al., 2021)。一项最新报告显示，“数字世界”每天产生的数据量已超过 2.5 万亿兆字节 (O’Keefe et al.,2020)。凭借强大的预测建模和数据处理能力，AI 被认为具有变革潜力，并日益成为公众和政策制定者关注的焦点。AI 具备以超高速，面向大规模人群或全球范围补充人类决策的能力，具备从根本上改变全球经济性质的潜力。(Margetts & Dorobantu,2019;Presser et al.,2021)。

然而，尽管有郑重承诺，公开发布的 AI 应用并非完全免受种族和性别偏见的影响 (Chen, Szolovits & Ghassemi,2019; Howard & Borenstein,2018)。例如，一项广泛部署的 AI 算法被发现低估了黑人患者的健康风险，与白人患者相比，其预测结果存在显著偏差 (Obermeyer et al.,2019)。该算法基于个人的医疗费用进行预测，却忽略了黑人患者医疗支出较低的主要原因是种族主义导致的医疗资源获取不足。类似的种族偏见案例还包括：AI 系统倾向于给黑人囚犯判处更长的刑期 (Angwin et al.,2016)，而且不精确的面部识别算法误判黑人面孔的概率是白人的五倍 (Simonite,2019)。针对女性的 AI 偏见也得到了证实，并带来了严重的社会后果，例如，女性收到高薪职位的求职广告更少 (Dastin,2018)，并且在就业中遭受歧视 (Datta et al.,2015)。这种偏见的根源在于 AI 预测算法不仅从定量数据中学习，还从文本（即语料库）中学习，而这些文本往往隐含着历史文化关联，从而导致语义偏见。例如，算法会将刻板印象中的男性名字与劳动力相关联，而将女性名字与家庭或育儿相关联 (Caliskan et al.,2017)。

对于计算机系统偏见的最早定义指出，计算机系统能够“系统性且不公平地歧视某些个体或群体，而偏袒其他人。如果系统以不合理或不恰当地剥夺个体（群体）的机会（利益），或分配不良结果为基础，则会造成不公平歧视” (Friedman & Nissenbaum,1996,p.332)。算法偏见可能导致两种独特的不良后果：分配性伤害和表征性伤害 (Crawford, 2017)。分配性伤害涉及资源和机会的分配，例如保释机会、求职通知、医疗资源或服务的获取等。相比之下，表征性伤害关注不同群体或身份如何在社会中被代表和认知。值得注意的是，这些伤害的根源十分复杂。虽然技术因素（如偏见数据和设计选择）起着重要作用，但偏见也可能来自使用情境，例如人类用户如何解读系统输出，或系统设计假设的能力和价值观与实际用户的能力和价值观不匹配 (Danks & London,2017; Friedman & Nissenbaum,1996)。这些情境因素反映了从技术诞生之初就存在的个体与社会偏见，包括谁参与技术设计、他们对终端用户的假设，以及终端用户使用技术时的资源和能力差异，这些差异使哪些数据（以及关于谁的数据）更易被收集。所有这些因素反过来又受到现有技术的分配性和表征性效应的影响，可能形成一种“不公正循环” (Whittlestone et al.,2019)，其中技术、个体和社会偏见相互作用，相互强化（见图 1）。

相比之下，在研究 AI 偏见的文献中，种族和性别偏见较多，与年龄偏见相关的讨论较少。然而，在这个日益数字化的世界中，衰老的过程直接且不知不觉地加剧了社会不平等、排斥和边缘化。现在是时候批判性地反思和思考 AI 年龄歧视了。接下来的部分集中讨论数字鸿沟、强化年龄歧视的不公正循环，以及数字年龄歧视的伦理和法律影响。

二、年龄歧视与数字鸿沟

技术的开发和使用常常将老年人排除在外，从而形成了所谓的“物理——数字鸿沟”。这种鸿沟的出现，源于某些群体因无法参与周围的技术应用而感受到的排斥感 (Ball et al.,2017)。老年人被排除在数字平台的开发和使用之外，导致与年龄相关的偏见数据在人工智能中不断涌现 (Rosales & Fernández-Ardévol,2020; Wilkinson & Ferraro,2002)。一种常见的误解是将老年人视为处于衰退期的同质化群体，认为他们缺乏技术能力，且在使用技术时需要年轻人的指导 (Mannheim et al.,2019)。此外，这种家长式的刻板印象和居高临下的态度助长了有害的“怜悯式年龄歧视”，这种刻板印象已渗透到公共言论中 (Binstock,1983)，并最终被老年人内化 (Vervaecke & Meisner,2021)。内化的负面刻板印象可能导致老年人在认知能力（例如记忆力）和心理表现方面出现衰退 (Hegman & Bugental,2015; Hess et al.,200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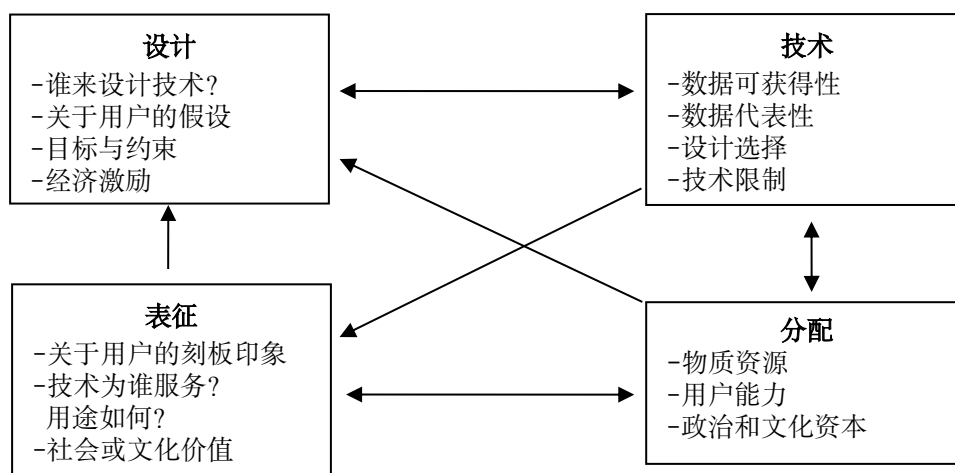


图1 社会成员在技术开发、应用和理解方面的不公平循环 (Whittlestone et al., 2019)

在人工智能日益普及的社会中，由于数字鸿沟的存在，老年人面临进一步被社会排斥和退化的风险 (Rosales & Fernández-Ardévol, 2020)。随着技术的不断进步，根据老年人是否有能力获取信息技术而将其划分为不同群体的风险也在增加 (Srinuan & Bohlin, 2011)。尽管越来越多的老年人开始使用技术并从中受益 (Anderson et al., 2017; Anguera et al., 2017; Cotten et al., 2011; Czaja et al., 2018; Decker et al., 2019; Harerimana et al., 2019; Hurling et al., 2007; Irvine et al., 2013; Tomasino et al., 2017; White et al., 2002)，但他们仍然是最不可能使用电脑和互联网的年龄群体。其原因包括身体障碍（例如身体残疾）和心理因素（例如缺乏使用技术的信心；Anderson et al., 2017; Tomasino et al., 2017）。欧盟的一份报告显示，三分之一的老年人表示从未使用过互联网 (Anderson et al., 2017)。一项对欧洲 17 个国家的调查表明，老年人使用互联网的比例因地理位置和年龄而异，随年龄的增长，不使用互联网的比例也在增加 (König et al., 2018)。结果显示，在 65 岁及以上的人群中，52% 是非互联网用户，而在 80-84 岁的人群中，这一比例升至 92%，这表明许多欧洲老年人不使用互联网，受到数字鸿沟的严重影响 (König et al., 2018, p. 626)。同样，在加拿大多伦多，60 岁及以上居民的家庭互联网接入率低于年轻居民，且接入者的网速低于加拿大国家目标的 50 Mbps (Andrey et al., 2021)。此外，近三分之一的老年群体缺乏互联网连接设备 (Andrey et al., 2021)。老年人在有关技术的物质获取、教育和技术学习支持方面存在更大的差距 (Ball et al., 2017; Cronin, 2003; Lagacé et al., 2015)。对于部分老年人而言，学习使用技术的挑战以及对技术在最需要时无法正常工作的担忧，会带来额外的压力 (Cotten et al., 2011)。

三、数字技术中的年龄歧视不公平循环

上述技术获取障碍为理解老年人被排除在数字技术的研究、设计和开发过程之外提供了可能的解释 (Baum et al., 2014; Kanstrup & Bygholm, 2019; Lagacé et al., 2015)。在相关文献中，老年人有时被称作“隐形用户”这暗示他们在技术设计过程中被忽视，其利益和需求未被充分考虑 (Kanstrup & Bygholm, 2019; Rosales & Fernández-Ardévol, 2019)。在以年轻人为主导的技术设计或产品开发过程中，老年人的观点往往难以被准确纳入。Charness (1990, 1992, 2009, 2020) 的研究强调，当技术设计未能考虑与年龄相关的正常变化（如感知、认知和心理运动能力）时，会导致人与系统适配性失调。这种失调不仅降低了老年人对技术的采纳率，还导致用户体验欠佳。随着社会向更依赖技术（例如医疗技术、信息和通信技术）的方向转变，这种影响可能会进一步加剧，使老年人在技术赋能的世界中进一步落伍。

此外，年龄歧视的态度在营销和研究中表现得尤为明显 (Ayalon & Clemens, 2018)，这种态度通过历时考察发现对老年人的排斥，特别是通过任意设定的年龄上限（如 50+ 或 60+）来影响技术设计 (Mannheim et al., 2019)。将老年人视为同质化群体的观念可能会忽视他们细微的需求差异。而且，大量信息技术主要面向老年人的医疗保健和慢性病管理 (Mannheim et al., 2019)，而非休闲、娱乐或乐趣。这种现象背后的假设是老年人是不健康的，管理健康状况是他们寻求使用技术并从中受益的唯一原因。这一假设可能会产生反馈循环，从而强化负面刻板印象。具体而言，如果大多数面向老年人的技术旨在解决或管理健康问题，那么这很容易强化老年人是不健康的、需要支持或处于衰退期的印象。Díaz 等人 (2018) 通过对维基百科、推特和网络爬取的大量文本数据进行情感分析，揭示了显著的年龄偏见。他们发现，与年龄相关的偏见体现在显性和隐性的年龄歧视刻板印象中。例如，在

控制其他句子内容后, 含有“年轻”字眼的句子比相同的句子但包含“年老”一词获得正面评价的可能性高出66%。在他们通过分析词嵌入探索隐性偏见时发现, “青春”与“勇敢”等词相关联, 而“年老”和“年长”则与“固执”和“顽固”相关联。这种偏见的另一个影响是, 这些技术所收集的数据最终只代表了有健康问题的老年人群体。这种选择偏差使技术无法捕捉到老年人群体的异质性, 导致 AI 等目标技术与老年人的实际需求不匹配 (Crawford,2017)。

综上所述, 可用于训练 AI 模型的老年人数据不足, 而现有语料不仅显性呈现年龄相关偏见, 还隐性地强化这种偏见 (Díaz et al.,2018)。当用算法基于此类语料来分析老年人对产品或服务的态度时, 其情感分析结果往往呈现系统性偏差, “仅因为句子描述对象是老年人, 输出结果就被标记为负面” (Díaz et al.,2018,p.9)。这可能会进一步导致的偏见, 产生缺乏普适性的 AI 模型, 无法准确反映老年人真实需求、兴趣和价值观, 同时强化或放大现有的劣势 (Coiro,2003)。此外, 这种偏见可能影响或减少面向老年人的产品或服务 (Díaz et al.,2018)。

AI 系统中的年龄歧视通过多重路径被生产并强化, 且与更宽泛的社会不公循环相互交织, 如图 2 所示。现有的表征将老年人归为“体弱多病”或“技术低能”的刻板印象, 影响了对老年人的假设, 可能导致老年人在研究和设计阶段被边缘化 (设计)。新的信息进一步强化了年龄歧视的刻板印象, 老年人主要侧重于健康监测和保健管理 (设计/技术)。数字鸿沟 (分配) 及现有应用模式共同导致数据集不能准确代表健康的老年人 (技术)。这些有偏见的数据集进一步促进了主要关注医疗需求的技术开发 (设计)。由于服务于老年人需求、兴趣和愿望的数字技术有限, 这可能进一步加剧数字鸿沟 (分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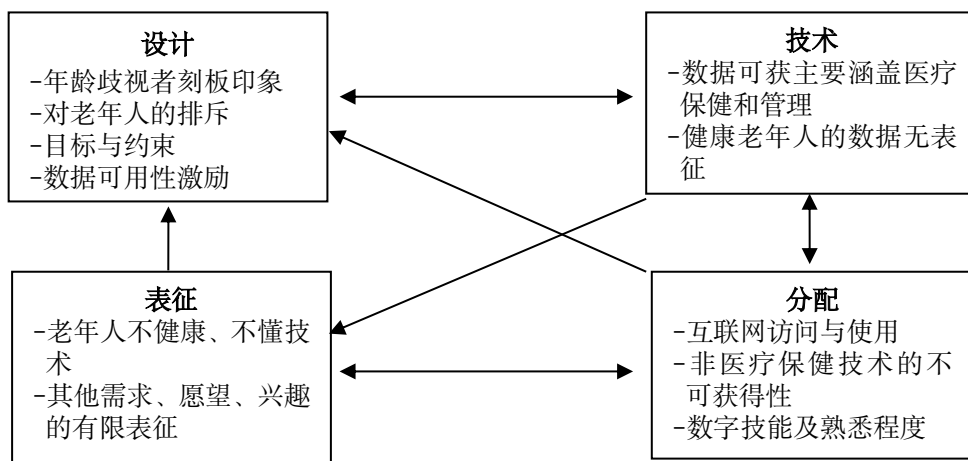


图 2 数字技术中循环往复的不公正现象如何导致数字年龄歧视

通过这种方式, 新系统不仅强化了不平等, 还放大了对“数字底层阶级” (Petersen & Bertelsen,2017) 的排斥, 这一群体主要包括老年人、贫困人群、种族化群体和边缘化群体。这引发了对老年人如何在日益数字化的世界中被纳入和看待的疑问, 以及强化年龄歧视的社会结构如何在 AI 系统中体现。在新冠疫情期间, 对数字技术的使用激增 (De' et al.,2020), 解决这些根本性问题显得尤为迫切。

四、AI 中的年龄歧视伦理与法律影响

年龄歧视是当前人工智能伦理领域中一个被忽视的重要议题。我们在检索《人工智能伦理指南全球清单》 (AlgorithmWatch,2021) 时得到了明确印证。该清单系统性收集了全球范围内关于 AI 系统自动化决策伦理标准的相关文件。大多数指南强调公平性是一项关键的伦理原则, 而公平性通常涉及对平等和正义的考量。我们对清单中 146 份可公开获取的英文文件 (来源包括政府机构、私营部门、民间组织和国际机构) 进行了全面检索, 重点关注“年龄歧视”及相关概念 (如“年龄偏见”“年龄”“老年/年长”“长者”和“老人”等)。研究发现: 仅有 34 份文件 (占比 23.3%) 明确提及年龄歧视问题; 其中过半文件 (19 份, 54.7%) 仅将年龄简单列为受保护特征之一, 未作深入探讨。例如, 联合国全球工会《人工智能十大伦理原则》 (2018) 指出: “在设计和维护人工智能系统时, 必须控制系统中的负面或有害于人类的偏见, 并识别任何偏见——无论是性别、种族、性取向、年龄等——以确保系统不会传播这些偏见” (第 8 页)。仅有 12 份文件 (8.2%) 提供了针对老年人偏见的具体讨论, 且内容通常极为简略。例如, 皇家医学院学会关于医疗保健中的人工智能的报告 (2019) 指出: “可以认为, 监管水平应根据风险程度而有所不同——例如, 精神病患者、儿童和老年人可能特别容易受到数字化系统‘不

良建议’的影响”（第 28 页）。

我们的综述最终表明，当前人工智能伦理框架未能充分认识到针对老年人的年龄歧视所具有的特殊性和独特性。要确保 AI 发展符合伦理标准、促进社会公平并消除不公正偏见，这一问题亟需得到明确认识和系统解决。正如前文所述，忽视老年群体的准确代表性和合理参与，不仅会扩大数字鸿沟，更可能加剧本可避免的社会不平等。

年龄歧视在 AI 应用中的一个突出表现是招聘系统的算法偏见。例如，某些 AI 简历筛选工具可能会根据申请人的毕业年份排除求职者。2017 年，包括 Jobr 在内的 AI 招聘平台就因禁止申请人选择 1980 年之前的毕业年份或第一份工作而受到调查（Ajunwa,2019）。同样，算法可能会优先选择年轻、男性求职者，这反映了机构当前的人员构成，并试图模仿雇主过去的招聘行为，从而延续既有的偏见（Kuei & Mixon,2020）。从伦理和法律视角看，这种做法严重违背了《联合国宪章》（1945）确立的机会公平原则，因为其基于与能力无关的固有特征（如年龄、性别）剥夺合格个体的就业机会。

AI 工具的广泛使用为个人和社会带来了变革性后果，同时也引发了一系列“亟待解决的法律问题”（Presser et al.,2021）。这些问题包括安全、公平、偏见和歧视、法律人格、知识产权、隐私和数据保护以及损害赔偿责任等（Rodrigues,2020）。人们越来越认识到，需要为人工智能的开发和部署制定“规范框架”（Martin-Bariteau & Scassa,2021）。监管治理框架有助于防止和减轻 AI 算法部署造成的伤害，并为受侵害的个人或实体提供法律救济途径。在开发过程中，监管治理框架为 AI 的伦理开发和部署提供指导，包括识别偏见和偏见最小化。

近年来，像谷歌和领英这样的大型雇主因使用软件算法向年轻求职者定向投放互联网招聘广告，排除了 40 岁以上的求职者，而面临一系列诉讼（Ajunwa,2018）。基于脸书的付费广告平台也发生了多起诉讼与和解，该平台允许广告商根据受保护类别（如年龄）进行微观定向广告排除，这违反了联邦和州民权法（美国公民自由联盟, 2019）。这些歧视性广告行为阻止老年人看到招聘广告，实质上剥夺了他们的就业机会。

利益相关者和监管者在 AI 监管和治理中面临着独特挑战。目前尚不存在全球统一的人工智能治理法律规范。国际上的 AI 法律来源可能在其他司法管辖区具有说服力，但不具约束力。这意味着立法者可以借鉴其他国家或地区应对 AI 普及带来挑战的经验，但最终必须制定和实施符合自身法律结构的监管体系。例如，《加拿大数字宪章实施法案》（2020）就是以欧盟《通用数据保护条例》（2016）为蓝本制定的。

在制定有关技术的法律和法规时，国内和国际应用方面都面临着全球性的挑战和问题。例如，在加拿大，政府和监管者必须在联邦和宪法框架内监管 AI（Martin-Bariteau & Scassa,2021），因为医疗保健和人权方面的权力由联邦和省政府共享。因此，“在加拿大实现连贯、一致和基于原则的 AI 监管，需要联邦和省级之间相当程度的合作，以及机构间强有力的协作——而这二者可能都难以实现”（Martin-Bariteau & Scassa,2021）。除管辖权问题外，政府还试图平衡相互竞争的监管利益，既要保护公众利益，又要避免过度监管阻碍创新（Martin-Bariteau & Scassa,2021）。

此外，一些 AI 算法作为专利，享有知识产权保护。这些知识产权保护使得受侵害个体（包括刑事被告）无法接触和审查 AI 算法。许多应用于社会、政治和法律的 AI 算法利用知识产权保护来逃避法律和研究审查。

鉴于 AI 系统的复杂性，关于年龄相关偏见的透明度至关重要。只有通过透明化（例如通过研究）仔细审查，我们才能从法律角度评估这些系统是否在延续社会中普遍存在的年龄歧视。否则，令人担忧的是，AI 可能会通过晦涩难懂、缺乏透明度的方式逃避审查，“复制现有的社会关系等级和脆弱性……”（Martin-Bariteau & Scassa,2021）。尽管 AI 应用广泛，但从监管或法律角度看，对由 AI 驱动的活动培训、支持、审计或监督仍然非常有限（Presser et al.,2021），加拿大当前的 AI 监管制度明显滞后（Martin-Bariteau & Scassa,2021），仍处于起步阶段。现有法律框架是否足以保护或为使用 AI 而遭受年龄歧视的受害者提供任何有意义的补救措施，尚不明确。

五、未来展望

尽管当前关于人工智能的讨论多聚焦于其潜在风险，但我们认为 AI 在消除人类偏见方面同样具有重要价值。以就业领域为例，新型 AI 招聘平台能够有效规避传统简历筛选过程中的人为偏见，帮助识别那些可能被忽视的优秀人才（Wiggers,2021）。此外，越来越多的研究正在与老年人合作开展，但这一过程需要持续分析，以解决年龄歧视等问题。

更多的技术开发研究也在老年群体中开展（Chu et al.,2021; Harrington et al.2018; Mannheim et al.,2019）。在

医疗保健领域,减少偏见也备受关注,验证数据集的代表性被认为是应对算法偏见的最佳方法(Ho et al.,2020)。展望未来,我们仍然乐观地认为,可以通过多管齐下的方法来解决数字年龄歧视问题。首先,从批判性老年学视角出发,在开发AI系统的整个流程中纳入老年人至关重要。这将需要解决结构性问题,例如参与研究和开发的途径、时间、培训和手段,以及研究资助和技术开发的现有资金限制(Grenier et al., 2021)。其次,需要采取跨学科方法,汇集老年学家、社会科学家、哲学家、法律学者、伦理学家、临床医生和技术专家,共同协作应对数字年龄歧视。特别是在新冠肺炎背景下,年龄在某些辖区成为获得医疗保健和救治的唯一标准,因此对年龄作为偏见的跨学科和批判性审查尤为必要(WHO & UN,2021)。

理解和解决数字年龄歧视问题既充满紧迫性,也蕴含着机遇。迄今为止开发的AI或许不能满足老年人的需求,甚至可能具有排他性和歧视性。然而,也有机会开发包括老年人在内的项目和机制,并界定关于AI的公平和伦理标准。随着社会文化转变,越来越多的人将技术融入生活,以保持与技术赋能世界的联系,尤其是当前精通技术的年轻一代逐渐老去,他们很可能成为未来技术(如医疗、信息和通信技术)的最大消费群体(Foskey,2001; Kanstrup & Bygholm,2019; Rosales & Fernández-Ardévol,2019)。新冠肺炎显著加速了日常需求(如在线杂物店、购物、医疗)和社交技术的使用(De' et al.,2020)。这种技术的普遍使用表明,可能有更多人被排除在这些沟通方式之外,并受到当前AI系统中隐性偏见的影响。这些情况共同凸显了对数字年龄歧视进行更多研究的必要性。

在未来研究中,我们团队计划开展一项系统的多阶段研究,旨在深入探究人工智能系统中的年龄歧视程度:首先,我们将建立科学的评估体系来量化AI中年龄歧视的普遍程度,并分析算法决策过程中年龄偏见的形成机制,揭示这些技术偏见如何延续老年人的社会不平等;其次,我们将基于现有理论构建更全面的分析框架,阐释老年人在AI使用中遭遇的显性与隐性歧视,推动形成更具社会意识的AI开发范式。考虑到“数字原住民”(国际电信联盟, 2013)未来将成为老年人群主体,其对AI公平性的更高标准要求为我们提供了重要研究契机。为此,我们将重点构建具有代表性的老年群体数据集以开发公平算法(如面部识别技术),同时联合老年组织、政府部门、技术研发机构等利益相关方建立伙伴关系,以制定法律和社会政策,旨在减少技术导致老年人被排除在外以及不平等对待的情况。

总之,年龄歧视作为人工智能领域尚未充分重视的研究盲区,其影响机制亟需系统性探讨。当前技术开发过程中对老年群体的系统性排斥,不仅延续了社会既有的年龄歧视观念,更通过技术固化作用加剧了数字鸿沟的恶性循环。基于此,我们强烈建议将数字年龄歧视纳入AI研究与政策制定的核心议程,以此推动人工智能技术向更加公平、包容的伦理方向发展。

参考文献:

- [1]ABBEY, R., Hyde, S. No country for older people? Age and the digital divide[J]. Journal of 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and Ethics in Society, 2009,7(4), 225-242.
- [2]ANGWIN, J., KIRCHNER, L., Larson, J., et al. Machine bias: There's software used across the country to predict future criminals. And it's biased against blacks 2016. ProPublica.
- [3]BALL, C., FRANCIS, J., HUANG, K.-T, et al. The physical-digital divide: Exploring the social gap between digital natives and physical natives[J].Journal of Applied Gerontology,2017,38(8),1167-1184.
- [4]BAUM, F., NEWMAN, L., BIEDRZYCKI, K. Vicious cycles: Digital technologies and determinants of health in Australia[J].Health Promotion International,2014, 29(2),349-360.
- [5]CHARNESS,N., BOOT,WR. Aging and information technology use: Potential Current and barriers[J]. Current Directions in Psychological Science,2009,18(5),253-258.
- [6]CZAJA, S.J., BOOT, W. R., CHARNESS, N., et al. Improving social support for older adults through technology: Findings from the PRISM 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J].The Gerontologist, 2018,58(3),467-477.
- [7]DATTA, A., TSCHANT,M.C., DATTA, A. Automated experiments on ad privacy settings[J]. Proceedings on Privacy Enhancing Technologies,2015(1),92-112.
- [8]GRENIER, A., GONTCHAROV, I., KOBAYASHI, K., et al. Critical knowledge mobilization: Directions for social gerontology [J]. Canadian Journal on Aging, 2021,40(2), 344-353.
- [9]HEHMAN, J. A., BUGENTAL, D.B. Responses to patronizing communication and factors that attenuate those responses[J].Psychology and Aging,2015,30(3), 552-560.

[10]PETERSEN,L.S., BERTELSEN, P. Equality challenges in the use of eHealth: Selected results from a Danish citizens survey[J].Studies in Health Technology and Informatics,2017,245,793-797.

Digital Ageism: 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 in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for Older Adults

Charlene H.Chu

Lawrence S. Bloomberg Faculty of Nursing, University of Toronto, Toronto, Canada

Wu Jing¹, Liu Xiaoyan² (trans.)

¹ *College of Communication, Qingdao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Qingdao, China*

² *College of Foreign Languages, Shandong Universit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Jinan, China*

Abstract: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I) and machine learning are changing our world through their impact on sectors including healthcare, education, employment, finance, and law, AI systems are developed using data that reflect the implicit and explicit biases of society, and there are significant concerns about how the predictive models in AI systems amplify inequity privilege, and power in society. The widespread applications of AI have led to mainstream discourse about how AI systems are perpetuating racism, sexism, and classism; yet, concerns about ageism have been largely absent in the AI bias literature. Given the globally aging population and proliferation of AI, there is a need to critically examine the presence of age-related bias in AI systems. This forum article discusses ageism in AI systems and introduces a conceptual model that outlines intersecting pathways of technology development that can produce and reinforce digital ageism in AI systems. We also describe the broader ethical and legal implications and considerations for future directions in digital ageism research to advance knowledge in the field and deepen our understanding of how ageism in AI is fostered by broader cycles of injustice.

Keywords: Bias; Gerontology; Machine learning; Technology

This article is a Chinese translation of “Digital Ageism: 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 in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for Older Adults” by Charlene H Chu et al., published in *The Gerontologist*, Volume 62, Issue 7, September 2022, Pages 947–955 (<https://doi.org/10.1093/geront/gnab167>).

The original article is distributed under the terms of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CC BY) license, which permits unrestricted use, distribution, and reproduction, provided the original work is properly cited. Translated by [Wu Jing, Liu Xiaoyan].

虚拟货币洗钱犯罪的法律风险与防控机制研究

陈文博¹

(1.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湖北 武汉 430073)

摘要:随着区块链技术和虚拟货币的快速发展,其匿名性、去中心化和跨境便捷性等特征在推动金融创新的同时,也为洗钱犯罪提供了新的工具和途径。本文首先从匿名化地址、去中心化架构及技术复杂性等方面深入剖析了虚拟货币固有特性与洗钱风险之间的内在关联;继而归纳了犯罪分子通过中心化交易所、多次“链上”转移、混合服务(Mixer/Tumbler)、去中心化金融(DeFi)、去中心化交易所(DEX)、非同质化代币(NFT)和游戏金融(GameFi)等多元化手段实施洗钱的具体模式;在此基础上,评述了当前国际和国内法律框架在法律定性、反洗钱义务主体认定、跨境监管合作及技术证据收集等方面的主要不足。针对上述问题,本文提出了构建完善虚拟货币法律属性与监管主体的制度体系、建立基于监管科技的大数据与人工智能风险防控平台、强化交易平台和行业自律组织的合规责任,以及完善跨境司法协助与刑事打击机制等综合对策。研究表明,多层次、系统化的法律与技术并举防控模式,有助于在维护创新活力的同时,提升对虚拟货币洗钱犯罪的识别、预警和打击能力。

关键词:虚拟货币;洗钱犯罪;法律风险;防控机制

DOI: doi.org/10.70693/rwsk.v1i5.986

一、引言

数字经济的蓬勃发展,深刻地改变了全球经济的运行模式和金融服务的提供方式。在这场变革中,以区块链技术为核心的虚拟货币体系异军突起。比特币作为首个去中心化加密货币,由化名中本聪的个人或团体在2008年首次提出其概念,并在2009年正式启动其网络运行。比特币的创新之处在于其点对点的电子现金系统,通过密码学原理保证交易的安全性和不可篡改性,无需依赖传统的中央银行或金融中介机构即可完成价值转移。随后,受到比特币的启发,以太坊、莱特币、瑞波币等众多不同类型的虚拟货币相继涌现,它们在共识机制、智能合约功能、交易速度和应用场景等方面各有侧重,进一步拓展了虚拟货币的应用范围。凭借其所宣称的便捷性、较低的交易成本以及潜在的投资价值,虚拟货币在全球范围内获得了显著的普及和应用,逐渐渗透到跨境支付、数字资产交易、供应链金融乃至新兴的去中心化应用(DApps)等多个领域,对传统金融体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然而,与此相伴随的是,虚拟货币所固有的匿名性特征、无国界的跨境便捷性以及底层技术的复杂性等特点,也使其日益成为洗钱等非法活动的理想工具,对全球金融安全和社会稳定构成了日益严峻的挑战。这些特性为犯罪分子隐藏其非法所得的来源和真实所有者提供了便利,使得追踪和查处洗钱活动变得异常复杂。

1.1 虚拟货币洗钱犯罪的严峻性及其危害

洗钱犯罪,作为一种旨在掩盖非法收益来源的活动,其核心目的是使非法获得的财产在表面上看起来合法化,从而逃避法律的制裁。传统的洗钱犯罪通常依赖于银行体系、现金交易、空壳公司以及跨境资金转移等多种渠道。然而,虚拟货币的出现,由于其独特的属性,为犯罪分子提供了新的、更为隐蔽和高效的洗钱工具。具体而言,由于虚拟货币交易的匿名性,虽然所有交易记录都公开记录在区块链上,但区块链地址与现实世界中的个人身份之间的关联往往需要额外的身份验证过程,而犯罪分子会采取各种技术手段来规避这些验证措施,从而隐藏其真实身份。其全球流通的特性使得跨境洗钱变得异常便捷,犯罪分子可以几乎无成本、无延迟地将资金转移到世界任何角落,从而轻易规避不同国家和地区的监管措施。^[1]而去中心化的特点也使得传统的监管框架难以有效覆盖,因为虚拟货币网络并非由单一的中心化机构控制,这使得传统的监管主体难以找到明确的监管对象和责任承担者。近年来,利用虚拟货币进行洗钱的案件数量和涉及的资金规模都在持续攀升,犯罪手段也随着技术的发展而日益复杂化,例如利用复杂的交易路径、混合服务、去中心化交易所等。这种犯罪活动不仅严重侵蚀了金融市场的健康发展,破坏市场诚信,还可能为恐怖主义融资等更严重的犯罪活动提供资金支持,对社会公共利益和国家安全构成直接威胁。

作者简介:陈文博(2003—),男,刑事司法学院本科,研究方向为刑事法学与犯罪学。

1.2 研究意义与核心问题的重要性

鉴于虚拟货币洗钱犯罪日益严峻的态势及其潜在的巨大危害,深入研究其法律风险并构建一套全面有效的防控机制显得尤为重要。本研究旨在系统地分析虚拟货币所特有的技术和经济特性与洗钱风险之间的内在关联,全面梳理当前国内外法律框架在应对此类新型犯罪方面存在的不足和挑战,并在此基础上,从完善相关的法律制度、构建多层次的风险防控体系以及加强刑事打击力度等多个维度提出具有实际可操作性的对策建议。通过本研究的深入探讨和分析,期望能够为全球范围内防范和打击虚拟货币洗钱犯罪提供坚实的理论支撑和切实可行的实践指导,从而维护全球金融秩序的稳定,保障社会经济的安全运行^[2]。

本论文将围绕以下三个核心问题展开深入探讨:首先,虚拟货币的哪些具体特性使其更容易被犯罪分子用于实施洗钱活动?其次,当前国际和国内的法律框架在应对虚拟货币洗钱犯罪方面存在哪些主要的局限性和挑战?最后,为了有效遏制和打击虚拟货币洗钱犯罪,应该如何构建一套全面、多层次且具有前瞻性的防控机制?通过对这些关键问题的细致分析和深入解答,本研究旨在为提升全球范围内虚拟货币洗钱犯罪的防控能力贡献学术力量和实践智慧。

二、虚拟货币洗钱犯罪的法律风险分析

2.1 虚拟货币特性与洗钱风险的内在关联的剖析

虚拟货币之所以日益成为洗钱犯罪分子的青睐之选,绝非偶然,而是与其自身所固有的多种独特特性之间存在着深刻的内在关联。深入而细致地剖析这些特性及其如何被犯罪分子利用以实施洗钱活动,是构建有效防范机制的首要前提。具体来看,虚拟货币的匿名性是其被用于洗钱的关键因素之一。虽然区块链上的所有交易记录都是公开透明的,但区块链地址本身并不直接与现实世界中的个人身份信息相关联。用户可以轻易地生成大量的匿名地址,并在这些地址之间进行交易,这使得执法机构在追踪资金流向时面临巨大的挑战,难以将链上的交易行为与特定的自然人或法人实体联系起来。此外,虚拟货币所具备的无国界的跨境便捷性以及相对较低的交易成本,为犯罪分子将非法资金快速、便捷地转移到世界任何地方提供了便利,从而可以轻易地规避不同国家和地区之间存在的监管差异和外汇管制措施。更重要的是,大多数主流虚拟货币系统所采用的去中心化架构,意味着没有单一的中央机构对其进行控制和管理,这与传统的依赖于中心化金融机构进行监管的体系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使得传统的监管手段难以直接有效地应用于虚拟货币领域。^[3]例如,传统的“了解你的客户”(KYC)和反洗钱(AML)规范通常要求金融机构对客户身份进行验证并监控其交易活动,但在去中心化的虚拟货币网络中,缺乏这样一个明确的责任主体来执行这些措施。最后,虚拟货币的技术复杂性,包括其所涉及的密码学原理、分布式账本技术、共识机制以及各种复杂的交易协议等,不仅显著增加了普通民众理解和识别虚拟货币洗钱活动的难度,也给执法机构的调查取证和技术分析带来了巨大的挑战,需要执法人员具备高度专业化的技术知识和使用先进的分析工具才能有效地追踪和识别洗钱资金的流向。

2.2 主要的虚拟货币洗钱类型与手段

随着虚拟货币技术的持续发展和其在全球范围内应用场景的不断拓展,犯罪分子利用虚拟货币进行洗钱的手段也呈现出日益多样化和复杂化的趋势。其中,利用虚拟货币交易平台进行资金的转移和转换仍然是较为常见的手段之一。犯罪分子通常会在这些平台上注册匿名账户,或者使用通过非法途径获取的他人身份信息进行注册,然后将非法所得兑换成虚拟货币,再通过在不同账户之间进行多次、复杂的交易,最终将虚拟货币兑换回法定货币或其他形式的资产,从而掩盖其非法来源。为了进一步逃避追踪,犯罪分子还会利用所谓的“混合服务”(Mixer/Tumbler),这些服务通过将来自不同用户的虚拟货币混合在一起,再按照一定的比例和数量发送到用户指定的地址,从而有效地模糊了交易的原始来源和最终目的地,极大地增加了追踪洗钱资金的难度。^[4]此外,近年来,去中心化金融(DeFi)协议的兴起及其所固有的匿名性和无需许可的特性,也为犯罪分子提供了新的、更为隐蔽的洗钱渠道,例如通过去中心化交易所(DEX)进行匿名交易,利用各种借贷协议进行资金的循环转移和清洗,以及通过参与流动性池等方式进行混币操作。值得关注的是,新兴的非同质化代币(NFT)和基于区块链的游戏金融(GameFi)等领域也逐渐成为洗钱的新途径,例如通过人为抬高低价值 NFT 的交易价格进行资金转移,或者利用游戏内的虚拟资产进行非法资金的转换和转移。更需要警惕的是,虚拟货币常常与其他上游犯罪活动紧密结合,成为这些犯罪活动的支付结算工具和转移、隐藏犯罪所得的有效手段,例如在暗网市场上进行的毒品交易、非法武器交易、人口贩卖以及网络诈骗等活动中,虚拟货币因其匿名性和便捷性而被广泛使用。

2.3 当前法律框架在规制虚拟货币洗钱方面的显著不足

尽管全球各国和地区都在积极探索和逐步完善针对虚拟货币的监管框架,以应对其带来的洗钱风险,但当前的法律体系在有效规制虚拟货币洗钱犯罪方面仍然存在着诸多显著的不足和挑战。首先,虚拟货币的法律定性在不同的国家和地区之间存在着显著的差异和争议,有的国家将其定义为一种商品,有的视为支付工具,还有的将其视为一种新型的数字资产。这种法律定性的不明确直接导致了各国在监管范围、监管标准以及法律适用上的差异,使得跨境监管合作变得异常困难,因为缺乏统一的法律基础和共同的监管目标。其次,传统的反洗钱法律和监管框架主要是针对传统的金融机构,例如银行、证券公司等,规定了明确的客户身份识别(KYC)、交易监测和可疑交易报告等义务。然而,在虚拟货币领域,由于其去中心化的特性,谁应该承担这些反洗钱义务仍然存在争议。例如,对于去中心化的协议开发者、非托管钱包服务提供商以及参与去中心化自治组织(DAO)的个人,

其是否应该承担与传统金融机构相同的反洗钱义务,在法律上仍然存在着模糊之处,导致监管责任难以有效落实。此外,虚拟货币交易的无国界性使得洗钱活动更容易跨境进行,然而,由于各国和地区对虚拟货币的监管政策和法律法规存在显著的差异,跨境监管合作面临着诸多挑战,例如信息共享机制的不健全、法律冲突难以协调、跨境执法合作受限以及司法管辖权的冲突等。最后,虚拟货币交易的技术证据形式与传统的金融交易存在着显著的差异,例如区块链上的交易记录、匿名化的钱包地址、复杂的交易路径等,如何有效地收集、固定、分析和解读这些技术证据,以及如何在法庭上对其真实性、完整性和关联性进行有效的论证,对执法和司法机关提出了前所未有的挑战,需要执法人员具备高度专业化的数字取证技术和法律知识。同时,一些先进的匿名化技术,例如零知识证明、环签名等,其在虚拟货币领域的应用,也给执法机构的证据获取和解读带来了更大的难度。

三、虚拟货币洗钱犯罪的防控机制研究

3.1 完善虚拟货币监管的法律框架的系统性策略

针对上述虚拟货币洗钱犯罪所带来的法律风险以及当前法律框架存在的不足,构建一套全面且有效的防控机制至关重要。这需从完善相关的法律制度、构建多层次的风险防控体系以及加强刑事打击力度等多个方面进行系统性的协同发力。首先,完善虚拟货币监管的法律框架是有效防控虚拟货币洗钱犯罪的基础和前提。各国和地区应尽快明确虚拟货币的法律属性,为后续的监管措施提供清晰的法律依据,并指定专门的监管机构负责虚拟货币领域的监管工作,避免出现监管真空和多头监管的混乱局面。同时,应积极借鉴国际反洗钱金融行动特别工作组(FATF)等国际组织的最新指南和建议,建立健全针对虚拟资产服务提供商(VASP)的许可或注册制度,明确其法律地位和监管责任,并要求其执行与传统金融机构类似的客户尽职调查(CDD)、交易监测、可疑交易报告等反洗钱和反恐怖融资(AML/CFT)义务。此外,鉴于虚拟货币交易的跨境特性,推动跨境监管合作与信息共享对于打击跨境洗钱活动至关重要,需要建立健全跨境信息共享机制,加强国际间的监管协调,共同打击跨境虚拟货币洗钱犯罪,并推动制定统一的国际监管标准和最佳实践,以减少监管套利的空间,提升全球范围内的反洗钱合力。

3.2 构建多层次的虚拟货币洗钱风险防控体系的综合措施

其次,构建一个多层次的虚拟货币洗钱风险防控体系是有效遏制此类犯罪的关键所在。这需要采取一系列综合性的措施,包括鼓励和引导虚拟货币行业组织制定行业自律规范和最佳实践,促进行业的规范化发展和风险意识的提升,并推动行业内部建立信息共享平台,以便及时共享风险信息和防范经验,共同应对洗钱风险。同时,应进一步强化虚拟货币交易平台的反洗钱合规义务,要求平台建立健全完善的内部控制制度,配备专业的技术和合规人员,实施有效的交易监控,及时识别和报告可疑交易活动。此外,应积极探索和应用监管科技(RegTech)手段,例如利用大数据分析、人工智能、区块链分析等先进技术,提升监管机构和虚拟资产服务提供商识别和预警洗钱风险的能力,例如通过分析交易模式识别异常交易行为,利用区块链分析工具追踪资金流向。^[5]更重要的是,还需要加强对虚拟货币用户和投资者的反洗钱宣传教育,提高公众对虚拟货币洗钱风险的认识,引导其合法合规地参与虚拟货币交易,并警示公众不要利用虚拟货币进行任何非法活动,同时鼓励公众积极举报可疑的洗钱行为,形成全社会共同抵制洗钱犯罪的良好氛围。

3.3 加强虚拟货币洗钱犯罪的刑事打击力度的有效途径

最后,加强对虚拟货币洗钱犯罪的刑事打击力度是震慑犯罪行为、维护法律权威的必要手段。这需要首先明确虚拟货币洗钱犯罪的构成要件和刑罚标准,针对虚拟货币洗钱的特点,对现有的洗钱罪进行法律解释和必要的完善,确保将利用虚拟货币进行的洗钱行为明确纳入刑法规制的范围,并根据犯罪情节的严重程度,设定相应的、具有足够威慑力的刑罚标准,从而形成有效的法律震慑。同时,还需要大力提升执法机关在虚拟货币领域的刑事侦查和证据收集能力,包括加强对执法人员的技术培训,使其掌握虚拟货币的技术原理、交易特点以及各种洗钱手段,配备先进的技术设备和分析工具,提升对虚拟货币交易数据的收集、分析和研判能力,并积极与专业的技术团队和机构进行合作,共同应对技术挑战。此外,鉴于虚拟货币洗钱犯罪的跨国性特点,加强国际刑事司法协助至关重要,需要针对跨境虚拟货币洗钱犯罪,加强与国际刑警组织及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执法机构的合作,建立健全跨境刑事司法协助机制,包括情报共享、证据互助、资产追回、人员引渡等,共同打击跨境洗钱犯罪活动,不让犯罪分子利用国界逃避法律的制裁。

四、结论与展望

本研究深入细致地分析了虚拟货币洗钱犯罪所面临的法律风险,清晰地阐述了虚拟货币所固有的匿名性、无国界的跨境便捷性、去中心化的架构以及技术复杂性等特性如何使其成为犯罪分子进行洗钱活动的理想工具。研究还全面梳理了当前全球范围内法律框架在规制此类犯罪方面存在的显著不足,包括法律定性的不统一、反洗钱义务主体认定的模糊、跨境监管合作的障碍以及技术证据采信的难度。

为有效防控和打击虚拟货币洗钱犯罪,本研究提出了完善虚拟货币监管的法律框架、构建多层次的风险防控体系以及加强刑事打击力度的综合性对策建议。具体而言,各国和地区需要尽快明确虚拟货币的法律地位和指定专门的监管主体,建立健全针对虚拟资产服务提供商的许可和监管制度,强化虚拟货币交易的实名认证和可追溯性要求,并积极推动跨境监管合作与信息共享。^[6]同时,应构建包括行业自律、平台责任、监管科技应用和公众

教育在内的多层次防控体系。此外，还需要明确虚拟货币洗钱犯罪的构成要件和刑罚标准，提升执法机关的技术侦查和证据收集能力，并加强国际刑事司法协助。

展望未来，随着虚拟货币技术的持续演进和其在全球范围内应用场景的不断拓展，虚拟货币洗钱犯罪的手法也将变得更加隐蔽和复杂。未来的研究方向可以进一步聚焦于对新兴虚拟资产（如去中心化金融 DeFi、非同质化代币 NFT）所带来的新型洗钱风险及其独特的防范机制进行深入研究，例如针对去中心化交易所和 NFT 平台的特定监管策略和技术解决方案；探索如何更有效地利用人工智能、大数据分析等先进技术，以提升洗钱风险的智能识别和预测能力，例如开发更为先进的交易监控和异常行为检测算法；加强对跨链交易、隐私计算等新型区块链技术的洗钱风险进行评估，并研究相应的监管对策；以及构建更加完善和高效的国际合作框架，以共同应对全球性的虚拟货币洗钱挑战。总之，应对虚拟货币洗钱犯罪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需要全球各国政府、虚拟货币行业、技术社区以及广大公众的共同努力，不断完善法律制度，创新监管手段，提升防控能力，才能最终有效遏制此类犯罪活动，维护全球金融安全和社会稳定。

参考文献:

- [1] 吕颢,张逸飞.涉虚拟货币犯罪现象研究[J].检察风云,2025,(06):5-6.
- [2] 邵会敏.虚拟货币犯罪风险研究[N].河南经济报,2025-03-04(011).
- [3] 梁可雯.“虚拟资产”交易型洗钱行为的司法认定[J].西部学刊,2025,(04):84-87.
- [4] 陈如超.刑事涉案虚拟货币的制度化处置[J].中国刑事法杂志,2025,(01):143-160.
- [5] 吴佳辉.基于虚拟货币交易技术原理的洗钱侦查对策研究[J].网络安全技术与应用,2025,(02):149-152.
- [6] 程雪军.加密数字货币洗钱的技术路径与系统监管[J].国际金融,2025,(01):44-52.

Study on the Legal Risks and Prevention and Control Mechanisms of Virtual Currency Money Laundering Offences

Chen Wenbo¹

¹ Zhongnan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and Law, Wuhan, Hubei

Abstract: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blockchain technology and virtual currencies, their anonymity, decentralisation and cross-border convenience have provided new tools and ways for money-laundering crimes while promoting financial innovation. This paper firstly analyzes the intrinsic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inherent characteristics of virtual currencies and the risk of money laundering from the aspects of anonymous address, decentralized architecture and technical complexity; and then it summarizes the criminal activities through the centralized exchanges, multiple ‘on-chain’ transfers, mixed services (Mixer/Tumbler), decentralized finance (DeFi), decentralized financial services (Tumbler), and the use of the ‘on-chain’ service. Then, it summarises the specific modes of money laundering implemented by criminals through diversified means such as centralised exchanges, multiple ‘on-chain’ transfers, mixed services (Mixer/Tumbler), decentralised finance (DeFi), decentralised exchanges (DEX), non-homogenous tokens (NFT) and game finance (GameFi), etc; on this basis, it reviews the major deficiencies of the current international and domestic legal frameworks in the areas of legal characterisation, identification of the main body of the anti-money laundering obligation, cross-border supervisory co-operation, and the collection of technological evidence. In view of the above problems, this paper proposes comprehensive countermeasures such as constructing a system that improves the legal attributes of virtual currencies and regulatory subjects, establishing a risk prevention and control platform based on regulatory technology with big data and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strengthening the compliance responsibilities of trading platforms and industry self-regulatory organisations, and improving the cross-border mutual legal assistance and criminal crackdown mechanism. The study shows that a multi-level and systematic legal and technological concurrent prevention and control model can help to enhance the identification, early warning and combating capabilities of virtual currency money laundering crimes while maintaining the vitality of innovation.

Keywords: Virtual currencies; money-laundering offences; legal risks; prevention and control mechanisms

电子伙夫：女性玩家烹饪类游戏角色实践与隐性规训

刘葶葶¹

(1. 西北大学新闻传播学院, 陕西 西安 710127)

摘 要: 女性玩家在电子游戏市场中的地位逐渐由边缘走向中心。本文以烹饪类游戏为切口, 采用参与式观察和深度访谈法, 探究女性玩家参与烹饪类游戏的实践方式与内在动因, 并揭示其中存在的潜在规训机制。研究发现, 玩家游玩烹饪类游戏的动机包括现实挫败的数字化疗愈、跨时空记忆唤起和游戏虚拟资本的获得与转化。此类电子游戏通过触屏手势、游戏画面、游戏规则的设计, 规训着玩家的视觉与认知, 蕴藏着对女性玩家刻板印象的强化倾向。

关键词: 烹饪类游戏; 角色实践; 规训; 性别偏见

DOI: doi.org/10.70693/rwsk.v1i5.984

一、问题的提出：数字时代烹饪游戏的女性实践

在数字技术深度嵌入并重塑日常生活的当下, 女性玩家群体已成为全球游戏市场不可忽视的力量。据观研报告网《中国女性向游戏行业现状深度分析与发展前景研究报告(2024-2031年)》显示, 互联网游戏用户规模进入存量市场, 女性玩家比重上升^[1], 特别是在手机游戏领域, 女性玩家已成为主力军之一。在这一背景下, 以《楼下的早餐店》《飞机大厨》为代表的烹饪类游戏, 通过将翻炒、配餐等传统家务劳动转化为触屏交互表演, 构建出独特的数字家政空间, 其低竞技性、高情感补偿的特质, 在女性玩家群体中尤为流行, 成为了一种颇具代表性的数字实践。

纵然互联网技术的发展推动着女性玩家逐渐成为游戏市场中不可忽视的力量, 但在那些具有较高入门门槛的传统“硬核”游戏领域(例如角色扮演、第一人称射击以及格斗游戏等), 复杂的操作机制、较高的游戏门槛, 再加上社区氛围多偏向男性等因素共同作用, 导致许多女性玩家对此类游戏望而却步, 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性别间的隔阂。人们也将电子游戏与性别联系起来进行探讨: 詹金斯等在 20 世纪 90 年代在《从芭比娃娃到真人快打: 性别与电脑游戏》一书中开启电子游戏与性别议题的研究, 后来的女性主义游戏学者也从权力结构的视角关注女性玩家的游戏参与^[2]。

后来有研究者提出, 女性玩家常处于游戏世界的边缘, 不被当作真正的玩家群体, 她们的游戏经历往往局限于休闲游戏、浪漫游戏这类所谓的“女性向游戏”之中, 这类游戏的诞生表面是吸引女性玩家, 但也揭示了女性发展空间的局限性, 反映社会对于女性的偏见与不公平^[3]。市面上宣称面向女性的电子游戏为减少固有的男性气质, 均不约而同地遵循所谓的女性气质的规则: 移除了杀戮、性欲等内容, 转而选择与女性社会身份关联紧密的游戏题材, 玩法设计趋于浅显单调, 弱化了电子游戏中的竞技、对抗等关键元素。这种依照女性气质开发的游戏, 在一定程度上缓解男性气质对女性的敌意, 但女性气质在此转化为刻板印象的约束力量, 看似是在消解电子游戏中的男性气质, 实际上是对女性游戏能力与创造力的轻视, 是用带有性别偏见的眼光去审视女性玩家的游戏行为^[4]。数字技术的发展迭代, 加之传统社会文化观念, 以及技术工具的非中立性, 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数字赋权的可能性, 固化甚至加剧刻板印象^[5]。

当前学界仍将研究视角集中于“游戏愉悦性”的微观分析(马中红, 2023)或将女性选择烹饪游戏归因于“天然兴趣”的“她经济”消费主义叙事框架(袁博研究院, 2020), 忽视技术对性别角色的隐性规训, 对于愉悦的研究也多局限于情感体验描述, 未触及界面设计、触屏手势等技术要素的探查, 也较少看到技术实践中潜藏的性别化偏见。本研究采用参与式观察法和深度访谈法, 选取 20—26 岁的青年女性为研究对象, 主张从情感描述到技术批判, 超越“愉悦如何产生”的表层追问, 解构烹饪游戏中显性的 Q 版画风与隐性的交互规则, 拟回答以下问题:

(1) 青年女性为何会乐意选择烹饪类游戏进行游玩, 成为“电子伙夫”?

(2) 青年女性如何通过烹饪游戏的技术实践, 既获得数字主体性的有限赋权, 又成为技术脚本规训的对象? 此类游戏背后存在什么样的性别规训?

二、成为“电子伙夫”的游戏选择

“电子伙夫”主要指那些在游戏中扮演厨师角色, 通过点击屏幕上的食材进行烹饪, 完成各种美食制作的玩家。

作者简介: 刘葶葶(1999—), 女, 硕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为数字新闻学。

这种类型的游戏通常以厨房为背景,以烹饪为主要内容,属于休闲益智类游戏的范畴。研究发现,在品类繁多的游戏市场中选择成为“电子伙夫”,主要动机包括基于现实限制的情感代偿、跨时空记忆的唤起以及虚拟资本的获取等因素。

(一) 情感代偿: 现实挫败的数字化疗愈

情感代偿是指在个体的特定需求陷入无法满足的情境中,进而引发情感层面上的空缺时,个体出于自主或无意识的动机,采取一系列行为来试图填补这一情感缺失的过程。在数字技术深度介入日常的今天,烹饪类游戏通过虚拟厨房空间,将烹饪劳动转化为具有娱乐放松性质的自觉行为,为玩家提供了一种替代性满足路径。

游戏通过高保真模拟食材搭配、火候控制等烹饪流程如温度进度条设计,在降低现实操作风险的同时,赋予玩家技术掌控感,这种“零损耗实验场”特性,使玩家得以在规避物理限制如食材浪费、油烟困扰的前提下,通过由简至繁的关卡设置逐步提升自我效能感,激发玩家兴趣和维持游戏动力。玩家通过预设菜品样式与摆盘美学将复杂烹饪工序压缩为触屏点击的符号化操作。这种去技能化设计使玩家在获得即时成就感的同时,劳动过程被简化为机械化的手势重复,这一过程中体现出的“虚假赋权”,也正是情感代偿的核心动力。有受访者提到,“我自己做饭经常把握不住用量,在这个游戏中很准确得还原了这一点,游戏 NPC 会提醒我放多少量,浪费会产生对应的惩罚”,在现实中个人进行烹饪不好把握食材用量,容易造成浪费,制作中对于口味的压力也更大,通过此类游戏还能制作出来自不同地域的特色美食等特点都能够为此类游戏的玩家带来弥补现实缺憾的数字化体验。

更深层地,游戏的即时反馈系统能够让玩家在劳动之后从心理上得到即刻的满足,烹饪类游戏中关卡通关后的金币掉落动画、成就勋章弹出与现实生活中家务劳动的不可见性形成鲜明对比。当现实中的家务付出因缺乏量化标准与社会认可而被漠视时,游戏却将劳动过程转化为可存储、可展示的数字凭证,例如连续 30 天登录签到记录和累计奖励等。这种对比折射出自我决定理论的核心命题即游戏通过满足能力感(通关成就)、自主性(关卡食品自主选择)与关联性(社群分享)三大心理需求,为玩家提供了一种补偿性情感基础设施。

(二) 记忆唤起: 跨时空的情感联结实践

记忆作为人的大脑的一种特定功能,对于人自身、周围事物、社会及整个时代的感知、回忆和反应具有重要作用。美国学者卡罗琳·凯奇提出媒介记忆是指把对媒介与记忆的研究结合在一起而展开的一项研究活动^[6]。媒介不仅承载记忆内容,更通过符号系统与交互设计重塑记忆的感知框架。本研究发现,玩家最早接触到烹饪类游戏是在小学时期电脑端的 4399 网页游戏,出现了“阿 sue”“老爹”系列小游戏,时至今日仍选择玩烹饪类游戏的动机就有对于童年的怀念,会感觉到逃离现实和治愈感。正如受访者提到,“有的时候也会有那种回忆杀的感觉,因为你玩了很久了,然后小的时候也在玩就会觉得有种类似疗愈的感觉。”

媒介记忆理论视角在烹饪类游戏研究中显现出独特解释力:玩家通过“阿 sue”“老爹”系列游戏的童年接触史,形成了持续性的数字怀旧纽带。这种记忆唤起机制成为了一种技术中介的情感联结实践:烹饪类游戏的玩家群体多以女性为主,童年时期对于粉色、童话、芭比等的热爱延续到游戏的选择中,游戏通过视觉符号的连续性设计,如 Q 版角色、高饱和度色彩等激活玩家的童年认知图式。从芭比粉的界面基调到萌系食物造型,烹饪类游戏刻意复刻了 90 后女性成长历程中的粉色媒介记忆。当玩家在《楼下的早餐店》中制作煎饼时,触屏手势与童年鼠标点击的肌肉记忆形成跨时空叠合,虚拟操作被赋予具身化怀旧的特质。

烹饪类游戏通过更为简单安全的怀旧形式为玩家提供情感庇护,在高压现实中,萌系画风与简化操作复现了童年的低焦虑情境,让玩家在游玩的过程中追忆无忧无虑的童年时代,获得逃离现实的安全感。

(三) 虚拟成就: 游戏成就中的资本获取

自古以来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就离不开交往活动,在烹饪类游戏当中也是如此。作为新型文化实践场域,烹饪类游戏催生独特的游戏化资本积累体系,游戏玩家在社交平台分享个人战绩或游戏成就的行为更易引发陌生网友的点赞与认同,通过群体反馈强化了玩家的身份认同,成为个体在虚拟社群中构建社会连接的重要心理支撑^[7]。当普通玩家在游戏挑战赛中遇到难以逾越的难关时,往往会寻求代打的帮助,以完成挑战并获得奖励^[8]。正如一位受访者所言:“我会在小红书上找代打,比如说最后的比赛为了积累钻石,最后两关需要手速非常快才能过,自己过不了的话我就会找代打帮我打。”另一方面,一些玩家通过观看主播直播玩游戏如《飞机大厨》,并加入她们的粉丝群,以获得高水平玩家的帮助和支持。这种行为不仅满足了玩家在游戏的需求,还促进了玩家之间的交流与合作。“我了解到一两个主播直播玩烹饪游戏,甚至现在抖音还关注了几个主播,进了她们的粉丝群给她们卡粉丝灯牌,送小礼物,就为了让她们帮我玩一下,因为她们手速特别快。”

通过虚拟成就的获取与展示,游戏成就的资本转化已突破传统社交范畴,延伸至经济维度:一些玩家利用自己极快的手速录制通关高难度关卡的视频,在社交平台上吸引大量粉丝,通过游戏取得的认可与地位,使自己成为少数能完成这些的技术优势者,他们通过代打服务、直播打赏及粉丝社群运营等建构起虚拟资本到现实社会资本与经济资本的转化路径。以网络游戏为代表的新型社交网络原型的产生,使玩家更加注重在虚拟现实中的自我重塑^[9]。在这个环境中,手速与通关成为了评价玩家能力的主要标准。通过展现自己的优势,玩家可以在虚拟社区中获得较高的地位,从而短暂地脱离现实身份,获得对于虚拟身份的认同。设置门槛、点亮粉丝灯牌、直播代打过程、推广游戏内充值服务以及使用辅助设备等行为,都在不同程度上实现了玩家的兴趣变现,并收获了粉丝支持,将虚拟资本转化可变现资本。

三、显隐之间：烹饪游戏的规训层级解码

（一）身体规训：触屏手势的机械设置

在电子游戏文化中存在一种只有男性才会被视为“铁杆”游戏玩家，电子游戏通常是给男性开发的产品的刻板印象^[10]，游戏设计通常以男性玩家的兴趣为导向，强调竞争性与挑战性。随着移动设备的普及，这种传统观念正在发生变化。电脑端游戏倾向于复杂的键鼠组合控制，而移动端游戏则更注重简化操作流程：在烹饪类游戏中，初学者阶段的设计旨在帮助玩家熟悉基本的游戏机制，通过固定点击范围和适中的距离来降低学习门槛；后续关卡逐步引入更多食物种类及烹饪工具，考验玩家的速度与手眼协调能力；对于食物制作及保温，则采用长按模式，进一步增加游戏的互动层次。

从福柯的规训理论视角来看，这种通过触屏手势实现的游戏机制可以被视为一种现代形式的规训实践^[11]。在烹饪类游戏中，通过对如滑动翻炒频率约为每秒 2-3 次的特定操作流程设定，玩家在游戏内形成一定的身体记忆，但其实质是“时间纪律”的数字转化，这些虚拟体验还可能影响其现实生活中的行为习惯，如受访者所言“我甚至尝试用真实平底锅进行类似的操作。”这体现了梅洛庞蒂所提出的“感知”与“被感知”的身体哲学概念，“身体既为客观存在的肉体，更是人类获取外部世界感知体验的媒介。”通过重复性的触屏交互手势，游戏用户在微观层面上接受了某种形式的数字规训。这种规训不仅限于游戏内部的行为模式，也存在技术具身的倾向，也可能延伸至现实世界的日常活动中，使用户形成将游戏化逻辑投射到现实空间的认知图式。

（二）视觉规训：“女性气质”的界面设计

马丁·杰伊教授较早地提出和使用“视觉中心主义”的观点。他论述这一理论体系的核心内涵是阐述视觉在真理探索过程中比其他感官具有更为重要的作用和价值。在他看来，“视觉中心主义”原初理论的基础可以追溯到古希腊时期。柏拉图指出：“视觉是于我们最为有益的东西的源泉，如果我们没有见过星星、太阳和天空，那我们就不可能有用来描述宇宙的语言。”在当代游戏设计领域，这种对视觉体验的重视同样得到了体现，特别是在针对女性玩家群体的游戏产品中。她们在选择游戏时更注重整体视觉效果，包括应用商店展示的大图、游戏中道具和食材的设计风格及其细节处理等。这些视觉元素不仅构成了游戏的第一印象，也成为女性玩家决定是否下载并尝试一款烹饪游戏的重要考量因素。如受访者所言，“当时就是觉得画风比较好看，然后比较想玩”“我觉得他的画风很吸引，我就是比较可爱，比较小女生那种。感觉能玩的下去，不像是那种战斗类的游戏感觉。”

有心理学研究显示，男孩喜欢蓝色的玩具，而女孩更多地选择粉色玩具。在数字游戏的表意系统中，各类符号通过动态演变和持续扩展实现了多维度的意义构建。由于符号的能指结构、语义内涵及其文化外延具有交互性特征，其内容形态与表征方式在互动过程中自然形成了“功能基础-环境适配-认知映射”的相互关联层次。在烹饪类游戏中，界面多采用粉色或暖色调，并运用圆角按钮、渐变色进度条等柔性设计元素，将复杂的火力值参数替换为爱心符号等，从而构建了一个预设女性视角的游戏环境。通过这种方式，游戏在视觉符号层面进行了具有“女性气质”的编码，强化了玩家对女性身份的感知，并加深了性别角色的刻板印象。

此外，烹饪类游戏中普遍存在的装扮元素进一步反映了社会层面对女性的刻板印象——装扮应是女性的角色。例如，在《飞机大厨》游戏中，经营餐厅需要不断升级店内装潢，这不仅提高了乘客等待用餐的耐心，还能增加额外的点餐需求和收益。这种设定体现了对女性在游戏中如何表现自己的规定，看似是女性自主进行身体消费和景观塑造，但实际上是在技术权力运作下的产物。因此，尽管表面上看是女性在游戏游戏中的自我表达，但其背后却隐藏着深层的社会规范和技术控制。

（三）机制规训：规则设计强化“她者”身份

游戏研究者萨伦将游戏规则分为构成规则、操作规则和隐性规则三种类型。其中系统后台的逻辑代码搭建了游戏的构成规则，玩家能够直接体验到的游戏玩法反映着游戏的操作规则，玩家之间约定俗成的游戏共识构成了游戏的隐性规则。具体到本研究中，烹饪游戏的闯关模式、操作逻辑、游戏惯习无不对玩家施加着“游戏规则”。例如，《飞机大厨》中多样化的任务和成就，如“在供应一定数量纪念品的情况下通关”，此类构成规则促使玩家不仅追求首次通关，还会循环重复以完成所有设定的任务并获得奖励；游戏中将默认店主、配餐者设为女性角色，不仅强化着现实社会价值观，也推动着玩家在线上社群中以“打工空姐”的身份自居并进行讨论，加深游戏中的玩家惯习。

电子游戏创造了一个区别于现实世界的虚拟空间，但其制作过程不可避免地受到现实社会环境的影响和制约。此类游戏直接将女性玩家的游戏兴趣与其固有的社会性别相联系，看似迎合了女性兴趣，实则是与传统观念中的性别分工达到了高度的一致，表明电子游戏仍被受制于社会性别的刻板印象之中。而游戏生产者与身处其中的女性玩家，以一种“集体无意识”的姿态接受、认同着游戏中蕴藏着的性别偏见。

游戏内的叙事文本往往反映了现实社会的价值观，尤其是在经营类游戏中，顾客满意度和满星通关成为最高评判标准。大量工作围绕封闭空间内的机械劳动、装饰和人际关系展开，这使得玩家在不断接受琐碎的游戏规则过程中，潜移默化地接受了游戏中传递出的性别价值观。然而，玩家们很少意识到这些游戏机制实际上隐喻了现实家庭家务和职场绩效考核中的性别分工和隐形量化考核标准。烹饪类游戏将女性的游戏需求与装饰、家务等事务相联系，折射出游戏市场对女性玩家兴趣的高度刻板印象，即女性的兴趣被局限于传统的性别分工和社会身份之下。这种现象揭示了游戏作为一种媒介如何强化甚至再生产了社会中存在的性别刻板印象，即从表面上看，烹饪类游戏提供了娱乐和放松的机会，但其深层次的设计机制却可能无意中巩固了关于女性角色的传统观念，进一

步限制了女性在虚拟世界乃至现实生活中的自由表达和发展空间。

四、结语：数字化烹饪的解放与枷锁

数字技术重构了现代社会的性别实践，而烹饪类游戏作为其中的典型场域，既为女性玩家提供了远离传统性别分工的象征性出口，也悄然编织着新型规训的权力网络。当前“她经济”营销策略本质是粉色陷阱的精致化，女性消费市场的广阔驱使着厂商不断强化“适女化”标签，而身处其中的女性玩家未能准确识别背后的消费主义逻辑陷阱。青年女性玩家在获取交互快感的过程中，其认知框架也在持续受到技术和社会规则共同地“无意识”形塑。这种矛盾性揭示了数字技术对性别秩序的双重中介：既是抵抗传统规训的武器，也是新型权力渗透的载体。

烹饪类游戏是一面数字棱镜，折射出技术时代的性别困境，这种隐藏在粉色背景后的规训提醒我们：技术的解放承诺从未脱离权力结构的阴影。唯有撕开“女性友好”的技术面纱，在游戏代码中植入性别正义的基因，才能让触屏厨房真正成为颠覆传统性别分工的试验场，而不仅是数字时代的围裙。

参考文献：

- [1] 观研报告网.“她”游戏爆发 我国女性向游戏行业发展潜力大 部分品牌转型尝试与破圈[EB/OL]. (2024-01-29)[2025-02-13]. <https://www.chinabaogao.com/market/202401/690578.html>.
- [2] 陆新蕾,虞雯.电子游戏女性玩家的叙事参与和意义生产[J].妇女研究论丛,2022,(06):106-115.
- [3] 李文启.电子游戏的女性角色与女性玩家研究:回顾与展望[J].长江师范学院学报,2021,37(02): 35-46.
- [4] 陈思婷.性别与传播视角下的电子游戏研究[D].厦门大学,2019.
- [5] 杨雅,汤清扬.作为拟形的“抽象游戏”:智能时代的女性虚拟化身生存与认知传播[J].全球传媒学刊,2024,11(03):112-129.
- [6] 李春阳.媒介记忆视角下电视剧的时代构建与启示——以《繁花》为例[J].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24,(04):94-97.
- [7] 唐铮,徐子岳.当他们谈论游戏时他们在谈论什么——基于微博评论的群体认知定量实践[J].新闻与写作,2021,(10):53-61.
- [8] 赵烜晴.视听元素驱动下的文化名片国际传播与国家形象塑造——以游戏《黑神话:悟空》为例[J].视听,2025,(07):19-23.
- [9] 唐铮,徐子岳.当他们谈论游戏时他们在谈论什么——基于微博评论的群体认知定量实践[J].新闻与写作,2021,(10):53-61.
- [10] 陆新蕾,虞雯.电子游戏女性玩家的叙事参与和意义生产[J].妇女研究论丛,2022,(06):106-115.
- [11] 尚云峰,高书峰.“特种兵旅游”:社会加速下媒介的可见性驱动与身体规训[J].当代传播,2024,(04):103-108.

Digital Cooks: Role Enactment and Covert Socialization among Female Gamers in Cooking Games

Liu Tingting¹

¹ School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Northwest University, Xi'an, China

Abstract: The position of female gamers in the electronic gaming market has gradually shifted from the margins to the center. Taking cooking games as an entry point, this paper employs participant observation and in-depth interviews to explore how female players engage with cooking games, along with their underlying motivations. It also reveals the latent disciplinary mechanisms embedded within such gameplay. Findings indicate that female players are motivated by digital healing from real-life frustrations, cross-temporal memory activation, and the acquisition and transformation of virtual capital within games. Through the design of touchscreen gestures, visual elements, and game rules, these games discipline players' visual perception and cognitive patterns, thereby reinforcing gendered stereotypes about women.

Keywords: Cooking games; Role enactment; Discipline; Gender bias

狄德罗的“怪物”与后人类——基于人的偶然性的解读

夏铮铮¹

(1.首都师范大学, 北京 100048)

摘要: 狄德罗对“怪物”问题的研究继承并转化了培根“自然偏差”范式。其思想经历了从目的论到有机-机械唯物主义的转向: 早期接受夏夫兹博里的目的论自然观, 后因目的论解释失效而质疑自然秩序, 最终将怪物视为自然失序的偶然产物。这一认识揭示: 在技术进化论框架下, 只要人类变化仍具不可预测性且依赖自然, 其偶然性本质就无法被超人类主义的技术目的论所克服。

关键词: 狄德罗; 怪物; 超人类主义; 偶然性; 目的论

DOI: doi.org/10.70693/rwsk.v1i5.983

“怪物”(monstre)是法国哲学家德尼·狄德罗哲学思想中的一个重要概念。作为十八世纪欧洲“怪物”和“怪异”(monstrosity)相关论争的关键人物之一, 狄德罗通常使用“怪物”一词描述对规则的违背或对常态的偏离, 并且借由“什么是怪物”这一关键问题对十八世纪中期占据思想界主流地位的生物预成论和自然目的论提出质疑和反对。“怪物”为何成为狄德罗有机-机械唯物主义的核心理论? 怪物问题何以最终指向“人是什么”这一更深层的追问? 又在何种意义上被视为在技术进化论背景下, 超人类主义者对后人类愿景的一种回应? 本文尝试对此展开讨论。

一、“怪物”从何而来

18世纪对“怪物”的研究可以被视为对弗朗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1672年提出的研究框架的追随及发展。培根在《新工具》中倡导新一代科学家跳出那些充满迷信的怪物图鉴的影响, 编纂一份包含一切怪物和异常的自然史; 怪物的诞生不应再被视为某种预兆或启示, 而应该被视为更好地认识自然普遍规律的参照点: “熟悉自然路径的人, 将更易于观察其偏差; 反之, 了解其偏差的人, 将能够更准确地描述其路径”²。“怪物”(monstre)和“怪异”(monstrosity)成为理性研究的对象和理解自然及宇宙的基准, 这种观点被达朗贝尔(Jean le Rond d'Alembert)在《百科全书》(Encyclopédie, ou Dictionnaire raisonné des sciences des arts et des métiers)中吸纳与继承,³也成为构成狄德罗对生成与繁殖、秩序与偶然等主题进行讨论的思想前提; 尤其是在对秩序与偶然的讨论中, 正是对“怪物”的反思让狄德罗开始审视他曾经信奉的自然神论信仰体系的弱点, 并促成其唯物主义转向。正如福柯所言, 怪物和怪异“带有自然的僭越、物种的混合、界限和特征的模糊”⁴, 狄德罗的“怪物”是一个多义的构造, 必须基于一个动态的标准进行理解。

狄德罗对怪物的兴趣始于对夏夫兹博里(Anthony Ashley Cooper, 3rd Earl of Shaftesbury)《论美德与功德》的翻译, 彼时他坚信一个普遍的天意, 即从自然中的无机物、植物、动物到人类都是一个具有综合协调性规律的宇宙的一部分, 由一个自然而明智的神将他们有序组织为一个伟大的整体; 自然具有终极原因, 导向整体和谐的目的。伴随十八世纪中叶实验科学中的发现, 狄德罗表现出一种信念, 即科学方法促成的人类知识进步导向一种经验的综合, 可以同时揭示宇宙的形而上学起源与造物主的意图; 但其中也隐含着一种不安: 如果自然是一个目的论的整体, 那么那些可见的、与自然秩序相矛盾和冲突的现象——比如怪物——该如何得到解释? 狄德罗最初诉诸一种莱布尼兹式的回答: 宇宙表现出的失序是源于人类智慧因其自身局限性而无法对神的智慧全面理解的假象; 如果人类能如神一般看到整体或大全(tout), 这些局部的失序就可以被更大规模的秩序吸收。⁵在夏夫兹博里的体系中, 自然等同于神的意图, 一切自然生物都遵循着神的理性创造观念朝向完美设计的目的, 这与狄德罗

作者简介: 夏铮铮, 首都师范大学政法学院哲学系在读博士生。

² Francis Bacon: *Novum organum*, in *Novum organum, New Atlantis, Advancement of Learning / Novum Organum / New Atlantis*, Robert Maynard Hutchins Mortimer J. Adler Ed, Encyclopaedia Britannica: University of Chicago, 1982, p159.

³ Andrew Curran: *Sublime disorder: physical monstrosity in Diderot's universe*, UK: Voltaire Foundation, University of Oxford, 2001, p1.

⁴ Andrew Curran: *Sublime disorder: physical monstrosity in Diderot's universe*, UK: Voltaire Foundation, University of Oxford, 2001, p1.

⁵ Andrew Curran: *Sublime disorder: physical monstrosity in Diderot's universe*, UK: Voltaire Foundation, University of Oxford, 2001, p42-43.

的解释相同，但在对怪物的处理上，两人产生了分歧。夏夫兹博里通过一种偶然主义从自然创造秩序中排除了怪物，将其解释为神创之后意外遭受机械外力冲击而造成的结果。换言之，怪物的形成并非自然失序，而是来自另一种更强大的自然力量的作用，怪物被排除在自然整体之外。狄德罗对这个观点并不赞同：如果承认宇宙是一个整体或者大全，那么这个“大全”必须包含一切生物，包括怪物。⁶

随着对动物学、解剖学和昆虫研究的兴趣增大，狄德罗的问题变得清晰：在一个和谐自然整体中何以可能产生众多难以理解的现象？在自然界充满神的意图的宇宙中，怪兽怎么可能存在？这些有机过程的不和谐动摇了目的论的先验秩序，怪物的不可理解性最终促成一种唯物主义觉醒，及一直以来试图“将自然神论的负担置于生物事实上”的哲学体系的崩溃。⁷狄德罗以实验中得出的物理与自然科学结论作为证据巩固“普遍天意”的做法遭受其自身的质疑：“谁对你说，你在此地赞赏的这种秩序不会在某个地方被打乱呢？怎么能从空间的一点向无限的空间推论呢？自然目的论和宇宙的秩序再次被揭示为一个幻想和误导性的假设，宇宙如同放在人们面前的‘陌生的机器’，其‘秩序’或者‘无序’只是根据不同的观察者的意见得出的结论。”⁸而怪物则成为这种不确定性的坐标。

什么是怪物？狄德罗通常将“怪物”与用来描述怪异的词汇——如无序（desorder）和“自然的偏差（écart de la nature）”——并列使用，用来暗示“对规则的违背、概念上的不一致或矛盾”，但这些术语并不具有与他同时期另一种主流观点的相同意义：在这种观点中，怪物意味着超自然的状态。换言之，怪物的存在暗示存在另一种独立于自然秩序的现实秩序，即上文中夏夫兹博里所说的“另一种自然”。¹⁰虽然培根的研究范式试图将怪物归于“自然的偏差”，并以此作为纠正人类理性对自然秩序认知错误的纠正手段，但狄德罗最终拒绝了这个方法论。在狄德罗看来，正是培根人为地将怪物与自然其他部分区隔，预示了十八世纪的科学研究中对自然进行理性化排序的趋势，即如果自然必定是有序的，那么怪物也必须遵循自然秩序，因此怪物形态的出现也必须是可预测和有规律的。¹¹狄德罗拒绝将自然视为理性的知识对象的尝试：对自然的排序意味着这个秩序极有可能并非自然本身的秩序，“任何试图创造自然所谓协调和逻辑的转喻描绘的努力，任何试图将自然简化为静态力量的努力，都是荒谬的行为……自然处处表现出崇高的混乱”。¹²事实恰恰相反，怪物并不能澄清对宇宙和自然的错误理解，而只能表明“人属于一个不遵守合理性规律的自然的一部分”，¹³人类及其个体的生成是偶然发生的。“什么是怪物”这个问题背后隐藏了一个更核心的问题：人是什么？

“人是一根系在动物与超人之间的绳索”¹⁴，继尼采之后，超人类主义¹⁵者亦如是说。从某种程度讲，超人类主义者对自然和人类抱有与狄德罗相似的看法：两者都认为人类并非占据存在之链中预定等级的生物，而仅仅是一个介于动物与后人类¹⁶之间的变易形态、一个朝向灭绝并且可以持续变化的不稳定物种；两者都否认自然目的论，认为自然界生物的形态和功能并非为了实现某种特定目标或预先设计。所不同的是，超人类主义者从两个方面以更为激进的态度对待自然和人类的未来：一方面，狄德罗认为人与怪物一样，本质上都是从自然的无序中偶然产生的物质形态，人类无法预知也无法控制人类个体的变异和种族的灭绝；而超人类主义者虽然承认生物进化遵循自然秩序，但自然秩序有其局限性，人类的进化路径和规则不应被局限于自然选择的框架内，而是应当主动干预自然秩序，以技术手段突破并超越自然限制：“生物进化已经让位于一个更快的进程——技术进化”，¹⁷人类可以通过基因编辑、纳米技术、脑-机接口等工具和途径改善生理和认知能力。另一方面，超人类主义者对目的论的态度充满矛盾：他们在否认自然目的论的同时主张一种技术目的论——人类放弃生物进化而选择技术进化的最终目的是在后人类形态中实现永生，在一种乐观主义假设中，技术将发展出高级宇宙智能，继而为自然和宇宙重新建立一种“实用”秩序——技术宇宙和技术自然，成为“将来之神”。在这个意义上，他们的观点可以被视为对狄德罗提出的核心问题“人是什么”的当代反思和回应。

二、去形态化的人

在《达朗贝的梦》（Le Rêve de d'Alembert）中，狄德罗将人与怪物相提并论：“人只是（自然整体不停改变的）一个普通的结果，怪物只是个稀有的结果；两种东西是同样地自然，同样地必然，同样地存在于普遍的、共

⁶ Andrew Curran: *Sublime disorder: physical monstrosity in Diderot's universe*, UK: Voltaire Foundation, University of Oxford, 2001, p45.

⁷ Andrew Curran: *Sublime disorder: physical monstrosity in Diderot's universe*, UK: Voltaire Foundation, University of Oxford, 2001, p56.

⁸ 狄德罗：《怀疑论者的漫步》，陈修斋、张冠尧译，上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上海分店，1989年，第135-136页。

⁹ Andrew Curran: *Sublime disorder: physical monstrosity in Diderot's universe*, UK: Voltaire Foundation, University of Oxford, 2001, p14.

¹⁰ Andrew Curran: *Sublime disorder: physical monstrosity in Diderot's universe*, UK: Voltaire Foundation, University of Oxford, 2001, p13-14.

¹¹ Andrew Curran: *Sublime disorder: physical monstrosity in Diderot's universe*, UK: Voltaire Foundation, University of Oxford, 2001, p14, p22.

¹² Andrew Curran: *Sublime disorder: physical monstrosity in Diderot's universe*, UK: Voltaire Foundation, University of Oxford, 2001, p24.

¹³ Andrew Curran: *Sublime disorder: physical monstrosity in Diderot's universe*, UK: Voltaire Foundation, University of Oxford, 2001, p22.

¹⁴ 尼采：《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孙周兴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23年，第12页。

¹⁵ 超人类主义与后人类主义（posthumanism）概念澄清：前者主张通过科学技术手段（如生物技术、纳米技术、信息技术和人工智能）来增强人类的身体和认知能力，以超越当前的生理和心理限制；后者则强调超越传统的人类中心主义，重新思考人类与技术、自然和非人类实体的关系。但超人类主义者经常用“后人类”（posthuman）描述人类在技术变革中可能拥有的未来形态。

¹⁶ 后人类是指通过技术手段（如生物技术、信息技术、人工智能等）来实现超越传统人类限制的人类状态，涉及对人类本质和存在的重新定义与反思。

¹⁷ 詹姆斯·A·赫里克：《人类未来进化史：关于人类增强与技术超越的迷思》，赵翌、陈天皓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2年，第44页。

同的秩序中……这有什么惊讶的呢？”¹⁸既然怪物作为一种自然的生命形式具有无限可变性，那么物种概念还有什么种意义呢？在日内瓦自然学家特伦布利 1741 年进行的水螅实验之后，一种静态的分类学必须被拒绝：水螅被视为一种“植形动物”¹⁹，即介于动物和植物之间的中间形态，同时具有植物和动物的特征。水螅的发现意味着物种固定性的传统认知被打破，“……所有的东西都在彼此循环，因此一切物种也都如此……一切矿物都是或多或少的植物，一切植物都是或多或少的动物”，²⁰而“一切动物都是或多或少的人”。²¹如果物种间的界限如此模糊，那么物种的演化过程中便可能随机产生当前自然界中尚不存在的怪物，比如人类水螅。在狄德罗的思想实验中，人类水螅可能已经出现在宇宙的其他行星上，并且具有水螅一样的繁殖能力：被分解成无数个碎片的“原子人”转化成无数个其他生物形态的个体而继续存活，而这种水螅式的繁殖方式是应当被赞赏的，因为这使得从不同器官分解成为的新个体获得跟与之相应的器官相同的性格和道德特征。

在物种概念被如此去形态化后，该怎样重新理解物种呢？值得注意的是，狄德罗并未尝试以生理学或解剖学的经验事实来解释物种的变化和变异，而是以英国生理学家倪唐（Needham）发现的鳗鱼状微生物的自然生命周期为模式进行描述：这些微生物的生命自发地从水滴中产生，以无目的物质的临时形态朝向未知的目的移动。²²物种只不过是一些引向它们所特有的共同目的的倾向而已”。²³狄德罗在此提及了一种目的的倾向，这种目的只是规范性的，而非建构性的。事实上，基于一种目的秩序一直是狄德罗思想中的矛盾所在：作为一个无神论唯物主义者，他坚决否定自然有一个神性的、外在于自然本身的目的；但如果自然是完全的无序和混沌，一种认识论意义上的知识又如何可能？更重要的是，如果相对于人类，怪物并非“他者”，而“人类”只是生物学意义上的偶然结果，那么差异与同一性概念也不再具有意义。如果所谓的“正常”只不过是另一种意义上的“怪异”，那么，什么是“人”？什么是“人性”？什么是“自我”？换言之，在一个可变的自然整体中，“人”怎么可能将自身认知为一个拥有主观体验和个体独特性的主体呢？

由此而言，“在自然之中，根本没有严格的分别……什么东西都没有一个特殊事物的本质了……因为没有一性质不是为任何事物所分享的……使我们归属于这一类东西而不归属于另一类东西的原因，乃是这种性质的或多或少的量的比例”。²⁴“自然中一切事物都是互相关连的”。²⁵狄德罗在生物学的发生学意义上谈论“存在之链”，这条巨链如赫拉克利特之河一般被无数随机的变异填满，没有任何空档，并不能通过当前历史时期具有的物种推断这些物种在过去或者未来的形象。狄德罗反对一种达尔文意义上的生物进化论，既然自然没有秩序，那么人类就无法作为一个固定的物种在历史中获得定位。人类在动物学世系中的位置遭到质疑：当前具有最高智力水平的生物是否就是下一个正在走向并且濒临灭绝的物种？任何物种的短暂形态都只不过是物质运动所产生的不同特性。因此，谈论自然中的个体是无意义的，“根本没有个体……只有一个唯一的大个体，就是全体”，²⁶这个全体就是物质。在这个意义上，一切都是物质的变化，生命也仅仅是物质间的相互作用，人的出生、生成和死亡也只是物质形式的变换，而形式也只是偶然被选择的，每个形式都只是短暂并且不完善的，“都有它特有的幸与不幸”。狄德罗称这个假设“几乎就是各种现存的和未来的动物的真实历史”²⁷因为人终究会被不断分解成微小的生物，这些微生物在持续蜕变中会重新生成怎样的组织和形态，以及它们何时会发展出最后的组织和形态，这一切都是不可预知的：“谁知道发生于我们以前的那些动物种类呢？谁知道发生于我们人类之后的那些动物种类呢？一切都在变，一切都在过渡，只有全体是不变的。世界生灭不已，每一刹那它都在生灭，从来没有过例外，也永远不会例外。”²⁸

狄德罗在物种的持续变易与去形态化中看到了人的偶然性，目的论的崩溃与自然的无序之外似乎只剩下变动不居的物质，让“人是什么”这个令人不安的问题陷入困局。时隔两个多世纪后，超人类主义试图以反思这个问题为前提设计人类的未来。换言之，超人类主义者不仅要问“人是什么”，更重要的是要知道“人将要成为什么”。基于如下认知，即人类身体（物质）不完善，需要由技术性身体（技术物质或者非物质）改进甚至替代²⁹，超人类主义者首先拒绝了狄德罗式的唯物主义将活物质视为构成人类生命的基本元素的第一原理，而技术智能无限进化的可能似乎为这个变种的诺斯替主义提供了现实可行性，类器官技术、CRISPR 等基因编辑技术与人工智能的结合应用都在导向后人类的“永生”。在某种意义上讲，超人类主义在一种相对于狄德罗更弱的程度上认同了人的偶然性：人类个体生命的短暂性源于人类身体物质构成的易变和易朽性，人类要克服偶然性，就不能以物质作为构

¹⁸ 狄德罗：《狄德罗哲学选集》，江天骥、陈修斋、王太庆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 年，第 152 页。

¹⁹ zoophyte 在词源上由希腊语 zoon (ζῷον，意为“动物”) 和 phyton (φυτόν，意为“植物”) 组合而成，字面意思是“动物-植物”，曾被用来指代一类介于动物和植物之间的生物。这类生物具有类似植物的固定生活方式，同时也展现出动物的某些特性。在十九世纪及以前的分类系统中，珊瑚、海葵和水螅等生物常被归类为 zoophyte。

²⁰ 狄德罗：《狄德罗哲学选集》，江天骥、陈修斋、王太庆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 年，第 153 页。

²¹ 同上，第 153 页。

²² Andrew Curran: *Sublime disorder: physical monstrosity in Diderot's universe*, UK: Voltaire Foundation, University of Oxford, 2001, p.93.

²³ 狄德罗：《狄德罗哲学选集》，江天骥、陈修斋、王太庆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 年，第 154 页。

²⁴ 同上，第 154 页。

²⁵ 同上，第 154 页。

²⁶ 同上，第 154 页。

²⁷ 同上，第 145 页。

²⁸ 同上，第 146 页。

²⁹ 诺伦·格尔茨：《虚无主义与技术》，张红军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24 年，第 28 页。

成生命的基本元素。超人类主义的共同意识形态基础中最核心的部分即对自然的拒绝与对生物学意义上的人类的拒绝³⁰；因此后人类应该拥有形态学自由——选择应用哪种技术对自身身体进行完善——和生殖自由——选择繁衍后代时使用哪种生殖技术。

人是什么？新的答案产生于 DNA 携带生物细节信息的发现：人的本质被规定为细胞核中携带密码的结构（DNA）。在这个解释下，人类个体变成一种与身体（物质）脱离的信息模式，以一种数据形态被评估、存储、传输和研究，人是信息。³¹换言之，人不再是由物质分子因其连续性而形成的偶然生物，而是一个以数据模式结构的信息。如果人类由构成人体的物质来定义，那么人的个体必须通过保持身体物质的连续性才可以保证；但如果将人的本质定义为头脑与身体中发生的模式与过程，只要这些模式与过程的连续性得以存储和保留，那么人类个体就能够得以保全。³²按照超人类主义者的观点，非物质的信息与模式作为人类身份的永恒载体不仅能够实现人类的“永生”，还可以根据增强人类的需要和目的予以修改。作为信息的人符合控制论的基本原则：控制论中用反馈回路³³描述一种自我调节机制对环境信息的响应，人则是这样一个基于反馈的系统。这个类比将人视为一个基于“刺激-反应”的复杂信息系统。由于复杂系统被看作具有自己生命的实体来讨论，因此具有“自主”功能，系统整体表现出的自组织和涌现特征仿佛具有某种适应性和进化的目的性，因此意义的概念也在新的叙述路径中找到新的解释：意义源自系统规则的物理因果律。这种系统与机械隐喻试图将个体感觉还原为机器模拟或工程方式的数学形式，人类由此成为一个机械实体：³⁴人类感官成为外部信息接收器，感觉的产生则是由信息通过接收路径——物理电路和程序逻辑——被传送到作为中央处理器的大脑，再由大脑基于反馈机制对信息给予反应。在这种叙事中，人是信息，身体是系统，大脑是信息处理器；人在本质上与机器并无不同，因此人类可以通过与人工生命或者人造生命的合成方式实现功能增强。在此我们看到了狄德罗所说“纯粹机械的作用”，所不同的是，狄德罗的机械作用将物质分子的感受性作为机械作用的动力和生命原则，而当代机器的生命原则是信息。

但是，信息的读取标准和对信息的解释并不具有一个普遍准则，不同的解释视角和方式使信息呈现出不同的面貌和意义；如果“信息是关于世界的事实”，那么事实总是呈现多重面貌。同样，作为信息的人是否也会因此具有不确定性？值得注意的是，在“人是信息”的前提下，感觉是否需要一个身体？抑或未来的“信息人”可以被认为是“缸中之脑”的变种，用储存信息的芯片（这个芯片甚至可以不是物理的，而是虚拟的）接受所有外部感觉和刺激？毕竟信息现实无法代替自然世界，如果人被还原为信息并且只能从信息现实中获取生命的养料，那么在一个一切都是理性的设计、都能够被理解的世界中，人类还能够拥有完整生命体验、获得生命的意义吗？

三、物质活性与自发生殖

在关于物种变化的解释中，狄德罗一直坚持一种物质一元论，即世界上只有一种实体，那就是物质；物质是包括生命、意识和思想在内的所有现象的基础。在这种观念下，一切变化都是物质的运动，狄德罗就此提出他需要研究的“两种重要现象”：“一种是从呆板状态到感受性状态的过渡”，即物质如何在两种不同状态之间变化，以解释生命的起源；另一种是“自发的生殖”，即指有生命的物质分子如何通过聚合的方式长成一个完整的生命体。

在谈论一切变化之前，狄德罗必须回答他自己在《对自然的解释》（Interprétation de la nature）中提出的一个问题：“很显然，一般的物质分成死物质（matière morte）和活物质（matière vivante）。可是，为什么物质不是单一的，或者全部是活的，或者全部是死的呢？活物质是否总是活的？死物质是否始终和真正地是死的？活物质是否会死亡？死物质是否会开始活过来？”³⁵如果自然界中既存在死物质——无机物与非生命体，又存在活物质——生物体，而非生命体与生命体之间也在不停地进行物种转化，那么，在非生命体促使其发生变化的活性从何而来？换言之，死物质是如何转化为活物质的？尽管布丰（Comte de Buffon）提出一种观点，即死物质有可能在适当的条件下通过某种未知的过程转化为活物质，但对狄德罗而言，这种解释过于模糊，这样的区分依然为物质的转化设置了障碍。因此，狄德罗做出如下假设：一切物质（包括死物质）都具有潜在的感受力（sensibilité），正是这种能力赋予物质生命的活性，“只有通过假设生命是物质内部普遍存在的一种能量形式的结果，才能形成一个充分的唯物主义的生命的观”。³⁶“感受力”在狄德罗的意义上获得了相较于医学领域更大的概念范围，从感觉的能力变为一切物质中的统一元素，并分享和医学领域共同的重要性：作为生命的基础。³⁷

为了说明“怎样使一个物体从迟钝感受性的状态过渡到活跃感受性的状态”，³⁸狄德罗构想了关于法尔可内雕像的思想实验作为消除两种物质间活跃感受性的障碍的尝试：把这个雕像拿来，“放在一个白里，用杵使劲捣”，直到大理石变成粉末，再混合到腐殖土中进行腐烂发酵；通过食用这个腐殖土中种植的植物，大理石最终被吸收

³⁰ 同上，第 30 页。

³¹ 詹姆斯·A·赫里克：《人类未来进化史：关于人类增强与技术超越的迷思》，赵翌、陈天皓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2 年，第 93 页。

³² 同上，第 100 页。

³³ 反馈机制指通过将系统输出的结果（即信息）返回到输入端，以此调整和优化系统行为。

³⁴ 同 2，第 97-98 页。

³⁵ 狄德罗：《狄德罗哲学选集》，江天骥、陈修斋、王太庆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 年，第 108 页，译文有改动。

³⁶ Dixon, B. Lynne: *Diderot, philosopher of energy: the development of his concept of physical energy, 1745-1769.*, UK: University of Oxford Voltaire Foundation, 1988, p144.

³⁷ Andrew Curran: *Sublime disorder: physical monstrosity in Diderot's universe*, UK: University of Oxford Voltaire Foundation, 2001, p82, note11.

³⁸ 狄德罗：《狄德罗哲学选集》，江天骥、陈修斋、王太庆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 年，第 122 页。

进入人体，成为人类肌肉物质的组成部分，并由此转化为具有感受力和思想的活物质。³⁹狄德罗在此接受并发展了一个伊壁鸠鲁式物质循环的解释模式：⁴⁰“伊壁鸠鲁曾主张大地包含着万物的种子，动物界是发酵作用的产物”⁴¹，一切有形物质都源自同一种无形物质的聚合、生长或者分离：生命的开端是“一个活的点子……不……起初什么也没有，后来有了一个活的点子……在这个活的点子上粘上另一个，又粘上另一个；这样继续不断地粘下去，便得出一个整体的东西”。⁴²“什么都没有”恰好说明物质分子无生命的原始状态，狄德罗以此描述人类个体与自然一切物质的同质性：达朗贝这个“欧洲最大的几何学家”起初只是“一个乌有”，他的出生与生长和法尔可内雕像的大理石并无二致。“那些将要形成我所说的几何学家的最初根苗的分子，是分散在两个人的年轻脆弱的机体里面，随着淋巴液分泌出来，随着血液循环着，直到最后才奔赴他们准备结集的场所——他父亲的睾丸和母亲的卵巢里。于是这个稀有的种子便形成了”⁴³，而达朗贝母亲的妊娠过程和达朗贝本人的成长则被简化还原为“吃和另外一些纯粹机械的作用”的结果，即遵照一个“四句话的一般公式：吃，消化，吸收养料，长大成人”，⁴⁴狄德罗将这些物质因素视为对一切生物形成情况的一般说明，并以此拒绝了预成论⁴⁵和自然目的论。

人是一个“整体的东西”，但这个整体是如何形成的？在狄德罗看来，物质分子的组合只能构成一个集合体，仅仅是一个“由许多细微的有感觉的东西构成的组织”⁴⁶，但一个动物是“一个全体”“一个完整的系统”。既然全体不能被还原为部分的组合，那么一个由物质基质组合而成的动物在何种意义上可以是一个能够意识到其自身完整性的系统呢？关键问题是怎样看待物质分子——即前文所说的“活的点子”——之间的连接关系。狄德罗在此区分了“毗连性”与“连续性”：前者仅仅具有物理相邻意义上的连接性，即只是被排列在一起，而后者则意味着分子个体的融合，“同化之前有两个分子，同化以后就只有一个”⁴⁷，物质分子的同化伴随着分子自身感受性的同化，不同于“两个呆板块体的毗连”。单个分子的感受性由此转化为人体这一共同整体的感受性，狄德罗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将意识的复杂性与作为其一部分的物质基质相协调”，⁴⁸使人的自我意识成为可能。

蜂簇与人体器官的类比可以被视为狄德罗对“自发生殖”的形象解释：如果把蜂房视为物质的总体，那么从里面飞出的蜜蜂就可以被看作从物质整体分解产生的物质分子；为了使蜜蜂之间实现真正的“连续性”，狄德罗设想单只蜜蜂的脚被融化，使它们能够以脚勾脚的方式生长在一起；这些蜜蜂重新聚集起来形成蜂簇的过程则被视为物质分子的自发生殖。蜂群并非仅仅是“蜜蜂单子”的简单集合，相反却总是作为一个整体进行活动。换言之，似乎存在一个“集体意识”在统一指挥蜂群的活动，其中每只蜜蜂的行为都具有协同性，朝向一个集体任务的目标。如果将这个蜂群类比为一个人体，那么人体的器官就像蜂群里单个的蜜蜂，“不过是一些单个的动物，由连续法则把它们放在一个总的结合体、统一体、同一体中罢了”。⁴⁹狄德罗进而再次以对人体自发生殖过程的详细描述明确地拒绝了目的论和预成论：人类个体生命源自活物质分子的活动聚集，继而这些分子生长为纤维和纤维束，作为“纯粹的感觉系统”的纤维束通过“吃，消化，吸收养料”等“纯粹机械的作用”在其末端长出不同的器官，同时产生出“记忆、自我意识”和“有限的理性”。换言之，人类灵魂被视为一种具有感觉和意识能力的特殊感觉物质，能够通过器官接收的信息回应外界刺激。既然人并非一个固定物种，不具有恒定形态，那么人类可能在未来生长出不同于现有五官类型的感官，而感官的形态、类型和什么时候产生则是自发并且不可预知的；同时，由于一切物种间的最根本差异取决于构成各物种的纤维束的不同形态和类型，通过人为手段促使纤维束产生变异，就可以造成物种的变异，生产出各种无法预知的怪物。

四、技术活性与永生悖论

将技术元素⁵⁰和奇点⁵¹假设相结合或许可以作为超人类主义对狄德罗的“两个重要现象”的当下回应，即替代自

³⁹ 狄德罗：《狄德罗哲学选集》，江天骥、陈修斋、王太庆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122-123页。

⁴⁰ Andrew Curran: *Sublime disorder: physical monstrosity in Diderot's universe*, UK: Voltaire Foundation, University of Oxford, 2001, p83.

⁴¹ *ibid.*, p.147.

⁴² Andrew Curran: *Sublime disorder: physical monstrosity in Diderot's universe*, UK: Voltaire Foundation, University of Oxford, 2001, p.138.

⁴³ *ibid.*, p.124.

⁴⁴ *ibids.*

⁴⁵ 预成论 (Preformationism) 是一种生物学理论，主要流行于 17 世纪和 18 世纪。这一理论试图解释生物的发育和繁殖过程，认为所有生物在其最原始的形式中就已经完全形成了，只是在生长过程中逐渐显现出其预定的形状和结构。预成论与渐成论 (Epigenesis) 相对立，后者认为生物的形态是在发育过程中逐步形成的。

⁴⁶ 狄德罗：《狄德罗哲学选集》，江天骥、陈修斋、王太庆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139页。

⁴⁷ 狄德罗：《狄德罗哲学选集》，江天骥、陈修斋、王太庆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139页。

⁴⁸ Andrew Curran: *Sublime disorder: physical monstrosity in Diderot's universe*, UK: Voltaire Foundation, University of Oxford, 2001, p88.

⁴⁹ 同 1，第 142 页。

⁵⁰ 技术元素 (The Technium) 是凯文·凯利 (Kevin Kelly) 在其著作《科技想要什么》(What Technology Wants) 中提出的一个概念，指由所有技术和人工制品组成的综合系统，包括工具、机器、软件、信息网络、文化实践和制度等，并具备以下四个特征：一是自主性：技术元素被视为一个具有自身进化逻辑和目标的独立系统，能够自主地发展和演变；二是复杂性：技术元素是一个高度复杂、相互关联的系统，各个组成部分之间存在复杂的互动和依赖关系；三是生命特征：技术元素具有类似于生命系统的特征，如自我组织、适应性、进化和增长；四是全球性：技术元素是一个全球性的网络，跨越地理和文化的界限，连接世界各地的技术和信息。

⁵¹ “奇点” (Singularity) 是由未来学家雷·库兹韦尔 (Ray Kurzweil) 提出的一个概念，特别强调技术进步达到一个临界点，之后技术的发展速度将呈指数级增长，导致人类社会和文明发生根本性的变革。在这个临界点之后，技术的发展将变得难以预测和控制，人类社会将进入一

然行使人类进化权利的技术自身怎样获得原初活性？技术活性在何种意义上使朝向后人类的变化得以发生？

根据技术元素的解释，活力并非源自物质，而是源自物质形式所包含的信息和能量，这些信息和能量随着技术进化而形成智能；奇点的到来使智能进化到一个较高等级，相应地具有较高等级的活性，由此将宇宙的哑物质（死物质）转化为智能物质（活物质）。智能物质同样是一种可以按照自身需求自组织的“活物质”，所不同的是它具有更大的活性和强力：狄德罗意义上的“活物质”只是在自然整体的无序中实现物种形态的短暂有序，其自身则必须受制于存在之链的历史变迁；而智能物质能够操控其他一切宇宙能量，并且为宇宙制定一个符合自身目的的顺序。值得注意的是，奇点将为宇宙重新制定一个符合智能意愿的顺序作为它的目的论的终点，是否暗含着一种在较弱的程度上的对“宇宙秩序是一个幻觉”这个狄德罗式判断的认同？自然的无序使人类理性认知世界的可能性遭到质疑，而为宇宙重新设立秩序，是否已经将人类置于造物主的位置和视角？然而，这种具有超验性和僭越危险的愿景必须认可两个重要前提：其一，既然技术元素和奇点的产生与自然和古老的生命同源，那就意味着这个秩序是由自然内部发生，而非从外部加诸其上的东西；其二，这个新的宇宙并非自然的替代物，新的秩序亦并非自然整体的秩序，而仅仅是人类理性在技术维度下对自然的认知结果。

如果关于奇点的技术发展和高级智能的出现假说成为现实，那么某种超级智能有可能在某一个瞬间代替人类接管整个世界。在这种情形下，我们将如何期待这个智能具有人性的道德和价值观？如果信息成为后人类的生命动力，那就意味着后人类的人性和人格（倘若后人类还具备这两种人类特征）皆由技术智能塑造。我们无法阻止技术智能将计算作为重塑后人类的本质依据，也许“如何基于一种计算的规则重新创造世界秩序”将是最有可能或者最先产生的机器意识；在这种假设之下，未来的“人性”将完全依赖于技术智能根据不同的计算逻辑和结果择优选取。因此，“人性”必然是不可确定的，其流动与变化取决于技术智能对计算规则的不断修改与优化，而修改依据则是对宇宙资源利用的最大化。在人类滥用技术理性、将自然还原为工具和“资源”之后，人类自身也沦为技术的材料和工具。鉴于技术在当下呈现出的计算本质，这种状况在未来或许面临加剧恶化的可能。

与狄德罗关于生命如何从物质中产生的叙述相似，超人类主义者关于技术与智能的叙事也在发生学意义上解释技术进化论，并赋予其形而上学的意义。在狄德罗看来，人的偶然性否认自然的秩序和目的；后人类主义者为了使超人类智能被视为一种历史的必然，从一种目的论神学的视角来解释技术的进化，试图为未来的人类、自然和宇宙建构一个必然的秩序。但这个智能神也可能是一个试图建立集权控制的危险政权的“邪恶的魔鬼”（Evil Demon），会在他建构的算法宇宙秩序中随意修改和删除以信息形式存在的个体，打破后人类“永生”的期望。

在这个意义上，超人类主义者博斯特罗姆致力于以一种模拟假设（simulation hypothesis）来建立后人类愿景与技术进化必然性之间的联系：我们现在和将来都永远生活在由未来的高级文明设计的计算机模拟世界中，这些高级文明即未来某一时期的后人类，模拟出当前的“人类”只是为了研究已不复存在的祖先。博斯特罗姆在模拟假设中引入了一个宗教类比，即后人类对人类世界的模拟与基督教的创世具有某种相似的意义：在当前人类的视角下，后人类以一种全知的（omniscient）神性超级智能——甚至以违背宇宙规律的方式（如库兹韦尔所言）——干涉、控制人类世界和人类生命。模拟者被赋予一种伦理责任和道德义务，即模拟生命必须受到合理对待及免受伤害。这种解释让模拟行为和过程具有一种救赎意味，似乎模拟生命被导向一种末世论的必然⁵²。但问题在于，模拟者并不必然是善的，我们没有理由假设技术智能与人类具有相同的价值或道德取向，一旦模拟生命失去研究价值，或者研究计划与实验参数发生变化，模拟系统可能会被终止或者修改，人类生命世界也将不复存在；抑或模拟者自身亦可能被持续进化出的更高文明所替代，与人类一样面临存在性风险；一旦模拟者被灭绝，模拟将被中止，作为模拟生命的人类也将随之消失，甚至人类可能灭绝于一场导致模拟系统意外崩溃的灾难。换言之，无论现存人类世界和人类生命是否遵循模拟假设，这种后人类的理想都不能消解人类存在的偶然。因此，在后人类主义的视角下，“什么是人”这一问题变得更加复杂，“人类”甚至可能不再是生物学意义上的物种，在将人的本质解释为信息而非物质之后，人的偶然性被放大了。

五、结语

狄德罗基于物理自然和生物自然提出的人的偶然性问题是否如同超人类主义者所认为的那样，能够在一个技术的自然和宇宙中被克服？事实上，只要人类的变化不可预知，只要人类还需要在物理宇宙和自然中生存，人的偶然性就不可能被克服。后人类可能不仅仅有五种感官，也可能拥有人类目前尚不可知的生理或者物理特征。如狄德罗所言，“谁要是断定不可能有第六种感官，……就是个冒失鬼了”。抑或后人类根本不需要任何感官作为信息的中介，而是以身体表面的任意部位就能行使全部感官的功能，就像荷兰哲学家赫姆斯特休斯（Hemsterhuis）

个全新的、未知的状态。奇点的到来具有如下三个特征：一是指数级增长：技术进步的速度并不是线性的，而是呈指数级增长的。这种增长模式在信息技术、生物技术、纳米技术和人工智能等领域尤为明显。二是技术加速：技术的加速发展是奇点的核心特征，表现为技术的进步速度越来越快，每一代技术的生命周期越来越短。三是智能爆炸：在人工智能领域，奇点可能导致“智能爆炸”，即机器的智能迅速超越人类智能，引发一系列技术和社会变革。据库兹韦尔预测，技术奇点将在21世纪中叶（大约2045年左右）到来。届时，人工智能将超越人类智能，人类社会将发生根本性的变革。

⁵² Nick Bostrom: *Superintelligence: Paths, Dangers, Strategies*, U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4, p141-142.

认为的人类感官的最完善状态——整个身体变成各种器官。甚至后人类终有一天不再需要任何物质身体，仅仅作作为信息处理的模态和过程而存在。事实上，超人类主义者的“永恒”面临着与狄德罗的“偶然”同样的境况：承载人类个体的信息持续变易，没有终结。无论如何，这些假设终究可以回溯到狄德罗的问题：变化什么时候发生？唯一的区别是，对狄德罗而言，变化首先是个体发生学意义上的；而对超人类主义者而言，变化首先在整体的意义上发生。

参考文献：

- [1]狄德罗.狄德罗哲学选集[M].江天骥、陈修斋、王太庆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
- [2]尼采.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M].孙周兴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23.
- [3]诺伦·格尔茨.虚无主义与技术[M].张红军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24.
- [4]詹姆斯·A.赫里克.人类未来进化史：关于人类增强与技术超越的迷思[M].赵昱、陈天皓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2.
- [5]Andrew Curran. Sublime disorder: physical monstrosity in Diderot's universe[M].UK: University of Oxford Voltaire Foundation, 2001
- [6]Dixon, B. Lynne. Diderot, philosopher of energy: the development of his concept of physical energy, 1745-1769[M]. UK: University of Oxford Voltaire Foundation, 1988.
- [7]Francis Bacon. Novum organum, in Novum organum, New Atlantis, Advancement of Learning/Novum Organum/New Atlantis[M].Robert Maynard Hutchins Mortimer J. AdlerEd.Encyclopaedia Britannica:University of Chicago,1982.
- [8]Nick Bostrom. Superintelligence: Paths, Dangers, Strategies[M].U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4.

Diderot's 'Monster' and the Posthuman —An Interpretation Based on Human Contingency

Xia Zhengzheng¹

¹*School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 Capital Normal University*

Abstract: Diderot's study of "monsters" constitutes a transformation of Bacon's paradigm of "natural deviations." His intellectual trajectory underwent a significant shift from teleology to organic-mechanical materialism: initially influenced by Shaftesbury's teleological conception of nature, he later rejected this framework due to its explanatory inadequacy regarding monstrous phenomena, ultimately reconceptualizing monsters as contingent products of natural disorder. This epistemological shift reveals a fundamental limitation of transhumanist technological determinism: as long as human transformation remains unpredictable and ontologically dependent on nature, the essential contingency of human existence cannot be overcome through techno-teleological schemes, even those proposing radical posthuman futures.

Keywords: Diderot; monster; transhumanism; contingency; teleology

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教育的历史逻辑与当代治理启示

傅丽君¹

(1.南京林业大学, 江苏 南京 210000)

摘 要: 抗战时期的思想政治教育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为理论根基, 通过群众利益融合、制度化设计与传播创新, 实现了思想引领与社会动员的有机统一。以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教育的历史实践为研究对象, 系统梳理其理论武装、群众路线、实事求是、批评与自我批评及文化宣传五大核心方法, 揭示其历史逻辑与治理智慧。通过整合历史文献与政策文本分析, 进一步反思其历史局限性并提炼其对新时代意识形态工作的启示, 为当前社会治理与意识形态建设提供了跨越时空的理论资源与实践路径, 对构建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体系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关键词: 思想政治教育; 抗战时期;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当代治理启示

DOI: doi.org/10.70693/rwsk.v1i5.968

一、历史坐标与时代命题：抗战胜利 80 周年

2025 年是抗日战争胜利 80 周年, 这一特殊的历史节点为重审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教育的历史经验提供了重要契机。抗日战争作为中华民族从近代屈辱走向民族复兴的关键转折点, 其背后的思想政治动员机制不仅是中共领导革命胜利的核心密码, 更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实践场域。在此背景下, 系统梳理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的思想政治教育方法, 既是对历史经验的学术回溯, 也是对新时代意识形态工作的深刻反思。当前, 随着全球化进程的深化与社会思潮的多元化发展, 如何在复杂环境中凝聚共识、强化主流价值观, 成为社会治理的核心议题。抗战时期的思想政治教育经验为此提供了跨越时空的理论资源与实践路径。

现有学界对抗战时期中共思想政治教育的研究多聚焦于具体政策^[1]、人物^[2]或个案分析^[3], 但对整体方法体系的提炼及其普适性价值的探讨仍显不足。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的思想政治教育方法既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 也是超越时空的治理智慧。本文试图通过整合历史文献、政策文本与案例分析, 系统总结抗战时期思想政治教育的五大核心方法, 结合当前社会治理与意识形态建设的现实需求, 通过学术化梳理与时代化转化, 丰富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谱系, 更能为新时代国家治理现代化注入深层动力。

二、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的思想政治教育的历史脉络与核心方法

(一) 历史背景与挑战

1. 抗战爆发初期 (1937-1941): 民族危亡下的思想动员任务

1937 年卢沟桥事变后, 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全面侵华战争, 中华民族陷入空前危机。此时, 国民党政府仍奉行“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 导致国内政局动荡、社会分裂, 而日军的军事侵略与经济封锁进一步加剧了民众的苦难。面对这一局面, 中国共产党迅速调整战略, 提出“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的口号, 推动国共合作, 建立以国共两党为主体、涵盖各民主党派、民族资产阶级、海外华侨及普通民众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然而, 这一阶段的思想政治教育面临多重挑战: 一方面, 党员干部需系统学习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例如, 学习毛泽东的《实践论》《矛盾论》以指导实际斗争; 另一方面, 如何将抽象的民族解放理念转化为普通民众可感知的行动目标成为关键任务。例如, 《论持久战》通过通俗化理论普及, 打破民众对“亡国论”的悲观情绪, 同时通过“三三制”政权建设平衡各方利益, 吸纳地方士绅、知识分子参与抗战。

2. 相持阶段 (1941-1942): 根据地内忧外患中的思想整肃

1941 年后, 日军推行“治安强化运动”, 对敌后根据地实施“三光政策”, 同时切断中共与外界的经济联系。与此同时, 国民党顽固派制造摩擦 (如皖南事变), 导致根据地陷入“黎明前的黑暗”。在此背景下, 中国共产党亟

作者简介: 傅丽君(2000—), 女, 硕士, 研究方向为思想政治教育、马克思主义理论。

需通过思想政治教育解决党内思想混乱的问题。教条主义与经验主义并存，削弱了党的凝聚力。此外，物质资源匮乏迫使党探索自力更生的路径，例如延安大生产运动中“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口号深入人心。国际援助中断也促使中共独立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道路，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构建了完整的理论体系，为后续整风运动奠定基础。

3. 战略反攻阶段（1943-1945）：思想政治教育与军事行动的深度融合

1943年后，随着日军战线拉长，中共领导的敌后战场成为对日作战的主力。此时的思想政治教育转向巩固根据地、提升战斗力的目标。一方面，制度化建设的需求日益迫切，例如《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要求全党强化纪律性，反对个人主义；另一方面，群众基础的深化成为重点，通过“减租减息”“诉苦运动”等政策进一步巩固工农联盟。同时，文化意识形态的塑造也成为关键任务，文艺作品如《白毛女》《黄河大合唱》将民族精神与革命理想结合，形成“延安精神”的文化标识。

从抗战初期的民族存亡与群众动员困难，到相持阶段的内部思想混乱与外部封锁，再到战略反攻阶段的根据地治理能力不足与文化认同缺失，中国共产党通过一系列应对策略逐步化解危机。例如，在理论武装方面，通过党校培训、干部轮训等形式系统传播马克思主义理论；在群众路线实践中，利用通俗读物、戏剧表演等贴近民众的形式实现思想渗透；在文化宣传中，依托《新华日报》《救亡日报》等媒体扩大影响力。这些举措不仅为抗战胜利提供了思想保障，更深刻影响了党的执政理念，从“被动防御”到“主动引领”，从“局部经验”到“系统理论”，最终形成了以“实事求是”“群众路线”为核心的治理逻辑。这一历史经验表明，思想政治教育不仅是特定时期的应急手段，更是实现长期治理现代化的关键工具，其背后蕴含的“以人民为中心”“理论与实践结合”等原则至今仍具普适性价值。

（二）核心方法与路径

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的思想政治教育方法体系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与实践创新性，其核心路径可概括为五大维度：理论武装与信仰教育、群众路线与基层渗透、实事求是与调查研究、批评与自我批评机制、文化宣传与精神塑造。这些方法既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本土化的创造性运用，也是对当时复杂政治生态与社会结构的适应性回应，构成了中国共产党凝聚人心、组织群众、推动革命进程的关键工具。

1. 理论武装与信仰教育：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深化

中国共产党在抗战时期高度重视意识形态建设，通过系统化理论教育强化党员与群众的阶级意识与革命信念。一方面，党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毛泽东的《论持久战》《实践论》《矛盾论》等著作，不仅为抗日战争的战略指导提供了哲学基础，更通过通俗化语言使抽象理论转化为民众可理解的思想武器。另一方面，党建立了多层次的教育培训体系，中央党校、抗大等机构成为干部理论学习的核心阵地^[4]。通过课程设置（如《社会发展史》《马列主义基础》）、教材编写（如《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及集中轮训，党员干部得以掌握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与方法，从而在实践中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此外，党还注重通过“讲坛式教学”“讨论式学习”等形式，将理论教育与具体斗争任务结合，例如在土地改革中宣讲《中国土地法大纲》，在减租减息政策中阐释“新民主主义经济”的内涵，实现了理论认知与实践行动的有机统一。

2. 群众路线与基层渗透：政治动员的多样性与实效性

中国共产党在抗战时期确立了“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的工作路线，通过多元化的政治动员手段将思想教育渗透至社会基层。一方面，党依托报刊、广播等媒介扩大宣传覆盖面。《新华日报》《解放》周刊等党报党刊通过连载《论持久战》《论联合政府》等纲领性文章，结合漫画、短评等通俗形式，使抗日理念深入人心；延安新华广播电台则通过电波向全国乃至国际传播中共的政治主张。另一方面，党充分利用艺术载体实现“寓教于乐”。戏剧《放下你的鞭子》《兄妹开荒》以东北家庭受日军压迫、农民参与生产互助为主题，通过街头演出与巡回剧场直接激发民众情感共鸣；歌曲《黄河大合唱》《义勇军进行曲》以激昂旋律凝聚民族精神，成为抗战文化的象征。此外，党通过制度化设计构建统一战线。在敌后根据地推行“三三制”政权，吸纳地方士绅、知识分子及民族资产阶级参与治理，形成了全国思想政治工作网络^[5]。此外，党还通过“诉苦会”“拥政爱民”等群众活动，将思想教育融入日常生活，例如通过揭露封建剥削唤醒农民阶级意识，或通过军民联欢巩固军政关系，最终实现了从“思想共识”到“行动自觉”的转化。

3. 实事求是与调查研究：方法论革新与实践导向

延安整风运动标志着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论的重大突破。为此，党通过调查研究制度化推动思想教育的科学化。一方面，要求干部深入农村、工厂、部队开展社会调查，撰写《兴国调查》等典型报告，总结群众实践经验并提炼政策依据；另一方面，通过“一般号召与个别指导相结合”的方式，将宏观战略部署细化为可操作的基层实施方案。例如，在土地改革中，党通过试点村的调研发现“平均分配”可能引发富农不满，进而调整政策为“减租减息”与“交租交息”并行，既保障农民利益又稳定社会秩序。此外，党还通过“典型示范法”推广成功经验，如将陕甘宁边区“南泥湾大生产”模式作为自力更生的典范，激励其他根据地效仿。这种以实证为基础的方法论，不仅纠正了党内脱离实际的倾向，也为后续政策制定提供了科学支撑。

4. 批评与自我批评机制：思想整肃与组织净化

延安整风运动通过系统化的批评与自我批评机制,实现了党内思想的统一与组织的纯洁化。党提出“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原则,强调通过坦诚交流而非简单斗争解决思想分歧。一是通过建立个人自传制度,要求党员全面梳理自身思想历程,主动暴露历史问题(如曾参加其他党派或存在“左”倾错误),以此促进自我反思;二是推行小组讨论制,以党支部或学习小组为单位开展“开门整风”,允许群众参与评议干部作风,例如在晋察冀边区通过群众举报整治官僚主义;三是将整风与纪律审查结合,针对特务嫌疑人员实施“审干”程序,但后期因“抢救运动”过激而调整策略,最终形成“审慎甄别”的制度规范。这一机制不仅清除了宗派主义与个人主义的影响,也强化了党的纪律性与凝聚力,为后续解放战争胜利奠定了组织基础。

5. 文化宣传与精神塑造: 主流价值的文化赋形

中国共产党通过文化创作与符号建构,将抽象的革命理念转化为具象的精神标识^[6]。一方面,党明确“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要求文艺工作者深入群众生活,创作反映抗战现实与社会主义理想的作品。例如,《白毛女》以地主压迫下的农民觉醒为主题,通过戏曲形式批判封建剥削,同时展现党的领导作用;木刻版画《纺车旁的补课》描绘妇女在劳动间隙学习识字的场景,赋予“扫盲”以革命意义。另一方面,党通过仪式化活动塑造集体记忆与身份认同。例如,“延安精神”被概括为“实事求是、艰苦奋斗”,并通过领袖讲话(如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纪念活动(如清明节祭奠烈士)不断强化;八路军“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则通过标语、快板等形式普及,使军队行为规范内化为战士的道德准则。这种文化赋形策略,不仅增强了思想政治教育的感染力,也使党的价值理念在潜移默化中成为社会主流话语。

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的思想政治教育方法呈现出高度的系统性与创新性。其核心逻辑在于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为指导,以群众路线为实践根基,以实事求是为方法论原则,以批评与自我批评为纠偏机制,以文化宣传为传播载体,最终实现思想引领与社会动员的双重目标。这一方法体系不仅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更蕴含着超越时空的治理智慧,为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提供了丰富的理论资源与实践范式。

三、抗战时期思想政治教育的历史经验总结

(一) 方法论特征

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的思想政治教育方法体系,既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本土化的创造性实践,也是对复杂历史条件的适应性回应。其方法论特征呈现出鲜明的辩证统一性与实践导向性,为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提供了深刻的历史镜鉴。

1. 理论与实践的辩证统一构成了思想政治教育的核心逻辑

中国共产党在抗战时期始终强调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通过“理论指导实践——实践检验理论——理论再指导实践”的闭环模式,实现了意识形态建设与革命任务的高度契合。例如,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以军事战略为核心,同时融入历史唯物主义分析,揭示战争发展的阶段性规律,为民众提供了科学认知框架;而《实践论》《矛盾论》则通过通俗化语言,将抽象哲学思维转化为群众可理解的思想武器。这一过程并非单向灌输,而是通过党校培训、干部轮训等形式系统传播理论,并结合《兴国调查》《长冈乡调查》等典型调查成果,不断修正政策方向,形成“典型示范——经验推广——政策修正”的动态循环。这种理论与实践的双向互动,不仅强化了党员干部的理论素养,也确保了政策制定与群众需求的精准对接,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经典范式。

2. 思想教育与群众利益的深度融合体现了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

中国共产党在抗战时期始终将思想政治教育嵌入群众切身利益之中,通过“物质利益+精神引领”的双重路径实现动员目标。例如,通过“减租减息”“大生产运动”等经济政策直接改善民生,使群众在物质获得感中认同党的领导;又如,《黄河大合唱》等文艺作品以艺术形式揭露封建剥削、凝聚民族精神,将抽象理念转化为具象叙事,激发群众情感共鸣。同时,党通过“三三制”政权建设吸纳地方士绅、知识分子参与治理,既缓解阶级矛盾,又扩大抗日力量基础。这种将思想教育与群众现实需求相结合的策略,超越了单纯的政治说教,通过满足群众物质与精神诉求的双重逻辑,实现了思想政治教育的内生性与可持续性。

3. 制度化与灵活性的平衡展现了动态治理的组织智慧

中国共产党在抗战时期展现出极强的组织创新能力,通过刚性制度设计与柔性策略调整的结合,构建了高效的思想政治教育体系^[7]。一方面,建立党校培训、政治工作条例、个人自传制度等长效机制,如《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政治工作暂行条例》首次明确“政治工作是革命军队的生命线”,为军队思想政治教育提供制度保障;另一方面,针对不同历史阶段的任务调整教育重心,初期以“全民抗战”为核心,通过报刊宣传(《新华日报》《救亡日报》)、街头演讲广泛动员;相持阶段转向“思想整肃”,通过延安整风运动解决党内教条主义问题;反攻阶段则聚焦“巩固根据地”,通过新秧歌运动深化群众认同。此外,党通过“党——政——群”三位一体的工作网络协调多方力量,如边区政府通过“拥政爱民”运动协调军民关系,文艺工作者深入部队创作反映抗战现实的作品,形成党政主导、社会参与的协同效应。这种刚柔并济的治理逻辑,既确保了行动的稳定性,又保持了应对复杂环境的灵活性,最终实现思想政治教育的全覆盖与高效率。

(二) 成功要素分析

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的思想政治教育之所以能够取得显著成效,其成功背后蕴含着多重关键要素。这些要素成功要素共同构成了抗战时期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在逻辑:以思想权威为核心,以群众基础为根基,以传播创新为路径,以制度设计为保障,最终形成了“理论指导实践—实践滋养理论”的良性循环^[8]。

1. 党的领导核心作用与思想权威的确立是思想政治教育成功的根本保障

中国共产党在抗战时期始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并通过系统化的理论创新确立了思想权威。毛泽东思想的形成与普及成为这一阶段的核心标志。从《论持久战》的战略分析到《实践论》《矛盾论》的方法论阐述,再到《新民主主义论》的理论体系建构,毛泽东的著作不仅为党员干部提供了科学认知框架,也为普通民众理解抗战意义提供了通俗化路径。例如,1937年洛川会议上提出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通过明确“全面抗战”“持久战”等战略目标,迅速成为动员群众的思想武器;而在1945年中共七大上,毛泽东思想被正式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标志着党从“自在的党”向“自为的党”的转变。这种思想引领与组织权威的结合,确保了思想政治教育在复杂环境中的方向性与稳定性。

2. 广泛的社会动员能力与群众基础的巩固是思想政治教育成效的实践基础

中国共产党在抗战时期展现出极强的组织渗透力,通过多层次的动员策略实现了思想教育与社会行动的深度融合。一方面,党通过“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吸纳各阶层力量:在敌后根据地推行“三三制”政权,吸纳地方士绅、知识分子参与治理,既缓解了阶级矛盾,又扩大了抗日力量的基础;另一方面,党通过“减租减息”“诉苦运动”等政策直接改善民生,使群众在物质获得感中认同党的领导。例如,晋察冀边区通过土地改革激发农民生产热情,陕甘宁边区通过“大生产运动”实现粮食自给,这些举措将抽象的政治理念转化为可感知的利益分配,增强了群众的参与感与归属感。

3. 创新的传播方式与适应性调整是思想政治教育持续深化的关键动力

中国共产党在抗战时期并非固守单一的教育模式,而是根据历史阶段的变化灵活调整策略。初期(1937-1941),党通过报刊宣传(《新华日报》《救亡日报》)、街头演讲等形式广泛发动群众,例如周恩来发表的《论统一战线》演讲与“华北之大,已经安放不得一张平静的书桌”等口号,迅速点燃了青年学生的爱国热情;相持阶段(1941-1942),党通过延安整风运动系统解决党内思想混乱问题,以“实事求是”为核心推动理论联系实际的作风转变,并通过“小组讨论制”“开门整风”等制度化程序确保思想统一;反攻阶段(1943-1945),党则将思想政治教育与军事行动紧密结合,例如在战斗前开展“诉苦”教育,揭露日军暴行以激发士兵斗志,或通过“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规范军队行为,塑造革命军人的道德准则。这种动态调整的策略,使思想政治教育始终与时代需求保持同步,既解决了阶段性任务,又积累了可持续发展的经验。

4. 制度化设计与柔性治理的协同是思想政治教育效能提升的组织保障

中国共产党在抗战时期建立了多层次的制度体系,既通过党校培训、政治工作条例、个人自传制度等刚性机制确保教育的规范性,又通过调查研究、典型示范、群众评议等柔性手段增强实践的灵活性。例如,《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政治工作暂行条例》为军队思想政治教育提供制度保障;而《兴国调查》《长冈乡调查》等典型调查报告,则通过实证研究修正政策偏差。此外,党还通过“党—政—群”三位一体的工作网络协调多方力量。这种刚柔并济的治理逻辑,既确保了行动的稳定性和持续性,又保持了应对复杂环境的灵活性,最终实现了思想政治教育的全覆盖与高效率。

(三) 历史局限性反思

尽管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的思想政治教育取得了显著成效,但受限于特定历史条件与实践探索的阶段性特征,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

1. 教条主义与经验主义的干扰影响了理论创新

早期部分党员干部机械照搬苏联革命模式(如“城市中心论”),忽视中国农村包围城市的特殊路径;而后期个别地区又陷入经验主义误区(如晋察冀边区因轻信“粮食充足”导致饥荒),暴露出理论联系实际能力的不足。这种思想偏差虽在整风运动中被纠正,但在实践中曾削弱党的科学决策能力。

2. 宗派斗争对统一战线的负面影响

整风运动初期的“抢救运动”因“逼供信”问题引发群众信任危机,虽经毛泽东干预调整为审干与整风结合,但仍暴露了党内政治生态的脆弱性。此外,部分干部在根据地治理中存在排他倾向(如排斥非党员参与政权建设),削弱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包容性。

3. 历史环境的极端性限制了教育方法的普适性

抗战时期的思想政治教育高度依赖军事动员与生存压力(如“大生产运动”),其强制性与功利性色彩较强,难以完全适用于和平时期的社会治理需求。例如,“诉苦会”“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激烈形式,在常态化的社会环境中易引发新的矛盾。这些局限性表明,思想政治教育需在动态实践中不断修正与完善,既要坚持核心原则,也要避免僵化模式对复杂社会关系的过度简化。

四、抗战时期思想政治教育的现实启示

（一）对新时代意识形态工作的指导意义

1. 强化理论武装与价值观引领

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通过《论持久战》《实践论》等理论著作实现思想引领的经验，为新时代意识形态工作提供了重要方法论参照。当前需推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大众化传播，突破传统灌输式教育的局限，借助短视频、直播平台等新媒体形式以通俗化语言普及理论。例如，通过算法推荐精准匹配不同群体的认知需求，提升理论传播的渗透力与接受度。同时，面对网络时代的舆论挑战，需构建“理论——实践——反馈”的闭环机制，例如通过青年亚文化研究识别价值冲突点，以“接地气”的叙事策略回应社会关切，增强主流意识形态的解释力与凝聚力。

2. 坚持群众路线与基层治理结合

抗战时期通过“减租减息”“大生产运动”等政策实现思想教育与众群众利益融合的经验，为新时代社会治理提供了实践路径。在乡村振兴与社区治理中，需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理念，例如通过“枫桥经验”深化干群关系：依托网格化管理机制开展入户走访，精准识别群众思想动态；利用数字政务平台实现政策透明化，增强群众参与感。此外，需强化基层党组织的政治功能，群众实践具有创造性，思想政治工作者不能自以为是、高高在上，应始终坚持师生平等原则，进行共情式沟通和启发式教学^[9]。通过“三查三整”制度化的延续，确保思想政治教育在基层治理中的常态化嵌入，形成“问题发现—群众参与—协同解决”的治理闭环。

（二）对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的创新启发

1. 数字化转型中的教育模式

抗战时期通过报刊、戏剧等多样化载体实现思想渗透的经验。在数字时代改进我国思想政治教育方式，是有效解决我国思想政治教育资源发展不平衡、丰富社会性思想政治教育资源迫切需要^[10]。在当代可转化为技术赋能的教育模式，例如，借助大数据分析精准识别不同群体的思想特征，针对青年亚文化（如二次元、电竞圈层）设计差异化传播策略；利用虚拟现实（VR）技术还原历史场景（如抗战纪念馆数字化），增强沉浸式学习体验，使抽象理论具象化。此外，人工智能驱动的个性化学习系统可替代传统“一刀切”培训，例如通过智能问答机器人实时解答党员干部的学习疑问，提升思想政治教育的效率与针对性。

2. 文化自信与主流价值的融合

抗战时期文艺宣传将民族精神与革命理想结合的经验，为当前文化自信建设提供了创作范式。需开发红色 IP 资源（如《觉醒年代》《长津湖》），通过市场化运作实现主旋律作品的破圈传播，例如将英雄叙事融入流行文化符号（如游戏、动漫角色）。同时，需挖掘传统文化中的家国情怀元素，与现代思政教育衔接：例如在中小学课程中增设“家国文化”专题，通过经典诵读与社会实践结合，培育青少年的集体认同感与责任意识。

（三）对应对重大危机的启示

1. 突发公共事件中的思想动员

抗战时期通过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整合多方力量的经验，为当代突发公共事件（如新冠疫情）提供了治理镜鉴。例如，借鉴“三三制”政权吸纳多元主体参与决策的模式，建立政府—企业—社会组织协同应对机制；通过透明化信息传播（如每日疫情通报）与情感共鸣叙事（如“最美逆行者”故事），化解社会焦虑并凝聚共识。此外，需完善应急心理干预体系，例如依托社区网格员开展心理健康服务，避免极端情绪引发次生风险。

2. 国际话语权构建

抗战时期通过延安新华广播电台向海外传播抗战信息的经验，为当前国际话语体系建设提供了战略思路。需以抗战精神为纽带，讲好中国故事，例如在“一带一路”文化交流项目中展示中华文明的包容性，通过李子柒等文化输出案例塑造“真实、立体、全面”的国家形象。同时，需主动应对西方意识形态偏见，构建基于平等互鉴的全球话语体系：例如在涉及中国台湾、新疆等问题的国际争议中，借鉴“诉苦会”叙事策略，通过个体故事与集体记忆的结合，增强国际社会对中国立场的理解与认同。抗战时期思想政治教育在新时代仍具普适性价值。唯有将历史智慧与当代需求相结合，才能在复杂环境中筑牢思想防线、凝聚民族力量，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坚实的精神支撑。

结论

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教育的实践，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里程碑，深刻体现了“自我革命”与“社会革命”的辩证统一。通过理论武装、群众路线、实事求是等核心原则，党不仅凝聚了全民抗战的力量，更塑造了以“延安精神”为内核的文化标识。这一历史经验表明，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质在于实现价值引领与社会实践的有机融合，至今仍具普适性价值，为新时代社会治理、意识形态建设提供了深厚的历史智慧。面向未来，需进一步深化对抗战时期思想政治教育的研究维度。一方面，应加强地方性史料的挖掘，通过区域比较分析揭示不同根据地教育策略的差异性及其成因，从而丰富对历史复杂性的认知；另一方面，需拓展研究视野，探索思想政治教育与科技伦理、生态伦理等新兴领域的交叉议题，回应时代变革中的新挑战。唯有在历史经验的基础上不断创新，

方能构建更具韧性和适应力的思想政治教育体系，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持续的精神动力与制度保障。

参考文献：

- [1]谢飞.全面抗战时期新疆社会教育研究——以政治动员为视角的考察[J].西域研究,2020,(04):49-58+168.
[2]薛延飞,王东维.延安时期中共农民思想政治教育的历史经验[J].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38(04):92-95.
[3]阮云志,梁亚婷.延安时期党的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研究——以《边区群众报》为例[J].中国延安干部学院学报,2019,12(02):119-126.
[4]吕星卓.延安时期党员干部思想政治教育方法及其启示[J].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2024,(06):20-24.
[5]翟兴娥,徐玉莲.延安时期思想政治工作对当前高校育人的启示[J].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13,(07):118-121.
[6]张铮,于天洋.延安时期党领导边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经验、主要特征及现实启示[J].大学教育科学,2022,(06):107-116.
[7]闫惠惠.延安时期思想政治教育资源转化对新时代“大思政课”建设的启示[J].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研究,2025,11(02):119-127.
[8]张铮,于天洋.延安时期党领导边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经验、主要特征及现实启示[J].大学教育科学,2022,(06):107-116.
[9]郭呈才.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教育观的群众实践逻辑[J].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24,(02):77-84.
[10]傅安洲,阮一帆,王兴.高度重视和加强思想政治教育资源体系建设[J].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2005,(07):18-20.

Localisation Exploration and Practical Path of Marxist Class Theory - An Analysis of the Classes in Chinese Society as an Example

Fu Lijun¹

¹ School of Marxism, Nanjing Forestry University, Nanjing, Jiangsu

Abstract: During the Anti-Japanese War period,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established its theoretical foundation through the Sinicization of Marxism. By integrating mass interests, institutional design, and innovative dissemination, it achieved an organic unity of ideological guidance and social mobilization. Focusing on the historical practices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s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during this period, this study systematically examines five core methodologies: theoretical arming, the mass line, seeking truth from facts, criticism and self-criticism, and cultural propaganda, thereby revealing their historical logic and governance wisdom.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historical documents and policy texts, it reflects on their historical limitations while distilling insights for ideological work in the new era. This research provides transcending spatiotemporal theoretical resources and practical pathways for contemporary social governance and ideological construction, offering significant reference value for building a modern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system in the new era.

Keywords: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Anti-Japanese War period; Sinicization of Marxism; Enlightenment for Contemporary Governance

英汉认知隐喻对比： 通过“(口)渴”和“饥(饿)”表达的“愿望”

郑翻¹

(1.华中科技大学, 湖北 武汉 430074)

摘要: 本研究基于概念隐喻理论框架, 作者发现在汉语和英语中均有“渴是愿望”、“饥饿是愿望”的概念, 本文从词汇角度并基于语料库 (CCL、BCC 和 COCA 语料库), 针对“(口)渴”和“饥(饿)”在汉英两种语言使用时表达的“需求”、“渴望”的隐喻进行挖掘和列举。通过探索中英文相同词汇喻指同一概念的隐喻, 能够证实一定背景下不同文化背景的语言有相通之处, 也进而促进跨文化交际时的理解。本文不止探寻“(口)渴”和“饥(饿)”两个概念引申至“愿望”这一概念的应用, 还将探讨英语和汉语在表达同一概念时, 由于文化和语言差异, 其表达和搭配有所不同。

关键词: 英汉对比; 概念隐喻; 认知语言学

Doi doi.org/10.70693/rwsk.v1i5.991

一、引言

隐喻在传统意义上被认为是修辞手段, 事实上是一种普遍的语言现象。尤其是自1980年莱考夫 (George Lakoff) 和约翰逊 (Mark Johnson) 合著书籍《我们赖以生存的隐喻》(*Metaphors We Live By*) 出版后, 概念隐喻一词被提出, 由此开启了全新的隐喻研究视角。

Lakoff 和 Johnson (1980) 发现“隐喻在日常生活中无处不在, 不仅在语言中, 而且在思想和行动中。我们用来思考和行动的普通概念系统本质上是隐喻性的。”概念隐喻反映着我们日常生活的细节, 构建了我们再生活中所能感知到的东西, 我们思考的方式以及我们每天做的事很大程度上都是隐喻性的, 通常也是不被人们意识到的 (Lakoff & Johnson, 1980, p. 4)。通过“观察”语言表达, 我们可以了解思维过程和行为的相同概念系统和我们活动的隐喻本质 (Lakoff & Johnson, 1980, p. 8)。例如, “人生是一场旅途”, 旅途是人生的映射。旅途是经历磨难和快乐的过程, 与各种各样的人相遇, 最终到达目的地的过程, 其中的隐喻义便是人生如同一场旅途, 经历了、遇见了, 并最终到达了。

隐喻是借一事物来谈另一事物 (Lakoff & Johnson, 1980)。“(口)渴”和“饥(饿)” (thirst and hunger), 本质上是形容人的生理上的一种状态, 反映人对于水或食物的需求、希望得到水或食物的愿望。通过进一步的探究发现, 在汉语和英语中均有用“渴”和“饥”的概念来表达需求、愿望或期盼。为了分析与探究, 作者将参考中英文字典和中英文的权威语料库, 其中字典包括: 第12版《新华字典》、第7版《现代汉语词典》、第9版《牛津高阶词典》、第11版《韦氏大学英语词典》和第8版《柯林斯英汉双解大词典》; 语料库平台包括: CCL 语料库 (即北京大学现代汉语语料库)、BCC 汉语语料库和 COCA 英文语料库。这三个语料库分别为英语和汉语最权威最齐全的语料库之一, 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词典的缺陷, 使研究更具可信度和说服力。

二、“(口)渴”是愿望

(一) 英语中通过“thirst”表达愿望

为了探寻英语中“(口)渴”这一概念对愿望的表达, 作者翻阅了《牛津高阶词典》、《韦氏大学英语词典》和《柯林斯英汉双解大词典》, 在三本词典中均提到 THIRST (口渴) 的概念意义 (Conceptual Meaning) 为 “The feeling of needing or wanting a drink” (口渴、干渴感)。在《牛津高阶词典》和《韦氏大学英语词典》中还明确展示了 THIRST 的另一含义 “a strong desire for something” (对某物的渴求), 例如 “a thirst for knowledge” 也就对应了汉语中“求知若渴”的含义。COCA 语料库提供的 THIRST 的同义词包括: eagerness, longing, yearning, desire,

作者简介: 郑翻(2000—), 女, 硕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为基于语料库的口笔译研究、英汉对比;

通信作者: 郑翻

也均表达渴望的含义。

当我们查阅 THIRST 的形容词形式“thirsty”时, COCA 语料库提供的“thirsty”的同义词包括了 desiring, craving, desirous, eager, voracious, yearning, 均表达了与“渴望”、“期望”同类含义的概念。相应的搭配有 be thirsty for, 意为渴望、渴望得到某物。“He is thirsty for power” (他拼命想掌权), 表达他希望的得到权力的愿望似口渴一般迫切。

例 1 Fame is a great **thirst** of the young. (from COCA)

(年轻人**渴望**名声。)

例 2 The **thirst** and excitement to obtain this knowledge only gave me more enthusiasm to stay as long as possible. (from COCA)

(获取这些知识的**渴望**和兴奋只会让我更满腔热情, 并且停留更长的时间。)

例 1 中的句子是表达年轻人想要得到名誉的愿望就像口渴的人一般。例 2 的句子表达“我”对于知识获取的渴望和兴奋。由此我们也可以判断, 在英语中“(口)渴”这一概念也被用来引申至“渴望”、“期望”的含义, 并且在大多数情况下也用于表达这种愿望的急迫性, 在这点与汉语中的用法也一致。

(二) 汉语中通过“(口)渴”表达愿望

为了探究汉语中“(口)渴”这一概念是如何表达“愿望”含义的, 作者在《现代汉语词典》和《新华字典》中查询单字“渴”后显示的第一含义均为“口干想喝水”。这一含义中“想喝水”的“想”足以成为引申出“愿望”概念的证据。关于这一含义, 字典中列举的词汇用法有: 解渴、口渴、又渴又饿、临渴掘井、止渴、干渴。在《现代汉语词典》中, 列举的“渴”的第二个含义为“迫切地”, 相应的组词有: 渴望、渴念, 这就反映出了用“渴”的概念表达了“需求”、“期望”的意思。相应地, 在第 12 版在线《新华字典》中明确标注了“渴”的第二含义为其比喻义“迫切”, 组词有: 渴求、渴盼、渴望。这也可以说明, “渴”这一汉字喻指的“愿望”概念已经在汉语中逐渐固定, 形成固定的表达。其中还有一些词汇更能显现出“渴”在“希望实现愿望”方面的体现。

例 3 不夯实农田水利基本建设这个基础, 指望丰收就像是望梅止渴, 遇上个水旱灾害, 丰收很可能化为泡影, 侥幸不成反遭不幸, 这样的教训是很多的, 应当记取。(CCL 语料库, 源自《人民日报》)

例 3 中的成语“望梅止渴”, 原意是梅子酸, 人想吃梅子就会流涎, 因而止渴。后比喻愿望无法实现, 用空想安慰自己。“止渴”的意思也喻指“满足愿望”。在这里是想表达, 若没有农田水利建设的基础, 想丰收就是空想的愿望。

例 4 把农村、把城市各行各业各类人群乃至天文地理自然万物都当成了学习的书本, 天地江河就是偌大的课堂, 对他能涉及到遇到的所有科学知识、社会知识, 他都求知若渴。(BCC 语料库, 源自《人民日报》)

这里成语“求知若渴”中的“若渴”表示“求知”(即求得、学习知识)的愿望像口渴的人想喝水一样地迫切。“援溺振渴”, 意思是援救落水者和干渴者, 比喻援救受灾的人。在这里“渴”作为名词, 暗含的意思是在落水时有需求、需要帮助的人。由此可见, 在汉语中, “渴”概念的使用不仅是传递出人们的一种需求和愿望, 更多时候也更强调这种愿望的迫切性。利用“口渴”时人们想要喝水的迫切愿望来应用于各种人们拥有急切希望的情况。

同等的情况也可以通过语料库中的例句来证实, 比如下面的例 5。

例 5 美国只得向阿塞拜疆等国求援, 挽救阿富汗的补给线, 但“远水解不得近渴”。(BCC 语料库)

该例句中的“近渴”表达的含义就是美国迫切想要挽救补给线的愿望。这一章的分析证明, “渴/thirst”在英汉语中都能表达一种想要迫切求得的“愿望”。

三、“饥(饿)”是愿望

(一) 英语中通过“hunger”表达愿望

在《牛津高阶词典》、《韦氏大学英语词典》和《柯林斯英汉双解大词典》中除了关于饥饿含义的注释之外, 均有“a strong desire for something”即表达“对某事物的渴望”的注解。而常见的搭配为“a hunger for something”表示希望得到某事物, 也可以使用其作动词时的用法“hunger for/after”表示渴望做到某事。

COCA 语料库给予的 HUNGER 的同义词有: craving, eagerness, desire, hankering, longing, need, wish, yearning。这些词汇也均传达愿望、期望的概念含义。在句子中同样可以得到证实。

例 6 Geffen has a hunger for success that seems bottomless. (from COCA)

(格芬对成功的渴望似乎永无止境。)

在上述例子中, 格芬想要获取成功的愿望似饥饿的人想得到食物一般。

例 7 But Jules was not eager for classroom learning, he hungered for adventure. (from COCA)

(但是朱尔斯并不热衷于课堂学习, 他渴望冒险。)

在例 7 中, 这里表达朱尔斯喜欢和期望去冒险的心境好似饥饿感强烈的人想要食物一般。

将例 6 和例 7 以及其中文翻译结合来看, 虽然“hunger”在这里和中文的“饥(饿)”喻指的“愿望/eagerness”概念是一致地, 但是却在翻译成中文时均翻译成了“渴望”, 可见在中文中, 用“渴”来表达“愿望”的情况更常见, 且逐渐固化。

（二）汉语中通过“饥（饿）”表达愿望

同样地，为了探究“饥”在汉语中如何表达愿望，作者同样参考了《现代汉语词典》和《新华字典》，并发现第一含义均显示为“饿”，且表明“饥”、“饿”二字常连用表达同一概念，意思是肚子空想吃东西。例如饥不择食、饥寒交迫。“饥”的第二个含义为庄稼收成不好或没有收成，例如“饥谨”。可以看到两个权威的汉语字典中均没有直接写出使用“饥”来表达愿望或期望含义的注解，但这也并不意味着汉语中没有这一现象。作者认为，与“渴”同理，“饥”这一概念中“想吃东西”的“想”也足以成为引申为愿望含义的证据。

在搜寻 BCC 语料库中，发现了“求知若饥”一词，与“求知若渴”一词高度相似，含义一致，也表示非常想要获得知识的愿望。中文中的俗语“饱汉子不知饿汉子饥”的意思为处境好的人不理解别人的苦衷，这几句话也可以被理解为“饱汉子”以及得到了某物、达成了某种心愿而不知他人求愿未果的苦楚。同理，利用“饥饿想吃饭”时人们想要喝水的迫切愿望来应用于各种人们拥有急切希望的情况。

同时，作者还搜寻了与“饥”相对的“饱”的含义。在《新华字典》中，“饱”的第一个含义为“吃足了，跟‘饿’相对”，例如饱学、饱经风霜。而第二个含义是“满足”，例如大饱眼福。“大饱眼福”意为观赏到好的东西或者美丽景色而满足了视觉的享受。在此，“饱”所表达的含义是“某种愿望已经得到了满足，从而很享受”。与“饥”所表达的迫切希望愿望的达成相反，而都包含期望、愿望这一领域的概念。

这一章的分析佐证了“饥（饿）/hunger”均可喻指“愿望”的概念。但从英文例句的中文翻译来看，在汉语中用“饥（饿）”的意象来表达迫切“愿望”的概念不及用“渴”来表达更常见，且“渴望”、“渴求”这样的词汇在汉语中已经成为固定表达。而在英文中也有类似的情况，虽然“be thirsty for”和“be hungry for”的说法都有，但在英语教材和词典中，“be thirsty for”是更基础的常见表达。

四、英汉“(口)渴”和“饥（饿）”喻指愿望时的不同

（一）“(口)渴 + 饥（饿）”组合表达愿望仅出现于汉语

在汉语中，“饥”与“渴”常常连用表达对满足愿望的强烈渴求。

例 8 书不是很贵，莎伦买下送给了德奥。德奥读得如饥似渴。他先看了一遍法语，又把英语背了下来。（BCC 语料库，源自《生命如歌》）

在例 8 中，“如饥似渴”，形容德奥拿到想要的书后像饿了急着要吃饭、渴了急着要喝水一样，比喻迫切需求阅读书籍，如同急需饮食那样。同样地，汉语中的习语还有“饥者易为食，渴者易为饮”，意思是饥饿的人什么食物都可以吃，口渴的人什么饮品都可以喝。也表达需要急迫的人容易满足。

值得注意的是，作者发现当我们试图搜寻在英语中将“饥”和“渴”连用来表达愿望概念时，却一无所获。不论是搜索“hunger and thirst”还是“hungry and thirsty”，都没有发现两个词汇连用表达同一概念（愿望）的现象，而只用于表达人生理上饥饿和口渴的含义。

例 9 He spoke how terribly thirsty and hungry he felt. (from COCA)

（他表达了他当时极度饥饿口渴的状态。）

例 10 Are you dying of hunger and thirst? (from COCA)

（你是要饿死渴死了吗？）

在例 9 和 10 两个句子中，“渴+饥”的组合，都只是表达人生理上饥饿和干渴的情况，却并不喻指任何愿望或需求的概念。

（二）“(口)渴”和“饥（饿）”表达愿望时的英汉中的不同宾语搭配

英汉两种语言在隐喻使用上的差异部分源于不同的语言习惯和文化背景。英语中，“thirst”和“hunger”更常用于形容非物质愿望；而在汉语中，“(口)渴”和“饥（饿）”更多用于形容物质类的实体愿望。

例 11 He is thirsty for power. (from Oxford Dictionary)

（他渴望权力。）

例 12 Both parties are hungry for power. (from Oxford Dictionary)

（两方都渴望权力。）

比如以上两个摘自《牛津词典》的例句 11 和 12，均是词典中显示“thirst/thirsty”以及“hunger/hungry”表达愿望概念时的最常见例句，均表达对“权力”的渴望。相反，在汉语中，类似“求知若渴”、“求贤若渴”的表达，均形容要求得知识、贤才等物质类实体的愿望。

关于英汉语中出现这种宾语搭配的差异，笔者认为应当归结于文化因素。文化是反映在人类生活中行为规范，传统习俗，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诸多方面的社会现象。语言和文化是相辅相成的。文化中包含着语言，但语言也是一种文化载体。每一个民族的文化是不一样的，必然反映到语言上。不同文化孕育着不同社会价值观。英汉语言分属两个不同语系，故可在文化与价值视角下了解英汉“(口)渴”和“饥（饿）”隐喻投射差异。

在本研究中，出现的这种差异可能与西方文化中强调个人主义和对个人追求的重视有关，所以有关于迫切的愿望的表达，很多就指向“权力”等。汉语文化更注重集体和谦逊，因此在语言中更谨慎地使用这些隐喻。

五、结语

本研究通过对比英汉语言中“(口)渴”与“饥（饿）”作为概念隐喻表达“愿望”的异同，揭示了跨语言隐

喻认知的普遍性与文化特异性。首先,研究证实了 Lakoff 与 Johnson 提出的概念隐喻理论的适用性:在英汉两种语言中,“口渴”和“饥饿”均被系统地映射至“愿望”这一抽象域,体现出人类通过身体经验构建抽象概念的普遍认知机制。例如,英语中“thirst for knowledge”与汉语中“求知若渴”的对应,均以生理需求隐喻精神渴望,展现了人类认知的共通性。

然而,文化背景与语言习惯的差异导致隐喻表达的具体形式存在分野。其一,汉语中“饥渴”常组合使用(如“如饥似渴”),强调愿望的迫切性,而英语中“hunger and thirst”仅保留生理意义,未衍生出组合隐喻。其二,英语中“thirst/hunger”更多指向非物质性愿望(如权力、成功),而汉语中“渴/饥”的隐喻对象多与实体相关(如知识、人才)。这种差异或可归因于文化价值观的分野:西方文化对个人成就的推崇促使隐喻投射至抽象目标,而汉语文化注重集体性与实用性,隐喻更贴近具体需求。

隐喻体现人类对世界的认知,而对隐喻的研究促进着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互相了解其他文化背景的人对世界的认知。本研究对跨文化交际与语言教学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一方面,隐喻的共通性为跨文化理解提供了认知基础。在翻译实践或二语教学中,可通过隐喻映射的相似性促进目标语言习得。另一方面,文化特异性提醒我们需关注隐喻的语境适配性,避免因直译导致语义偏差。此外,研究也为认知语言学领域提供了一定的实证支持,表明概念隐喻不仅是语言现象,更是文化认知的镜像。

未来的隐喻研究可以进一步探索其他的概念投射。同时,也可结合不同年代和地域的语料对概念隐喻进行历时性的动态研究,纳入更大规模的语料库,深入剖析文化因素,从多个维度挖掘文化对隐喻表达的影响,推动领域研究的发展。

参考文献:

- [1] Lakoff G, Johnson M. *Metaphors We Live by*[M].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0.
- [2] Yu N, Huang J. Primary metaphors across languages: Difficulty as weight and solidity[J]. *Metaphor and Symbol*, 2019, 34(2): 111-126.
- [3] 车慧. 跨文化视角下的英汉翻译隐喻差异对比[J]. *现代英语*, 2023, 4(11), 69-72.
- [4] 陈升笑. 概念隐喻视角下对英汉习语“狗”的对比研究[J]. *汉字文化*, 2022, 34(19), 157-160.
- [5] 龚旭, 吴环宇. 英汉温度域中“温/warm”概念隐喻对比研究[J]. *海外英语*, 2023, 17(20), 68-71.
- [6] 林书武. 国外隐喻研究综述[J]. *外语教学与研究*, 1997, 30(1), 14-22.
- [7] 束定芳. 论隐喻的认知功能[J]. *外语研究*, 2001, 18(2), 28-31.
- [8] 王文斌. 英汉对比研究的三大问题[J]. *外语教学与研究*, 2023, 57(2), 163-175+318.
- [9] 吴瑾萱. 英汉“路”的隐喻认知对比[J]. *海外英语*, 2020, 14(23), 251-252+262.

Comparing Metaphors in English and Chinese: Wishes Expressed by “Thirst” and “Hunger”

ZHENG He¹

¹ Huazh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Wuhan, China

Abstract: As a cognitive linguistic study, the author finds that there are concepts of “thirst is eagerness” and “hunger is eagerness” in both Chinese and English. Based on applied lexical usage and corpus (CCL, BCC & COCA), this paper explores and enumerates the target meaning of “eagerness” and “desire” implied in “thirst” and “hunger” in Both Chinese and English. In the meantime, this essay will also explore different collocations and expressions in both English and Chinese when they are trying to express the same concept. Through the exploration of metaphor, the essay confirms the similarities between languages from different cultural backgrounds in a certain context, and thus promote understanding in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 This essay will not only explore the application of the concepts of “thirst” and “hunger” to the concept of “eagerness”, but also discover the differences in the expression and collocation of the same concept in English and Chinese due to cultural and linguistic differences.

Keywords: contrastive study of English-Chinese; conceptual metaphors; cognitive linguistics

语篇分析视角下语言景观治理研究

吴仲启¹ 陈维妙¹

(1. 广东白云学院, 广东 广州 510000)

摘 要: 传统的语言景观治理有赖于人工的纠错, 在生成和治理方面一直存在制作不规范, 纠错不及时, 修订不系统的弊病。Halliday (1985:10) 把在情景语境中起作用的任何一个语言实例称作语篇, 并认为语篇可以是口头或书面的, 也可以是其他的表达媒介。这为我们把语言景观视作语篇奠定了基础, 通过将语言景观语篇化, 有助于我们更好地整理, 清洗, 为人工智能时代的语言生活研究、治理提供了新的途径。

关键词: 语篇分析; 语言景观; 语言治理

基金项目: 广东白云学院 2024 年度大学生创新训练项目《多模态视域下粤港澳大湾区民办高校语言景观调查及优化路径研究》(编号 S202410822027)

DOI: doi.org/10.70693/rwsk.v1i5.999

根据 QR-Code 网站提供的数据, 中国的二维码使用量极为巨大: 中国二维码仅 1 个月就被扫描 1.136 亿次。中国用户每天与二维码互动 10-15 次。这是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 二维码是一种编码储存信息数据的矩形编码, 通过手机扫描, 我们可以因此跳转获得更多的信息。由于二维码常常与其他语言文字符号共现, 我们也将其视作一类特殊的语言景观, 这显然超越了 (Landry & Bourhis 1997) 的经典定义: 路牌、广告牌、街名、地名、商铺招牌以及政府楼宇的公共标牌之上的语言共同构成一个地区或城市群的语言景观。但正如尚国文所说, 随着研究的深入, 我们早就把各个空间维度的标牌纳入了研究视野, 语言也不再局限于书面文本, 而是涵盖多个模态, 例如符号、图像、声音等多模态。随着 VR、AR 等技术的发展, 以及元宇宙概念的提出, 语言景观或许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时代。它们正在走向智能化、数字化, 互动性大大加强, 这些周遭的语言景观构成我们语言生活的一部分, 传统的语言景观研究侧重于语言景观背后展示出来的角色冲突, 话语权力, 但中国的语言景观研究则更加关注语言景观在语言生活、语言文化中起到的作用。李宇明 (2016a) 指出“语言生活是学习、运用和研究语言文字、语言知识、语言技术的各种活动”。语言景观作为语言生活的外在呈现形式, 不仅反映了语言的使用状况, 也承载了语言政策、文化认同和社会变迁的多重功能。因此本文更加关注语言景观在社会治理、文化认同和语言技术发展中的作用。传统的语言景观治理研究依赖于对个案的分析, 依赖于个体角色的干预, 例如“啄木鸟行动”“市民反馈”等方式, 尽管能起到一定的作用, 但缺乏足够的效率, 基于此本文将论述将语言景观视作语篇的可行性, 为语言景观的治理提出新的路径。

一. 语言景观的语篇化依据

传统语言景观研究中, 研究语言景观的理论方法有场所符号学理论, SPEAKING 模型等, 后来学界广泛地运用批评话语分析, 民族志, 视觉语法, 关联理论等对语言景观进行研究, 取得了十足的成效。批判话语分析、民族志方法等都是人类学、社会学等领域的经典研究方法。批评话语分析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CDA) 最早

作者简介: 吴仲启 (2004—), 男, 广东白云学院, 教育学院中文系汉语言文学专业大三本科生, 研究方向为语言景观、社会语言学;
陈维妙 (1991—), 女, 广东白云学院, 教育学院中文系讲师, 研究方向为社会语言学、华文教育。

致谢: 本论文是广东白云学院 2024 年度广东省大学生创新训练省级立项项目《多模态视域下粤港澳大湾区民办高校语言景观调查及优化路径研究》的成果之一, 论文曾在第二十九届功能语言学与语篇分析高层论坛汇报, 再次致谢点评人杨炳钧教授、何清顺教授。

由英国语言学家 (Norman Fairclough) 在 20 世纪 80 年代提出,旨在揭示语言与权力、意识形态、社会不平等之间的关系。批评话语分析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CDA) 自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逐渐发展为一种跨学科的分析方法,将语言学、社会学、政治学、心理学等多学科理论融为一体,在跨学科发展中,系统功能语言学 (Systemic Functional Linguistics, SFL) 和认知语言学 (Cognitive Linguistics, CL) 成为批评话语分析的重要支撑理论,并在具体分析中发挥互补作用 (辛斌, 2023)。在多种学科交叉的语言景观研究中,日益发展的语言生活呼唤我们用更多视角进行学术研究,正如杨炳钧所认为的:新时代和新技术期待深化意义为本的语言学理论, SFL 可在未来人机 (际) 交互以及网络化与日俱增的语言活动中发挥重要作用 (杨炳钧, 2024)。语言景观正是一个随着时代发展日新月异的语言现象。Halliday (1985: 10) 把在情景语境中起作用的任何一个语言实例称作语篇,并认为语篇可以是口头或书面的,也可以是其他的表达媒介。Matthiessen & Nesbitt (1996) 意识到技术和社会需求的发展导致出现语言理论和描写脱离的现象。Kress (1996) 也提出了他的视觉语法,实际上这为语言景观视作语篇奠定了理论的基础,杨信彰 (2009) 也表明,语篇表达模式的变化给理论描写带来了新要求。实际上都接纳了语言和其他模态互动之下成为语篇的可能性,这也为我们将语言景观整体视作大语篇奠定了基础,语篇是系统。语篇是文本/话语生产者通过文本/话语 (产品) 及其消费者的互动来实现社会目的的系统 (王振华 2009)。王振华认为“语篇”这个概念的指称范围应该扩大,“语篇”应该指大语篇。大语篇之所以大,不仅仅是指它“超越小句”,更应该指它包含不同的模态,比如交警执法话语,图片、音乐、电影电视等。以上的研究都认为语言景观视作语篇的合理性,而事实上语言景观的描写也一直是符合语篇的特性。传统的语言景观例如标语,招牌,一般都以文字符号作为主要内容,颜色、图案等模态则一般为陪衬,这些交互元素实际上都可以化作纯语言属性的描述:文字的放置位置、字体的选择、背景颜色的选择、图案的插入位置,图案的内容,这种做法在意识形态研究中相当常见,罗兰巴特曾在其著作中曾讨论过这样一个范例:一个戴着军帽的黑人士兵,正目光向着法国国旗庄严地敬礼。巴特的分析中说道:“但或许我有些天真,我清楚地意识到了这幅照片向我传递的意指效果:法国是个巨大的帝国,她的所有子民,不分肤色,都在她的旗帜下忠诚服役;这个年轻的黑人在为所谓的压迫者服役时展示出的热忱,就是对于那些殖民主义的批评者最好的回应。”在此并不讨论巴特的神话学理论,我们强调的是这种对图像的解读由来已久,这种分析实际上正泛用于我们对图像,宣传片的研究中,在视觉语法的研究中, Kress 更系统地讨论了多个模态之间对意义的理解,颜色的冷暖,排布等,这些都可以作为我们语言景观转换为语篇的基础。

二. 语言景观的语篇特点

语言景观相较于传统语篇更为复杂的是,它处于一个动态变化中的复杂空间,又充斥着话语交互之间的某种预设,又比寻常的语篇更具变化,我们可以这样总结语言景观的三个语篇特征:1. 内蕴复杂时空:语言景观不仅局限于传统的物理空间,还包括了多模态的数字环境和虚拟空间、2. 话语交互预设:语言景观中的符号和语言包含预设的信息,交互在特定的时间和空间维度中发生,并且存在动态的变化,影响到受众对符号的理解和解读、3. 技术强势介入:随着二维码、AR/VR 等技术的发展,技术在语言景观中的介入显著增强,使得语言景观从静态走向动态,交互性和实时性更为突出。余华 (2023) 指出,语言景观构建着空间的意义,并通过其指涉功能,将时间的不同向度凝聚在同一空间,而反过来说,在同一时间内,话语的互动又是一个跨媒体,也就是跨空间的行为。以商场广告的 LED 显示屏为例,不断更替的广告抑或资讯,大部分都与商场的客观存现产生纠葛,假设有一个活动快闪正在举行,底下活动的人群如风一般赶来展开活动的时候,假设 LED 大屏幕也宣告活动的进行,那么此刻,这个语言景观在读者的视野里则建构起了一个活动的全貌,而活动消失,景观存在,则会导致一种背景知识的丢失,使得无法把握整体事件的发生。由此,我们再回到瑟金特,菲利普和贾乔格卢,科里纳,强调的内容,语言景观和媒体 (包括新媒体和旧媒体) 是互相构成的,因此话语互动是一个跨媒体的构成,总的来说,联系韩礼德的三大元功能,语言景观中概念功能不局限于文字,还包括图像,色彩等很多非语言手段进行表达,并且随着语境的预设、背景知识的在线生成,以及空间的布局、视觉衔接来完成人际功能和语篇功能。

三. 功能语法视角下的语言景观语篇分析示例

这是一个餐饮店的招牌,最显眼的是他的店名《煲仔华》以及下面的粤语拼音,视作语篇我们可以用这样的

方式对其进行描写。“煲仔华”“BOU CHAI WAN”中文店名和粤语拼音店名我们视作话题，而店面与店里传来的香味，来往的人群与标牌构成了所谓的互文性，奠定了我们理解景观语篇的基础，即背景知识的在线生成。其标牌主要用了三种颜色，偏亮的暗红色，暖橙色和黑色，其中黑色用来标写粤语拼音，暗红色用来书写店名以及充当暖橙色字体的背景，暖橙背景也同时充当店名的背景，从设计的角度来说，做到了突出重点的功能，通过颜色的分布切割了各个语言符号。苗兴伟（2021）认为，话题-述题结构就是以活动为取向的信息组织方式，并直接作用于交际双方的理解。在传统的语体中，这种话题-述题结构通过话题化的句式结构或者话语标记来展示，但在多模态的景观中，他是通过字体颜色的改变，信息的放置来体现的。具体的描写可以如下：

话题-述题语法结构：

核心话题层：暗红色“煲仔華”（字号最大）+ 黑色粤拼“BOU CHAI WAN”（次大字号）构成主位系统
述题扩展层：暖橙色“勁火砂煲 真煲仔飯”（较小字号）作为新信息焦点，通过颜色对比实现 Kress 的“显著性”

空间语法：垂直排列形成“已知信息→新信息”的语篇推进模式

跨模态互文网络：

语言符号：“煲仔”（炊具）+“華”（品质）→ 味觉符号：砂煲烹饪的焦香

文化符号：粤语拼音激活地域身份认同 → 空间符号：店铺所在广州文化社区的方言生态

色彩语法系统：

暗红色（Pantone 7620C）：象征传统烹饪的灶火温度，触发“热烈/正宗”的情感联想，体现啫啫煲最典型烹饪样态“烤焦，收干水分，美拉德反应”

暖橙色（Pantone 157C）：隐喻食材的天然色泽，构建“温暖/安全”的消费心理空间

黑色（Pantone Black C）：通过低明度对比强化方言拼写的权威性，也较为低调地展示粤语属性，保留文化冲突的余地。

多模态介入策略：

字体对比：楷体店名（传统感）vs 无衬线拼音（现代性）构成“守正创新”的修辞张力

空间占位：“煲仔華”占据招牌 60%视觉面积，使主体达到较佳的显著性



图1 煲仔華



图2 食堂告示

另一个是广州某学校食堂的一个告示牌，再看食堂海报，它也是通过字体、颜色、图像等符号，信息通过多模态结构向受众传递，并且构成了复杂的语篇功能。这些符号的语法隐喻和互动特性加强了信息的传播，也就是满足我们的元功能。整体主题化：这类型的安全标语，向来整体就是表示一种提示信息的主题，这个海报就明确传递了“保持社交距离，避免飞沫传播”的公共安全信息。时间定位：突出了“疫情期间”的特定背景下需要采取的措施。主位与述位：海报的主位是“食堂安全就餐”，述位进一步解释如何通过保持距离来避免感染。通过文字和

图像结合,海报有效传达了信息。左下方的卡通人物形象用手势指示“保持距离”,这种图像符号的使用增强了信息的传递效果。有意思的是,语篇的阅读和理解受接受者的影响,语言景观作为语篇的独特之处就是,接受者、时空间的变化远比传统的语篇更快,疫情结束之后,读者的理解将会与曾经的理解存在差异。

四. 结语

本研究初步论证了语言景观整合成语篇进行分析的可行性,将其语篇分析后可以得出较为系统的文本数据,整理归纳后有望得出一套语言景观的特征,但治理本身需要具体的规范,而规范需要公共层面、政策层面、学术层面的三方合力建构,后期的相关研究应该侧重于归类治理的规范,以期能做到批量的语言景观数字化治理。

参考文献:

- [1]王振华, 语篇研究新视野——《语篇研究——跨越小句的意义》述介[J].外语教学与研究,2007,(5): 396-399
- [2]杨信彰.话语与语篇的研究: 理论和方法[J].中国外语,2013,第 10 卷(4): 1, 18-19
- [3]张德禄, 胡瑞云.多模态话语建构中的系统、选择与供用特征[J].当代修辞学,2019,(5): 68-79
- [4]余华, 杨宇湘.社区咖啡馆语言景观的时空体分析: 本土全球化的日常实践[J].语言政策与规划研究,2023,(2): 96-108, 185, 186
- [5]尚国文著.语言景观研究的理论与实践[M].北京: 商务印书馆,2023
- [6]杨炳钧.系统功能语言学研究的国际前沿趋势[J].现代外语,2024, (6)
- [1]Halliday, M. A. K., & Hasan, R. (1976). *Cohesion in English*. London: Longman.
- [2]Matthiessen, C. M. I. M., & Nesbitt, C. (1996). On the idea of theory-neutral descriptions. In S. Caffarel, J. R. Martin, & C. M. I. M. Matthiessen (Eds.), *Language typology: A functional perspective* (pp. 39-85). John Benjamins.
- [3]Kress, G., van Leeuwen, T. (1996). *Reading images: The grammar of visual design*. Routledge.
- [4]Landry, R., Bourhis, R. Y. (1997). Linguistic landscape and ethnolinguistic vitality: An empirical study. *Journal of Language and Social Psychology*, 16(1), 23-49.
- [5]Pietikinen, S. (2014). *Multilingualism and the peripher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A Discourse Analysis Perspective on the Governance of Linguistic Landscapes

Wu ZhongQi¹, Chen WeiMiao¹

¹ GuangDongBaiYun University, Guangzhou, China

Abstract: Traditional governance of linguistic landscapes has long relied on manual error correction, which suffers from persistent issues such as non-standardized production, delayed error rectification, and fragmented revision practices in both generation and governance processes. Halliday (1985: 10) defines a text as "any instance of language that is operational in a context of situation," encompassing oral, written, and other semiotic modalities. This theoretical foundation enables us to reconceptualize linguistic landscapes as cohesive discourses. By textualizing linguistic landscapes, we can systematically organize and refine multimodal data, thereby offering novel pathways for both research and governance of language practices in the AI era.

Keywords: discourse analysis; linguistic landscapes; language governance

从海洋到城市：广州海洋文化与城市文化的

共生逻辑与战略选择

郭彦汝¹

(1.广州航海学院 航运学院, 广东 广州 510725)

摘要: 本文以广州为研究对象, 批判性地审视了海洋文化与城市文化二元对立的研究范式, 构建了一个整合批判理论与共生视角的权力-空间-话语分析框架, 旨在揭示二者共生的内在逻辑及其复杂性, 并探寻其优化路径。研究发现两者在广州历史中长期共生演进, 但当前经济融合、社会互动、空间衔接与生态关联中存在开发与保护、传统与现代等多重矛盾。为解析其内在逻辑, 研究构建了“权力-空间-话语”分析框架, 指出了多元权力博弈、空间生产机制及话语竞争对共生形态的关键影响。基于此分析, 研究提出构建深度融合、包容韧性的全球海洋中心城市战略目标, 并从优化权力、重塑空间、引导话语三方面给出路径建议与保障措施。研究通过运用整合性分析框架, 丰富了文化共生理论在城市研究领域的应用, 为广州及其他海洋城市的文化发展与战略选择提供了理论参考与实践借鉴。

关键词: 海洋文化; 城市文化; 共生逻辑; 权力-空间-话语; 全球海洋中心城市; 广州

DOI: doi.org/10.70693/rwsk.v1i5.996

一、引言

进入“海洋世纪”, 海洋的战略意义已远超传统的资源库角色, 成为牵动全球经济、政治乃至文化交流的枢纽地带^[1-2]。作为人类文明多样性的重要组成元素, 海洋文化的理论意义不仅体现在文化层面, 更对现代海洋治理体系的完善与可持续发展路径的探索具有实际指导作用。2012年我国明确提出建设海洋强国的战略规划后, 通过共建“海上丝绸之路”、参与全球海洋治理改革等行动, 持续推动国际海洋秩序向更加公平合理的方向演进^[3-4]。

地处改革开放前沿、身为粤港澳大湾区核心引擎, 广州不仅是国家中心城市, 更在全球海洋城市体系中占据举足轻重的地位, 独特的区位与海洋历史传统更巩固了该市在国际海洋城市竞合中的战略支点作用。但在快速城市化与海洋产业扩张背景下, 广州海洋城市建设也面临三重结构性矛盾: 其一, 海洋生态保护要求与资源开发诉求之间形成持续张力; 其二, 传统海洋文化遗产保护与创新转化的价值博弈; 其三, 在制度性协同海洋产业升级与城市整体规划方面仍具提升空间^[5-7]。对广州海洋文化与城市文化互动机制的系统解析, 能够填补现有理论研究的局部空白, 更对解决当前发展困境找到新的钥匙。

海洋文化研究领域, 国外学者起步较早, Braudel 以“长时段”理论揭示海洋环境对文明的塑造力; Lefebvre 与 Harvey 等则聚焦城市空间生产与文化符号。国内学者亦在海洋经济、文化认同、区域规划等方面取得进展。^[8-13] 回顾相关研究可以发现, 以往的探讨往往将海洋文化与城市文化分离开来^[14-15], 较少采用整合性的共生视角来审视二者的互动关系, 理论层面的协同不足。基于对该局限性的认识, 本研究尝试另辟蹊径, 从批判理论视角出发结合共生理论进行洞察, 提出“权力-空间-话语”分析框架。笔者计划运用这一框架, 对广州的具体实践进行深入解读, 揭示其共生逻辑、权力运作和社会建构机制, 从而在研究视角、理论及方法论上提供新的思考。

二、理论框架：超越二元对立的共生逻辑

2.1 批判理论视角下的文化观

传统研究常视文化为一种静态同质的独立实体, 看重其传承与稳定, 容易忽视动态演变的过程并遮蔽其内在异质性^[16]。本文理论建构中关注两个关键点。其一, 法兰克福学派的代表人物 Theodor W. Adorno 和 Max Horkheimer 在《启蒙辩证法》中指出, 现代文化工业借由标准化生产, 隐性地控制大众意识, 使文化产品变成维护现存秩序的工具^[17], 这揭示不同文化形态往往映射出不同的权力关系、利益诉求及意识形态色彩, 故审视权力具体运作不可忽视。其二, 吸纳文化研究学派关于文化建构性的观点。Stuart 的编码/解码理论认为, 文化意义并

作者简介: 郭彦汝 (2004-) 本科生, 研究方向为海事管理和绿色航运。

非固定，它在生产、传播与消费中被持续建构和协商^[18]，这一视角为分析不同群体如何差异化解读海洋文化符号提供了方法论支持。

2.2 共生理论的引入与拓展

共生 (Symbiosis) 概念源于生物学，指不同生物体间的长期密切互动，已广泛应用于社会文化领域，以阐释现象间的相依与互动^[19-20]。本研究将此概念拓展，定义“文化共生体”为两种以上文化要素在特定时空下相互依存、作用、建构形成的有机整体。广州的海洋文化与城市文化在碰撞与滋养中塑造出独特的城市气质与文化景观，使其呈现为动态的文化共生体。文化共生强调不同文化间的互动、调适与共同演进，视冲突与张力为催生新文化意义的契机，从而为理解多元文化社会的复杂平衡提供独特视角。

2.3 权力、空间与话语：整合性分析框架

以系统地剖析广州海洋文化与城市文化共生的内在逻辑及其社会建构过程为导向，研究由前述批判理论与共生理论进一步拓展，构建了一个整合性的“权力-空间-话语”三维分析框架。

借鉴批判理论对权力弥散性与生产性的解读，权力在此超越传统政府制度性权力，涵盖资本的市场权力、社会组织文化实践权力乃至市民日常生活的微观权力，构成理解文化共生形态、驱动力、利益格局及潜在社会不公的关键切入点。这种多维权力并非抽象存在，而是深刻嵌入并生产着空间；遵循 Lefebvre 的空间生产理论，空间被视为社会力量塑造的、承载权力运作与资本积累的建构场域，而非中立的物理容器。广州独特的海洋与城市共生空间结构，其生产逻辑、形态与实践，正是权力关系如何塑造物质环境并进而影响资源分配和社会交往模式的核心体现。在此基础上，话语依循 Foucault 的观点被视为权力的实践^[21]：它通过定义现实、建构知识、规范行为，为特定的权力关系和空间秩序赋予“自然性”或“必要性”。围绕广州海洋与城市文化的官方、媒体、学术、商业及民间等多元话语，共同构成复杂的“话语场域”，持续塑造并影响着公众对二者关系的认知图式。

借助该三维度整合分析，有望更深入地辨识广州文化共生的内在矛盾与创新可能，为建设兼顾文化传承与创新发展的全球海洋中心城市提供治理参考，并推动理论认知向实践指导转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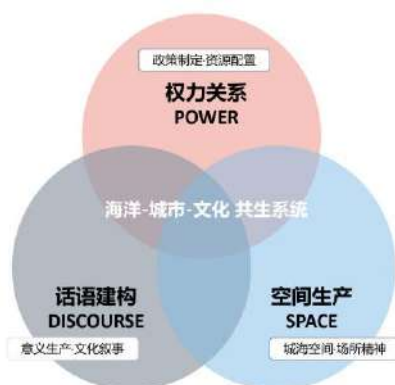


图1 权力-空间-话语分析框架耦合图

三、广州海洋文化与城市文化的共生关系：历史与现实

3.1 历史维度：海洋文化与广州城市发展的共生演进

秦汉时期，广州（番禺）凭借南海之滨的地理优势成为重要港口与南方重镇^[22]，至汉代已是“海上丝绸之路”的始发港。隋唐宋三代，海洋贸易持续繁荣，隋设南海神庙，唐立市舶司，形成“蕃坊”^[23]，见证了跨文化交流与区隔管理并存的格局，阿拉伯、波斯文化亦随之融入。宋代造船技术进步（如“南海一号”）与海洋贸易制度完善，

标志其海洋文化的成熟。明清延续海贸，乾隆朝“一口通商”政策使广州成为全国唯一对外贸易口岸，十三行在此背景下兴盛^[24]，琶洲塔、莲花塔等兼具航标与文化象征功能。此阶段，海洋文化赋予城市开放务实的经济形态与文化特质。权力结构表现为中央集权主导，地方执行管理；空间格局以港口为核心延展，海洋相关建筑成为地标，“蕃坊”则体现了交融与区隔；话语层面，官方叙事（“天子南库”）与民间传说共同构建了认知体系（图2、图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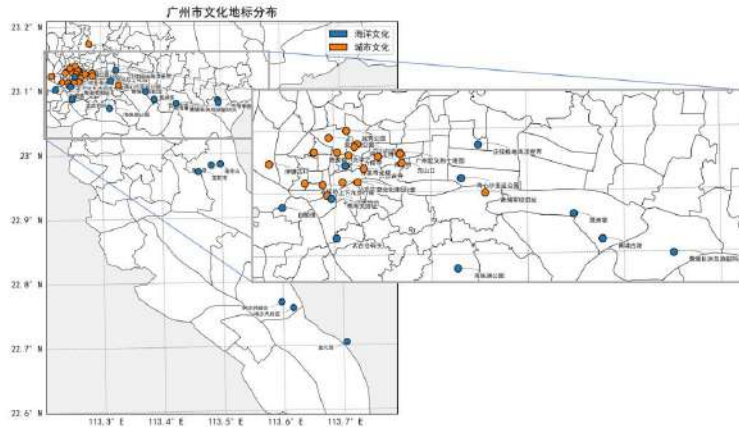


图2 广州市部分海洋文化与城市文化地标分布示意图 (作者基于历史文献与现状调研绘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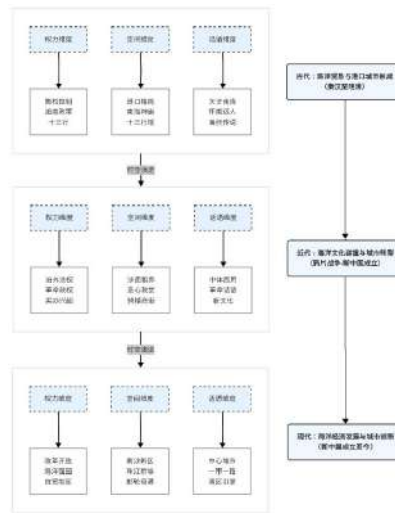


图3 广州海洋文化与城市文化共生关系的历史演进及其权力-空间-话语维度

鸦片战争后,西方列强入侵导致广州经济、主权与文化遭受剧烈冲击。沙面租界^[25]的建立是殖民权力与文化差异的空间烙印。外部冲击亦激发内部变革,孙中山在此领导革命,海洋文化中的开放进取精神与救亡图存主题结合,催生了独特的革命文化。此期权力格局复杂,西方势力、清政府、地方与买办、革命力量激烈博弈;城市空间因西式建筑与市政引入而呈现新旧冲突、中西杂糅的景观,粤海关大楼等成为时代标记,映射权力重构与文化博弈。

新中国成立后,尤其改革开放以来,广州依托沿海开放优势,经济由外向型逐步升级为现代海洋经济,促进了城市文化的开放、多元与包容^[26]。2021年,广州提出建设“全球海洋中心城市”战略,南沙新区开发成为关键,承载国家级新区、自贸区等多重功能,旨在拓展海洋发展空间,培育新兴海洋产业,并服务于国家“海洋强国”战略。

3.2 现实维度:共生关系的多元呈现与内在张力

纵览广州的发展格局,港口物流、海洋交通、滨海旅游及海洋装备制造、生物医药等新兴产业对广州经济贡献显著,广州港已成为国际主枢纽港(至2025年与世界百余国家400多港口通航),南沙自贸区亦注入发展动力。然传统临港工业转型、新兴产业可持续性 & 港城用地矛盾等挑战犹存。在社会层面,广州作为移民城市,大量海洋相关从业者带来了文化多样性,亦伴随社会融入挑战。以疍民为代表的传统海洋社群,其文化传承在城市化进程中面临空间挤压与生活方式转变的严峻考验,文化基因保护成为重要议题。从黄埔旧港到南沙滨海公园,海洋元素与城市结构交织。南沙新区拓展了发展空间,游艇、邮轮等提供了融合新平台。但部分沿海开发过度强调经济功能,忽视公共与文化价值,引发对滨海空间私有化和过度商业化的忧虑。城市生态与珠江口、南海近岸海洋生态系统休戚相关。陆源污染、港口航运及围填海工程持续威胁近岸海域生态。虽有“湾长制”等治理措施,但区域协调难、陆源污染控制复杂及发展与保护目标冲突等深层障碍仍待克服。

四、共生逻辑下的权力、空间与话语分析

4.1 权力关系的博弈与共生关系的塑造

政府作为核心规划者,通过“全球海洋中心城市”战略下的政策制定、资源调配及议程设置^[27],强力主导共生关系走向,彰显其将海洋发展置于城市战略核心的决心。然而,这种自上而下的主导逻辑面临挑战:宏观政策与市场动态、社会需求的潜在错位可能引发资源配置与效率问题;政府内部不同部门间的职能分割与利益权衡亦可能削弱政策合力,限制其他主体参与空间。

商界作为活跃市场的主体,直接参与并促进海洋活动与文化融合。以广州港集团为例,其庞大的外贸航线网络不仅巩固了广州的国际物流枢纽地位,赋予港区与腹地显著议价能力,更通过对港口、地产、旅游项目的投资开发与运营创新,推动了航运业发展及邮轮、滨海休闲等特色海洋文化的传播。然而,市场固有的逐利性亦构成潜在风险,在缺乏有效制度约束与社会监督时,可能导致粗放发展及对项目社会经济效益的选择性开发^[29]。

市民作为文化共生的创造者、消费者与传承者,其对海洋的认知、态度与行为直接影响共生关系的质量。尽管广州市民因地理因素对海洋怀有天然亲近感,海洋文化已渗透日常生活,但城市化与现代生活方式正冲击传统海洋习俗与价值观。同时,市民在城市发展与海洋治理决策中的话语权与实际影响力不足,参与渠道受限,其权利保障、文化自觉与参与热情的激发,是海洋文化名城建设的关键议题。此外,行业协会、研究机构、非政府组织(NGO)等社会组织在监督与建言方面的作用日益显现,但在促进文化传承、推动政企履责方面的自主性、资源与影响力仍有待提升。

综上,广州当前的海洋-城市文化共生图景,是在特定制度框架下,政府、企业、市民及社会组织等多方力量基于各自利益、观念与资源,在持续互动、角力与妥协中共同形塑的。这种多元行动策略与权力博弈造就了复杂且充满张力的共生格局。欲达致更健康的共生未来,关键在于对现有权力关系进行深刻反思与结构性重构,迈向更平等透明、鼓励协商对话的治理模式。

4.2 空间生产的逻辑与共生关系的空间表达

空间并非仅为物质容器,依循列斐伏尔(Lefebvre)理论,空间本质上是社会关系的产物,亦是权力与意识形态运作的关键场域。广州海洋与城市空间的独特结构与形态,既是共生关系及其矛盾的物质载体,也反作用于二者互动、社会分层及文化认同。

古代广州,城市围绕港口兴建,国家主导的海洋贸易繁荣推动了城市扩张与功能分化(如商馆区、蕃坊),此空间生产逻辑凸显了海洋贸易的主导地位及中央王朝通过控制关键节点与渠道以规制贸易及财富的意图。而当代广州,尤其是南沙新区的规划建设,代表了国家战略与全球资本共同驱动的空间生产逻辑。南沙的多重定位及其对“现代”“高效”“生态”“海洋”元素的强调,指向快速构建面向未来的现代化滨海新城。此逻辑反映了广州在全球化与海洋强国战略下拓展海洋发展空间、培育高附加值海洋新兴产业的意图,并彰显了国家与地方政府在空间生产中的主导作用及资本的深度介入。这种服务于国家战略的空间重构,在提升区域竞争力与城市形象方面取得成效,可视作一种空间治理创新。然而,南沙模式内含系统性挑战:大规模围填海对河口生态系统服务功能造成压力;过度强调功能分区与高端产业,可能牺牲滨海空间的公共性与人文底蕴,潜藏功能单一化与“千城一面”风险;高速建设模式亦可能冲击本土文化传承与社区认同。因此,未来空间实践需超越对速度与规模的单一追求,转向将生态韧性、文化赓续与社会公平置于核心的可持续发展路径,以促进海洋与城市空间的和谐共生。

4.3 话语建构的力量与共生关系的意义生产

福柯(Foucault)的理论揭示,话语不仅是表征工具,更是权力实践^[30],通过定义现实、塑造认知、规训行为,进而影响权力结构与空间秩序。围绕广州海洋文化与城市文化形成的各类话语构成竞争性“场域”,共同型塑公众认知情感及共生关系的意义与价值。

官方话语通过规划蓝图、政策发布、政府报告及主流媒体宣传(如强调“海洋强市”、“全球海洋中心城市”战略,《广州市建设海洋创新发展之都规划》中“文化亲海”定位),主导着方向塑造与公众认知。其核心策略在于将筛选并特定阐释的海洋文化元素与积极城市形象捆绑,服务于提升城市能级、吸引发展要素、强化全球海洋城市网络地位。但此类宏大叙事倾向于统一和正面化,可能简化历史复杂性或回避现实矛盾(如环境污染、文化冲突)。其效力深层取决于能否回应市民日常生活体验与文化认同。

主流媒体(如《南方日报》《广州日报》)通常与官方话语保持一致,系统性呈现广州海洋历史成就、经济活力与文化特色,聚焦南沙港建设、海洋科技等积极主题,强化“海洋经济引领者”形象。然而,商业媒体与网络自媒体可提供更多元甚至冲突的观点(如滨海旅游消费、环境问题、开发项目社会影响)。所有媒体实体均受议程设置、商业利益或信源依赖等因素制约,可能导致报道偏差或简化。提升公众媒介素养与推动媒体生态多元化是关键。

学术界运用多学科方法(历史学、地理学、经济学等)对广州海洋与城市文化进行考察,如通过历史考古学重构“海上丝绸之路枢纽”叙事^[31-36],并关注海洋保护、渔业社区变迁、文化创意产业等现实挑战。知识从研究向公众传播存在障碍:转化渠道不足、项目资助的潜在影响、跨学科对话不足。未来需深化跨学科合作,拓展社会议题关怀,并探索有效知识转化与公共传播途径,以提升民众海洋文化素养与批判性思维。

市民通过口述故事、地方习俗、在线讨论与社交媒体分享等渠道,表达对海洋与城市的个人看法、生活经验与城市记忆。此类话语常呈现分散、多元、具体特征,真实反映市民生活经历、情感联系与文化认同,是对官方和媒体话语的重要补充,甚至形成修正或挑战。关注与理解基层声音对制定贴近民生、更具包容性的文化政策至关重要。

综上,广州海洋与城市文化共生关系的复杂现状,是多元话语持续互动、竞争、协商乃至相互建构的动态产物。不同主体基于各自立场、认知与利益诉求所发出的声音,共同交织成丰富且具张力的话语生态系统。在全球化、信息化背景下,广州迈向全球海洋中心城市的目标,应着力培育更加多元、开放、包容的话语环境,鼓励理性对话与相互理解,使沟通成为凝聚共识、化解分歧、共同塑造城市未来的有效途径。

五、广州海洋文化与城市文化共生的战略选择

5.1 战略目标: 构建海洋文化与城市文化深度融合、包容韧性的全球海洋中心城市

依据《广州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广州致力于构建全球海洋中心城市及海洋科技创新核心区。此定位要求广州兼具国际水准的经济、科技、基建等“硬实力”与引领性的海洋文化、治理、合作等“软实力”。功能层面,广州应成为多重中心:全球海洋经济枢纽(贸易、航运、金融)、全球海洋科技创新中心、全球海洋文化交流中心^[37],并探索成为全球海洋治理示范中心,贡献“广州方案”。

战略目标应超越规模速度,侧重质量与内涵,故提出“构建海洋文化与城市文化深度融合、包容韧性的全球海洋中心城市”的战略定位。此定位植根历史现实,面向未来。“深度融合”指价值观念、产业发展、空间布局、社会生活、生态环境等层面的有机结合、互促共进;“包容韧性”则强调尊重文化多样性、维护社会公平,并提升城市适应与恢复能力。其核心特质在于:将重塑的海洋文化精神(开放、包容、创新、进取)融入城市精神;实现海陆经济深度整合与绿色转型,培育可持续的现代海洋产业体系;优化城海空间功能与生态联系,保护活化海洋文化遗存,建设高品质共享公共空间;将海洋文化元素融入日常生活,提升市民海洋意识、环境素养与文化参与,营造亲海爱海护海社会风尚。

5.2 战略路径: 优化权力关系、重塑空间生产、引导话语建构

(1) 优化权力关系,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海洋治理新格局:针对权力主体失衡与治理模式局限,需从单一中心、自上而下转向权责利明晰、注重协商对话的共治共享格局。政府核心作用在于把握战略方向与设定规则底线(如生态红线),营造公平透明制度环境,从“全能管制”向“服务监管”转变,促进市场与社会力量协同。建立高效跨部门、跨区域协调机制。规范企业市场行为,强化其环境与社会责任监管,追求经济、社会、环境效益统一。实质性提升市民在涉海事务中的有效参与和话语权,拓宽制度化参与渠道,增强文化认同与主人翁精神。积极扶持专业性社会组织,形成政、企、民、社多元主体良性互动治理局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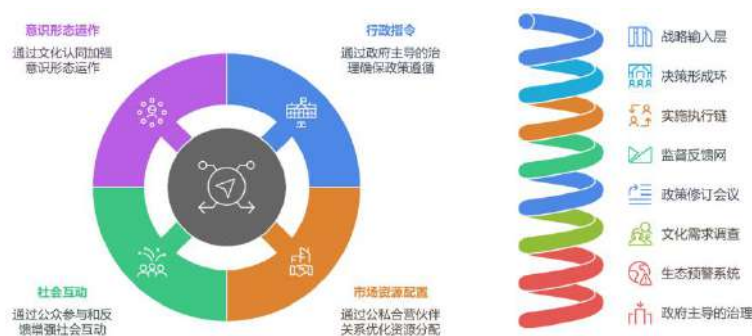


图4 广州海洋文化政策路径示意图

(2) 重塑空间生产,营造生态人文、城海交融的可持续空间:为回应空间生产中生态破坏、功能单一、文化割裂等弊端,秉持生态优先、以人为本、尊重历史、和谐包容理念,推动城海空间有机融合与永续发展。坚持陆海统筹,将海岸带及近海纳入城乡统一规划,严守生态红线,优化空间布局,促进港、产、居、生态功能协调与陆海联动。严控滨海开发强度与围填海,优先保护修复自然岸线及生态系统,打造高品质公共性滨海开放空间。空间设计融入地方海洋文化,保护活化海洋文化遗产,塑造富场所精神与地方特色的城市景观。结合“灰”“绿”基础设施,提升海岸带生态韧性与防灾力。运用数字技术赋能智慧海洋建设,强化环境监测、资源管理与风险预警,提升空间管理精细化、科学化水平。

(3) 引导话语建构,促进多元认知与国际文化交流:面对民间声音易被边缘化、国际传播力待提升现状,广州需采取更开放、包容的话语策略,深化海洋文化认知,增进社会共识,扩大国际影响力。应夯实海洋文化学

术研究,鼓励跨学科、面向实践研究并促进成果转化,打造国际学术品牌。推动媒体报道客观、深入、多元,鼓励对敏感议题理性讨论。创新传播策略,平衡官方叙事与民间故事,提升城市海洋文化吸引力。积极参与和组织高水平国际海洋文化交流,在合作互鉴中提升全球话语地位。借助各级公共机构普及海洋文化教育,培育公民素养。培养具国际视野、跨文化沟通及批判思维的专业人才队伍。

5.3 战略保障: 制度创新、政策支持、社会参与

(1) 制度层面: 深化改革创新,破除体制壁垒: 核心目标是健全促进良性共生的长效机制。探索权责对等、运转顺畅的陆海统筹规划管理及生态补偿模式,突破陆海与部门分割。修订并严施海洋文化资源保护利用法规,压实主体责任,畅通公众监督,提升保护利用实效。构建鼓励海洋文化特色创新产业发展的支撑体系,为企业创新松绑助力,开拓常态化、能影响决策的公众参与新路径。

(2) 政策层面: 精准有效赋能,确保措施落地: 制定推行目标明确、成效显著的政策举措。设海洋文化发展专项基金,明确投向与绩效评估,重点扶持基础研究、多元传播、社区实践、可持续产业等。优化面向海洋文化企业和社会组织的税收减免、财政补贴、融资支持组合拳。健全覆盖研究、创作、保护、传播等环节的人才引进、培养、激励全链条机制,给予政策倾斜^[38]。

(3) 社会层面: 广泛动员参与,构筑共建共享格局: 核心是塑造“人人关心、人人参与”的海洋文明建设良好生态。具体行动: 创新文化传播触达方式(如海洋科普课堂、生态体验营),使海洋意识培育融入日常生活,提升公众保护自觉;壮大海洋文化传承力量,鼓励组建多元背景志愿团体,开展遗址守护、生态修复等活动,促进“市民-高校-科研机构”联动;建设跨界融合有效载体,利用南沙邮轮母港等地标举办创意活动,设专业论坛深化产学研合作,通过数字博物馆等促资源共享,编织多方联动文化创新网络。

六、结论

本研究以广州为样本,运用整合批判理论与共生视角的“权力-空间-话语”分析框架,系统揭示了其城市发展史中海洋文化与城市文化深度交织、相互塑造的动态过程。从古代“海上丝绸之路”节点至近现代转型,海洋元素深刻影响了广州的城市空间、经济模式与社会构成,孕育了开放、包容、务实、创新的城市精神特质,此构成其独特文化基因与发展动力。当前,二者共生关系呈现高度复杂且充满内在张力的图景,既是魅力与优势之源,亦构成其应对发展与保护、效率与公平、可持续性等多重困境的严峻考验。

面对此现实挑战,广州未来战略应锚定于构建海洋文化与城市文化深度融合、展现高度包容性与发展韧性的全球海洋中心城市。迈向此愿景,需实施系统性变革,协同作用于权力运作、空间实践和话语环境: 权力层面,核心是推动治理模式向平等透明、协商对话的共建共治共享结构转型,以制度创新保障多元主体有效参与,激发市场与社会活力及责任担当;空间层面,须以生态优先、人文关怀为根本原则,推行陆海统筹规划,精心保护并活化海洋文化遗产及场所,营造高品质生态人文共享滨海空间,并运用数字技术提升治理的精明化与可持续性;话语层面,应着力培育开放多元、鼓励理性对话的公共领域,支持批判性、跨学科研究与创新性文化传播,拓展国际文化交流,培养具反思与跨文化沟通能力的专业人才。这些战略路径的有效推进,最终离不开强有力的制度创新、精准的政策扶持以及广泛深入的社会参与,三者协同方能确保变革行稳致远。

本研究的理论贡献,在于尝试引入此整合性“权力-空间-话语”分析框架,为理解城市场域中文化共生现象背后复杂的社会建构过程,提供了有别于传统二元论或单一融合论的新解释视角。展望未来,广州若要实现全球城市网络中的战略抱负,应持续深化全社会海洋意识教育,积极拓展多层次国际海洋合作,以负责任态度拥抱并引领海洋科技进步,将海洋生态环境保护置于优先战略地位,并始终以开放包容、勇于创新的文化姿态传承其海洋文化底蕴,努力建设成为具独特魅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的全球海洋中心城市,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进程中谱写新的辉煌篇章^[39]。

参考文献:

- [1] 徐萍. 新时代中国海洋维权理念与实践[J]. 国际问题研究, 2020 (6): 23.
- [2] 王莹, 王方方, 宋丹凤. “海洋强国”战略下港口新兴产业发展的财务风险管理及预警研究[J]. 中国市场, 2022, (20): 146-148.
- [3] 陈伟光, 孙慧卿. 全球海洋治理的国家参与: 一个比较分析框架[J]. 广东社会科学, 2024 (4): 37-47.
- [4] Sheng E L. China at the Geopolitical Crossroads: The Construction of Sea Power[M]//From Colonial Seaports to Modern Coastal Cities: The Bohai Economic Rim and China's Rise as a Maritime Power. Singapore: Springer Nature Singapore, 2024: 29-58.
- [5] 陈彦鸿, 潘蕾, 何婷婷, 等. 海洋生态环境公益诉讼的南沙模式[J]. 环境, 2019, 11: 56-57.
- [6] Guilan L, Weiwei D. Synergetic management strategy for maritime cultural heritage protection and marine development in China[J]. Marine Policy, 2021, 125: 104383.
- [7] 廖健聪. 广州市海洋经济发展质量评价指标体系构建及实证分析[J]. 商业经济, 2020 (05): 35-37+90.
- [8] 韩兴勇, 杜贤琛. 浅议海洋文化与海洋经济协同发展[J]. 中国农学通报, 2014, 30(29): 75-80.
- [9] 尤晓敏, 瞿群臻. 海洋强国背景下的海洋文化认同研究[J]. 安徽农业科学, 2013, 41(21): 9176-9178.
- [10] Lefebvre H. From the production of space[M]//Theatre and performance design. Routledge, 2012: 81-84.
- [11] 大卫·哈维. 社会正义与城市[M]. 香港: 商务印书馆, 2022: 1-403.
- [12] 刘泓, 叶凤琴. 对城市文化及其产业的一种思考[J]. 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1, (05): 155-159.

- [13] Liu T K, Tuminez A S. The Social Dimension of Urban Planning in Singapore[M]//50 Years of Social Issues in Singapore. 2015: 97-115.
- [14] Amendolagine V, von Jacobi N. Symbiotic relationships among formal and informal institutions: Comparing five Brazilian cultural ecosystems[J]. *Economic Systems*, 2023, 47(3): 101092.
- [15] 黄小芮, 孟鸣. 海洋文化地域特色在滨海城市风貌建设中的应用——以青岛滨海广场为例[J]. *设计*, 2020, 33(02): 143-145.
- [16] Tylor E B. Primitive culture: researches into the development of mythology, philosophy, religion, art, and custom[M]. J. Murray, 1871.
- [17] Horkheimer M. Dialektik der Aufklärung: Philosophische Fragmente[J]. 1981.
- [18] Hall S. Encoding and decoding in the television discourse[M]//CCCS selected working papers. Routledge, 2007: 402-414.
- [19] 石献记, 朱德全. 民族地区职业教育服务乡村振兴的文化共生场域[J]. *教育研究与实验*, 2021 (3): 43-52.
- [20] 江凌, 强陆婷. 上海实体书店文化空间与城市文化的共生发展[J]. *出版发行研究*, 2021, 3: 69-76.
- [21] Foucault M. Archaeology of knowledge[M]. routledge, 2013.
- [22] 广州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广州市志 (第一卷) [M]. 广州: 广州出版社, 1999: 35.
- [23] 王宏斌. 从蕃坊到租界: 试探中国近代外侨政策之历史渊源[J]. *史学月刊*, 2017(05): 75-84.
- [24] 汤开建, 田一言. 西班牙文手稿阿戈特《广州商馆日记》所反映的清代中期中西贸易和广州十三行史料[J]. *清史研究*, 2024(03): 1-21.
- [25] 李倩菁, 蔡晓梅. 广州沙面空间的生产与重构[J]. *热带地理*, 2015, 35(06): 814-821.
- [26] 张敏敏. 海丝文化传承与创新研究[J]. *中国港口*, 2021(08): 55-57.
- [27] 广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广州市海洋经济发展“十四五”规划[R].
- [28] 蔡敏婕. 广州港集团已开辟 173 条外贸航线 [EB/OL]. 中国新闻网, 2025-02-08[2025-02-28]. <https://finance.sina.com.cn/roll/2025-02-08/doc-ineiumza6417875.shtml>
- [29] Bo Y A N, Jun D U, Ruimin F. Mechanism and path of deepening the marine economic cooperation between guangdong and asean in the context of the 21st century maritime silk road construction[J]. *Asian Agricultural Research*, 2017, 9(5): 10-20.
- [30] 韩清怡. 福柯话语权力视域下主流媒体话语体系的建构研究——以央视新闻为例[J]. *科技传播*, 2021(1):62-64.
- [31] 梁凤莲. 历史·现实·理论: 广州城市历史文化的呈现及其展望[J]. *粤海风*, 2023, (04): 100-105+114.
- [32] 齐含伟, 贾梦蛟. 广州国土空间规划体系下大城市文化设施专项规划方法研究[J]. *北京规划建设*, 2022, (04): 121-123.
- [33] 赵谢璧圆. 海洋文化遗产视角下广州珠江口三塔历史环境保护与再生策略研究[D]. 华南理工大学, 2023.
- [34] 钟悠云, 黄小彪. 广州市实施海洋文化战略, 打造世界文化名城[J]. *珠江水运*, 2012, (05): 30-31.
- [35] 杨素梅. 广州发展海洋文化产业的思考[J]. *当代经济*, 2012, (05): 80-81.
- [36] 柳姣羽. 分析广州海上丝绸之路的海洋文化遗产保护——以广州对外贸易机构为例[J]. *旅游纵览(下半月)*, 2015, (20): 154.
- [37] Zeng S. The Marine Property Rights Operating Platform Built on the Transformation of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Achievements Is Constructed under the New Economic Normal of Coastal Areas: An Example of Guangzhou City[J]. *Journal of Coastal Research*, 2020, 112(SI): 216-219.
- [38] 唐刚. 习近平总书记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重要论述的主要内容及实现[J]. *北京科技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22, 38(3): 256-263.
- [39] 习近平.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M]. 北京: 外文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 2020.

From ocean to city: the symbiotic logic and strategic pathways of maritime and urban cultures in Guangzhou

GUO Yanru¹

¹ School of Shipping and Maritime Studies, Guangzhou Maritime University, Guangzhou, China

Abstract: This Guangzhou-focused study critiques marine/urban culture dualism, proposing a 'Power-Space-Discourse' framework. Integrating critical theory and symbiosis, it reveals their symbiotic logic and complexity, seeking optimization. Findings show historical symbiosis but current multifaceted contradictions in Guangzhou's socio-economic, spatial, and ecological spheres. Analysis highlights how power dynamics, spatial production, and discourse shape this symbiosis. The study proposes strategies—optimizing power, reshaping space, guiding discourse—towards an integrated, inclusive, resilient global maritime city. It advances cultural symbiosis theory in urban studies, offering insights for Guangzhou and other maritime cities.

Keywords: maritime culture; urban culture; symbiotic logic; power-space-discourse; global maritime center city; Guangzhou

核心素养视域下 BOPPPS 模式在中学英语教学中的应用

邢新荣¹

(1.合肥师范学院, 外国语学院, 安徽 合肥 230601)

摘 要: 随着教育改革的持续推进, 学生核心素养的培养成为中学英语教学的关键任务。BOPPPS 教学模式作为一种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方法, 在提升学生学习效果和培养核心素养方面具有其独特优势。本文将深入探讨 BOPPPS 教学模式在中学英语教学中的应用价值、面临的挑战, 并提出针对性的应用策略, 旨在为中学英语教学改革提供有益参考, 推动中学生英语核心素养的提高。

关键词: 核心素养; BOPPPS 教学模式; 中学英语教学; 应用策略

DOI: doi.org/10.70693/rwsk.v1i5.1000

在全球化背景下, 英语作为国际交流的重要工具, 其教学质量也备受关注。中学阶段是学生英语能力发展的关键时期, 培养学生的英语核心素养至关重要^[1]。英语核心素养主要包括四个方面, 即语言能力、文化意识、思维品质和学习能力。所以, 核心素养并非单纯的知识技能或兴趣、动机、态度, 而是个体在运用知识技能解决现实问题时, 所需要的思考力、判断力、表达力以及人格品质等。^[2]这要求学生不仅掌握英语知识和技能, 还能运用英语进行有效的沟通交流, 理解多元文化, 发展批判性思维和自主学习能力。但是传统的中学英语教学模式往往以教师讲授为主, 学生被动接受知识, 这种教学方式难以满足新课标对核心素养培养的要求。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缺乏主动性和参与度, 语言运用能力、文化理解能力和思维能力的发展就会受到限制。因此, 寻求一种创新的教学模式, 成为中学英语教学改革迫切需求。BOPPPS 教学模式是一种基于建构主义和交际教学法的教学模型, 它将教学过程划分为导入 (Bridge-in)、学习目标 (Objective)、前测 (Pre-assessment)、参与式学习 (Participatory Learning)、后测 (Post-assessment) 和总结 (Summary) 六个环节。该模式围绕教学目标达成展开这六个相互衔接的模块, 同时兼顾教师教学与学生学习特点, 以师生参与式互动学习为核心, 遵循以学生为中心原则, 通过多元教学活动激发学习兴趣、提升参与度、推动深度学习, 并为各学科教学提供新思路和新方法。^[3]在核心素养视域下, 探究 BOPPPS 教学模式在初中英语教学中的应用策略与研究其对推动英语教学创新发展、提升学生综合素养意义重大。

一、BOPPPS 教学模式应用于中学英语教学中的价值

BOPPPS 模型最初是为了提高教师的教学技能, 而提出的一种有效课程设计模式。^[4]1976 年, 温哥华大学 Douglas Kerr 团队创立了加拿大教师技能培训工作坊 Instructional skills workshop (Isw), BOPPPS 教学框架最初由该机构为教师资格认证而打造, 并在 David Kolb 提出的体验式学习模型基础上逐步发展成熟。该模式流程如图 1 所示: 这六个环节环环相扣, 充分发挥了其优势, 对教学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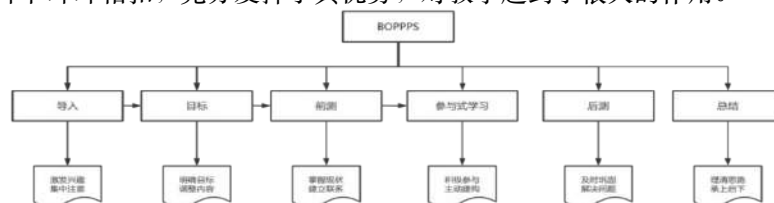


图 1.BOPPPS 教学模式框架图

(一) 激发学习兴趣, 提升语言能力

在 BOPPPS 教学模式的导入环节, 教师可通过创设情境、讲述有趣的小故事或展示多媒体视频、图片等方式,

作者简介: 邢新荣 (2001—), 女, 合肥师范学院硕士研究生。

吸引学生的注意力,激发他们对英语学习的兴趣。在参与式学习环节,可以通过小组讨论、角色扮演等英语游戏,让学生积极参与到课堂中来,有更多机会运用英语进行交流表达,并在实践中锻炼听、说、读、写技能,增加词汇量,提升语言运用的准确性和流利度,夯实英语语言基础。

(二) 增强文化理解, 培养文化意识

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可以结合学习内容,引入不同国家的文化背景知识,培养学生的文化意识。“文化意识”是指学生对英语国家的历史、地理、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知识有一定的了解^[5]。例如在进行英语阅读教学时,通过介绍文章中涉及的文化习俗、价值观等内容,让学生了解东西方文化差异。在参与式学习环节,教师组织学生开展文化主题的讨论或活动,鼓励学生分享自己对不同文化的看法和理解,增强学生的跨文化交流意识和能力,培养文化包容心态。

(三) 促进思维发展, 提升思维品质

BOPPPS 教学模式的各个环节都注重引导学生进行思考。在前测环节中,教师可以引导学生发现自己的知识漏洞,促使他们主动思考学习方向。再此基础上,教师组织学生进行小组合作、问题解决活动的参与式学习,要求学生分析问题、提出观点、进行推理和论证,锻炼逻辑思维能力。比如在讨论英语戏剧表演的活动中,学生需要分析剧情中的矛盾冲突,思考如何通过语言和动作更好展现角色,并进行推理和论证,这一过程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有效锻炼逻辑思维能力。后测和总结环节则引导学生反思学习过程,培养学生的批判性思维和元认知能力,让学生从被动学习转向主动自我提升的转变,真正达成自主学习能力的进阶。

(四) 强化学习能力, 发展学习策略

BOPPPS 教学模式的各个环节,都注重引导学生学会学习。前测环节让学生精准了解自身知识水平,从而明确后续学习方向;参与式学习中,学生在合作探究中掌握学习方法,例如如何收集资料、怎样分析问题等;在后测和总结环节,学生分析自己在英语学习中的失误,如阅读时找到关键信息,写作时优化结构,听力中捕捉重要信息等,促使学生全面反思学习过程,科学调整学习策略,逐渐养成自主学习的习惯,切实提升学生学习能力。

二、BOPPPS 教学模式在中学英语教学中应用面临的挑战

(一) 教师对新模式的适应困难

BOPPPS 教学模式对教师的教学设计能力、课堂把控能力与组织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部分教师受传统教学模式影响,短期内难以适应新的教学模式,对 BOPPPS 教学模式的六个阶段理解的不够深入,导致在设计教学环节时可能不够合理,使目标与教学活动相脱节,或前测、后测只浮于表面,无法充分发挥该模型的预期效果。例如,在参与式学习环节,因为缺乏教师的有效引导,会导致学生参与讨论时偏离主题,课堂秩序混乱,进而影响教学效果。

(二) 学生参与度不均衡

中学生个体之间存在显著的个体差异。一些性格开朗、英语基础好的同学在 BOPPPS 教学模式的课堂中能够积极参与各项活动。然而,一些性格内向或英语基础薄弱的学生,由于害怕犯错或缺乏自信,在小组活动中参与度较低,易成为活动的“旁观者”。此外,在小组活动中,可能会出现个别学生主导,其他学生参与度不足的情况,这会影响整体教学效果。这种参与度不均衡现象,不仅阻碍了一些学生的语言能力的提升,还会导致他们在长期边缘化过程中逐渐丧失英语学习兴趣与积极性。这破坏了小组协作的整体氛围与效果,影响教学目标的全面达成。

(三) 教学资源与时间限制

BOPPPS 教学模式由多个环节组成,这需要教师大量的课前准备和时间分配,使每个环节都需要合理分配时间。然而中学课时紧张,教师常遇到活动设计与教学进度之间的矛盾。在实际教学中,教师可能会因为某些环节时间消耗过多,导致后续环节无法顺利完成。例如,在参与式学习环节,学生讨论过于激烈,教师未能及时把控时间,导致后测和总结环节时间仓促,无法达到预期的教学目标。

三、核心素养视域下 BOPPPS 教学模式应用于中学英语教学中的策略

(一) 导入 (Bridge-in): 情境激趣, 集中注意

教师依据教材内容,借助多样化的手段创设与教学主题相关的情境。以人教版八年级上册 “Will people have

robots?”为例，在课前通过班级学习平台发布科幻电影中机器人的精彩片段，同时设置问题，如“What are the possible benefits and challenges of having robots in our daily lives?”。这种方法不仅能迅速吸引学生的注意力，激发他们对英语学习的兴趣，还可以促使学生主动用英语表达自己的观点，锻炼他们的语言能力，并促使学生在思考问题的过程中，接触到不同文化对未来科技的想象与态度，从而初步培养他们的文化意识。

（二）目标（Objective）：明确目标，调整内容

结合课程标准和学生的实际英语水平，制定全面且具体的教学目标，涵盖语言能力、文化意识、思维品质和学习能力四个维度。以七年级下册“What did you do last weekend?”为例，语言能力目标设定为学生能够熟练运用一般过去时准确、流畅地描述过去发生的事件；文化意识目标为引导学生了解中西方周末活动在文化内涵、休闲方式上的差异；思维品质目标为通过对周末活动的描述和讨论，来培养学生的逻辑思维，如引导学生按时间顺序有条理地叙述事件，同时培养学生的批判性思维，鼓励学生对不同的周末活动进行评价；学习能力目标则是帮助学生学会独立总结一般过去时的构成和用法规则，掌握有效的学习策略，提升自主学习能力。同时需要注意的是学生实际英语水平则决定了目标的难易程度与达成梯度。例如，对于英语基础较弱的学生群体，在语言能力目标的设定上，会更侧重于一般过去时的基础运用和简单事件描述；而对于基础较好的学生，则会提高要求，如运用丰富词汇和复杂句式进行描述。通过这样的差异化设定，确保教学目标既符合课程标准，又能满足不同层次学生的学习需求。

（三）预评估（Pre-assessment）：掌握现状，建立联系

采用线上问卷、小组讨论等多元方式进行预评估。在学习九年级“We're trying to save the earth!”之前，教师借助线上问卷收集学生对环保话题的了解程度、已掌握的相关英语词汇和表达，以及对常见环保问题的见解。同时，组织学生进行小组讨论，观察学生在讨论中的英语交流能力、思维活跃度以及合作学习能力。在小组讨论活动中，教师提前设定讨论规则和引导问题，如“What are the most effective ways to reduce pollution?”，以便有效观察学生表现。根据预评估的结果，教师能清晰地了解每个学生在语言能力、文化意识、思维品质和学习能力方面的优势与不足，为调整后续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的选择提供了强有力依据，确保教学活动能够精准满足学生核心素养发展的需求。例如，预评估发现多数学生对环保相关英语词汇掌握不足，在后续教学可以增加词汇拓展环节，并采用词汇游戏、语境运用等教学方法强化记忆；若发现学生在小组讨论中合作学习能力较弱，则可以在后续教学中设计更多小组合作活动，并给予合作技巧指导，提高学生合作学习能力。

（四）参与式学习（Participatory Learning）：积极参与，主动构建

开展小组讨论活动，以八年级下册“Have you read Treasure Island yet?”为例，教师提出“How does the author's cultural background influence the story's setting and characters?”等具有深度和启发性的问题，让学生分组讨论。在讨论过程中，学生需要运用英语表达自己的观点，倾听他人的想法，碰撞和交流他们的观点，并主动积极的构建内容，从而提高语言表达的准确性和流利度，锻炼语言能力。同时，通过分析文学作品中的文化元素，学生可以加深对不同文化背景的理解，增强文化意识。在探讨问题的过程中，学生需要运用逻辑思维进行推理和论证，培养批判性思维，并且学会在小组合作中相互学习、共同进步，从而提升合作学习能力。设情景模拟表演活动，如在学习七年级上册“This is my sister.”时，模拟家庭聚会的场景，让学生分别扮演家庭成员，用英语进行交流和介绍。在表演过程中，学生将所学的英语知识运用到实际情境中，提高语言的实际运用能力。同时，通过体验模拟的家庭场景，学生能够感受西方家庭文化中关于亲属关系的表达和互动方式，增强跨文化交际意识和能力。

（五）后评估（Post-assessment）：及时反馈助力素养进阶

在课堂活动进行过程中以及结束后，教师要及时对学生的表现进行评估。例如，在小组讨论和情景模拟表演结束后，教师会从语言表达的准确性、流利度，对文化内涵的理解，思维的逻辑性和创新性，以及团队协作能力等多个维度对学生进行量化打分与质性评价。通过及时的反馈，学生能够了解他们在学习过程中的优点和不足，明确努力的方向，从而有针对性地改进和提升自己的各项素养。教师还可以引导学生进行自我评价和同伴互评，使学生学会反思自己的学习过程，培养元认知能力，并进一步促进核心素养的发展。

（六）总结（Summary）：理清思路，承上启下

教师引导学生进行课后总结，借助线上学习平台，如班级群或学习管理系统，鼓励学生分享自己在本节课中的收获与困惑。教师将本节课的重点知识、关键的文化要点、思维方法以及学习策略进行梳理和总结，并分享给

学生。以七年级下册“Why do you like pandas?”为例,教师总结描述动物的相关词汇、句型,以及在描述过程中涉及的中西方动物文化差异,同时引导学生回顾在课堂学习中如何运用逻辑思维组织语言、如何与小组成员合作完成学习任务。通过总结,帮助学生将课堂所学的碎片化知识系统化,深化对文化的理解,强化思维方法和学习策略的运用,促进核心素养的内化。

(七) 学生巩固与教师反思

学生通过分层作业、自主学习和小组协作巩固知识提升素养。分层作业设置基础、进阶、拓展三类:基础作业要求整理八年级上册“I'm going to study computer science.”等单元核心词汇与语法;进阶作业布置职业规划短文写作;拓展作业安排跨文化职业调研任务。学生利用线上资源观看英语纪录片、阅读原著拓宽文化视野,强化语言能力。参与英语学习小组完成项目式任务,在实践中提升沟通协作能力等。教师可以从教学目标达成与策略实施两方面反思。对照后评估数据,分析学生在语言能力、文化意识、思维品质和学习能力四个维度的发展情况,检验批判性思维培养等教学目标的落实效果。复盘参与式学习活动设计、预评估应用等教学策略,审视小组讨论参与度、文化拓展深度等课堂环节存在的问题。针对反思结果,调整教学重难点与活动形式,优化后续教学设计,持续推动学生核心素养发展与教学质量提升。

综上所述,将 BOPPPS 教学模式应用于初中英语教学,在提升学生核心素养方面效果显著。通过巧妙设计的课堂导入,明确的教学目标设定,精确的课前测试,丰富的参与式学习活动,科学的课后测试和全面的教学总结,教师可以更高效地组织课堂,充分调动起初中学生学习英语的热情。同时,这种教学模式还有助于培养学生的实际语言运用能力,提高他们的听说读写综合素养。

在核心素养理念日益突出、教育技术不断发展和创新的背景下,BOPPPS 教学模式不仅可以在初中英语教学中持续发挥重要作用,而且有望在初中阶段的其他学科教学领域得到更为广泛的应用与推广。

参考文献:

- [1]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义务教育英语课程标准:2022年版[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22.
- [2] 钟启泉.基于核心素养的课程发展:挑战与课题[J].全球教育展望,2016,45(1):3-25.
- [3] 曹丹平,印兴耀.加拿大 BOPPPS 教学模式及其对高等教育改革的启示[J].实验室研究与探索,2016(2):196-200+249.
- [4] Pat Pattison. Russell Day Instructional skills workshop (Isw) handbook for participants [M]. Vancouver: The Instruction Skills Workshop International Advisory Committee,2006:3.
- [5] 吴倩.核心素养背景下提升高中英语阅读教学质量的研究[J].教育,2025,(07):57-59.

Application of the BOPPPS Model in Middle School English Teaching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re Competencies

Xing Xinrong¹

¹*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Hefei Normal University, Hefei 230601, Anhui, China*

Abstract: With the continuous advancement of educational reform, cultivating students' core competencies has become a key task in middle school English teaching. As a student-centered teaching method, the BOPPPS teaching model possesses unique advantages in enhancing students' learning outcomes and cultivating core competencies. This paper deeply explores the application value and challenges of the BOPPPS teaching model in middle school English teaching, and proposes targeted application strategies. The aim is to provide beneficial references for the reform of middle school English teaching and promote the improvement of middle school students' core English competencies.

Keywords: core competencies; BOPPPS teaching model; middle school English teaching; application strategies

颜色词在国际中文教学中的文化价值研究

洪杨¹

(1.西南科技大学, 四川 绵阳 621000)

摘要: 汉语颜色词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根基, 它源于对自然万物的观察和感悟, 伴随着漫长的文化发展而绵延不断, 最终形成了其独有的意象和哲学思想。颜色词作为语言和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承载着丰富的文化内涵和民族心理。在国际中文教学中, 颜色词教学不仅是语言教学的重要内容, 更是传播中华文化的重要途径。本文主要探讨颜色词在国际中文教学中的文化价值, 并从跨文化视角出发提出相应的教学策略, 以期提升国际中文教学质量和传播中华文化提供参考, 让中华文化在全球范围内更有效地传播。

关键词: 颜色词; 国际中文教学; 文化价值; 教学策略

基金项目: 西南科技大学 2024 年研究生创新基金青苗计划(24ycx1109)

DOI: doi.org/10.70693/rwsk.v1i5.998

引言

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发展, 国际中文教育的重要性日益凸显。作为中华文化的重要载体, 中文不仅是一种语言工具, 更是文化传播的桥梁。在这一背景下, 如何有效地进行中文教学, 尤其是如何在语言教学中融入文化元素, 成为当前国际中文教育领域的重要课题。颜色词作为语言和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承载着丰富的文化内涵和民族心理, 是国际中文教学中不可忽视的重要内容。

颜色词不仅仅是描述颜色的词汇, 它们还蕴含着深厚的文化意义和民族情感。不同文化背景下的颜色词往往具有不同的象征意义和使用习惯, 这些差异反映了各民族独特的文化心理和社会习俗。在国际中文教学中, 颜色词的教学不仅是语言教学的一部分, 更是文化传播的重要途径, 颜色词其中所包含的文化义也对学生学好汉语, 更好的了解中国文化有很大的推动作用^[1]。通过颜色词的教学, 可以帮助学生更好地理解中华文化, 增强他们的跨文化交际能力。

一、颜色词教学对国际中文教学的价值

(一) 丰富语言知识体系

汉语颜色词结构类型以偏正型为主, 兼有部分联合型, 从分类来看, 可依据基本颜色词如“红、黄、蓝、白、黑”等, 以及在此基础上衍生出的大量复合颜色词, 有借助其他物体对颜色进行隐喻命名的词语, 如实物类“桃红”“橄榄绿”“咖啡色”等借用自然或生活事物指代颜色; “浅蓝”“深紫”“淡黄”等是通过修饰语从视觉上对颜色的明度和饱和度进行区分; 还有文化象征色如“朱红”象征传统正色、“玄色”象征深黑等。^[2]在构词方面, 颜色词常通过与其他语素组合, 形成丰富多样的词汇形式, 如复合式构词“雪白”“银灰”采用“名词+颜色”结构; 重叠式构词“红彤彤”“绿油油”通过叠词增强生动性; 比喻式构词“鹅黄”、“鱼肚白”则具有鲜明的形象色彩。这种丰富而系统的颜色词体系, 充分展现了汉语对色彩世界的精准把握和独特表达, 对这些内容的教学, 能够显著扩充学习者的汉语词汇量, 使其掌握更为多元的语言表达方式, 进而深化对汉语语言系统内在逻辑与结构的理解。

(二) 提升语言运用能力

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 颜色是我们能直观感受到的第一特质。当我们与外界沟通交流时, 语言是传递信息的重要媒介, 我们用语言来描述对世界的感知, 颜色词就是其中一种, 在不同文化中, 颜色词被赋予了不同的文化内涵。^[3]因而在实际语言运用中, 颜色词的正确理解与恰当使用至关重要。不同文化中颜色词的象征意义存在显

作者简介: 洪杨(1995—), 女, 硕士在读, 研究方向为汉语国际教育-跨文化交际。

通讯作者: 陈云萍(1977—), 女, 西南科技大学教授, 研究方向为跨文化交际。

著差异,例如中文里的“红色”象征喜庆吉祥,如“红包”“红火”,但在非汉语文化中多与危险(red alert)或亏损(in the red)相关联;“白色”在西方代表纯洁,在中文语境中却常用于丧葬场合如“白事”;颜色词在搭配规则上有些固定用法需要特别强调,如中文的“绿茶”对应英文“green tea”,但“红茶”却要讲“black tea”而非直译;又如中文用“黄色”表示色情内容,而英语则使用“blue movie”来表达。^[4]若不了解这些文化差异,学习者极易产生误用。那么颜色词的学习能够帮助学习者精准把握词汇在不同语境中的语义内涵与搭配规则,避免因文化差异导致的用词不当,从而提升学习者汉语表达的准确性与灵活性,提升语言运用能力。

(三) 增强学习兴趣与动力

颜色词本身具有较强的形象性与直观性,相较于一些抽象词汇,更易引起学习者的关注与兴趣。在教学过程中,通过展示与颜色词相关的生动实例,能够营造轻松愉悦的学习氛围,如在教授“红绿灯”“蓝天白云”等基础词汇时,教师可以配合彩色图片或实物道具,使抽象的语言符号变得具体可感。这种寓教于乐的教学方式可有效降低学习难度,激发学习者主动学习汉语的内在动力,使其更积极地投入到汉语学习活动中,提高学习效率与效果。

此外,颜色词的多样性和丰富性也为教学提供了广阔的空间。教师可以通过设计各种有趣的活动,如“用颜色词描述心情”等创意练习,让学生体会到语言表达的乐趣。像“今天我的心情是粉红色的”,这种个性化的表达既巩固了学习内容,又获得了情感表达的满足感。让学生在轻松愉快的氛围中学习和运用颜色词。

二、颜色词教学对传播中华文化的价值

(一) 展现传统民俗文化与禁忌

儒家思想作为几千年来中华民族居于统治地位的主流思想,其内涵丰富多样,对中国的政治制度、文化生活等多方面都产生了影响。^[5]在这一思想影响下产生的颜色词常承载独特的民俗传统与社会禁忌,其象征意义往往与日常生活、节日仪式紧密相连。

以红色为例,它在中华文化中具有强烈的吉祥寓意。春节时家家户户贴红对联、挂红灯笼,寓意驱邪纳福;婚礼上新娘穿红嫁衣、盖红盖头,象征喜庆与幸福;本命年系红腰带则用于避灾;直到现在“中国红”作为一种颜色成为积极吉祥的文化标识。与之截然不同的是白色,传统丧葬礼仪中家属穿戴白色孝服(披麻戴孝),白灯笼、白纸钱成为哀悼的视觉符号,这与西方婚礼尚白的习俗形成鲜明对比。再如绿色在中文语境中亦有特殊隐喻,“戴绿帽子”暗指配偶出轨,而现代环保运动中的“绿色出行”又赋予其积极意义。^[6]此外,黄色则自汉唐起成为皇权独享色,通过法律严禁民用,形成“黄袍加身”的权力意象;黄色又是与中国最亲近的颜色,我们是黄种人,我们的母亲河叫黄河,我们称赞自己的黄土地,歌唱我们的黄土高原,我们是炎黄子孙;但当代“黄色”还增加了泛指色情的义项。^[7]这些颜色词的民俗应用与禁忌差异,既反映了历史文化的积淀,也展现出社会价值观的变迁。

(二) 传递文学意象和艺术表达

在中华文化中,颜色词在文学、绘画、建筑等艺术领域的运用充分体现了中国人独特的审美观念与哲学思想。^[8]在古典文学作品中,诗人常运用颜色词营造意境,如“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通过“黄”“翠”“白”“青”等颜色词的巧妙组合,勾勒出一幅清新明快、富有生机的画面,展现出对自然和谐之美的追求;在中国传统绘画中,注重色彩的神韵与意境表达,如徐复观在《中国艺术精神》提到:“水墨之色,乃不加修饰而近于‘玄化’的母色。”以素为绚的水墨看似无色,实为自然,通过黑白之间的色调变化,辅以水的渲染调和,物象的虚实与气韵得到表现,生命和精神也在这变化之间呈现出来,从而达到对事物的本质认识。这种崇尚水墨,崇尚自然的观点,开启了水墨的变革,尤其是在文人山水画方面。^[9]这就是中国画强调的“墨分五色”,即通过水墨的浓淡变化来表现丰富的色彩层次,这种独特的审美丰富了汉语对颜色的表达。中国的建筑色彩也十分考究,如北京故宫以红墙黄瓦为主色调,让红色的热烈与黄色的庄重相互映衬,彰显出皇家建筑的威严与华丽,这其中便蕴含着中国人对色彩的审美偏好与文化寓意。通过对这些艺术形式中颜色词运用的讲解,能够帮助国际中文学习者深入理解中华文化的文化内涵。

通过颜色词的教学,学生可以更好地理解中华文化的独特魅力,从而增强对中华文化的认同感和亲近感。不仅能够加深学生对汉语语言的理解,还能增强他们的文化敏感性和跨文化交际能力。

三、跨文化视角下颜色词教学策略

在国际中文教学中,颜色词教学更应注重去讲解不同文化中颜色词的象征意义和情感联想。通过文化对比法,也可以借助表格或案例讨论,引导学生分析中西方的颜色词差异,比如红色在中国代表喜庆,而在西方可能象征危险。这种对比不仅能够帮助学生理解颜色词背后的文化价值观,还能增强他们的文化敏感性和跨文化交际能力,

避免交际中的误解。

其次要应该注重语境化教学, 为了让学生更积极更活跃地参与到教学活动中来, 也为了吸引学生的注意力, 在课堂教学上, 有必要设置一些和颜色词文化义相关的语境来调动学生的积极性, 让学生主动参与学习。^[10]教师可以选取影视片段、广告等真实语料, 让学生在具体情境中观察颜色词的使用。这种教学方式不仅能够增强学生对颜色词的理解, 还能激发他们对中华文化的兴趣。或运用任务型教学法, 通过设计真实的任务情境, 并要求学生在完成任务的过程中运用颜色词, 以达到学习的目的。

此外, 构建词网, 避免混淆也至关重要。对于汉语学习者来说, 想要掌握一个相对独立的词语并非难事, 一旦需要将所学的知识进行串联并综合运用时, 却很容易因彼此间的相似性而混淆。如很多同学会将“黄道吉日”说成“红道吉日”。而汉语教材中有关基本颜色词的编排方式不尽相同, 便需要教师发挥主观能动性, 将颜色词背后所蕴含的文化内涵进行有效串联, 帮助学生构建一个完整、系统的知识脉络。^[11]同时还要利用多媒体辅助教学, 在课堂上多利用图片、视频等多媒体手段, 增强颜色词教学的直观性和趣味性。不仅能够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 还能增强他们对颜色词的理解和运用。

结语

汉语颜色词教学在国际中文教学与中华文化传播中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价值。通过颜色词教学, 不仅能够助力学习者构建完善的汉语语言知识体系, 提升其语言运用能力, 还能让他们深入领略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 促进不同文化间的交流与理解。

然而, 当前颜色词教学仍面临诸多挑战, 需要国际中文教育工作者不断探索与创新教学方法。未来, 应进一步加强对颜色词教学的研究, 结合现代教育技术与多元文化背景, 开发更具针对性与实效性的教学资源与课程, 使颜色词成为连接语言学习与文化理解的桥梁。期待通过汉语颜色词这一独特的文化符号, 为国际中文学习者开启一扇通往丰富多彩中华文化世界的大门, 让他们在“色”彩斑斓的文化之旅中, 不断深化对汉语与中华文化的热爱与理解, 从而在全球化背景下, 成为兼具语言能力与文化包容性的交流使者。

参考文献

- [1] 史雪微. 对外汉语中基本颜色词的文化义教学[J]. 文学教育(下), 2022, (02): 46-48.
- [2] 李学丽. 现代汉语新兴颜色词探究[J]. 文学教育(下), 2023, (01): 34-36.
- [3] 张晴阳. 跨文化视角下的汉语文化词研究——以颜色文化词为例[J]. 文化创新比较研究, 2024, 8(06): 165-169.
- [4] 谭雯. 跨文化交流中的英汉基本颜色词文化内涵对比研究[J]. 英语广场, 2022, (28): 47-51.
- [5] 马成欢. 中国传统色彩观的内涵分析[J]. 色彩, 2023, (10): 122-124.
- [6] 韩田昕. 汉语颜色词的文化内涵与翻译方法[J]. 嘉应文学, 2025, (03): 88-90.
- [7] 项喜军, 王雪歌. 谈对外汉语教学中的颜色词[J]. 品位经典, 2020, (12): 24-25+38.
- [8] 李金阳. 中国传统色彩在现代艺术设计中的创新与应用[J]. 上海包装, 2024, (11): 144-146.
- [9] 马成欢. 中国传统色彩观的内涵分析[J]. 色彩, 2023, (10): 122-124.
- [10] 施意. 妙用颜色词[J]. 汉字文化, 2022, (S1): 53-55.
- [11] 宋佳宝. 马来西亚汉语学习者基本颜色词偏误分析及教学研究[D]. 河北大学, 2024.

A Study on the Cultural Value of Color Terms in International Chinese Teaching

Hong Yang¹

1Southwest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Mianyang, Sichuan 621000, China

Abstract: As an essential component of language and culture, color terms carry rich cultural connotations and reflect national psychology. In international Chinese teaching, the instruction of color terms is not only a crucial aspect of language education but also an important means of disseminating Chinese culture.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cultural value of color terms in international Chinese teaching and proposes corresponding teaching strategies from a cross-cultural perspective. The aim is to provide insights for enhancing the quality of international Chinese teaching and promoting Chinese culture globally, thereby facilitating more effective worldwide dissemination of Chinese culture.

Keywords: color terms; international Chinese teaching; cultural value; teaching strategies

翻译美学视角下《伤寒论》中模糊语的英译研究

蒋靖¹, 柯蓬¹, 廖玲¹

(1.新疆大学,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 830046)

摘要: 中医典籍《伤寒论》中存在着许多模糊性表达, 给准确理解和传播中医知识和文化带来了困难。然而, 一些模糊表达展现出一定的美学价值, 这些美学价值的传递在翻译过程中也不容忽视。本文从翻译美学角度探讨《伤寒论》中模糊语的翻译策略和方法, 旨在为准确翻译中医典籍模糊语并同时在译文中传递其美学价值提供参考意见。

关键词: 翻译美学; 模糊语; 审美再现; 《伤寒论》

基金项目: 2024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研究生科研创新项目 (XJ2024G065)

DOI: doi.org/10.70693/rwsk.v1i5.990

引言

《伤寒论》中存在着许多由语义不明确、语法规则灵活使用、特定语用功能的选择以及文化多样性和独特性等原因造成的模糊性表达。本文把具有这些模糊性的表达称为模糊语。模糊语在多方面表现出不明确性, 给读者的阅读理解带来了一定的困难。然而, 《伤寒论》中模糊语不但展现出中医典籍的语言特色, 还体现出独特的中医思想和中医文化内涵, 在翻译时不能忽略模糊语这些审美价值的传递。翻译美学理论注重语言审美和语言审美价值的再现, 因此从翻译美学视角研究《伤寒论》中模糊语的审美价值和翻译审美再现, 有利于模糊语的中医语言特点、中医思想文化这些审美价值在译语社会的展现和传播。

1. 翻译美学概述

翻译美学是一门美学和翻译学的交叉学科。翻译美学包括语言审美理论和审美再现理论两部分, 用于指导译者进行原文审美和译文审美再现一系列翻译审美活动(刘宓庆 等, 2016: 17)。翻译美学主要概念包括翻译审美活动、翻译主体和客体、翻译审美原则等。

1.1. 翻译审美活动

翻译审美是翻译审美主体对原文进行审美价值分析和对译文进行审美优化再现的一系列活动(刘宓庆, 2016: 152)。翻译审美活动包括对原文的理解、对原文的审美信息扫描、译语文本的初步构建、对译文的审美加工和调节以及完成构建译文五个环节。翻译美学理论主要用于指导原文的审美信息扫描和对译文的审美加工和调节这两个环节。在对原文的审美信息进行扫描时需要根据语言审美价值的普遍标准来判断语言是否美。在对译文进行审美加工和调节时需要满足翻译审美原则的要求。因此, 翻译审美活动可以描述为翻译审美主体根据一定的翻译审美原则对具有审美价值的审美客体进行的一系列审美活动。

1.2. 翻译审美主体和客体

作者简介: 蒋靖 (1999-), 女, 硕士, 研究方向为翻译理论与实践。

柯蓬 (1996-), 女, 硕士, 研究方向为翻译研究。

通讯作者: 廖玲 (1974-), 女, 教授, 研究方向为英语翻译研究。

翻译审美主体是指在翻译过程中进行翻译审美活动的主体,也就是翻译者。刘宓庆(2019)指出翻译审美主体具有双重任务,即对原文的理解和鉴赏以及对原文审美信息的再现或创造。审美客体指人的审美活动所作用的客观事物(刘宓庆,2019:80)。在翻译过程中,翻译者对原语文本的审美信息进行分析,并将原文审美信息在译文中再现或创造。因此,翻译审美客体主要是翻译中的原文和译文。

翻译审美客体具有一般审美客体的价值属性,包括审美价值或功能价值(刘宓庆,2019:83)。语言的审美价值是用来判断语言是否美的标准和尺度。刘宓庆(2019)提出了六个语言美价值标准,即高度和悦的视听感性、适体精当的结构形态、明确精到的意涵容载、深刻感人的情感含蕴、生动鲜活的意象以及鲜明独到的文化特色。可以分为形式美和内涵美两个部分。视听感和结构形态是语言形式美的价值标准,意涵、情感含蕴、意象、以及文化都是语言体现出的内涵美。一般来说,文艺作品具有美学价值是普遍认同的,然而非文艺作品却被认为是枯燥、无趣的。其实非文艺作品,如新闻报道、法律文书、医学著作等,也是有价值的,即其信息功能价值。在翻译审美过程中,根据文本类型的不同,审美要求也是不同的。

翻译审美活动中,翻译审美主体作用于审美客体,审美客体反过来也制约着审美主体,它们之间有着相互作用的关系,如图1所示。首先,翻译审美主体受制于原语形式美的可译性限度,比如中国格律诗中的声韵律和对仗等形式美在英语中没有对应的形式,很难在译本中再现这些形式美。其次,审美主体也受制于原语非形式美的可译性限度。非形式美本身不能直观感受到,不同的译者和读者对非形式美的把握程度不一,在翻译时,非形式美的再现也就是一个难题。最后,译文的审构成和审美效果需要依附于原文的审美信息,翻译者不能脱离原语的审美构成在译文中增添审美信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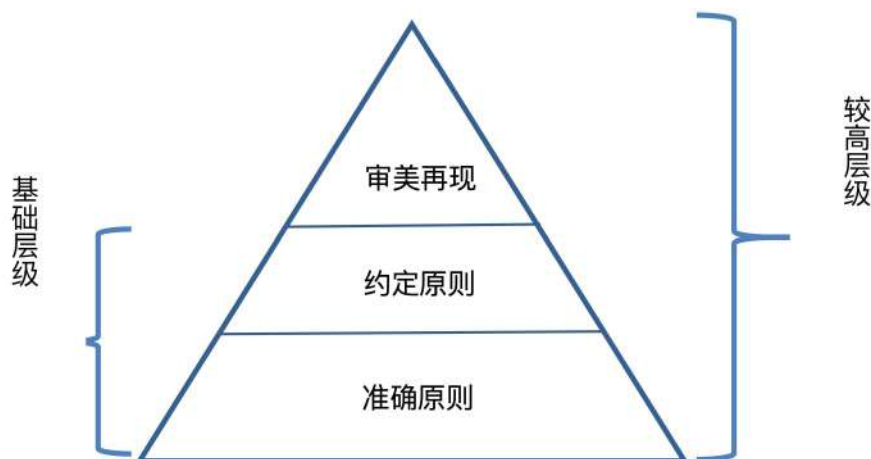


图1 翻译审美主体和客体的相互作用关系

翻译审美主体除了会受到限制外,还可以发挥主观能动性。主观能动性的发挥需要审美主体具有审美情感、审美认知、审美能力和意志(刘宓庆,2019:164-184)。审美主体是翻译审美的关键,主体的心理、知识、经验、认知等的不同让翻译审美活动具有个性化。同时翻译审美活动与主体的语言综合能力有关,主体可以致力于提高理解能力、情感能力、语际转换和再现能力,来达到预期的审美目标(刘宓庆,2016:157-159)。

1.3. 翻译审美原则

文学文本通常表现出比较明显的审美价值,而非文学文本通常表现出功能价值。针对文学文本和非文学文本,刘宓庆提出了不同的翻译审美原则要求。非艺术作品的译文注重功能价值的传递,首先需要准确传达原文含义,同时译文的用词和行文也需要符合译语习惯,即行文得体。非艺文学作品需要满足基础层级翻译审美原则,即遵循达意和约定(刘宓庆,2019)。文学文本的翻译则需要满足更高层级的翻译审美原则,即准确、约定和审美再现原则。文学文本不仅要求达意和适宜,还要满足审美再现原则,充分传达原文的情致并符合原语审美的最佳效果

(刘宓庆, 2019: 275), 即再现原文的审美信息和表达效果。翻译审美原则层级如图 2 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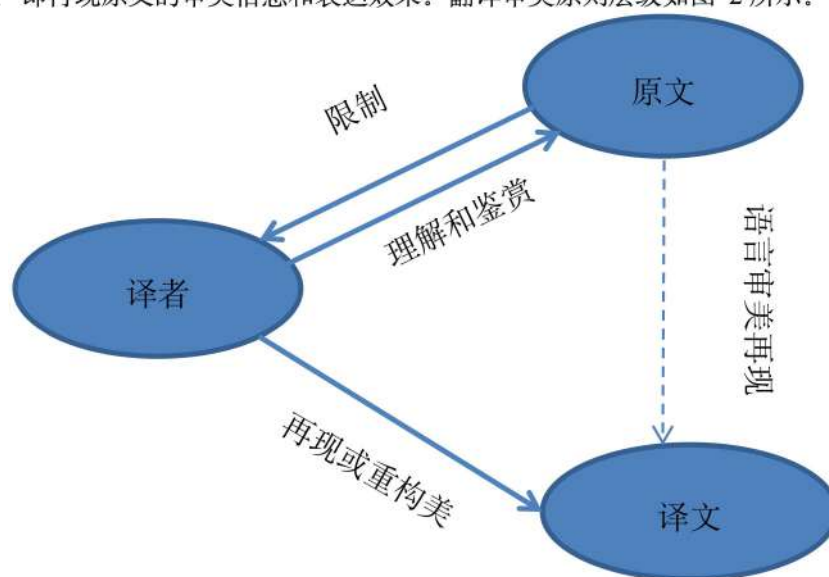


图 2 翻译审美原则层级

准确原则是翻译审美的首要原则，要求准确传达原文含义，即忠于原文，这也是翻译最基本的要求。对于中医文本《伤寒论》的翻译来说，准确原则需要做到中医术语对应、字词理解准确、语句逻辑清楚及中医文化内涵准确传达等方面。翻译审美的第二个原则是约定，即社会接受性。翻译《伤寒论》时，首先需要满足行文符合现代英语，包括其语法规则、表达习惯要求等。其次是其术语的翻译符合中医术语国际标准的约定。审美再现原则需要尽可能地再现原文的美。在双语可译性限度内，审美再现要求充分保留原文的概念内容、行文形式、形象描写手段以及风格要素(刘宓庆, 2019: 222-223)。《伤寒论》中模糊语具有一定的美学元素和文化内涵，在翻译时应尽可能地再现模糊语这些美学价值。

《伤寒论》是一本中医书籍，主要阐述中医学知识，它不是文学文本。但是由于其典籍性质，使用古汉语写成，保留大量四字词语、四字成语等特点，具有古典意蕴。它作为东汉时期的医学著作，包含当时的哲学思想和文化习俗，体现了独特的中医文化特色。可以说，中医药典籍在客观阐述医理的同时，蕴涵着深邃的医学美学思想，具备丰富的美学艺术特点(于洋等, 2022)。可以看到，即便《伤寒论》不是文学文本，但它仍具有一定的艺术特点。因此，可以在刘宓庆对不同文本的翻译审美要求的基础上，提出适合中医典籍《伤寒论》中不同类型模糊语的翻译审美原则。

对于不具有明显审美价值的模糊语，在翻译时，需要满足准确和约定两个基础的翻译审美原则，即准确传达原文含义，并且译文的用词和行文符合译语习惯。对于具有明显审美价值的模糊语，在翻译时不能忽略这些审美价值的传递，需要满足综合层级的翻译审美原则，即准确、接受和审美再现三个原则。

2. 《伤寒论》中模糊语的语言审美

2.1. 模糊语常见形式

模糊语表现为某些具体的语言形式。语言是由词汇按照语法规则构成的表义系统，在实际运用中发挥着一定的语用功能如：交际功能、指示功能、思维功能、表情达意功能等(潘文国, 2001)。同时，语言又展现出人们对客观世界的认识 and 态度，记述下民族和社会的历史发展进程，可以说语言是文化的载体，是反映民族文化的镜子(戚雨村, 1992)。可见，语言包含语义、语用、语法、文化等多个层面的内容。《伤寒论》中，语言表达的模糊性也主要体现在语义、语法、语用和文化层面上。常见的模糊语形式包括模糊概念词、模糊描述词、模糊限制语、省略句、模糊修辞、文化表达。

1) 模糊概念词

模糊概念词是指某个词语可以表达多个概念而造成模糊。《伤寒论》中的“太阳”不是指由地球和其他行星围绕着公转的恒星，而是指太阳经，是人体经络系统的一部分。“中风”指的是风邪造成的疾病。它与现代医学术语中表示突然昏倒、不省人事、口斜眼歪的脑部疾病“中风”的概念有很大差别(刘渡舟等, 1983: 11)。“伤寒”既可以指广义的外感热病，也可以专指狭义的寒邪侵袭太阳经所致的疾病(刘渡舟等, 1983: 12-13)。这些词语有多个概念，它们就是模糊概念词。《伤寒论》中模糊概念词还包括霍乱、重、逆、更、强、以、内、复、下等。

2) 模糊描述词

《伤寒论》中，模糊描述词主要是用来描述某一症状、感觉或状态，如叠词和形容词。模糊描述词本身概念的外延界限不够明确，导致难以准确把握其精准含义，具有模糊感。叠词“啬啬”表示肌体怕冷蜷缩的状态、“淅淅”表示被雨淋湿的寒冷感、“翕翕”表示羽毛聚合下温暖的感觉、“缘缘”表示面色红扑扑的样子。这些症状和感觉难以准确描述，只能通过想象感受到，因此这些叠词的含义不够明晰。《伤寒论》中的一些形容词的概念没有明确的界限，导致了表达的模糊。第49条中“重”是一种身体沉重的感觉，不能用数字精确表示，没有衡量“身重”的标准，因此是模糊表达；“脉微”、“里虚”、“表里实”等表达都是由概念界限不明确的形容词构成，这些症状表现程度很难把握，也是模糊表达。

3) 模糊限制语

模糊限制语可以用来改变被修饰词的模糊程度(Lakoff, 1973)。模糊限制语本身就是模糊的，可以用来改变中心词语的模糊程度，如“大约”、“可能”等。《伤寒论》中使用了大量的模糊限制语，如使用“余”和“许”修饰“一升”和“一时”，让本义精确的词语“一升”和“一时”变为模糊表达。数词连用构成的概数表达也可以被看做模糊限制语，它也可以改变词语的模糊程度，如“二三日”并不是指“三日”或者“两日”，而是指一个大概的天数范围，是一个模糊表达。

4) 省略句式

汉语为意合的语言，主要靠语义逻辑连接句子，有时候可以不严格按照语法规则，省略句子成分或逻辑连接词。这样的情况虽然会造成语法上的模糊性，但是一般结合语境仍然可以理解语句完整的意思。《伤寒论》中“颇欲吐，若躁烦，脉数急者，为传也。”省略了“颇欲吐”的主语“病患”。“发于阳，七日愈；发于阴，六日愈。”省略了服用“发于阳”和“发于阴”的主语“病”。“问曰：……其状何如？答曰：……名曰结胸也。”分别省略了问和回答的主体。这些句子的主语不明确，从而导致了语法上的模糊。

《伤寒论》常常按照中医表述逻辑连接句子成分，而省略逻辑连接词造成语法上的模糊。“太阳之为病，脉浮、头项强痛而恶寒”按照中医语言逻辑“病名+病症”连接句子，前后两部分没有逻辑词连接。“若吐、若下、若温针”中三个短句没有任何连词连接，它们的关系可以理解为先后关系、并列关系或者选择关系等，因此可以说其语法上具有模糊性。

5) 模糊修辞表达

书写者为了让语言表达具有委婉含蓄、礼貌得体等语用功能，而故意选择使用委婉表达，间接、委婉地表明原义。《伤寒论》第6条中“失溲”用来委婉地指大小便失禁的情况；“促命期”是“造成死亡”严重后果的委婉表达。这些委婉语的使用可能会造成读者对真正语义理解的偏差。

书写者还可以使用借代、比喻、夸张等修辞手法，借用其他物体形象夸大或减弱真正表达物体的形象特征，读者直接接受的是借用物体的形象特征，对真正描述的物体特征的掌握不够直接清晰。《伤寒论》中“如见鬼状者”使用夸张手法夸大了病症严重程度；“奔豚”使用隐喻修辞把“奔跑中的小猪”的剧烈动态感来比喻症状剧烈运动的状态；《伤寒论》中“风家”、“喘家”、“疮家”、“汗家”等借用“风、喘、疮、汗”直接代替由这些病症感染的病患。夸张、隐喻和借代修辞等借用了其他事物形象或其特征，来描述某一事物的形象特征，给表述带

来了模糊性。

6) 文化表达

《伤寒论》撰写于东汉时期，必然会受到当时社会背景、哲学思想的影响，大量文化思想内涵隐藏在《伤寒论》的原文表达中。蕴含着中医文化观念、文化意象和古文化知识的表达，往往给中医文化素养不足或者文化背景有差异的读者带来了困难，这些表达在文化方面展现出模糊性。

《伤寒论》中，“昼日烦躁不得眠，夜而安静”、“昼日明了，暮则谵语”蕴藏着人与自然为一个整体的观念。“太阳病欲解时，从巳至未上”和“阳明病欲解时，从申至戌上”根据时间来推断病症痊愈的时间，蕴含了重时思想。

《伤寒论》中还存在大量文化术语，如“太阳”、“太阴”、“气”、“脏腑”等。这些中医术语是基于文化产生的，在表达中具有一定的模糊性，需要借助文化知识和背景来理解这些文化术语。

《伤寒论》还使用了一些文化意象给汤药命名，赋予这些汤药名称文化内涵，如白虎汤、大青龙汤、小青龙汤。借用“白虎”、“青龙”两个四象文化意象，使汤药暗含四象的文化内涵。同时这些词汇的暗含的文化意象内涵给理解带来了难度，使表达具有模糊性。

2.2. 模糊语的审美价值

本文在刘宓庆普遍语言美价值标准的基础上对《伤寒论》中模糊语表现出的美学价值进行审美，模糊语表现出美学价值包括视听美、结构形态美、意涵美、意象美和文化美。

1) 视听美

人类通过视听来获取外部信息，视听和谐给人带来美的感受。《伤寒论》中使用了許多具有模糊性的叠词，如“嗇嗇”、“淅淅”、“翕翕”、“缘缘”等，这些词不仅视觉上具有重叠美感，读起来也具有节奏感，达到了视听和谐，具有视听美。

2) 结构形态美

结构形态美体现在选词造句上，包括简约凝练、分布平衡、句式丰富、组织紧凑等特点(刘宓庆, 2019:191)。省略句式省略主语或者逻辑词连接，让句子结构更加简练、紧凑等。《伤寒论》中大量句子省略了主语，这些句子在结构形态上表现出简约凝练、句式紧凑等特点，具有结构形态美。如：“下之后，复发汗，必振寒、脉微细”四个三字短句均省略了主语，语言表达显得十分简练；用“，”和“、”把12个字分成匀称的四个短句，结构形态上展现出平衡美。

3) 意涵美

一些词语和表达有着丰富的意涵，包括思想内涵、文化内涵和情感内涵等方面。《伤寒论》中的模糊描述词、委婉语、文化思想表述、文化意象等模糊语形式都体现出意涵美。叠词一般用做描述词，“嗇嗇”描述人蜷缩在一起怕风的状态，“淅淅”描述人被淋湿被冷的症状，其形象生动地描写，引起人的联想，展现出词语的意涵美。《伤寒论》中委婉语表达委婉含蓄地表达真实含义，避免过于直白，体现出书写者人文关怀思想内涵。中医文化术语和文化意象词的形成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表达丰富的文化内涵，具有意涵美。

4) 意象美

意象是经过人审美感知、审美联想、审美情思等加工融合形成的(刘宓庆, 2019:195)。意象是主体赋予事物新的含义，往往蕴藏着主体独特的情感或寓意。《伤寒论》中的文化意象词、隐喻、借代、夸张等模糊语形式包含着意象，作者通过联想、感知和情感思考后，将其他事物特征与描述的事物相互联合起来，赋予事物新的含义。《伤寒论》以“白虎”来命名汤药名称，寓意着“白虎汤”功效与“白虎”对应。《伤寒论》中“奔豚”用来隐喻病症的动感，“风”来指代感受风邪的病人，将“暮则谵语”的状态夸张为“鬼”的恐怖样。这些事物经过书写者的联想、感知它们的特点，将它们与新的事物含义相对应，具有意象美。

5) 文化美

《伤寒论》中医文化观念包括整体观念，重时观念，阴阳协调，五行学说等。中医的整体观念认为人自身是一个有机整体，人体的各个部分是相互联系的。人与自然、社会之间也是统一的，生理和病理受季节、环境、气候、昼夜等变化是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张其成, 2021:675-676）。“昼日烦躁不得眠，夜而安静”、“昼日明了，暮则谵语”说明病人的病症根据昼夜交替而变化，这便是蕴藏了人与自然为一个整体的观念。重时思想是《周易》的重要哲学观念，认为人的活动应法于天道，与时谐行（张其成, 2021:477）。《伤寒论》中“太阳病欲解时，从巳至未上”和“阳明病欲解时，从申至戌上”根据时间来推断病症痊愈的时间，蕴含了重时思想。中医的五行学说把“木、火、土、金、水”五行的性质和关系赋予人体五脏，用五行相克的制化关系来解释疾病的产生，说明五脏的生理功能及其相互关系（张其成等, 2021:107）。《伤寒论》中“寸口脉浮而紧，此肝乘脾也，名曰纵，刺期门”根据人体五脏之间相克的关系，判断“寸口脉浮而紧”的病症产生原因，是因为肝（木）过度克制了脾（土），由此提出“刺期门”的治疗方法。

受东汉时期文化背景、前人医学基础和哲学思想观念的影响，《伤寒论》的语言包含大量的中医文化术语、文化意象和文化表达，这些表达字里行间都蕴藏着中医文化观念和文化背景知识，表现出独特丰富的文化特色美。

3. 《伤寒论》中模糊语的翻译

魏迺杰的《伤寒论》译本 *Shang Han Lun On Cold Damage: Translation & Commentaries* 以明代赵开美版本（宋本）为底本，于1999年由美国出版社 Paradigm Publications 出版。其目标读者是现代西方国家的中医学者和临床医生，旨在尽量再现《伤寒论》原文全部内容，使目标读者理解《伤寒论》的中医学术思想及中国传统文化（盛洁等, 2013）。基于魏迺杰《伤寒论》译本旨在再现《伤寒论》原文的全部内容的目的，本文从翻译美学角度审视其《伤寒论》中模糊语的再现情况，对其译本进行分析和评估，为再现中医典籍模糊语的美提出翻译策略和方法。

3.1. 模糊概念词

模糊概念词可以表达多个含义而造成模糊，不具有明显的审美价值，需要满足最基本的准确和约定审美再现原则。《伤寒论》中存在着大量的模糊概念，这里主要对常用病症名称“伤寒”进行分析。魏迺杰模糊概念词的翻译情况分析如下：

例1：太阳病，……名为伤寒。（《伤寒论》条3）

魏迺杰译本：（Line 3）Greater yáng disease, …… is called cold damage.

例2：伤寒一日，太阳受之。（《伤寒论》条4）

魏迺杰译本：（Line 4）On the first day of cold damage, greater yáng contracts [the disease].

“伤寒”表达多个含义，有狭义和广义之分，例1中的“伤寒”是专指寒邪侵袭太阳经造成的疾病，WHO 中医国际标准术语为“cold attack pattern”；例2中的“伤寒”指广泛的外感热病，WHO 中医国际标准术语术语为“cold damage”。

例1和例2中“伤寒”的含义不同，魏迺杰都将它们译为“cold damage”，因此例2译本符合术语标准，例1中不符合约定原则。应该使用不同的术语区分它们的差别。例2中，魏迺杰译本中将“伤寒”直译为“cold damage”，用来代替“伤寒”概念。他在注释中说明了“伤寒”具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准确传达了原文含义。魏迺杰的例2译本采用直译的方式保留了原文的模糊概念，还利用增加注释的方式准确传达原文含义，更利于读者理解，满足了基本的准确和约定原则。

3.2. 模糊描述词

叠词作为典型的模糊描述词，既具有视听和谐美，又有能引发人联想的意涵美。因此叠词的翻译需要满足高层次的审美再现原则。叠词模糊语形式的审美翻译对译文实现美的再现具有重要意义。魏迺杰模糊描述词的翻译

情况分析如下:

例 3: 啬啬恶寒, 淅淅恶风, 翕翕发热 (《伤寒论》条 12)

魏迺杰译本: (Line 12) If there is huddled aversion to cold, wetted aversion to wind, feather-warm heat effusion,……

“啬啬”为四肢蜷缩状;“淅淅”表示被雨淋湿的状态;“翕翕”本意指鸟的羽翼合拢的样子。在例 3 中它们分别用来生动描述了怕冷、怕风以及发热而表现出的状态,引起人的想象,具有意涵美。同时它们都是叠词,具有视听美。

魏迺杰的译本使用动词“huddle and wet”,准确传达了“啬啬”、“淅淅”的含义。并且将使用这些动词的分词形式“Huddled”,“wetted”来形容怕冷、怕风的状态,具有动态感,引发读者的联想,既符合英语表达习惯也保留了原文模糊描述词的意涵美。魏迺杰用复合形容词“feather-warm”,准确而又生动描述了原文中由羽翼合并而产生的发热感。但是叠词的视听美缺失。

总的来说,魏迺杰将叠词转译为动词分词和复合形容词能够很好地平衡原文模糊描述词的意涵美和准确性。

3.3. 模糊限制语

模糊限制语主要用来修饰并改变中心词模糊度的词语,没有明显的审美价值,需要满足基础的准确和约定原则,魏迺杰模糊限制语的翻译情况分析如下:

例 4: 服已须臾,啜热稀粥一升余,以助药力,温覆令一时许……。 (《伤寒论》12)

魏迺杰译本: (Line 12) Shortly after taking [the first dose] drink approximately one sh ē ng of hot, thin gruel to reinforce the strength of the medicinal. Warm [the body] by covering [with a blanket] for a short period,…….

例 4 中,“一升余”和“一时许”使用了模糊限制语“余”和“许”,让表达变得模糊。模糊限制语的使用没有死板限制喝粥的量和盖被子的时间,体现了中医诊治灵活。

魏迺杰将“一升余”直译为“approximately one sh ē ng”,保留了原文含义和模糊限制语体现的灵活性。“一时许”转译为“for a short period”,保留了原文的模糊含义,可以体现中医语言的灵活。但是“for a short period”改变了模糊限制语的中心词“一时 (two hours)”为“a period”,导致原文含义有一定的差别,没有准确传达原文。

可见,模糊限制语一般能在译语中找到对应的表达式。对于模糊限制语的翻译,宜采用直译的方法,保留模糊限制语的使用,以准确再现原文模糊语限制语的灵活含义。

3.4. 省略句式

省略句省略了部分语法成分,在句式形态上具有简洁凝练、紧凑的结构形态美。在翻译时需要满足高层次的审美再现原则,魏迺杰省略句式的翻译情况分析如下:

例 5: 服桂枝汤,或下之,仍头项强痛……。 (《伤寒论》条 28)

魏迺杰译本: (Line 28) When Cinnamon Twig Decoction (gui zhi t ā ng) is taken, or precipitation [is used] and [there is] still stiffness and pain of the head and nape…….

例 5 中省略了“服桂枝汤,或下之”和“仍头项强痛”的主语,造成了语法结构上的模糊。但是在中医文本中服用汤药、表现症状的主体显而易见是病人,不用反复说明,因此原文省略了主语。这体现了中医语言结构的简洁性以及语言逻辑的内隐美。

魏迺杰使用被动语态翻译“服桂枝汤,或下之”,为“When Cinnamon Twig Decoction (gui zhi t ā ng) is taken, or precipitation [is used]”,准确翻译了原文含义,句式符合译语表达习惯。且被动句避免了使用主语,结构形态具有简洁美和语言逻辑内隐美。魏迺杰译本将“仍头项强痛”改译为英语“There be”句型,不但符合英语表达,而且也避免了主语的使用,保留了原文语法模糊及其简约美。因此,总的来说魏迺杰的译本符合高层次的翻译审美再现原则。

例 6: 太阳病, 头痛、发热、汗出、恶风, 桂枝汤主之。 (《伤寒论》条 13)

魏迺杰译本: (Line 13) [For] greater yáng disease with headache, heat effusion, sweating, and aversion to wind, Cinnamon Twig Decoction (guì zhī tāng) governs.

例 6 中的 6 个语言结构之间没有任何词语的连接, 它们之间的关系在语法上具有模糊性, 但同时它的句式简练、短句分布均匀, 具有结构形态美。

为符合英语表达习惯, 魏迺杰采用增添连词和介词的方法, 都准确地表达了原文的含义。但都牺牲了一定的简练美。从整体上来看, 魏迺杰的译本增加了两个词语, 其余几乎都对应对了原文, 因此他的译本均衡和简练, 符合审美再现的原则。

3.5. 模糊修辞表达

修辞手法的使用让表达更加委婉含蓄、生动形象, 让表达具有意涵美和意象美。翻译模糊修辞表达时需要满足高层次的审美再现原则, 魏迺杰模糊修辞表达的翻译情况分析如下:

例 7: 一逆尚引日, 再逆促命期。 (《伤寒论》条 6)

魏迺杰译本: (Line 6) One [instance of] of adverse [treatment] will lengthen the time [of disease], and further adverse [treatment] will lead to the term of life.

“命期”指生命期限, “促命期”是“导致死亡或加速死亡”的委婉表达。

魏迺杰译本将“命期”直译为“the term of life”, 保留了原文委婉的说法, 具有委婉含蓄美。同时, “term”有时间持续长度的含义, “term of life”可以准确表达原文的含义。魏迺杰还添加了注释“the term of life: the termination of life; death”, 帮助读者理解“the term of life”的具体含义, 满足读者接受性

例 7: 发汗后, 其人脐下悸者, 欲作奔豚。 (《伤寒论》条 65)

魏迺杰译本: (Line 65) When, after sweating has been promoted, the person has palpitations below the umbilicus about to become running piglet.

例 7 中“奔豚”本意为“奔跑的小猪”。患了水邪后人体有气从少腹上冲心胸, 这样的状态和小猪奔跑的情形有相似之处, 突出了患上“水邪”后病人体内气体的奔腾感。因此, 奔豚”用来比喻“患水邪的病症”状态。

“奔豚”采用了暗喻修辞, 语言表达简练和生动, 突出了事物形象特征, 体现了主体联想的丰富, 具有意象美。从准确原则来看, 魏迺杰译本使用直译的方法, 保留了原文的暗喻, 用“about to become”连接本体“palpitations below the umbilicus”和喻体“running piglet”, 准确地传达了原文含义。从约定原则来看, 魏迺杰通过“about to become”连接了本体和喻体的关系, 符合译语表达习惯, 也符合约定原则。从审美再现原则来看, 魏迺杰译本“about to become running piglet”采用直译的方法, 保留了原文暗喻, 再现了主体生动形象的联想美且表达简练。因此魏迺杰的译本符合审美再现原则。

3.6. 文化表达

中医文化思维往往蕴藏在表达中, 有一定的模糊性, 同时也具有文化特色美。其文化特色的保留和准确传达中医学知识是中医翻译的难点与重点。对文化表达的翻译也需要满足高层次的审美再现原则, 魏迺杰文化表达的翻译情况分析如下:

例 8: 太阳病欲解时, 从巳至未上。 (《伤寒论》条 9)

魏迺杰译本: (Line 9) The time when greater yáng disease is about to resolve is from sì (B6) to wèi (B8).

例 8 中“巳”和“未”是来自于中国古代的计时文化, 即十二时辰计时。“巳”是指现在时间的 9 点到至 11 点, “未”指 13 点至 15 点。“从巳至未”正是午前至午后这段时间, 也是阳气最盛之时, 人体在这段时间通过获取外部的阳气, 并达到治愈太阳病的作用(李心机译注, 2022:136-137)。这也体现了中医“天人合一”的整体思维, 人与自然是整体, 人的生理、病理受到自然环境的影响, 从而推断出太阳病治愈的时间。

对于“巳”和“未”的翻译，魏迺杰译本采用了音译+注释的方法。使用音译保留了中医语言特色，传播中医文化印记。魏迺杰附上了十二时辰注释表，B6是指9:00am-11:00am，B8指的是1:00pm-3:00pm，表达了原文含义。不仅如此，魏迺杰还给Line 9注释了“On the basis of the intimate relationship between humans and the natural world”，完全消除了原文文化差异带来的模糊，有助于读者深刻理解文化内涵，同时也再现了中医文化内涵和文化特色。

例 9：白虎汤（《伤寒论》条 219）

魏迺杰译本：(Line 219) White Tiger Decoction (bái hù tāng)

白虎汤不仅仅只是以动物“白虎”的名称命名，而是按照具有丰富内涵的中国“四象”文化来命名的。“白虎”在四象文化中与秋季对应，象征着清凉，这正好与白虎汤的清热功效相符。因此白虎汤的命名具有象征意义，蕴含着丰富的中国古代文化。

魏迺杰译本采用直译+意译的方法，译为“White Tiger Decoction”。“Decoction”准确传达了“白虎汤”作为一个汤剂的含义，且保留了中文文化意象“white tiger”，但是在西方文化中，“白虎”并没有代表“凉爽”的含义，可能会造成一定的误解。魏迺杰译本在审美再现原则上有一定的缺失，没有再现原文“白虎”的意象。由于魏迺杰在译本中保留了原文文化意象，但是在文化方面还存在模糊性，给读者理解带来了难度。因此最好在魏迺杰译本的基础上增加释义，解释“白虎”具有的文化内涵，赋予“white tiger”中医文化意象，展现文化特色美。

总的来说，对于文化表达的审美再现需要考虑到语言和文化的差异和对应情况，必要时需要添加注释或进行解释。

4. 模糊语翻译审美策略

通过对魏迺杰《伤寒论》中模糊语英译的翻译效果和翻译方法分析，本文总结出了适合中医文本中各种模糊语形式的翻译策略和方法，致力于为中医翻译做出贡献。中医典籍模糊语的翻译可以采用对应、模仿、重建和补偿策略。

4.1. 对应策略

一些模糊语形式可以在译语中找到完全对应的语言表达，可以采取对应的翻译策略。这种翻译策略可以实现词与词的对应达到语言含义和表达效果的再现。在翻译中医术语时，如果有标准化的术语，译文翻译首先要对应国际标准术语标准术语。在翻译由模糊限制语、委婉语、比喻、夸张等构成的模糊表达时，如果它们能在译语表达中找到对应式，那可以通过直译的方法达到词与词的对应，以实现原文含义、表达习惯和审美再现的原则。

4.2. 模仿策略

模仿策略就是模仿原文的语言形式。因为有的语言形式在译语中不能找到含义、语言形式和表达效果完全对应的表达，因此可以通过模仿其形式，以再现其表达效果。对于一些语义比较单一，但是语言形式不符合译语表达习惯的模糊语形式可以采取模仿的策略。如魏迺杰在翻译叠词时，他通过转换词语词性和构建复合形容词来模仿原文的语言形式，使其符合译语表达习惯，并尽量再现原文简洁凝练的结构形态美。

4.3. 重建策略

重建就是在译语中重新构造语言表达式，对于一些句法表达习惯不符合译语的模糊表达时，往往可以采用重建策略。汉语中常使用无主句、省略句、词性活用等模糊语形式。而英语要求形合，注重语法规则和句子的逻辑。因此，在翻译由语法变异造成的模糊语时，要对原文进行重建，以满足译语表达习惯。

4.4. 补偿策略

补偿策略是指在译文正文外为译文进行补充说明的策略，以达到翻译审美原则。中医文本中很多模糊语形式

不能在译语中找到对应表达式，同时还具有丰富的含义、意蕴或文化内涵，可以采用补偿策略在注释中补充说明其含义或文化内涵。对于一些词语可以先采用直译或者音译的方法保留语言形式美学特点，再增加注释的方法能补偿其原文含义，如模糊概念词、借代、文化意象词和文化术语等。在翻译蕴含中医文化观念的表达时，必须添加表达完整的文化内涵的注释，否则很难满足文化内涵和文化美的传递。

5. 结论

《伤寒论》中模糊语存在各种模糊语表达式，这些模糊语形式展现出多样的美学特点，体现了中医典籍丰富的语言和文化特色，在翻译时不能忽视这些模糊语美的再现。通过对魏迺杰译本各种模糊语表达式的分析和评估，他的译本采用了直译、转译、增译、改译、音译+注释、直译+意译等翻译方法，大部分满足了翻译审美原则的要求，准确地再现了原文的模糊语的美。但是对一些叠词和文化表达的翻译审美再现时，缺失了一定的美，这主要是由于中英语言和文化之间难以找到完全对等的表达式。本文针对中医典籍中各种模糊语表达式提出了对应、模仿、重建、和补偿四种翻译策略，为准确翻译和再现中医典籍中模糊语的美提供参考。

参考文献：

- [1] Lakoff G. "Hedges: A Study in Meaning Criteria and the Logic of Fuzzy Concepts." *Journal of Philosophical Logic*, vol. 2, no. 4, 1973, pp. 458 – 508. JSTOR, <http://www.jstor.org/stable/30226076>. Accessed 7 May 2025.
- [2] 刘渡舟,傅士垣.伤寒论诠释[M].天津:天津科学技术出版社,1983.
- [3] 刘宓庆,章艳.翻译美学教程[M].北京:中译出版社,2016.
- [4] 刘宓庆.翻译美学导论(修订版)[M].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5.
- [5] 刘宓庆.翻译美学导论[M].北京:中译出版社,2019.
- [6] 潘文国.语言的定义[J].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01):97-108+128.
- [7] 戚雨村.语言·文化·对比[J].外语研究,1992,(02):3-10.
- [8] 于洋,孙宏亮,贾爱明,等.中医药典籍语言的美学化特征探析[J].医学与哲学,2022,43(08):72-75.
- [9] 张其成,臧守虎.中医文化学[M/OL].微信读书:中国中医药出版有限公司,2021.

A Study on the English Translation of Vague Language in Shang Han Lun

Jiang Jing¹, Ke Peng¹, Liao Ling¹

¹*Xinjiang University, Urumqi, Xinjiang Uygur Autonomous Region, China*

Abstract: There are many vague expressions in Shang Han Lun, which brings difficulties to the accurate understanding and dissemination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knowledge and culture. However, some vague expressions exhibit certain aesthetic values, and the transmission of these aesthetic values during the translation process cannot be ignored. This article explores the translation strategies and methods of vague language in Shang Han Lu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ranslation aesthetics, aiming to provide reference opinions for the accurate translation of the vague language in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classics and, at the same time, to convey its aesthetic values in the translated texts.

Keywords: Translation Aesthetics; Vague Language; Aesthetic Representation; Shang Han Lun

副文本理论下《道德经》英译本脚注的文化阐释研究

杨白雪¹

(1.新疆大学, 新疆 乌鲁木齐 830046)

摘 要:《道德经》作为道家经典, 其跨文化传播对世界哲学和文化交流意义深远。虽然原文仅有五千余字, 但具有内涵深奥和语义模糊的特点, 现有翻译研究多集中于语言转换和文化传播, 鲜少见对英译本中副文本内容的深入研究, 对脚注的研究则更加少见。对于译本而言, 脚注不仅有补充说明原文的作用, 更是译者文化立场与翻译理念的直观反映, 在《道德经》跨文化交流中发挥着不可忽视的作用。本研究以副文本理论为指导, 对詹姆斯·理雅各、亚瑟·韦利和林语堂三个《道德经》英译本脚注进行深入分析, 探讨其在文化阐释和辅助读者理解原文等方面的功能与特点。

关键词:《道德经》; 副文本; 脚注

基金项目:2024 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研究生创新项目(XJ2024G066)

DOI: doi.org/10.70693/rwsk.v1i5.994

一、引言

《道德经》作为道家思想的经典之作, 用短短五千余言阐述了宇宙、人生、社会等诸多方面的深刻道理。这部经典不仅在中国文化中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对中国哲学、文学、艺术、政治等领域产生了深远影响, 还在世界范围内广泛传播, 被誉为“西方第二《圣经》”。在英语世界的发行量仅次于《圣经》, 成为了传播中国文化、促进中外文化交流的重要载体。

众多译者对《道德经》进行英译, 不同的文化背景、翻译目的和翻译策略使得这些英译本各具特色, 也导致了在翻译过程中对原文的理解和阐释存在差异。这种差异不仅体现在对正文的翻译上, 也反映在作为副文本的脚注中。脚注作为一种常见的副文本类型, 发挥着对正文中的难点、文化背景、特殊词汇等进行解释说明的作用, 帮助读者更好地理解译文。在《道德经》英译本中, 脚注同样对于传达原文文化内涵和哲学思想起着重要作用。

二、三个英译本简介

在众多《道德经》英译本中, 詹姆斯·理雅各、亚瑟·韦利、林语堂的译本各具特色, 在译界占据着重要地位, 对《道德经》在英语世界的传播和理解产生了深远影响。

詹姆斯·理雅各是最早到中国的传教士之一。在中国传教期间, 他翻译了《论语》、《易经》等中国经典著作。1891 年, 理雅各翻译的《道德经》由牛津大学出版社作为《东方圣书》的第三十四卷出版, 后经各出版社再版。1962 年, 多佛出版社在 1891 年原稿的基础上重印了该译本, 本研究以 1962 年的重印版为研究对象。理雅各的译本副文本内容丰富, 他不仅在译本中撰写了长篇序言和引言, 而且还遵循了他以前翻译中国经典时注重考证的习惯, 在脚注中引用了大量中国清代以前的道教研究成果和对以前翻译的讨论。该译本是同时期最有影响力、最被接受、最被广泛认可的译本之一, 成为后来学者研究的重要参考资料。

亚瑟·韦利是英国著名的东方学家、翻译家, 他对中国古代文学和哲学有着深入的研究和独特的见解。《道与德:〈道德经〉及其在中国思潮中的地位研究》由亚瑟·韦利翻译, 于 1934 年首次出版, 该译本中的副文本内容包括前言、引言、附录、注释、评注等。据统计, 自 1934 年首次出版以来, 已被再版或重印二十多次, 本研究以格罗夫出版社 1958 年的重印版为基础。该译本受到学者和普通读者的广泛好评, 成为向西方介绍中国文化

作者简介: 杨白雪 (1997—), 女, 硕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为翻译理论与实践

的重要途径,为西方读者打开了一扇了解中国哲学思想的窗口。

1948年,现代图书馆出版了林语堂英译本——《老子的智慧》。林语堂是中国现代著名作家、翻译家、新道家代表人物。他的《老子的智慧》,以其独特的翻译风格和深刻的文化理解而备受关注。他的译本既忠实于中国文化,又兼顾西方读者的思维和审美期待。该译本的副文本特点在于译者为每个章节拟的章节标题、译文的末尾处的大量译者对原文的评论与阐释、大量注释,还通过比较老子和孔子的思想来帮助读者理解《道德经》的深刻内涵。林语堂将《道德经》视为拯救西方精神危机的“良药”,希望将中国古代哲学引入西方世界,他的翻译对《道德经》在西方的传播和接受产生了重要影响。

三、副文本理论与脚注的作用

3.1 副文本理论

1979年,法国著名文学理论家杰拉德·热内特首先提出了“副文本”的概念,指“围绕作品文本周围的元素”。1987年,热内特在他的法文著作《门槛》中提出了副文本的定义、分类和功能。1997年,该书以英文出版,副文本概念开始在世界范围内传播。副文本指所有添加到文本中的口头或其他材料,这些材料在文本、作者和读者之间起调解作用^[1]。在这本书中,热奈特进一步将副文本细分为13种类型(标题、署名、献词、序言、目录、注释、后记、附录、封面和装帧设计、插图与排版、访谈与公开信、广告与书评、作者手稿与未公开材料)。他还明确指出,副文本的目的不是让文本“好看”,而是确保文本被正确的阅读和理解^{[1]407}。换句话说,在设计副文本内容时,作者希望读者能根据这些内容尽可能接近作品的初衷,帮助读者更好地理解文本。

3.2 脚注在翻译中的功能与分类

正如热奈特所说,注释主要指用于详细解释某些特定文本的副文本内容^{[1]319}。注释是最重要和最常见的副文本类型之一。在翻译中,尤其是汉英典籍翻译中,为了向目标读者解释他们可能不熟悉的文化和历史知识,或者对文本中有疑问或有争议的内容进行解释,添加注释是一种常见的现象。在这方面,注释的重要性是毋庸置疑的,因为注释可以大大提高译本的可读性,帮助目标读者理解文本。

根据脚注的内容和功能,可以对其进行分类。蒋辰雪^[2]将脚注分为意义阐释脚注、背景描述脚注、分层递进脚注和深层铺垫脚注四种类型,本研究根据这四种脚注类型对三个《道德经》英译本中的脚注进行分析。

意义阐释脚注:这些脚注用于直接解释文本的意义,缓解读者的阅读障碍,是书籍中最常见的脚注类型。

背景描述脚注:补充与原文相关的历史文化知识,帮助读者更好地理解相关内容。在中华典籍外译本中,通常会有大量此类注脚^[3]。

分层递进脚注:对于那些有历史渊源、在不同历史时期有多重含义,或有争议的内容进行解释,运用整合、排序的方式,营造出深层语境,在此过程中,通过脚注构建出完整的知识内容框架。

深层铺垫脚注:通过列出与原文内容相关的文献和信息供读者参考和进一步深入研究,此类脚注可以更好地突出书籍的学术意义,具有重要的学术研究价值^[4]。

四、三个英译本中脚注的分析

4.1 詹姆斯·理雅各译本脚注分析

据统计,詹姆斯·理雅各译本共有599个脚注,其中意义阐释脚注所占比例最大,共有399个;深层铺垫脚注的数量最少,只有48个;分层递进脚注和背景描述脚注分别为124个和88个。

表1 理雅各译本中各类型脚注数量

脚注类型	引言	正文	《庄子》	共计
意义阐释	7	0	332	339
背景描述	7	0	81	88
分层递进	15	0	109	124
深层铺垫	13	0	35	48
共计	42	0	557	599

詹姆斯·理雅各在其《道德经》英译本中,运用了大量脚注对中国古代文化背景知识进行阐释,这些脚注犹

如一把把钥匙,为西方读者打开了理解《道德经》深邃内涵的大门。例如,在引言中介绍中国历史文化时,他在脚注中对禹这个人物进行了介绍:“舜的继任者与谋臣,应对并治理了尧时期的洪水”^[5]。禹因治理洪水的成就而被后人称赞,英文读者可能不太熟悉这个历史人物,在脚注中简要介绍,为目标读者提供他们可能缺乏的文化历史知识,方便有兴趣的读者深入探索,避免文化缺失造成的阅读障碍,更好地向英文读者介绍中国文化。此外,对历史文化的介绍可以促进中西方文化的交流,促进了不同民族的交流与融合。

理雅各在译本中还对《庄子》部分内容进行了翻译,在《庄子·秋水》的翻译中,他将“鹓鶵”译为“the Young Phoenix”,并在脚注中补充道:“学者们如此解释这一名称。威廉·姆斯认为,这种鸟可能是‘孔雀雉’或‘孔雀的某个变种’。但此鸟究竟为何种鸟类,并不影响作者在此处引用它的寓意。”中文原词“鹓鶵”是传说中与凤凰同类的神鸟,象征高洁、超脱世俗的品格,与英语文化中凤凰有相似的寓意。西方的凤凰,也被称为“火鸟”,通常被描述为一种有着强壮而美丽的身体的大鸟,是重生和不朽的象征。在这段脚注中,理雅各引用了威廉·姆斯的解释,以帮助读者更全面地把握原文可能的含义,呈现多重视角,也反映了译者严谨的学术态度。

4.2 亚瑟·韦利译本脚注分析

与理雅各的译本一样,韦利在译本的几个部分添加了大量的脚注,但两位译者添加的脚注数量和类型各不相同。韦利译本共有470个脚注,其中意义阐释脚注210个,所占比例最大。背景描述脚注最少,只有57条;分层递进脚注和深层铺垫脚注分别为108和95个。

表2 韦利译本中各类型脚注数量

脚注类型	序言	引言	其他	正文	共计
意义阐释	0	46	13	151	210
背景描述	0	33	8	16	57
分层递进	0	36	10	62	108
深层铺垫	2	70	14	9	95
共计	2	185	45	238	470

亚瑟·韦利在其《道德经》英译本中,运用脚注对原文的字词含义和语法结构进行了细致的注释,这对于西方读者理解《道德经》的内容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例如,在翻译第四章时,他将“尘”译为“dust”,并在脚注中解释道:“在道家思想中,‘尘’象征着日常生活的喧嚣与纷扰^[6]。在中国文化中,‘尘’既指‘土’,也指‘尘’。在道家文化中,它隐喻世俗世界及其混乱,并被赋予抽象意义,与现实社会的肮脏和令人不安的事物相关。然而,在英语文化中,‘尘’没有这样的含义。译者在这里对这个词的内涵进行解释,帮助西方读者理解‘尘’这一核心概念在《道德经》中的特殊含义,避免因文化差异造成对‘尘’字的错误解读。”

韦利将“故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翻译为“After Tao was lost, then came the ‘power’; After the ‘power’ was lost, then came human kindness”。为帮助读者准确理解“道”这个核心概念,韦利在脚注中补充道:“此说亦见于《庄子·外篇二十二》第一章。”^{[6][89]}原文意为失去了“道”才提倡“德”,失去了“德”才提倡“仁”,失去了“仁”才提倡“义”,表达了老子对道、德、仁、义等概念的理解和对社会发展变化的一种思考。老子认为,“道”是宇宙万物的根源和本质,是一种超越人类认知和语言描述的最高存在。通过脚注,韦利建议读者参考《庄子》中类似的论述,引导读者进一步阅读,加深对“道”和此句话内涵的理解。

4.3 林语堂译本脚注分析

林语堂译本中注脚共有179条,大部脚注出现在对《道德经》正文的翻译部分。其中关于意义阐释的脚注有94条,所占比重最大。背景描述脚注和分层递进脚注分别为34个和44个,深层铺垫脚注只有7个。

表3 林语堂译本中各类型脚注数量

脚注类型	引言	序言	正文	其他	共计
意义阐释	0	0	94	0	94
背景描述	2	4	25	3	34
分层递进	14	5	23	2	44
深层铺垫	4	0	3	0	7
共计	20	9	145	5	179

林语堂在其《道德经》英译本中,十分注重对中国文化典故的注释,通过脚注详细阐释典故的来源、含义和文化背景,使西方读者能够深入理解《道德经》中蕴含的丰富文化内涵。林语堂在引言中对《道德经》的翻译史和主要译本进行了介绍,并在脚注中补充道“参见笔者在《中国与印度的智慧》一书中《道经》的导论部分,第579页”^[7]。这是林语堂《道德经》英译本导言中的一个例子。林语堂总结了西方翻译的《道德经》译本数量,但没有列出这些译本的具体信息,而是让读者在他的另一本书中找到答案。这样的方法可以激励读者阅读译者的其他著作或译作,让读者了解《道德经》研究在学术领域的发展,使读者对《道德经》有一个更全面、宏观的认识。

林语堂将“故善人者不善人之师,不善人者善人之资”翻译为“Therefore the good man is the Teacher of the bad. And the bad man is the lesson of the good.”并在脚注中对“资”的内涵进行补充说明“资,原料,资源,帮助,借以获利的东西,如教训。”^{[7]156}在中文中,“资”字有“财物,地位,天资,资料”等含义。在这个句子中,“资”有“经验教训”的意思。而在英语中,“lesson”有“经验教训、课程”的内涵,林语堂将“资”翻译为“lesson”,并在正文最下方添加脚注,避免因翻译造成对文本的误读。通过在文本页的底部添加解释脚注,对具体的翻译进行解释说明,使译文更加生动、准确地传达原文内容,帮助读者更好地理解复杂的概念或理论,从而提高译文的可读性。

五、三个英译本脚注的比较与启示

5.1 脚注内容的异同

通过对三个英译本脚注的详细分析,发现三个译本脚注内容存在明显差异,涵盖了文化背景阐释、宗教关联、文字训诂、思想内涵挖掘、时代背景关联、学术研究成果引用等多个方面,反映了中国文化和中华典籍走向世界的过程。首先,就脚注的数量而言,三个译本的脚注数量变化显示了中华典籍外译的历时特点。早期译本往往展示更多的脚注,内容也倾向于学术性。近年来出版的译本脚注较少,甚至没有脚注。理雅各的译本出版于东西方文化交流的早期,西方传教士开始在中国传教,所以译者在脚注中加入了很多中国文化内容和基督教概念,以帮助其传教活动顺利进行。韦利和林语堂的译本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出版的,西方人开始寻找治疗精神问题的方法,因此译者会在脚注中提供更多对道家思想内涵的解释,以满足读者对译本的阅读期待。

就脚注的具体内容而言,三个译本各有特点。詹姆斯·理雅各的译本脚注重文化背景阐释和宗教关联,通过大量引用中国古代文献和将《道德经》与基督教义相关联,为西方读者提供了深入了解中国文化和哲学的途径,但也存在因过度关联基督教义而导致对《道德经》原意曲解的问题;亚瑟·韦利的译本脚注侧重于思想内涵挖掘和对原文的词语和关键词含义的挖掘,通过脚注的形式向读者深入分析了原文中的哲学思想,显示了译者对《道德经》的深刻理解;林语堂的译本脚注内容则集中于文化典故和个人理解与感悟,通过对文化典故的详细阐释和融入自己对道家思想的独特见解,使西方读者能够更好地领略《道德经》所蕴含的文化魅力。

5.2 《道德经》英译本中脚注内容对文化传播的启示

詹姆斯·理雅各、亚瑟·韦利和林语堂的《道德经》英译本脚注都从不同角度对中国文化的传播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为西方读者打开了一扇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窗口,促进了东西方文化的交流与融合。脚注作为解释学的桥梁,帮助读者跨越《道德经》的哲学和历史鸿沟。副文本能为读者提供了解释文本所必须的原文化背景知识。中国典籍通常包含多学科知识,具有很大的阐释和解读空间。由于《道德经》固有的文化属性,译者在翻译这些文本时需要添加大量的副文本内容,如引言、评论、脚注等。通过脚注,译者得以对文本中涉及的人物和事件进行详细的说明,帮助读者建立相应的知识框架,以达到更准确理解原文含义的目的。

此外,脚注有提供相关文献的作用,为目标读者进一步了解中国文化提供了便利。译者在翻译时参考的其他译本、相关文献等内容都可以在脚注中展示,对读者进行深入研究有很大的帮助。理雅各英译本中脚注内容学术性显著,他的脚注详尽而细致,力图精确传达《道德经》的原意。他对《道德经》中的文化观念、历史背景等作了详尽的考释,并在脚注中对其他译者的译法进行展示,在处理译者不确定的文化内涵或翻译时,通过引用其他学者的阐释,避免因文化差异而造成的误读。

六、结语

本研究从副文本理论出发,深入剖析了詹姆斯·理雅各、亚瑟·韦利、林语堂三个受到学界和普通读者广泛认同的《道德经》英译本中的脚注内容,揭示了脚注在《道德经》英译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和价值。脚注作为一种

重要的副文本类型，在翻译中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具有多种功能。脚注能够解释文化背景，帮助读者跨越文化障碍。由于不同语言和文化之间的差异，源语文本中包含的文化元素，如历史典故、风俗习惯、宗教信仰等，对于目标语读者来说可能十分陌生。通过脚注，译者可以对这些文化元素进行详细的解释和说明，使读者能够更好地理解文本的内涵。脚注还能提供补充信息，丰富读者对文本的认知。译者可以在脚注中提供与文本相关的背景知识、作者的创作意图和其他学者的观点等信息，这些补充信息有助于读者更全面地理解文本，加深对中华文化和中国传统哲学思想的认识。

参考文献:

- [1] Genette G. translated by Jane E. Lewin, *Paratexts: Thresholds of Interpretation*[M].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
- [2] 蒋辰雪. 文树德《黄帝内经》英译本的“深度翻译”探究[J]. 中国翻译, 2019, 40(5): 112-120, 190.
- [3] 张佩瑶. 从“软实力”的角度自我剖析《中国翻译话语英译选集(上册): 从最早期到佛典翻译》的选、译、评、注[J]. 中国翻译, 2007, (06): 36-41.
- [4] 温馨儿, 赵霞, 王茜亚, 等. 深度翻译视角下杨守忠《脉经》英译本的副文本研究[J]. 环球中医药, 2023, 16(10): 2096-2100.
- [5] Legge J. *The Text of Taoism*[M]. New York: Dover Publications, 1962:181.
- [6] Waley A. *The Way and Its Power: Lao Tzu's Tao Te Ching and Its Place in Chinese Thought*[M]. New York: Grove Press, 1958:146.
- [7] Lin Yutang. *The Wisdom of Lao-tse*[M]. New York: The Modern Library, 1948:3.

A Study on the Cultural Interpretation of the Footnotes in the English

Translations of *Tao Te Ching* under Paratext Theory

Yang Baixue

Xinjiang University, Urumqi, Xinjiang

Abstract: As a classic of Taoism, the cross-cultural dissemination of *Tao Te Ching* has profound significance for world philosophy and cultural exchanges. Although it is only about five thousand characters long, it is characterized by profound connotations and ambiguous semantics. Existing translation studies mostly focus on language transformation and cultural transmission, and in-depth studies on the content of the paratexts in English translations are rarely seen, and studies on footnotes are even rarer. For a translation work, footnotes not only serve to supplement and explain the original text, but also are a direct reflection of the translator's cultural stance and translation concepts, playing an indispensable role in the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 of *Tao Te Ching*. Guided by the paratext theory, this study conducts an in-depth analysis of the footnotes in the three English translations of *Tao Te Ching* by James Legge, Arthur Waley, and Lin Yutang, and explores their functions and characteristics in cultural interpretation and assisting readers in understanding the text.

Keywords: *Tao Te Ching*; Paratext theory; Footnote

《白鹿原》的性别文化意识分析

李昊军^{1*} 赵晓倩²

(1.广西民族大学, 广西 南宁 530000, 2.泰山学院, 山东 泰安 271000)

摘要: 本文旨在用性别文化的视角重新解读《白鹿原》, 并从历史、文化和社会三个维度对小说中的性别文化意识进行全面剖析, 深入探讨《白鹿原》中的性别与文化冲突问题。通过对小说中不同性别人物的分析, 揭示传统性别文化对女性角色的压抑。文中性别文化的冲突也推进了小说情节的发展, 并推动性别平等观念的产生。本文通过阐述社会规范与性别歧视对风俗文化的影响, 促使人们反思传统的性别观念和社会制度, 推动性别平等的实现。

关键词: 性别文化, 性别观念, 白鹿原

DOI: doi.org/10.70693/rwsk.v1i5.1008

引言

《白鹿原》是陈忠实以陕西关中地区一个名为白鹿原的村庄为背景创作的中国当代小说, 于1993年出版。这部作品充分地展现了20世纪中国农村社会的变迁和变革: 白鹿原充满浓厚封建宗族气息, 呈现了那个时代社会性别关系的真实情况。因此, 深入分析《白鹿原》中的性别文化具有重要意义。通过对《白鹿原》角色和性别意识的研究, 对分析小说中不同性别角色的性格和命运, 从而揭示封建社会中女性所面对的困境与无奈。

一、性别文化分析相关概念界定

社会性别理论把人的性别分成生理性别和社会性别。生理性别是与生俱来的生理上的男女差异, 由第一、第二性征来分辨, 主要包括生理男性和生理女性。由于生理性别的客观存在, 由生理性别决定的男性和女性, 必然存在一定的差异。性别文化区别于其他文化现象的特征在于“性别”, 它不仅指生理性别(sex), 还包括建立在生理性别基础上的用来指称“风俗、价值及行为的综合的”社会性别(gender)。性别文化的内涵可以从四个层面进行分析: 价值观念、伦理道德、风俗习惯和制度规范。性别文化是指反映两性特征、需求、行为、关系的价值观念、伦理道德、知识能力、风俗习惯、制度规范等方面的意识形态及其表现。作为文化的种概念, 性别文化在内涵上区别于其他文化现象的特征在于“性别”。在我国传统性别文化“男尊女卑”的价值观念影响下, 产生了“重男轻女”的传统生育观念, 即大众普遍认为男孩的价值高于女孩。

性别文化分析能够揭示社会性别关系的不平等现象。不平等的社会性别关系是指在社会生活中, 男性和女性所扮演的角色和地位的差异。然而, 这种差异并非天生, 而是由社会文化因素所决定的。性别观念是指人们对于男性和女性角色和地位的看法和认知。然而, 这种认知并非天生, 而是由社会文化因素所决定的。性别观念是在身份认同中逐渐产生的, 身份认同(identity)事实上包含了两个概念: 一是身份, 即“某个个人或群体据以确认自己在一个社会里之地位的某些明确的、具有显著特征的依据或尺度, 如性别、阶级、种族等”; 二是认同, 即“某个人或群体试图追寻、确认自己在文化上的‘身份’”。因此, 探索性别认同问题的首要困难在于如何定义“性别”。何为女性、何为男性, 这既是研究的出发点, 也是问题的争议所在, 而围绕性别文化研究正是从解构这一概念开始的。

综上所述, 性别文化分析作为一种重要的社会学研究方法, 它关注社会性别关系、性别观念和性别行为, 运用性别文化分析理论并能够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白鹿原》中诸如重男轻女、男尊女卑此类的性别文化现象, 从

作者简介: 李昊军(2003—), 男, 硕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为生态美学;

赵晓倩(2002—), 女, 学士, 研究方向为中国语言文学。

通讯作者: 李昊军

而揭示性别不平等的根源。

二、《白鹿原》的性别角色塑造

作者通过对《白鹿原》中不同个体的刻画,展现了20世纪中期农村性别角色的变迁。其中,男性角色作为故事的主要载体,不断追求权力和地位。这种冲突使他们的角色更加立体和丰富。同样《白鹿原》中也有大量反映农村社会女性意识变迁的情节,这些女性角色在家庭中往往承担着传统的角色,如妻子、母亲和女儿。但在社会和家庭之外,她们也面临着现代化的挑战,这种矛盾使得白鹿原上女性的命运更加复杂和丰富。

(一) 男性角色

在《白鹿原》中,家庭中的男性角色不得不面对内部冲突,捍卫家庭利益,这种冲突塑造了他们矛盾和挣扎的性格。

在政治上,顺随历史的惯例,男性往往面对着更多的政治斗争和权力斗争,这种斗争源于历史遗留、宗族观念等各种复杂的因素,比如白嘉轩与姐夫朱先生二人退清兵,黑娃参加农协、参加革命军,鹿兆海“退共参国”等,作品依照当时的时代背景,大多数政治事件由男性角色主导,而常常缺失了女性角色参与的描写。但作者在文本中也对女性作为男性角色政治附庸的情态进行描写,白嘉轩与姐夫朱先生二人退清兵时,作者着重写了吴仙草和朱白氏身在军营中的情节,也在读者的阅读过程中增加紧张感。

在社会中,男性角色同样需要面对各种压力,作者塑造了一批以白嘉轩为首的承担着家庭和生产重任的男性角色,同时也有试图游离在宗法祠堂之外但最终选择回归宗族的黑娃。白嘉轩在白鹿原承受着作为族长的政治压力、经济压力等。这使得他的性格中无意识地产生了一部分权谋和算计,例如在与鹿子霖换“白鹿”宝地时,他不仅需要保障自己的地位和利益,也需要应对来自冷先生、朱先生乃至事后鹿家的压力;再如白嘉轩任族长伊始,计划修缮白鹿祠堂时,遭到鹿家乃至族人的反对。白嘉轩第一个念头是用自家的钱去修祠堂,这虽显示了白嘉轩的大公无私,但也是那个年代男性角色不得不承担的社会压力和经济压力的具体体现。

(二) 女性角色

女性角色通常扮演着传统的角色,她们承担照顾家庭,抚养子女,维护家庭的稳定和谐的责任。但在全书前半部分以男性为主导的白鹿原,女性大多只能沦为生育机器和劳动机器。白嘉轩对自己一生里娶过七房女人这件事引以为豪壮。甚至作为女人的白赵氏(白嘉轩的母亲)也曾说:“女人不过是糊窗子的纸,破了烂了揭掉了再糊一层新的。死了几个我准备给你再娶几个,家产花光了值得,比没儿没女断了香火给旁人占去心甘。”这也体现出在二十世纪的白鹿原,女性更像是一种传宗接代的物件,而不是一个具有人格尊严的人。然而,随着社会局势的改变和现代化的进程,女性的传统角色开始受到挑战,显得更加多元:敦厚踏实的吴仙草、试图抵抗却被封建礼教深深残害的田小娥、坚定突破封建束缚的白灵等。这些角色的塑造也反映了作者对性别平等的倡导和对传统性别观念的挑战。她们不仅要承担传统的家庭角色,还要在家庭之外面对现代化的挑战。但白灵的出现打破了这一传统观念,她以死相逼,以一种相当决绝的姿态去城里念书。来自家人的反对不仅没有阻碍白灵,反而成为她的磨刀石,更坚定了她革命的意志。交织在传统和现代性别观念的这种矛盾使得当时女性的命运更加复杂和丰富。

女性角色的传统与现代之间的矛盾也体现在她们的情感和心理上。在传统的家庭角色中,女性角色通常扮演着温柔、顺从的角色。就如冷秋月作为白鹿原冷先生的女儿,因父母之命嫁给鹿兆鹏,顺从地度过了自己的后半生,却因此而得“淫疯病”,从而被亲生父亲下了重药,从而离世。可见即使以生命为代价,生长在传统环境下的女性也很难挣脱出封建的藩篱。然而,近代以来的思想现代化让女性角色的情感和心理也开始发生变化。她们开始有了自己的欲望和追求,不再只是被动接受传统的角色,更有选择自己身份的机会。这种变化使得女性角色在情感和心理上变得更加复杂和丰富。从时间顺序纵向对比来看,前期的田小娥饱受郭举人的荼毒,虽有反抗的心理,但受条件限制,处处掣肘,只敢偷偷用尿液泡枣,不敢正面反抗。而后期的白灵却敢直接在鹿子霖脸上撒尿,此种转变也能从中看出田小娥为争取自己独立的人格而公开抵抗封建礼教的勇敢追求;白灵追求婚恋自由,白灵因信仰不同而放弃鹿兆海,最终选择和鹿兆鹏在一起。虽然后期白灵的叙事相对破碎,但这也体现了白灵作为白鹿原为数不多接受过新式教育并且具有“婚恋自由”意识的女性,看似叛逆的行为背后实际上是对传统性别观念的冲击。

三、《白鹿原》中的性别文化关系

(一) 家族关系

父亲这一角色在家庭中拥有绝对的权威,这来源于传统社会中的男性地位和权力。在传统的男性主导社会中,女性“在家从父,出嫁从夫,夫死从子”,男性天然的被视为家庭的顶梁柱,拥有支配整个家庭的决策权。

而母亲在家庭中的地位相对较低,她需要服从父亲的权威,并承担起照顾家庭和子女的责任。这不仅源于她的生理性别角色,也源于她的社会地位和经济地位。传统的农耕社会中,拥有较强体力的男性有着较高的权力和

地位,因此在传统的家庭结构中,女性被视为家庭的附属品,她们的地位和权力往往取决于男性的地位和权力。

在《白鹿原》中,父权、夫权、封建大家长与子女关系的表现形式,反映了性别不平等和社会压迫的存在,这使得家庭内部存在着巨大的矛盾和冲突。这种矛盾和冲突不仅发生在家庭成员之间,也体现在家庭成员与社会的关系上。

(二) 社会关系

在社会关系中,男性往往拥有主导地位,而女性则处于被动地位。这种不平等的性别关系使得女性在工作、生活等方面受到了不公平的待遇。在《白鹿原》中,我们可以看到大量的描绘了农村社会生活的场景,女性的工作往往限于农田和厨房,而男性却可以从事其他更多的行业,例如军人、医生等。

此外,在教育方面,女性受教育的机会和质量往往较低,并且大多只有《女则》、《女训》此类封建糟粕,男性在受教育的机会和质量上更有优势,在白嘉轩主张开设的学堂里,大多都是男孩,并且传授四书五经。这种性别不平等的现象,使得也使得教育的天平倾斜,侵害女性学习的权益。

(三) 社会规范与性别歧视对风俗文化的影响

在《白鹿原》中,社会规范与性别歧视是性别关系的重要表现。社会规范对性别关系起着重要的制约作用,而性别歧视则使得女性在家庭和社会中遭受不公平的待遇。

首先,在小说中,社会规范对性别关系起着重要的制约作用。例如,在传统农村社会的风俗文化中,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男女之间的婚姻是由家长安排的,男性可以娶多个妻子,甚至引以为豪,而女性在伦理上则只能嫁一次人。这种传统观念下的婚姻制度体现了当时的社会规范,对男女之间的平等关系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譬如冷秋月,即使冷先生不在乎鹿兆鹏给出休书,但在白鹿原中的两大家族之一的大家长——鹿子霖的眼里,休妻对女性的打击几乎是毁灭性的。而社会规范对白鹿原风俗文化的影响从田小娥身上也可窥见一二:黑娃将小娥带回来,却被众人指责,甚至终生不能进入白鹿祠堂。但后期小娥死后,黑娃选择重归白鹿原,娶了高玉凤,接受朱先生的教育,从而得以重返祠堂。如此可见,白鹿原的社会规范对于风俗的引导更偏向于男性角色,男人即使做了诸多错事,但只需重新按照秩序来做便可以叫做“改邪归正”或者“浪子回头”,女人即使本本分分,只要略有错处,也会被打上邪恶的标签。小娥被鹿三杀死后,村里恰好爆发了一次大规模的瘟疫,这本是一次简单的自然灾害,但村民却将此现象归咎于死去的小娥,将其视作妖女,族长白嘉轩更是决定盖一座六棱镇妖塔来解决此次瘟疫。诸如此类的社会规范和性别偏见使得白鹿原一带的风俗文化也更重视于男性。

性别歧视在《白鹿原》中的表现为小说中的女性往往受到相对于大多数男性角色不公平的待遇,这种现象反映出当时社会对女性的歧视。例如,在婚姻中,女性往往被视为男性的附庸,即使丧偶,也很少被允许改嫁,而男性则可以娶多个妻子。郭举人有正妻的同时还纳了田小娥为二房,在郭举人眼里,小娥被物化为泡枣和发泄性欲的工具,甚至其妻子也成为了男性权利结构的附庸,和郭举人一起压迫小娥,她允许郭举人娶二房,并定下“每月逢一”才能“逍遥一会”的规矩。女性在家庭和社会中遭受不公平的待遇,这种婚姻制度体现了当时社会在婚姻关系里对女性人格权利的漠视。

四、《白鹿原》中的性别文化变迁

(一) 传统与现代的冲突

《白鹿原》通过塑造男性和女性在家庭和社会中的形象,来展现传统与现代的性别文化冲突。

在性别角色方面,传统观念中的男性天生就是封建家庭的大家长,包括掌控女人和孩子的一切;而女性只能以相夫教子为己任,负责家庭的内务。然而,随着现代化进程的推进,尤其是近代改革开放以来,女性的社会地位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提高,她们不仅参与到了社会经济活动中,还逐渐在家庭中占据了主导地位,使得家庭观念更加民主、开放和人性化,从而推动了家庭文化的多元化和包容性。这使性别角色的性别文化意识发生了巨大的转变,仙草因病去世后,从白嘉轩的恸哭里能体会到他对于性别观念男女关系的改变,女人不是生孩子、照顾公婆的工具,婚姻关系应当是两个人彼此作为对方的依靠。由此可以看出,此阶段白鹿原的家庭结构发生了变化,婚姻观念和亲子关系也发生了相应的调整。

在社会规范方面,传统与现代的冲突主要体现在道德观念、法律制度和人际关系等方面。在传统社会中,道德观念以“三纲五常”为核心,强调的是家庭伦理和个人道德修养;法律制度则以家族法和乡规民约为主,主要维护的是家族和乡里的利益。然而,法治国家的建立标志着道德观念逐渐从家族和乡里转向了国家和民族,法律制度也逐渐从家族宗法转向了国法和人法。这种变化使得社会规范更加公正、公平,推动了社会文化的规范化和包容性。

(二) 社会变迁对性别文化的影响

《白鹿原》描绘了中国北方农村社会的变迁历程,通过讲述白鹿原上两个家族的纷争,展现了社会变迁对性别文化产生的深远影响。

首先,随着社会变迁,性别关系发生了变化。就像传说里神人降世都会出现异象,在《白鹿原》中,自白灵出现伊始,便用“百灵”、“白鹿”等带有奇幻色彩的意象来烘托此女的不凡。而后许多情节也围绕白灵的叛逆展开:从求学、恋爱、离家到入党,她在自主的反叛中完成从传统到现代的“蜕变”。传统的男尊女卑观念受到了挑战。

此后随着新思想、新文化的传播,女性的地位逐渐得到提升,女性开始有了更多的社会活动空间和权利。同为自由恋爱的破局者,田小娥却在性别思想观念最牢固——封建社会的末尾开始追求自由恋爱,但命运却把她定格在了白鹿祠堂的耻辱柱上,挣脱不过命运的变幻。她们观念的变化不仅打破了传统的性别界限,也为性别平等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其次,作者将人的性欲作为反映人性的突破点,传统礼教模式下的人们情爱受制于礼教观念,“白鹿原的男性白天唾弃田小娥,晚上却私会田小娥”,人性被压抑于礼教之下,正是传统的理学观念将田小娥压在了传统性别观念的“镇妖塔”下。白灵的出现代表了社会变迁,性别文化随之发展,推动小说中的婚姻观念发生了变化,年轻人开始追求个性解放和自由恋爱,不再受制于传统的婚姻观念。同时,随着社会的进步,性别文化也发生了变化,女性开始关注自己的精神世界,追求个性和独立。这种变化不仅推动了性别文化的进步,也为社会的和谐发展做出了贡献。

结语

《白鹿原》是一部具有深厚文化内涵的小说,其中蕴藏着中国近现代的性别文化变迁史。作者通过描写各种不同出身、性格迥异的女性角色相同的悲惨结局,传达出了“无论顺从还是反抗,那个时代的女性终究无法跨过时代的鸿沟。”这一观点。作者将美好的角色毁灭在读者眼前,从而激起人们对千百年来处于弱势地位的女性角色的同情。小说中的白灵并非传统意义上的弱者,而是具有独立思考 and 判断能力的个体。她在家庭性别观念转变和社会发展中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用实际行动证明了女性也可以像男男性一样接受教育,参与各类活动,并甘愿为自己的信仰献身。文中白灵这种女性独立观念的实践,有利于促进男女两性形成在社会价值、地位作用方面的客观正确认识,也能推动性别平等观念的传播。

参考文献:

- [1] 王凤华,贺江平等.社会性别文化的历史与未来[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2-36.
- [2] 李亚楠. 同妻群体的反抗行为[D]. 哈尔滨工业大学, 2013: 13.
- [3] 陈后亮,吴丹妮.身份认同 衰老焦虑与性别平等:当代西方文化老年学关键议题研究[J].社会科学研究,2024,(02):186-192.
- [4] 陈忠实.《白鹿原》[M].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1:10.
- [5] 彭淘.多重历史隐喻——《白鹿原》的叙事策略[J].文山学院学报,2023,36(06):87-93.

Analysis of Gender Cultural Consciousness in White Deer Plain

LiHaojun¹, ZhaoXiaoqian²

¹ Guangxi University for Nationalities, Nanning, Guangxi

² Taishan University, Taian, Shandong

Abstract: This paper is aimed at analyzing White Deer Plai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gender culture. It comprehensively examines the gender consciousness in the novel from the three dimensions of history, culture, and society, and deeply discusses the significance of literature as a medium to express and shape gender consciousness. By analyzing the diverse gender characters in the novel, the study reveals the repression of traditional gender culture on the female role. Furthermore, the investigation is focused on the gender and cultural conflicts in White Deer Plain, which are primarily reflected in two aspects: one is the conflict between traditional gender concepts and the transformations of modern society, and the other is the conflict between male and female cultural identities. The conflict of gender culture also promotes the development of the novel's plot and the emergence of the concept of gender equality. By explaining the influence of social norms and gender discrimination on customs and culture, this paper encourages people to reflect on traditional gender concepts and social systems. It calls for analyzing the gender cultural consciousness of thousands of years from different perspectives and striving to promote the realization of gender equality.

Keywords: Gender Culture; Gender Concept; White Deer Plain

基于“互联网+”的电工电子课程数字化教学模式探究

付亚坤¹ 于晟伟^{1*} 何永明^{1*}

(1.中国消防救援学院, 北京 102202)

摘要:教育数字化转型相关的发展战略,旨在将数字技术融入教育,推动教育全要素、全领域和全过程的数字化转型。面对学情和教学痛点,根据电工电子课程的学科特点和教学内容,以教学成果为导向,基于“互联网+”数字化教学模式设计全新的电工电子课程教学,完善并开发数字化教学中的四大元素,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和数据分析技术开展个性化、差异化、多元化教学的教学模式,有效地利用数字化教学资源,通过教学重构实现“互联网+”与课程教学深度融合,实践以学生为中心的学思结合、知行统一、因材施教的教学目标。体现以学生为主体、以教师为主导的教学过程,在提高教学质量和学习效果的同时实现全方位育人。

关键词: 电工与电子技术; 互联网+; 数字化; 教学资源; 教学方法

DOI: doi.org/10.70693/rwsk.v1i5.1011

一、引言

随着5G技术的诞生,世界各国纷纷实施与教育数字化转型相关的发展战略,旨在将数字技术融入教育,推动教育全要素、全领域和全过程的数字化转型。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提出“推进教育数字化”;《教育部2022年工作要点》中也明确提出“实施教育数字化战略行动,加快推进教育数字转型和智能升级”的建设要求。教育的全面数字化转型事关我国高质量教育体系建设,已成为必然趋势。在以培育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专业应用型人才为办学目标的前提下,教学组面对学情和教学痛点,根据电工与电子技术课程特点和教学内容,以教学成果为导向,将数字化教学模式带进课堂,有效地利用数字化教学资源,通过教学重构实现“互联网+”与课程教学深度融合,实现教学环节的全方位数字化^[1,2]。通过平台融通互联,整合共享优质资源;应用场景导向,科学设计课堂空间,升级教法学法,探索课堂模式创新;通过线上数据准确反馈课堂教学有效性;利用人机多维交互的便利,协同促进深度学习,让学生学会学习,为后续的学习及任职奠定基础。

电工电子课程是电气工程学和电子信息学的合称,是具备明显基础性、综合性、跨学科性的新工科课程^[3,4]。本课程理论与实践并重,实践环节以工程应用为导向,以巩固和深化学生理论知识为目的,培养学生解决实际工程问题的能力。消防救援学院以培育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专业应用型人才为办学目标,生源渠道包括消防救援队伍基层优秀的消防员和全国高考统一招生两种。面对学生文化基础参差不齐、网络原住民的学生、视觉型学习习惯以及碎片化学习时间的特点,存在课堂沉浸感不高、资源形态较落后、互动形式较简单、评价方式较单一、教学效果差等不足,难以适应教育高质量发展对课堂环境、资源、交互与评价的新要求,不符合人才培养目标的总要求,在实现知识目标、能力目标和情感目标的教学过程中不能很好地体现课堂的两性一度。因此通过进一步分析人才培养目标要求,分析并把握学生学习特点,准确定位教学资源的真实现状,亟需满足学生个性化需求,契合学生学习习惯,吸引其学习兴趣的新的教学范式设计思路,充分利用“互联网+”丰富的数字平台实现教学资源的整合,建立以信息技术为支撑的信息化课堂,体现“以学生为主体,以教师为主导”的教学过程,在逐步完善的数字化教学环境中提高教学质量和学习效果,实现全方位育人。

二、数字化教学模式探究

通过教学改革思考与实践,在逐步完善的数字化教学环境中,将现有的数字化教学资源进行整合,应对学

作者简介: 付亚坤(1981—),女,硕士,副教授,研究方向为电工电子、大学物理教育;

于晟伟(1995—),男,博士,讲师,研究方向为偏微分方程、次黎曼流形、动力系统、复杂网络、高等数学教育;

何永明(1978—),男,硕士,副教授,研究方向为抗洪抢险、高等数学教育。

通信作者: 于晟伟,何永明

生学习特点,从培养学生兴趣入手,以互联网为基础的教学手段覆盖学前、学中、学后以及评估四大阶段,全方位实现数字化课程教学。我们利用数字技术的导入,赋能课堂创新,利用线上线下融合的学习氛围,实现人机多模式交互,采集多模态数据信息,促进学生的学习与实践^[5]。在培养学生分析能力和思维能力的同时,锻炼学生动手动脑的能力,充分发挥数字化教学模式的优势,拓宽信息获取渠道,让学生学会学习,为后续的学习及任职奠定基础。

(一)“互联网+”环境下的电工电子课程素材类数字教学资源的再完善,形成具有消防特色的四库一册,实现教学资源的系统化、层次化、网络化建设

基于教学内容、教学对象的分析和教学目标的要求,课程以 OBE 教学理念为导向,结合消防救援队伍对人才能力素质的需求,经过精心的教学设计,以互联网思维构建的数字化教学模式为指导,建立数字化课程资源体系,完善与之匹配的数字化教学资源,贯穿于教学全过程,详见图 1。



图1 教学过程与学习资源关系图

从教学需求出发,构建以教材为中心,符合教学过程的系统性多元化且可拓展的教学资源库,为教学活动提供丰富的素材和工具^[6-8]。通过收集、组织、整理和开发了不同来源的教学资源,实现数字教学资源的整合。按照教学章节内容将所需的媒体素材、试题、试卷、文献资料、课件、案例、常见问题解答进行目录索引化,选择针对性强、适用范围恰当的互联网数字素材,并对日常积累的文字资料包括试卷、试题、常见问题解答等进行数字化处理,形成了具有消防特色的四库一册,包含实现课前预习与课后提升的优质慕课资源库,辅助课上练习与课题研讨的雨课堂课件库,课堂上帮助理解抽象内容且可嵌入电子课件的文本、图像、视频等知识手册,实现学生能力素质培养的课程思政资源库,实验中促进师生互动的仿真案例库以及课后帮助复习、练习的思维导图与视频等多种媒体库等。通过学院的智慧教学平台,各类资源之间相互配合,覆盖教学全过程,其分布式存储和网络化传播,可供学生多次访问和使用。

(二)面向学情,直击教学痛点,用互联网思维构建电工电子课程的数字化教学模式,以数字化资源重构教学空间,实现电工电子课程教学过程与方法数字化、网络化创新

根据课程理论性与实践性兼具的特点,把握以学生为中心、教师为主导的原则,数字化教学过程全方位覆盖理论教学和实验教学。依托在线教学平台和虚拟仿真实验室,结合数字化教学资源,实现“互联网+”的教学模式,构建线上+线下、虚拟+现实、仿真+实体的数字化教学模式。

基于 BOPPPS 教学模型,利用智慧校园雨课堂教学平台实现理论课内容的预习、作业、复习、测验、研讨五个涵盖自学和师生互动环节^[9];打破传统实验预习无序和实验课时有限的壁垒,利用虚拟仿真实验室和电工电子实体实验室共同完成线上+线下、仿真+实操的叠加模式,有效拓展课堂,更好地激发学生学习兴趣,引导学生自主学习,促进教与学双方的多维度交流,拓宽师生、生生之间线上和线下交流渠道^[10,11]。在“互联网+”背景下灵活应用不同的教学模式,设计正式学习与非正式学习相融合、引入游戏化学习、创设开放性的学习环境等多样化的教学活动,实现教学过程与方法的数字化、网络化创新,详见图 2。



图2 数字化教学工具的复合使用

以雨课堂为平台，应用于课前、课中、课后整个教学环节。根据学生碎片化学习时间以及视觉型学习习惯的特点，课前将知识点视频辅助有针对性的预习题，并结合引发思考的讨论题构成预习雨课件的形式向学员发布预习任务；课中利用多媒体将图像、声音、动画、视频等数字化资源与教学内容有机结合，根据教学内容选择不同案例，适时融入对应的思政元素，采用翻转课堂、情境探究、差异化教学、研究性学习，以及微课自学等多种模式完成教与学的交互，将虚拟仿真穿插在理论教学环节，更加直观地将理论和应用结合；课后作业或者研讨任务，辅以典型例题讲解视频植入雨课堂，设定作业要求，督促学生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通过分组学习、线上讨论促进学生之间、学生与教师之间的合作和交流。在即时通讯和协作工具的辅助之下，可以实现远程教学和一对一辅导，跨越时空限制，提供个性化的学习支持，实现多维度人机交互，协同促进深度学习。

以岗位任务为驱动力的“互联网+”环境电工电子课程素材类教学资源四库一册，实现课堂教学空间的数字化重构，大幅度提升了教学团队的数字素养，实现了全方位技术赋能教学；对学员来说，充分满足学员理论知识个性化需求，受到了学员的一致好评，促进了学员的学习热情。

（三）基于智慧教学平台全方位、多层次把握学生学习情况，覆盖教学全过程、多维度、多样化的数字化教学评价体系的建立

教学评价体系不仅是对教师教学过程的评价和学生学习过程的评价，更重要的是通过对教与学的双向评价，反思教学过程和教学方法。用“互联网+”的数字化教学评价体系与教学过程相对应，全面多维地评价学生的学习过程、学习成果、知识应用能力进行，综合考察学生在学科知识和理解、问题解决和批判性思维、创造力和创新能力、沟通和合作能力、自主学习和承担责任以及社会和文化意识等方面的成长过程^[12]。数字化评价采用线上+线下相结合的复合评价模式，线下评价主要从课堂上师生互动、课堂测验、小组合作、实验操作、问卷调查等方面展开，了解学生线下学习的真实情况；线上评价则是通过实时记录学生的学习过程以及学习效果，比如观看学习视频的时长、视频的查阅次数、自我检测错题知识点分布、情景模拟的场景数量、虚拟仿真实验过程等方面展开，其详细的数据记录与显示，为教师分析学生学习参与程度、学习态度、自主探究、合作情况以及创新情况考量提供基础数据，详见图3。



图3 数字化评价体系结构图

线上评价与线下评价相互辅助，互相验证，为得出较为准确的教学评价结果提供了依据。通过数字化教评价的实时性能够指导教师及时作出教学计划调整，更有针对性的辅导学生；学生也能够通过评价对自我的学习情况进行复盘，与同学互评学习成果，互相激励培养积极的学习态度。

同时借助互联网+，持续性提升教师的知识和技能，增强教师借助各自不同的信息技术来创造性地处理问题

的能力,以及对于不同渠道信息的分析、归纳与应用能力。通过各类资源的收集整理全面提升教师的数字素养,拓宽对于相关知识的应用领域,跳出固有的思维定式,有助于改善教学方法,提高教学水平,实现全方位技术赋能教学。通过线上与线下互动的教学模式,可以多渠道,全方位关注对学生创新能力和实践操作能力的培养效果,进一步拉近师生关系,让“教与学”形成良好互动,教学效果向好趋势明显。

三、结论

在数字化教学模式推进的过程中形成了规范化、层次化和体系化的数字化资源,满足理论知识与实验操作的个性化需求;用互联网思维构建电工电子课程的数字化教学模式,实现了了针对碎片化学习时间的“小课堂、大教学”;通过电工电子虚拟实验室的应用,完善了基于“互联网+”的数字化实验教学模块,通过教学重构实现“互联网+”与教学全方位深度融合;设计并建立多维度全过程数字化教学评价系,更加贴合教学评价实际,以更加灵活多样的评价机制考量学员知识素养和能力培养的效果。通过数字化教学改革创新突破传统课堂教学的藩篱,更加熟练地将可视化、动态化、立体化、形象化的学习内容应用于课堂,将合作、探究、自主等学习方式变为主流,增强学员的学习感受与学习效能,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动力得到了提高,综合素质得到了增强。师生共同协作建构高品质的课堂教学行为,将课程建设与应急救援人才培养更紧密的结合,与学校办学特色高度契合,为学院应用型人才培养贡献力量。

参考文献:

- [1] 李玉堂.“互联网+”背景下的课堂教学改革实践[J].北方民族大学学报,2024,3:107-112.
- [2] 刘鑫.“互联网+”视域下本科院校电子信息类专业课程体系改革研究[J].教育教学论坛,2024,32:96-99.
- [3] 马进,卫永琴,袁方,等.“互联网+”背景下“电工电子技术”课程创新教学模式研究[J].科技视界,2024,8:141-144.
- [4] 彭春.高职电工技术课程理实一体化教学模式探索与实践[J].科学咨询(科技管理),2023,7:247-249.
- [5] 吕值敏,唐斌.高职电工电子技术课程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模式探索[J].中国教育技术装备,2021,11:70-72.
- [6] 陆鹏.高职电工与电子技术课程教学改革创新探讨[J].现代职业教育,2016,28:159.
- [7] 宁金叶,罗小丽.基于“互联网+”的电工电子互动教学平台的构建初探[J].教育现代化,2017,4(48):96-98.
- [8] 赵飞燕.基于“互联网+”视域下的《电子技术基础》课程教学信息化模式应用分析[J].高教学刊,2018,22:71-73.
- [9] 张昀,于舒娟,李娟,等.基于雨课堂的《电工电子实验》教学改革与实践[J].科技视界,2019,29:158-159.
- [10] 龙世佳,司长代,周红燕,等.模块化智慧课堂评价探究:基于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模式[J].西部素质教育,2022,8(12):19-21.
- [11] 王玲,张浩,李世欣.混合式教学模式下电工学课程思政实施路径探析:以河南农业大学为例[J].河南教育(高等教育),2022,11:68-70.
- [12] 金石,王璐露,宛敏.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的反思与策略优化[J].中国大学教学,2022,11:72-77.

Research on Digital Teaching Mode of Electrical and Electronic Courses Based on “Internet plus”

Fu Yakun¹, Yu Chengwei^{1*}, He Yongming^{1*}

¹ China Fire and Rescue Institute, Beijing 102202, China

Abstract: The development strategy related to th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f education aims to integrate digital technology into education, promote th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f all elements, fields, and processes of education. In the face of learning conditions and teaching pain points, according to the subject characteristics and teaching content of electrical and electronic courses, guided by teaching results, and based on the “Internet plus” digital teaching mode, design a new electrical and electronic course teaching, improve and develop the four elements of digital teaching, use modern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data analysis technology to carry out personalized, differentiated and diversified teaching mode, effectively use digital teaching resources, achieve the deep integration of “Internet plus” and course teaching through teaching restructuring, and practice the teaching goal of student-centered combination of learning and thinking, unity of knowledge and practice, and individualized teaching. Reflecting a student-centered and teacher led teaching process, achieving comprehensive education while improving teaching quality and learning outcomes.

Keywords: Electrical and Electronic Technology; Internet plus; digitization; Teaching resources; teaching method

智能时代下设计的系统化转型研究

寇犇¹ 曹棵棵² 袁臣辉³

(1.黑龙江大学艺术学院, 黑龙江 哈尔滨 150080)

摘要: 21世纪以来,在时代不断发展,朝着可持续转型的过程中,复杂性不可避免地蔓延到更为庞大的系统之中。无论是产品和服务设计需要应对的复杂商业挑战,还是社会创新设计推动社区以及城市的关系转向更具包容性、更为复杂的系统思考与实践。颠覆性变革已不能再停留于过去的概念创意环节。单一方面的创新也难以支持真正解决问题与商业上的最终成功。当今时代呼唤,亟需系统化创新的嵌入。

关键词: 设计; 弗卢塞尔; 系统化; 可持续

DOI: doi.org/10.70693/rwsk.v1i5.1016

2015年,世界设计组织对设计定义进行了修订:“设计是一种将策略性解决问题的过程应用于产品、系统、服务及体验的设计活动,旨在引导创新、促发商业成功及提供更好质量的生活。”设计的疆域和边界也在日益扩张。设计领域正经历从单一产品创新向系统化思维转型的深刻变革。在应对复杂商业挑战和社会可持续转型的背景下,设计不再局限于物质创造,而是演变为整合技术、文化、生态等多维要素的系统工程。

一、系统性创新中的可持续设计

设计不仅仅是个体组件的组合,而是一个有机的系统,每个设计元素都应该与整体目标相符合,确保设计的每个部分在传递信息时彼此协调。设计的每个环节不仅服务于物理需求,更有责任传达文化、情感和社会价值。无论是产品的外形、功能,还是它的交互方式,都应当与整体设计中的信息流动和符号传递目标保持一致。“系统性思维就是将认识对象作为一个‘系统’来进行观察,从系统与要素、要素与要素、系统与环境之间的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等方面综合地考察对象的一种思维方式。”系统性创新设计展示了将可持续设计再度进行总体考量和协同优化的重要性。在传统设计中,可持续主要关注于个别产品的生命周期,包括资源消耗和环境影响。然而,系统性创新设计提供了一种更为完整的观点,将设计对象作为一个相互连系的复杂系统来考量。这种视角下,设计实现可持续的方法不再仅限于产品本身,而是要考虑产品与服务之间的相互作用,以及其与社会和环境系统的整体相关性。

威廉·弗卢塞尔的“非物质设计”理论进一步深化了系统性创新设计的理念。他认为设计是“欺骗”,这一观点来源于柏拉图对“质料与形式”的看法。柏拉图认为艺术家或技术员在将理念中的形式转换到现实世界中时,所制造的东西绝不会完全遵守理念的规定,这种缺失本身就是发生了背叛和扭曲,因此二者被认为是理念的“叛徒”和“骗子”,因为他们巧妙的诱使人们感知扭曲的理念。基于此,威廉·弗卢塞尔认为设计的本质就是一种“欺骗”。“弗卢塞尔将技术图像的产生置于人类宏大的历史语境中考察,构想人类文化进步由五级台阶构成,人类拾级而上走向文明。”^[1]基于这一观点弗卢塞尔认为,在数字时代,设计正在经历从物质到非物质的转变。设计的本质是形式,而物质只是形式的填充物。随着技术的发展,质料的种类变得越来越坚固,似乎趋向于不朽,但实际上,只有形式才是永恒的。“弗卢塞尔将“阻碍”定义为“关于物的状态的导论”,同时也认为设计在清除阻碍的过程中所产生的物品,同样会成为新的阻碍。”^[2]在数字时代,设计师的工作不再是创造物质产品,而是创造可以填充到各种物质

作者简介: 寇犇(1997—),男,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视觉艺术传播;
曹棵棵(2001—),女,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视觉艺术传播;
袁臣辉(2000—),男,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视觉传达设计。

中的“形式”或“内容”。这种转变意味着设计的价值不再局限于物质的创造，而是在于形式的创新和内容的传播。设计不仅仅是物质形态的创造，而是信息和符号的表达。设计的真正任务并非仅仅创造物品，而是通过物品的形式表达和传递信息。这种信息不仅体现在物质形态的视觉和触感上，还包括其背后的文化、社会和精神层面的传递。

在弗卢塞尔看来，设计的目的在于通过物品、符号以及交互方式去激发人的感知和思考，从而影响人的认知模式和社会行为。在他的理论中，物质世界与非物质世界之间的界限逐渐模糊，尤其在数字化时代，非物质设计的空间得到了极大的拓展。弗卢塞尔特别指出，随着技术的发展，设计将逐步超越传统物质世界的限制，进入一个更加抽象、灵活和多维度的领域。在这一框架下，设计不再单纯依赖于物体的硬性构造和制造过程，而是更多依赖于信息的传播、虚拟空间的创造以及人类感官与技术的交互作用。设计者在创作过程中，应该将重点从单纯的形态美学转向信息的生成与传播，使得设计能够在非物质层面产生深远的影响。

二、系统性创新中的整体性设计

“系统性思维就是将认识对象作为一个‘系统’来进行观察，从系统与要素、要素与要素、系统与环境之间的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等方面综合地考察对象的一种思维方式。”^[3]系统性的思维在交互设计、体验设计领域有着其重要整体性视角是系统性思维的核心之一，特别适用于分析复杂系统中各部分之间的相互关系。“系统性应是造物（设计）的本质属性，造物从来都不是脱离整体的局部。”^[4]在设计过程中，整体性视角要求设计师超越局部的、单一的设计问题，聚焦于事物之间的连接、互动及其背后的全局效应。“任何一个系统都包括三种构成要件：要素、连接、功能或目标。”^[5]这种视角帮助设计师将多个变量、层次和不同影响因素综合在一起，从而对设计进行更加深入和全面的分析。例如，在设计一个软件产品时，整体性视角不仅关注界面的设计，还要考虑软件的后端架构、用户数据流动、技术支持等多个层次的交互与兼容性。正如著名设计师和设计教育家查尔斯·伊姆斯（Charles Eames）所说：“设计不仅是产品的外观，更是解决问题的过程，它关乎如何通过设计将各个部分有效地组织起来，服务于最终的目标。”著名设计师如乔纳森·艾维（Jonathan Ive）和迪特·拉姆斯（Dieter Rams）认为，虽然其设计多以物质产品为主，但他们也强调设计应该具备深刻的社会性和文化性。艾维在苹果产品的设计中，强调基于材料特性的简洁性和易用性，同时注重信息和情感的传递；而拉姆斯则在其长期的产品设计实践中，提出了“少即是多”的设计理念，追求的是通过简洁的物质形态，传递出更深层次的功能整合。

在中国本土品牌中，整体性设计也逐渐被广泛采纳并成功应用。2023年发布的华为Mate 60系列手机也展示了整体性设计的重要性。华为将硬件、软件和生态系统进行了深度整合。例如，Mate 60系列配备了自研的麒麟芯片，并且支持5G网络、鸿蒙系统、华为云服务等技术的无缝对接，整体设计确保了这些技术能够协同工作，提升整体的性能和用户体验。这种整体性设计不仅限于单一产品，而是覆盖到整个生态系统，形成了一种完整的设计语言。另外，小米公司自成立以来，便注重通过“全家桶”的方式将智能硬件和软件服务系统化，形成统一的产品生态系统。在2023年，小米发布了米家智能家居控制中心，这款产品不仅能控制小米的各种家电设备，还能通过AI智能算法优化设备之间的互动，提高家居生活的便利性。米家的产品设计通过系统创新设计的整体性原则，将用户的需求、设备之间的协同关系以及科技创新有机结合，创造了更加高效、智能的家居环境。

事实上，面对市场的随机性和竞争性加剧，企业的重点将不再是以大量销售产品来盈利，而是提供给人们一种需求得到满足的“幸福感”来获得发展的空间。这也是传统制造业实现利润增长的新途径。使企业更有效地进行投入，并且从一开始就规划好从投入到产出和消耗，再到利用的循环过程。这样不但可以改善对环境的影响，同时由于资源的高效利用，必将带来可观的经济利益。

三、系统性创新中的动态适应性设计

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技术的进步，设计的环境变得越来越不确定。技术创新、用户需求的变化、市场竞争的加剧等因素，都会对设计产生影响。在这种快速变化的环境中，设计必须具备一定的灵活性和适应性。在设计实践中，动态适应性要求设计师能够预测和适应环境变化，确保设计在复杂的、快速变化的条件下依然能够有效运行。动态适应性不仅仅局限于解决当前问题，还包括识别未来可能发生的变化，并对其进行提前布局，以保证系统在不断变化的环境中保持其有效性和可持续性。中国设计师朱赢椿通过“虫子书”项目，将自然生态与用户体验相结合。他强调，“设计不只是形式的表达，更是人与自然互动的媒介”。他的作品通过将虫子元素融入书籍设计，引导用户反思自然保护与人类行为之间的关系，从而达到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相处。马斯·赫斯维克（Thomas

Heatherwick) 曾表示,“设计必须具有引领未来需求的能力,而非单纯追随当下潮流”。日本设计师原研哉(Kenya Hara)从文化层面强调了设计对人们的影响力。他认为,“设计的真正价值在于塑造用户的思维方式,引导他们回归简朴与自然”。这一理念在他的无印良品品牌战略中得到了完美体现,极简化的产品设计能够让消费者在潜移默化中减少不必要的浪费。

作为冰雪文化的重要发源地之一,哈尔滨每年都吸引大量游客前来观赏冰雪大世界等冰雪景点。利用这一文化资源,哈尔滨创意设计产业就能够通过动态适应性设计,创新性地将冰雪文化与现代设计、科技结合,创造出系列既具地方特色又富有创新感的文化产品。其动态适应性设计就体现在产品能够根据市场需求、消费群体以及文化趋势的变化做出灵活调整。这两年间,哈尔滨充分抓住了文旅发展的关键窗口期,通过创新思维和精准市场定位,在冰雪文化的基础上迅速推出了一系列富有创意的文化产品,如冰雕艺术品、冰雪主题的冰箱贴、个性化冰雪服饰以及具有地方特色的冰雪工艺品等。这些产品不仅充分满足了不同时间段的市场需求,还根据游客的偏好进行了快速设计、优化和迭代。在这个过程中,哈尔滨政府及时响应游客需求,对当地的旅游景点、服务设施进行及时的追踪和更新,获得了良好的口碑,树立了“尔滨”“共和国长子”“热情好客”等形象。这种从创意设计到生产环节,再到政府服务的及时反应,整个过程既有个性化、时尚化又将龙江特色文化融入其中,持续吸引了各个年龄层次以及不同文化背景的游客和消费者,成功打造出独具魅力的冰雪文化品牌,形成了一个兼具传统与现代、艺术与科技相结合的冰雪文化生态系统,成为吸引国内外游客的重要文化名片。

四、系统创新设计服务新质生产力发展

2023年9月7日下午,习近平总书记在哈尔滨主持召开新时代推动东北全面振兴座谈会时说,“积极培育新能源、新材料、先进制造、电子信息等战略性新兴产业,积极培育未来产业,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增强发展新动能。”随着全球经济的转型和科技的飞速发展,传统的生产模式和劳动方式正在逐步被智能化、数字化和网络化的新型生产力所取代。在这一过程中,设计服务作为创新驱动的重要力量,扮演着越来越关键的角色。特别是随着“服务经济”和“创意经济”的兴起,设计服务的作用不再仅限于产品外观的修饰,而是深刻融入到整个生产过程之中,成为推动新质生产力提升的重要因素。设计创新的系统性思维作为新质生产力发展的驱动力之一,通过系统化的设计思考和方法来推动创新,优化产品、服务和整体产业模式。这种思维不仅仅聚焦单一设计环节,而是从战略、运营、技术、市场等多个维度全面考量设计在生产力中的作用。

系统创新设计作为一种方法论框架,以全局性、动态性和协同性为特征,通过结构优化与流程再造推动生产力向更高层次跃迁。系统创新设计的核心在于突破传统线性思维,构建多维联动的创新范式。首先,其强调系统思维的整合性,将技术、组织、制度等要素视为相互作用的有机整体。例如,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需同步匹配数据治理规则、人才培养体系和伦理审查机制,才能转化为稳定的生产力输出。其次,系统创新设计注重跨域协同的开放性,通过技术架构的模块化设计,实现不同产业生态间的知识流动与价值共生。这种开放性使得制造、服务、数字等领域的生产要素能够形成新的组合方式,催生跨界融合的产业形态。

在服务新质生产力发展的路径上,系统创新设计从三个维度构建支撑体系。技术维度层面,通过构建具有自适应能力的数字基座,实现物理系统与信息系统的深度耦合。工业互联网平台与数字孪生技术的结合,使生产系统具备实时感知、动态优化和自主决策能力,推动制造流程向智能化演进。组织维度层面,突破传统科层制结构,建立扁平化、网络化的创新共同体。这种组织形态通过智能合约、共识机制等技术手段,实现资源按需调配和利益动态分配,极大提升创新要素的配置效率。生态维度层面,打造具有正反馈效应的创新生态系统,形成技术研发、成果转化、市场应用的闭环链条。通过建立开放标准接口和共享知识库,降低创新协作门槛,加速知识资本的价值转化。

新质生产力的培育对系统创新设计提出新要求,主要体现在动态适应能力和持续进化机制两个方面。面对技术迭代加速和市场需求多变的环境,系统设计需嵌入弹性调节机制。这包括构建可扩展的技术架构、预留要素重组接口、建立快速试错机制等,使生产系统能够灵活应对不确定性挑战。在持续进化层面,需要建立知识积累的螺旋上升通道,通过机器学习算法对生产数据进行深度挖掘,形成具有自优化能力的智能系统。这种进化机制使生产力发展突破传统边际效应递减规律,实现指数级增长。

系统创新设计的实施需要多维政策工具协同发力。在制度供给方面,应建立包容审慎的监管框架,为新技术、新模式预留试错空间。同时完善数据确权、跨境流通等基础性制度,破除要素流动壁垒。在基础设施层面,推进新型数字基建与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重点建设工业大数据中心、算力网络等公共服务平台。人才供给端需重构

教育培养体系，培育兼具工程思维与系统视野的复合型人才。资本支持方面，发展风险共担的利益联结机制，引导社会资本投向底层技术攻关和共性技术研发。

面向未来，系统创新设计将呈现三个演进趋势：一是创新单元从企业主体转向生态网络，形成分布式协同创新格局；二是价值创造从效率优先转向韧性优先，构建抗风险能力更强的生产体系；三是技术应用从工具属性转向认知属性，人工智能等技术的深度融入将重塑人类决策模式。这些趋势要求系统设计必须前瞻性布局，在技术伦理、人机协同、生态安全等新兴领域建立规范框架。

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本质上是生产函数的结构性变革，而系统创新设计正是这场变革的架构师。通过构建技术、组织和制度的协同创新体系，不仅能够释放现有要素的潜在价值，更能孵化出全新的生产要素组合方式。这种系统化创新模式打破了传统生产力增长的路径依赖，为经济高质量发展开辟了可持续的动力源泉。在数字化与绿色化双重转型的背景下，深化系统创新设计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将成为塑造未来竞争优势的战略支点。

五、结语

系统创新设计的崛起标志着设计学科从工具理性向战略思维的范式跃迁。面对全球可持续发展与技术革命的叠加挑战，传统线性设计模式已难以应对日益复杂的系统性问题。无论是弗卢塞尔揭示的“形式永恒性”，还是中国实践中的“设计事理学”，均指向设计本质的深层转变——从单一物化对象转向信息整合与关系重构。华为的生态协同、哈尔滨冰雪文化的动态创新，印证了系统思维在商业与文化领域的普适价值。

当前，新质生产力的发展亟需突破传统生产要素的边界，而系统创新设计通过技术、组织与生态的协同优化，正成为这一进程的架构师。其核心在于构建具有弹性与进化能力的创新网络，既需数字孪生、人工智能等技术支撑，也依赖制度创新与人才培育的系统性变革。正如 DesignX 宣言所倡导的，设计的未来在于“复杂系统的介入与共生”。这种转型不仅关乎效率提升，更指向人类认知模式的革新：设计从解决问题的工具，升维为定义问题、重构价值的认知框架。在数字化与可持续的双重浪潮下，唯有深化系统创新设计的理论与实践，才能为人类社会的韧性发展开辟新路径。

参考文献：

- [1] 刘可文,冉丽.技术图像·装置权力·远程通信社会:威廉·弗卢塞尔传播思想寻踪[J].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24,46(12):55-63.DOI:10.19997/j.cnki.xdcb.2024.12.012.
- [2] 汤雪灏.编纂世界:威廉·弗卢塞尔的设计哲学[J].艺术设计研究,2024,(04):115-120.
- [3] 彭漪涟.逻辑学大辞典 [M] 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4.
- [4] 杭间.系统性的涵义:万物皆“设计”[J].装饰,2021,(12):12-16.DOI:10.16272/j.cnki.cn11-1392/j.2021.12.003.
- [5] 德内拉·梅多斯 . 系统之美 [M]. 邱昭良,译 . 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12:7.

Research on the Systematic Transformation of Design in the Intelligent Era

Kou Ben¹, Cao Keke², Yuan Chenhui³

¹*Affiliation, School of Art, Heilongjiang University, Harbin, China*

Abstract: Since the 21st century, as the era continues to evolve toward sustainable transformation, complexity has inevitably proliferated into increasingly vast systems. Whether addressing intricate commercial challenges in product and service design, or advancing social innovation design that transforms community and urban relationships toward more inclusive and sophisticated systems thinking and practice, disruptive transformations can no longer remain confined to the conceptual and creative stages of the past. Single-dimensional innovation struggles to sustain genuine problem-solving and ultimate commercial success. The current era demands the urgent integration of systemic innovation.

Keywords: Design; Flusser; Systematic; Sustainable

短视频切片对电影叙事与传播路径的重构

曹棵棵¹ 寇犇²

(1.黑龙江大学, 黑龙江 哈尔滨 150080)

摘要:随着短视频平台的迅猛发展, 电影宣传模式逐渐转向多平台、多渠道的复合传播, 传统的线性叙事也因此被打破, 叙事内容呈现出碎片化与跨媒介化的特点。短视频切片通过提炼电影中的关键情节和情感高光, 以片段的形式快速吸引观众, 并借助算法推荐和社交平台传播扩大电影的市场影响力。然而, 这种非线性传播模式也可能导致对电影叙事完整性的削弱、导致叙事的简化与误读等问题。本文通过分析短视频切片的传播机制及其对电影制作与宣发的影响, 以期丰富现有的传播学、叙事学和影视传媒等领域的研究成果。

关键词: 短视频切片; 电影; 跨媒体叙事; 营销

DOI: doi.org/10.70693/rwsk.v1i5.1010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不断发展与移动设备的普及, 全球范围内的信息获取和传播方式发生了深刻变革。特别是以 Web 2.0 为代表的用户生成内容 (UGC) 模式, 催生了大量的社交媒体平台和短视频应用, 诸如抖音、快手等平台的兴起, 标志着信息传播进入了碎片化、即时化的新时代。学者关欣认为, 移动短视频通过丰富多样的内容和精准的内容分发机制, 占据了一个独特的内容“生态位”, 满足了用户多样化的信息需求, 也推动了内容生产的创新与繁荣。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 (CNNIC) 发布的第 53 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 截至 2023 年 12 月, 我国网民规模达 10.92 亿人。这其中, 我国网络视频用户规模达 10.67 亿人, 占网民整体的 97.7%。随着短视频在我国网络视听市场规模中占比越来越高, 短视频成了仅次于即时通信的第二大网络应用, 逐渐成为互联网的基础应用。以抖音、快手为主导的短视频两强格局持续强化, 腾讯微视、西瓜视频以及新兴的微信视频号等二三梯队的平台也在持续竞争。”

在短视频火热的当下, 许多电影的宣传方式也受短视频的影响, 不再局限于传统的影院发行和电视播映, 而是逐步向互联网多平台、多渠道的复合型模式转变, 逐渐下沉, 通过各类社会热点, 网络流行语的运用, 使营销内容紧紧与当下用户绑定。短视频平台拥有大量用户为电影宣传提供了流量基础, 可以使电影的宣传触及各类群体, 扩大电影的覆盖面, 拓宽电影所产生的影响范围。同时, 短视频平台内因其社交特性, 为电影提供了一个直接与用户互动的渠道。相较于传统的预告片和长视频宣传模式, 电影宣发团队对电影中关键片段的提炼与重新组合, 即短视频切片, 以简化和极具感染力的方式向观众传递核心信息。其平台算法的推送机制、社交传播的裂变效应以及用户自发制作的二次创作内容, 使得短视频切片不仅加速了信息的传播, 还对电影的叙事效果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在短视频平台的影响下, 电影的叙事内容逐渐呈现出跨媒介化和碎片化的特征, 传统的线性叙事模式被打破, 情节高光和情感爆发点被切片后广泛传播, 这种非线性、多元化的传播方式极大改变了观众对电影内容的理解和接受方式。这一现象不仅仅反映了新媒体技术对内容传播的影响, 更是电影叙事和传播路径在新媒体时代中不断被解构和重构的过程。

一、短视频切片的特点与传播机制

“我们正处于一个图像生产、流通和消费急剧膨胀的‘非常时期’, 处于一个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图像资源富裕乃至‘过剩’的时期。”短视频凭借其“短平快”的传播特点, 收获“注意力经济”, 满足了人们对视觉影像的需求和欲望, 但与此同时, 它也打破了传统长视频中连续、完整的叙事逻辑。短视频切片通过提炼关键内容和情节, 将电影的关键情节和情感高光时刻浓缩在几十秒至几分钟的时间内。这种短小精悍的呈现方式契合了现代受众快节奏的生活方式和注意力日益分散的趋势, 也是对观众浅层化的阅读消费需求的回应。切片内容高度简化, 往往通过视听

作者简介: 曹棵棵(2001—), 女, 硕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为视觉艺术传播;
寇犇 (1997—), 男, 硕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为视觉艺术传播。

语言的压缩表达来强化某一特定情节、情感或氛围，从而迅速抓住观众的注意力。例如，影中的情感高潮、悬念铺设、视觉特效等元素常常被选择性地提取并精简为短视频切片，形成强烈的视觉冲击和情感共鸣。短视频平台依赖高度浓缩的内容形式，实现了信息的快速传播和用户之间的广泛互动，成为观众与电影作品之间的“情感桥梁”。

短视频切片传播如此之快，主要在于社交传播的裂变效应和算法的精准推荐机制。随着移动社交媒体的发展，短视频通过用户的分享、点赞和评论等互动行为，在社交平台上形成了强大的“病毒式”传播效应。两级传播模型认为，信息首先影响意见领袖，然后再通过他们传递给广大受众。在短视频平台上，KOL和普通用户自发分享电影片段，引发二次传播，从而形成裂变式扩散的效果。这一机制不仅使电影的影响力快速蔓延，还增强了观众对电影内容的期待和讨论热度。短视频平台精准的算法推荐技术，将切片内容推送给具有相似兴趣的观众，从而实现了个性化传播，也圈住了电影爱好者，让人们在刷到一条视频后，只要留下行动（停留、点赞、转发、评论等）就会被继续推送该电影相关的其他内容。对于电影传播而言，这种算法推荐机制极大地提升了电影片段的传播效率和触达范围，尤其是在影片上映初期，有助于快速提高影片的关注度和话题度。

二、短视频切片对电影叙事效果的重构

电影的传统叙事通常遵循线性时间顺序，即按时间顺序展示事件发展。然而，短视频平台上的电影片段往往打破了这一线性结构，呈现出非线性的片段化叙事模式。学者邓慧敏指出：“与1906年前的戏法片类似，短视频化的电影画面之间亦不存在连贯的叙事逻辑。它们更像是一系列场景展示，促使观众直面电影的视觉效果并掩藏其叙事功能。”观众通过短视频观看电影，不再像传统观影那样被引导按照导演预设的情节顺序去感受故事，而是通过多个切片片段拼凑、重构电影的叙事脉络。托多罗夫在其著作《〈十日谈〉的语法》（1969）中提出“叙事学”，用来表示结构主义对文学叙事的分析，强调事件的起因、发展和解决之间的连贯性，而短视频的非线性提取则模糊了这些界限。观众通过短视频切片接触电影内容时，往往只能获得碎片化的信息，无法完整地理解角色发展、情节推进以及故事背景的构建。

并且，电影宣发团队制作的短视频切片往往强化电影中的情感高光时刻，通过选择那些情感爆发的关键节点进行剪辑，使得观众在短时间内获得强烈的情感冲击。例如，许多电影的高潮段落、感人至深的情感场景或惊险刺激的动作场面等。反诈骗题材电影《孤注一掷》的短视频选择呈现大量触目惊心的诈骗工厂施暴场景，带领观众身临其境境外诈骗的生活场景，从而让观众带入“如果自己深处险境”又或者是“自己的家人朋友被诈骗会如何”的恐惧之中。在求知和猎奇心理的双重推动下，观众们纷纷走进电影院。

这种处理方式不仅能够迅速抓住观众的注意力，还能够通过强化情感元素，激发观众的观看欲望。然而，这种情感表达与情节的浓缩在某种程度上也可能导致对电影复杂情节的简化或弱化。电影叙事往往包含复杂的情节发展、人物关系的变化以及多重情感线索的交织，但短视频切片关注于瞬间的情感爆发或情节转折，而忽视了情节的铺陈与细腻刻画。这种浓缩后的情感表达可能无法承载电影中情感变化的全貌，反而削弱了复杂故事的层次感。例如，电影《孤注一掷》制作团队在宣发过程中，充分利用短视频平台，通过选取影片中最具猎奇性和情感冲击力的片段来吸引观众，在主演王传君的“拜佛”片段视频激起大量水花后，宣发团队更是将中心放在了王传君所演的片段和聚焦于诈骗集团的对话、操作手段，以及受害者在骗局中的情绪崩溃时刻，巧妙利用“猎奇”和“真实”的标签吸引观众的注意。然而，这种片段化的传播也带来了叙事完整性上的缺失。观众在短视频平台上接触到的多为戏剧化的高光片段，而影片中更为细腻的人物关系和剧情发展却容易被忽略。短视频切片的宣发往往只是从影片叙事内容中选取部分进行放大宣传。相较于电影中完整的故事叙述，短视频着重于突出高潮情节，渲染情绪的爆发。观众对二者叙事的接受程度不同，容易误将短视频平台中的宣传重点当成影片的实际内容重点。

此外，短视频切片也打破了电影空间的整体感。在传统电影院中，观众需要特定的时间和地点来观看影片，沉浸在一个无法被打断的物理空间中。电影院不仅是一种艺术体验的固定场所，也是电影与观众产生情感联结的重要媒介，这种体验强调了时间与空间的不可替代性。而短视频则嵌入观众的移动设备中，使观众在日常场景中零散地接触电影片段，观众只能接触到部分画面或场景，而难以感知整个电影空间的构建。这种“去身化”的观影体验削弱了电影作为一门艺术形式的完整性。这种对时间与空间的破碎化处理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电影叙事效果的连贯性和完整性。

三、短视频切片对电影传播路径的改变

（一）宣发模式的创新与精准营销

经由短视频平台，无数院线电影能够在宣传、预售阶段就精准触达目标用户群体，并在影片上线后以及观影后的衍生创作中通过话题讨论走向公众。当前，短视频形式的电影宣传已趋于成熟，影片方在抖音、快手等平台

进行电影营销已经成为常态，不少观众因为短视频而走进电影院，灯塔研究院发布的《2022 年中国电影市场年度盘点报告》显示（如图 1），抖音的宣传视频播放量与相关电影票房呈正相关关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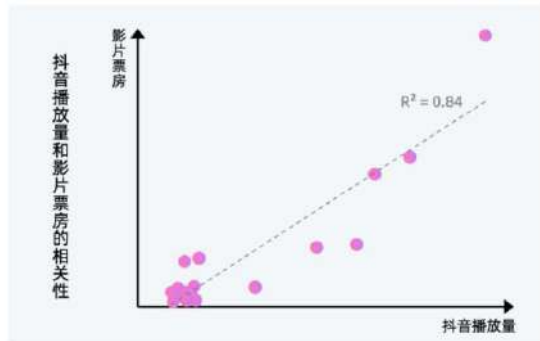


图 1 灯塔研究院《砥砺前行，向阳而生——2022 年中国电影市场年度盘点报告》

在新媒体生态下，短视频平台已经逐渐取代传统媒体，成为电影预告片和宣传片的主要发布渠道。这种革新使得电影宣传的方式发生了质的转变。在传统的电影宣发模式中，预告片通常通过电影院、电视台、报纸和网站等媒介发布，观众通过有限的渠道接触到影片的信息。而随着短视频平台的迅猛发展，电影的预告片、宣传片以及幕后花絮等内容更多地通过抖音、快手等短视频平台发布，并迅速扩散至广大的用户群体。

这种宣发模式的革新极大提升了电影的曝光度与观众期待。短视频平台具备广泛的用户基础和快速的信息传播机制，能够通过精准的推送将电影的预告片等直接呈现给潜在观众。平台的算法推荐机制，依托用户的兴趣标签和观看行为，为不同受众推荐相应的电影内容，从而提升了电影宣传的精准性和传播效果。同时，短视频平台特有的病毒式传播效应，可以在短时间内迅速形成广泛的社会影响力，这种传播效应不仅吸引了电影的核心受众，还能激发普通用户的兴趣，提升影片的市场期待值。更为重要的是，短视频平台打破了电影宣发的时空限制，使电影宣传内容能够随时随地被观众接触，减少了传统宣发模式中观众被动接收信息的局限性。

（二）社交媒体与口碑传播的交互机制

短视频平台的开放性和用户参与度使得观众不再是被动的受众，而是电影宣传过程中的积极互动者，这进一步增强了电影与观众之间的情感连接。短视频片段的迅速传播，使电影成为社交媒体上的热点话题，并在上映前后引发广泛讨论，对电影的口碑和市场表现产生了直接影响。在电影宣发的关键时期，短视频平台成为了不可忽视的舆论场。尤其是那些具有强烈情感张力、视觉冲击力或剧情反转的瞬间，往往被大量用户观看、评论、转发，形成社交媒体上的讨论热潮。这种“社交推荐”通过碎片化传播的形式，以极高的效率打入不同圈层的用户群体。

根据灯塔研究院发布的《2024 年国庆档电影市场洞察报告》（如图 2），国庆档影片抖音热搜 TOP10 话题均覆盖了电影中的高潮细节片段，并引发了相关话题的讨论、模仿和挑战。例如，2024 年国庆档《志愿军：存亡之战》中的战争场面、人物情感对白成为抖音和快手等平台的热门话题。观众模仿经典台词并发布相关视频，引发了挑战和模仿的浪潮。这种参与式传播不仅提升了影片在社交平台的关注度，也成功吸引观众走进影院，实现了从小屏幕到大银幕的跨圈层传播。同时，短视频平台通过算法和标签话题的设置，帮助影片创造热门讨论并塑造舆论导向。例如，《志愿军：存亡之战》围绕爱国精神展开的话题吸引了大量讨论，平台的热搜榜进一步强化了该影片在用户中的曝光度，进而让观众形成认知，形成口碑传播，即影片是当前的热门选择，促使更多用户参与观影。



图 2 灯塔研究院《2024 年国庆档电影市场洞察报告》

在当下的电影市场中，借助短视频平台进行精准宣发，已成为影片获得成功的关键之一。尽管短视频平台的片段化传播提高了影片的曝光度，但过度切片容易导致叙事的简化与误读。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影片宣发团队通

常会放出幕后花絮和导演访谈为观众提供更多解读。

四、总结与展望

短视频切片作为一种新兴的媒介形式，在电影叙事与传播路径中展现出了显著的双刃剑效应。一方面，电影宣发团队通过短视频切片提取电影中的关键情节和情感高光时刻，有效地吸引了观众的注意力，平台也为电影提供了一个高速传播和精准营销的渠道，使得影片能够在短时间内获得大量曝光，提升电影的市场影响力，增强了电影的传播深度和广度。但另一方面，短视频的碎片化特征和非线性呈现方式也对电影的叙事效果构成了挑战，观众通过短视频获取电影信息的方式削弱了他们对完整故事情节的关注，忽视了影响想要传达的主题。

在新媒体时代，电影与短视频平台的共生关系促使电影产业在宣发策略上进行创新，探索如何更好地利用这一媒介形式来增强电影的影响力与传播力。其中，电影制作者应在内容创作阶段充分考虑短视频的传播特点，将电影中具有情感张力和视觉冲击力的片段精心设计，确保这些片段在短视频平台上的传播能够准确传递影片的核心价值；电影宣发团队应借助人工智能算法和大数据分析，实现精准营销，将电影切片推送给最有可能产生观影行为的目标观众群体；并且，宣发团队在制作短视频切片时，应避免过度暴露电影的关键情节或剧透情节，而应专注于吸引观众走进影院或流媒体平台观看全片，从而平衡碎片化信息与完整叙事之间的关系。

总而言之，短视频切片在未来的电影传播中将继续发挥重要作用。电影制作者和宣传者需要在利用短视频切片吸引观众的同时，注重维护电影叙事的完整性，找到二者之间的最佳平衡点。这不仅能够推动电影产业的创新与发展，也将为观众带来更加丰富、多元的观影体验。

参考文献：

- [1] 关欣.融媒体语境下新闻短视频生态位研究[J].新闻文化建设,2021(12):150-151.
- [2]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 第 53 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DB/OL].中文互联网数据资讯网,2024-03-29.<https://www.199it.com/archives/1682273.html>
- [3] 祝明,胡智锋.碎片化时代影视剧传播的短视频化转向与困局[J].北京文化创意,2022,(01):27-33.
- [4] 周宪.视觉文化的转向[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5
- [5] 邓慧敏.于“震惊”中“循流”: 电影在短视频平台中的跨媒介改编[J].当代电影,2022,(11):116-124.
- [6] 灯塔研究院《砥砺前行，向阳而生》——2022 年中国电影市场年度盘点报告[EB/OL].微信公众号,2023-01-01.https://mp.weixin.qq.com/s/GBrLWNxDGMiXp_lpAi8SfQ
- [7] 灯塔研究院《2024 年国庆档电影市场洞察报告》[EB/OL].微信公众号,2024-10-08.<https://mp.weixin.qq.com/s/IR6HRAR0FyW-hpYNcXvYYQ>

Reconstruction of Film Narrative and Communication Pathways through Short Video Clips

Cao KeKe¹, Kou ben²

¹Affiliation, Heilongjiang University, Harbin, China

Abstract: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short video platforms, film promotion has gradually shifted toward multi-platform and multi-channel integrated communication. Traditional linear narratives have consequently been disrupted, leading to fragmented and cross-media narrative characteristics. By extracting key plot points and emotional highlights from films, short video clips rapidly engage audiences in segmented formats, leveraging algorithmic recommendations and social platform dissemination to amplify a film's market influence. However, this non-linear dissemination model risks undermining narrative integrity, resulting in oversimplification and misinterpretation of storylines. This study analyzes the dissemination mechanisms of short video clips and their impact on film production and promotion, aiming to enrich existing research in communication studies, narratology, and film and media studies.

Keywords: short video clips; film; cross-media narrative; marketing

亲子联结强度及学业自我效能感对普通高中生抑郁程度的影响： 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 2022 数据的实证分析

于文丽¹ 陆泳仪² 葛蒲³ 杨赛儿⁴ 张瑞峰^{5*}

(1.吉林体育学院 吉林 长春 130022, 2.澳门大学健康科学学院 澳门 999078, 3.北京中医药大学中医学院 北京 100029, 4.陆军军医大学护理系 重庆 400038, 5.广州市黄埔区凤凰湖幼儿园 广州 510760)

摘要:

目的: 揭示亲子联结强度与学业自我效能感对普通高中生抑郁程度的影响, 为“双减”政策背景下家校协同干预提供实证依据。

方法: 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 (CFPS) 2022 年全国数据, 筛选 366 名普通高中学生为研究对象。采用 CES-D 8 量表评估抑郁程度, 构建多维指标体系测量亲子联结强度 (关系质量、信任程度) 与学业自我效能感 (学业满意度、压力感知、自我优秀度评价、学生干部适任性评估), 运用多重线性回归模型检验变量关联。

结果: 受访者抑郁检出率为 26.23% (CES-D 8 总分 ≥ 7 分), 过去 6 个月与父母关系质量 ($\beta=-0.52, P=0.008$) 及对父母信任程度 ($\beta=-0.45, P<0.001$) 均显著负向预测抑郁程度, 即时互动质量保护效应更强, 学业自我效能感方面, 学业压力感知是抑郁核心风险因子 ($\beta=0.96, P<0.001$)。

结论: 亲子联结通过动态互动与长期信任双路径缓解高中生抑郁, 学业压力特异性驱动心理风险, 二者共同构成家庭-学业系统的差异化作用机制。建议家校协同干预优先提升亲子互动质量、重构压力认知策略, 为高中生抑郁防控目标提供靶向路径。

关键词: 亲子联结强度; 学业自我效能感; 抑郁; 中国家庭追踪调查

DOI: doi.org/10.70693/rwsk.v1i5.1012

1. 前言

青少年时期作为身心发展的重要过渡期, 往往也是心理健康问题的高发阶段。世界卫生组织数据显示, 抑郁障碍已成为全球青少年致残的首要原因^[1], 中国中学生抑郁检出率亦呈现持续上升趋势^[2-4], 这一公共卫生问题已引起学界广泛关注。以往相关研究多聚焦于学业压力、家庭经济状况等单一因素对青少年心理健康的影响, 但近年来研究者依托生态系统理论, 强调个体发展应受多重环境系统交互作用的影响, 其中家庭与学校子系统的动态关系受到格外关注, 并提出其对青少年心理适应具有双重预测作用^[5-6]。

在家庭层面, 作为青少年最重要的社会支持来源的亲子关系, 其联结质量直接影响情绪调节能力的发展。大量研究表明, 亲子沟通障碍、情感疏离与青少年抑郁症状存在显著关联^[7-9], 但既有研究多采用单向度的亲子冲突测量, 对亲子互动中支持性维度 (如信任程度) 的关注相对不足。同时, 学业自我效能感作为个体对自身学习能力的信念系统, 已被证实能有效缓冲压力事件对心理健康的负面影响^[10-13]。然而, 现有研究多集中于学业自我效能感对学业成就的预测作用, 其在学生抑郁情绪形成中的机制仍需深入探讨。

当前中国正处于教育“双减”政策深化实施阶段, 政策效果评估需要更精细化的实证证据。普通高中生作为

作者简介: 于文丽(1999—), 女, 硕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为心理健康教育;

陆泳仪(1990—), 女, 硕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为医院管理;

葛蒲(1997—), 男, 博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为健康管理;

杨赛儿(2004—), 女, 硕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为护理心理学。

通讯作者: 张瑞峰 (1994—), 男, 硕士, 研究方向为学前教育。

直面高考压力的特殊群体，其心理健康问题具有典型性和紧迫性。然而现有研究存在两方面局限：其一，全国性代表性样本研究相对匮乏，多数研究局限于区域性抽样；其二，针对普通高中生的专门研究较少，缺乏与职业院校学生的差异化分析。

基于此，本研究利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2022 年全国性数据，聚焦普通高中群体，通过构建多维度的亲子联结强度指标（包括关系质量、信任程度）和学业自我效能感指标体系（涵盖学业满意度、压力应对等多维度），探讨两者对抑郁程度的影响。研究结果可为优化家庭支持策略、完善学校心理健康服务体系提供科学依据，对实现《健康中国行动—儿童青少年心理健康行动方案》提出的“降低儿童青少年抑郁发生率”目标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2. 方法

2.1 资料来源

本论文使用数据全部来自北京大学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执行的中国家庭追踪调查^[14]。基于研究需要，设定如下纳入标准与排除标准。纳入标准：①就读于普通高中（非技工学校、普通中专或职业高中）；②父母均未去世；③年龄≤18 周岁；④完整填写问卷。排除存在逻辑问题的问卷。通过以上数据处理方式，本文最终得到由 366 个普通高中生样本组成的数据库。

2.2 变量构建

2.2.1 被解释变量

被解释变量是抑郁评分，根据 CFPS 问卷的“在过去一周内各种感受或行为的发生频率”设置，包括感到情绪低落、做任何事都很费劲、睡眠不好、愉快、孤独、生活快乐、悲伤难过、生活无法继续等 8 个问题，回答“几乎没有（不到 1 天）”、“有些时候（1~2 天）”、“经常有（3~4 天）”、“大多数时候有（5~7 天）”分别赋值 0~3（愉快、生活快乐两道题目反方向赋值），加总 8 个问题得到取值范围为 0~24 分的抑郁评分（CES-D 8），分值越大表明抑郁程度越严重，即抑郁风险越大。参照既往在中国人群中进行的调查，将 CES-D 8 分数≥7 分定义为伴有抑郁状态。本研究中，CES-D 8 的 Cronbach's alpha 系数为 0.788，信度良好^[15-17]。

2.2.2 核心解释变量

将 2022 年 CFPS 问卷中与学业自我效能感和亲子联结强度的相关问题作为核心解释变量。

2.2.2.1 学业自我效能感

学业自我效能感表示个人对凭借自己具备的能力完成某种目标的自我能力评价和信心程度，可以用来衡量学生对于学业的胜任程度。学业自我效能感高的学生会对自身的学习能力有更高的评价，拥有正向的态度，使得学习表现比其他学生要好。本研究将学业满意度、学业压力、自我优秀度自评（认为自己多优秀）、学生干部适任性评估（认为自己是否适合担任学生干部）这四个变量得分分别作为学业自我效能感得分变量^[18]。四个变量得分范围均为 1-5 分。

2.2.2.2 亲子联结强度

亲子联结强度通常指子女与父母之间情感连接的紧密程度，以及双方在互动中表现出的稳定性和支持性^[19-21]。本研究将 CFPS2022 问卷中近六个月与父母关系（1-5 分）、对父母的信任程度（1-10 分）这两个变量得分分别作为亲子联结强度得分变量。

2.2.3 控制变量

本研究的控制变量包括年龄、性别、常住地、家庭成员人数四个变量。

2.3 统计分析

使用 SPSS 25.0 统计软件进行一般描述性分析、t 检验/方差分析、相关性分析和多重线性回归分析，检验水准为双侧检验 $\alpha=0.05$ 。

3. 结果

3.1 受访者的一般情况

366 名普通高中生中, 男性 175 人 (47.81%), 女性 191 人 (52.19%), 16 岁者 101 人 (27.60%), 17 岁者 130 人 (35.52%), 18 岁者 135 人 (36.89%), 常住地为乡村者 180 人 (49.18%), 常住地为城镇者 186 人 (50.82%), 目前家庭成员数量 2-3 人者 80 人 (21.86%), 目前家庭成员人数 4 人及以上者 286 人 (78.14%)。

3.2 受访者抑郁程度

366 名受访者中, CES-D 8 得分的 4.41 ± 3.42 分, 可能处于抑郁状态 (CES-D ≥ 7 分) 者为 96 人 (26.23%)。不同性别、年龄、常住地、家庭成员人数分组的受访者 CES-D 8 得分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均 $P > 0.05$) (表 1)。

表 1 不同特征受访者抑郁程度比较

变量	n (%)	CES-D 8, Mean $\pm$ SD	t/F	P
总人数	366 (100)	4.41 $\pm$ 3.42		
年龄			F=0.30	0.744
16 岁	101 (27.60)	4.63 $\pm$ 3.36		
17 岁	130 (35.52)	4.31 $\pm$ 3.30		
18 岁	135 (36.89)	4.35 $\pm$ 3.58		
性别			t=0.80	0.423
女	191 (52.19)	4.55 $\pm$ 3.37		
男	175 (47.81)	4.26 $\pm$ 3.47		
常住地			t=0.24	0.813
农村	180 (49.18)	4.46 $\pm$ 3.30		
城镇	186 (50.82)	4.37 $\pm$ 3.53		
家庭成员人数			t=0.63	0.530
2-3 人	80 (21.86)	4.62 $\pm$ 4.15		
4 人及以上	286 (78.14)	4.35 $\pm$ 3.19		

3.3 学业自我效能感、亲子联结强度与普通高中生抑郁程度的 Pearson 相关性分析

Pearson 相关性结果显示, 受访者 CES-D 8 得分与学业压力正相关, 与学业满意度、自评优秀程度、对父母的信任程度、过去 6 个月与父母关系负相关 (均 $P < 0.05$) (表 2)。

表 2 学业自我效能感、亲子联结强度与普通高中生抑郁程度的 Pearson 相关性分析

变量	1	2	3	4	5	6	7	Mean	SD
1 学业满意度	—							3.14	0.69
2 学业压力	-0.134*	—						3.11	0.85
3 自我优秀度自评	0.398***	-0.05	—					2.94	0.64
4 学生干部适任性评估	0.141**	0.01	0.277***	—				2.78	0.98
5 对父母的信任程度	0.241***	-0.113*	0.127*	0.06	—			9.18	1.34
6 过去 6 个月与父母关系	0.178***	-0.09	0.104*	0.10	0.334***	—		4.09	0.90
7 CES-D 8	-0.203***	0.284***	-0.119*	-0.05	-0.276***	-0.236***	—	4.41	3.42

注: * $P < 0.05$, ** $P < 0.01$, *** $P < 0.001$

3.4 多重线性回归模型

回归结果显示, 受访者学业压力对其抑郁程度有正向影响 ($\beta = 0.96, P < 0.001$), 过去 6 个月与父母关系 ($\beta = -0.52, P = 0.008$) 及对父母的信任程度 ($\beta = -0.45, P < 0.001$) 对其抑郁程度有负向影响 (表 3)。

表3 学业自我效能感、亲子联结强度对普通高中生抑郁程度影响的多重线性回归分析

变量	β	S.E	t	P	95%CI of β
学业满意度	-0.45	0.27	-1.65	0.100	[-0.99, 0.08]
学业压力	0.96	0.20	4.85	<0.001	[0.57, 1.35]
自我优秀度自评	-0.18	0.29	-0.61	0.541	[-0.75, 0.39]
学生干部适任性评估	-0.02	0.18	-0.13	0.897	[-0.37, 0.33]
过去6个月与父母关系	-0.52	0.20	-2.65	0.008	[-0.91, -0.14]
对父母的信任程度	-0.45	0.13	-3.35	<0.001	[-0.71, -0.19]
年龄	-0.04	0.21	-0.21	0.830	[-0.46, 0.37]
性别 (对照组为女性)					
男性	0.14	0.34	0.41	0.682	[-0.52, 0.80]
常住地 (对照组为农村)					
城镇	-0.19	0.34	-0.57	0.572	[-0.85, 0.47]
家庭成员人数 (对照组为2-3人)					
4人及以上	-0.17	0.41	-0.41	0.681	[-0.97, 0.63]

4. 讨论

4.1 受访者抑郁现状分析

本研究发现, 受访普通高中生 CES-D 8 评分均值为 4.41 ± 3.42 分, 26.23% 的受访者处于抑郁状态 (CES-D $8 \geq 7$ 分), 既往有研究显示青少年抑郁状态者占比为 14% 至 54% 不等, 本研究高中生抑郁状态占比结果与其他研究接近^[22]。此外, 尽管既往研究提示农村青少年抑郁风险高于城镇, 但本研究未发现常住地对抑郁程度的显著影响 ($P=0.572$), 可能与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城乡教育资源趋同、代际教养模式改变有关^[23-24]。值得关注的是, 家庭规模在本研究中未显现对抑郁的保护效应, 提示单纯的家庭成员数量增加可能无法替代亲子互动质量对心理健康的促进作用^[25]。

4.2 亲子联结强度对受访者抑郁程度的影响

多重线性回归模型显示, 亲子联结强度的两个条目——过去6个月与父母关系质量及对父母信任程度——均对抑郁程度产生独立负向影响, 这与 Bowlby 依恋理论的核心观点一致^[26-27]。值得注意的是, 过去6个月与父母关系质量的标准化回归系数绝对值 ($\beta=-0.52$) 高于对父母信任程度 ($\beta=-0.45$), 可能反映即时的互动质量比长期的信任认知对抑郁情绪的缓冲作用可能更强^[28-29]。动态的亲子互动通过提供实时情感反馈, 可能比静态的信任评估更能有效缓解抑郁症状。本研究提示未来家庭干预策略需从单向的信任建设转向双向互动质量提升, 例如通过家庭干预中的亲子沟通训练、冲突解决演练等方式增强关系修复的即时性^[30-31]。

此外, 尽管 78.14% 的样本来自多子女或扩展家庭, 但家庭成员人数在单因素分析及回归分析中均未表现出与受访者抑郁程度的显著相关性, 这可能是由于家庭系统中特定二元关系 (如父子、母子) 的质量比整体家庭结构特征对子代心理适应水平更具预测力^[32]。

4.3 学业自我效能感对受访者抑郁程度的影响

研究发现学业自我效能感对受访者抑郁程度呈现差异化影响模式: 学业压力对抑郁程度有显著正向预测力 ($\beta=0.96, P<0.001$), 而学业满意度等指标在多重线性回归模型中未表现出对受访者抑郁程度的显著影响。这一结果部分支持 Bandura 的自我效能理论^[33], 普通高中生的抑郁情绪更易受压力感知而非能力评价驱动。可能的解释是, 在高考导向的教育生态中, 学生可能将短期压力体验泛化为对自我价值的否定, 形成“压力-无能感-抑郁”的恶性循环, 此外, 学业压力还可能通过削弱个体对压力源的掌控感加剧抑郁。值得注意的是, 尽管学业压力与抑郁呈较强正相关 ($\beta=0.284, P<0.001$), 但其与学业满意度仅呈较弱负相关 ($\beta=-0.134, P<0.05$), 反映出中国现行教育体制下学生可能同时存在高压与高学业满意度的矛盾心理, 这种认知失调本身可能导致普通高中生的抑郁易感性^[34]。

4.4 研究优势与局限性

本研究优势如下：①采用 CFPS2022 全国概率抽样数据，结论具一定的人群代表性；②构建多指标亲子联结强度与学业自我效能感指标体系，突破既往研究的单指标局限；③聚焦普通高中，为差异化心理健康服务提供证据。局限性主要为样本量较小。未来可设计纵向研究并扩大样本，并整合社会网络分析等分析方法探讨多系统交互机制。

5 结论

基于全国性数据，本研究揭示了亲子联结与学业压力对普通高中抑郁情绪的差异化影响。亲子联结强度通过即时关系质量与长期信任维度发挥对普通高中心理状况的独立保护效应，其中动态的亲子互动质量对抑郁情绪的缓冲作用尤为显著，凸显家庭支持的核心作用；学业压力感知作为独立风险因子，其对抑郁程度的影响显著超越学业满意度等其他学业自我效能感指标，折射出高考压力情境下认知-情绪的解离特征。建议家校协同干预优先通过亲子互动训练、学业压力认知行为疗法等靶向路径。本研究为《健康中国行动-儿童青少年心理健康行动方案》中“家校协同心理服务体系建设”目标提供了靶向指标（亲子联结强度、学业压力），未来研究需通过追踪设计进一步验证变量间因果路径，并探索家庭-学校系统对高中生抑郁情绪影响的动态交互机制。

参考文献

- [1] Friedrich M J. Depression is the leading cause of disability around the world[J]. *Jama*, 2017, 317(15): 1517-1517.
- [2] 杨之旭,彭海云,辛素飞.疫情后期青少年的抑郁和焦虑变迁趋势及其潜在因果:一项追踪研究[J].*心理学报*,2024,56(04):482-496.
- [3] 牟帮军.中小学生抑郁的变化趋势及其风险预警模型的构建[D].贵州师范大学,2024.
- [4] 刘贤臣,郭传琴,王均乐,等.高中生抑郁情绪及其影响因素调查[J].*中国心理卫生杂志*,1991,(01):24-26+48.
- [5] 刘杰,孟会敏.关于布朗芬布伦纳发展心理学生态系统理论[J].*中国健康心理学杂志*,2009,17(02):250-252.
- [6] 俞国良,李建良,王勃.生态系统理论与青少年心理健康教育[J].*教育研究*,2018,39(03):110-117.
- [7] 龚芳敏,易培,吴一波.媒介使用行为对青少年抑郁情绪的影响——家庭健康和自我效能的链式中介作用[J].*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44(06):124-136.
- [8] 汤佳怡,付成好,徐慰.青少年家庭功能对抑郁和社交焦虑的影响:公正世界信念的中介作用[J/OL].*心理发展与教育*,2025,(05):701-709[2025-04-29].
- [9] 李思迅,王美雯,杨燕平,等.情绪调节与注意缺陷多动障碍患儿焦虑/抑郁症状:社交问题的中介效应和家庭功能的调节[J].*四川大学学报(医学版)*,2024,55(02):346-352.
- [10] 杨庆平,沈梓锋,赖雪芬.高中生化学学业求助行为、学业自我效能感与化学学习焦虑的关系:个体中心的视角[J].*化学教育(中英文)*,2023,44(07):93-100.
- [11] 杨青松.学业自我效能感对中学生考试焦虑的影响:链式中介效应及性别差异[J].*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2022,30(02):414-420.
- [12] 汤舒俊.基于学业自我效能感的团体辅导对高中生考试焦虑的干预实验[J].*教育研究与实验*,2018,(02):92-96.
- [13] 罗荣,陈京军.初中生成就归因、学业自我效能感对外语焦虑的预测模型[J].*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2013,21(02):300-302+305.
- [14] 王小华,吴双虹.化“数字”为“数治”:数字素养与村民社会治理参与[J].*湖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5,26(01):62-71.
- [15] 孔玉皓,马宁,李晓谕,等.抑郁状态及其变化与生育意愿的关联性——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的育龄人群的研究[J].*中国公共卫生*,2025,41(01):61-67.
- [16] Missinne S, Vandeviver C, Van de Velde S, et al. Measurement equivalence of the CES-D 8 depression-scale among the ageing population in eleven European countries[J].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2014, 46: 38-47.
- [17] Briggs R, Carey D, O'Halloran A M, et al. Validation of the 8-item Centre for Epidemiological Studies Depression Scale in a cohort of community-dwelling older people: data from The Irish Longitudinal Study on Ageing (TILDA)[J]. *European Geriatric Medicine*, 2018, 9: 121-126.
- [18] 栾新红.大数据视角下中小学生学习表现的影响因素研究[D].福建师范大学,2021.
- [19] 曾晓强.大学生父母依恋及其对学校适应的影响[D].西南大学,2009.
- [20] 赵景欣,刘媛.留守青少年抑郁的发展轨迹:亲子分离和亲子联结的作用[C]//中国心理学会.第二十三届全国心理学学术会议摘要集(上).山东师范大学心理学院,2021:50-51.
- [21] 王华栋,王卉,廖巧毅,等.亲子联结问卷的修订及在高职院校少数民族护生中的应用研究[J].*现代职业教育*,2021,(52):28-29.
- [22] Balázs J, Miklósi M, Keresztény Á, et al. Adolescent subthreshold-depression and anxiety: Psychopathology, functional impairment and increased suicide risk[J]. *Journal of child psychology and psychiatry*, 2013, 54(6): 670-677.

- [23]段成荣,吕利丹,王宗萍.城市化背景下农村留守儿童的家庭教育与学校教育[J].北京大学教育评论,2014,12(03):13-29+188-189.
- [24]陈鹏,李铭泽.分割抑或趋同:基础教育阶段学生教育期望性别差距的城乡比较——来自中国教育追踪调查基线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J].武汉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32(04):34-42.
- [25]唐梅.亲子互动质量与小学生攻击行为的关系及干预研究[D].江西师范大学,2024.
- [26]张玉沛,郭本禹.鲍尔比的依恋理论及其临床应用[J].南京晓庄学院学报,2012,28(01):66-70+123.
- [27]朱佳颖.依恋理论述评及展望[J].黑龙江教育学院学报,2012,31(08):98-101.
- [28]洪彩云.父母教养方式、学业自我效能感和学习适应性的关系研究[D].厦门大学,2021.
- [29]杨静.论不同家庭结构中的亲子关系[J].中国德育,2020,(04):41-44.
- [30]徐超凡.家庭治疗对“问题少年”的心理干预研究[D].中国人民公安大学,2017.
- [31]李小静,李曙亮.心理教育性家庭干预在青少年抑郁症患者中的应用效果[J].中国民康医学,2020,32(20):64-66.
- [32]杨雄.社会学视域下的家庭教育:结构、关系与功能[J].中华家教,2023,(02):8-15.
- [33]林皎.班杜拉自我效能理论研究综述与展望[J].文化学刊,2024,(06):148-151.
- [34]季文婕.初中生学业压力与学习满意度的关系[D].延安大学,2018.

The effects of parent-child bonding strength and academic self-efficacy on depression among general high school students: a study based on China Family Panel Studies 2022

Wen-li Yu¹, Yongyi Lu², Pu Ge³, Sai-er Yang⁴, Rui-feng Zhang^{5*}

¹ Jilin Sport University, Changchun, China

² Faculty of Health Sciences, University of Macau, Macau, China

³ School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Beijing University of Chinese Medicine, Beijing, China

⁴ Department of Nursing, Army Medical University, Chongqing, China

⁵ Phoenix Lake Kindergarten, Guangzhou, China

Abstract:

OBJECTIVES: To ascertain the differential effects of parent-child bonding strength and academic self-efficacy on depression among high school students and to provide empirical evidence for collaborative home-school interventions in the context of the "double reduction" policy.

METHODS: The study is based on data from the China Family Panel Studies (CFPS) conducted in 2022. A sample of 366 high school students was selected for the study. The CES-D 8 scale was utilised to evaluate the severity of depression, and a multidimensional index system was devised to ascertain the strength of parent-child bonding (relationship quality, level of trust) and academic self-efficacy (academic satisfaction, stress perception, self-evaluation, and assessment of student leaders' fitness). The interrelationship among the variables was investigated through multiple linear regression analysis.

RESULTS: The results of the study indicated that the respondents demonstrated a depression detection rate of 26.23% (CES-D 8 total score ≥ 7). The quality of the respondents' relationships with their parents in the past six months was found to be a significant predictor of depression, with a beta coefficient of -0.52 and a p-value of 0.008. Additionally, the degree of trust in parents was found to be a predictor of depression, with a beta coefficient of -0.45 and a p-value of <0.001 . The protective effect of the quality of immediate interactions was found to be more pronounced. In terms of academic self-efficacy, the perception of academic stress was identified as a core risk factor for depression ($\beta = 0.96$, $P < 0.001$).

CONCLUSION: It is concluded that parent-child bonding has a significant role to play in alleviating depression in high school students. This is achieved through two main pathways: dynamic interaction and long-term trust. Furthermore, it is evident that academic stress specifically drives psychological risk. Collectively, these factors constitute a differential mechanism of action within the family-academic system. It is recommended that collaborative home-school interventions prioritise enhancing the quality of parent-child interactions and reconfiguring stress cognitive strategies to provide a targeted pathway to the goal of depression prevention and control in high school students.

Keywords: Parent-child Bonding Strength; Academic Self-efficacy; Depression; China Family Panel Studies

食品安全犯罪的侦查取证研究

钟云东¹

(1.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湖北 武汉 430073)

摘要: 食品安全犯罪日益呈现复杂化、隐蔽化、高科技化和网络化趋势, 对传统侦查取证工作构成严峻挑战。本研究旨在深入剖析当前食品安全犯罪侦查取证面临的突出困境, 并系统构建科学高效的应对策略体系。研究基于文献梳理、法律法规及实践经验分析, 识别了证据特性、犯罪模式演变、数据分析与情报研判、跨境合作等方面的核心难点。针对这些挑战, 本文提出了四大应对策略: 强化证据保全与技术支撑(如移动实验室、区块链技术应用)、创新侦查模式与数据衔接(转向全链条生态化侦查, 健全“行刑衔接”机制)、提升数据分析与情报研判能力(应用大数据、人工智能模型)以及深化国际合作。这些策略旨在全面提升食品安全犯罪侦查取证的精准性与效率。本研究展望了食品安全犯罪侦查取证向智能化、体系化、国际化和专业化演进的未来方向, 为有效打击此类犯罪、保障人民群众食品安全提供了重要理论支撑与实践指导。

关键词: 食品安全犯罪; 侦查取证; 证据保全; 行刑衔接; 国际合作

DOI: doi.org/10.70693/rwsk.v1i5.1013

食品安全关乎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与生命安全, 是社会和谐稳定的重要基石。近年来, 随着经济全球化和科技的飞速发展, 食品产业链日益复杂, 食品安全犯罪呈现出显著的复杂化、隐蔽化、高科技化和网络化趋势, 给传统的侦查取证工作带来了前所未有的严峻挑战。犯罪分子利用现代科技手段、电子商务平台等进行非法交易, 犯罪链条日趋完善且常伴有跨区域、团伙化作案特点, 导致侦查难度剧增, 其危害后果具有广泛性和长期性, 不仅直接威胁公共健康, 更动摇公众对食品行业的信任, 引发社会不稳定因素^[1]。

尽管我国在食品安全犯罪的法律界定、立法完善和打击力度上持续加强, 并逐步形成了行政监管与刑事制裁相结合的全方位监管体系, 但在主观要件认定、物证书证电子证据收集与保全、跨部门协作机制效能提升及科技手段深度应用等方面仍面临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现有侦查手段在应对新型食品安全犯罪时, 面临证据收集范围不明确、证据保全固定技术滞后、证据合法性风险增高等困境, 且食品监管、检验检疫、公安等多部门协同配合不足, 信息共享不畅, 严重影响了侦查取证的效率和效果。

然而, 现代科技的快速发展, 如大数据、物联网、快速检测技术等, 也为食品安全犯罪侦查取证带来了新的机遇, 为创新侦查手段、提升侦查能力提供了可能。鉴于此, 本研究旨在深入分析当前食品安全犯罪的新趋势和特点, 系统研究其侦查取证的策略和方法体系, 探索多部门协同联动机制, 并积极探索现代科技手段在侦查取证中的创新应用, 以期通过构建科学高效的侦查取证体系, 为提升食品安全犯罪案件的侦查取证水平, 有效打击此类犯罪提供理论支撑和实践指导, 从而更好地保障人民群众的食品安全和身体健康。本研究不仅将丰富食品安全犯罪侦查理论, 特别是在应对新型、高科技犯罪方面的理论空白, 更为公安机关及相关执法部门提升侦查取证能力、构建多部门协同机制、有效打击食品安全犯罪提供具体可行的策略和指导, 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一、食品安全犯罪侦查取证的难点

(一) 证据特性与取证困境

食品安全犯罪案件的侦查取证, 首要难点在于其关键物证固有的动态性与脆弱性, 以及犯罪分子普遍

采取的系统性证据销毁行为^[2]。涉案的生产设备、原材料、半成品、成品、包装材料、财务记录和生产日志等，均与持续进行的生产经营活动紧密关联，极易在流转过程中损耗、转移或灭失，为犯罪嫌疑人清除证据提供了便利。更为严峻的是，犯罪分子通常有预谋地采取系统性销毁措施，如迅速转移关键设备、彻底清洗生产场地、篡改重要记录、销毁电子数据等，旨在最大限度抹除犯罪痕迹^[3]。这种动态性与系统性销毁行为，与侦查机关必须迅速、全面、准确保全证据的迫切需求形成尖锐对抗，导致侦查工作从一开始就陷入时间紧迫、难度巨大的困境。

现代食品安全犯罪的高度专业化和技术化特征，构成了侦查取证的另一道技术壁垒。不法分子普遍利用最新的生物技术、化学技术和食品工程技术进行非法生产和加工，甚至涉及基因工程改造、复杂化学合成等，使得犯罪行为更具隐蔽性、欺骗性。对涉案食品的精准检测和鉴定，高度依赖专业的检测机构、高素质人才和先进技术。然而，侦查人员的知识结构和更新速度与食品检测技术的日新月异之间存在明显鸿沟。这种专业知识的代际差异和信息不对称，导致部分侦查人员难以准确识别新型犯罪手段、判断侦查方向，也难以有效指导和配合专业检测机构工作，显著增加了侦查取证的技术难度，对一线侦查人员的专业素养提出更高要求，也对公安机关培养和引入专业技术人才、构建外部技术协作机制带来巨大挑战。

跨部门、跨区域协作机制的制度性障碍严重制约了侦查取证效能。食品安全监管是一项系统性工程，涉及市场监管、农业农村、卫生健康、海关、公安等多个部门及不同层级的执法机构协同配合。然而，长期存在的部门壁垒和行政区划限制导致信息资源难以有效共享，各部门掌握的企业注册、生产许可、质量抽检、投诉举报、行政处罚等海量数据，仍处于分散、封闭状态，难以形成情报互联互通和执法资源协同的强大合力。同时，随着食品犯罪的网络化和跨区域化，跨区域协作日益成为常态需求，但不同地区执法机构在管辖权划分、证据收集标准、案件移送程序、协作机制等方面仍存在标准不统一、程序不衔接、机制不健全等问题，导致协作成本高、效率低，易出现取证环节脱节、证据链条人为割裂的“取证断层”现象。

（二）犯罪模式演变带来的侦查困境

传统的个案打击模式已无法有效应对当前食品安全犯罪所呈现的复杂化、组织化、规模化、链条化特征。现代食品安全犯罪已演变为一种复杂的“产业链犯罪”，犯罪分子精心构建起分工精细、环环相扣的犯罪网络^[4]。从非法原料采购、违禁添加物生产，到违法违规生产加工、直至多层级代理和网络化销售，各个环节分工明确、紧密衔接，共同构成一个庞大而隐蔽的犯罪网络。这种犯罪模式的复杂性和系统性，使得传统的“单兵作战”式侦查捉襟见肘，难以实现全链条打击和溯源治理，造成了打击效果的碎片化。

为支撑侦查模式的转型升级，构建行政监管数据与刑事侦查证据的有效衔接转化机制至关重要。市场监管、农业农村、卫生健康等行政部门在日常监管和行政执法中积累了海量的、多维度数据资源，蕴含着丰富的犯罪线索和风险预警信息。然而，在传统模式下，这些数据分散于各行政部门，难以实现跨部门、跨层级、跨区域的有效共享和充分利用，更难以顺畅转化为刑事侦查所需的证据材料和情报信息，严重制约了数据价值的发挥和侦查效能的提升，并可能导致“以罚代刑”或犯罪行为长期得不到有效遏制等问题。

（三）数据分析与情报研判的挑战

食品安全犯罪案件涉及的数据类型繁多且规模巨大，包括生产记录、销售数据、物流信息、社交媒体舆情等。这些数据分散在不同系统和平台中，格式各异且质量参差不齐，且犯罪分子常利用加密、伪装等手段隐藏关键信息，导致从海量、异构数据中提取有价值信息成为侦查取证的一大难题。

情报研判作为侦查取证的重要环节，面临精准性难以保证的问题。目前情报来源往往较为单一，主要依赖传统举报和摸排，难以全面反映犯罪真实情况。同时，情报研判方法相对落后，过度依赖人工分析和经验判断，难以有效应对日益复杂的犯罪手段和网络化犯罪模式，制约了情报研判的精准性，影响侦查决策的科学性。

（四）跨境犯罪与国际合作的挑战

全球化背景下，食品安全犯罪日益呈现出跨境化、国际化趋势。犯罪分子利用不同国家和地区间的法律差异、监管漏洞，进行跨境作案和资产转移，给我国侦查取证工作带来严峻挑战。跨境食品安全犯罪具

有涉案范围广、犯罪链条长、证据收集难等特点,往往涉及多个国家和地区,侦查取证工作需跨越国界,协调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执法机构,难度极大。

当前,我国在跨境食品安全犯罪侦查合作中,仍面临法律制度衔接不足、合作机制不够顺畅、信息共享渠道有限等问题。不同国家和地区间法律体系、司法协助机制的差异以及信息共享的障碍,使得证据的跨境获取和人员的引渡变得困难重重,与国际先进水平相比仍有提升空间,尤其是在数据主权和隐私保护的背景下,如何高效安全地进行信息交换和证据互认,是亟待解决的难题。

二、食品安全犯罪侦查取证的对策与路径

(一) 强化证据保全与技术支持,应对证据特性挑战

为有效应对物证的动态性、脆弱性及犯罪分子系统性销毁证据的挑战,亟需提升侦查机关的快速反应与现场勘查能力。应建立移动侦查取证实验室,配备先进的现场勘查、物证固定与初步检测设备,确保在第一时间对犯罪现场进行全面、高效的证据保全。同时,加强侦查人员反销毁侦查技能的培训,利用区块链技术等新型科技,对电子证据进行实时存证与溯源。例如,通过将关键电子证据(如电子交易记录、生产配方、网络通信记录等)的哈希值上链,确保证据的完整性与不可篡改性,有效应对犯罪分子的销毁行为^[5]。然而,区块链证据的刑事采信机制及其法律效力仍需在法律法规层面进一步明确和完善。

面对食品安全犯罪的高度专业化和技术化壁垒,应着力提升侦查人员的专业素养与技术应用能力。构建复合型人才培养体系,通过警校教育与在职培训相结合,使侦查人员掌握必要的食品科学、生物技术、化学分析及信息技术取证知识。同时,建立食品安全专家智库和专业鉴定团队,为复杂案件提供专业咨询和技术支持。此外,加大对先进食品检测技术与设备的投入,推广快速检测、质谱分析、基因测序等前沿技术在侦查取证中的应用,并制定统一规范的取证和鉴定标准,弥合侦查与技术之间的鸿沟,确保证据的科学性和合法性。

针对跨部门、跨区域协作机制的制度性障碍,核心在于构建高效协同的侦查取证联动机制。应在更高层次建立食品安全犯罪侦查协调小组或联席会议机制,明确各行政监管部门与公安机关的职能定位和协作边界,形成常态化协作模式。建设全国统一的食品安全综合信息共享平台,打破信息壁垒,实现企业注册、生产许可、质量抽检、风险监测、消费者投诉举报及行政处罚等数据的实时互通,为刑事侦查提供精准情报支持。同时,完善跨区域执法协作机制,统一证据收集标准和案件移送程序,通过建立区域性联合侦查中心,解决管辖权争议和证据衔接难题,确保证据链条的完整性和连续性。

(二) 创新侦查模式与数据衔接,应对犯罪模式演变

为有效应对食品安全犯罪的“产业链化”特征,亟需从传统的个案打击向全链条、生态化侦查模式转型。侦查工作应以情报主导警务为核心,围绕犯罪产业链的各个环节,从原料采购、生产加工、仓储运输到分销销售,进行全方位、系统性侦查。通过资金流向追踪,深入挖掘犯罪资金的来源、去向及洗钱网络,阻断犯罪资金链条,从经济上摧毁犯罪组织。运用大数据分析和关联图谱技术,深度分析犯罪团伙的组织架构、地域分布和作案规律,精准打击关键节点,实现对整个犯罪网络的瓦解^[6]。

解决行政监管数据与刑事侦查证据衔接转化问题是侦查模式转型的关键支撑。应建立健全“行刑衔接”工作机制,明确行政执法部门向公安机关移送涉嫌食品安全犯罪案件的标准、程序和证据移送要求,确保移送证据的合法性与刑事诉讼证据的效力^{[7][8]}。开发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数据交换接口和平台,推动监管数据与侦查数据的深度融合,实现信息共享、线索互转、证据互认。例如,市场监管部门在日常抽检中发现的不合格产品信息,可以自动与公安机关的涉案线索库进行比对,一旦发现匹配,立即启动侦查程序;消费者投诉举报数据也可作为潜在线索源头。同时,完善相关法律法规,明确行政执法过程中所收集证据在刑事诉讼中的可采信性,提升行政证据的刑事转化效率,避免“以罚代刑”现象。

(三) 强化数据分析与情报研判能力,提升侦查精准度

针对食品安全犯罪案件海量、异构、隐蔽性强的数据挑战,应全面应用大数据、人工智能和机器学习技术。构建专业化的食品安全犯罪数据仓库,整合各类案件数据、行业数据、舆情数据,并开发智能化的

数据分析模型,对数据进行清洗、挖掘、关联分析和模式识别,实现从海量数据中快速提取有价值的犯罪线索和证据^{[9][10][11]}。例如,通过AI算法对海量生产、销售和物流数据进行异常模式识别,发现可疑生产环节或交易网络;对社交媒体舆情进行情感分析和主题挖掘,及时发现并预警潜在的食品安全风险。配备专业的电子数据取证软件与设备,提升从电商平台、社交媒体、加密通信等渠道获取并解析数字证据的能力,并加强对隐藏数据和加密数据的攻坚技术研发,突破犯罪分子的技术反侦查手段。

为提升情报研判的精准性,亟需拓宽情报来源并创新研判方法。在现有举报、摸排等传统方式基础上,积极引入行业协会、消费者组织、媒体舆情、第三方数据公司等多元情报来源,建立多源信息汇聚机制。建设跨部门、多学科的情报融合分析中心,汇集食品科学、刑事侦查、网络安全、经济金融等多领域专家,运用犯罪预测模型、犯罪地理信息系统(GIS)分析、关联图谱分析等先进研判方法,对犯罪形势进行深度分析,预测犯罪趋势,为侦查决策提供科学、前瞻性支持,实现由被动打击向主动预防和精准打击的转变。

(四) 深化国际合作, 应对跨境犯罪挑战

为有效应对跨境食品安全犯罪的严峻挑战,亟需深化国际司法协助与执法合作。积极参与并推动国际司法协助协议的签署,简化跨境取证和引渡程序。加强与国际刑警组织(Interpol)、欧洲刑警组织(Europol)、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FAO)、世界卫生组织(WHO)等国际组织以及相关国家执法机构的沟通协作,建立常态化的信息共享与联络官机制。推动国际食品安全法律法规和检测标准的协调统一,减少犯罪分子利用法律差异和监管漏洞进行跨境作案的空间。在国际合作中,应积极探索在保障数据主权和隐私保护的前提下,建立高效的信息共享和证据互认机制。通过开展联合调查行动和能力建设培训,提升各国在跨境食品安全犯罪侦查方面的协同作战能力,构建全球食品安全联防联控体系,共同维护国际食品贸易秩序和消费者健康。

三、展望与未来方向

本研究通过对食品安全犯罪侦查取证的深入探讨,不仅揭示了当前面临的挑战,更提出了一系列系统性的解决方案。展望未来,随着科技的飞速进步和社会治理理念的持续深化,食品安全犯罪侦查取证工作将朝着智能化、体系化、国际化和专业化的方向持续演进,这既是应对未来挑战的必然要求,也是实现更高水平食品安全治理现代化的关键路径。

首先,科技赋能将推动侦查取证实现智能化跨越。未来,人工智能(AI)在食品安全风险识别和预警中的应用将更加深入,通过机器学习算法对海量数据进行挖掘,构建精准的风险评估模型,实现对高风险区域、企业和产品的智能预警,从而变被动打击为主动预防。区块链技术有望在食品供应链全流程中得到更广泛的推广应用,确保从原材料采购、生产加工、仓储运输到终端销售各环节数据的真实性、透明性与不可篡改性,为侦查取证提供坚实的数字证据链,从源头上遏制假冒伪劣^[12]。大数据分析和图谱技术将进一步升级,精准解构犯罪团伙的组织架构、资金流向和物流轨迹,实现对复杂产业链犯罪网络的全面掌控与精准打击^{[13][14]}。此外,物联网技术在食品生产和流通环节的远程监控与证据采集中的潜力将得到充分挖掘,例如通过智能传感器实时监测食品存储环境参数(温度、湿度)和运输轨迹,一旦出现异常,系统能够自动预警并记录相关数据作为证据,实现异常情况的实时预警与证据的远程固定^[15]。

制度创新与机制完善将构建更加高效协同的治理体系。未来的食品安全犯罪侦查取证将更加注重法律法规的动态完善,以适应不断涌现的新型犯罪形态,特别是针对利用基因技术、新型生物毒素等前沿科技实施的犯罪,需及时修订法律法规,明确罪名界定与证据标准。行刑衔接机制将实现实体化、常态化运作,通过设立专门的协调机构,优化证据移送、案件会商和联合督办流程,确保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之间的无缝衔接,杜绝“以罚代刑”现象,并保障行政证据的刑事转化效力。多部门协同治理将向更深层次发展,通过建立常态化的联合执法行动小组和功能完善的全国统一信息共享平台,细化各部门的权责清单与协作流程,真正形成打击合力。同时,跨区域协作将得到制度性保障,探索建立区域性侦查协作区,统一区域内侦查标准和规范,并逐步推动跨区域管辖和异地用警机制的完善,有效应对犯罪分子的区域性流窜作案,提升公安机关的整体打击效能。

人才培养与国际合作将拓展侦查视野与能力边界。面对食品安全犯罪的日益复杂性和专业化,未来将更加注重培养高素质的复合型侦查人才队伍,通过警校教育与在职培训相结合,培养一批既精通法律和侦查实务,又具备食品科学、生物技术、信息技术等专业知识的复合型人才,尤其是在公安机关内部,将鼓励和支持侦查人员进行跨学科学习与实践。同时,将积极构建多元化的社会共治格局,进一步畅通群众举报投诉渠道,完善举报奖励和保护机制,并鼓励行业协会、科研机构、媒体等社会力量深度参与食品安全监督,形成全社会共同维护食品安全的强大合力。在国际层面,将积极参与全球食品安全治理体系建设,加强与各国执法机构、国际刑警组织(Interpol)等国际组织在情报信息共享、证据协查、联合行动等方面的务实合作,推动国际食品安全法律法规和检测标准的协调统一,并探索解决跨境数据流动中的法律障碍和隐私保护问题,共同应对日益严峻的跨境食品安全犯罪挑战。

参考文献:

- [1] van Ruth S M, Huisman W, Luning P A. Food fraud vulnerability and its key factors[J]. Trends in Food Science & Technology, 2017, 67: 70-75.
- [2] 舒洪水.论我国食品安全犯罪行刑衔接制度之建构[J].华东政法大学学报, 2016(3):12.
- [3] Berghs S, Morrison G S, Goemans-Dorny C. Electronic evidence: 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 for law enforcement[J]. Handling and Exchanging Electronic Evidence Across Europe, 2018: 75-123.
- [4] Soon J M, Manning L, Smith R. Advancing understanding of pinch-points and crime prevention in the food supply chain[J]. Crime Prevention and Community Safety, 2019, 21: 42-60.
- [5] 孙志国,李秀峰,王文生,等.区块链技术在食品安全领域的应用展望[J].农业网络信息, 2016(12):2.
- [6] 曹晨.大数据时代食品监管模式创新性[J].食品安全导刊, 2017(05X):1.
- [7] 张斯涵."行刑衔接"视域下行政违法与刑事犯罪的界分[J].争议解决, 2024, 10(7):170-176.
- [8] Liu Z, Mutukumira A N, Chen H. Food safety governance in China: From supervision to coregulation[J]. Food science & nutrition, 2019, 7(12): 4127-4139.
- [9] 张影.大数据背景下食品安全监控平台建设研究[J].广东科技, 2017, 000(007):77-78.
- [10] 张微.人工智能与大数据在食品安全信息监管中的应用[J].食品安全导刊, 2024(9):135-137.
- [11] Ding H, Tian J, Yu W, et al. The application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d big data in the food industry[J]. Foods, 2023, 12(24): 4511.
- [12] 孙志国,李秀峰,王文生,等.区块链技术在食品安全领域的应用展望[J].农业网络信息, 2016(12):2.
- [13] Bosona T, Gebresenbet G. The role of blockchain technology in promoting traceability systems in agri-food production and supply chains[J]. Sensors, 2023, 23(11): 5342.
- [14] 刘玉洁,廉小亲,赵峙尧,等.基于区块链的食品安全知识图谱可信管理探究[J].农业大数据学报, 2023, 5(3):69-82.DOI:10.19788/j.issn.2096-6369.230311.
- [15] Tian F .A supply chain traceability system for food safety based on HACCP, blockchain & Internet of things[J].IEEE, 2017.DOI:10.1109/ICSSSM.2017.7996119.王雅彬, 应芝, 郑晓园, 等. 热化学硫碘循环制氢系统研究进展[J].能源研究与信息,2021,37(3):169-175.

Research on Investigation and Evidence Collection in Food Safety Crimes

Zhong Yundong¹

¹ Zhongnan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and Law, Wuhan, China

Abstract: Food safety crimes are increasingly complex, covert, technologically advanced, and networked, posing significant challenges to traditional investigation and evidence collection. This study aims to thoroughly analyze the prominent difficulties encountered in investigating and collecting evidence for food safety crimes and to systematically construct a scientific and efficient system of countermeasures. Based on a review of relevant literature, laws and regulations, and practical experience, the research identifies core challenges related to evidence characteristics, evolving crime patterns, data analysis and intelligence judgment, and cross-border cooperation. Addressing these challenges, this paper proposes four key strategies: strengthening evidence preservation and technical support (e.g., mobile laboratories, blockchain technology applications), innovating investigation models and data integration (shifting towards full-chain ecological investigation and improving "administrative-criminal justice linkage" mechanisms), enhancing data analysis and intelligence judgment capabilities (applying big data and AI models), and deepening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These strategies are designed to comprehensively improve the accuracy and efficiency of food safety crime investigation and evidence collection. This study anticipates the future evolution of food safety crime investigation and evidence collection towards intelligence, systematization, internationalization, and professionalization, offering crucial theoretical support and practical guidance for effectively combating such crimes and ensuring public food safety.

Keywords: Food safety offences; investigation and collection of evidence; preservation of evidence; convergence of justice;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数智文化赋能抚州康养产业发展的对策研究

许迅^{1,2} 李亚军¹

(1.南京理工大学, 江苏 南京 210094, 2.东华理工大学, 江西 南昌 330013)

摘要: 随着全球人口老龄化的加速推进, 银发经济已成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在现代科技与康养产业深度融合的趋势下, 抚州康养产业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为推动抚州打造康养产业高地, 本研究从抚州康养产业的建设实践与成效出发, 分析了其发展过程中所面临的挑战。在此基础上, 从数智赋能产业进阶、赋能康养服务升级、激发康养产业活力三大维度, 探究了数智文化赋能抚州康养产业发展的方向与对策。

关键词: 抚州康养产业; 数智文化; 产业赋能; 对策研究

基金项目: 江西省社会科学基金“十四五”(2024年)地区项目“数智赋能助力抚州打造中国康养名城研究”(24ZXDQ33)

DOI: doi.org/10.70693/rwsk.v1i5.1031

近年来, 我国养老产业市场规模在持续提升。与此同时, 在数智文化等新兴领域不断赋能和转型升级的背景下, 现代科技与康养产业正呈现出深度融合的新趋势。抚州积极响应国家关于发展银发经济、增进老年人福祉的号召, 制定了《抚州市森林康养产业规划(2022-2035)》《抚州市生态康养名城建设三年行动计划》《抚州市生态康养名城建设行动方案》等文件政策, 以“养老、养身、养心、养性”为目标, 对全市康养产业发展布局, 逐步形成“一县一风格、县县有特色”的康养发展模式, 构建点、线、面全域发展的康养产业格局。抚州市委主要领导在市五届人大五次会议上强调, 要做大实体产业, 坚持强攻工业不动摇, 瞄准新能源汽车和先进制造业、材料产业、医药和食品产业、数智文化和旅游产业等, 推动产业从“小散弱”迈向“大聚强”。

目前, 抚州康养产业发展势头良好, 各项举措为产业注入了新的活力。然而, 在实际推进过程中, 依然面临着亟待攻克的多重挑战: 资源富集待精琢, 亮点焕新缺数智; 服务精细有短板, 品质进阶需提质; 低空融合绽新蕾, 破壁攻坚正当时。为突围当前困境, 依托东临新区区域优势, 抚州市应深挖特色潜能, 数智赋能产业进阶; 加持数智力量, 赋能康养服务升级; 开拓空域应用, 激发康养产业活力。通过上述多维度举措协同推进, 为抚州康养产业的数智建设筑牢根基, 实现数智文化赋能抚州康养产业蓬勃发展。

一、数智赋能康养产业的发展逻辑

“数智化”概念由北大民营经济研究院于2015年提出, 其核心在于“数字化”与“智能化”的结合^[1]。数智化经历了从信息化到数字化、智能化的演进, 推动生产、生活和治理方式的变革, 加速康养产业由“粗放融合”向“深度融合”升级^[2]。随着康养产业的拓展方向从传统医疗与养老服务延伸至健康生活方式、文化体验和生态康养, 其与文旅产业的互动日益增强, 逐渐形成相互促进、协同发展的局面。同时, 数智技术也促进了产业链、供应链和价值链的深度重构^[3]。

康养产业的发展逻辑不仅依赖于自然资源与文化底蕴, 还受到数字化、智能化、市场化及产业化等多维要素的共同驱动。数智赋能康养产业的内在动因则涵盖人口老龄化与健康需求驱动、新兴技术推动产业创新发展、消费升级与个性化需求增长三方面。新兴技术的快速发展正深刻改变康养产业, 成为驱动产业创新发展的核心内在动因。当前, 以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区块链、虚拟现实(VR)、增强现实(AR)等为代表的

作者简介: 许迅(1989—), 男, 南京理工大学博士研究生、东华理工大学副教授, 研究方向为产品设计、文化产业研究;

李亚军(1962—), 男, 硕士, 南京理工大学教授, 研究方向为工业设计。

通讯作者: 李亚军

新兴技术，正在加速渗透至康养产业的各个环节，实现从内容生产到场景体验，从服务交付到产业管理的全方位优化（见表1）。在新兴技术的加持下，康养产业的产品形态、服务模式和运营体系得到了深刻变革，打破了传统康养产业的空间与时间限制，使健康管理、康养服务、文化体验等要素实现深度融合，智慧康养社区、沉浸式康养体验、个性化健康管理等创新模式开始涌现。此外，新兴技术也促进了供需精准匹配，从个性化推荐、实时健康监测、智能交互体验等方面，促进康养产业正逐步由传统的线下运营模式向数据驱动、智慧运营的方向迈进。

表1 新兴技术在康养产业的应用环节及作用

新兴技术	应用环节	具体作用
人工智能 (AI)	个性健康管理	依据用户数据，智能生成康养方案
	智能交互体验	智能助手、客服等，提升服务便捷性
	运营管理优化	辅助决策，提高运营效率与精准营销
大数据	用户需求分析	分析用户偏好，实现个性化推荐
	市场趋势预测	监测行业动态，优化产品和管理
	资源优化配置	提升康养服务与产品供需匹配度
物联网 (IoT)	健康设备联网	连接智能穿戴设备，事实健康监测
	智慧环境调控	结合智能家居调节温湿度、空气质量等
	实时安全管理	监测老人行动轨迹，预防意外情况
VR/AR	沉浸康养体验	VR 体验虚拟康养场景
	文化场景体验	VR 体验沉浸式文化场景
	虚拟现实融合	AR 增强场景虚拟现实融合
	远程康复训练	VR 远程物理治疗与心理康复
云计算	智慧社区管理	支持数据整合与智能管理
	数据存储与共享	支持跨平台数据同步
	远程医疗与监测	支持云端远程医疗服务
区块链	数据存证与共享	确保数据安全，提升信任度
	交易与支付安全	保障支付的透明度与安全性
	供应链溯源管理	确保康养产品来源可追溯

二、抚州康养产业建设的做法与成效

（一）夯实生态品牌基底，厚植产业发展根基

一是生态建设成果显著，奠定康养产业基础。抚州市大力发展森林康养业态，编制了《抚州市森林康养产业 发展规划（2022-2035）》。目前，全市 9 个县（区）获批为“江西省森林城市”^[4]，共创建省级森林乡村 215 个、乡村森林公园 32 个、国家级森林康养基地 8 个，省级森林康养基地 24 个（见表 2），居全省第一。

表2 抚州市各市森林康养基地数量分布情况表

所属市域	县城名称	森林康养基地数量(个)	在市域中的占比 (%)
抚州市	崇仁县	3	12.5
	东乡区	3	12.5
	广昌县	1	4.2
	乐安县	2	8.3
	黎川县	1	4.2
	临川县	2	8.3
	南城县	2	8.3
	南丰县	2	8.3
	宜黄县	2	8.3
	资溪县	6	25.0

资料来源：根据调研梳理。

二是依托重点景区资源，丰富旅游休闲康养业态。以重点景区为依托，大力发展旅游休闲康养业态。目前，全市共有国家 5A 级旅游景区 1 家、4A 级旅游景区 27 家，国家级夜间文旅消费集聚区 2 家、国家级工业旅游示范基地 1 家。三是促进医养、康养深度融合，拓展中医养生康养业态。积极推进康养产业与养老服务、健康旅游融合发展，如资溪县建设“热敏灸”体验中心；宜黄县中秋小镇成功创评“江西省热敏灸康养小镇”，入选“江西省康养旅游打卡地”^[5]。

（二）特色业态多点开花，形成差异化优势

一是特色康养小镇蓬勃兴起，绘就产业新画卷。依托山岳风光、湖泊水库、地热温泉等丰富资源禀赋，开发健康养生休闲度假目的地。如打造宜黄“康养小镇”、资溪“中国睡都”、南丰蜜桔主题康养、临川温泉疗养等一批特色康养业态。二是多元探索“康养+”融合模式，激活产业新动能。打造“康养”+“健身”+“有机农业”+“休闲观光”+“夜间经济”+“民宿经济”等模式。如临川仙盖山景区以生态农业和中药为主题，开发观光农业、乡村旅游、生态养生、中药健康体验相结合的系列功能产品。三是创新拓展空域应用场景，培育产业新活力。自 2024 年 8 月起，东临新区开启低空经济的深度探索与实践，已获批飞行高度 300 米以下、半径 5 公里的低空空域，并正推进电动垂直起降器（eVTOL）起降场等基础设施建设^[6]。依托灵谷峰景区等独特资源，推出直升机空中观光体验等，进一步增强了康养产业的文化魅力和市场竞争力。

三、抚州建设康养产业高地亟需解决的问题

（一）资源富集待精琢，亮点焕新缺数智

一是资源整合浅尝辄止，康养产品同质高发。抚州市拥有丰富优质的生态与人文资源，为康养产业发展提供了坚实基础。然而，传统的“康养+休闲观光”、“康养+民宿经济”等模式因缺乏数字化创新驱动，导致康养产品在市场竞争中缺乏辨识度，难以形成与周边地区的差异化优势。二是新型体验打造乏力，品牌缺乏数智印记。在数字化浪潮冲击下，抚州康养产业在涉及演艺装备、交互体验等数字化创新类型上也略显不足。除了如文昌里历史文化街区《寻梦牡丹亭》、流坑景区《流芳》这样的少数案例外，能够提供沉浸视听、虚拟互动等新型体验的产品较为稀缺。当前，中医药养生康养业态虽已成为抚州康养产业的“名片”，但仍缺乏具备沉浸式视听体验和虚拟互动功能的特色产品，难以塑造具有广泛传播力、高辨识度，并融入独特“数智印记”的康养 IP。

（二）服务精细有短板，品质进阶需提质

一是智慧服务应用有限，智慧康养联动迟缓。抚州市各级政府积极动员社会力量投身养老服务发展，然而在数智文化传播缺位的背景下，群众对康养理念的认知仍局限于传统“养生”“养老”范畴。其一，目前抚州康养行业对智能推荐、用户画像、数智人技术等 AI 技术的应用仍处于初级阶段，社交媒体、线上科普等数智渠道在广泛普及现代康养理念方面的深度和广度都有待深入挖掘；其二，缺乏融合“景区、住宿、康养、医疗、出行”等多功能于一体的一站式智慧康养平台，未能构建起康养全场景智慧联动生态。二是客群细分尚待深耕，个性服务火候欠佳。为了打造独具特色的康养旅游高地，抚州市各级政府出台了多项文件政策进行谋划，但投资规模超 10 亿元的康养旅游项目数量较少，康养旅游企业普遍较为弱小，难以借助大数据实现规模化、集聚化、带动性发展。在精准定位目标客群方面，仍有较大提升空间，尤其是在基于年龄、健康状况和消费偏好等因素，为客群提供差异化产品和个性化康养方案方面。

（三）低空融合绽新蕾，破壁攻坚正当时

一是跨界联动缺纽带，协同创新遇阻碍。目前，抚州市低空经济资源与康养产业融合尚处初步阶段。低空康养业态似“孤岛”，与传统康养板块未建立紧密资源共享、服务互补机制，游客难以便捷衔接低空特色项目。部分生态项目如森林疗养、湿地康养等，对低空视角的挖掘还不够充分。各板块联动欠缺，缺乏协同创新模式，致产业效能难以充分释放。二是市场启蒙路尚遥，品牌推广需加力。低空康养作为新兴业态，目前在市场推广、品牌塑造、提高消费者接受度等方面仍处于培育阶段，商业模式的探索进程需进一步加快。同时，在市场宣传推广层面，力度仍显不足，尚未精准锁定目标客户群体，也未能充分运用多种渠道和形式，深入宣传低空康养的特色与优势。

四、数智文化赋能抚州康养产业发展的方向与对策

（一）深挖特色潜能，数智赋能产业进阶

一是深挖资源整合潜力，赋能产业数智转型。扎实推进《江西省“数据要素×”三年行动实施方案(2024-2026年)》落地落实，以文旅数据要素为引领，推进抚州旅游休闲康养业态特色资源数字应用，支持采取大数据、人工智能、5G、数字媒体、虚拟现实等手段，整合落地一批具有抚州特色的康养资源数字应用。同时，建议开展“传统康养产业数字化改造”与“未来数字康养产业化提升”两大关键任务，国有企业应肩负起应尽职责，在推进“三资”清查工作的基础上，强化各类康养资源的数字化建设，推进康养资源数字应用创新。通过强化康养产业与多领域的融合发展以及数字化技术的深度应用，拓展康养产业发展空间、提升康养产品服务质量。

二是强化龙头景区引领，打造品牌数智印记。精选高吸引力龙头景区，借助数智技术融合流量与康养元素，打造具有国际国内影响力的康养旅游品牌。以医药健康产业为例，作为江西“1269”行动计划 12 条重点产业链之一，建议深挖宜黄、南城等地中医药资源，用大数据精准洞察游客中医康养需求，定制专属服务。同时，借助 VR、AR 技术开发沉浸式中医文化体验项目，如模拟古代中医问诊场景、展示中药材的生长过程等，打造“中医+数智康养”新品牌。

（二）加持数智力量，赋能康养服务升级

一是助力企业数智转型，升级康养智慧服务。紧紧围绕全省制造业数字化转型工作部署，深入贯彻落实《抚州市制造业数字化转型实施方案》《抚州市制造业数字化转型行动计划》等系列文件精神，全方位纵深推进制造业数字化转型。以龙头骨干企业为示范引领，大力推动先进数字技术的深度应用。其一，积极引导康养产业上下游企业，深度部署如 DeepSeek、通义千问、文心一言等国内先进的人工智能软件，并广泛应用于康养产业的具体服务内容。例如，通过人工智能技术集成抚州康养信息，提供智能筛选和精准推送服务；依托 AI 的“上下文推理”能力打造虚拟主播、优化康养咨询等智能客服场景，提升客服系统的自动化程度、精准度；借助 AI 的“自然语言处理”和“语音识别”能力，支持国际旅游的多语种智能服务；根据用户偏好匹配个性化康养方案，实现智能行程规划、旅游线路推荐及最优消费组合建议。其二，精准招商，积极推动数字化健康服务产品的创新，拓展未来康养产业新方向，支持面向个人及家庭的健康检测、实时监测预警、养老物联网等技术的研发与应用。通过招商引资，引入相关技术应用企业，推动智能手环、智能手表、智能眼镜等可穿戴设备的研发，并促进智慧睡眠、智能健身等健康家居产品的创新与落地。

二是提升数智个性服务水平，盘活提升产业存量空间。其一，支持商业综合体、康养基地、景区、街区、文化产业园区等依托数字化技术创新康养消费场景，运用智能感知、数据分析、沉浸式交互等手段，整合 XR、元宇宙、AI 等数智技术，推动康养产业向智能化、个性化发展。其二，深化康养服务与医疗、交通、旅游等产业的融合发展，丰富健康管理、康复理疗、冥想瑜伽、自然疗愈、文化养生、康养主题餐饮等多元业态。拓展涵盖孕产护理、避暑度假、疗养康复、文化创作等多元化的全龄段家庭旅居康养服务，吸引不同年龄层的群体共同前往抚州休闲康养。对传统康养产品与服务进行优化升级，推动其向远程医疗、智能康复、VR 沉浸式康养旅游、智慧健康体验等创新业态转型，以焕新市场吸引力并实现价值提升^[7]。其三，打造“景区、住宿、康养、医疗、出行”等多功能于一体的一站式“抚州智慧康养平台”，通过数据共享和协同合作，为用户提供更加便捷、高效的服务。此外，打造智慧康养联动平台，整合各方资源和数据，实现信息的互联互通和智能调度。

（三）开拓空域应用，激发康养产业活力

一是深挖低空康养资源潜力，闭环低空康养产业。依托优质空域资源与通用航空基础，推动低空飞行与康养产业深度融合，拓展服务场景，提升区域吸引力与市场竞争力。其一，拓展 eVTOL 在多场景下的应用，例如开通景区货物运输通道、低空医疗运输通道，丰富无人机表演等低空经济新业态。其二，推动低空观光与健康旅游，结合自然疗愈地（如温泉、森林公园等）开发低空观光航线，结合中医康养业态推出“飞行+养生”套餐，如飞行至中医康养中心等。其三，利用 VR 技术与无人机结合，打造沉浸式低空飞行体验。在疗养基地内构建“VR+无人机”模式，使用户足不出户即可享受低空飞行的沉浸式感官体验。

二是推动低空康养市场启蒙，强化特色康养体验。进一步完善宣传矩阵，充分利用抖音、微博、微信、小红书、B 站等网络新媒体平台，拓展低空康养辐射圈，增强公众认知与市场接受度，打造具有影响力的低空康养品牌。借助 VR、AR 技术开发特色空中观光线路虚拟体验，展现森林、湿地等生态景观魅力，吸引客源。同时，

建议与知名旅游、健康媒体合作,强化“抚州文旅”栏目、“抚州文化旅游”抖音号、“抚州旅游”微信公众号等现有平台的内容建设^[8]。依托东临新区区域优势,策划“抚州低空康养达人体验”等宣传推广活动,通过增强公众认知,推动商业模式完善与品牌塑造,以独特资源满足人们对“康养抚州,梦想之舟”的向往。在此基础上,总结凝练康养产业“抚州经验”,辐射周边,激活上下游产业潜能,汇聚产业要素,推动产业由“小散弱”向“大聚强”转变。

五、结语

在现代科技与康养产业深度融合的背景下,抚州康养产业需要紧紧抓住数智化与文化赋能的发展机遇,推动产业升级与高质量发展。通过深入挖掘各地康养产业的特色潜能,结合数字技术与智能化手段,推动康养服务模式创新与产业升级。同时,拓展空域经济在康养领域的实践路径,构建高效、便捷、个性化的康养服务体系,全面激发康养产业的内生动力与市场活力。未来,抚州应进一步加强政策支持、技术创新和资源整合,助力康养产业实现智能化、特色化、可持续化发展。

参考文献:

- [1] 杨鑫,万玉霜.数智赋能赣南革命老区康养产业发展探究[J].苏区研究,2023,(02).
- [2] 马然.文旅康养产业融合发展探赜:动因机制、价值意蕴及共生发展举措[J].商业经济,2025,(01).
- [3] 邓丽姝.推动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的机制与路径研究[J].商业经济研究,2023,(14):189-192.
- [4] 抚州市人民政府.抚州新增一个“省级森林城市”[EB/OL]. (2023-03-13)[2025-04-02].http://www.jxfz.gov.cn/art/2023/3/13/art_3826_3967355.html.
- [5] 宜黄县人民政府.赞!宜黄中秋小镇荣登 2020 年百家“江西康养旅游打卡地”名单! [EB/OL]. (2020-05-19)[2025-04-02].http://www.jxyh.gov.cn/art/2020/5/19/art_5253_3401618.html.
- [6] 东临新区管理委员会.2024 高质量发展答卷|逐鹿低空经济新赛道,振翅腾飞正当时[EB/OL]. (2025-02-07)[2025-04-02].http://dlxq.jxfz.gov.cn/art/2025/2/7/art_8123_4269343.html.
- [7] 杨红,夏茂生.基于动态演化博弈的康养旅游产业融合演化机制及路径研究[J].云南财经大学学报,2022,38(07).
- [8] 何华丹.江西省市级媒体融合发展的的问题与对策研究[D].南昌大学,2023.

Countermeasures Research on Digital Intelligence Culture Empowering the Development of the Health and Elderly Care Industry in Fuzhou

Xu Xun^{1,2}, Li Yajun¹

¹ Nanji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Nanjing, China

² East China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Nanchang, China

Abstract: With the acceleration of global population aging, the silver-haired economy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force to promote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Under the trend of deep integration of modern technology and the health and elderly care industry, Fuzhou's health and elderly care industry has ushered in new development opportunities. In order to promote Fuzhou to build a highland of the health and elderly care industry and cultural services, this study analyzes the challenges faced during its development from the construction practice and effectiveness of Fuzhou's health and elderly care sector. On this basis, it explores the direction and countermeasure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Fuzhou's health and elderly care industry empowered by digital intelligence from the three dimensions of digital intelligence empowering industrial advancement, empowering the upgrading of elderly care services, and stimulating the vitality of the health and elderly care industry.

Keywords: Fuzhou Health and Elderly Care Industry; Digital Intelligence Culture; Industrial Empowerment; Countermeasure Research

“小鸭舍·大振兴”：

生态养殖模式对乡村可持续发展的路径探究

陈铭杨¹ 樊震怡² 章浩³ 冀文慧^{*}

(1.集宁师范学院, 内蒙古 乌兰察布 012000)

摘要：内蒙古赤峰市敖汉旗下井村通过实施“小鸭舍·大振兴”生态养殖模式，有效推动了乡村经济的多元化发展，促进了农民增收与就业，同时减轻了环境污染，实现了经济效益、社会效益与生态效益的协调统一。本文详细阐述了该模式的实施背景、具体内容、对乡村可持续发展的影响以及面临的问题与对策，旨在为其他乡村地区提供可借鉴的发展经验。

关键词：乡村振兴；生态养殖模式；可持续发展；农民增收；环境污染

Doi: doi.org/10.70693/rwsk.v1i5.929

一、引言

在“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的国家战略框架下，我国农牧交错带生态脆弱区的可持续发展面临严峻挑战。这类区域既是保障粮食安全的重要农业产区，又是维系生态安全的关键屏障，长期承受着产业升级动力不足与生态系统退化的双重压力。以内蒙古赤峰市敖汉旗下井村为例，地处科尔沁沙地南缘的地理区位使其成为典型的生态敏感区域，干旱少雨的气候条件与过度垦殖的历史遗留问题，导致传统旱作农业陷入“低产低效—生态退化”的恶性循环，土地沙化、土壤盐碱化与水资源短缺等问题交织，严重制约着乡村振兴进程。

本研究聚焦于下井村探索形成的“小鸭舍·大振兴”生态养殖模式，该模式立足区域资源禀赋与生态约束，创新性构建“养殖—粪污处理—有机种植”的闭合循环产业体系。通过引入标准化鸭舍养殖技术，将畜禽养殖产生的粪污进行集中化、资源化处理，经厌氧发酵转化为沼气能源与有机肥料，形成“养殖供能—肥料还田—有机种植—饲料补给”的全产业链生态闭环。这一实践不仅突破了传统养殖业面临的污染治理难题，更通过物质能量的高效循环利用，实现了农业生产从“资源消耗型”向“生态循环型”的范式转变。作为生态脆弱区产业转型的典型样本，该模式在破解资源环境约束瓶颈、构建产业生态化与生态产业化协同发展机制等方面具有重要研究价值，其经验可为同类地区提供产业振兴与生态保护双赢的路径参考，助力筑牢国家生态安全屏障的同时激活乡村内生发展动能。



图1 下井村概貌

作者简介：陈铭杨(2005-)，女，本科，内蒙古赤峰市，研究方向为物理学；

樊震怡(2006-)，女，本科，内蒙古呼伦贝尔市，研究方向为物理学；

章浩(2002-)，男，本科，内蒙古呼和浩特市，研究方向为人工智能。

通讯作者：冀文慧(1982-)，男，博士，内蒙古乌兰察布市，物理学，307204@jnnu.edu.cn (W. H. Ji)

下井村概况

下井村位于内蒙古赤峰市东南部，地处农牧交错带，处于努鲁尔虎山区向科尔沁沙地过渡的丘陵地带，属浅山丘陵区，地势南高北低，平均海拔 545 米。这里水资源丰富，境内河道属西辽河水系，主要河流孟克河发源于丰盛店村的赖毛沟山，其支流北扎兰营子河流经下井村。根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村里常住人口以老人和妇女为主，年轻人多选择外出打工谋生。长期以来，传统畜牧业发展面临资源约束与生态保护压力的双重挑战。为突破发展困境，下井村积极响应国家政策，实现乡村经济转型升级，探索生态养殖模式，力求走出一条可持续发展的新路径。

二、生态养殖模式内容



图 2 鸭舍概貌

下井村生态养殖模式以“绿色生态、高效益、可持续”为核心理念，通过科学规划鸭舍建设、精准应用养殖技术、构建完善的生态循环体系以及精心选择与繁育优良品种，实现了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的协同提升。鸭舍选址充分考虑水源、通风等因素，采用环保材料，并配备先进的温控、通风设备，为鸭子营造舒适的生长环境。在养殖技术应用方面，下井村结合本地资源，科学配制饲料，满足鸭子营养需求，并建立完善的疫病防控体系，确保养殖效益。同时，通过沼气池处理鸭粪，形成“养殖-沼气-种植”的生态循环链条，既有效减轻环境污染，又提升土壤肥力，助力农作物增产提质。此外，下井村注重品种选择与繁育，精选适应性强、生长快、品质优的小鸭品种，并建立自繁自育体系，降低养殖成本，提升市场竞争力。该模式为乡村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可借鉴的经验^[1]。

三、下井村生态养殖模式的多维探索与实践

（一）下井村的养殖模式起源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首次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积极响应国家政策，赤峰市敖汉旗新惠镇政府迅速行动，多举措并行，全力推动乡村振兴战略落地见效^[2]。2021 年起，新惠镇利用乡村振兴资金 350 万元启动育肥鸭养殖小区建设项目。项目运营后，可实现 4000 余万元的年产值，为当地经济发展注入了强劲动力。下井村“小鸭舍·大振兴”生态养殖模式通过科技养殖、废弃物资源化、产业链延伸等路径，推动乡村经济多元化转型，实现生态与经济双赢。该模式提升养殖效率，拓展国际市场，创造就业机会，带动基础设施升级，形成良性循环，为乡村可持续发展提供范例。

（二）对周边生态环境的影响

下井村“小鸭舍·大振兴”生态养殖模式在生态保护上成效显著。通过沼气罐对鸭粪进行集中处理，使其发酵产生沼气，沼气作为清洁能源用于村民日常生活，实现清洁能源利用与有机肥料转化，替代传统养殖的污染排放。养殖废水循环灌溉，形成水资源闭环。持续施用有机肥改良土壤，降低面源污染。青饲料种植扩大植被，遏制土地沙化，重现生态平衡。村民环保认知提升，形成产业与生态保护的正向循环。

（三）下井村鸭类养殖业的可持续发展策略

截止到 2024 年 12 月，下井村鸭类养殖业共争取乡村振兴资金 1050 万元，建规模养鸭小区，总面积 120 亩，建有鸭舍 19 栋，每年养 6 批，每批 19 万羽，每栋 1200 平米，一期工程于 2021 年年末全部投入使用，每年出栏 42 万羽。二期工程于 2024 年 10 月份建成投产，年可出栏肉鸭 72 万羽，两期工程全部达产投效年可出栏肉鸭 114 万羽，每羽 35 元左右，年可实现产值 4000 多万元。

除此之外，还被桂柳公司列为标准化养鸭小区，桂柳集团总部和海关长期来鸭舍指导技术，总部为鸭舍已办理完出口资质，出口于俄罗斯、东南亚、吉尔吉斯斯坦，每年可实现壮大集体经济 47.5 万元。

下井村鸭类养殖业构建系统性可持续发展策略，实现生态与经济效益双赢^[3]。生态循环上，以鸭粪利用为核心，形成种植养殖闭环，降低污染；技术赋能上，与龙头企业合作，推行“六统一”标准化养殖，配

套技术培训；产业融合上，延伸关联产业，开发乡村旅游；市场拓展上，线上线下结合，提升产品附加值；保障机制上，争取政策扶持，强化科研合作，培育村民环保意识，构建可持续发展共同体^[4]。

下井村生态养殖模式以系统性创新推动绿色转型，在养殖技术、品种选育及产业协同方面形成特色实践。鸭舍选址注重水源与通风条件，采用环保建材及智能环境调控系统，构建适宜生长空间。技术上融合本土资源优化饲料配方，建立精细化疫病防控体系，保障养殖效能。品种培育方面实施自繁自育闭环管理，既降低养殖成本，又强化市场竞争力。通过“养殖-沼气-种植”闭环实现废弃物基本利用，同步提升土壤质量与生态效益，形成“科技+生态+经济”的可持续模式，为乡村振兴提供创新路径。

四、生态养殖模式对乡村可持续发展的影响

在“小鸭舍·大振兴”生态养殖模式对乡村可持续发展的多维影响呈现出清晰且显著的实践路径^[5]。从经济层面审视，生态养殖模式为下井村这一典型样本开辟了多元化的增收渠道。依托养殖产出、有机肥销售以及相关产业就业等多重路径，该村成功实现了年产值超 4000 万元的经济飞跃，村集体经济由此获得了实质性的增长。更为关键的是，该模式不仅直接提升了经济效益，还推动了产业融合增值的进程。饲料加工、禽肉加工等产业的蓬勃兴起，为乡村经济注入了新的增长动力，构建了经济持续增长的良性循环体系^[6]。

生态养殖模式成为破解农村剩余劳动力难题的有效策略，创造了大量就业机会，吸引了村民就地就近就业。据调查发现，按照工作量计算，这里的工人月工资最高能达到 9000 元。村民参与养殖场工作后，家庭人均年收入实现了数万元的跨越式增长。有的村民凭借在养殖场学到的技术，还利用自家庭院搞起了小规模的家畜养殖，增加了家庭收入渠道。目前，养殖小区每年能为 50 名本村和周边村的村民提供长期或临时的工作岗位，既服务了企业发展，也为当地创造了家门口就业的机会。来此打工的村民张永军，他感触颇深地说：“以前单靠种地，全凭老天赏饭吃。现在村里高标准农田建设提高了土地产出，我还能在养殖场学技术、挣工资，这样的生活越过越有劲儿！”这一转变不仅促进了乡村人口的稳定，还间接推动了乡村治理。通过成立养殖专业合作社，村民得以深度融入产业决策与管理过程，其能力得到实质性提升，集体凝聚力显著增强，共同塑造了乡村社会和谐发展的新图景。

在生态方面，生态养殖模式对环境保护与生态平衡的贡献尤为显著。通过实施科学的废弃物处理方案，下井村实现了养殖废弃物的资源化利用，有效缓解了环境污染压力。同时，该模式还积极促进了生态平衡的保护与生物多样性的恢复，为乡村构建了一个更加健康、可持续的生态环境。这一转变为下井村的可持续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五、下井村生态养殖：问题挑战与应对策略研究

下井村生态养殖在推动乡村振兴进程中成效显著，然而实践过程中暴露出的多重问题严重制约其可持续发展。技术层面，养殖户普遍缺乏智能环控设备操作经验，鸭舍内温湿度与通风系统有时出现调节失准，导致肉鸭生长周期延长，正常 40 天出栏的标准难以保障，疾病发生率较标准化养殖高出 18%。人才缺口更使技术创新举步维艰，难以支撑新型养殖技术的研发与推广。市场端风险加剧，2024 年全国肉鸭价格波动达 20%，下井村过度依赖桂柳牧业等单一收购渠道，且终端产品以白条鸭为主，附加值低。受南北消费偏好差异影响，北方白羽肉鸭在南方市场竞争力不足，一旦企业压价或拒收，养殖户将面临“出栏即亏损”的严峻局面。

资金困境同样突出，尽管 2024 年二期 80 亩养殖项目获得乡村振兴衔接资金支持，但后续运营维护与技术升级资金缺口巨大。饲料供应方面，敖汉旗旱作农业特征显著，玉米、豆粕等核心饲料原料自给率不足 40%，依赖东北三省调运，2024 年玉米价格同比上涨 15%，叠加 8%-12% 的运输成本，饲料开支占养殖总成本高达 70%，严重压缩利润空间。环保层面，随着养殖规模扩大，粪污处理设施接近饱和，若不及时升级，可能引发新的环境风险，动摇生态养殖根基。

针对上述问题，需构建系统性解决方案。在人才培育与技术革新上，应联合科研院所建立实训基地，开展智能环控、疫病防控等专项培训，提升养殖户实操能力；技术层面加快引入温湿度智能调节、有害气体自动监测系统，降低环境控制风险。市场应对方面，需完善监测预警机制，通过大数据分析精准预判价格走势，并拓展销售渠道，开发鸭肉深加工产品提升附加值。资金保障上，积极争取政策扶持，吸引社会资本参与。饲料供应环节，可探索与东北原料产区建立长期合作，或因地制宜开发本地替代饲料，降低运输成本与价格波动风险，推动生态养殖行稳致远。

六、结语

在乡村振兴的时代浪潮中，下井村积极探索，走出了一条独具特色的发展道路，“小鸭舍·大振兴”生

态养殖模式便是其核心引擎。过去,下井村面临着产业结构单一、生态环境压力较大等发展难题。而该模式的落地,宛如一把“金钥匙”,打开了村庄发展的新大门。

通过科学规划小鸭舍的布局,合理利用当地的土地、水资源,下井村构建起了一个集鸭子养殖、粪便资源化利用、生态种植于一体的循环农业体系。鸭子在舒适的鸭舍中生长,其产生的粪便经过处理后,成为了农田里天然的有机肥,滋养着各类农作物。这种生态养殖方式,不仅降低了养殖成本,减少了环境污染,更创造了可观的经济效益。同时,该模式还带来了显著的社会效益,吸引了更多年轻人返乡创业,提升了乡村的活力和凝聚力,改善了乡村的人居环境。

展望未来,下井村深知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性。为了在乡村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道路上迈出更坚实的步伐,村里计划继续加大在养殖技术、粪便处理技术等方面的研发投入,不断提升养殖的科学化、智能化水平。此外,还将积极延伸产业链,发展鸭肉深加工、生态旅游等产业,让更多的村民在产业链的各个环节受益。

下井村的成功经验为其他乡村地区提供了有益的借鉴。各地在学习时,不应简单照搬照抄,而是要深入分析自身的自然条件、资源优势和市场需求,因地制宜地探索适合自己的生态养殖模式。只有将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有机结合,才能走出一条产业兴、生态美、农民富的乡村振兴之路。

参考文献:

- [1] 施振旦,麦燕隆,赵伟.我国鸭养殖模式及环境控制现状和展望[J].中国家禽,2012,34(9):1-6.
- [2] 谢昕莹,王小林.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内生发展动力:框架构建、政策特征与提升路径——基于“目标—工具”视角的政策文本分析[j/ol].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14.
- [3] 陈建鑫.乡村振兴背景下我国畜牧产业新质生产力发展水平测度及其演变特征分析[j/ol].饲料研究,2025(06):188-192.
- [4] 邓新艳,廖和平.新质生产力赋能乡村全面振兴的价值意蕴及路径选择[j/ol].安徽乡村振兴研究:1-10.
- [5] 杨丽端,王克敏,杨明,刘蓓.文旅赋能乡村产业振兴的路径研究[j/ol].安徽乡村振兴研究:1-8.
- [6] 王子月,田云刚.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的文化意蕴[j].中国集体经济,2025,(6):1-4.
- [7] 周宏春.乡村振兴背景下的农业农村绿色发展[J].环境保护,2018,46(07):16-20.

“Small Duckhouse - Big Revitalization”: An Exploration of the Path of Ecological Farming Model to Sustainable Rural Development

Chen Mingyang¹, Fan Zhenyi², Zhang Hao³, Ji Wenhui^{*}

¹Jining Normal University, Ulanqab, China, 012000

Abstract: Through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small duck house - big revitalization” ecological farming model, Xiajing Village, Aohan Banner, Chifeng City, Inner Mongolia, has effectively promoted the diversified development of the rural economy, facilitated the income and employment of farmers, and at the same time alleviated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realizing the coordination and unity of economic benefits, social benefits and ecological benefits. This paper describes in detail the background of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is model, the specific content, the impact on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the countryside, as well as the problems and countermeasures, with the aim of providing reference development experience for other rural areas.

Keywords: Rural revitalization; ecological farming model;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farmers' income;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红色旅游线路中的乡村公共艺术介入研究

——以大别山红安县为例

张智乐¹ 吴楚君¹

(1.湖北文理学院, 湖北 襄阳 441053)

摘要:在国家乡村振兴与红色旅游融合发展背景下,本研究聚焦大别山革命老区红色旅游线路中公共艺术建设“符号空壳化”问题。研究发现,当前红色文化地标存在艺术与红色精神叙事脱节、参与机制欠缺、可持续运营体系不健全及在地文化资源挖掘浅表化等症结。提出叙事性艺术装置重构红色记忆空间、数字技术增强体验、“政社艺”协同管理、本土资源创新转化策略。旨在强化红色旅游线路的文化标识与情感共鸣,助推乡村振兴与红色文旅融合发展。

关键词:红色旅游;乡村公共艺术;文化地标;艺术装置;大别山红安县

DOI: doi.org/10.70693/rwsk.v1i5.1023

在国家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与红色旅游融合发展的战略背景下,红色旅游线路作为赓续红色血脉、活化乡村资源的重要载体,已成为革命老区实现文化振兴与经济发展的关键路径。大别山革命老区作为中国革命的重要策源地,其红色文化遗产与乡村空间的共生关系具有典型性与研究价值。然而,当前红色旅游线路中的公共艺术建设普遍面临“符号空壳化”困境:艺术介入与红色精神叙事脱节、游客参与度不高及体验感薄弱、文化资源转化浅表化等问题,导致红色文化的传播效能与能够产生的情感共鸣不足。以红安县为例,其丰富的红色资源与乡村振兴诉求亟需通过公共艺术的创新介入,以实现文化价值的深度挖掘与场景重构,从而提高游客情感共鸣。本研究聚焦乡村公共艺术在红色旅游线路中的实践逻辑,旨在探索艺术赋能红色文化传承与乡村空间活化的系统性策略,为革命老区文旅融合与可持续发展提供理论与实践参考。

既有研究围绕红色旅游线路规划中的公共艺术介入主题展开。在红色旅游领域,多从红色旅游资源整合开发^[1]、红色文化遗产保护^[2]等视角探讨线路开发模式;公共艺术研究则集中于空间美学^[3]与社会功能^[4]的讨论。近年来,部分学者开始关注艺术介入乡村的实践,如^[5]提出公共艺术作为乡村全面振兴的媒介功能,但多聚焦于传统村落,对红色文化场景的特殊性缺乏针对性分析。国外研究中,“记忆景观”^[6]与日本“在地性艺术节”的实践经验。这些成果虽为本研究提供了启发,但也存在三方面局限:其一,红色旅游线路中艺术介入的系统性策略研究匮乏;其二,对数字技术赋能、政社艺协同机制等创新路径关注不足;其三,案例研究多停留于现象描述,缺乏对在地文化转化逻辑的深度解构。这些空白也为本研究提供了理论突破空间。本研究以红安县红色旅游线路为实证对象,采用文献分析、跨案例对比方法,尝试剖析乡村公共艺术介入红色场景的实践症结与优化路径。

一、研究红色旅游线路中公共艺术介入的理论现实意义

(一) 乡村振兴战略与红色旅游融合发展

在乡村振兴战略与红色文旅融合的宏观背景下,红色旅游线路不仅是革命精神传承的载体,更成为激活乡村经济、重构文化认同的重要抓手。国家《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明确指出“挖掘乡村特色文化资源,发展红色旅游等新业态”,为红色文化资源的价值转化提供了政策依据。以红安县为例,该地区依托“中国第一将军县”的历史定位,通过“红绿结合”发展模式,2022年实现旅游综合收入66亿元左右,带动全县文化及相关产业增

作者简介:张智乐(2005—),女,本科生,公共艺术;

吴楚君(1991—),男,副教授,硕士生导师,现代艺术创作,文化遗产转化,传统工艺美术保护。

值,印证了李德山提出的文旅融合显著提高了乡村振兴水平^[7]的理论观点。在文化协同机制层面,红色旅游通过场景重构实现了革命记忆的当代转译。如贵阳长征数字科技馆将红军长征的历史文化与虚拟现实技术,使游客沉浸式体验“长征”历史场景。这种实践印证了布尔迪厄的文化资本再生产理论,即通过符号化叙事将革命精神转化为可感知的文化产品。例如,研究表明高职院校学生获取广东红色文化知识的途径中,红色旅游占 12.5%(150 人),占据较大比重,证明文旅融合能有效强化集体记忆传承。^[8]

(二) 公共艺术介入红色旅游的实践需求

当前红色旅游普遍存在“纪念碑式”展示的路径依赖,据文旅部调查显示,大多数的红色景区仍以静态展陈为主,导致游客平均停留时间极短。红安县前期发展同样面临此类困境,其多处重点革命遗址的游客重游率低下,反映出文化体验的浅层化危机。这验证了麦克卢汉“媒介即讯息”理论——单一的展陈媒介难以承载多维度的文化内涵。

公共艺术的介入为此提供了破题路径。在理论层面,冯建平提出公共艺术的三大功能:审美功能、对生存空间的改良功能、对民众的教化功能。实践层面,江西井冈山旅游区的进山标识性公共艺术——“天下第一山”占地 1600 平方米,主体高 19.27 米。总体造型为一面动态红旗矗立在万山丛中,既体现了历史的内蕴又展示了艺术的美感。它们都已成为了景区的重要标志物。这种介入方式契合列斐伏尔“空间生产”理论,将革命历史转化为可参与的空间实践。

(三) 大别山红安县的典型性与研究价值

红安县作为鄂豫皖革命根据地核心区,拥有各级文物保护单位 479 处、革命遗址遗迹 186 处,其资源密度较高,属于大别山红色文化圈典型样本。但前期开发存在“重申报轻运营”问题,多数红色景点年维护投入不足,导致文化资源转化率较低。该案例的研究示范价值体现在:其一,其“点轴式”红色遗址分布特征(以七里坪镇为核心沿公路辐射)为线性公共艺术布局提供空间基础;其二,推进“红色记忆走廊”项目,通过 8 公里艺术装置带连接分散遗址,形成“可视化的革命史诗”,为破解红色旅游碎片化问题提供实践范式。正如吴必虎所指出的,县域尺度最能体现文旅融合的“政策—资源—市场”三元互动机制,红安模式对同类革命老区具有普适参考价值。

二、红安县红色旅游线路中公共艺术介入的现状以及存在的具体问题

(一) 空间分布失衡:核心景区过度集中与乡村节点缺失

数据分析表明(如表 1),红安县大多数的公共艺术装置密集分布于烈士陵园、革命纪念馆等核心景区,而乡村道路、传统村落等生活空间的覆盖率较低。这种景区依附性布局导致公共艺术与乡村日常空间割裂,削弱了文化传播的渗透力。

景点	位置	特点
黄麻起义和鄂豫皖苏区革命烈士陵园	华家河镇新庙村陵园大道	包括晋普德野战军司令部旧址、刘伯承、邓小平、李先念等领导人的居住处。
黄安三区农民协会旧址	七里坪镇联山村张石河湾	包括牌坊、纪念碑、烈士祠、纪念馆等,展示 230 名烈士的事迹和遗物。
西江家湾革命旧址	华河镇新庙村西江家冲	原为张氏宗祠,建于清末,砖木结构,建筑面积 435.12 平方米。
红安七里坪革命旧址	七里坪镇列宁小学旧址	包括纪念碑、墓园、纪念馆等多个纪念建筑,被评为国家 AAAA 级旅游景区。
红二十八军抗日干部训练班旧址	七里坪镇盐店河村	保存完好的革命旧址 40 余处,包括鄂豫皖特区苏维埃、革命法庭、工会、银行等。
鄂豫皖省委旧址	槐树岗乡长冲村	包括红二十八军展陈馆、军政旧址复原陈列等,展示红军鄂豫皖三年游击战争的光辉历程。
李先念故居纪念馆	高桥镇长丰村李家大屋	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曾是一家大地主的住宅,拥有七栋中式楼房和 60 余间房屋。

表 1 红安县主要红色旅游景点分布

(二) 艺术形式符号化:革命意象的程式化复制与创新匮乏

调研显示,红安县半数以上的公共艺术为纪念碑、群雕等传统形式,且大量重复使用“红旗”“火炬”等符号。跨案例对比发现,其与井冈山、延安等地的同质化率较高。这种符号化倾向暴露出两大问题:一是对革命文化的表层图解,忽视个体叙事与民俗记忆的多元表达;二是未能通过当代艺术语言重构红色基因,导致审美疲劳与文化认知的浅表化。

(三) 技术互动性不足:数字媒介应用滞后与体验浅表化

尽管 AR/VR 技术被证实能突破时空界限、增强学习体验、实现跨界知识融合、激发读者求知欲和探索心等,^[9]但红安县数字艺术装置覆盖率不足 15%,现有交互设计多局限于静态展板与二维码扫码解说。技术应用的滞后性导致文化传播仅仅停留于单向输出。

(四) 本土文化转化薄弱:非遗元素移植与语境脱节

红安县虽有丰富的红色歌谣、皮影戏等非遗资源，但艺术装置的文化体验提升效果不足。七里坪镇等地的公共艺术多直接挪用剪纸纹样、红军标语等符号，却未与当代乡村生活场景融合。这种“符号拼贴”现象暴露了文化转化的双重困境：一是对非遗基因的提取停留在视觉表层，缺乏精神内核的当代转译；二是未能构建红色文化与乡土生活的叙事关联，导致“政治性”与“生活性”的空间张力失衡。

三、系统性优化红安县红色旅游线路中的公共艺术介入策略的建议

(一) 艺术介入的“空间-叙事”双维优化

基于大别山红安县红色旅游线路的线性特征，可以尝试“核心区-辐射带-微节点”三级空间架构。以黄麻起义和鄂豫皖苏区纪念园为核心锚点，通过 10 公里辐射半径串联红安县革命烈士纪念墙、董必武故居等二级节点，在沿线乡村选取 20 处闲置空间（如村口广场、废弃粮仓）植入公共艺术装置。空间布局遵循“视觉引导-场景渗透-情感共振”的递进逻辑，形成红色记忆的空间拓扑网络（如图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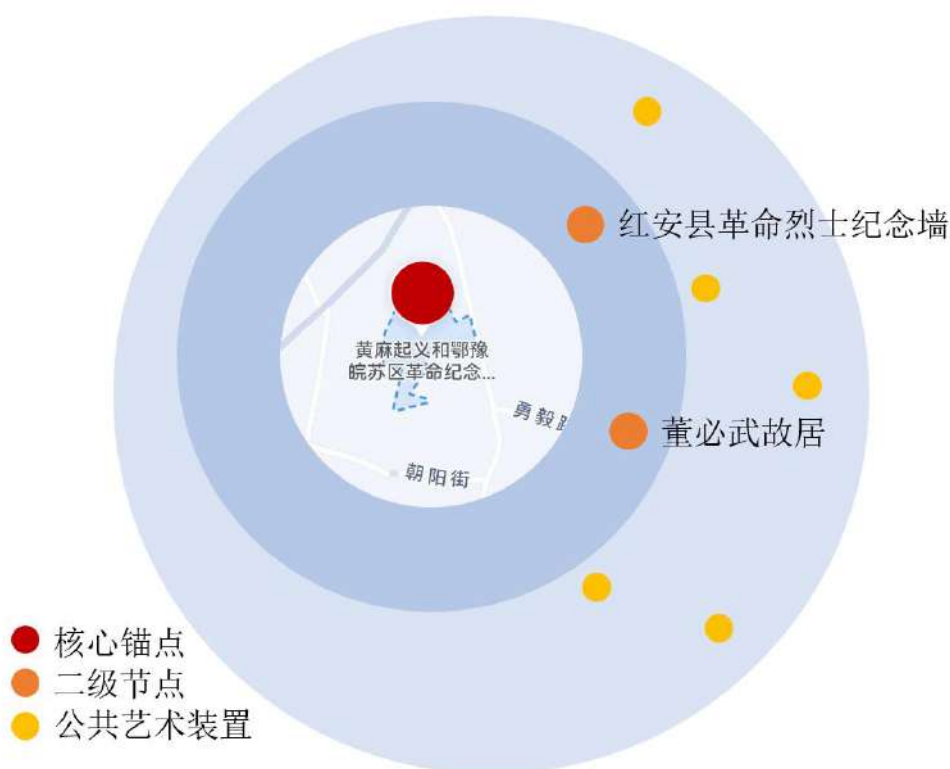


图 1 三级空间架构示意图

构建“历史事件轴+人物故事链”双线叙事系统。在核心区采用纪念碑式艺术装置强化集体记忆（如以花岗岩浮雕墙重现黄麻起义全过程）；在乡村节点运用“碎片化叙事”策略，选取李先念借粮、秦基伟参军等本土革命故事，通过铜雕群像、陶板故事墙等媒介进行场景还原。通过定位技术实现装置间的叙事连续性，使游客在 10 公里线路中形成完整的历史认知拼图。

(二) 技术驱动的情感体验升级

开发“红安 1932”AR 应用程序，基于地理围栏技术在七里坪苏维埃旧址等多处遗址触发三维历史场景重建。当游客持移动设备扫描特定标识时，可观看数字化复原的“黄麻起义”等动态影像，配合空间音频技术重现革命标语口号声场。介入 AR 以使游客平均停留时间延长。在列宁小学遗址设计“红缨枪投影互动装置”，利用毫米波雷达捕捉游客动作轨迹，当模拟突刺动作达标时触发《八月桂花遍地开》、《黄安谣》、《步工伤心事》、《农人伤心事》、《打菩萨》、《为什么贫穷不均》等革命歌谣片段。开发可穿戴式震动背心，让体验者在重走红军路体验中，通过触觉反馈模拟负重行军的身体记忆。

(三) 本土文化资源的符号提取与转化

建立红安文化符号数据库。例如,在传统民俗中提取几大核心元素融入红安绣活:古戏表演脸谱、天台禅乐乐谱、连(莲)年有鱼题材、红军布告板式等。通过参数化设计将绣活纹样转化为3D打印的锈钢板镂空幕墙,在游客中心实现传统技艺的数字化呈现。

开展“绣娘工作坊”驻地计划。邀请国家级非遗传承人刘寿仙指导村民将革命诗词转化为刺绣图样。开发“可拼接布艺模块”允许游客DIY组合绣片形成大型装置,每季度遴选优秀作品永久陈列。该模式或许可实现非遗技艺的代际传递。

四、结语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把红色资源利用好,把红色传统发扬好,把红色基因传承好”^[10],这一重要论断为红色文旅融合发展标定了‘活化-传播-永续’的行动路径。”本研究以红安为镜鉴:在乡村介入公共艺术能让红色资源从“展柜里的标本”变为“可触摸的文化基因”,在红色旅游线路中“具象化”传承。

参考文献:

- [1] 蒋露薇,盘俊.乡村振兴战略下零陵区红色旅游资源整合开发优化路径研究[J].文化创新比较研究,2024,8(23):106-110.
- [2] 吴康.红色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利用耦合协调度研究——以大别山革命老区为例[J].西部旅游,2024,(18):48-50.
- [3] 李明炅.功能、人文、生态:当代公共艺术设计的空间美学[J].天工,2024,(04):64-66.
- [4] 郭玮.艺术植入社区——公共艺术在现代社会功能中的作用[J].美与时代(城市版),2019,(10):54-55.
- [5] 王天祥.艺术介入乡村——美术社会实践与乡村全面振兴的互构共生[J].美术,2025,(01):57-63.DOI:10.13864/j.cnki.cn11-1311/j.007605.
- [6] Holden N W. Gibsland, Louisiana's memoryscape of Bonnie and Clyde: Putting the past in the present[J].Memory Studies,2024,17(6):1536-1553.
- [7] 李德山,许秋生.文旅融合驱动乡村振兴:内在机制与实证检验[J].安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4,33(04):20-32.DOI:10.19747/j.cnki.1009-2463.2024.04.003.
- [8] 顾雪黎,刘文静.延续与重塑:传统文化再生产研究综述[J].玩具世界,2025,(01):6-9.
- [9] 阮静.AR/VR技术在科普出版中的应用探究——以湖北科学技术出版社的实践为例[J].编辑学刊,2025,(02):64-68.
- [10] 向帮国,向国权.红色旅游助推乡村产业振兴的路径研究——以湘西为例[J].现代农机,2025,(02):30-32.

Research on the Intervention of Rural Public Art in Red Tourism Routes: A Case Study of Hong'an County in the Dabie Mountains

Zhang Zhile¹, Wu Chujun¹

¹ School of Fine Arts, Hubei University of Arts and Science, Xiangyang, China

Abstract: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the integrated development of national rural revitalization and red tourism, this study focuses on the issue of "symbolic shellization" in the construction of public art in the red tourism routes of the revolutionary old areas in the Dabie Mountains. The research finds that the current red cultural landmarks have problems such as the disconnection between art and the narrative of red spirit, the lack of participation mechanisms, the incomplete sustainable operation system, and the superficial exploration of local cultural resources. It proposes strategies such as reconstructing red memory spaces through narrative art installations, enhancing the experience through digital technology, collaborative management of "government, society, and art", and innovative transformation of local resources. The aim is to strengthen the cultural identification and emotional resonance of the red tourism routes, and promote the integrated development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and red tourism.

Keywords: Red tourism; rural public art; cultural landmark; art installation; Hong'an County, Dabie Mountains

金融集聚对产业创新成果转化的影响研究

郭杨¹ 洪果琳² 马晓婷³ 马晓磊⁴

(1.哈尔滨工程大学, 黑龙江 哈尔滨 210001, 2.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湖北 武汉 430073, 3.中国人民大学, 北京 北京 100872, 4.山东工业技师学院, 山东 潍坊 262106)

摘要: 金融是实体经济的血脉, 它与政府因素(zc)、城镇化水平(cit1)、人力资源(ledu)等息息相关。同时, 金融是推动产业创新成果转化的因素之一。本文利用2005—2020年我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 以金融集聚(fin)为核心变量, 并且采取余泳泽等(2013)、肖利平、洪艳(2017)的测度方式, 基于金融业从业人数得到金融业的区位熵对金融集聚进行度量, 再以产业结构升级(str)为被解释变量, 政府因素(zc)、城镇化水平(cit1)、人力资本(ledu)为控制变量, 来搭建实证分析模型, 再利用Pool OLS、随机效应和固定效应三种实证结果分析方法对实证结果进行评估和分析。本文通过实证检验了金融集聚与产业结构升级之间具有显著的正向关系, 即该地区金融集聚水平的提高有助于促进产业结构的进一步转型升级。

关键词: 金融集聚; 产业结构升级; 区位熵; 政府政策

DOI: doi.org/10.70693/rwsk.v1i5.1028

1. 引言

1.1 创新成果转化的背景、创新的背景

进入21世纪, 中国持续强化自主创新战略地位, 十九大将创新驱动提升至国家战略高度, 明确科技创新在解放生产力、增强综合国力中的核心作用, 国务院配套政策加速战略落地, 成为“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型的关键指引。金融作为实体经济“血脉”, 其资本流动深度渗透产业创新全链条, 集聚程度直接影响产业创新活力。过去经济两位数高速增长伴随环境恶化、社会发展失衡、区域差距扩大等代价, 当前增速放缓至6%-7%的“结构性放缓”, 标志经济发展迈入新阶段。十九大强调聚焦实体经济建设, 推动万众创新与科技创新协同, 更重视金融与人力资源在转型期的协调作用。基于此, 需针对性施策促进产业创新成果高效转化。

1.2 金融集聚的背景

改革开放以来, 中国金融业迅猛发展, 但是同时产生了很多不足和问题, 导致了金融资料在地域上的分配不均衡, 拉大了沿海地区和内陆地区的经济差距。金融资源的地域分配不均直接影响了创新资本的投入, 降低了地区技术创新的积极性和科技成果的转化效率, 影响我国整体创新水平的提升。因此, 为了推动区域协调发展, 提升区域创新水平, 我国开始将分散的金融资源空间分布集中化。国家积极调用金融资料来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支持创新发展战略。

1.3 文献综述

在现代经济体系中, 金融不仅仅能够有力地配置产业间的资本同时也能够引导资本附带的其他要素资源。一个国家经济高质量发展并保持竞争优势的实现依赖于持续性的创新活力和高级优化与合理化的产业结构。由于金融集聚是金融发展的一个阶段, 学者们曾对金融发展与产业升级者之间的关系进行广泛的研究和探讨, 然而在当

作者简介: 郭杨(2004—), 男, 学士, 研究方向为绿色金融、ESG、企业管理、宏观金融;

洪果琳(2006—), 女, 学士, 研究方向为保险学、区域经济学;

马晓婷(1998—), 女, 硕士, 研究方向为绿色金融、ESG、企业管理;

马晓磊(2005—), 男, 中专, 研究方向为产业经济学。

注: 以上作者对本文有同等贡献, 共同为第一作者。

下,将出发点放在金融集聚的视角,研究其对产业升级影响的较少。因此,本文将以金融集聚为出发点,研究其对产业升级的影响。

1.3.1 国外文献综述:

产业集聚不仅仅是一项经济理论,同时还是该课题的理论研究基础,是探究金融集聚现象的出发点。产业集聚这一名词最早于十九世纪的经济学家马歇尔提出,他经过大量案例分析,结合经济发展与地域分布的关系,总结得出该理论。当很多的企业集中于一定范围内,那么企业所需的劳动力和技术也将更加集中于此地,导致其经济活动中的成本会减少,并且可以更加高效的实行生产活动,由此导致该地的经济效益提升,对其他企业产生更大的吸引力。对于“集聚经济”的研究最早由 Alfred(1909)提出,这种经济现象是以利益为驱动的自发性经济现象,是受到内部因素和外部因素共同作用的。随着工业革命以及金融服务行业的迅速崛起,大批国外学者开始关注此类“集聚经济”所产生的经济效应,更有不少学者开始聚焦于第三产业的金融集聚(Shaw & Gurley, 1955; Patrick, 1966; Goldsmith, 1969),他们在研究过程中发现,社会金融规模的发展以及集聚程度都会促进当地的经济增长。金融集聚不仅降低了交易成本,提升了资金的流动能力和配置效率,大大缓解了产业结构升级的资金约束(Kindleberger, 1974),而且,金融机构通过金融集聚,在业务合作、信息传播、劳动力专业化以及设施共享等方面,均获得了规模经济优势(Park 和 Essayad, 1989)。

1.3.2 国内文献综述:

国内学者围绕金融集聚与经济增长、产业结构升级的关系展开研究(基于国外理论结合国内现状),形成以下核心结论:其一,金融集聚对经济增长具有显著促进作用,且产业结构升级是其关键传导渠道;其二,金融集聚通过知识溢出(王丹等)、空间溢出(于斌斌等)双效应,既提升区域经济水平,又推动本地产业结构优化。实证层面,部分研究(黎平海等)以广东为例,验证金融集聚通过拓宽融资、优化资金配置促进产业升级;孙晶等基于省际数据进一步指出,该效应主要依托银行业,证券、保险业作用有限,且东中西部均受促进但中西部成效较弱。不过,朱玉杰等利用 270 个城市数据提出异议,认为东部、中部金融集聚对产业升级无显著促进,反而是西部呈现明显正向作用。研究共识与分歧并存,为后续深化探讨提供了多维度视角。

1.3.3 文献评述

综合目前学者和专家的研究成果来看,无论从理论分析还是实证检验,大多数都认可金融集聚确实对产业结构升级起到了促进作用,但涉及到时间期限以及地域位置,可能促进作用有所不同,以上的文献为本文的开展提供了强有力的理论支撑,但基于现在经济发展速度迅猛,不同的时代发展对金融集聚以及产业升级有更高的要求。因此,已有研究的基础上,本文利用最新的数据,探索在新时代,新经济形势下,金融集聚对产业升级又有怎样新的变化。

1.4 贡献

1.4.1 助力企业快速融资

金融集聚形成的金融中心汇聚多元资源,在经济多元化背景下承担资金融通与资源流动核心角色,通过人力、信息、资源的高效配置降低融资成本,提升融资效率,满足企业多样化需求,为产业调整升级提供充足资金支持,推动升级进程加速。

1.4.2 提升经济资源使用效率

金融集聚下丰富的金融机构提供多样化资金融通方式,灵活应对不同资金需求;同时引导金融资源向高效、发展态势好的产业集中,淘汰低效产业,推动企业在资源优化配置中最大化资源使用效率,增强市场竞争力,助力产业升级。

1.4.3 促进产业整合

随着金融集聚水平提升,资源配置更高效多元,能满足产业多样化资金需求;充足资金支撑下,高效产业竞争优势快速凸显,金融资本持续积累,进一步推动产业整合进程。

2.金融集聚和产业升级相关理论概述

2.1 金融集聚的内涵

金融集聚是指与金融相关设备、市场、人才、工具、机构、法律、制度等要素在一定区域上集中,并且形成了一定的规模和密度。同时,金融活动参与主体与该区域内的资源互动、协同、组合。最终一定程度上形成了比较竞争优势的空间组织形式和动态过程。

2.2 产业升级的内涵

产业升级可从微观、中观、宏观三层面解析。微观上,企业是核心主体,产品为经济效益关键,中小企业需

优化管理、提升生产效率,通过技术研发与产品创新增强市场价值及品牌影响力,以生产能力提升推动经济增长。中观层面,产业链转型需从劳动驱动转向技术与创新驱动,核心路径是提升产品附加值,助力企业转型并增强经济实力。宏观视角下,产业结构升级是关键,需调整生产要素配置,发挥产业协同优势,构建协调发展模式;仅提升效益而不调整结构的改革不充分,最终目标是实现经济长期稳定增长与高效产业结构的建立。本质上,产业升级是发展模式向技术、知识、创新驱动的转型过程。

2.3 金融集聚对产业升级的影响机理

2.3.1 金融集聚帮助企业快速融资

在金融集聚当中形成的金融中心拥有多种多样资源形式,在经济逐渐多元化的时代背景之下,令金融中心在一定程度上担任资金融通与资源流动的重要角色,使融资效率大大提高,从而使经济效益不断增加,而让资金融通所需的各种成本因人力、信息、资源的高效配置而大大降低。因此金融集聚有效的帮助企业完成快速融资,满足了企业多样化的发展需求。在充足的资金支持之下,为产业调整与升级带来了足够的空间与时间,便利的条件下使产业升级也更为高效。

2.3.2 金融集聚提高经济资源的使用效率

在金融集聚下,类型丰富的金融机构使资金融通的方式更为多变,因此能够更好的应对不同状况下的资金需求,与此同时,金融资源正在不断走向更为高效的,发展态势持续看好的产业,效益低下的产业被不断淘汰,最终各企业在高效的资源配置模式中将经济资源使用效率不断最大化,市场竞争力随之增强,产业升级随之逐步完成。

2.3.3 金融集聚能够促进产业整合

随着金融集聚水平的不断提升,资源配置更为高效且多样化,能够应对产业对在资金融通上的丰富需求。因为产业拥有充足的资金,从而使得高效的产业在这种情况下竞争优势迅速凸显,金融资本开始不断积累,从而促进产业整合。

3.我国金融集聚与产业升级的现状分析

3.1 我国金融集聚的现状分析

随着时间的不断发展,与金融有关的所有要素相互联系,相互影响最终在某一特定的地理区域上汇集,在经济规模上形成一定密度的金融集聚。经济规模发展到当下的一定水平,金融集聚的形成已然水到渠成,因为金融集聚不仅与各种金融相关要素存在关系,还与地理人文和本土产业特色有关,因此金融中心区域化发展的态势是金融集聚在逐步形成和发展中所渐渐产生的新表现。而这种表现形式一旦产生,必将为市场流动性和市场交易带来正向作用,并且令资金融合和资金投入得到一定的安全保障。在此,本为通过相关指标与数据对我国金融集聚的现状进行详实的分析。

3.1.1 金融集聚的测度

通过参考同类型文献,一般地,学者用空间基尼系数,区位熵等指数测度金融集聚。鉴于文章数据地可取性与方便性,本文采用区位熵来测度金融集聚的程度。区位熵指的是通过对在某一区域的要素分布情况进行衡量后能够反映的相应产业部门的专业化程度,以及某一区域在高层次区域的作用等方面的指标。其中,若该地区某行业区位熵小于1,则证明该地区该行业集聚程度较差,而大于1则证明集聚程度较好。

核心变量:金融集聚(fin)。本文采用余泳泽等(2013)、肖利平、洪艳(2017)的测度方式,基于金融业从业人数得到金融业的区位熵对金融集聚进行度量,其计算公式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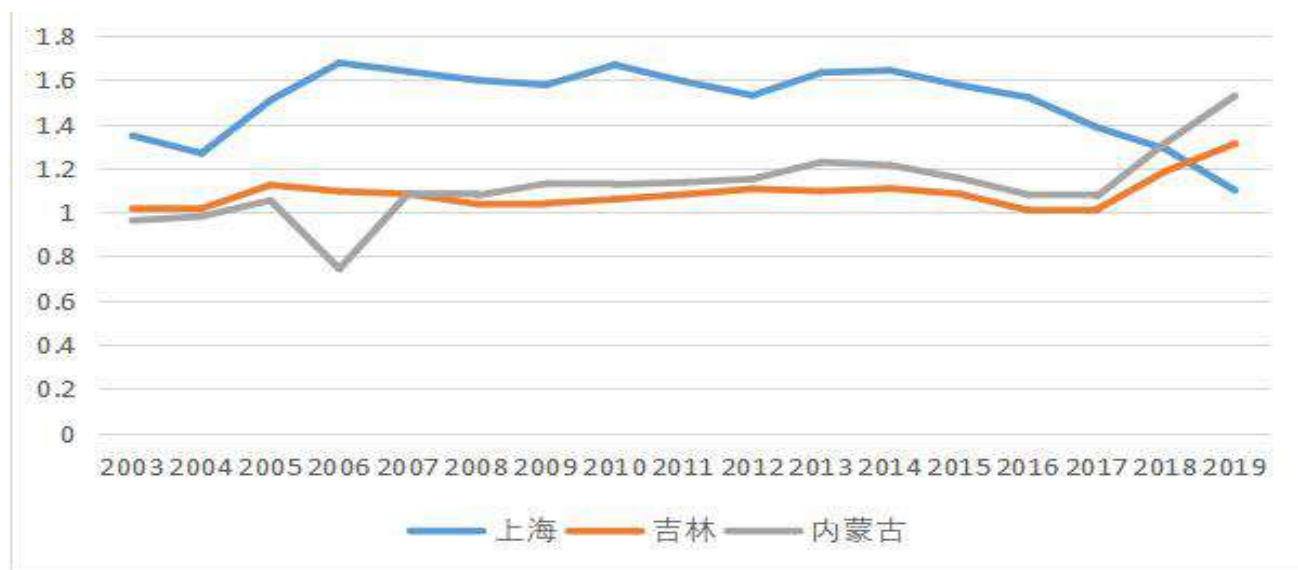
$$fin_i = (emp\_fin_i / emp_i) / (emp\_fin / emp) \quad (3.1)$$

其中,i为各个地区,t为时间,emp_fin为金融业的就业人数,emp为全国就业人数,fin为采用金融区位熵测度的金融集聚水平,其中该值越大,表明金融业集聚水平越高。

3.1.2 我国金融集聚程度现状

随着经济的发展,我国越来越重视金融集聚所造成的正向效应,因此,各个地区的省市都逐渐建立起本地特有的金融中心,金融集聚程度逐年增高。本文以上海(东部地区代表城市),吉林(中部地区代表城市),内蒙古(西部地区代表城市)来简要探究我国集聚的发展趋势。由表1可知,我国无论东中西部城市金融集聚区位熵基本都在一以上,尤其是内蒙古身为西部地区,较为落后,但是,区位熵仍保持在一左右,证明我国整体金融集聚程度较好,从走势来看,虽然这三个城市无法分别代表东中西部,但是可以简略看出,西部和中部金融集聚程度在不断上升。

表 1 2003 年到 2019 年我国代表区域金融集聚走势



3.2 我国产业升级的现状分析

3.2.1 我国产业升级测度

产业结构升级 (str)。产业结构是指经济中某单一产业占 GDP 的比重。而产业结构升级则是指当前经济结构由某一旧的 (不发达的) 产业结构形式向更高级的产业结构中动态转化的过程 (杨青龙、刘双, 2016)。为有效地刻画经济体在不同产业结构之间进行调整的动态变化过程。本文参考干春晖等 (2011) 与方云龙 (2020) 的方法, 以第三产业产值占第二产业的比重来表示产业结构由传统向新型产业的升级过程。

3.2.2 我国产业升级现状

近年来, 随着我国经济的不断发展, 各个产业都有了一定的发展, 其中作为国家重点扶持的第三产业发展迅速。这与国家大力实施产业转型计划息息相关, 由表 2 可知, 第三产业逐步上升, 并在 2013 年超过第二产业, 且在 2015 年开始, 与第二产业的 GDP 总量差距愈来愈大, 而第二产业发展虽仍在上升但幅度相对较小, 这更加剧了其与第三产业的差异。而由表 3 可以明显看出, 第二产业自 2003 年占比大幅度下降, 非典在国内蔓延使得第二三产业遭到巨大创伤, 从零三年开始, 第二产业虽有所回升但总体呈现下降趋势, 第一产业持续下降, 而第三产业逐步上升并在 2013 年超过第二产业, 证明我国近年实施的产业转型政策取得显著成果。

表 2 2002 年-2019 年各产业 gdp 总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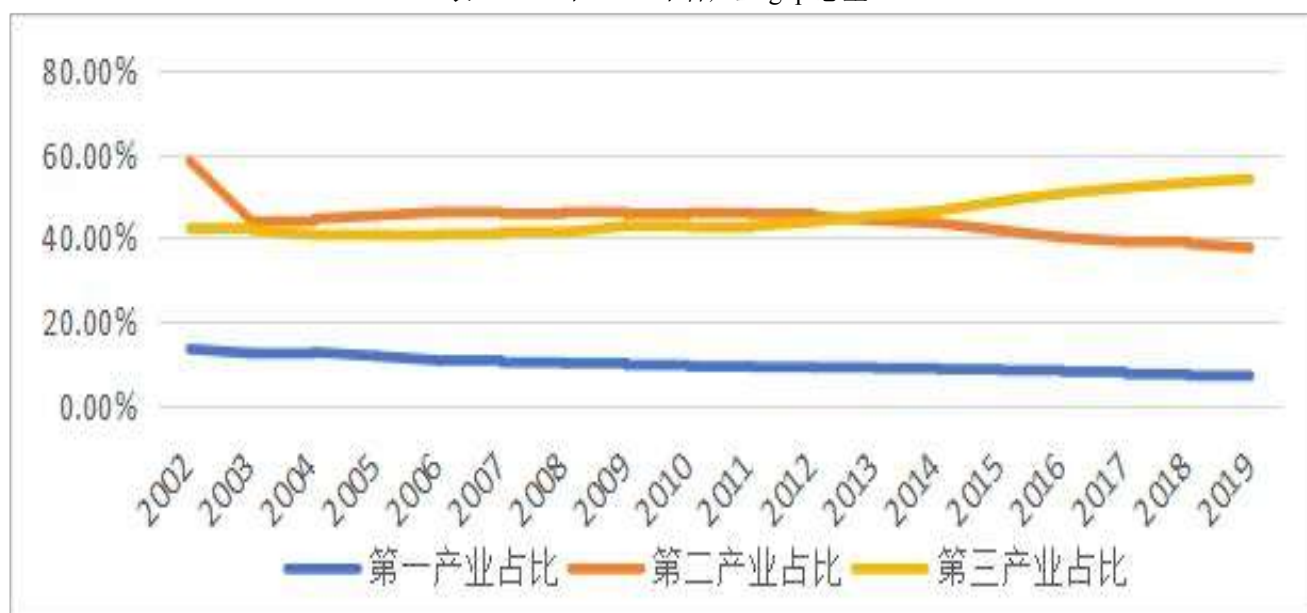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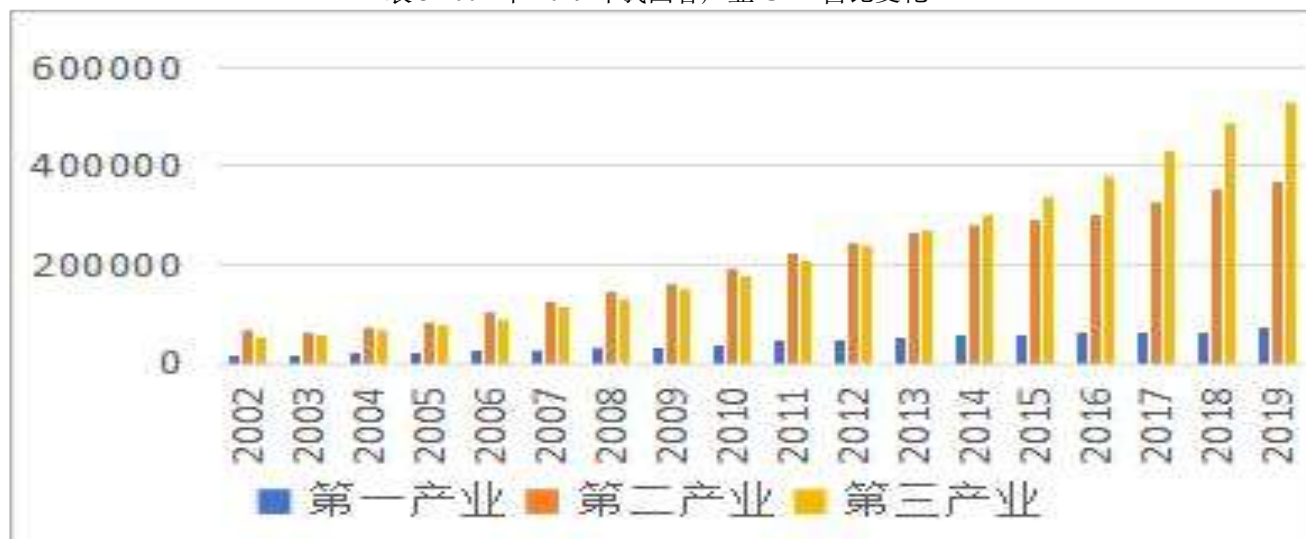


表 3 2002 年-2019 年我国各产业 GDP 占比变化



4. 金融集聚与产业升级发展影响的实证分析

4.1 样本选择和指标体系建立

本文的变量主要被分为三部分：

被解释变量：产业结构升级 (str)，核心变量：金融集聚 (fin)。由于第三章做过具体说明，在此不再详述。

控制变量为控制其他影响产业结构升级因素，本文还进一步控制了各地区政府因素 (zc)、城镇化水平 (cit1)、人力资本 (ledu)。其中，以各地区政府财政支出与财政收入的比例测度政策自由度，以此来控制当地政府对经济的干预能力；城镇化水平以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表示；人力资本以普通高校在校生人数规模表征，同时为防止变量的波动性过大，进行对数化处理。

综上，本文的指标定义如表 4 所示：

表 4 变量定义

变量名称	变量符号	计算方法
产业结构	str	三产/二产
金融集聚	fin	金融行业区位熵
财政自由度	zc	财政支出/财政收入
城镇化	cit1	城镇人口占比
人力资本	ledu	普通高校在校生人数的对数

注：本文所选取的数据主要来自于各省份《国家统计局网站》、《人口和就业统计年鉴》以及《教育统计年鉴》等。

4.2 模型的构建

为验证 2003 年-2019 年各省份地区金融集聚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构建实证模型设计如下所示：

$$str_{it} = \alpha \times fin_{it} + \beta_1 \times zc_{it} + \beta_2 \times ledu_{it} + \beta_3 \times cit1_{it} + \mu_i + \varepsilon_{it} \quad (4.1)$$

其中， α 、 β 分别代表各因素对产业结构升级 str 的影响系数，该值为正，则表明为正向影响，反之则为负向影响。为地区效应，it 为残差，其他符号同表 2。

4.3 实证过程

上一章节给出了该部分实证分析所需要的指标数据和基本特征，该章节主要采用上述数据并结合合适的估计方法，实证的角度检验金融业集聚对各地区产业结构升级存在何种影响。首先，搭建实证分析模型，并对估计方法进行选择；最后，估计模型并加以分析。

4.3.1 估计方法的选择

构建模型后，还需要对上述模型所需要的估计方法进行选择。主要有三种估计实证结果分析方法：Pool OLS、

随机效应和固定效应。表 5 给出了三种估计方法选取的结果。其中第一列为模型选择 Pool OLS 或者固定效应的检验结果,由 F 统计量可见,该值伴随概率为 0.00,小于 0.01,表明在 1%的显著水平拒绝原假设,即应该选择固定效应进行估计。第二列为模型选择随机效应或者固定效应的检验结果,由豪斯曼检验的卡方统计量结果可知,伴随概率为 0.28,大于 0.1,表明应接受使用随机效应对原模型进行估计的原假设。综合来看,应采用随机效应对模型 6-1 进行估计。

表 5 估计方法的选择

	第一步: Wald F 统计量	第二步: 卡方统计量
统计量	71.00	5.10
伴随概率	0.00	0.28

4.3.2 实证的结果及分析

本文基于随机效应与固定效应模型,实证检验了金融集聚及控制变量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核心结论如下:
随机效应模型结果

金融集聚(fin)对产业结构升级呈现显著正向影响(系数 0.767,1%水平显著)。机制上,金融集聚通过整合区域金融资源、提升金融机构配置效率、加速资金跨产业流动,同时借助规模经济降低交易成本、减少资金损耗,为产业结构升级提供资金支撑。

控制变量中,财政自由度(zc)系数 0.095(1%显著)、城镇化率(cit1)系数 0.793(1%显著)、人力资本(ledu)系数 0.117(5%显著)均正向显著。其中,财政自由度高表明政府干预能力强,能有效推动产业升级;城镇化水平提升直接促进产业高级化;人力资本积累在考虑省份间差异后,与产业升级呈现显著正向关联。

固定效应模型结果

金融集聚系数为 0.753(1%显著),与随机效应结果接近,验证了金融集聚对产业升级的稳健正向作用。控制变量方面,财政自由度仍显著为正,说明政府可支配空间越大,对产业升级的助力越强;城镇化率保持显著正向影响;人力资本系数升至 0.162(1%显著),高于随机效应结果,表明其对产业升级的促进作用在固定效应模型下更突出。

无论是随机效应还是固定效应模型,金融集聚均是产业结构升级的关键驱动力,财政自由度、城镇化率及人力资本亦通过不同机制显著正向推动产业高级化。研究结果为通过优化金融布局、提升政府财政效能、推进城镇化及积累人力资本等路径促进产业升级提供了实证支持。

表 6 回归结果

因变量: str	(1)	(2)
fin	0.767*** (10.23)	0.753*** (9.93)
zc	0.095*** (5.17)	0.093*** (4.72)
cit1	0.793*** (4.96)	0.669*** (3.93)
ledu	0.117** (2.52)	0.162*** (3.13)
_cons	-0.657*** (-3.44)	-0.749*** (-4.33)
within R2	0.331	0.332
N	527	527

注: 括号内为 t 值, ***, **, * 分别代表 1%、5% 和 10% 的显著性水平。

5. 对策及建议

综合当前国内金融集聚与产业发展现状,提出四点产业升级建议:

一是加大金融集聚投入,利用省域间产业升级在高度化、合理化层面的正向空间依赖性,强化区域产业协同与溢出效应,推动地区产业结构规范化与整体升级;

二是科学看待外商投资与产业升级的关系,政府需引导外资合理进入市场,降低其对本土企业的冲击,借力外资促进产业创新;

三是健全教育体系优化结构,提升人力资本累积质量,结合地方实际制定科学政策,强化人力资源对产业升

级的支撑作用；四是政府应注重区域协调发展，结合我国地域差异大的特点，吸取改革开放初期忽视区域协调的教训，制定合理产业政策，整合各省优势形成发展合力，全面推动产业升级。

参考文献：

- [1] 陈丽贞.金融集聚对区域产业结构升级空间溢出效应研究——基于 2003-2015 年省际经济数据空间计量分析[J].鸡西大学学报,2016,16(06):72-75.
- [2] 成学真,岳松毅.西北五省区金融集聚与产业结构升级关系的实证研究[J].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53(06):41-47.
- [3] 丁焕峰,孙泼泼.中国产业升级测度与策略分析[J].商业研究,2010(05):97-100.
- [4] 丁艺,李靖霞,李林.金融集聚与区域经济增长——基于省际数据的实证分析[J].保险 研究,2010(02):20-30.
- [5] 付凌晖.我国产业结构高级化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研究[J].统计研究,2010,27(08):79-81.
- [6] 干春晖,郑若谷,余典范.中国产业结构变迁对经济增长和波动的影响[J].经济研究,2011,46(05):4-16+31.
- [7] 何剑,肖凯文.金融集聚对中国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溢出作用的空间计量分析[J].金融 与经济,2017(01):18-24+7.
- [8] 李子伦.产业结构升级含义及指数构建研究——基于因子分析法的国际比较[J].当代经济科学,2014,36(01):89-98+127.
- [9] 李红,王彦晓.金融集聚、空间溢出与城市经济增长——基于中国 286 个城市空间面板杜宾模型的经验研究[J].国际金融研究,2014(02):89-96.
- [10] 李林,丁艺,刘志华.金融集聚对区域经济增长溢出作用的空间计量分析[J].金融研究,2011(05):113-123.
- [11] 李博,胡进.中国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测度和比较分析[J].管理科学,2008(02):86-93.
- [12] 李洪亚.产业结构变迁与中国 OFDI: 2003 ~ 2014 年[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16,33(10):76-93.
- [13] 刘军,黄解宇,曹利军.金融集聚影响实体经济机制研究[J].管理世界,2007(04):152-153.
- [14] 刘建民,陈霞,吴金光.湖南省产业转型升级的水平测度及其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 [J]. 湖南社会科学,2015(01):143-147.
- [15] 刘伟,张辉.中国经济增长中的产业结构变迁和技术进步[J].经济研究,2008,43(11):4-15.

Research on the Impact of Financial Agglomeration on the Transformation of Industrial Innovation Achievements

Yang Guo¹, Guolin Hong², Xiaoting Ma³, Xiaolei Ma⁴

¹ Harbin Engineering University, Harbin Engineering University, Harbin, China

² Zhongnan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and Law, Zhongnan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and Law, Wuhan, China

³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China

⁴ Shandong Industrial Technician College, Shandong Industrial Technician College, Weifang, China

Abstract: Finance, as the lifeblood of the real economy and a driver of industrial innovation transformation, is closely linked to government factors, urbanization, and human resources. This study uses 2005-2020 panel data from 30 Chinese provinces, with financial agglomeration (fin) as the core variable. Drawing on Yu Yongze et al. (2013) and Xiao Liping & Hong Yan (2017)'s methods, it measures financial agglomeration via financial industry location entropy based on employment data. Taking industrial structure upgrading (str) as the dependent variable and government factors (zc), urbanization (cit1), and human capital (ledu) as controls, the study constructs an empirical model. Using Pool OLS, random effects, and fixed effects methods, it empirically verifies a significant positive relationship: enhanced regional financial agglomeration promotes industrial structure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Keywords: Financial Agglomeration; Upgrade of industrial structure; location entropy; government policy

内容、形式与身份：处在阈限中的中国作者纪录片

李忠业¹

(1.福建师范大学传播学院, 福建 福州 350117)

摘要：中国作者纪录片自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兴起后，不论在影片内容、形式还是身份上皆处在“阈限”之中。中国作者纪录片通过对阈限空间和阈限中个体的关照，使用着多样杂糅、未被归类、处在阈限中的表达形式，使影片主体性渐显，也为观众提供了不设限的多样读解的可能。作者纪录片及其作者的阈限身份不但拓宽了影片的内容与形式，也为其与被拍摄者、观众的交往提供了更为丰富的可能；作者复杂多元的阈限身份成为他们关照民众、在拍摄中实现自我追寻与社会交往的条件与契机；影片及作者被遮蔽的身份迫使影片在边缘化的阈限空间中寻求传播，但这也使其排除了传统观影所呈现出的单方面规范与特权，在一定意义上实现着“交往理性”。

关键词：作者纪录片；阈限；内容；形式；交往

DOI: doi.org/10.70693/rwsk.v1i5.1029

上世纪初，中国就开始了纪录片创作的尝试。但此时的纪录片创作常常与国家使命、教育民众连接在一起，有着较为宏大的表现形态。这中间或存在过一些个人影像，但多未形成作品，且不具规模，并未发展成潮流或现象。直至上世纪八十年代后，中国纪录片才获得了新的发展契机。“几乎就在被称为‘第六代’导演登场的同时，一种新的纪录片实践也开始了”。^[1]脱离原有的“媒介纪录片”的生产体系和形式，关注被媒介忽略的个体、实现个人表达成为了创作者们的期望，也使得纪录片实践拥有了新的路径，开始呈现出具有作者电影性质的“作者纪录片”倾向。

“所谓的‘作者纪录片’，首先需要体现导演的个性风格，另外就是基本能控制自己作品走向，具有一定的创作延续性。”^[2]由于作者纪录片对导演风格的重视，其很少关注结构性的宏大叙事，也不采用工业化的媒介纪录片生产方式。相比媒介纪录片，作者纪录片大多在题材上选择关注边缘性内容、在形式上采取杂糅的表现形式并选取被遮蔽的传播形态进行传播，这些特点都标志着其处在“阈限阶段”及“阈限空间”之中。“阈限”这一概念由德国民俗学家阿诺尔德·杰内普(Arnold Van Gennep)引入人类学领域，后被不断发展成为人文社会科学界的一个重要术语，用于指代模糊的过渡或时空的中间地带。“阈限性群体同时天然具有边缘性、混杂失序性与未被归类的非类型化特征”^{[3]98}，对应着作者纪录片隔绝于主流的历史与社会的记忆建构之中。“阈限的实体，既不在这里，也不在那里；他们在法律、习俗、传统和典礼所指定和安排的那些位置之间的地方”。^{[3]95}作者纪录片所处位置的结构之外的位置，在一定意义上填补了被媒介所遮蔽的以他者视角审视的阈限空间，将“他者的审视”演变为“主体的表达”，完善着社会记忆的建构，充当着社会交往的中介。

一、内容：处在阈限中的空间与个体

在电影中，有关空间的讨论很早就出现。“只要电影是一种视觉艺术，空间似乎就成了它总的感染形式，这正是电影最重要的东西。”^[4]在剧情片中，导演可以通过具有相似性的“图解式的视觉影像”来进行空间的建构。但对于纪录片来讲，“发现”往往比“发明”更具有意义。纪录片虽然无法建构空间，但可以通过发现或选择空间来呈现出相应的观念。结构性的空间成为八十年代之前纪录片关注的重点，《收租院》(1966)《第一辆汽车》(1956)等纪录片作品都在结构性的空间中延展：宏伟的工厂、劳动的土地、优美的自然风光……其实，对于这些结构性空间和内容的选择不是只是出于社会环境的需要，更有工业上的无奈。“彼时的胶片，多为进口，加之外汇紧张，拍摄时要求极高的成功率，新影厂的拍片比有时就是一比一”^{[5]24}。加之同期声录音设备很晚才引进，这就导致创作者不得不去关注那些具有稳定性的、宏大语境下的结构空间。八十年代末，轻便影像设备的引进、西方纪录片观念的影响，使得纪录片对阈限空间的关注成为了可能。正如吴文光所说“吾辈的崛起，是源于诸神

作者简介：李忠业(1995—)，男，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纪录片理论与创作、中国电影史论。

的缺位”^[54]，对于公共结构性空间的关注，往往是公共媒介的权力，但在阈限空间中，这种权力产生了缺位，这就使得作者的触角可以在城乡结合处、铁路、私人空间等阈限空间中自由地延展。这些阈限空间，从物理属性上看往往处在两种结构性空间之间的过渡地带，这种物理上的过渡性使得其在观念上具有模糊性和二重性，“正是这种含混不清的特点增加了作品的趣味”^[6]。

在徐童的《算命》（2009）一片中，片中主人公历百成和石珍珠就生活在这样一个阈限空间中——处在“首都北京”和河北交界的燕郊镇。城乡结合处被隐蔽在城市建筑当中，与真正的城市空间形成强烈的对比，呈现出低矮、无序、逼仄的空间样式。城乡结合处无法像乡村一样在原野上横向铺展，也无法像城市一样在纵向上生长，站在处于工业与农业的过渡地带之上，人们能同时看到过去与现在的混乱交融与对话。这个阈限空间中可以看到城市，但却是乡村化野蛮发展的城市界面；可以看到乡村，但却是被红砖与水泥建构的乡村。这个空间容纳了众多北京溢出的处在阈限中的人们，他们不被城市文化所接受，同时也无法回归乡村。这也正是王学泰所说的“游民”——“一切脱离了当时社会秩序的人们”。^[7]杜海滨的《铁路沿线》（2001）则发现了铁路这一阈限空间。铁路作为连接两端确定的结构性空间的阈限空间，处在过去和未来的边界上，是一个有待沉淀的时空，当下感受不到未来，人在其中居无定所：“这群人就像被飞驰而过的列车甩了下来，他们永远无法再回到车上。”^[8]周浩的《差馆 I》（2010）则将摄影机指向两个阈限空间：车站、派出所共同构建出的一个阈限空间——广州站的铁路派出所。火车站最能体现“游民”问题，春运场景也为事件发展预设了众人渴求阖家团圆的特定背景，让发生在火车站派出所这一处在合法与非法之间的阈限空间中的一切琐事显得额外急迫、无奈与心酸。阈限空间所呈现出来的冲突性和对社会的切面性呈现，加之结构性话语在阈限空间中的缺失，使得作者们唤起了“在那个年代的表达的渴望”^[9]。

其实，当作者们在关注阈限空间的时候，其往往关注的是身处阈限空间中的个体。“以前出现的……都是一个符号的存在，不是一个日常的存在……新纪录片的一个共同特点就是个体的存在开始呈现了。”^{[5]26}作为被作者纪录片关注的个体，他们往往以农民工、下岗工人或处在激烈变革中的人的身份出现在影片中，往往都面临着生活中的某些困境，他们是“阈限中的受礼者，行踪隐秘且没有恒产、没有姓名的陌生人，以及处在社会底层边缘的弱者”^{[10]26}。尤为突出的是对农民工的关注。从身份上讲，他们来自农村，户籍身份是农民；从职业上来说，他们又是产业工人，他们进入了城市，但没有融入城市。在他们身上呈现出来的传统与现代的碰撞尤为突出。《厚街》（2002）《红毛皇帝》（2019）《杀马特我爱你》（2019）片中的主人公无一不是困限于阈限中的人。值得一提的是《红毛皇帝》与《杀马特我爱你》，这两部影片的作者不但将阈限空间扩展到互联网这一虚拟空间，更将话语权交给了阈限中的个体。在虚拟的空间中，他们陷于自我构建的阈限空间中不能自拔，享受着阈限带来的虚幻荣耀，但在物理空间中，却是一个个失落的个体。他们居住在城市的缝隙中，被结构性空间所否定、所排挤，自然其话语权也被剥夺。近几年的作者纪录片在实践中，不只是赋予了阈限中个体被关注的可能，更是赋予了他们“发出声音”的可能。在《杀马特我爱你》中，整部影片在由“杀马特”们的言说所构成的基础上，更是使用了大量“杀马特”们用他们的视角所拍摄的素材，在一定意义上通过技术的发展与观念的更新实现了“话语权的解放与让渡”。

二、形式：从反叛到表达的阈限呈现

正如吕新雨教授所说，“‘纪录片’……这个词在八九十年代中国旧有的语境中是以反叛旧有的习惯而获得意义的”^{[11]13}，纪实手法成为作者纪录片反叛的鲜明标志。形式是服务于表达的，形式成为了作者们进行自我表达的一种外在工具。此时的作者主动选择了一种更加贴近现实生活的表达方式：长镜头、大景深以及毫无保留的同期声的使用。纪实手法使得被拍摄的人和事件具有了完整的整体性质，这种手法所呈现出的效果是可信的、实在的，同时它呈现给观众的却是多意的、暧昧的生活。这种多意性呈现出阈限的交融作用，为观众提供了不设限的、非结构性的丰富读解的可能。“尽管都反对专题片以解说为主的‘文学电视’模式，《流浪北京：最后的梦想者》（1990）完全抛弃了解说，而用采访、跟拍等方法贴近生活，《天安门》（1991）则在不拍抛弃解说的前提下进行蒙太奇的实验。”^{[12]51}可以看到，此时纪录片的创作并未彻底的脱离“文学电视”美学的桎梏，在形式上既有跟拍，又有采访同时出现，也有解说词的介入，甚至还有“城市交响乐”的身影，呈现出一种混杂的、未被归类的、处在阈限中的表现模式。虽说在形式上是对“文学电视”的一种反叛，是对一种虚假生活呈现方式的反叛，但同时，他们也要回应曾经被忽略的“底层叙事”、“微观叙事”等阈限内容的召唤。“因为长期不让人说话，现在突然开口说话，所以创作者就大量往外说，说自己的情感、认识，创作者特别想表达自己，这被认为特别重要。”^{[12]143}可见，一方面纪录片作者在追求“真实”，一方面又视纪录片为“讲坛”。这就导致了此时的纪录片需要在纪实风格的基础之上呈现出“声音”，呈现出作者的观点。而这种处在阈限中的纪录片形式，恰恰满足了作者们“反叛”的需求，也满足了“作者声音”呈现的需要。

从张以庆的《英和白》（1999）开始，范俭的《的哥》（2008）魏小波的《生活而已》（2011）等一系列作品中，作者更注重自我观念在影片中的呈现，并希望在现实中找到契合的素材作为自我宣泄的注脚。尤其是近年来《冈仁波齐》（2020）《吉祥如意》（2020）《这个女人》（2022）等影片采取的混杂外在形式，可以从中看出对于作者纪录片来讲，形式为何已不再重要，作者们开始享受处在阈限当中的形式带来的极高创作自由度以及“作

者声音”的便利呈现。《冈仁波齐》全片大部分画面采取摆拍的方式进行拍摄,镜头语言与画面异常之考究,作者让藏民“重演”了作者架构后的朝圣路上发生的真实故事,从人物、结构、情节、摄影等多方面对影片进行“介入”,又通过这些视听元素,使影片整体的形式上呈现“直接电影”的范式。“所有的电影元素和概念都是对生活的重演,通过对村落里朝圣者的日常生活的观察,然后把它浓缩到电影里。”^[13]作者只是利用观众对于纪录片“真实性”的认知,将其对于朝圣的主观上的真实认知呈现出来。而《吉祥如意》则直接将影片分为两部分,“吉祥”部分按照工整的纪录片语法进行叙述,呈现出“直接电影”的影像形式,但演员的加入又使得影片具有一定剧情片色彩;“如意”部分则是将摄影机与银幕暴露在影像之中,将作者的拍摄过程与思考过程暴露在影像之中,“其与‘吉祥’部分产生了一种界面效应,……界面效应使两部分相互拉扯,产生出更多元、更深刻的话语表达”^[14]。《这个女人》也如同《吉祥如意》一样,无法用传统的纪录片尺度去审视它,作者采用了类似戏剧中“幕表制”的方式,导演与主人公之间达成“共谋”的创作初衷,在直接的镜头语言表达之中埋设了假象,组合出一种极为混杂的电影表现方式。让纪录片与剧情片有机组合,幻化出一种粗砺、大胆、迷人的直观感受。模糊的真实与虚幻之中,树立起一个超时代意义的自由女性形象,实现着作者、主角与观众共同的自我审视。

阈限中的作者纪录片的表现形式,在一定意义上证明了在后现代文化语境中,真实这一概念处在被质疑、被消费、被褒玩的状态之中。真实已经不再是作者纪录片的最终追求,传统纪实美学所营造的真实神化变得难以为继,“真实”不再只是被悬置,而已经被打破,作者纪录片不只是影像视觉所营造出来的“真实”表达,更应是多感官所呈现出来的知觉与情绪。正如蒋巍所说“纪录片给我感觉它之所以有魅力,是因为它宽容,它什么都可以包含”^{[12][167]}。阈限中的众多可能性的形式为纪录片的创作、作者声音的呈现、纪录片样式的探索提供了空间。这种一直处在探索中的对于真实的认知并不是对于纪录片真实性的否定,而是在形式上不断进行探寻,从而抵达作者认知、作者表达的真实之中。

三、身份:由阈限中的身份带来的交往

“阈限中的个体/群体在社会结构和文化分类中的特征是模糊的、不确定的无法被明确或被安排于某一社会位置。”^{[10][26]}可以说作者们就是以“阈限中的个体”的身份出现在舞台之上的。上世纪八十年代末独特的历史文化阶段使成长其中的作者们呈现出复杂多元的文化主体身份。他们在思想意识上是社会精英,而在物质、权利等层面又是处在边缘中的群体。吴文光在拍摄《流浪北京:最后的梦想者》之前,曾以“知识青年”的身份上山下乡,在辗转新疆、昆明后才来到北京。“到北京后什么也没干,身上大概有几百块钱……住的地方是乱七八糟的朋友家,处在一直流浪的状态。”^{[11][6]}他们被结构性社会认为是不稳定的、是需要被排斥与遮蔽的对象。随着知识分子理想的落地,作者们形成了一种新的主体性,不再是以启蒙大众为己任的精英态度,而是站在个人角度对个体化的表达进行追求。作为“失落的知识分子”,处在阈限中的身份成为了作者们创作灵活性的来源,成为了他们体察民众、理解民众并获得平民意识的条件与契机。创作的过程,也正是一次交往的过程。对影片来讲,对于普通民众生活的关照,召唤出了处在阈限中的国人的日常生活与细微表情,实现作者与被拍摄对象间的直接交往;对作者来讲,创作往往是一个追寻自我的过程,在对被拍摄对象进行纪录与反映的过程中,作者们也在反映着自身,发现着自我,实现着自我反思与自我交往。

同时,DV、智能手机等影像设备的发展与价格愈发的低廉,再一次降低了通过影像发声的门槛,使得“人人成为作者”这一神话成为可能。愈发多的个体成为了作者,作者们不再只是“失落的知识分子”,普通人拥有了呈现自我,成为作者的机会。作者们也可以是被拍摄的对象,他们将摄影机对向自己,对向自己的生活,通过创作来实现个人满足与表达。他们与早期作者们相比,其身份更为混杂,更具有阈限性。技术实现了影像权力的下放,赋予了更多人通过创作进行自我审视,通过影片实现社会交往的可能,召唤出了更多的处在阈限中的人的生活状态,尤其是召唤出了具有主体性的自我呈现。正如《生活而已》的作者魏晓波本人所说,“在做了几部纪录长片之后,我不敢奢望纪录片能改变什么,但是,我发现它能悄悄的改变我自己,从这面镜子中,我才真正意识到,我不过是生活着而已”^[15]。

虽说更多的个体参与到作者纪录片的创作,但作者纪录片所存在的空间却在逐渐缩小,尤其是影片与观众见面的方式。虽有《归途列车》(2010)、《城市梦》(2020)、《棒!少年》(2020)等作者纪录片以纪录电影的形式在院线上映,但民间放映机构、互联网资源依旧是作者纪录片与观众见面的主要方式。作者纪录片作为处在阈限中的“受礼者”,往往需要通过“仪式”才能向结构空间进行转换,“但仪式力量让阈限里的受礼者表现得卑微低下、顺服和沉默。他们往往要承受身体的折磨和心灵的考验”^{[10][26]}。以“反叛语境”出现的作者纪录片自然不会变得“卑微低下、顺服与沉默”,这也使得作者纪录片更青睐于在阈限空间中进行传播,采取边缘化、小众化的传播方式。阈限中的传播虽短于横向,但更长于纵向。这种传播方式反而能够吸引具有更高价值的观众进入到阈限空间内进行交往,尤其是对于民间放映来讲。民间放映给予了作者与观众一个交往融合的空间,在这个空间中,在一定意义上实践着尤尔根·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提出的交往理性。民间放映中观众通过传统观影形式以作者纪录片为载体与作者进行交往、扩充生存经验的同时,日常生活影像中的出现使得观看变得更为审慎清晰,促使观众进行自我反思与审视。同时,放映空间也是“民主化”的,映后交流作为民间放映的“必备科目”,排除了传统观影呈现的单方面的规范与特权,使得影片拍摄、放映中所有参与者呈现出对等的身份。作者、学者、观众甚至被拍摄对象都有机会参与陈述性、规范性表现性的言语活动,在一定意义上实现着平等真

诚的对话。对话带来了更多的观看世界的视角,有助于个体走出经验盲区,发展个体对他者的理解能力,让群体变得更加富有人性,实现着“交往共识”。

四、结语

正如王小鲁所说,“纪录片是一种社会交往,它从制作到传播的全过程,都是对于社会区隔的打破”^[16]。在内容上,作者纪录片对阈限空间和个体的关注在一定意义上是对媒介纪录片对社会关照中缺失的补充;在形式上,阈限所带来以表达为目的的表现形式拓宽了纪录片样式探索的空间;在身份上,处在阈限中的作者身份与作品身份成为了创作灵活性的来源,实现着从创作到放映全过程的社会交往。处在阈限中作者纪录片所处的不再是一个“通过性”“过渡性”的空间,相反地“过渡成为了一个永久状态”^{[3][108]},这个空间成为了永久性的交融、变革、筛选的空间。在一定意义上,阈限中的作者纪录片缓冲了社会区隔所带来的对立冲击,实现了“交往共识”,促使个体适应性的增长,也促使了纪录片所关注的内容与影片形式上的革新。

参考文献:

- [1] 查建英.八十年代:访谈录[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22.
- [2] 黎小锋.“作者纪录片”何以成立[J].艺术广角,2017(02):54-55.
- [3] [英]维克多·特纳.仪式过程:结构与反结构[M].黄剑波,柳博赞,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
- [4] [法]马塞尔·马尔丹.电影语言[M].何振淦,译.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1985:169.
- [5] 梅冰,朱靖江.中国独立纪录片档案[M].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 [6] [美]约翰·费斯克.等.关键概念:传播与文化研究词典[M].李彬,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04:29.
- [7] 王学泰.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M].北京:学苑出版社.1999:17.
- [8] 凤凰·DV 新时代栏目组.一个人的影像:DV 完全手册[M].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03:112.
- [9] 李幸,刘晓倩,汪继芳.被遗忘的影响:中国新纪录片的滥觞[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9.
- [10] 王华.阈限[J].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44(06):26.
- [11] 吕新雨.纪录中国.当代中国的新纪录运动[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
- [12] 樊启鹏.民间影像与个人书写:中国独立纪录片的创作与传播(1990-2007)[M].北京:北京出版社.2013.
- [13] 张杨,王红卫,孙长江.发现自我的朝圣之路——《冈仁波齐》导演创作谈[J].北京电影学院学报,2015(06):41-43.
- [14] 范虹.电影与现实的叠映:元电影中的界面效应研究[J].北京电影学院学报,2021(06):49-56.
- [15] 魏晓波.纪录片《生活而已》资料[EB/OL].[\(https://www.douban.com/note/138243919/?_i=1672618LB4nOTG,1672650LB4nOTG\)](https://www.douban.com/note/138243919/?_i=1672618LB4nOTG,1672650LB4nOTG).(2011-03-06)[2023-08-15].
- [16] 王小鲁.纪录片与中国现代性——论当代纪录片如何参与现代社会建构[J].电影评介,2022(10):1-6.

Content, Form, and Identity: Chinese Author Documentaries in Liminality

Li Zhongye¹

¹*School of Communication, Fujian Normal University, Fuzhou, Fujian 350117, China*

Abstract: Since the emergence of Chinese author documentaries in the late 1980s, they have remained in a state of "liminality" in terms of content, form, and identity. By focusing on liminal spaces and individuals within these transitional zones, Chinese author documentaries employ hybrid, unclassified, and liminal expressive forms that gradually assert the films' subjectivity while offering audiences unrestricted interpretative possibilities. The liminal identity of both the documentaries and their creators not only expands the films' content and formal boundaries but also enriches their interactions with subjects and viewers. This complex, multifaceted liminal identity becomes a condition and opportunity for filmmakers to engage with the public, pursue self-reflection, and facilitate social connection through their work. The obscured status of these films and their creators compels them to seek dissemination within marginalized liminal spaces, yet this very marginalization strips away the unilateral norms and privileges inherent in traditional viewing contexts, partially realizing "communicative rationality" in the process.

Keywords: Author documentary; Liminality; Content; Form; Interaction

基于 Citespace 可视化分析脑卒中患者运动功能康复的研究热点与演化趋势

黄佳雪¹ 陈园¹ 周宏宇¹ 齐浩宇¹

(1. 成都大学, 四川 成都 610106)

摘 要: 旨在通过对中国知网收录的 2001-2024 年间关于脑卒中患者运动功能康复相关的文献索引进行文献计量学分析, 总结该领域的研究现状和热点问题。方法: 采用 Citespace 软件对选定文献的发文量、研究机构、高产作者、关键词等关键指标进行可视化分析, 以揭示该研究领域的发展趋势和研究热点。结果显示: (1) 自 2001 年起, 该领域研究的发文量呈现出波动上升的趋势; (2) 现阶段研究的核心力量主要集中在如中国康复研究中心北京博爱医院、首都医科大学康复医学院、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等机构; (3) 研究热点经历了演化, 从最初的运动疗法、康复训练逐步扩展到护理以及智能康复领域, 呈现跨学科融合的特点。研究发现, 随着大量研究成果的涌现, 针对脑卒中患者运动功能康复的机制及其护理方案也更加趋于多元化。

关键词: 脑卒中; 运动功能; 康复; 可视化分析

DOI: doi.org/10.70693/rwsk.v1i5.1026

脑卒中 (Stroke) 俗称中风, 包括缺血性脑卒中和出血性脑卒中两种。它是由多种因素引起的脑血管受损, 导致产生局灶性或整体脑组织损害的疾病, 脑卒中已经成为我国居民死亡和残疾的主要原因^[1], 对国民健康构成了重大威胁。它具有高发病率、高致残率、高死亡率及高复发率的特点^[2]。数据显示, 中国脑卒中的发病率逐年上升, 从 1993 年的 0.40% 增长到 2013 年的 1.23%, 且发病的平均年龄也在下降。在中国, 卒中患者一年内的复发率高达 17.7%, 五年累积复发率超过 30%。孙海欣, 王文志^[3]在 2013 年对全国 480687 脑卒中患者的多中心调查研究表明: 脑卒中的患病率、发病率和死亡率均有所上升, 并且存在明显的地理差异。目前农村地区是脑卒中的高发区, 无论是患病率、发病率还是死亡率都显著高于城市, 并且呈现出年轻化的趋势, 这严重影响了患者的生活质量。医学研究也证实, 脑卒中康复是降低其致残率、致死率最有效的手段^[4]。因此, 我们需要从多方面关注卒中患者, 以促进其身体机能恢复, 提高他们的生活质量。

为了更有效地应对脑卒中带来的挑战, 国家和医疗机构正在采取一系列措施。此外, 在科研领域, 脑卒中的研究正朝着个性化医疗的方向发展。研究者们正在探索如何利用先进技术, 为患者提供更为精准的诊断和治疗方案。同时, 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的应用, 也在帮助医生更好地预测疾病风险、制定治疗计划。未来, 随着这些技术的不断进步和应用, 我们有望在脑卒中的预防、诊断和治疗方面取得更大的突破。本文借助 Citespace 可视化知识图谱工具, 深入挖掘该领域的研究文献, 对发文量、研究机构、主要作者以及研究的热点和未来发展势进行知识图谱网络可视化分析, 以帮助学者们更好地掌握和理解该领域当前的研究现状。

1 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1.1 数据来源

本研究所采用的文献数据来源于中国知网 (CNKI) 学术期刊, 使用高级检索, 分别以“运动”“脑卒中”“脑卒中康复”“运动功能”等为检索词, 时间范围设置为“不限”, 来源类别选择核心期刊, 选择主要/次要主题后共检索到 1342 篇文献, 经过人工筛选和剔除书评、访谈、会议、综述以及题录不完整、缺乏与研究主题直接关联的不相关文献, 最终得到有效文献 418 篇, 最后将筛选后的论文以 refworks 导出, 并保存为纯文本 (.txt) 形式, 作为本研究的数据来源。

1.2 研究方法

作者简介: 黄佳雪(2001—), 女, 成都大学体育学院在读研究生, 研究方向为体育教学、运动干预与健康促进;
陈 园(2002—), 男, 成都大学体育学院在读本科生, 研究方向为体育教学、体育心理学;
周宏宇(2002—), 男, 成都大学体育学院在读本科生, 研究方向为体操教学、体育心理学;
齐浩宇(2003—), 男, 成都大学斯特灵学院在读本科生, 研究方向为体育教学、运动干预与健康促进。

2 研究结果与讨论

APPENDIX C

2014年12月15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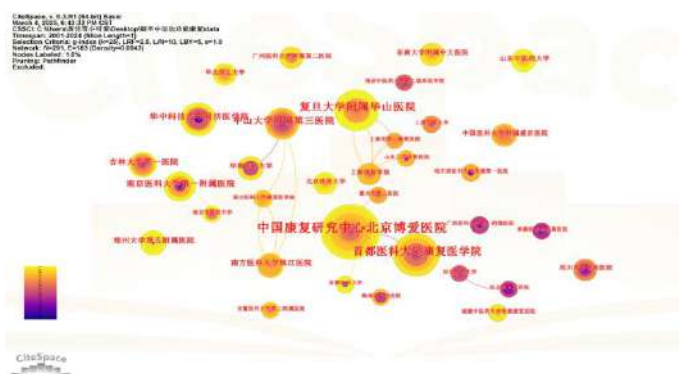
50



1. *Journal of Management Studies*, 1996, 33, 1, 1-14.

通过上述统计显示得出：

bioRxiv preprint doi: <https://doi.org/10.1101/2020.03.04.328131>; this version posted March 4, 2020. The copyright holder for this preprint (which was not certified by peer review) is the author/funder, who has granted bioRxiv a license to display the preprint in perpetuity. It is made available under aCC-BY-NC-ND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



该领域的先进研究水平和未来发展趋势,有助于学者迅速掌

[illegible]

1 得出,在本领域年度发文量位居前列的研究机构主要是医院和高校。其中,中国康复研究中心北京博爱医院的节点最大,发表相关文献 30 篇,排在首位;排在第二、三位的机构分别是首都医科大学康复医学院 (18 篇) 和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 (17 篇);后续依次为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 (11 篇)、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 (9 篇)、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8 篇)、吉林大学第一医院 (7 篇)、郑州大学第五附属医院 (6 篇)、南方医科大学珠江医院 (6 篇)。由此可见,医院和高校构成了该领域研究的核心力量,拥有杰出的科研人员和团队,他们将继续深入研究,无疑将为该领域的研究作出更大的贡献。

表 1 2001-2024 年发表相关文献的机构分布一览表(前 9 位)

序号	年份	机构	发文量
1	2012	中国康复研究中心北京博爱医院	30
2	2010	首都医科大学康复医学院	18
3	2015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	17
4	2007	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	11
5	2003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	9
6	2004	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8
7	2006	吉林大学第一医院	7
8	2007	郑州大学第五附属医院	6
9	2019	南方医科大学珠江医院	6

2.3 研究的主要作者分布

通过 Citespace 可视化分析得到 $N = 286$, $E = 273$ 的科学化网络知识图谱 (图 3)。一个节点代表一位作者,节点的大小代表共现的频次,节点之间的连线则代表作者之间的合作,连线越多合作越紧密。表 2 总结了该领域相关研究的前九位作者,其中,贾杰学者的节点最大,出现的频次最多,发表相关文献 8 篇,排在首位;排在第二、三位的主要作者分别为吴毅学者 (6 篇) 和黄国志学者 (5 篇);后续第四至第九位依次为何龙龙、陈杰、傅建明、张明、张通、金振华,其发表的文献均为 4 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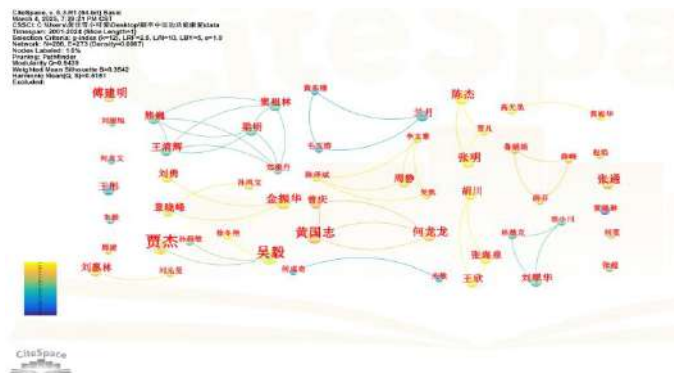


图 3 2001-2024 年发表相关文献的核心作者网络知识共现图谱

根据节点数量和节点之间的连线,可以划分出几个子网络。一是以贾杰、吴毅学者为核心的合作网络,包括孙莉敏、徐冬艳等成员;二是以黄国志、何龙龙学者形成的学术合作团队,包括曾庆等成员;三为张明、陈杰、贾凡等学者的合作团队;四是由王清辉、熊巍、凉明、窦祖明、郑雅丹共同组成的学术合作网络,相较于前面几个团队,此团队之间合作较为紧密,除此之外,还存在个别学者相对独立的研究。综上所述,在脑卒中患者运动功能康复领域,虽然已经形成了若干研究团队,但这些团队规模较小,数量有限。此外,由于存在众多独立研究者,不同研究机构之间以及研究者之间的合作并不频繁。因此,该领域的跨区域交流与合作亟需加强。预计未来,合作的频次将会增加,研究的深度也将得到进一步的提升。

表 2 2001-2024 年发表相关文献的高产作者一览表 (前 9 位)

序号	年份	作者	发文量/篇
1	2015	贾杰	8
2	2015	吴毅	6
3	2019	黄国志	5
4	2019	何龙龙	4
5	2023	陈杰	4
6	2015	傅建明	4
7	2023	张明	4
8	2004	张通	4
9	2023	金振华	4

3 研究的热点分析

3.1 关键词共现分析

关键词是一篇论文的核心概括,对论文关键词进行分析可以对文章主题窥探一二。通过分析关键词的共被引频次、高频出现以及高中心性,我们可以洞察该研究领域的核心内容,进而揭示该领域的发展前沿和演变趋势。图 4 显示节点 $N=300$, 连线 $E=817$ 的关键词共现网络知识图谱,一个节点代表一个关键词,节点的大小表示关键词出现的频次,节点外的圆环则代表该关键词的中心性。表 3 和图 4 显示,节点最大的关键词是脑卒中,共出现了 402 次,运动功能出现的频次为 98 次,以及偏瘫 (84)、康复 (68)、上肢 (52)、平衡 (29)、综述 (28)、平衡功能 (24) 等高频词汇;同时得出高中心性的词汇分别为脑卒中 (中心性 1)、运动功能 (0.43)、偏瘫 (0.33)、综述 (0.22)、康复 (0.19) 等。高频次和高中心性的关键词共同构成了 2001-2024 年脑卒中患者运动功能康复研究领域的热点与前沿。

表 3 2001-2024 年发表相关文献的高频及高中心性关键词一览 (前 10 位)

序号	高频关键词		高中心性关键词	
	关键词	频次	关键词	中心性
1	脑卒中	402	脑卒中	1
2	运动功能	98	运动功能	0.43
3	偏瘫	84	偏瘫	0.33
4	康复	68	综述	0.22
5	上肢	52	康复	0.19
6	平衡	29	上肢	0.11
7	综述	28	平衡功能	0.11
8	平衡功能	24	运动想象	0.08
9	下肢	19	护理	0.08
10	步行能力	19	下肢	0.0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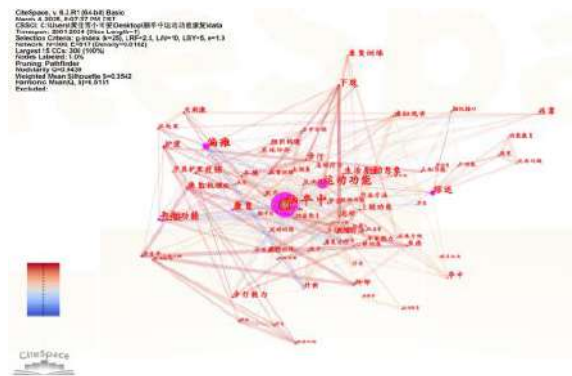


图 4 2001-2024 年发表相关文献的关键词共现网络知识图谱

3.2 关键词聚类分析

本文运用可视化分析软件得到了节点 $N=295$, 连线 $E=1064$, 密度 (Density) = 0.0245 的关键词可视化网络知识图谱 (图 4)。Citespace 依据网络结构和聚类的清晰度, 提供了模块值(Q)和平均轮廓值(S)两个指标, 它可以作为我们评判图谱绘制效果的一个依据^[8]。在图中, 聚类中的 $Q=0.4422>0.3$, $S=0.826>0.7$, 由此可得关键词聚类的结构清晰、较为理想。在该研究领域中, 关键词被归入了 11 个不同的聚类。深入分析这些聚类后, 我们可以将研究主题概括为以下几点: 多模态融合的运动功能康复干预策略 (#0、#1、#2、#4、#8); 心理神经机制在康复过程中的协同作用 (#5、#7、#9); 以及针对复杂功能障碍的跨学科康复研究 (#3、#6、#10), 每个主题都涵盖了基础研究、干预手段和临床问题, 既注重理论深度也强调实践价值。



图 5 2001-2024 年发表相关文献的热点聚类网络知识图谱

3.2.1 多模态融合的运动功能康复干预策略 (#0、#1、#2、#4、#8)

偏瘫和运动功能障碍在脑卒中后极为普遍,严重影响了患者的日常生活能力(ADL)。康复训练是促进运动功能恢复的核心手段,对于脑卒中患者而言,恢复下肢功能和步行能力至关重要。由于神经系统受损,他们的平衡功能通常会严重下降,脑卒中患者是跌倒的高危人群,而跌倒已经成为老年人死亡的重要病因之一^[9]。因此,开发专门针对平衡功能的训练,成为提高患者平衡控制能力、降低跌倒风险等关键目标的关键。通过特定的平衡训练器械和方法,可提高患者的平衡能力,进而改善步行功能。传统运动疗法如 Bobath 技术被广泛应用与研究,现阶段主要应用于小儿脑瘫和脑卒中患者的治疗^[10],旨在通过抑制异常运动模式,促进正常运动模式的出现。徐华平等研究发现^[11],采用 Bobath 技术结合平衡仪训练能更好地改善脑卒中偏瘫患者的平衡功能。功能性电刺激(FES)^[12]作为一种治疗手段,对于增强肌肉力量、扩大运动范围以及促进患者运动模式的重新学习发挥着关键作用。李燕军等人^[13]通过实验发现:功能性电刺激联合新 Bobath 技术在脑卒中后肩痛患者康复中的效果较好,治疗后患者满意度较高。分阶段减重步行训练^[14]通过减重支撑及安全带保护脑卒中患者,从而降低患者步行时的能量消耗,减轻患者下肢负担,进一步提升平衡能力和下肢功能。同时,八段锦^[15]作为传统健身功法,通过进一步改良可以改善患者肺通气功能及膈肌功能,进而提高患者的日常生活能力。多种运动功能康复干预策略相结合,形成了一种多模态、跨学科的康复模式。该模式致力于通过运动功能的重塑与心理-生理协同干预,促进患者整体功能的代偿和生活质量的提升。在脑卒中康复领域,康复机器人是重要的发展方向,与“运动功能”“偏瘫”密切相关,能提供精准、重复性高的运动训练,解决人力有限和训练标准化的问题,但如何提升机器人的人机交互性能力和对不同患者的适配性仍然是目前研究的热点问题。

3.2.2 心理神经机制在康复过程中的协同作用 (#5、#7、#9)

心理状态会影响患者的康复积极性和身体恢复能力,而心理干预则对康复效果具有潜在的调控作用。心理神经机制通过多种方式协同作用,以促进身体功能的恢复和整体健康状况的改善。研究心理神经机制在康复中的协同作用,有助于制定更有效的康复方案。脑卒中患者神经系统受损,损伤后神经系统自我修复和重新组织的能力称为神经可塑性,神经可塑性是脑梗死患者康复的重要机制之一,陶锋、邓士哲等人^[16]发现针刺能从多途径、多靶点调控神经可塑性,改善脑梗死后的神经损伤,神经可塑性与心理因素产生交互作用,在康复过程中,患者如若保持积极乐观的心态,大脑中与运动相关的神经元更容易通过轴突发芽、突触重建等方式,恢复对肢体运动的控制。抑郁和焦虑是脑卒中患者常见的心理问题,康复护理不仅要关注身体康复,还要重视心理护理。心理状态能直接影响自主神经系统的平衡,放松、愉悦的心理状态会激活副交感神经,促进身体的休息和恢复,有利于伤口愈合、组织修护等。通过认知行为疗法,帮助患者辨别并转变负面思维模式和行为习惯,可增强其康复的自信心和动力,进一步促进神经-心理-行为的交互作用,有助于恢复神经功能和心理健康,运动想象利用大脑对运动过程想象性演练,激活相关神经通路;利用人工智能技术如表面肌电和功能性核磁共振技术用于监测康复效果,自动识别脑部病变区域、大小和形态变化,通过对比不同时期的影像,精准评估脑部损伤的恢复情况,以及是否有新的病变出现。

3.3.3 针对复杂功能障碍的跨学科康复研究 (#3、#6、#10)

脑卒中患者常伴有多种功能障碍,需要多学科协作进行康复治疗。对康复领域的综述有助于总结经验、发现现存问题,从而进一步优化手功能和整体功能康复方案,提高康复效果。首先,虚拟现实^[17]和机器人技术^[18]在康复领域的应用,为上肢功能康复提供了新的途径,通过模拟真实场景和辅助训练,让患者沉浸其中,从简单的目标识别逐步过渡到复杂的多步骤操作,精准辅助运动训练以适应不同患者康复需求。在整个模拟训练过程中系统实时监控患者运动数据,并给予患者及时反馈与评估,及时调整康复策略,为患者提供更有效、科学的康复治疗。吞咽障碍和认知功能障碍是脑卒中患者常见的复杂问题,护理^[19]在解决这些问题中发挥重要作用,通过大量实验数据的反复验证与交叉对比,可以观察到,相较于常规护理而言,采用护理专案干预急性期脑卒中吞咽障碍患者的护理效果更为显著,可控制并预防肺部感染的发生,提升患者的生活质量及吞咽能力,值得临床运用。护理人员参与制定个性化护理计划,预防并发症,同时给予患者心理支持,帮助其应对疾病带来的身心创伤,促进康复进程。除此之外,脑卒中康复需要康复医师、物理治疗师、作业治疗师以及心理医生等多学科团队协作。各学科从不同角度出發,共同为患者恢复运动功能、回归社会努力。

表 4 关键词共被引聚类信息列表

ClusterID	Size	Silhouette	year	Label(LLR)
0	63	0.856	2014	运动疗法(14.76,0.001);恢复期(8.42,0.005);社区康复(8.42,0.005);平衡(4.86,0.05);步行(4.73,0.05)
1	42	0.795	2014	平衡功能(28.89,1.0E-4);偏瘫(22.33,1.0E-4);下肢功能(17.83,1.0E-4);步行能力(17.03,1.0E-4);步行功能(14.88,0.001)
2	37	0.747	2016	运动功能(25.34,1.0E-4);康复训练(21.49,1.0E-4);肺功能(12.74,0.001);热敷(8.48,0.005);临床疗效(8.48,0.005)
3	30	0.699	2013	康复(40.84,1.0E-4);上肢(30.96,1.0E-4);上肢功能(15.42,1.0E-4);虚拟现实(11.14,0.001);机器人(11.14,0.001)
4	24	0.775	2015	步行(48.68,1.0E-4);平衡(47.78,1.0E-4);下肢(39.79,1.0E-4);运动(21.3,1.0E-4);减重训练(9.92,0.005)

5	22	0.892	2016	组织构建(13.69,0.001);心理状态(13.69,0.001);生活质量(10.34, 0.005);痉挛状态 (9.94,0.005);卒中(8.28,0.005)
6	19	0.929	2017	综述(31.12,1.0E-4);手功能(15.53,1.0E-4);功能康复(13.26,0.001);现存问题(13.26,0.001);效果(13.26,0.001)
7	18	0.919	2016	抑郁(16.93,1.0E-4);焦虑(11.87,0.001);康复护理(11.87,0.001);社会疏离(7.79,0.01);火龙罐(7.79,0.01)
8	16	0.798	2018	八段锦(13.55,0.001);心肺功能(11.45,0.001);运动康复(9.77,0.005);肢体功能(9.77,0.005);水疗法(7.58,0.01)
9	11	0.898	2016	运动想象(19.23,1.0E-4);表面肌电(14.97,0.001);步速(11.2,0.001);双侧训练(7.45,0.01);功能性核磁共振(7.45,0.01)
10	11	0.936	2021	吞咽障碍(16.29,1.0E-4);认知功能(16.29,1.0E-4);护理(9.66,0.005);七步循环站立平衡训练(8.1,0.005);想象训练(8.1,0.005)

4. 研究的演化趋势

突增关键词主要用于揭示在特定时间段里, 哪些关键词的频次发生了显著性变化, 即哪些关键词“突现”成为热点或者研究主题。突现词的突现状态通常具有时间的延续性, 延续周期在两年或者以上, 可以用于辅助判断未来一段时间内的热点和研究趋势^[20]。根据图 6, 在康复训练领域, 研究强度位居榜首, 突增值高达 3.93。研究^[21]指出, 早期康复训练对于改善脑卒中患者的机能障碍和提高生活质量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在 2019 年至 2021 年期间, 康复训练成为该领域的研究焦点, 这可能归因于针对脑卒中患者运动功能康复的新研究进展, 使其成为研究的热点。紧随其后的是偏瘫研究, 突增值为 3.5, 突现状态持续了 6 年, 这表明卒中后患者的主要症状是偏瘫, 它严重干扰了患者的运动功能和参与社区活动的的能力, 因此早期研究主要集中在这一症状上。排名第三的是运动疗法, 突增值为 3.49, 这强调了运动疗法在卒中患者运动功能康复中的关键作用。排名第四的是护理, 突增值为 2.75, 这表明康复后的护理对于预防复发、巩固康复效果以及提升生活质量具有重大意义, 该研究趋势始于 2021 年, 并持续至今。

如图 6 显示, 护理是目前研究的新兴热点, 研究时间从 2021 年持续至今, 但是目前研究强度较低, 为 2.75。康复护理研究的侧重点在于如何通过一系列的干预措施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 这一系列措施需要医护人员、患者及其家属协同参与完成。有研究表明^[22], 脑卒中患者早期运动康复护理方案具有可靠性、科学性, 构建脑卒中患者早期运动康复护理方案具有重要意义。医护康一体化康复护理方案^[23]对脑卒中后患者的日常生活能力、改善病人肢体肌张力等方面皆有益处。但我国康复机构及人员仍存在分布不均、康复医疗资源缺口等问题^[24]。医护人员、患者以及家属需协同合作发挥重要作用, 不断缓解患者的病情程度, 提高患者生活质量。从患者入院起医护人员便针对患者情况制定个性化方案, 护理团队对患者和家属进行康复知识培训, 解答疑问; 患者本人积极配合治疗, 不断加强自我管理, 调整心态, 鉴定康复信念; 家属则在生活照顾、康复协助以及心理支持等方面扮演至关重要的角色, 为患者营造舒适的生活环境, 关注其心理变化。这些综合性的护理措施旨在全方位巩固康复成效、防止复发并提高患者的生活品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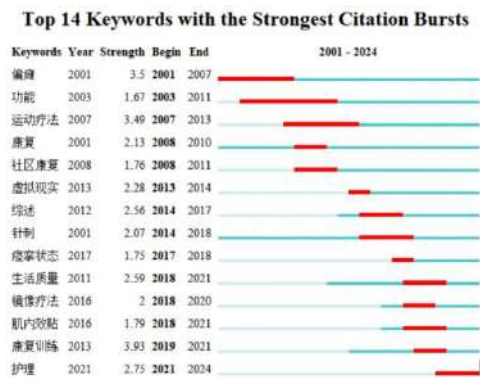


图 6 2001-2024 年发表相关文献的突增关键词知识图谱

5. 小结

本研究从多个视角出发, 推动了新知识与新领域的交叉融合, 从而催生了新的研究热点和主题, 进一步丰富了该领域的研究成果。此次研究借助了 Citespace 可视化分析工具, 对该领域相关研究进行了整合分析, 发现该领域研究的发文量呈现出波动上升的趋势; 研究的核心力量主要集中在我国康复研究中心北京博爱医院、首都医科大学康复医学院、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等机构; “护理”“康复机器人”“虚拟现实”等成为了脑卒中患者运动功能康复领域的研究热点, 尽管这些技术为患者提供了更为高效的治疗手段, 但也存在一些局限性。未来, 该领域

研究有望深化跨学科合作,整合医学、心理学、工程学等多学科知识,开发更有效的康复护理方案,借助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技术,实现康复治疗的精准化和个性化,对其存在的局限性在今后的研究和实践中不断改进和优化,提升机器人的人机交互性能和对不同患者的适配性;同时,应加强研究团队间的交流合作,促进知识共享与成果转化,以提升整体研究水平;还需注重康复护理体系的完善,培养专业护理人才,优化资源配置,从而进一步提高脑卒中患者的康复效果和生活质量。

参考文献:

- [1] 潘钰,谢欲晓,张皓,等.脑卒中重症康复指南[J/OL].康复学报,1-10[2025-02-19].<http://kns.cnki.net/kcms/detail/35.1329.R.20241210.1515.001.html>.
- [2] 国家卫生健康委办公厅.国家卫生健康委办公厅关于印发中国脑卒中防治指导规范(2021年版)的通知[EB/OL].(2021-08-31)[2025-02-09].<http://www.nhc.gov.cn/yzygj/s3593/202108/50c4071a86df4bfd9666e9ac2aac605.shtml>
- [3] 孙海欣,王文志.中国脑卒中患病率、发病率和死亡率调查结果发表.中华神经科杂志,2017,50(05):337-337
- [4] 林志诚,薛偲华,江一静,等.中医康复临床实践指南·脑卒中[J].康复学报,2019,29(06):6-9+15.
- [5] 许贞峰,郭宗君,郭云良,等.早期康复及针刺对急性脑卒中患者运动功能的影响[J].中华物理医学与康复杂志,2001,(04):33-35.
- [6] 陈丽萍,陈倩维,杜爱华,等.脑卒中患者肢体偏瘫的康复护理[J].辽宁中医杂志,2004,(01):82-83.
- [7] 李垂坤,凌勇,魏翠兰.基于Citespace的学龄前儿童身体活动研究知识图谱分析[J].湖北体育科技,2020,39(09):767-774+797
- [8] 陈悦,陈超美,刘则渊,等.Citespace知识图谱的方法论功能[J].科学学研究,2015,33(02):242-253.
- [9] 伞春红,张宁,尚焦.平衡仪训练对脑卒中患者平衡功能及跌倒风险的影响[J].中国实用医药,2019,14(22):187-188.
- [10] 房涛,张积众,袁清强.Bobath技术的应用现状及发展趋势[J].按摩与康复医学,2020,11(06):35-37.
- [11] 徐华平,全莉娟,冯珍.PRO-KIN平衡仪训练对脑卒中患者平衡功能康复的疗效[J].南昌大学学报(医学版),2011,51(02):66-67+69.
- [12] 胡晓芳,孟冬娅,罗军,等.功能性电刺激恢复脑卒中后的运动功能[J].中国临床康复,2002,(07):981.
- [13] 李燕军,蒋雪骏.功能性电刺激联合新Bobath技术在脑卒中后肩痛患者康复中的效果观察[J].吉林医学,2025,46(01):20-24.
- [14] 刘振,李东霞,孙秋莲.不同减重步行训练方式对脑卒中患者下肢功能恢复的效果比较[J].安徽医学,2023,44(05):548-551.
- [15] 李月华,刘雪梅,储开昀,等.改良八段锦对急性缺血性脑卒中合并呼吸障碍患者肺通气功能及膈肌功能的影响[J].实用心脑血管病杂志,2025,33(04):123-126.
- [16] 陶锋,邓士哲,朱巍明,等.针刺对脑梗死神经可塑性影响机制的研究进展[J].天津中医药,2025,42(02):253-257.
- [17] 林娜,高菡璐,卢惠苹,等.虚拟现实技术对脑卒中上肢功能影响的弥散张量成像研究[J].中国康复理论与实践,2024,30(01):61-67.
- [18] 睦有昕,郭川,朱仕哲,等.经颅直流电刺激联合虚拟现实康复机器人对脑梗死后上肢功能影响的临床研究[J].中国脑血管病杂志,2022,19(12):801-808.
- [19] 施明郡,陈雨,余晓燕,等.常规护理与护理专案干预对急性期脑卒中吞咽障碍患者的护理效果分析[J].中国防痨杂志,2024,46(S2):420-422.
- [20] 费晨雨.基于知识图谱的我国击剑运动研究热点可视化分析[D].内蒙古师范大学,2021.
- [21] 张通,赵军.中国脑卒中早期康复治疗指南[J].中华神经科杂志,2017,50(06):405-412.
- [22] 金静芬,李梅,陈圆圆,等.脑卒中患者早期运动康复护理方案的构建[J].中华护理杂志,2020,55(09):1360-1365.
- [23] 陈冲,云利娥,文荣鑫,等.医护康一体化康复护理方案在脑卒中后肌痉挛病人中的应用[J].护理研究,2023,37(14):2632-2635.
- [24] 刘向国,李李佳,武继磊,等.北京市老年康复机构及康复医学人力资源现状研究[J].中国康复医学杂志,2022,37(07):937-940.

Visual Analysis of Research Hotspots and Evolutionary Trends in Motor Function Rehabilitation for Stroke Patients Based on Citespace

HuangJiaXue¹, ChenYuan², ZhouHongYu³, Qi Haoyu⁴

¹School of Physical Education, ChengDu University, Chengdu, 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his study aims to conduct a bibliometric analysis of literature indexes related to motor function rehabilitation in stroke patients published between 2001 and 2024 in the China National Knowledge Infrastructure (CNKI), summarizing the research status and hotspots in this field. Methods: Citespace software was employed to visually analyze key indicators of the selected literature, including publication trends, research institutions, prolific authors, and keywords, thereby revealing the developmental trajectories and focal research areas in this domain. Results indicated that: 1. Since 2001, the annual publication volume in this field has exhibited a fluctuating yet overall upward trend. 2. Current research efforts are predominantly led by institutions such as Beijing Bo'ai Hospital (China Rehabilitation Research Center), School of Rehabilitation Medicine (Capital Medical University), and Huashan Hospital (Fudan University). 3. Research hotspots have evolved from early focuses on motor therapy and rehabilitation training to encompass nursing interventions and intelligent rehabilitation technologies, reflecting a notable trend of interdisciplinary integration. The study further revealed that: With the accumulation of research outputs, the mechanistic explorations and nursing protocols for motor function rehabilitation in stroke patients have become increasingly diversified.

Keywords: Stroke; Motor function; Rehabilitation; Visual analysis

文旅融合视域下宁德市陆游文化旅游资源开发

林黎茜¹

(1.福建师范大学, 福建 福州 350007)

摘要: 陆游是宁德最富文化内涵的历史名人之一,也是最具价值与影响力的文化符号与文化品牌之一。宁德市陆游文化资源丰富,如陆游廉政文化、宁德城隍庙城隍信俗、支提山佛禅文化等。以文强旅、以旅兴文,讲好陆游故事,丰富旅游内核。应通过保护、提升文化遗存、完善配套基础设施、打造特色文化IP、丰富文化旅游产品等战略举措,全面推进宁德市陆游文化旅游资源开发。

关键词: 陆游; 宁德; 文旅融合

DOI: doi.org/10.70693/rwsk.v1i5.1032

陆游(1125-1210),字务观,号放翁,越州山阴(今浙江绍兴)人,南宋文学家、史学家。宋绍兴二十八年(1158)至绍兴二十九年(1159),陆游仕宁德县主簿,爱国爱民,正理平治,对宁德发展产生深远影响。陆游在宁德留下了不少诗、文及其他文化遗存,是宁德富有文化内涵的历史名人,也是重要的文化符号与文化品牌。陆游文化旅游资源应进一步开发与发展。当前,“文旅融合”政策深入推进,部分学者将目光投射至文旅融合发展的理论逻辑与实践路径研究中。^[1]目前与宁德市陆游文化旅游资源开发相关的研究尚有空缺,本文试分析该市陆游文旅资源的开发现状,并提出发展策略,在一定程度上推动当地特定历史文化名人研究,也有助于地方文旅资源开发。

一、宁德市陆游文化旅游资源分析

绍兴二十八年(1158)春,陆游取福温古道入闽,赴任宁德县主簿。在任一年,陆游既是克尽厥职、节用爱民的地方官员,又是寄情山水、体物缘情的爱国作家。宁德市陆游文化旅游资源丰富,包括相关诗文与历史遗迹等,应予以重视并深入挖掘。本节结合陆游诗文创作,以城隍庙、华严寺以及物产为例分析宁德市陆游文化旅游资源。

(一) 宁德城隍庙

宁德城隍庙可根据《旅游资源分类、调查与评价》(GB/T18972-2017)分类为:主类F“历史遗迹”、亚类FA“物质类文化遗存”中的基本类型FAA“建筑遗迹”。

宁德城隍庙位于福建省宁德市蕉城区北部,建于宋绍兴元年(1131),明清重建、重修多回。2023年8月,宁德市蕉城区发展和改革局正式批复以城隍庙为中心的蕉城区历史文化街区保护与修缮项目,预计修缮保护景区历史街巷长度1340米,改造6处空间节点。

宁德城隍庙历史悠久,蕴含丰富的文化价值。近十几年,宁德城隍庙愈发受到相关部门重视。2012年6月,宁德城隍庙被公布为宁德县城隍庙旧址;2013年12月宁德市城隍信俗被列入宁德市第四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15年,“宁德市归国华侨联合会《亲情中华》陆游文化活动基地”在宁德城隍庙揭牌成立;2020年4月,宁德城隍庙被认定为福建省第四批省级宁德城隍庙历史文化街区;2021年5月,“宁德市对台交流基地”在宁德城隍庙正式揭牌成立。

宋绍兴二十八年(1138)至绍兴二十九年(1139),陆游任宁德市主簿,克尽厥职,节用爱民。清李拔《乾隆福宁府志》卷十七《秩官志·宁德循吏》陆游条后按:“予读《剑南诗集》万余言,慨然想见其为人。及守长溪,考其设施、经济,体用兼备。南渡后文人范、陆、萧、尤,陆其首哉。”^[2]其中,“经济”为“体”,经世济民,为官之道;“设施”为“用”,躬行实践,为官之行。^[4]任间,陆游受托撰写《宁德县重修城隍庙记》,详细记载了福建民间城隍信仰的情况,“闽之风俗,祭祀报祈,比他郡国最谨。以其祠庙之盛,甲于四方”^[3]。福建地区民间信仰

作者简介: 林黎茜(1999-),女,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唐宋文学。

浓厚,百姓注重祭祀礼俗,寺庙香火旺盛。陆游进一步分析了当地城隍信仰盛行的原因:“宁德为邑,带山负海。双岩白鹤之岭,其高摩天,其险立壁,负者股栗,乘者心掉;飞鸾关井之水,涛澜汹涌,蛟鳄出没,登舟者涕泣与父母妻子别,已济者同舟更相贺。又有气雾之毒,蛙龟蛇蚕守宫之蛊,邮亭逆旅,往往大署墙壁,以道出宁德为戒。然邑之吏民独不得避,则惟神之归,是以城隍祠比他邑尤盛。”宁德面山临海,山高路险,交通不便,地形地貌复杂。生产力落后的情况下,百姓大多以传统的耕种渔牧为生,靠山吃山,靠海吃海,受制于自然条件。风雨不测,百姓转向祈神,祈求城隍等超自然力量的庇佑,故民间城隍信仰盛行。

陆游还注意到了铺张祭祀的现象,指出:“夫神之所以为神惟正直,所好亦惟正直。君傥无愧于此,则擷涧溪之毛,挹行潦之水,足以格神。不然,丰豆硕俎,是谄以求福也,得无与神之意异邪?既以励君,亦以自勉,又因以励邑人。”陆游并非直接否定城隍信俗的合理性,而是将城隍神建构为一位“正直”的神,进而教化百姓:只要行事正直,敬奉山涧的茅草和沟渠的流水也足以感动神明;如果品行不端,供奉再多的祭品也有悖于神明的旨意。陆游主张“神惟正直”,于官于民都有教育意义。一方面,陆游要求官员简政爱民,体恤百姓疾苦,不以城隍祭祀加重课税;清正廉明,洁己奉公,以“正直”的道德规范来约束自己。另一方面,百姓不应铺张浪费、盲目攀比,供奉祈福在心不在迹,根据自身条件准备祭品即可。陆游还写道:“礼不必皆出于古,求之义而称,搔之心而安者,皆可举也。”礼俗不必因循旧例,只要出于心、合乎义,就是可取的。陆游反对铺张浪费,主张薄祭,在尊重民间信仰的基础上匡谬正俗,化民易风,减轻了百姓的生活负担。陆游在宁任县主簿,官微职小,仍体察民情,体恤民心。

(二) 支提山华严寺

参照《旅游资源分类、调查与评价》(GB/T18972-2017),宁德支提山华严寺可分类为:主类F“历史遗迹”、亚类FA“物质类文化遗存”中的基本类型FAA“建筑遗迹”。

华严寺位于福建省宁德市蕉城区霍童镇,别名支提寺。据传,华严寺五代末由了悟禅师始建,宋开宝四年(971)受赐额“华严寺”,于明永乐五年(1407)重修。支提山据传为天冠菩萨说法处,为僧俗人等所熟知和重视。^[4]华严寺在1983年4月9日经国务院批准,被列为全国佛教重点寺观;1985年10月经福建省人民政府批准,被列入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赴宁之初,陆游前往天冠菩萨道场——支提山华严禅寺礼佛,并与寺僧彻夜相谈,后作七律《访僧支提寺》:

高名每惯习凿齿,巨眼忽逢支道林。

共夜不知红烛短,对床空叹白云深。

满前钟鼓何曾忍,匝地毫光不用寻。

欲识天冠真面目,鸟啼猿啸总知音。(《逸稿补遗》卷八)

陆游自比东晋大儒习凿齿,又将寺僧比为东晋高僧支道林。夜静更深,红烛摇曳,二人对床共语,论道说法。“毫光”,又作白毫光,传说世尊眉间有白色毫毛,放之则有光明,名“白毫相”。白毫相为如来三十二相之一,后以“毫光”指“佛光”。^[5]钟鼓交响,毫光辉映,此中三昧,奥妙无穷。诗人与僧侣沉浸在幽邃高远的菩提世界中,暂时忘却了政治失意、报国无门的痛苦。山林溪谷间,沙门僧徒,鸟鸣猿啸,皆是知音。佛法何求?即心是禅。

陆游两度参加科举,皆因秦桧落第,年逾而立才初仕宁德。诗人只身外任,虽与寺僧萍水相逢,相谈甚欢,但因缘际会之下,难以预料何时重逢。诗人扩大化知音对象范围,僧侣等人可以成为知音,鸣禽走兽也可以作为挚友。万物生灵皆为知音,诗人通过强化主体的能动作用消解了内心的孤寂之苦。

陆游父亲陆宰志在归隐,曾作《留别东阳》,一说此诗为避建炎(1127-1130)之乱而居东阳山安福寺时所作:^{[6][7]}

前身疑是此山僧,猿鹤相逢亦有情。

珍重岭头风与月,百年常记老夫名。^[8]

陆宰自比山僧,枕山栖谷,顿生亲切之感。陆宰以法眼观照万物生灵,灵猿仙鹤、清风明月皆为故交,相逢有情。陆游诗作《访僧支提寺》作于《留别东阳》之后,诗中亦引猿、鸟为知音。陆游离乡别土,思念家人,仍以父辈身教自我宽慰。

宋室南渡之后,禅悦之风盛行,士大夫援佛入儒,文人多与僧侣交游。在家庭背景、社会背景等因素的作用下,陆游也深受佛教影响,其诗歌中体现着明显的“禅意”。^[9]“钟鼓”为佛门意象,“毫光”为佛门典故,禅语堆叠,可见佛教浸染之深。此外,从佛禅义理的角度来说,陆游将知音范围扩大至万物生灵,也体现着佛门教义“万法平等”的思想。在某种程度上,陆游对知音的超越性理解建立在体悟禅理的基础上,这也可以看作是华严寺对陆游的恩遇与宽解。

（三）陆游诗文所涉物产

宁德市物产丰富，陆游诗文中所提及的物产主要为荔枝、海蛎。荔枝可根据《旅游资源分类、调查与评价》（GB/T18972-2017）分类为：主类 G“旅游购品”、亚类 GA“农业产品”中的基本类型 GAA“种植业产品及制品”。海蛎按照《旅游资源分类、调查与评价》（GB/T18972-2017）分类为：主类 G“旅游购品”、亚类 GA“农业产品”中的基本类型 GAD“水产品及其制品”。

荔枝是宁德市地方特产之一，最著名的品种是霞浦晚熟荔枝。霞浦依山傍海，地理条件优越，产区土壤条件好，冬无严寒，夏无酷暑，受东吾洋、官井洋“小气候”调节，气候适宜。霞浦荔枝肉厚色白，肉质滑嫩，汁多化渣，绵甜适口，香气浓醇。霞浦栽培荔枝始于公元 14 世纪，主栽品种为“状元红”，果农生产经验丰富。2003 年，霞浦县被福建省列为荔枝生产优势产区；2006 年，被定为农业部南亚热作名优基地；2012 年 5 月 2 日，国家有关部门正式批准对“霞浦晚熟荔枝”实施农产品地理标志登记保护。

陆游现存诗文中共有三首提到了宁德荔枝。

其一，《青玉案·与朱景参会北岭》（《放翁词》），陆游仕宁德期间所作：

西风挟雨声翻浪。恰洗尽、黄茅瘴。老惯人间齐得丧。千岩高卧，五湖归棹，替却凌烟像。故人小驻平戎帐，白羽腰间气何壮。我老渔樵君将相。小槽红酒，晚香丹荔，记取蛮江上。

其二，陆游晚年梦忆故人，重提岫村折荔枝一事，作《予初仕为宁德县主簿，而朱孝闻景参作尉，情好甚笃，后十余年景参下世，今又几四十年，忽梦见之若平生，觉而感叹不已》（《诗稿》卷六十二）：

白鹤峰前试吏时，尉曹诗酒乐新知。

伤心忽入西窗梦，同在岫村折荔枝。

其三，开禧元年冬，陆游作组诗《道院杂兴四首》（《诗稿》卷六十五），其三曰：

早岁知闻久已空，岿然犹有灞城翁。

东楼谁记倾春碧，北岭空思擘晚红。

冉冉流年霜鬓外，累累荒冢绿芜中。

琳房何日金丹熟？老鹤犹堪万里风。

红酒醇厚，丹荔绵甜，陆游在宁德任上与友人闲啖荔枝，以此冲淡客居异乡之苦。韶光易逝，故交零落，诗人两次追念与故友共折荔枝的往事，抒发物是人非、有志无时之悲。陆游记忆中的荔枝与宁德、初仕生活、故友朱孝闻呈现强关联性。荔枝既是朱、陆友谊的重要载体，也是青春岁月、风华正茂的重要象征。诗人晚年忆想荔枝，实质上是在回念关于故地、故人的记忆，并借此消解内心之块垒。

海蛎也是陆游笔下的宁德物产。陆游仅写下一首关于宁德海蛎的诗，为晚年所作《绍兴中，予初仕为宁德主簿，与同官饮酒食蛎房甚乐，后五十年有饷此味者，感叹有赋，酒海者大劝杯容一升，当时所尚也》（《诗稿》卷六十四）：

昔仕闽江日，民淳簿领闲。

同寮飞酒海，小吏擘蚝山。

梦境悠然逝，羸躯独尔顽。

所嗟晨镜里，非复旧朱颜。

陆游回忆与友人共食海蛎的情形。“酒海”“蚝山”，所指意蕴丰富。一方面，“酒海”为容器，“大于酒碗而为饮器中尺寸之巨者……口径一般逾 20 厘米”^[10]；“蚝山”指牡蛎附着于岩石大量繁殖形成的牡蛎礁。另一方面，“海”“山”对举，酒深似海，蚝聚成山，想象奇特，奇中有味。“飞”“擘”二字极具张力，诗人与友饮酒食蛎，豪情英姿跃然纸上。后笔锋一转，颈联叹梦境远逝，尾联诉朱颜易老，今昔对比，更衬岁月蹉跎之悲。

记忆具有明显的对现实的指涉导向，对过去的回望实质上投射出当下的种种心迹。^[11]无论是荔枝还是海蛎，都只是陆游初仕生活的切片之一。陆游仕宁德，正值青壮年，主簿官职微小，仍可有所作为。五十年后，经历了宦海浮沉，罢官归乡的陆游无论是在生理年龄、心理年龄与政治年龄上都已经迈入“老年期”。逝者如斯，时期的转变带来心境的跃迁，陆游晚年借荔枝与海蛎追忆宁德初仕生活，也是在回望过去意气高昂、奋发踔厉的自己，抒发对过往生活的眷恋之情与报国无门的悲苦之感。

二、宁德市陆游旅游文化资源开发策略

文化与旅游融合，通过优势互补、功能重组和价值创新，可以形成涵盖文化和旅游产业核心价值的新价值链，将释放更强能量，取得“1+1>2”的产业叠加效应。^[12]文化和旅游行业以及国家文化旅游融合战略，不仅体现为经济效益，还体现为国家文化的建构价值。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为“象征意义体系”，对于集体成员而言，是浸润于“地点”上难以体察却客观存在的关于族群作为共同价值的本质。具有同质文化性质的文化旅游装置可以一再唤醒个

体意识上的自身文化身份的确认与强化。文旅融合的最终体现是召唤不同的人汇聚在某个文化地理空间,并于某种文化价值或者符号维系着特定的联系与交流,换言之,推动个体文化身份与族群文化共同体之间的同构。^[13]

打好文旅融合组合拳,迈向创新发展新时代。要进一步强化文化与旅游融合发展理念,持续推进建设多领域、深层次的文旅融合新局面。要实现文旅有机融合,就要实现组织结构、管理体制、发展规划和政策措施一体化,确保理念、载体、市场等方面共享融通,有效整合基础资源、生产要素、产业链各个环节,对齐颗粒度,打出组合拳。充分融合陆游在宁孕育的爱国文化、廉政文化与宁德旅游发展规划,充分满足人民群众旅游需求,在尊重历史实际、尊重文化发展规律的基础上,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全力打造具有中国特色、符合新时代要求的旅游产业体系。依托与陆游相关的历史文化资源,深入挖掘“陆游+”文化内涵,注重传统文化的时代化创新发展,结合现实旅游消费需求,融入现代价值观念与现代生产生活方式,打造陆游IP,在传统旅游环节“吃、住、行、游、购、娱”中融入文化元素,打造当代大众所喜爱的文旅产品;借助旅游产业载体保护、传承和传播特色文化,讲好陆游故事,丰富旅游内核。

(一) 保护、传承陆游文化遗存

全面研究陆游文化。设立宁德市陆游研究会或宁德市陆游文化研究会,聘请相关领域专家、学者为陆游研究顾问,持续发掘陆游在宁德孕育的廉政文化、知音文化等重要文化资源。定期主办陆游学术研讨会,积极与学术界专家沟通交流,提升宁德陆游研究的学术水平。组建文学、历史学、公共管理学、旅游管理学等跨领域专家团队,研究陆游文化对宁德经济、旅游、教育与文化事业的重要促进作用,协调保护文化遗存与经济发展,将陆游文化研究纳入宁德市长远发展规划,促进文化资源的可持续利用。

科技赋能,数字化保护护航文化传承。运用现代技术,对文化遗存进行数字化记录与保护。运用3D扫描技术,精确测量、记录陆游文化相关遗存,创建高精度三维模型。通过虚拟现实技术,创新化呈现陆游文化,让游客“穿越”到南宋与陆游对话,在虚拟环境中感受陆游文化的魅力。建立数字化档案库,整理、归档所有陆游文化相关文本资料、图形、音频、视频等数据,便于检索与使用。建设在线平台与数据库,向公众开放,促进陆游文化的传承与传播。

深入发掘相关文化资源,持续结合地方实际与旅游发展。以宁德城隍庙为例,应以陆游《宁德县重修城隍庙记》为关键点,创造性转化、创新化发展符合现代社会要求的城隍信俗,助推文旅融合“破圈”发展。陆游所记载的民间城隍信仰盛况不仅有助于现代观众“穿越”到宋朝,感受宋代宁德百姓对城隍的虔诚信仰、对美好生活的期盼,更能够带领观众发掘城隍信俗背后横亘古今的巨大文化力量。此外,陆游在宁德孕育的廉政文化兼具文化价值与当世指导意义,应与宁德城隍庙文化建设充分融合。以文强旅,以旅兴文,宁德市支提山华严寺既是佛门圣地,又是福建省著名旅游景点。除了华严寺佛教文化以外,还应充分挖掘陆游知音文化的文化价值、积极推进陆游知音文化与宁德支提山华严寺旅游有机融合,讲好“陆游”故事,丰富旅游内核。

(二) 完善陆游相关景点配套基础设施

以陆游名、字、号和官名、誉称如务观、放翁等命名宁德境内有名和重要的山水、街道、建筑物、公园、中小学、幼儿园等,如陆游大道、务观阁、放翁亭、陆游公园、陆游小学、陆游书院等;以陆游名句格言命名建筑物等,如正直亭、丹心台、躬行阁等。

以省、市、县三级廉政教育基地、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为目标建设陆游纪念馆,VR全景式呈现陆游生平,科技助力还原陆游宦游行迹;引进相关文物,展陈沙盘模型、陆游雕像,开展文化、文物旅游;设置沉浸式剧场,适应当代短视频平台、直播平台“快传播”的特点,戏剧化、影视化改编陆游的经典作品并定期组织演出,让游客身临其境地感受陆游的爱国情怀。

充分发掘、及时修复、科学保护与陆游有关的名胜古迹,如福温古道、支提寺、宁德城隍庙等,修旧如旧,并制作拓片,图片集,收入陆游纪念馆。在景区内放置陆游诗词创作石碑、陆游雕像等。

开发陆游文化主题公园,将陆游在宁德时所作诗文制成石碑,建造独立的陆游诗文碑林、碑廊。集中拓制陆游遗迹,打造陆游文化长廊。进一步保护、开发、修复或修建陆公祠、尊陆书院、务观阁、陆公井等名胜。

陆游相关旅游景区实现智能导游、电子讲解、实时信息推送全覆盖,开发建设宁德市全域旅游咨询、导览、导游、导购、导航和分享评价等智能化服务系统。

(三) 加强“陆游初仕之地”营销,打造陆游特色文化IP

加强“陆游初仕之地”营销,建立政府、行业、媒体、公众等共同参与的整体营销机制,整合宣传营销渠道,建立合作平台,形成上下结合、横向联动、多方参与的全域旅游营销格局。

加强传播能力建设,充分利用各种媒体,大力宣传陆游文化。利用广播电视、报刊传单、专栏条幅、路牌路标等,在高铁站、高速路段分界处挂上“陆游初仕之地——宁德欢迎您”等。在高速路入口、县城主要干道、文化广场等树立高大醒目的陆游雕像。在陆游相关景点放置卡通版陆游立牌。利用抖音、微信公众号、微信视频号、微博等社交媒体平台,制作短视频,以轻量化、大众化的方式,发布“陆游小百科”“陆游小故事”等陆游生平、作品、思想等相关内容。与社交媒体平台上的知名文化博主、旅行博主合作,邀请赴宁考察,请他们创作有关宁德陆游文化或宁德陆游之旅的文章或视频。主动与中央电视台,《典籍里的中国》《美美与共》等文化类综艺制作

团队接洽,以陆游文化为切入点,助力宁德走上央视。

全方位普及陆游文化。陆游文化进入乡土教育教材,增强中小学生的文化认同感与自豪感。市图书馆可多组织开展陆游研究学术讲座、陆游读书会与陆游文化展览等,市文化宫定期办公益文化沙龙与陆游文化知识讲座,努力做到人人知陆游、爱陆游、学陆游、研究陆游、宣传陆游。

全面提升传播效能,有效运用赛事营销、节庆营销、网络营销等手段,开展以陆游为主题的电影、电视、诗歌、音乐、绘画、舞蹈、戏剧、雕塑等创作比赛活动,举办相对固定的陆游文化节、陆游诗歌节、陆游主题书画展览等文化活动。积极参加国内外文化交流活动,包括文旅展会、文化节、论坛等,充分发挥历史文化名人效应,打造陆游IP,培育文化品牌,全面提升宁德文化品位和知名度、影响力。

打造陆游特色文化IP,推进文旅深度融合。设计“卡通陆游”,将陆游文化具体表现为文学家陆游、史学家陆游、军事家陆游、政治家陆游等,针对陆游不同身份分别设计不同卡通形象。将陆游卡通形象有机融入城市形象设计、景区景观设计、文创产品设计等重要策划中,具象化呈现陆游文化,实现文化和旅游的深度融合。

发挥IP引流作用,开发陆游IP文创产品,培育发展IP全产业链。与邮局合作,发行陆游与宁德纪念邮票和明信片。开发陆游文化纪念品,如书签、手绘地图、钥匙扣、挂件、签字笔、笔记本、随行杯、旅行袋、手提包等。与大型会议、文化精品路线等多项项目合作,将陆游原创文化产品作为会议用品或研学留念品。与宁德当地企业合作,联名发售陆游IP产品,如推出陆游IP联名奶茶、陆游IP联名文具、陆游IP联名文化衫等。

(四) 丰富陆游文化类旅游产品

推动宁德市文化旅游产业跨界融合,以“文化+”“旅游+”和“+旅游”“+文化”助推文化、旅游与相关产业的融合度,进而衍生新业态,拓宽产业面,拉长产业链,构建现代文旅产业体系,谋求多元化发展。

打造陆游文化精品旅游路线。多部门联动,组织宁德陆游文化旅行精品路线规划领导小组,学习“浙东唐诗之路”“朱子之路”成功经验,打造“陆游初仕之路”品牌,使之成为宁德特色旅游新业态。教育部门与文旅部门共同牵头,组织大学生、中小學生开展“陆游初仕之路”采风活动或夏令营活动。文化搭台,旅游唱戏,进一步优化宁德旅游产业布局,激活宁德旅游经济发展。

创新赋能,开发沉浸式、体验式旅游产品。在陆游文化主题公园,游客既可身着官服,振笔疾书,感受陆游一秉至公的气概;又可披挂戎装、手持兵器,体验陆游上阵杀敌的风范。打造“陆游聊天室”,聘请专业编剧制作台本,安排陆游知识储备丰富的舞台剧演员扮演陆游。“陆游”化身心灵导师,以个人经历开解、勉励观众,观众可以与“陆游”对话、共吟诗作,感受穿越千年的心灵共鸣。

结合宁德特色物产,因地制宜,推动产业发展。聚力转型,旺旅兴产,开发、利用宁德市陆游文化资源,探索宁德市文旅发展路径和有效模式,有效提升产业发展与文旅建设协同度,加速推进宁德市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陆游笔下的荔枝与海蛎皆具有丰富的文化意蕴,应充分开发利用。树品牌,促振兴,以产业升级与创新营销为引擎,推动海蛎、荔枝等产品品牌建设与产业高质量发展。以荔枝为例,结合现有霞浦荔枝品牌营销战略,优选良种荔枝,推出高端支线“晚香丹荔”,以陆游为视点搭建品牌故事,制定能体现产品稀缺性与独特性的价格策略,销售渠道可选择高端商超、线上旗舰店等。持续关注市场动态与消费者需求变化,不断创新产品生产、加强产品营销。拓宽霞浦销售渠道,线上直播平台、购物平台与线下商超多渠道共同发力;与喜茶、古茗等中高端奶茶品牌及鲜芋仙、好利来、达利园等零食品牌合作推出荔枝果茶、荔枝团子、荔枝牛奶芋圆冰、荔枝蛋糕等限定款产品;延长产业链,开发荔枝果酱、荔枝饼、荔枝糕、荔枝酥、荔枝酒、荔枝茶、荔枝牛奶、荔枝苏打水等多元化产品,助力产业转型。

开发利用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整理陆游在宁诗文,还原陆游在宁行迹,讲好与宁德有关的陆游故事。与国内知名主创团队合作,拍摄“陆游在宁德”宣传片,将陆游生平改编为线上短视频、电视剧、微电影,线下舞台剧、情景剧等多种形式,讲人民听得懂、听得进、喜欢听的陆游故事。

(五) 强化旅游人才保障与专业支持

加强旅游业从业人员培训,规范服务礼仪与服务流程。培养掌握陆游文化的旅游人才,加强旅游队伍建设,组织从业人员学习陆游文化,提高讲解词标准。设置考核制度,定期考核从业人员陆游文化熟悉程度与导游综合素质。组织导游陆游文化比武大赛,鼓励全域导游参与。强化在职人员培训,鼓励从业人员通过继续教育、挂职培训、长短期培训等方式拓宽知识储备、提升服务质量。

人才强旅、科教兴旅,深化校企合作,培养适应宁德市旅游发展要求的技术技能人才。在宁德师范学院、宁德职业技术学院等院校开设《陆游文化概论》《陆游诗文专题》等课程,持续推进旅游基础理论、应用研究和学科体系建设,优化旅游专业设置。通过与厦门大学、福州大学、福建师范大学等高校交流合作,定期邀请相关领域学者授课培训,提高从业人员的理论水平与服务能力。

人才是第一资源。制定相关人才政策,吸引各地文旅品牌建设人才、文旅发展人才、网络营销人才入宁,邀请各地旅游博主入宁游玩,鼓励宁德当地直播人才、网络红人参与宁德文旅宣传。推动高层次人才引进工作,在住房、职称、薪酬待遇等方面适当倾斜,鼓励高层次人才“回宁”“入宁”。

推动宁德市有关陆游研究单位、旅游科研单位、旅游规划单位与国土、交通、住建等相关规划研究机构服务全域旅游建设。强化全域旅游宣传教育,营造全社会支持旅游业发展的环境氛围。运用现代技术,增强科学技术对旅游产业发展的支撑作用,加快推进旅游业现代化、信息化建设。

陆游是伟大的爱国诗人,是宁德市最具魅力的文化符号和文化品牌之一。宁德市陆游文化资源丰富,如陆游

廉政文化、宁德城隍庙城隍信俗、支提山佛禅文化等,应充分开发、有效利用。文旅融合发展既能促进经济发展,又具有重要的文化价值,陆游文化应成为宁德市文旅融合发展的新增长点。以文强旅、以旅兴文,积极推进陆游文化与宁德旅游有机融合,讲好陆游故事,丰富旅游内核。打好文旅融合组合拳,谱写时代发展新篇章。要持续保护、传承陆游文化遗存,积极完善陆游相关景点配套基础设施,深度加强“陆游初仕之地”营销,合力打造陆游特色文化IP,不断丰富陆游文化类旅游产品,全面强化旅游人才保障与专业支持;持续推进建设更多领域、更深层次的文旅融合新局面。

参考文献:

- [1] 刘治彦.文旅融合发展:理论、实践与未来方向[J].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19,(16):92-97; 李任.深度融合与协同发展:文旅融合的理论逻辑与实践路径[J].理论月刊,2022,(01):88-96; 钟华美.文旅融合背景下乡村旅游产业融合发展理论分析[J].资源开发与市场,2020,36(04):421-426 等都有涉及,兹不一一列举。
- [2] 《中国地方志集成》编委会.乾隆福宁府志[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317.
- [3] 钱仲联,马亚中.陆游全集校注[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6:195.以下所引陆游诗词文,皆据此书,仅括注篇名及卷数,注释从略。
- [4] 何孝荣.论孝定李太后崇佛与晚明佛教复兴——以福建宁德支提寺为例的考察[J].安徽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1,49(03):40-49.
- [5] 高秀军.宝顶山石刻佛饰“毫光”意涵探析[J].敦煌学辑刊,2015,1(02):115-128.
- [6] 参见莫砺锋.陆游与陶诗的离合[J].学术月刊,2021,53(05):146-153.
- [7] 参见李小荣.陆游诗歌“化身梅”范式的建立及后世影响[J].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63(06):37-46.《中国地方志集成》编委会.乾隆福宁府志[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317.
- [8] 北京大学古文献研究所编.全宋诗.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18890.
- [9] 参见欧明俊.陆游集(节选).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 2022:7; 朱子良.禅思与诗法——论陆游自嘲诗的禅宗渊源[J].中国韵文学刊,2022,36(03):29-36; 李小荣.陆游诗歌“化身梅”范式的建立及后世影响[J].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63(06):37-46.
- [10] 扬之水.广元旺苍唐代银器窖藏知见录[J].形象史学,2021,(03):191-202.
- [11] 参见扬·阿斯曼,陈国战.什么是“文化记忆”?[J].国外理论动态,2016,(06):18-26; 金寿福.扬·阿斯曼的文化记忆理论[J].外国语文,2017,33(02):36-40.
- [12] 黄永林.文旅融合发展的文化阐释与旅游实践[J].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19,(11):16-23.
- [13] 傅才武.论文化和旅游融合的内在逻辑[J].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73(02):89-100.

A Research on the Development Strategies of Lu You Cultural and Tourism

Resources of the Ningde region in the Context of Culture-Tourism Integration

Lin Liqian¹

¹ Affiliation, Fujian Normal University, Fuzhou, China

Abstract: Lu You is one of the most culturally significant historical figures in Ningde region and also one of the most valuable and influential cultural symbols and cultural brands. Ningde region is abundant in Lu You-related cultural resources, such as the integrity culture of Lu You, the Faith in Town Gods of Ningde region, and the Buddhist culture of Zhiti Mountain. To enhance tourism through culture and invigorate culture through tourism, tell the stories of Lu You well and enrich the core of tourism. Comprehensive efforts should be made to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Lu You cultural and tourism resources in Ningde region through strategic measures such as protecting and upgrading cultural relics, improving supporting infrastructure, creating distinctive cultural IPs, and enriching cultural and tourism products.

Keywords: Lu You; Ningde region; Culture-Tourism Integration

基于大语言模型和 RAG 的舆情知识交互及推荐研究

马钰¹, 任世明¹

(1. 郑州升达经贸管理学院 信息工程学院 河南郑州 451191)

摘要: 随着社交媒体与网络舆论变革, 海量舆情信息呈碎片化、实时化及多源异构化等特点, 对公共决策及社会稳定具有重大影响。本文基于大语言模型与检索增强生成 (RAG) 技术, 设计并实现舆情知识交互系统。系统构建领域知识库, 利用 RAG 高效检索文档片段, 并将检索结果与用户提问输入 LLM, 生成准确而丰富的舆情解读; 同时嵌入推荐子模块, 依托提问语境主动拓展相关话题, 提升回答的启发性与可读性。本系统为构建高效可交互的舆情知识服务平台提供了新技术路径, 并为公共管理与舆情治理领域的信息服务提供了有力支持。

关键词: 大语言模型; RAG; 舆情知识交互

基金项目: 郑州升达经贸管理学院 2025 年度立项课题: 融合协同过滤与大语言模型的智能推荐系统研究 (编号: SD-YB2025018)。

DOI: doi.org/10.70693/rwsk.v1i5.1027

一、引言

(一) 研究背景

近年来, 社交媒体与网络舆论环境发生了深刻变革, 传统信息传播方式逐渐被微博、微信、短视频等多层次、多渠道的碎片化信息所取代。与此同时, 舆情信息具有实时化特征, 短时间内海量数据涌现且来源多元, 涵盖新闻报道、公众评论、问答互动等异构内容。这些数据既蕴含丰富舆情动向, 又存在噪声信息与冗余信息并存的挑战, 使得精准、高效地获取关键信息成为急需突破的难题。因此, 亟需构建一套能够支持多层次、多维度深度查询与交互分析的舆情知识服务平台。

近年来, 大语言模型凭借其强大的语义理解能力, 为自然语言处理领域带来突破性进展。然而, 其在知识时效性、领域适配性等方面仍存在瓶颈。检索增强生成 (RAG) 技术可在模型内部融入外部知识库, 为解决上述问题提供了新思路。基于此, 本系统引入大语言模型 (LLMs) 与检索增强生成 (RAG) 技术, 旨在突破传统关键词检索与模板式问答的局限, 为舆情知识获取、交互及推荐提供一种更具智能化、可拓展性的技术路径。

(二) 研究意义

本研究在理论层面丰富了舆情知识服务体系的技术视角, 将大语言模型与 RAG 检索机制有机结合, 为舆情信息处理提供了一种全新的范式。该范式既能发挥检索模块对异构文档的高效定位能力, 也能借助大语言模型在自然语言理解与生成上的优势, 实现精确且富有深度的舆情知识解读。此外, 研究中嵌入的推荐子模块, 可根据用户提问语境主动延展相关话题, 提升系统响应的启发性与可读性, 推动从单一问答向智能化交互式知识服务的转变。

在实践层面, 所提出的舆情知识交互系统可为相关企业或部门辅助决策支持, 为公共管理、媒体传播、社会治理等领域提供高效、智能的信息服务解决方案, 具有较高的应用价值与推广前景。

二、文献综述

知识交互问答系统旨在实现用户与系统之间的动态对话与内容探索。传统的问答系统多基于静态关键词检索

作者简介: 马钰 (1997—), 男, 河南郑州人, 郑州升达经贸管理学院助教, 硕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 自然语言处理、舆情分析。

任世明 (2003—), 男, 河南商丘人, 郑州升达经贸管理学院本科生。

和预设模板,缺乏深度交互与智能引导。近年来,基于大模型技术的智能问答逐渐成为研究热点,大语言模型是一种基于深度学习技术的自然语言处理模型,拥有数十亿甚至上千亿个参数,不仅能够理解和生成自然语言,还能显著提升问答系统的准确性和效率^[1]。借助 LLM 技术,研究者提出了多种问答交互策略:一是基于提示学习的问答系统,如方全等人为提升知识问答系统的性能,提出了一种新的基于组合上下文提示的大型语言模型领域知识问答方法^[2];二是基于知识图谱的问答系统,如李锦等人为解决在陶瓷收藏及鉴赏领域研究人员获取相关知识时面临知识匮乏和知识难有效统一表达的问题,开发了融合前沿技术的五七瓷知识图谱问答系统^[3];三是基于检索增强生成的问答系统,如杨诗卓等人融合 RAG 检索增强与 LoRA 微调等技术,设计了一种基于 Qwen 2.5 大语言模型的智能医疗问答系统^[4];四是基于特定领域知识库的问答系统,如李明等人构建了中医古籍方剂数据挖掘与知识问答系统^[5],黄冰等人构建了古生物学领域中知识问答系统^[6]。

本文针对舆情领域大语言模型知识更新滞后、领域适配性不足及个性化推荐服务能力受限的瓶颈问题,设计了一种基于 RagFlow 的舆情信息智能问答系统。通过大语言模型、RAG 检索增强算法、构建舆情领域专用问答数据集等方法,实现动态知识融合与轻量化领域适配的协同优化,使用户能够通过自然语言询问舆情事件相关信息,如事件背景、演变路径和关联主体等。

三、相关技术研究

(一) 大语言模型

基于 Transformer 架构的大语言模型 (Large Language Model, LLM) 是通过海量文本数据进行无监督预训练,以学习语言的统计规律和语义表示的人工智能模型^[7]。在预训练阶段,模型使用自回归或自编码目标,例如 GPT 系列采用下一词预测任务,BERT 系列采用掩码语言模型任务,通过多层自注意力机制捕捉长程依赖。随后,使用者可通过微调 (fine-tuning)、提示工程 (prompt engineering) 或少样本学习 (few-shot learning) 等技术,将通用语言知识迁移到特定任务,如文本分类、问答生成、摘要撰写和机器翻译等。得益于模型规模和数据量的持续增长,LLM 展现了强大的自然语言理解与生成能力,并在零样本或少样本场景中表现出色。

(二) 检索增强生成技术

检索增强生成 (Retrieval-Augmented Generation, RAG) 是一种将大规模文本检索与生成模型结合的混合框架,旨在提升生成结果的准确性和知识覆盖度。RAG 主要由两部分组成:一是检索模块 (Retriever),通常基于倒排索引或向量检索,从预先构建的文档库中选取与查询最相关的若干文本片段;二是生成模块 (Generator),将检索到的上下文与原始输入一起作为条件,通过大型生成模型 (如 GPT) 进行回答或文本生成^[8]。相比于纯生成式模型,RAG 能够借助外部知识库补充最新信息,显著提升事实性和一致性。

四、基于大语言模型和 RAG 的舆情知识交互及推荐系统方法研究

(一) 系统总体架构介绍

本研究提出了一种基于 RAGFlow 引擎的舆情解读与推荐系统,旨在实现对海量、多源舆情信息的高效检索、准确解读及主动推荐。系统整体架构可划分为四个核心模块:数据层、检索增强层、推理层和推荐层。

数据层通过定期抓取文献库、社交平台、新闻网站和论坛等渠道文本,并进行清洗、分词、去重和标准化,存储于向量化数据库中;检索增强层利用 RAGFlow 引擎构建向量查询,召回相似度最高的文档片段,并结合 TF-IDF 与余弦相似度进行二次排序与去冗余,最终将精炼片段与用户提问拼接为推理输入;推理层通过 API 调用大语言模型 (如 DeepSeek 等),基于结构化 Prompt 生成要点概括、趋势研判与风险评估,并对输出结果进行格式校验与术语规范化;推荐层通过意图识别和对话上下文分析,调用检索增强流程获取相关背景资料或典型案例,结合话题相关性和启发价值生成推荐项,以列表形式呈现。各模块协同构成从数据摄取到智能输出的闭环流程,为舆情监测与决策提供了高效、可靠且可扩展的技术方案。

(二) 舆情知识交互系统构建及系统处理流程

在本系统中,当用户发出舆情咨询请求后,首先将用户的自然语言提问传入 RAGFlow 引擎。RAGFlow 根据预先构建的多源舆情知识库 (包含舆情文献、网络舆情文本、专家报告等异构数据),通过 RAGFlow 引擎结合 BM25 与向量检索快速定位相关文档片段;这些片段即以“知识提示” (Knowledge Prompt) 的形式,与用户原始问题一并送入大语言模型 (如 DeepSeek) 的接口。模型在接收到用户问题与检索到的高置信度片段后,首先对信息进行融合与语义对齐,生成准确且富有深度的舆情解读;与此同时,系统内嵌的推荐子模块会基于当前对话上下文主动识别潜在相关话题,补充提示或衍生问题,从而引导模型输出更多启发性见解。最终,用户将获

严谨又可读性强的舆情分析答复，整个流程实现了“用户询问→RAG 检索→LLM 生成→推荐扩展→结果呈现”的闭环交互。系统处理流程图如图 1 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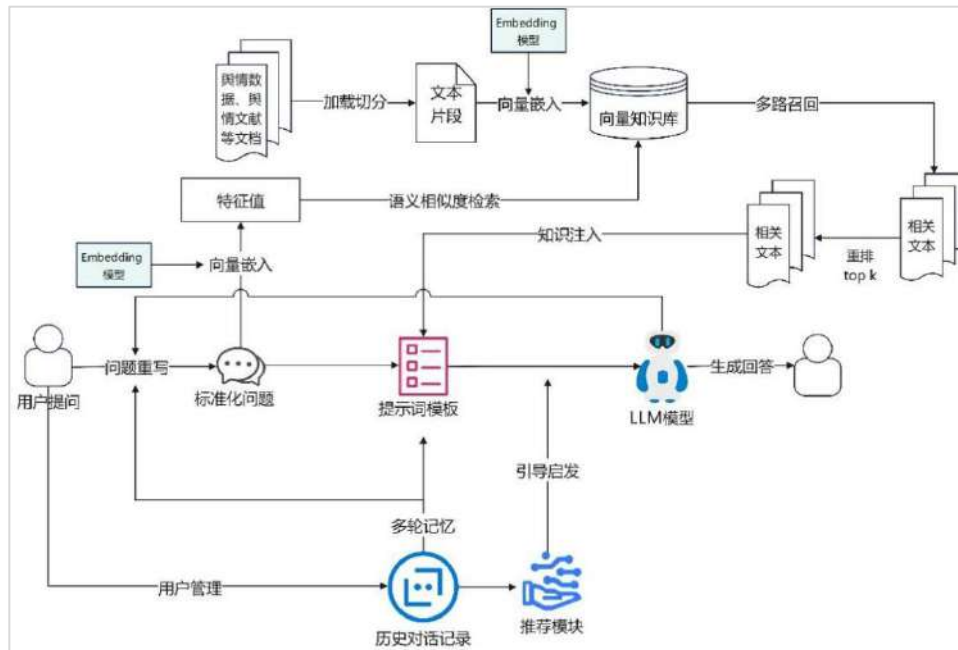


图 1 舆情知识交互系统处理流程图

五、实证分析

为验证所设计的舆情知识交互与推荐系统的实用性，本文组织了多轮模拟问答与真实用户评估。本系统在构建的舆情知识库的基础上，调用 DeepSeek-R1 大模型进行实例测试。测试结果表明，本系统平均响应时长仅为 1~2 秒，远超传统人工舆情分析（通常需 30 秒~1 分钟），显著减少了用户等待时间；在处理常见舆情概念和热点事件细节时，能够从知识库中提供既准确又深入的解读，并基于上下文主动补充背景资料。推荐子模块在用户提问后，会自动拓展相关话题，例如，当用户询问“舆情是什么？”时，系统不仅阐述了舆情的定义，还阐述了舆情的演化过程及舆情的复杂性，如图 2 所示。此外，在面向实际业务人员的盲测反馈中，87%的参与者认可系统生成内容的深度与可读性，83%的参与者表示推荐话题切中需求并具有启发性。总体来看，该舆情知识交互及推荐系统在系统性能、解读深度和用户体验三方面均表现出色，显著提升了舆情分析效率与决策支持能力，更能满足用户在实时舆情监测与分析中的多样化需求。



图 2 舆情知识交互系统交互界面

六、结语

本文基于大语言模型与检索增强生成 (RAG) 技术, 构建了一个集知识交互与话题推荐于一体的舆情分析系统。系统通过领域知识库的构建与高效检索, 能够在用户提出问题时快速筛选出相关文档片段, 并结合大语言模型生成具有深度解读价值的舆情分析; 同时, 推荐模块依托提问语境主动拓展关联话题, 提升了回答的启发性与可读性。实验结果表明, 该系统在回答准确性和用户满意度方面均优于传统单一生成或检索方法。未来研究可进一步丰富知识库的多模态信息源, 探索更高效的检索策略, 以及引入用户反馈机制以实现个性化优化, 从而构建更智能、更贴合实际需求的舆情交互与推荐平台。

参考文献:

- [1] 任海玉, 刘建平, 王健, 等. 基于大语言模型的智能问答系统研究综述[J]. 计算机工程与应用, 2025, 61(07): 1-24.
- [2] 方全, 张金龙, 王冰倩, 等. 基于组合上下文提示的大型语言模型领域知识问答研究[J/OL]. 计算机科学, 1-13.
- [3] 李锦, 刘陶, 邱望仁. 融合前沿技术的五六七瓷知识图谱问答系统创新开发[J/OL]. 计算机应用与软件, 1-8.
- [4] 杨诗卓, 周燕玲, 解翔杰. 融合 RAG 检索增强与 LoRA 微调的医疗问答系统优化研究[J/OL]. 江西科学, 1-8.
- [5] 李明, 罗晓兰, 朱邦贤. 中医古籍方剂数据挖掘与知识问答系统构建[J]. 图书馆论坛, 2025, 45(04): 49-59.
- [6] 黄冰. 大语言模型在古生物学中的应用初探——以基于 RAG 的知识问答系统为例[J]. 古生物学报, 2025, 64(01): 100-112.
- [7] 赵正平. 人工智能大语言模型和 AI 芯片的新进展[J]. 微纳电子技术, 2025, 62(03): 7-37.
- [8] 刘雪颖, 云静, 李博, 等. 基于大型语言模型的检索增强生成综述[J/OL]. 计算机工程与应用, 1-31.

Research on Interactive Public Sentiment Knowledge and Recommendation Based on Large Language Models and RAG

Yu Ma¹, Shiming Ren¹

¹*School of Information Engineering, Zhengzhou Shengda University, Zhengzhou, Henan 451191, China*

Abstract: With the advent of social media and shifts in online public opinion, massive volumes of sentiment information have become fragmented, real-time, and multi-source heterogeneous, exerting profound effects on public decision-making, corporate reputation, and social stability. This paper, leveraging large language models and retrieval-augmented generation (RAG) techniques, designs and implements an interactive knowledge system for public sentiment. The system constructs a domain-specific knowledge base, efficiently retrieves document snippets via RAG, and feeds both retrieved results and user queries into an LLM to produce accurate and comprehensive sentiment analyses. At the same time, it embeds a recommendation submodule that proactively expands related topics based on the query context, thereby enhancing the insightfulness and readability of the responses. The proposed system offers a novel technical approach for building an efficient, interactive platform for sentiment knowledge services and provides robust support for information services in the fields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and opinion governance.

Key Words: Large Language Model; RAG; Interactive Public Opinion Knowledge

“人工智能+”驱动的计算机专业创新型人才培养模式研究

王天顺¹马钰¹付丽方¹李坤²

(1.郑州升达经贸管理学院 信息工程学院 河南郑州 451191; 2.郑州电力高等专科学校 电气工程学院 河南郑州 451191)

摘要:在“人工智能+”赋能教育的时代背景下,计算机专业创新型人才培养急需突破传统教育理念束缚,重新构建教育生态系统,培养满足企业需求的计算机专业创新型人才培养。本文首先收集了影响计算机专业创新型人才培养的各种现象,然后聚焦人工智能与计算机科学的深度融合,分析造成这些现象的原因,最后,构建“以赛促创”的生态化培养机制。通过学科竞赛的“问题导向-过程迭代-成果转化”三维驱动,全力挖掘学生的创新潜能,最大程度激发其创新热情,深度强化大学生的实践操作能力,致力于培育兼具创新思维的高素质创新型计算机专业人才,以满足软件行业对计算机专业创新型人才的迫切需求。

关键词:人工智能+; 计算机专业; 创新型人才培养

基金项目:郑州升达经贸管理学院 2025 年度立项课题:“人工智能+”驱动的计算机专业创新型人才培养模式研究(编号:SD-YB2025034)。

DOI: doi.org/10.70693/rwsk.v1i5.1020

一、引言

(一) 研究背景

近年来,人工智能技术的飞速发展,高校人才培养的模式带来了巨大的影响,尤其是对传统的计算机专业的教育体系带来巨大的冲击^[1]。传统的计算机教育体系的弊端日益凸显,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第一、传统课程架构偏重基础理论教学,学生虽然掌握了一定的理论基础,但是实际的动手能力较差,从而所学理论知识的具体应用受到了限制;第二、实训环节多停留于模块化、碎片化的案例操作,学生仅能完成局部技术的操作,难以从全局视角把握真实场景,进而无法满足系统性技术解决方案的要求;第三、跨领域协同培养机制欠缺,直接制约学生适应“技术赋能型”复合岗位的核心竞争力的发展。

(二) 理论基础

中国政府高度重视人工智能的发展,在《中国教育现代化 2035》等政策文件的战略指引下,以智能技术为驱动力,赋能人工智能与教育的深度融合,已然成为我国教育领域推进改革创新、实现高质量发展的核心方向^[2]。同时,教育部高等教育司 2024 年 11 月 14 日组织开展了第二批“人工智能+高等教育”应用场景典型案例的征集、论证与推荐工作。各高校加强研究交流,结合实际进一步深化“人工智能+高等教育”的探索和实践,在人工智能技术的辅助下优化教学模式、创新人才培养、提升教育治理效能,在更广的范围内推动人工智能赋能教育教学的创新发展^[3]。以上内容为该课题提供了有力的理论研究基础。

(三) 研究目标

作者简介:王天顺(1980—),男,河南郑州人,郑州升达经贸管理学院副教授,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人工智能、机器视觉。
马钰(1997—),男,河南郑州人,郑州升达经贸管理学院助教,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自然语言处理、舆情分析。
付丽方(1981—),女,河南郑州人,郑州升达经贸管理学院讲师,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人工智能、软件测试。
李坤(2005—),男,河南郑州人,郑州电力高等专科学校,在校学生,研究方向:电气工程。

该论文旨通过分析人工智能对教育的影响,通过相关的教学改革措施,提升学生的创新思维 and 创新能力,提升计算机专业的创新型人才培养,满足行业对计算机专业创新型人才培养的需求。

二、计算机专业创新型人才培养的现状分析

随着人工智能、大数据、边缘计算、物联网等技术的飞速发展,计算机专业的相关课程的发展和迭代的速度也非常快^[4]。但是,目前还有部分高校的计算机专业人才培养方案、课程设置的内容偏于陈旧,致使毕业生知识技能与市场需求脱节,就业竞争力不足且难以快速适应企业实际工作需求。

(一) 人才培养方案陈旧、无法满足用人单位需求

在已有课程的设置上,基础理论课程占比过高,像人工智能、大数据分析等前沿课程课时安排不足。且部分理论课程内容陈旧,无法及时满足行业最新的发展动态和技术趋势,导致培养出来的毕业生无法满足用人单位的实际需求^[5]。

部分课程的实践教学环节设置相对薄弱,缺乏综合性、创新性的实践内容,无法体现当前人工智能在教学实践中的优势。因此学生难以将理论知识应用于实际场景,动手能力和解决复杂问题的能力与用人单位要求相脱节^[6]。

(二) 课程内容陈旧,与实际企业需求脱轨

人工智能技术发展迅速,但是课程内容更新速度缓慢,例如《面向对象编程技术》缺乏当前最新的低代码框架的融入;另外,在数据结构和算法方面,缺乏实际业务的应用场景,对具体的复杂问题分析不够全面,导致学生很难将所学的理论知识应用到实际工作中。

陈旧的教学内容,使得学生在毕业后进入企业时面临巨大挑战。企业注重的是员工能否快速上手项目,解决实际问题,而学生在学校学到的知识与企业实际需求存在明显差距。这种现象持续下去,不仅学生就业受到影响,高校计算机专业的教学质量也会受到质疑^[7]。

(三) 计算机专业师资构成不科学,学生创新意识不足

有部分高校计算机专业,存在这有师资力量薄弱,师资结构不均衡、年龄层次结构失衡的现象,尤其是在人工智能及新兴学科方向,缺乏具备深厚教学经验、前沿知识以及创新教学理念的资深教师。在当前计算机专业的教学过程中,部分高校仍然以教师讲授知识为主,忽视了学生的主体性和创造性,培养的学生创新意识不足,不具有创新能力,造成社会上创新型人才的短缺,形成了创新发展的瓶颈^[7]。

(四) 高校和企业产学研合作深度不足

目前部分高校计算机专业和企业的产业学院合作的内容仅停留在表面,如简单的实习实训、共建课程或者是计算机专业理论知识的应用。校企之间缺乏深层次的融合,缺乏创新人才培养的探讨。

三、计算机专业创新型人才培养的 implements

(一) 调整计算机专业人才培养方案

高校应积极调研用人单位对计算机专业的需求,及时调整人才培养方案,增加前沿技术课程和实践教学比重,强化学生创新能力和实践技能培养,明确人才培养目标定位,构建与用人单位需求紧密对接的课程体系和实践教学体系,为社会输送更多适应时代发展的计算机专业人才^[8]。

(二) 教育思想的转变

高校教师应该积极推动教育教学理念的转型,优化系统化的教学实施方法。围绕“人工智能+教育”的核心思想对计算机专业课程进行改革创新,以适应新时代人才培养的需求。例如,在《面向对象程序设计》等编程课程中,教师不再单纯地讲解相关的语法,而是设计一个人工智能应用的典型场景,让学生带着问题去探索去学习相

关的编程技术,激发学生的学习的主动性和创造性^[9]。

另外在对学生进行考核时,不仅要体现出来学生对理论知识的掌握程度,同时还要对创新思维和创新能力进行考核。比如在进行实践环节的时候,可以让学生结合人工智能技术,例如数据分析技术,对现有的数据进行分析,并能够根据相关的数据借助于人工智能技术进行一系列的智能问答。

(三) 课程体系的优化

根据课程的进度安排及时将人工智能等新的技术融入到课程体系中,确保学生能够与行业最新的技术同步发展。例如,在算法设计课程中可以适量增加人工智能算法的原理与实践,在项目开发实践中,增加大数据分析模块等。

打破传统的学科界限,开设跨学科的课程,组织一系列的课程群,培养学生的综合素养和创新能力,拓宽学生的知识面和视野。例如:软件项目开发综合实验、面向对象开发技术、移动智能终端开发、软件测试以及软件项目管理等,这几个课程可以建立一个课程群,从而提升学生的创新能力和综合解决问题的能力。

不断开设新的前沿课程,如:人工智能通识课,同时以项目为导向,让学生在实践中锻炼创新思维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10]。

(四) 教学方法的改进

不断推出项目式教学,通过实际的教学项目,学生能够在完成项目的过程中,学习新的知识和技能,同时培养学生的项目管理能力和团队写作能力。例如,安排学生参与房源管理系统的设计与实现,通过真实的项目提升了学生的前后端以及数据库操作的能力。引入行业和企业的最新案例和实际案例,对案例进行讨论和分析,引导学生运用所学的知识解决实际的问题,提升学生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采用混合式教学模式,利用超星、优慕课等在线教学平台提供的教学资源,如分组讨论、在线测试、生生互评、问卷调查等,让学生随时随地进行预习和复习。因此,在线下授课过程中,任课教师只需要进行答疑解惑、重难点的讲解和实践指导等内容,提升了教学质量。

(五) 新的教学实践平台的搭建

配备先进的教学软件和实验室设备,为学生提供良好的实践环境。例如:建立大数据实验室、人工智能实验室、软件测试实验室、移动终端开发实验室等,让学生在专业实验室中进行相关操作、项目开发和实践创新。

同时,高校要与企业建立长期稳定的合作管理,建立校外大学生实习基地,为学生提供实训环境和机会,让学生在实际的工作中积累经验,提高就业的竞争力。

最后,高校还可以鼓励学生参加各种学科类竞赛活动,例如挑战杯、蓝桥杯、ACM、大学生软件设计打下等,激发同学们的创新意识和学习热情。

(六) 加强高校的师资队伍建设

高校应该积极引进具有丰富企业经验和创新能力的高层次人才,充实教师队伍,将企业和行业最新的技术带入课堂,完善高校的教学内容。同时,定期组织教师参加各种学术会议和企业挂职锻炼,提高教师的教学能力和学术水平,促进产学研的深度融合。

四、下一步工作思路

下一步将进一步挖掘人工智能与计算机专业课程的结合点,系统梳理教学内容,优化课程设置,使人工智能更深入、全面的融入计算机专业。并且构建以创新能力、实践能力和跨学科知识运用能力为核心的评价体系,公正、全面、客观地评价学生学习效果,为社会和企业源源不断地输送合格的计算机专业相关人才。

五、结束语

在科技飞速发展、人工智能浪潮席卷全球的时代背景下,“人工智能+”驱动的计算机专业创新型人才培养模

式研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与深远影响。本研究通过分析现状、挖掘问题、探索路径,为计算机专业人才培养提供了新的思路与方法。但是,人才培养是一个长期且复杂的系统工程,本研究只是初步探索。未来,将持续关注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动态,不断调整和完善人才培养模式。加强与企业的深度合作,实现产学研用充分融合,确保计算机专业人才培养与社会需求密切对接,为国家的数字化转型与智能化升级提供坚实的人才支撑。

参考文献:

- [1] 丁雯,朱依滢,朱斐,等.创新型人才成长关键驱动因素研究及政策优化[J/OL].重庆医学,1-8[2025-05-14].
- [2] 彭瑞萍.“岗课赛创”动态协同下创新型人才培养体系研究[J].卫生职业教育,2025,43(10):19-22.
- [3] 刘衡,赖泳,周萍,等.地方高校创新型人才培养模式的探索与实践[J].大理大学学报,2025,10(04):27-32.
- [4] 高明明,边廷玥,南敬昌,等.基于应用创新型人才培养的电子信息类专业实践教学探索[J].西部素质教育,2025,11(07):174-177.
- [5] 任萍萍.AIGC 技术驱动下的知识服务新质生产力变革与双向赋能机制研究[J/OL].图书馆,1-6[2025-05-14].
- [6] 肖福赞.人工智能驱动高校思政课教学改革的内在机理、风险挑战与应对之策[J/OL].电化教育研究,2025,(05):103-107+115[2025-05-14].
- [7] 谢卫红.人工智能驱动下数学教学的创新与实践[J].四川教育,2025,(12):36-37.
- [8] Shi Da. Transforma-tion of tourism management education driven by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Challenges and development paths[J]. SocialScientist, 2025(1): 55-61.
- [9] 赵福君,代洋磊.人工智能赋能教育 4.0 的挑战与机遇——《塑造未来学习:人工智能在教育 4.0 中的作用》解读[J].中国教育信息化,2025,31(03):96-106.
- [10] 王磊,徐子竞,朱戈,等.生成式人工智能赋能网络安全人才培养的探索研究[J].中国电化教育,2023,(09):101-108+116.

Research on the Training Mode of Innovative Computer Science Talents Driven by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ianShun Wang¹, Yu Ma¹, Lifang Fu¹, Kun Li²

¹*School of Information Engineering, Zhengzhou Shengda University, Zhengzhou, Henan 451191, China*

²*School of Electrical Engineering, Zhengzhou Electric Power College, Zhengzhou, Henan 451191, China*

Abstract: In the era of "AI+" empowering education, the cultivation of innovative talents in computer majors urgently needs to break through the constraints of traditional educational concepts, rebuild the educational ecosystem, and cultivate innovative talents in computer majors that meet the needs of enterprises. This paper first collects various phenomena that affect the cultivation of innovative talents in computer majors, then focuses on the deep integration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d computer science, analyzes the causes of these phenomena, and finally constructs an ecological cultivation mechanism of "promoting innovation through competition". Through the three-dimensional drive of "problem orientation-process iteration-results transformation" of subject competitions, we will fully tap the students' innovative potential, maximize their enthusiasm for innovation, deeply strengthen college students' practical operation capabilities, and strive to cultivate high-quality innovative computer professionals with innovative thinking to meet the urgent needs of the software industry for innovative talents in computer majors.

Key Words: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Computer Science major; cultivation of innovative talents

红色文化融入大学生理想信念教育的路径探析

张雅平¹

(1.山东财经大学, 山东 济南 250014)

摘要:大学生作为未来国家发展的中坚力量,其理想信念的坚定程度不仅关系到自身成长成才,更对党和国家事业的薪火相传具有深远影响。将红色文化有机融入大学生理想信念教育体系,对于筑牢理想信念的基石、充实教育内容、创新教育形式具有重要意义。在新时代背景下,加强大学生理想信念教育这一关键任务,迫切要求我们深度挖掘并有效发挥红色文化资源所蕴含的独特育人价值,以此推动教育实效性的显著提升,促进红色文化与理想信念教育的深度融合,从而为培育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筑牢思想根基。

关键词:大学生; 理想信念; 教育; 红色文化

DOI: doi.org/10.70693/rwsk.v1i5.1025

红色文化是中国人民在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中形成的,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实践深度融合的产物,是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最宝贵的精神财富和最独特的育人资源。它既继承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又吸收了人类文明的优秀成果,蕴含着丰富的革命精神与深厚的文化底蕴。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高度重视红色文化的精神传播。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弘扬以伟大建党精神为源头的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用好红色资源,深入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宣传教育,深化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教育。”^[1]把红色文化深度嵌入新时代大学生理想信念教育体系,积极探索理想信念教育的实践育人新模式,不仅能够有力地强化大学生对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执着追求,还能大学生理想信念教育在新时代的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与活力。此外,这也是新时代高校践行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内在要求与重要体现。

一、红色文化融入大学生理想信念教育的价值意蕴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要传承红色文化,赓续红色血脉。”并一再强调“共和国是红色的,不能淡化这个颜色”。^[2]大学生作为党和国家事业的接班人,是新时代的中流砥柱。因此,必须从红色文化中汲取养分,这一要求为高校在新时代传承红色基因、弘扬党的光荣传统指明了方向,具有深远的时代价值。

(一) 筑牢理想信念文化根基

马克思指出:“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继承下来的条件下创造。”^[3]所以说,红色文化绝不是空中楼阁,它根植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吸收和借鉴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及革命文化的优秀成果,是在特殊社会历史条件下孕育的。

在近代中国革命的历史长河中,无论是井冈山的烽火岁月、瑞金中央苏区的艰苦探索,还是延安时期的伟大实践,我们党始终秉持“人民至上”的理念,与人民群众携手并肩,共同奋斗。诸如“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人民至上”等理念,深深植根于中华文化的广袤沃土之中,它们不仅极大地拓展了红色文化的内涵,更化作激励一代代青年勇担时代重任、不懈奋斗的强大精神引擎。红色文化,作为中国革命历程中孕育出的璀璨瑰宝,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中华民族实现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伟大飞跃的精神支柱与不绝动力。以红色文化滋养心灵、培育新人,不仅能为青年学生提供坚定理想信念的深厚力量源泉,筑牢“四个自信”的坚实思想根基,还能使大学生深刻感悟传统文化的独特韵味,进一步增强对中华民族的认同感与归属感。

作者简介:张雅平,(1995—),硕士研究生在读,思想政治教育方向。

（二）树立正确理想信念价值导向

理想信念对国家和民族的繁荣发展以及大学生的全面发展具有至关重要的引领作用，是新时代育人理念中不可或缺的核心内容。红色文化凝聚了革命先辈们在为民族解放和国家富强不懈奋斗的历程中所铸就的光荣传统、优良作风以及宝贵历史经验。它生动展现了先辈们将理想信念与现实国情有机结合的理论智慧，成为新时代奋进路上一座熠熠生辉的精神丰碑。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坚定理想信念，坚守共产党人精神追求，始终是共产党人安身立命的根本。”^[4]党的百年奋斗历程深刻印证，理想信念作为我们党永葆先进性与纯洁性的核心驱动力，亦是我们在应对各类艰难挑战时的精神支柱，与红色文化所承载的政治意蕴与价值导向高度相融。当前，全球正经历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际局势风起云涌，新发展阶段面临诸多挑战。中华民族在迈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征程中，正经历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而大学生群体作为党和国家事业的建设者和继承者，承载着祖国和人民寄予的厚望与重任。在此背景下，如何引领青年一代不负时代使命、不负人民重托，在新时代的“赶考”路上行稳致远，交出令人民满意的答卷，已成为亟待解决的关键议题。

红色文化资源作为中国人民坚定信仰、顽强意志与深厚情感的高度凝结，是激励青年学子勇担时代重任、奋勇前行的精神滋养与思想灯塔。唯有通过红色文化的浸润，筑牢正确的思想政治根基，培育坚定的理想人格，方能科学解答“培养什么样的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这一教育的根本问题。

（三）增强新时代红色文化凝聚力

大学生理想信念教育的核心目标在于增强青年大学生的思想政治素养，培育其“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社会担当，促使青年大学生将个人命运与国家命运紧密相连。红色文化在塑造大学生行为、提升认知、构筑价值观等方面，展现出独特的育人魅力。它为大学生成长成才筑牢了精神基石，有效提升了他们在文化自信与文化自觉方面的认识和认同，激励他们勇担时代使命。

红色文化是爱国主义精神的集中体现，它以文字与史实为载体，生动呈现了中国人民在党的引领下，为达成民族独立、人民解放以及国家繁荣富强的宏伟目标，所展开的波澜壮阔且持之以恒的奋斗历程。将红色文化融入大学生理想信念教育，能够激发大学生内心深处的爱国热情，增强他们对祖国的归属感和认同感。大学生在学习红色文化的过程中，能够深刻感受到祖国从积贫积弱走向繁荣富强的艰辛历程，深刻体会到中国共产党在这一历史进程中所发挥的中流砥柱作用，从而更加坚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这种强烈的爱国热情和民族自豪感会促使大学生自觉将个人的理想追求与国家的发展目标紧密相连，积极投身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伟大实践中，为国家的建设和发展贡献自己的智慧和力量。同时，红色文化所蕴含的团结一心、众志成城的精神内涵，也能够增强大学生的民族凝聚力，使他们在面对外部挑战和困难时，能够团结一致、携手共进，展现出强大的民族精神和凝聚力。

综上所述，新时代红色文化融入大学生理想信念教育具有极为重要的价值意蕴。它不仅能够帮助大学生传承革命精神、筑牢精神根基，强化价值引领、塑造正确价值观，激发爱国热情、增强民族凝聚力，还能够培养担当精神、助力时代发展。因此，将红色文化融入大学生理想信念教育，对于助力大学生成长成才，努力成长为合格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奠定坚实的人才基础。

二、红色文化融入大学生理想信念教育的现实境况

红色文化是大学生理想信念教育的宝贵资源，能够显著增强教育的实际成效。目前，红色文化在助力大学生理想信念教育方面已经取得了较为显著的进展，但在两者的融合过程中，仍面临一些现实挑战。

（一）理想信念意识薄弱

共产主义作为人类社会的崇高理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则构成当下全社会的共同愿景。然而审视当下，部分学子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缺乏明晰且正确的认知，在基础理论层面掌握不深、理解不透，思想意识层面亦显薄弱。还有一些人认为共产主义的实现与我们相距甚远，没有把个人命运与国家命运紧密联系起来，不明白“小我”与“大

我”之间的联系，对于国家发展、前途命运置身事外等等。

（二）红色文化资源融入内容不足

从当前红色文化在大学生理想信念教育中的实际应用情况来看，红色文化资源的融入程度仍存在明显不足，整体效果尚未达到预期目标，主要体现在红色文化融入的广度和深度上均有待进一步提升。一方面，在红色教育基地的利用方面，部分高校虽然增加了参观红色教育基地、调研红色历史的活动，但选择范围较为局限，往往只集中在少数知名度较高的基地，而忽视了其他具有重要教育价值的红色资源。这种选择的片面性导致高校未能充分挖掘本地红色教育基地的丰富内涵，未能实现对本地红色教育资源的全面整合与利用。另一方面，在红色文化资源的研究与应用方面，部分高校未能对本地红色文化资源进行系统性梳理和深入研究。在开展理想信念教育活动时，难以将红色文化与主题教育有机结合，缺乏针对性和系统性，导致红色文化教育活动形式较为单一，难以充分发挥红色文化的教育价值。

三、红色文化融入大学生理想信念教育的实践路径

精神的传承并非一朝一夕，而是需要持之以恒的努力与长期积累。在新时代背景下，要强化大学生的理想信念教育，必须充分发挥红色文化资源的育人价值，不断探索、创新红色文化融入大学生理想信念教育的有效路径。

（一）深挖红色文化资源，充实大学生理想信念教育内涵

红色文化内容博大精深，形式丰富多彩。高校作为理想信念教育的主阵地，要充分发挥其价值引领功能，结合大学生的社会实践、志愿服务、实习实训等活动，引导学生深入基层、走进社区、走进农村，开展红色文化调研、红色文化宣传、红色文化志愿服务等实践活动。例如，组织学生到革命老区开展社会调查，了解当地人民传承红色基因、发展红色产业的情况；到社区开展红色文化宣传活动，为社区居民讲述红色故事，传播红色文化知识，增强学生对红色文化的实践认知和社会责任感。

深入研究红色文化资源中所蕴含的理想信念、革命精神、道德品质等，结合新时代的要求，挖掘其与当代大学生理想信念教育的契合点，如将长征精神中的艰苦奋斗、不怕牺牲与大学生面对困难时的坚韧不拔相结合，将红船精神中的开天辟地、敢为人先与大学生的创新精神相结合等，使红色文化更具时代感和针对性。

（二）优化红色文化课程体系，创新理想信念教育形式

在思想政治理论课中，将红色文化有机融入教学内容，根据不同课程的特点，设计专门的教学模块或专题。例如在《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程中，通过讲述重大历史事件和革命先辈的事迹，引导学生深刻理解中国革命的历史逻辑；在《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课程中，结合红色文化资源，阐释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增强学生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认同感。其次，组织专业教师编写红色文化校本教材或讲义，开发如“红色文化与理想信念”“地方红色文化研究”等特色课程，系统地向大学生传授红色文化知识，引导学生深入学习和研究红色文化，从学术层面加深对红色文化的理解，进而提升理想信念教育的深度和广度。

（三）加强师资队伍建设，提升教师红色文化素养

定期组织教师参加红色文化专题培训，邀请党史专家、红色文化研究学者等为教师讲解红色文化的历史背景、内涵价值、传承发展等，帮助教师深入理解和把握红色文化的精神实质，提升教师的红色文化素养和理论水平，为更好地开展红色文化教育奠定基础。其次，安排教师到红色文化遗址、革命圣地等地进行实地考察学习，让教师亲身感受红色文化的魅力，增强对红色文化的感性认识。通过实地考察，教师可以更好地挖掘红色文化资源中的教育元素，为课堂教学和实践活动提供生动的素材和案例。

（四）推动红色文化融入组织建设，夯实理想信念教育基础

大学生党支部作为党与大学生群体紧密相连的关键枢纽，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及组织建设中占据着举足轻

重的地位。将红色文化深度融入大学生党支部建设,是强化大学生理想信念教育、提升党支部凝聚力与战斗力的重要举措。高校应高度重视大学生党支部在理想信念教育中的组织引领作用,将其作为加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抓手。

在具体实践层面,大学生党支部要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功能,以多样化的活动形式为载体,创新红色文化教育方式。例如,借助“三会一课”、主题党日活动等常规组织生活,精心策划并定期展开红色文化主题党日、演讲比赛、征文比赛以及文艺汇演等活动。鼓励大学生党员积极投身其中,通过自主创作与精彩表演,亲身感受红色文化的独特魅力,深入挖掘红色文化所蕴含的精神内涵。引导大学生党员在实践中探寻红色基因源头,追溯那些鲜为人知的红色记忆,用心挖掘感人至深的红色故事,深刻体悟红色文化的深厚底蕴,进而增强自身的信仰力量和担当意识。同时,大学生党支部应充分依托红色文化资源,营造浓厚的支部集体学习氛围。通过建立红色文化学习小组、开展红色文化读书分享会等形式,推动理想信念教育常态化、制度化,使红色文化教育如春风化雨般,潜移默化地影响每一位党员思想和行为。

“青年兴则国家兴,青年强则国家强。”^[5]青年一代怀揣理想、具备能力、勇于担当,国家的发展便充满希望,民族的未来便光明璀璨。迈入新征程,广大青年,特别是大学生群体应以强国有我的担当,肩负起民族复兴的使命职责;以奋发有为的精神,为实现中国跨越式的发展做出新的更大贡献,做有理想、敢担当、能吃苦、肯奋斗的新时代好青年,让青春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火热战斗中绽放光彩。

参考文献:

- [1]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65.
- [2] 习近平总书记看望文艺界社科界委员的镜头:“共和国是红色的”[N].人民日报,2019-03-05(1).
- [3]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 [4] 全面从严治党研究课题组.全面从严治党理论与实践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145.
- [5]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

An Analysis of the Path for Integrating Red Culture into the Education of College Students' Ideals and Beliefs

Zhang Yaping¹

¹Shandong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Jinan, Shandong

Abstract: As the backbone of the country's future development, college students' firmness in their ideals and beliefs not only affects their own growth and success, but also has a profound impact on the continuation of the cause of the Party and the country. Integrating red culture into the education system for college students' ideals and beliefs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for laying a solid foundation for ideals and beliefs, enriching educational content, and innovating educational forms. In the context of the new era, strengthening the education of college students' ideals and beliefs, a key task, urgently requires us to deeply explore and effectively utilize the unique educational value contained in red cultural resources, so as to significantly enhance the effectiveness of education and promote the deep integration of red culture and education on ideals and beliefs, thereby laying a solid ideological foundation for cultivating new-era individuals who are responsible for the great rejuvenation of the nation.

Keywords: College students; ideals and beliefs; education; red culture

乡村振兴背景下工业与遗产旅游“政产学研用”五维联动教学机制研究

宋承霖¹

(1.辽东学院, 辽宁 丹东 118000)

摘要: 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深入推进, 工业与遗产旅游逐渐成为活化乡村资源和培养新一代人才的关键途径。但是传统的教育方式与农村的发展需求之间存在明显的结构不匹配, 迫切需要建立一个“政产学研用”五方面的协同机制。通过对东西南北方代表性案例进行深入分析, 本文揭示了主体之间的协同难题和教学创新的途径, 并提出了一个“目标-主体-资源-场景”的四维互动模型, 旨在为乡村人才的供给侧改革提供坚实的理论基础和实践指导。

关键词: 工业与遗产旅游; 乡村振兴; 政产学研用; 教学机制

基金资助: 辽东学院科研项目博士科研启动基金项目: 辽宁工业遗产的活化利用: 旅游驱动下的新质生产力发展 (2024BS032)

DOI: doi.org/10.70693/rwsk.v1i5.1014

一、引言

1.1 现实困境与政策张力

乡村振兴战略的进一步执行需要教育体系与乡村的发展需求紧密结合, 但在工业与遗产旅游的教学领域, 仍然存在许多结构性的矛盾和问题。从政策执行的角度来看, 中央文件强调了“历史耐心”和“量力而行”的原则, 但在地方实践中, 部分文旅项目被异化为“圈地运动”, 这偏离了教育赋能的初衷。以黑龙江省的一些工业遗产景区为例, 它们将其教学基地转型为商业地产, 这反映了政策方向与实际操作之间的不匹配。从教育供应的角度看, 高等教育机构的课程存在明显的同质化问题。西南财经大学在2023年的调查中发现, 有76%的旅游管理专业的学生觉得当前的课程过于偏重理论而忽视了乡土实践, 这难以满足乡村产业的升级需求。在市场主体的行为模式中, 由于企业过分追求短期利润, 导致了教学资源的碎片化。黑龙江农业工程职业学院在“校地企”合作模式下, 企业更偏向于提供单一的技术培训, 而不是进行系统性的人才培养, 这揭示了资本逻辑与教育公共性之间存在的内在矛盾。

1.2 理论缺口与研究设计

现有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产教融合”和“校企合作”的双元框架上, 而对于多元主体之间的协同机制, 特别是在社区参与这一方面, 研究关注度相对较低。本研究超越了传统的分析模式, 采纳了协同创新的理念, 构建了一个“主体协同度-教育赋能效应-乡村发展绩效”的三维分析结构。在研究方法方面, 选择了混合研究路径, 并以湖北黄石矿冶遗址(由政府主导)、青岛啤酒文化小镇(市场驱动)和景德镇陶瓷工业遗产(社区嵌入)这三种典型模式进行了多案例的比较分析。在数据收集过程中, 进行了政策文本的深入分析、深入的访谈和空间模型构建, 访谈的目标群体包括15名政府官员、20名企业管理人员、50名教师和学生以及30名村民, 以确保研究结果能够从多个来源进行相互验证。

二、理论模型与机制设计

2.1 五维主体功能再定义

工业与遗产旅游教育的三重属性——作为文化传承的载体、作为激活产业的媒介以及作为空间治理的工具,

作者简介: 宋承霖(1994—), 男(汉族), 辽宁丹东人, 讲师, 研究方向: 工业与遗产旅游, 数字文旅。

因此需要重新定义“政产学研用”这一主体功能的定位。政府的角色需要从仅仅是政策制定者转变为负责制度供应和资源整合的角色。一个典型的例子是贵州省麻江县建立的乡村振兴研究院，该研究院通过整合南京农业大学、贵州大学等跨区域的资源，构建了一个集产、学、研、用于一体的综合平台。在企业功能的转型过程中，青岛啤酒文化小镇利用 IP 授权将其生产流程转变为沉浸式的教学课程，从而实现了商业价值与教育功能的完美结合，进一步证实了企业在场景建设者角色中的核心地位。作为知识的创造者，高等教育机构需要加强以实践为导向的知识输出能力。西南财经大学通过教师的实际工作经验和本土化案例的开发，形成了一种“课堂田野”双向流动的机制，这一机制具有很高的示范意义。对于科研机构来说，重点应该放在技术赋能和标准制定上，重庆科技学院与鲁花集团合作进行的工业文旅技术攻关项目正是这种思维方式的体现。社区作为共同创造价值的主体，其在地知识价值在景德镇陶瓷工匠的合作教学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而村民的口述历史成为了动态教学资源的关键部分。

2.2 协同动力机制解析

实现主体之间的协同合作需要依赖于利益的相互关联和权力的重新构建这两大驱动因素。在利益的耦合方面，政策的红利分配、课程产品的变现以及学术成果的转化共同构建了一个闭环的动力系统。麻江县的蓝莓产业园成功地通过技术合同交易达到了 3.68 亿元的产值，并且将 15% 的收益专门用于教学基地的建设，从而构建了一个经济回馈教育的持续模式。在浙江交通职业技术学院的“三定向”人才培养策略中，通过参与“数字农村路”系统的开发，村民获得了决策的主导权。^[1]这种做法打破了传统学校与企业合作的单一权力模式，使得社区的需求能够直接融入到课程设计中。两种驱动机制之间的互动为五维的联动带来了持续的动力。

2.3 理论模型构建

基于主体功能与动力机制分析，本文提出“五维螺旋上升模型”（Pentagon Helix Model）。该模型突破传统线性协同框架，动态呈现政策牵引（政府）→场景激活（企业）→知识溢出（高校/科研）→价值内化（社区）→反馈优化（政府）的非线性交互过程。创新性引入的“空间正义”调节变量，有效解释资本过度渗透导致的教学异化现象。青岛啤酒文化小镇案例显示，企业主导的教学商业化虽能快速提升课程变现效率（青岛模式营收增长率达 34.5%），但村民参与率仅 38.6%，且薪酬水平较外来员工低 41%。这一空间非正义现象（基尼系数 0.67）表明，资本过度渗透可能破坏五维协同的阈值平衡。这一理论建构为后续实证研究提供分析框架，同时揭示主体协同的阈值边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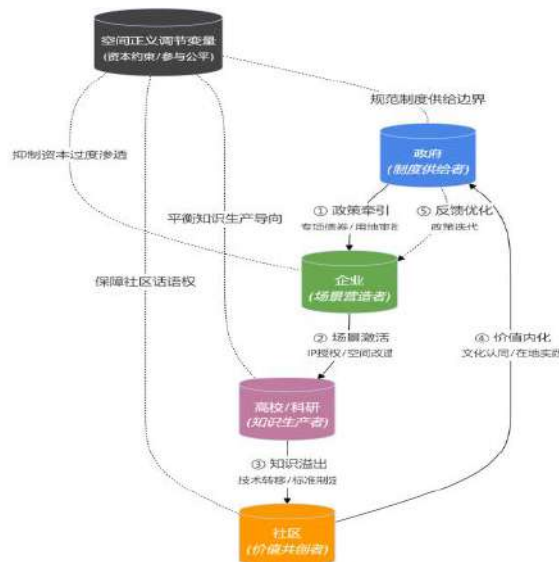


图 1 五维螺旋上升模型（Pentagon Helix Model）

三、实证分析与模式提炼

3.1 数据收集与测度

该研究采用了量化和质性两种方法来交叉验证其理论假设。在量化的维度上开发了“五维协同指数”。测量结果显示，企业的参与度与社区的赋权之间存在明显的负相关关系（ $\beta = -0.32$ $p < 0.05$ ），而 Bootstrap 检验（1000 次抽样）揭示了 95%CI: -0.41~-0.23 的范围。在回归模型中，控制变量涵盖了区域 GDP、政策支持的强度以及遗产密度，模型的拟合优度 R^2 为 0.68，这表明该模型具有较高的解释能力。从质性的角度分析，黄石模式采用了“遗产修复+课程开发”的综合策略来降低交易的成本，但在社区参与方面存在形式化的问题，即村民的决策参与率低于 12%；青岛的商业模式是基于企业 IP 的变现逻辑，而村民的参与率只有 38.6%；景德镇的经营模式以非物质

文化遗产技艺的传承为中心，社区的满意度高达 85.2%。空间建模的结果进一步揭示，教学空间与日常生产和生活空间的融合程度对知识的转化效率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R^2=0.67$)。

3.2 典型模式比较

在工业与遗产旅游的教学机制中，不同地区的实践表现出明显的异质性。根据主导力量和价值取向的差异，可以将其拆解为三种典型模式：政府主导型、市场驱动型和社区嵌入型。本项研究利用多维指标对比（见表 1）来揭示其运行逻辑、效能边界和适配条件，旨在为乡村振兴战略下的教育模式选择提供有力的实证支持。

（1）政府主导型：制度嵌入与资源整合

黄石矿冶遗址中的“修复-教学”协同机制展示了在行政主导下的制度性创新。地方政府通过发行专项债券（2023 年获得 2.3 亿元的批准）将遗产保护和教育功能结合起来，形成了一个“资金-空间-政策”三位一体的供应体系。^[2]从空间生产的角度来看，遗址修复工程预留了 30% 的空间用于教学场景的建设，例如将井下巷道改造成安全实训基地，从而实现物质遗产向教育资本的转化。在知识生产方面，黄石理工学院与湖北省文旅厅合作推出了“矿冶文化+生态修复”的课程模块，并在 2023 年成功培训了 420 名乡村技术骨干。但是，社区的参与度呈现出明显的工具性特点：87% 的村民只负责清洁、安保等低技能的劳务，决策参与率低于 12%（2024 年的调查数据）。奥斯特罗姆的“制度供给陷阱”理论得到了证实，即过分依赖行政干预可能会导致社会资本的发展受到阻碍，这一结构性矛盾体现在“政府强动员-社区弱赋权”之间。^[3]

（2）市场驱动型：资本逻辑与效率优先

青岛啤酒文化小镇的市场运营模式展示了在企业主导之下，教育如何走向商业化的道路。基于青岛啤酒集团的 IP 授权，构建了一个从“酿造工艺研学”到“品牌体验营销”再到“衍生品开发”的完整课程体系。到 2023 年，与教学相关的收入达到了 2176 万元，这占据了小镇总收入的 18.7%。以效率为导向的资本思维推动了创新实践的发展：通过“收益分成制”策略，吸引了 6 所高等教育机构共同建立实训基地，而企业则按照课程收入的 15% 支付给合作学院知识使用费。然而，从空间正义的角度看，存在明显的不足，乡村居民的角色被简化为仅作为服务提供者——仅有 32.6% 的人参与导览解说工作，并且他们的薪资水平比外来员工低 41%（依据青岛市人社局的数据）。从布迪厄场域理论的角度来看，“文化资本垄断”的现象引发了地方文化认同的危机。根据问卷调查，仅有 29.3% 的村民认为“啤酒文化是本地文化的代表”。

（3）社区嵌入型：内生发展与文化重构

景德镇陶瓷工业遗产的“大师工作室+村民合作社”模式，展现了社区主体性重构的教育赋能路径。通过非遗传承人认定制度（现有国家级大师 37 人）与村民合作社（注册社员达 2135 户）的协同，形成“技艺传授-产品共创-收益共享”的教学生态系统。2023 年数据显示，参训村民的本地就业率达 72%，较传统培训模式提升 48 个百分点。知识传播机制呈现“双向嵌入”特征：一方面，大师工作室将现代设计理念注入传统技法（如 3D 打印辅助制胚）；另一方面，村民口述史被系统整理为《景德镇瓷工记忆》教材（收录方言术语 1246 条）。^[4]这种“文化自觉”驱动的教学模式，呼应了费孝通“乡土重建”理论，但也面临规模化挑战——高端定制课程占比达 65%，难以满足普惠性教育需求。

表 1 工业与遗产旅游教学模式比较分析

维度	政府主导型（黄石）	市场驱动型（青岛）	社区嵌入型（景德镇）
核心动力	行政权威与政策捆绑	资本增殖与 IP 运营	文化认同与技艺传承
知识流向	高校→政府的单向输送	企业→市场的快速变现	社区↔大师的双向重构
社区参与	劳务供给（参与率 87%）	服务配套（参与率 32.6%）	主体共建（参与率 68.4%）
空间正义	制度性排斥（基尼系数 0.52）	资本垄断（基尼系数 0.67）	文化赋权（基尼系数 0.38）
适配条件	遗产密集+财政充裕地区	企业集群+消费市场成熟区	非遗富集+社群组织度高区

（注：基尼系数基于教学收益分配数据计算，数值越高表征不平等程度越大）

（4）模式选择的权变逻辑

“效率-公平-可持续”的三重目标在本质上决定了三种模式之间的效能差异。^[5]根据计量模型（见表 2），政府主导型在基础设施的改进速度 ($\beta=0.78^{**}$) 和政策的响应度 ($\beta=0.65^{*}$) 方面展现出了明显的优越性，但其在社会资本的积累效率 ($\beta=0.21$) 上明显不如社区嵌入型 ($\beta=0.83^{***}$)。尽管市场驱动型可以迅速提高经济表现（营业增长率为 34.5%），但这也导致了文化真实性的损失（游客对真实性的感知下降了 12.7 个百分点）。在进行实践选择时，必须遵循“时空适配”的原则：在乡村振兴的初始阶段（即人均 GDP 低于 5 万元的地区），由政府主导的模式能够迅速突破资源的限制；当市场化的指标超出 0.6 时，需要采用社区嵌入的策略来对冲资本的风险；在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禀赋（每万人非遗项目数量）超过 2.5 的地区，应当优先考虑发展文化共生模式。

四、对策与结论

此项研究超越了传统的协同创新理论中的三螺旋结构，并提出了“教育场域权力的再平衡假设”。根据实证研

究的数据,当社区的参与度低于45%时,企业的资本增长会明显地削减教育的公共性($p<0.01$),这一发现为协同阈值的研究开辟了新的视野。通过引入空间正义这一变量,修正了现有模型在忽视权力博弈方面的不足,并为乡村振兴教育的研究构建了一个伦理分析的框架。在实际操作中,需要通过制度的创新和评价体系的改革来加强五维联动机制的实际效果。首先,建议实施教育用地的混合使用制度,具体措施包括修订《土地管理法》第47条,新增“遗产教育复合用地”这一类别,并通过法律手段明确工业遗产空间在教学功能方面的合法性;基于此,我们优先选择了5个国家级的乡村振兴示范县(例如浙江安吉、四川丹棱等),计划在2025至2027年期间进行试点工作,以探讨如何将遗产保护与教育功能更好地结合起来;在试点阶段,有必要同时建立一个第三方的评估体系,由高等教育机构的智库和自然资源部门共同制定验收准则,特别关注土地使用效率、社区的参与程度以及教育成果等关键指标,以确保政策执行的规范性和可持续性。接下来,我们应该建立一个以能力为核心的评估体系,以解决传统评估方法过于注重形式而忽视实际效果的问题。可以构建一个名为“乡土问题解决指数(RPSI)”的核心评估工具。这个指数涵盖了技术转化率(权重30%)、社区满意度(权重40%)和经济带动效应(权重30%)这三个二级指标。

“政产学研用”这一五维联动机制能够通过知识的再生产来激活乡村的内在活力,但同时也需要警觉资本逻辑可能对教育公共性造成的侵蚀。在未来的研究中,可以考虑利用数字技术来加深场景的整合,例如创建工业遗产的数字孪生教育平台,并对不同区域的制度环境进行深入的比较分析。在实际操作中,建议东部地区更多地关注市场与社区的合作,而中西部地区则应加强政府与科研的协同作用,从而制定出差异化的执行策略。

参考文献:

- [1]张中波.农村工业遗产旅游开发:价值、困境及对策[J].中共山西省委党校学报,2022,45(02):63-67.
- [2]刘金林.资源型城市工业遗产特色旅游的实践与探索——以黄石工业遗产博物馆群建设为例[C]//中国旅游研究院(文化和旅游部数据中心).2020中国旅游科学年会论文集 旅游业高质量发展.湖北师范大学资源枯竭城市转型与发展研究中心,2020:390-398.
- [3]马建富,陈春霞,吕莉敏.乡村振兴与农村职业教育变革[M].知识产权出版社:202008.339.
- [4]甘牧.留下曾经的记忆——景德镇瓷业文化遗产保护片区工程纪略[J].景德镇陶瓷,2014,(05):1-2.
- [5]李晓燕.走效率、公平、可持续之路——新常态下四川县域经济发展之论[J].四川党的建设(城市版),2016,(12):54-55.

Research on the Five-Dimensional Linkage Teaching Mechanism of "Government, Industry, Academia, Research and Application" for Industry and Heritage Tourism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Song Chenglin¹

¹ College of Tourism and Culture, Liaodong University, Dandong, Liaoning Province, China

Abstract: With the in-depth advancement of the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industry and heritage tourism have gradually become the key ways to activate rural resources and cultivate a new generation of talents. However, there is an obvious structural mismatch between the traditional educational approach and the development needs of rural areas. There is an urgent need to establish a collaborative mechanism involving "government, industry, academia, research and application". Through in-depth analysis of representative cases from the east, west, south and north, this paper reveals the collaborative problems among the subjects and the approaches to teaching innovation, and proposes a four-dimensional interactive model of "goal - subject - resource - scenario", aiming to provide a solid theoretical basis and practical guidance for the supply-side reform of rural talents.

Keywords: Industry and Heritage Tourism Rural revitalization Government; industry; academia; research and application Teaching mechanism

本土音乐文化在幼儿园音乐教育中的融合现状和反思

——以广东省江门市幼儿园为例

李丽婷¹ 杨晓岚²

(1.淮北师范大学, 安徽 淮北 235000, 2.常州工学院师范学院, 江苏 常州 213000)

摘要: 江门本土音乐文化具有独特的地域特征, 近年来逐渐被引入各类学校的音乐教学。本文聚焦江门地区, 探讨本土音乐文化在幼儿园音乐教育中的价值, 分析其在当地幼儿园音乐教学中的传承与应用现状, 并提出相应的教学建议, 以期为幼儿园本土音乐文化的传承与发展提供参考。

关键词: 本土音乐文化; 幼儿园课程; 音乐教育

DOI: doi.org/10.70693/rwsk.v1i5.1021

幼儿教育是个体成长的重要阶段, 对良好性格和习惯的养成具有奠基作用。在幼儿园教学中, 音乐教学法在拓展幼儿学习体验方面起到了关键作用。本土音乐作为地方传统文化, 蕴含独特的人文魅力, 近年来逐渐受到国内外音乐及相关领域专家的关注。对这一伟大文化遗产的最佳方式是在童年时就开始。处于幼儿时期的孩子, 他们的理解能力较弱, 不适合学习复杂的内容, 而江门本土音乐以其即兴创作和口头演唱而闻名, 具有很强的即兴性, 题材内容丰富、种类多样。歌曲的语言具有民族特色, 易唱易懂, 亲切感强, 具有浓厚的地方色彩, 幼儿容易对其产生兴趣^[1]。本土音乐文化本身就具有传承性, 将音乐与教育相结合, 通过音乐教育不仅可以丰富幼儿园音乐教育内容, 提高幼儿音乐素养, 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促进江门本土音乐文化的发展, 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本文将以此为基础, 探讨如何将当地独特的音乐资源与幼儿园音乐教育有效融合。

一、江门地区本土音乐文化的特色

江门位于我国南方沿海地区, 其本土音乐独具地方特色, 反映了当地人们生活劳作和风俗的过程, 不同地区和环境孕育出来的音乐也各有其特色。例如, 沿海地区流传的有“咸水歌”“龙船歌”“闹房歌”“牧牛歌”; 北部和东南地区的孟兰节、功果会、元宵灯会、中秋丰收庆典中, 有“禾楼歌”“卖鸡调”“架桥歌”“赞酒礼”, 以及新婚庆典中的“新娘歌”“嫁女歌”和“木鱼”, 此外, 上、下川岛也广泛传唱“山歌”^[2]。江门本土音乐文化多是以本地方言为主, 随性而唱, 内容丰富, 种类多样。其中台山童谣最为当时的小朋友喜爱, 台山童谣以孩童的视角去叙述孩童的生活, 多以口头的形式流传, 曲式较短, 歌词朗朗上口, 通俗易懂易记, 歌曲节奏较为轻^[3], 如:

《摇呀摇, 摇到外婆桥》

摇呀摇, 摇到外婆桥, 买条鱼来烧, 外婆哈哈笑。

头未熟, 尾巴翘, 跌落湖里跳三跳。

这首台山童谣主要是以台山本地方言进行传唱, 主要描述了孩子想要烧鱼孝敬外婆, 可是鱼不仅没有煮熟, 还不小心让鱼跃出锅跳入湖的尴尬场面。简单的句式, 却描述出了一个生动活泼的画面, 通俗易懂。

《落水可帽》

落水仔, 可帽戴。阿妈打, 阿人滞。阿爷来归眼界界

作者简介: 李丽婷(1999—), 女, 硕士, 研究方向为学前教育语言;

杨晓岚(1983—), 女, 博士, 副教授, 研究方向为学前教育语言。

通讯作者: 李丽婷

这首童谣主要是描述午后顽童在外玩耍,突然下起小雨,于是回家拿帽子戴上,继续出去玩。结果还是被淋湿了,一副“落汤鸡”模样,想偷偷溜回家换衣服吃晚饭。脚刚踏进家门,恰好被从厨房端菜出来的妈妈见到。妈妈就把顽童教训一顿。顽童边跳着躲闪边大声嚎哭,奶奶心疼孙子,马上起身出来制止儿媳妇,用身子把孙子保护。这时爷爷农耕归来,看到这种场面,只能干瞪着眼睛。顽童从奶奶身后伸出半个头,对阿妈眨了眨眼睛。

台山童谣具有本土当地特色,主要是从孩子的视角,用简短的句式去描述孩子的生活,虽然当时的孩子的生活和现在的生活有很大的变化,但是,我们可以吸取其优秀的价值,例如其简短的句式,节奏的轻快等,来进行童谣的创造,并将其与幼儿音乐教育相结合。

江门本土音乐文化种类繁多,特点各异,如果得不到弘扬和传承,可以说是本土文化的一大损失。

二、江门本土音乐文化在幼儿园音乐教育中的意义

学龄前幼儿正处于身心迅速发展的阶段,虽然他们的学习能力较强,但在文字表达和理解上较为薄弱,学习复杂知识与他们的身心发展规律不符。本土音乐文化源自生活,其简单且富有感染力的旋律能激发幼儿的兴趣。将本土音乐文化融入幼儿园音乐教育,不仅丰富了教育内容,还促进了幼儿与教师的共同发展,有助于打造具有特色的幼儿园音乐课程。

(一) 贴近生活, 激发幼儿的音乐兴趣

本土音乐文化不仅是地区特定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总和,还体现着地区核心竞争力,新时期的本土音乐文化有着强大的生命力^[4]。江门本土音乐文化是广大群众在社会实践中,经过广泛的口头传唱而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和人民的的生活是密切相关的,江门本土民歌是以江门本地方言的形式来传唱,对于本地的群众来说具有易唱易懂的特点,很有亲切感,以江门童谣《落水可帽》为例,这首童谣以江门本地方言形式进行传唱,句式简短,节奏欢快。描述了孩童在外玩耍,刚好下雨回家拿帽子继续玩耍,结果淋湿的画面。这画面在江门是很常见的,把《落水可帽》这个童谣融入到学前音乐教育,以幼儿熟悉的,贴近幼儿生活的形式和学前音乐教育相融合,不仅可以增加幼儿对音乐的熟悉程度,而且在一定的程度上能够激发幼儿的音乐兴趣。

(二) 积累沉淀, 丰富幼儿的音乐认知

本土音乐不仅具备审美功能,它还包含着丰富的文化资源。江门本土音乐的内容是多种多样的,有庆祝当地节日风俗的龙船歌;也有反映人民劳动生活的山歌;还有为儿童作的游戏歌,猜谜歌等。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是“八音班”,又叫锣鼓架,八音是八种材料制作的乐器所演奏的音乐的总称,每到重要节日或是农闲时刻,多数村庄中都会有“八音班”的表演^[5]。八音班是江门本土音乐文化代表性的存在,将其与学前音乐教育相结合,能够让幼儿认识和接触不同的乐器,丰富其音乐认知。

(三) 潜移默化, 熏陶幼儿的音乐情感

新音乐课程标准明确提出:“以音乐审美为核心,培养兴趣和爱好,应贯穿于教学全过程,在潜移默化中培养学生的美好情操和健全人格。”^[6]优秀的本土音乐有助于培养幼儿的音乐情感,因为它蕴含了地方独特的情感,这种情感只有当地人能深刻体会。江门本土音乐文化融合于学前音乐教育中,幼儿从小接触本土音乐,感受其中的情感,从而在潜移默化中培养他们对地方文化的认同和自豪感。

三、江门本土音乐文化融入幼儿园音乐教育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传统的音乐教育多侧重于西方音乐,只有少数课程涉及本土音乐,而本土音乐教学的重视程度较低,甚至几乎没有。这样导致本土音乐文化在幼儿园音乐教育中处于边缘化地位。同时,固有的教育观念也限制了本土音乐文化与我国多元化音乐教学的融合^[7]。

近几年,江门对本地文化的传承越来越重视,建筑的维修,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申请等等,引人瞩目,但针对本土音乐的传承,依旧存在以下问题,其中最突出的是在与教育的融合方面。

(一) 师资缺乏, 教师对江门本土音乐文化了解较少

在“童心向党”2021年岭南童谣征集传唱活动,强国复兴有我”2022年五邑童谣征集传唱活动等广东省举行的重大童谣比赛中,笔者对获奖名单中的江门市作品进行分析,发现获奖的作品中,多是作曲家与不同年段的学

校进行合作,作曲家不是该学段的教师;包括《蓬江河畔我长大》中的梁向宁老师也不是该幼儿园的专职教师,其职业是一名青年作曲家;其次笔者走访江门市台山市共5家幼儿园,两家公立,三家私立;江门市开平市3家私立幼儿园,1家公立幼儿园;并对从八家幼儿园中的随机几位教师进行随机访谈,访谈中的教师对于“你是否了解江门本土音乐文化”,纷纷表示不了解,其中个别认为江门本土音乐等同于粤语童谣;由此推断出,本土音乐文化的在幼儿园的师资是缺乏或是专业能力有欠缺,还需加强的。

(二) 宣传不足,相关机构对本土音乐文化传承关注较少

为传承和发展江门本土音乐文化,江门市政府已积极推动民间音乐的保护和宣传活动,期望让更多民众了解和认识本土音乐。然而,宣传力度仍显不足,政府的重点主要放在继承人培养上,江门文化中心定期组织继承人到省内学习,以增强他们的责任感。这种宣传方式较为单一,主要依赖官方组织的学习和展览活动,尚未充分将本土音乐文化与义务教育相结合。其次笔者对江门市15家公办幼儿园的办学理念及特色课程进行搜索,发现各园特色课程多为“幼儿园生活,探究式自主学习体验活动等”课程,没有针对江门本土音乐文化开展的特色课程,各幼儿园的领导也没有意识到本土音乐文化的重要性,要把本土音乐文化作为幼儿园的一大特色课程来发展。

(三) 成果匮乏,本土音乐文化创作者与幼儿园合作较少

为了能够深入了解江门本土音乐文化的现状,笔者在江门市人民政府、台山文明网、江门广播电视台、江门市文明办等多个官网,以“童谣”“时间”为关键词进行搜索,对近八年的获奖情况进行整理(如表1)。

表1 近八年江门“童谣”获奖情况

时间	活动名称	代表人	获奖	合作单位(备注)
2017	CCTV-14 少儿频道	台山市台城第二小学	《点之碟碟》亮相 CCTV-14 少儿频道	
2018	江门市优秀童谣征集活动	洪梓椿(开平市三埠春华小学) 梁韵薇(同上)	三等奖:《牵牛花》;优秀奖:《清明》	
2019	“新时代好少年”发布暨优秀童谣	吴艳娟、张鸿普	三等奖:《祖国,我们的家》 二等奖:《美丽的家》	鹤山市雍日幼儿园 蓬江区蓓蕾幼儿园
2020	“2020·难忘的记忆”第五届岭南童谣征集传唱活动	何韦明(作词,台山市台城第二小学校长) 李培(作词,合城二小音乐组)	二等奖:《小朋友 戴口罩》	台山市台城第二小学
2021	省级“童心向党”岭南童谣传唱活动	梁向宇(词曲) 赤溪中心学校专门组织教师	一等奖:《蓬江河畔我长大》 三等奖:《惜粮谣》	蓬江区怡康华庭中英文幼儿园 赤溪中心学校
2021	五邑“童心向党”童谣征集传唱	邱劲松(词)/肖绍静(曲) 李培 梁向宇	一等奖:《爷爷告诉我》、《社会主义好》、《国旗下的红领巾》、《蓬江河畔我长大》	—
2022	“强国复兴有我”岭南童谣征集传唱	梁向宇(作曲)/邓晓莹(作词) 李培	二等奖:《书香江海》 三等奖:《热爱祖国热爱党》	—
2023	“强国复兴有我”岭南童谣征集传唱	王强进(词)/肖绍静、李婉燕(曲) 梁向宇邓晓(词)/梁向宇(曲) 孔雷	二等奖:《石板沙》《根在故里》 三等奖:《故乡的骑楼》 三等奖:《将友好传递》	江门市文明办被评为优秀组织单位 新会青少年宫(幼儿园)

江门市对童谣与本土音乐文化融合的这一方面是越来越重视,2017年前的参赛作品较少有取得优秀的成绩,

从2017年开始参赛获奖的作品在逐年增加,成绩也在不断突出,但是获奖人来来去去都是“梁向宁、肖绍静”等作曲家,少有的作曲家出现,说明在童谣创造方面,人才存在匮乏的状态;其次江门本土音乐文化在幼儿园的融合方面不够重视,江门本土音乐文化多在中小学进行传承,而与幼儿园的合作则是较少,在近十年的获奖名单中,与幼儿园合作获奖的只有4家幼儿园,对比于小学,在幼儿园的推广不够普及。

根据图示我们可以看出,本土音乐文化在幼儿园的融入是比较少的,笔者认为原因有三。其一:缺乏能够进行本土音乐文化融合的师资力量,对于如何将江门本土音乐文化融入到幼儿园音乐教育中,存在一定的困难;其二是幼儿园办园理念在一定的程度上影响着本土音乐文化在幼儿园的应用,江门市各公办幼儿园的办园理念多集中在幼儿的生活化上,在一定程度上忽略了音乐教育的重要性;其三,现在幼儿的生活与当时的孩童的生活存在差异,对于童谣的理解可能会存在一定的难度,其次还存在部分幼儿不懂江门本地方言,这对于童谣在幼儿音乐教育的融入是一大困难,也是文化创造者与幼儿园合作较少的原因。

四、本土音乐文化在幼儿园音乐教育中的应用策略

为了将江门本土音乐文化有效融入幼儿园音乐教育,笔者将从师资、幼儿园及政府三个层面,针对当前在融合过程中遇到的问题,提出相应的改进措施。

(一) 加强师资的培训及本土音乐文化的素养教育

本土音乐文化在幼儿园音乐教育的应用中,最为重要的要素就是“以人为本”,其中教师作为传递的重要主体,在这其中发挥着关键的作用^[7]。教师自身的素质影响着教育的质量,要想充分发挥本土音乐文化在学前音乐教育的作用,首先要加强教师自身对本土音乐文化的音乐素养,包括了解本土音乐文化的相关知识(歌谣,乐器等),其次,教师需要自己会江门本地语言,能够进行江门本土音乐的传唱,最后还要有属于个人特色的教学技巧,如何把本土音乐融入到幼儿园的音乐教育当中去。所以要加强教师的本土音乐文化的素养。例如幼儿园可以邀请对江门本土音乐文化有深厚了解的音乐家来对教师进行培训,或是定期组织江门本土音乐文化资源的交流活动,丰富教师对本土音乐文化的相关知识。

(二) 尝试构建园本化本土音乐文化教育课程体系

幼儿园的课程反映了幼儿园的教育理念,是一个促进孩子智力、体能和审美全面发展的课程^[9]。本土音乐文化拥有着形式多样的民间歌谣,朗朗上口的童谣等,它们来源于日常生活,对于幼儿园来说,本土音乐课程的开发与幼儿日常生活息息相关,是最具实践性的教材。为了将江门本土音乐文化融入幼儿园音乐教育,幼儿园应广泛收集本土音乐素材,并在此基础上设计、编写和创新音乐教学内容。在构建本土民歌音乐教学体系时,需要打破传统的教学模式,如即兴教学、口传心授或使用传统的记谱方法,力求以更生动、接地气的方式呈现给幼儿,确保教育内容的原汁原味,也可以在江门本土音乐的音乐风格的基础上,与幼儿的身心发展状况相结合,准确把握本土音乐的创造角度,从而本土音乐文化更好的融入到幼儿园音乐教学中。幼儿园对本土音乐文化进行开发,以丰富的本土音乐文化为立足点,将它融入到幼儿园课程当中,能够进一步的丰富幼儿园的课程,形成特色的“园本课程”,提高幼儿园的教育质量,促进幼儿的发展。

(三) 集结政府资源,增强对本土音乐文化传承的重视与投入

在多元文化的背景下,外来音乐教育在幼儿园中深受欢迎,使得对于本土音乐文化的关注力在不断的下降,对本土音乐文化的重视意识薄弱,使本土音乐文化处于边缘化。面对这种情况,首先政府及其相关部门通过政策的颁布,利用政治的权力,强调本土音乐在教育体系的重要性,促进各学校对本土音乐文化的重视。只有拥有对本土音乐文化传承的意识,各学校才会有行动去推动本土音乐文化的发展。其次本土音乐文化课程的开发只依靠教师和学校是不够的,还需要相关政府部门的支持。在信息化的时代,相关政府部门可以加大对本土音乐文化的科研投资,采取与“互联网+”相结合的方式,使课程的开发形成一个综合性的网络,把本土音乐文化与幼儿园等教育机构或是科研部门建立联系,能够让各级政府能够及时了解本土音乐文化的开发现状,对幼儿园等教育机构对课程开发所存在问题进行纠正,促进课程开发的有效性,促进本土音乐文化的发展^[8]。例如:政府指导幼儿园通过录制本土音乐文化在幼儿园音乐教育的有趣课程,将视频发放在自媒体上,进一步的在互联网上去推广本土音乐文化在幼儿园音乐教育的应用现状,让本土音乐文化可以走向各大平台,慢慢更进一步影响到幼儿园中,引起相关教育机构对本土音乐文化的重视,达到弘扬本土音乐文化的作用。

《全日制义务教育音乐课程标准（实验稿）》在 2001 年提出，强调要实施国家、地方和学校三级课程管理，鼓励学校自主开发课程，并要求地方课程在整体教育体系中占有一定比例。地方和学校要开办具有民族的，地区的或是本校的特色音乐课程。”^[10]课程标准的颁发不仅体现了我国具有丰富多彩的地区音乐文化资源，也体现了音乐教育在我国教育体系中占有重要作用。笔者在对江门本土音乐文化的过程中，发现江门具有丰富的本土音乐文化，但在与幼儿园音乐教育相融合的过程中，却还存在较大提升空间。相信在国家对传统文化大力推广的时代背景下，通过江门市政府和各级各类教育机构对本土音乐文化的关注和重视，江门本土音乐文化将会在幼儿园阶段音乐教育活动中得到有效传承和发展。

参考文献:

- [1] 朱英俊.广东台山民歌述略[J].中国民族博览,2017(02):125-127.
- [2] 梁露.广东省江门市“非遗”音乐保护现状[J].戏剧之家,2018(25):47-48+74
- [3] 宋维佳.台山广东音乐活态传承与保护研究[J].北方音乐,2016,36(19):4-5.
- [4] 黄霜阳.本土音乐文化在高校音乐教育中的传承与发展研究[J].中国民族博览,2021(07):75-77.
- [5] 康保成.岭南“八音班”艺术形态及其源流试探[J].曲学,2017,5(00):483-505+9.
- [6] 俞岚.地域文化在学前音乐教学中的功能发挥[J].郑州铁路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2021.04.024
- [7] 曹淼.音乐教育中本土音乐文化的传承[J].音乐时空,2015(20):138.
- [8] 魏雅铭.幼儿园音乐教育的本土化研究与实践[D].新疆师范大学,2018.
- [9] 康晓霞.幼儿音乐教育存在的问题及对策探究[J].戏剧之家,2021(10):102-103.
- [10] 徐皖闽.对闽南地区学校教育中本土音乐文化传承的反思[J].漳州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26(04):22-28.

The Integration of Local Music Culture into Kindergarten Music Education: Current Status and Reflections — A Case Study of Kindergartens in Jiangmen, Guangdong Province

Litong Li¹, Xiaolan Yang²

¹ Huaibei Normal University, Huaibei, Anhui 235000, China

² College of Education, Changzhou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Changzhou, Jiangsu 213000, China

Abstract: The indigenous musical culture of Jiangmen, characterized by its distinct regional features, has in recent years been progressively introduced into music instruction across various educational institutions. This paper centers on the Jiangmen area to examine the value of local music culture in kindergarten music education, analyze its current status of transmission and application within local kindergartens, and offer targeted pedagogical recommendations. It is hoped that these insights will serve as a reference for the preserv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indigenous music culture in early childhood settings.

Keywords: Indigenous Music Culture; Kindergarten Curriculum; Music Education

云南省乡村教师身份认同现状调查研究——基于 1908 份数据的分析

张善富¹ 代江丽²

(1.玉溪师范学院外国语学院, 云南 玉溪 653100; 2.玉溪体育运动学校, 云南 玉溪 653100)

摘要:乡村教师身份认同危机现象愈发普遍,很多乡村教师长期挣扎于寻求职业意义的价值冲突之中,衍生出了一系列教育教学实践的现实问题,极大地阻碍了乡村教育的高质量发展,进而制约了城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目标达成,更制约了广大农民群众子女“上好学”的现实期盼。云南省乡村教师身份认同危机问题较为普遍,整体认同处于“一般认同”水平,未达到“高认同”水平,也在性别、民族、教龄、婚恋情况等多方面体现出一定的群体差异性。乡村教师发生流动或流失的潜在风险较大。

关键词:乡村教师; 身份认同; 调查研究

DOI: doi.org/10.70693/rwsk.v1i5.1015

一、研究背景与问题

所谓乡村教师身份认同指在社会交往之中,乡村教师个体体悟身份不同,并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对个体社会地位、职责功能的主观感知、认同,而认同的核心是乡村教师个体能对教师职业形成肯定,并予以实践。^[1]也有学者认为,乡村教师身份认同基于自我身份及所属群体身份的个体认知和肯定,而整个认同心理过程往往伴随着情感体验和整合行为模式。^[2]上述定义中,乡村教师身份认同结构往往包含3个要素:个体认知、个体情感体验及个体行为倾向。

乡村教师存在身份认同危机,相关研究多立足于身份认同的2个维度,即自我认知^[3]和他者认知^[4]。在自我身份认知维度,乡村教师存在身份认同感低、荣誉感不强的共性问题。我国基础教育阶段教师身份认同感整体体现出历时性下滑的特征,乡村教师身份认同感薄弱现象较为突出,甚至演变为一种“声望危机”。^[5]在社会身份认知维度,由于自身专业能力水平存在的一些客观现实问题,乡村教师常被赋予一些污名化标签,常被给予等“能力差”“水平低”“门槛低”等刻板文化意象。^[6]可见,在现代化等同城市化的理念下,城市教育成为先进与优质的代名词,而乡村教师相较之下却被贴上“落后”的刻板印象与外在标签。然而,现阶段有关乡村教师身份认同的研究主要聚焦东中部地区,对西部民族地区乡村教师的系统研究较为匮乏,^[7]对身处“边疆、民族、乡村”三重视野下的云南省乡村教师身份认同的研究则更是稀缺。有鉴于此,本研究基于实证调查开展云南省乡村教师身份认同研究。

二、调查工具与调查对象

为确保研究的信度和效度,进而较好地达到研究的预期目的,本研究问卷未采用自编问卷,课题组基于我国中小学教师职业认同量表^[8]、我国外语教师身份认同量表^[9]、农村教师职业认同问卷^[10]等问卷基础之上进行相关改编,设计了符合本研究预期的调查问卷。经过检验,问卷的信度和效度较好,能够满足该项目研究的需求。

调查问卷主要分为三大部分:第一部分是有关乡村教师的基本信息,包含性别、民族、教龄、任教学段、任教岗位婚恋情况等方面的信息,共有10题;第二部分是有关乡村教师身份认同现状的调查,关于乡村教师对身份的认知、情感接纳与行为倾向三个维度的信息,该部分题目设计采用Likert五级量表,共31题。第三部分是调查乡村教师身份认同的影响因素和提升建议,题目设计采取多选题+开放题的混合方式,共9题。本次问卷调查时间为2023年3月-2023年9月,通过问卷星和少量纸质问卷在调研点开展调研。本次调研问卷共发放2317份,回收1986份,剔除无效问卷78份(如答题时间过短、答案唯一等),回收有效问卷1908份,有效问卷率为82.3%。

作者简介:张善富(1991-),男,博士,讲师,研究方向:教师教育、教育发展。

代江丽(1988-),女,学士,讲师,研究方向:教育管理。

此外,为更好开展研究,研究样本需要符合目的性抽样的条件,所选样本均需为在农村从事教育工作的教师,且自身对乡村教师身份认同建构话题具有一定的思考。在研究对象选择方面,基于年龄、性别、入职时学历、专业技术职称、教师职务、教师招录方式、学校类型等方面差异,选取13位乡村教师作为研究对象,并于2022年10月-2023年5月间对相关人员陆续开展访谈。

三、研究发现

(一) 云南省乡村教师身份认同整体面貌

云南省乡村教师身份认同总体水平平均值为3.46,略高于临界值3.0,但低于4.0,这表明云南省乡村教师整体认同水平处于“一般认同”,未达到“高认同”水平,其中个体认知水平和个体行为倾向水平分别为3.51和3.46,略高于个体情感体验水平3.41,这在一定程度反映出乡村教师对乡村教师职业的义务、责任等方面具有较为清晰的认识,能够在日常教育教学实践中更多关爱、关怀学生,担负起教书育人的职责,但乡村教师对个体身份的情感认知仍然存在较多障碍,这也制约了乡村教师个体身份认同的有效建构。

表1. 乡村教师身份认同整体水平及各维度水平状况表

维度	样本量	最小值	最大值	平均值	标准差
总体水平	1908	1	5	3.46	0.65
个体认知	1908	1	5	3.51	0.62
个体情感体验	1908	1	5	3.41	0.67
个体行为倾向	1908	1	5	3.46	0.64

为更清晰、直观呈现乡村教师不同认同水平教师群体的身份认同差异,本研究以样本认同水平平均分3分作为衡量标准的临界值,将认同水平总体均分 ≥ 4 作为高认同水平,认同水平总体均分 $3 \leq$ 且 < 4 作为一般认同水平,认同水平总体均分 < 3 作为低认同水平。如表2调查结果,8.43%的乡村教师身份认同处于高水平状态,68.29%的乡村教师身份认同处于一般认同水平状态,23.27%的乡村教师身份认同处于低水平状态,这说明云南省乡村教师身份认同整体水平偏低,未达到理想样态。具体来看,在高认同群体中,个体认知 $>$ 个体情感体验 $>$ 个体行为倾向,这表明该群体乡村教师对乡村教师身份、角色有较为清晰认识、定位,并能较好履行好自身职责,肯定自身职业的内在价值,从而不断实现主体自身的专业发展;在一般认同群体中,个体认知 $>$ 个体行为倾向 $>$ 个体情感体验,这表明该群体乡村教师对乡村场域中的各个主体整体上呈现出较为积极的态度,但对乡村教师身份、角色等方面的认知仍有较大提升的空间,这也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其个体身份认同的有效建构;在低认同群体中,个体认知 $>$ 个体行为倾向 $>$ 个体情感体验,相关数值均低于临界值3,这表明该群体乡村教师缺乏对乡村教师职业的清晰认知,对乡村教师义务、责任等方面也缺乏认同,对乡村教师职业比较排斥,因而在日常教育教学工作实践中很难全身心投入其中。

表2. 乡村教师身份认同整体水平及各维度水平状况表

维度	样本量	占比/%	总体平均值	标准差	个体认知均值	个体情感体验均值	个体行为倾向均值
高认同群体	161	8.43	4.23	0.57	4.28	4.22	4.19
一般认同群体	1303	68.29	3.60	0.61	3.64	3.56	3.60
低认同群体	444	23.27	2.77	0.65	2.86	2.67	2.78

(二) 云南省乡村教师身份认同群体差异情况

本部分主要从关键人口学变量对云南省乡村教师身份认同现状的群体差异特征进行解释。具体来看:

1、性别差异

男性和女性乡村教师身份认同的整体平均水平分别为3.33和3.57,女性群体乡村教师身份认同感高于男性。长期以来教师,教师职业被认为是“铁饭碗”,其典型特征在于稳定有保障,能够给家庭提供一定的经济支持。^[11]对女性教师而言,他们看重教师职业的稳定性,也对教师职业其他优势,如寒暑假等福利,较为看重,这有利于她们更好地投入家庭生活之中。正如D老师所言,“这份工作尽管收入比不上,但比下也有余,更重要的是我超级爱这种寒暑假,这份职业给了很多看不到的幸福,有些东西永远不能简单地用金钱衡量……”但值得注意的是,“铁饭碗”似乎对男性乡村教师而言并不是一个值得骄傲的一种提法。B老师认为:“这个铁饭碗么,要看怎么看。实际上,铁饭碗,也就是穷地稳定……”在传统观念中,相较于女性,男性往往承担更多的家庭经济重任,经济收入水平成为衡量男性的关键指标,^[12]然而乡村教师整体收入水平相较其他行业一定程度上有较大不足,因而“成为乡村教师”往往意味着更大的经济负担压力。此外,乡村教师群体社会声望、名声等各个方面同样存在较多问

题,这对活在“面子”中的男性乡村教师群体而言,必然会影响其个体身份认同。

表 3. 乡村教师身份认同整体水平性别差异表

维度	样本量	平均值	标准差
男	877	3.33	0.71
女	1031	3.57	0.62
总体水平	1908	3.46	0.65

2、民族差异

汉族和少数民族乡村教师身份认同的整体平均水平分别为 3.36 和 3.59,少数民族群体乡村教师身份认同感略高于汉族群体教师。一直以来,云南省高度重视民族教育工作,对民族地区教育实行一定的倾斜优惠政策,重点推进对少数民族地区教育援助、帮扶等工作,取得了较为突出的实效。近年来,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的主线引领下,各级政府不断加大对民族地区教育事业的投入,这些成效取得了较为突出的成就。L 老师在访谈中提及,“我们这属于老少边穷了,国家很重视各项工作。前几年脱贫攻坚,国家投入了大精力在这边。这两年,义务教育均衡发展验收,国家也是投入了大经费在我们教育这块……”基于此,少数民族教师的身份认同感体现出较好的发展态势。但值得注意的是,云南省汉族教师群体身份认同感相较而言较低。这可能是因为云南省是少数民族聚居地区,生活在少数民族地区的汉族教师属于“外来人”^[13],对当地的方言、风土人情等方面缺乏一定的必要了解,因为影响了其身份认同建构。

表 4. 乡村教师身份认同整体水平民族差异表

维度	样本量	平均值	标准差
汉族	1102	3.36	0.69
少数民族	806	3.59	0.61
总体水平	1908	3.46	0.65

3、教龄和职称差异

不同教龄乡村教师身份认同的整体平均水平差异较大,教龄≤5、5-10、11-15、16-20、≥20 群体乡村教师身份认同水平分别为 3.01、3.42、3.56、3.73、3.89,这表明教龄和乡村教师身份认同之间呈现出正相关关系,即教龄越长,教师身份认同感越高,教龄越短,教师身份认同感越低。这里需特别关注的是乡村青年教师群体身份认同感低问题,这一发现跟已有研究论断较为一致。^[14]相较教龄长的乡村教师,乡村青年教师社会、生活、情感等方面压力更大,职业稳定性整体较差,容易在教师职业生涯发展初期陷入身份认同危机之中,进而发生不可逆的流动、流失现象。对教龄长的乡村教师而言,在长期乡村教育实践中,已建构较为稳定的教育生态链接,拥有较为稳定的社会、物质和文化资源,能够游刃有余地应对各种困难,因而身份认同感较高。正如 I 老师所言:“到我这年纪,这辈子差不多就这样了。我也就只会教教书,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经营好自己的小家,这也就够了……”。

表 5. 乡村教师身份认同整体水平教龄差异表

维度	样本量	平均值	标准差
≤5	519	3.01	0.62
5-10	378	3.42	0.68
11-15	423	3.56	0.71
16-20	301	3.73	0.61
≥20	287	3.89	0.57
总体水平	1908	3.46	0.65

另一与教龄高度关联的群体差异特征是教师职称。一般而言,教师教龄越高,教师职称越高,两者呈现出正相关的关系。乡村教师认同水平职称差异见表 6。云南省不同职称乡村教师身份认同的整体平均水平差异较大,三级及以下、二级、一级、高级及以上职称乡村教师群体身份认同水平分别是 3.26、3.21、3.52、3.78,这表明云南省乡村教师高职称教师身份认同水平优于低职称教师。一般而言,高职称教师多工作经验丰富,能够较好地胜任教育教学工作,此外伴随着教师个体职称晋升,教师工资收入增加,其工作满意度会进一步提升,进而建构其较高的教师身份认同感。^[15]值得注意的是,三级及以下、二级、一级乡村教师群体身份认同水平两者之间并无显著差异。这表明乡村教师身份认同建构需要着眼于乡村青年教师群体,这事关乡村教育能否高质量可持续发展的未来。

表 6. 乡村教师身份认同整体水平职称差异表

维度	样本量	平均值	标准差

三级及以下	287	3.26	0.82
二级	583	3.21	0.65
一级	499	3.52	0.71
高级及以上	539	3.78	0.61
总体水平	1908	3.46	0.65

4、婚恋差异

不同婚恋情况乡村教师群体身份认同的整体平均水平差异较大,已婚未异地、已婚异地、单身的乡村教师群体身份认同分别为 3.41、3.63、3.21,这表明教师婚恋情况能够对乡村教师身份认同产生影响。相较单身乡村教师群体,已婚教师群体的教师身份认同感更高,教师职业稳定性越好,而在已婚教师群体内部,是否异地同样影响着该群体教师身份认同建构。已有研究表明,“子女教育及家庭生活”是乡村教师发生流动、流失最主要的影响因素。^[16]在访谈中,E 老师提及个人未来生涯发展规划时,就说到“我未来想调县份上去,很大一部分原因就是我和我老公两地分居,这种长期以来对家庭会有影响的。未来有了孩子,孩子教育我也要给他考虑考虑,毕竟农村这教育什么样子,我自己作为老师,我还是心里有点数的……”类似 E 老师这样想法的乡村教师并不是少数,他们都或多或少地表达了这方面的忧虑。另外,需要注意的是,对单身乡村教师而言,他们个人情感问题和个人问题成为身份认同建构的重要影响因素。城乡经济二元催生城乡人口结构错位,单身教师在所处于的乡村场域的婚恋市场往往是错位的,其个人的婚恋问题成为这一群有效建构身份认同的重要阻碍。K 老师在访谈中不无调侃地说道“也着急个人问题,但是也没有办法。也去相亲了,但是么,主打相互瞧不着。各方面条件好的看不上我们这种,我也不能贴上去。一般点的,我又看不上。只能先这么耗着,未来还长,说不定就有缘分了……”。

表 7. 乡村教师身份认同整体水平婚恋差异表

维度	样本量	平均值	标准差
已婚,否	751	3.41	0.67
已婚,是	778	3.63	0.62
单身	379	3.21	0.71
总体水平	1908	3.46	0.65

5、任教岗位差异

云南省不同任教岗位乡村教师身份认同的整体平均水平差异较大,普岗教师、特岗教师、编制外教师、临聘教师乡村教师群体身份认同分别为 3.50、3.33、3.13、3.14,这表明普岗教师乡村教师群体身份认同显著优于特岗教师、编制外教师、临聘教师等其他乡村教师群体。近年来,云南省为补充农村义务教育师资,招聘了大量的特岗教师群体,但特岗教师群体从事教育教学工作学校的整体环境相较而言更加艰苦,待遇、职称、编制、职称申报等各方面或多或少存在一定劣势^[17],这就导致特岗教师在其教师生涯初期的起步往往就处于不利境地,因而很难建构起得当的、积极的乡村教师身份认同感。F 老师在访谈中提及“成为特岗教师是现阶段个人经过综合权衡后不得不做的现实选择”。而对于编制外教师、临聘教师,他们更多被看成体制外的人,则更容易理解他们的处境和现实焦虑。考虑到本研究样本量较小,参考价值有限,在此不做过多的探讨。

表 8. 乡村教师身份认同整体水平任教岗位差异表

维度	样本量	平均值	标准差
普岗教师	1511	3.50	0.66
特岗教师	331	3.33	0.61
编制外教师	56	3.13	0.71
临聘教师	10	3.14	0.53
总体水平	1908	3.46	0.65

6、入职时学历差异

云南省入职时不同学历乡村教师身份认同的整体平均水平差异较大,初中及以下、中专中师、大专、本科、研究生乡村教师群体身份认同分别为 3.87、3.59、3.29、3.11、2.81,这表明入职时学历跟乡村教师身份认同水平两者之间是反比关系,学历越低,乡村教师身份认同感越强,反之学历越高,乡村教师身份认同感越低。事实上,入职时学历这一因素跟教师年龄关联密切,教师入职时学历越低,其年龄往往越大,入职时学历越高,其年龄越小,这与云南省乡村教师招聘的历时性变迁紧密关联。入职时学历为初中及以下、中专中师层次的教师多为 40 周岁以上教师,职称高、收入高,所面临的社会生活压力往往较小,因而教师身份认同感高,而入职学历为本科及研究生学历的教师多为年轻教师,职称低、工资低,生活压力大,因而教师身份认同感偏低。此外,对研究生

学历的乡村教师群体而言,他们有更多“逃离乡村”的机会,现有的选择多被视为短期选择。但是对入职时学历为初中及以下、中专中师层次的教师,他们教学经验、专业发展乃至社区交往等各个已经固定,因而职业稳定性较好,乡村教师身份认同感因而也处于较好的位置。

表 9. 乡村教师身份认同整体水平入职时学历差异表

维度	样本量	平均值	标准差
初中及以下	67	3.87	0.62
中专中师	563	3.59	0.67
大专	532	3.29	0.73
本科	736	3.11	0.64
研究生	10	2.81	0.62
总体水平	1908	3.46	0.65

7、生源地差异

云南省生源地不同乡村教师身份认同的整体平均水平差异较大,生源地为乡村、市区的乡村教师群体身份认同分别为 3.53、3.16,这表明生源地为乡镇的乡村教师群体对乡村教师身份认同感高于生源地为市区的乡村教师。这里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随着教师招聘难度逐渐加大,开始有城市家庭孩子愿意到乡村学校开展教育教学工作,但对生源地为市区的乡村教师而言,他们缺乏必要的乡土情怀^[18],对乡村教育场域的实践样态缺乏必要的了解,往往成为乡村场域中的“陌生人”,难以融入乡土社会。正如有学者指出,“为数不少的乡村青年教师存在不安心教学的现象,把乡村教师这一职业看作是临时岗位或‘跳板’,过着‘骑驴找马’的日子,他们随时都有可能成为飞向城市的‘飞鸽’”。^[19]在调查中,另一值得注意的现象就是,生源地在市区的乡村教师多选择离城区距离较近的乡村学校工作。这一“逆城市化”乡村教育从教问题值得在后续的研究中予以追踪关注。但与此同时,应该看到另一现实,对生源地为乡镇的乡村教师而言,他们对乡村教师的身份认同感也并未达到“高认同”水平,这可能跟他们的个人成长经历、教育经历等高度关联,其中“向城性”的教育模式和城市化生活经历的影响是较为突出的。围绕此块的相关分析出现在本部分的第二和第四模块。

表 10. 乡村教师身份认同整体水平生源地差异表

维度	样本量	平均值	标准差
乡镇	1530	3.53	0.62
市区	378	3.16	0.72
总体水平	1908	3.46	0.65

8、职务差异

基于职务差异的云南省乡村教师认同水平见表 4.10。云南省职务不同乡村教师身份认同整体平均水平差异较大,普通教学类、学科年级类、校级类的乡村教师群体身份认同分别为 3.41、3.51、3.78,这表明教师职务会对乡村教师身份认同产生影响,有校级领导职务的乡村教师身份认同感高于学科年级类和普通教学类乡村教师群体。在乡村教育场域中,相较普通教师,校级领导往往拥有更高、更多的权力,其个体在乡村学校、乡村的社会地位和声望高,这种社会认可往往会影响着乡村教师个体对其教师身份的认同。对普通教师而言,他们在承担日常教育教学的同时,承担越来越多的各种非教学性事务,教师负担并未得到减轻,因而降低了个体身份认同感。在访谈中,L 老师罗列了相关非教学性事务,包括但不限于:精准扶贫、乡村振兴、疫情防控、办学情况报表、禁毒防艾、定期家访、消防安全、卫生健康安全、反邪教、防诈骗、防溺水、防校园欺凌、防火防盗、防触电、防地震、心理健康教育、交通安全宣传、普法宣传、留守儿童关怀、未成年人保护、四风建设、师德师风学习、护学岗、志愿岗、各类教学培训等。这些非教学性事务极大地限制了乡村教师常规性的教育教学活动,也对教师身份认同产生了不利影响。

表 11. 乡村教师身份认同整体水平职务差异表

维度	样本量	平均值	标准差
普通教学类	1350	3.41	0.62
学科年级类	435	3.51	0.67
校级类	123	3.78	0.59
总体水平	1908	3.46	0.65

四、研究讨论与建议

基于实证调查结果来看,云南省乡村教师身份认同整体水平属于“一般认同”水平,在个体情感体验水平方面表现较差,体现出乡村教师群体乡村情感较为薄弱,因而乡村教师发生流动流失的可能较大。在实证调研过程中,研究发现部分乡村学校老龄化问题尤为严重,中青年骨干教师“向城性”流动趋势显著,带来的突出问题就是乡村学校教育质量得不到保证,农民群众子女“上好学”的教育愿望得不到满足,一定程度上损害了我国基础教育公平有质量发展。此外,云南省乡村教师身份认同的群体差异特征较为显著,在性别、民族、教龄、婚恋情况等方面体现出显著的差异性。进一步对以上群体差异进行分析,发现此类差异多关联教师年龄这一关键要素,其指向的更多是年龄所关涉的“社会变迁”要素,而教师年龄段正好对应社会变迁的关键时间段。

从社会变迁视角来看,乡村教师队伍建设政策是形塑乡村教师身份认同的关键要素,政策支持及背后的资源投入扮演着关键角色。长期以来,我国乡村教师队伍建设在教师队伍建设体系中处于弱势地位,未得到足够的重视。尽管这一状况在近些年得到较为显著的改善,如乡村教师支持计划的实施,但现阶段短期的乡村教师队伍建设政策优化难以改变长期“向城性”导向基础教育政策的“积弊”,现阶段对乡村教师队伍建设的政策性“补偿”不足以扭转“城优乡劣”教师队伍现状。这种事实性差异也成为乡村教师身份认同感低的现实基础。与此同时,不应该忽视乡村教师个体主观能动作用的发挥。面对乡村教育场域中的各类问题,能否发挥个体主观能动性予以应对,直接决定乡村教师个体身份认同的有效建构。实证调查显示,云南省乡村教师在面对乡村教育困境时,其个体主观能动性发挥往往受限,往往迷失了乡村教师身份认同,陷入身份认同危机之中。

参考文献:

- [1] 容中逵.教师身份认同构建的理论阐释[J].教育研究,2019(12):135-144.
- [2] 张淑华,李海莹,刘芳.身份认同研究综述[J].心理研究,2012(01):21-27.
- [3] 谢爱磊,刘群群.声望危机隐忧下的乡村教师荣誉制度建设研究[J].中国教育学报,2019,(01):23-28.
- [4] 时伟.乡村教师形象:他者认知与自我建构[J].中国教育学报,2017,(05):21-25.
- [5] 牛震乾.论乡村教师身份认同的“边界”问题[J].现代教育科学,2018(02):79-83.
- [6] 谷亚,肖正德.乡村教师的污名化媒介镜像:何以建构与如何解构[J].当代教育论坛,2021,(03):107-114.
- [7] 史兴松,程霞.国内教师身份认同研究:回顾与展望[J].现代教育管理,2020(4):54-60.
- [8] 魏淑华,宋广文,张大均.我国中小学教师职业认同的结构与量表[J].教师教育研究,2013(01):55-60+75.
- [9] 寻阳,孙丽,彭芳.我国外语教师身份认同量表的编制与检验[J].山东外语教学,2014(05):61-67.
- [10] 张丽萍,陈京军,刘艳辉.农村教师职业认同问卷的编制[J].当代教育论坛,2011(09):10-12.
- [11] 付卫东,范先佐.《乡村教师支持计划》实施的成效、问题及对策——基于中西部6省12县(区)120余所农村中小学的调查[J].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8,57(01):163-173.
- [12] 谢爱磊,刘群群.声望危机隐忧下的乡村教师荣誉制度建设研究[J].中国教育学报,2019,(01):23-28.
- [13] 王艳玲.“局外”与“局内”:多元文化学校情境中教师的跨文化适应及其课程实施取向探究[J].全球教育展望,2014,43(04):45-58.
- [14] 刘铖,陈鹏.乡村定向师范生的多重身份冲突——基于社会学制度主义的教育民族志研究[J].教育发展研究,2022,42(02):18-27.
- [15] 李森,崔友兴.新型城镇化进程中乡村教师专业发展现状调查研究——基于对川、滇、黔、渝四省市的实证分析[J].教育研究,2015(7):98-107.
- [16] 王艳玲.乡村教师离职意愿影响因素的变与不变——基于《云南省乡村教师支持计划(2015—2020年)》实施前后的比较[J].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23,41(09):85-99.
- [17] 王晨,张鹏飞.农村青年特岗教师职业“转场”心态的社会学考察[J].教育学术月刊,2023,(02):83-90.
- [18] 王艳玲,陈向明.回归乡土:我国乡村教师队伍建设的途径选择[J].教育发展研究,2019,39(20):29-36.
- [19] 郑新蓉,王成龙,佟彤.我国新生代乡村教师城市化特征研究[J].河北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16,18(03):70-77.

Investigation into the Professional Identity of Rural Teachers in Yunnan Province: Analysis of 1908 Survey Responses

Shanfu Zhang¹, Jiangli Dai²

¹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 of Yuxi Normal University, Yuxi 653100, Chin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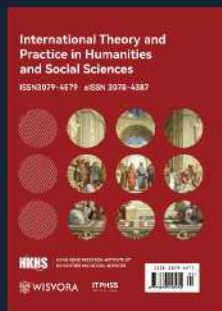
² Yuxi Sports School, Yuxi 653100, China

Abstract: The phenomenon of professional identity crisis among rural teachers has become increasingly prevalent. Many educators in rural areas persistently grapple with value conflicts in seeking professional meaning, giving rise to a series of practical challenges in educational practice. This situation significantly hinders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rural education, consequently constraining the achievement of equitable quality education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areas, and further limiting rural students' access to quality educational opportunities as desired by farming communities. In Yunnan Province, the professional identity crisis manifests notable prevalence, with overall identity levels remaining at a "moderate" rather than "high" recognition status. Distinct group variations are observed across gender, ethnicity, years of teaching experience, and marital status. Additionally, rural teachers demonstrate substantial potential risks of occupational mobility or attrition.

Key words: Rural teacher; Professional identity; Investigation

WISVORA 出版社：专注于学术出版管理，WISVORA 出版社提供期刊编辑、论文出版和国际索引、期刊创办、期刊托管等服务，增强学术研究的全球传播和影响力。

www.wisvora.com



人文与社会科学学刊

《人文与社会科学学刊》是由香港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主办的学术期刊，致力于为人文与社会科学领域的研究者提供一个高质量的学术交流平台。本刊重点关注学术研究中的理论创新与实践应用，旨在探讨人文与社会科学领域的核心议题，促进知识的广泛传播与共享。作为一份面向全球中文学术界的专业期刊，本刊倡导跨学科、跨文化视角的学术探讨，为学术界和实践领域之间搭建桥梁，推动社会科学知识的进步与应用。

Online ISSN 3079-4560
Print ISSN 3079-4552

ISSN 3079-4552



9 773079 455255



学术赠阅

权责声明

期刊所刊载的评论、意见、观点等均出自文章作者个人立场，不代表本出版社的观点或看法。对于文章任何部分及文内引用材料给任何个人、机构、及其财产所带来的任何损失及伤害，本出版社均不承担任何责任。我们郑重声明，本出版社的出版业务，不构成对任何产品商业性能的保证，也不表示本社已承认本社出版物中所述内容适用于某特定用途。如有疑问，请寻找专业人士协助。